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

1855年1月—1855年6月

著 作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封面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3084-2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225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四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2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26 插页:2

字数:70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01-013084-2 定价:6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7-01-013084-2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5 年 1 月至 6 月所写的政论、时评和军事文章,共计 107 篇。这些文章中,除恩格斯的《欧洲军队》一文发表于美国《普特南氏月刊》外,其他都发表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

1855 年,欧洲仍然处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危机已显露端倪,革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一些地区虽有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仍然处于低潮。在革命报刊遭到查禁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稿,成为他们传播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评述国际重大事件、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内外政策、推动革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当时正专心从事经济学研究,但仍挤出时间为《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同恩格斯紧密合作,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为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判断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认清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本质、明确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本卷所收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要涉及克里木战争及其进程,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在当时条件下如何推进工人运动和群众性革命民主运动等重要问题。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是克里木战争及其进程。在有关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本质,指出这场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参战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整个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欧洲列强在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的利益所在和矛盾焦点,指明它们相互斗争和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土耳其帝国、争夺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的霸权,从而彻底揭穿了英法等国的政客和官方报刊把英法对俄战争说成是为了“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的谎言。

在《欧洲的斗争》、《奇怪的政策》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俄、英、法等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其野心是妄图吞并土耳其进而称霸欧洲,对于沙皇来说,“问题将不再是应当由谁来统治君士坦丁堡,而是应当由谁来号令整个欧洲”(见本卷第 318 页);而就英、法来说,它们力求削弱俄国这个在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的手,从俄国手中抢走克里木和高加索,而根本不想摧毁反动的沙皇制度。他们还指出,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使俄国在欧洲取得了优势地位,“然而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 1815 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怪政策:“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存维也纳条约,而借口却是削弱俄国的实力!”(见本卷第 481 页和第 48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剖析了英、法等国惧怕战争扩大而努力使克里木战争局部化的企图。他们在《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局部

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等文章中着重指出,英法统治集团害怕东方冲突演变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烈火,因而努力使战争局部化。由法国政府提出的“为了局部目的的局部战争”(见本卷第 468 页)的计划,完全符合法国和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企图维护欧洲反动制度的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欧洲革命民主运动的立场出发,期望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有利时机,把克里木战争转变为“人民战争”(见本卷第 5 页),转变为反对现存反动制度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欧洲革命。他们在《克里木战局的回顾》、《英国的危机》、《大冒险家的命运》、《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等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期望。他们指出:“这场战争与商业危机(目前还只有一些初步表现)结合在一起,由那些没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的人们所指挥,同时又具有欧洲规模,就必然会引起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将使无产者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在法国 1848 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那时将只存在着以民主革命为一方和以君主反革命为另一方的斗争。”(见本卷第 293—294 页和第 223 页)

论述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群众性革命民主运动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这部分文章主要是由马克思撰写的。

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英国的危机》、《金融市场》和其他一些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国内外贸易、市场价格、汇率等方面的情况。他考察了 1853 年底和 1854 年初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在 1855 年重演的种种特征,预言英国不久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危机。这一预言在 1857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典型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经济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以及繁荣和危机阶段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等规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总是习惯用与工商业无关的偶然情况来解释危机”,企图“把 1854 年危机的责任推到战争上面,就如同把早在 1847 年就已爆发的危机的责任推到 1848 年革命上面一样”(见本卷第 25 页)。马克思指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工业制度致命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本国造成过度生产,在所有其他国家则造成过度投机”(见本卷第 46 页)。

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经济状况时尖锐地批判了以自由贸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贸易派宣称,只要推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就会使经济危机消失,并企图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幻想和臆断,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马克思还抨击了自由贸易派以提高英国的竞争力为名,力图废除限制妇女与儿童的劳动时间的法律和破坏工厂视察制度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马克思把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同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契机。马克思指出:“一旦工人阶级普遍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处于沉寂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那时,英国工人就会重新起来进行斗争;并且恰好是在资产阶级最终把贵族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时候,给资产阶级以威胁。到那时,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的假面具将会脱落下来。英国的两股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这个国家终将被纳入欧洲社会的总的社会发展轨道。”(见本卷第 185—18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阿伯丁内阁的倒台》、《论内阁危机》、《被推翻的内阁》、《上一届英国政府》、《两种危机》、《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不列颠宪法》等文章中深刻地揭示了英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论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历史成因和阶级特征。马克思写道:“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妥协。”(见本卷第 187 页)他指出,贵族保持对国家最重要职位的垄断,是英国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这使贵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发挥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给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议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军事管理机构的组织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场上。马克思认为,阿伯丁内阁和帕麦斯顿内阁的活动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地阻碍任何威胁英国上层统治阶级政治垄断的进步改革。

马克思在《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对英国官方政党,特别是对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辉格党自由派轮流执政的传统两党制作了深刻评述,指出两党的争斗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之争,在野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逼迫对手下台的手段。实际上,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都竭力巩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寡头政治制度。马克思还指出,陈旧的政治制度已不适合英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的议会政党

已经蜕化。他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宗派罢了。”（见本卷第 110 页）马克思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 19 世纪中叶英国旧贵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揭示了资本家阶级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位在日益巩固的事实。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的文章中介绍并积极评价了英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性革命民主运动，特别是宪章运动的进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左翼领袖厄·琼斯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论鼓动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等文章中，马克思论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斗争方向。他指出，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影响、拉拢和利用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附庸。他称赞宪章派对资产阶级的这类企图所进行的斗争。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一文中，马克思从英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支持人民群众争取普选权的要求。他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普选权“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政治权力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见本卷第 436 页）

英国议会以遵守基督教戒律为由，制定了限制在星期日出售酒类和营业的法案，宪章派发起了反对这两个法案的群众示威。马克思对这一重大事件给予高度评价。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议会提出这两个法案的根本原因，指出：“在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

而且在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宗教的惩治法律是为了对付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的良心得到安慰。”(见本卷第 504 页)马克思揭示了这次运动的历史意义,把它看做英国革命的开始,并指出:“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像英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斗争一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下等’人反对‘上等’人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见本卷第 50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的一些文章中对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等欧洲国家的对外对内政策作了精辟分析。

在《大冒险家的命运》、《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拿破仑最近的诡计》、《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波拿巴当政的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是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指出军事冒险是波拿巴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掠夺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团政治统治和波拿巴王朝执政本身所依据的原则之一。恩格斯写道:“对亚历山大来说,塞瓦斯托波尔并不就是俄国,远远不是;但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拿不下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见本卷第 249 页)恩格斯还揭露了波拿巴政体的反动性:“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被禁止,其拥护者被流放到非洲,编入劳役连和劳役营,去干最苦最危险的活。”(见本卷第 287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比路易·波拿巴和拿破仑·波拿巴,对路易·波拿巴作了辛辣的讽刺:“复辟的帝国不管怎样战战兢兢地模仿自己的原型,还是不得不到处做和拿破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这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见本卷第 226 页)

在《欧洲面临的战争》、《欧洲的斗争》、《皮亚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

所采取的观望立场,揭示了奥地利采取两面政策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奥地利统治集团害怕革命,需要沙皇政府作为支柱,以便在革命爆发时向俄国求助。另一方面,奥地利觊觎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又希望俄国被削弱。因此,奥地利采取了摇摆不定的态度,它与英法订立条约并作出许多承诺,在多瑙河集结了大量军队,有力地钳制了俄军的行动,但是它自始至终未投入战斗,并未正式对俄宣战。

在《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等几篇文章中,马克思介绍了英国议会和报界对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中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所谓中立立场的不满和批判。马克思引用一位英国国务活动家的话形象地说明了普鲁士的态度:普鲁士的政策“‘既非欧洲的,又非德国的,也非普鲁士的’;与其说是要牵制俄国,不如说是要挫败奥地利”。(见本卷第2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项条款》、《欧洲战争》、《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分析了俄国的对外政策。他们指出俄国进行克里木战争的真正企图是要控制土耳其和称霸欧洲,并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在历史上一再表现的侵略扩张性。恩格斯在谈到俄国的对外扩张史时写道:“只要敌人还在它的领土上,就不可能议和。近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从未缔结过一次丧失领土的和约。甚至蒂尔西特和约都给俄国增加了领土……”(见本卷第465—466页)。恩格斯还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利用欧洲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把斯拉夫联合起来的口号

变成实现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

本卷收录的关于克里木战争的军事评论和军事论文主要是恩格斯撰写的,其中包含军事学说史、军事理论、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性的结论。恩格斯 1850 年移居曼彻斯特后对军事科学作了系统研究,在撰写有关克里木战争的评论时,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全面掌握各种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对交战各方的兵力、装备、军事素质和攻守策略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精辟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评述了英法联军司令部的战略,指出了它在指挥方面的一系列失误。他指出,这个司令部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和统筹全局的主动精神,在战术思路和作战方法中表现出墨守成规的惰性和目光短浅的缺陷,而这一切是由英法统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追求的那种极为自私的、反人民的目的所决定的。在《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不列颠军队》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英国军队组织的守旧性、英国军官理论素养和军事素养水平的低下、司令部和军需部领导者的庸碌无能,指出指挥失当、管理混乱是造成英军士兵在克里木大量伤亡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的大部分军事评论涉及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情况。他详细分析了英法军队的围攻方法和俄国军队的防御方法,对要塞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的作用以及野战军与要塞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恩格斯在《克里木战局》、《战争的进程》、《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等文章中,评析了联军把英法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分开的战略错误以及在围攻策略方面的败笔。他写道:“比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更出色的防御战的确不乏其例,但是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毫无章法、愚不可及的围攻战例,在特洛

伊围攻战以来的战争编年史中却一个也找不出来。”(见本卷第 306 页)恩格斯在对联军战略战术基本上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对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守军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和出色的工程艺术作了肯定,并把这次防御战看成是积极防御的典范。

本卷还收入恩格斯为纽约《普特南氏月刊》写的一篇重要军事著作《欧洲军队》。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详细评述了欧洲各国的军队,分析了各国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和官兵的战斗素质的特点。恩格斯揭示了近代以来各国军事信息互相公开和军事制度趋于一致的新情况:“从前每一个大国都出于猜忌而把自己军队的情况神秘地掩盖起来,如今已不再是这样了。”“由于这种公开性的原因,文明世界各国的陆军部在平时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事委员会,目的在于讨论一切新提出的改革措施的优点,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利用所有其他成员的经验。这样一来,几乎一切欧洲军队的体制、组织和一般管理制度就大体上趋向一致……”(见本卷第 529 页和第 530 页)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军事著作的历史唯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其中包括关于某国军队永远不可战胜的神话,指出从战争史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军事素质,就勇敢和善战这两点而言,在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间,总的说来都是相当均等的。”当然,“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特别是不同的文明程度,却又造成了许多差异,使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各有其特殊的长处和短处”。要想在军事竞争中占据优势,各国“在现今军事公开性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只有下功夫在国家的军事制度和资源利用方面多动脑筋,作出改进,有所创造,并发展那些为本国所特有的军事素质”。(见本卷第 532 页和第 530 页)恩格斯的整篇著作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力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政治

状况。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相应时期的有关卷次增加了恩格斯的 11 篇文章：《克里木战局》、《克里木的前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德国与斯拉夫民族》、《欧洲的斗争》、《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袭击》、《必败无疑的围攻》、《新任法军总司令》、《克里木的消息》。由于马克思给《新奥得报》写的有关克里木战争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根据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翻译的，在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本卷只收入恩格斯写的原文，而将马克思的译文与原文不同之处以脚注的形式反映出来。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收入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翻译的、发表在《新奥得报》上的文章《克里木事件》、《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和《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本卷则收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恩格斯的的文章《克里木的战果》、《拿破仑的辩白》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收入本卷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4 卷（2001 年）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目 录

前言	1—11
卡·马克思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	3—9
卡·马克思 报刊和军事制度	10—14
弗·恩格斯 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	15—23
卡·马克思 *工商业危机	24—32
卡·马克思 *四项条款	33—39
卡·马克思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	40—48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	49—51
卡·马克思 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 ——克兰里卡德	52—5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评塞瓦斯托波尔的 围攻	55—57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前景	58—64
卡·马克思 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 ——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骚动	65—67
卡·马克思 议会常会开幕	68—71
卡·马克思 论内阁的危机	72—74
卡·马克思 议会状况	75—79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	80—8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新闻。	
——战区消息	87—91
卡·马克思 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92—99
卡·马克思 论内阁危机	100—104
卡·马克思 被推翻的内阁	105—108
卡·马克思 政党和集团	109—11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上一届英国政府	112—119
卡·马克思 两种危机	120—123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斗争	124—1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军队	129—132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格莱斯顿的发言	133—134
弗·恩格斯 欧洲面临的战争	135—143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	144—150
卡·马克思 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 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	151—153
卡·马克思 议会	154—158
卡·马克思 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	159—1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和军事问题	162—164
卡·马克思 论新的内阁危机	165—168
卡·马克思 休谟	169—170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171—178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	179—182
卡·马克思 英国的危机	183—186
卡·马克思 不列颠宪法	187—190

卡·马克思	莱亚德	191—192
卡·马克思	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	193—196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	197—199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200—203
卡·马克思	调查委员会	204—207
卡·马克思	布鲁塞尔回忆录	208—209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复仇	210—213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战果	214—218
弗·恩格斯	大冒险家的命运	219—2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	224—227
卡·马克思	*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228—231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的消息	232—234
卡·马克思	*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	235—238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	239—244
弗·恩格斯	拿破仑最近的诡计	245—249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	250—255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256—259
弗·恩格斯	不列颠军队	260—264
卡·马克思	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	265—26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调查委员会的揭露	268—271
弗·恩格斯	战争的进程	272—27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克里木局势	277—280
卡·马克思	法国立法团的丑事。——德鲁安-德 路易的影响。——民军的现状	281—283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	284—288
卡·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289—294
弗·恩格斯	拿破仑的辩白	295—301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302—306
弗·恩格斯	德国与斯拉夫民族	307—316
弗·恩格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317—324
	一	317
	二	320
弗·恩格斯	欧洲的斗争	325—328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	329—335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轰击	336—343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344—351
卡·马克思	论鼓动运动的历史	352—355
卡·马克思	皮亚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	356—35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	359—366
卡·马克思	*《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 和托利党	367—369
卡·马克思	上院会议	370—374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	375—378
卡·马克思	金融市场	379—381
卡·马克思	关于改革运动	382—384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	385—392
卡·马克思	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	393—397
弗·恩格斯	必败无疑的围攻	398—400
弗·恩格斯	新任法军总司令	401—403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勋爵官邸
演出的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 404—407
- 卡·马克思 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和恢复。
——所谓歼灭性战争 408—412
-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的提案 413—417
-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 418—424
-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 425—428
- 卡·马克思 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 429—432
- 卡·马克思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 433—437
-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 438—442
-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 443—446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评克里木事件 447—450
- 卡·马克思 *英国议会中的辩论 451—454
-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 455—462
- 弗·恩格斯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 463—469
- 卡·马克思 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 470—473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下院的事件。
——克里木战争 474—476
- 卡·马克思 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
——报纸印花税 477—479
- 卡·马克思 奇怪的政策 480—484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局部战争。——关于
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 485—490
- 卡·马克思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巴黎
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科暴行的辩论 491—496

卡·马克思	六月十八日的失利。——增援部队	497—502
卡·马克思	*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	503—510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	511—515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516—523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	524—526
弗·恩格斯	欧洲军队	527—609
[第一篇]	529
一、法国军队	535
二、英国军队	544
三、奥地利军队	554
[第二篇]	560
一、普鲁士军队	560
二、俄国军队	568
三、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	581
[第三篇]	585
一、土耳其军队	585
二、撒丁军队	593
三、意大利各小邦的军队	597
四、瑞士军队	599
五、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队	600
六、荷兰军队	604
七、比利时军队	604
八、葡萄牙军队	605
九、西班牙军队	605
注释	613—703

目 录

7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704—748
文献索引	749—751
报刊索引	752—788
地名索引	789—795
	796—805

插 图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多瑙河、克里木、高加索三战区	8—9
卡·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草稿)一文的手稿一页	41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克里木战区	386—387
刊载弗·恩格斯《欧洲军队》一文的1855年12月 《普特南氏月刊》第36期	587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5年1月—6月

卡·马克思

*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¹

伦敦, 12月29日。

“布奥尔伯爵、布尔克奈先生和哥尔查科夫公爵在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威斯特摩兰伯爵府邸的会晤, 目的仅在于向俄皇提供他希望了解的关于12月2日缔结的三国同盟²的意义和三大国准备在四项条款³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的信息。哥尔查科夫公爵立即向彼得堡报告了他得到的消息。沙皇^①方面是接受先决条件还是拒绝先决条件, 不日当见分晓。新的一年开始将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②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通报《晨邮报》报道的。而托利党的《新闻报》写道:

“维也纳会谈将会给奥地利一个新的借口来拖延就十二月二日条约所规定的期限问题向西方列强作最后的表态。”^③

具有决定意义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 政治家们在为日报和周报撰写的社论中以高深的政治智慧谈论新近召开的维也纳会议⁴, 而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4年12月30日《晨邮报》第25271号。——编者注

③ 1854年12月30日《新闻报》第87期。——编者注

商人们却在这些报纸上刊登的关于交易所的文章中干脆把这次会议叫做一场“闹剧”。例如，今天在《晨邮报》上发表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的那个商人就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伦敦交易所对维也纳事件似乎无动于衷，关于它的消息无论是对交易所中预测“熊市”的人还是预测“牛市”的人，无论是对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都不成其为哪怕是进行微不足道的交易的动因。近三天来国家证券的行情出现微小的波动，与此有关的不是维也纳的外交活动，而是巴黎的预算。人们推测，英国资本家会入股新发行的5亿法郎的巴黎公债⁵，因而引起货币市场的紧缩，而货币市场的情况由于北美危机（其规模比1837年的危机大得多）的影响、最近关于东印度的不妙的商业报告、粮价上涨以及伦敦和利物浦两地的若干起出乎意料的大破产，本来就越来越令人不安。如果说俄国皇帝方面对和平不存幻想的话，至少英国内阁方面对和平是充满幻想的。英国人民曾被本国的寡头政体拖入那场在上一世纪开始的同法国进行的大战。目前同俄国的战争是人民迫使英国寡头政体发动的。目前寡头政体所采取的一切外交、军事和财政的措施都表明，它不愿意进行这场它被迫进行的战争。甚至内阁最近的一项措施——招募外籍军团法案⁶——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使英国人对这次战争“失去兴趣”。在一个每年都有10万以上的健康男人迁居国外的国家，如果这种迁居只对工资水平发生短暂的影响，那就谈不上兵源枯竭的问题；同样也谈不上突然需要紧急增派辅助部队的问题，因为内阁的措施既不是为突然的援助，也不是为紧急的援助而采取的。5月通过的民军法案⁷使内阁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可以征集8万名民军，而且结果已经表明，在春季征招的各个团足足有四分之一的志愿兵转入了现役；不过，到本月初政府只编成了18个民军团（约13500人）。大家知道，英国人向

来——在查理一世时期,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在头两位乔治^①当政时期,最后在反雅各宾战争⁸时期——反对把外籍雇佣兵输入大不列颠。但是,在英国本土外使用外籍雇佣兵竟然引起了这样大的愤懑,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目前这场战争具有与英国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当政的贵族阶层决意要重新祭起过去的幽灵,采用其旧时经纪人的惯常做法,在最廉价的市场上招买士兵。虽然英国贵族根本不相信——正如悉尼·赫伯特在下院所承认的^②——自己所提出的措施会成功,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可见,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准备媾和。为了建立一支能满足需要的英国军队,政府目前本应当提高士兵的薪饷、废除体罚、保证普通士兵有晋升的机会,简言之,应当使军队民主化,把军队由政府所有变为国家所有。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不论战时或平时,军队至今都不过是一个政府机构,用来晋升贵族和支持历届内阁。”^③

我们现在要来谈谈主要的一点。对英国贵族来说,同俄国的战争意味着丧失它对政府的垄断权。英国贵族虽然从1830年以来,被迫奉行了仅仅有利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国内政策,但是,由于他们保持着对外交政策和军队的垄断权,仍然占据着政府的一切要职。然而,这种垄断权只有在人民战争——只有同俄国的战争才可能是这

① 指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编者注

② 悉尼·赫伯特《1854年12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12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929号。——编者注

③ 1854年12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38号。——编者注

样的战争——把外交政策变为人民的事业以前，才能保持得住。因此英国 1830—1854 年的全部外交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一个原则：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因此英国近 24 年来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丹麦以及地球的各个角落不断向俄国作出让步。当前的事实证明，英国贵族的盘算是正确的。同俄国的战争刚开始，连《泰晤士报》都说：

“贵族没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战争。寡头政体的国家机器同我国的社会机器明显矛盾。”

伦敦，1 月 1 日。

“我国所有的军事管理部门都在目前战争的重压下垮台了。”^①

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写的。实际上，如果看一看这个国家军事管理的组织或其他任何官方管理机构的组织，所谓宪法规定的权力均衡原则似乎就直观地展现在眼前。各种权力机构相互并立，以致相互掣肘，从而使整个机器运转不灵。因此，在当前的战争中才会出现伤员在巴拉克拉瓦，军医在君士坦丁堡，而药品在斯库塔里的事情。因此，克里木军队起来暴动，反对给他们带来牺牲的制度；既然各级军人，从上校至普通士兵，都在破坏纪律，每周给伦敦报纸投寄上千封信，并大声向社会舆论控诉他们的长官的行为，我们难道不能把它叫做暴动吗？不过，要拉格伦勋爵为制度本身所造成的状况负责是不公正的。他要负责的是军事指挥。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克里木战局，我们就会发现，拉格伦勋爵在阿

^① 1855 年 1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1939 号。——编者注

利马河会战⁹中犯了他的第一个错误,因为他不是下令迂回俄军的右翼,而是下令迂回靠海的左翼。迂回右翼就会把一部分俄军逼向大海,把另一部分俄军逼向北炮台,而俄军现在实际上是被击退到辛菲罗波尔,也就是对他们最有利的退却线上。如果说联军在阿利马河会战中曾经没有必要地和盲目地采取过大胆的行动,那么恰恰在形势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却退缩了。经常被提及的“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¹⁰就是放弃对要塞北区的进攻。而北区是居于瞰制地位,因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北炮台是攻克塞瓦斯托波尔的关键。可见,联军为了取得巩固的防御地位竟放弃了一次更大胆的,因而实际上胜利在握的进攻。

当奥美尔帕沙¹¹在卡拉法特¹²固守下来而没有从奥尔泰尼察¹³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并突破敌人的拉得很长的战线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①随后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这次围攻至少证明,随着工业的发展武器装备是增加了,但长期的和平却使得军事艺术相应地倒退了。在以往的任何一次战争中,普通的土堡都没有起过这样大的作用。起初俄军在奥尔泰尼察沿用旧的一套办法,炮击这些土堡达数小时,然后发起强攻,但是没有成功。在卡拉法特,俄军不敢攻击的土堡把俄军牵制住了。在锡利斯特里亚,一座残存的土堡使俄军的全部努力受挫,¹⁴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土堡线承受了比以往进攻最正规的要塞所使用过的更多的攻城炮队和更重的火炮的轰击。但是,在攻城部队还没有就位之前,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大家知道,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英国骑

① 恩格斯《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1—34页。——编者注

兵异乎寻常地遭到了没有必要的和盲目的牺牲。最后，我们谈一谈克里木战局中最大的军事事件，即因克尔曼会战¹⁵。像普鲁士军队在耶拿¹⁶时一样，在因克尔曼对面的英军配置在一系列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接近的高地。英军像普军一样，没有注意占领自己左翼最远处的高地，而缅施科夫在因克尔曼会战中像拿破仑在耶拿会战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投入了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而在拂晓前在敌人的翼侧设防固守下来。根本不喜欢独创的俄国人，抄袭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但是，当战略机动刚刚完成和战术动作应当开始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假面具就掉了下来，露出了鞑靼人的本色。这支拥有许多服役 25 年的老兵的出色的俄国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迟钝，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用散兵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他们的军官除了突然用大批兵力向敌人猛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大批兵力猛扑过去本来足以突破英军稀疏的队列；然而，一方面，这一道道人墙为英国枪炮火力的毁灭性威力提供了准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俄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转入白刃战时，英军以拿破仑的方队在金字塔会战¹⁷中迎击马木留克¹⁸兵时的同样的优势迎击了他们。14 000 人的联军，虽然损失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却战胜了 3 万人的俄军；尽管大家公认，俄军单个士兵都打得很勇敢，而且俄军的进攻计划比联军的计划高明。自纳尔瓦会战¹⁹以来，俄军还从来没有遭到这样的不幸。如果考虑到纳尔瓦会战时的俄军和因克尔曼会战时的俄军之间，即 1700 年的半野蛮的乌合之众和 1854 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纳尔瓦会战比起因克尔曼会战就显得出色了。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惨败，这个民族懂得把失败本身变成胜利的武器。因克尔曼会战则是从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的那种温室发展走

向衰退的确实的征兆。人为的加速发展和借助半野蛮的手段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观所作的巨大努力,看来已经使这个民族精疲力竭,使它害上了类似肺癆的病症。因克尔曼会战之对俄国步兵正如罗克鲁瓦会战²⁰之对西班牙步兵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2 月
29—30 日和 1855 年 1 月 1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新奥
得报》第 1、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报刊和军事制度²¹

伦敦,1月3日。

《泰晤士报》记者从塞瓦斯托波尔兵营报道：

“据说,俄皇^①已表示,愿意用一艘军舰把我军到5月初还活着的全部人马送还英国。”^②

该报接着对英国兵营中普遍存在的死亡、军需短缺、混乱和瓦解的情景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这种状况现在几乎成了伦敦各日报社论的唯一题目。

《泰晤士报》写道：

“英国军队从军队这个词的军事意义上说已经不成其为军队。它是一群乌合勇士;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确切地说,比这还糟,因为指挥它的是一些不配指挥它的人,并因此而使它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战斗力……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司令部纯粹是虚有其名;而且更不像样,优秀的军官们肯定地说,即使由军士来指挥这支军队,他们也不会比那些自称指挥这支军队的人逊色。我们感觉到,那些军功多、军龄长、英勇而忠诚的人被取而代之,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②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5年1月3日《泰晤士报》第21941号。——编者注

但是,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

“如果说某个内阁有可能采取这类强制办法,那就是本届内阁。”^①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样顽强地反对宣战”。因此“政府已经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不会因顾及人事问题而受约束”。^①

狮子,你吼叫得好!^② 因为本届内阁对俄国进行的战争并非出于自愿,所以作战当中的错误不应当归之于内阁,而只能由指挥作战的将领负责,并且读者应当明白,不是内阁妨碍了拉格伦勋爵,而是拉格伦勋爵妨碍了内阁。

正当《泰晤士报》为了给内阁解围用这种方式攻击拉格伦勋爵的时候,皮尔派机关报《纪事晨报》却攻击《泰晤士报》,表面上是为了袒护拉格伦勋爵,而实际上是感激《泰晤士报》承认内阁没有过失,赞同它的观点,并加以利用,同时串演一通两家政府报纸间的交锋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尊敬的《纪事晨报》写道:

“我们痛心指出,近日笼罩舆论界的沮丧情绪要完全归罪于《泰晤士报》的影响。用灰暗的色彩描写故事,夸大灾难,败坏我国将军们应得的声誉,把英国人对不在场的人所采取的尽人皆知的宽宏态度置之脑后,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耸人听闻,为了哗众取宠!特别是,把仇恨和恶毒的攻击都倾泻到拉格伦元帅的头上……军队从12月初以来在克里木所处的悲惨状况(虽然最近的消息又令人安心一些),首先应当归咎于11月14日的可怕的狂风暴雨²²。”^③

① 1855年1月3日《泰晤士报》第21941号。——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5幕第1场。——编者注

③ 1855年1月3日《纪事晨报》第27464号。——编者注

内阁还算宽宏大量,不要拉格伦勋爵为11月14日的狂风暴雨负责。这样一来,除了《泰晤士报》的哗众取宠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代表内阁内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那部分伦敦报刊——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帕麦斯顿的秘密喉舌的《每日新闻》和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正式喉舌的《晨邮报》。

《每日新闻》说:

“我国的行政制度几乎没有改变,好像它们属于米太人和波斯人一样。任何意外的危机都能使它们崩溃。即使面临生命和财产的最可怕的浩劫,它们也很难被改造得将来能抵御类似的灾难…… 陆军部也是这样。不久前任命陆军首席大臣^①时,人们曾经抱过多大的期望!但是情况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善。我们应当责怪纽卡斯尔公爵呢,还是宁可着手改革这个把国家职权禁锢在贵族冰冷的阴影中的处于瘫痪状态的制度本身?无论纽卡斯尔公爵有怎样的功勋,他毕竟不是那个能粉碎这个制度的官方的海格立斯。但是,英国人民将坚持认为,公爵所做不到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②

《每日新闻》在充当内阁的喉舌方面还是个新手。况且,它不能不顾及它的资产阶级读者。不过一眼就可看出,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需要一个“官方的海格立斯”。但是谁是这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呢?又怎样找到他呢?《晨邮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

“从攻击拉格伦勋爵开始,无疑是从错误的终点开始。《泰晤士报》的攻击伤害不到拉格伦勋爵…… 然而政府在国内的工作有缺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拿陆军部来说,今后是否还应当继续按照近九个月思想和模式来引导它呢?…… 必须记住,在国外的军队完全依赖于国内的行政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部的首脑有主人的气魄并能像主人那样行事是何等重要啊!……

① 亨·纽卡斯尔公爵。——编者注

② 1855年1月3日《每日新闻》第2691号。——编者注

据说,旧的制度起了妨碍作用。但是,一个有气魄的主人,早就会自动地负起责任把这个制度打碎……真正的秘密在于:本届政府的首脑像一个铅锤一样压抑着各个部门的一切努力,阿伯丁的脉搏的缓慢跳动传到行政机关的各个肢体,并对整个制度施加影响……改造整个制度并把一个真正强健的头安在它的肩上吧。”^①

换句话说,让帕麦斯顿当首相吧。他就是《每日新闻》所梦想的那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就是这个帕麦斯顿,他在1830年由墨尔本勋爵根据俄国利文公爵夫人的提议任命为外交大臣;他在阿富汗战争²³中十分令人不解地葬送了英军,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再继续用吹牛的办法触怒他的话,他就要“揭露真相”^②;就是这个帕麦斯顿,在他的巧妙操纵下,那个1839年由法国提出并似乎已经生效的反俄的进攻同盟,在1840年的一个美好的早晨居然变成了反法的英俄同盟²⁴。虽然帕麦斯顿是现在的行政机关的最有势力的成员并且在议会各派人士面前作为而且也必须作为他们的先锋出现,但是,他在报刊上却不断使用一切外交手段来表明他同阿伯丁处于严重的对立,以此在联合内阁一旦垮台时保全自己的威信。同时,以此来阻止反对派采取断然措施,使反对派继续以紧张的心情关注内阁的内部纠纷而无所作为。例如,托利党的《先驱晨报》今天是第一百次陷入圈套,它宣称联合内阁的倒台是注定了,并且大讲特讲帕麦斯顿和罗素对阿伯丁、纽卡斯尔和格莱斯顿的出自爱国热忱的愤懑。关于格莱斯顿,还应当指出,从今天《纪事晨报》一篇论述法国公债的社论可以看出,格莱斯顿不打算

① 1855年1月3日《晨邮报》第25274号。——编者注

② 罗·皮尔(1842年8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2年伦敦版第65卷。——编者注

求助于公债,而决定用直接征税的方法,也就是采用一种最不受欢迎的、负担最重的和最不经济的方式来进行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3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6 日《新奥得
报》第 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²⁵

自从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最近那几篇激烈的社论以后，看来英国公众对英军在克里木的处境全都怀着非常激动和不安的心情。的确，由于每个军事部门在管理上都是空前拙劣，英军正在迅速地趋于彻底瓦解，对这一事实再也不能否认或掩饰了。那些对印度的炎炎烈日或俾路支人和阿富汗人的凶猛攻击都毫不畏惧的老兵，现在备尝冬季作战的艰辛，受着寒冷和潮湿的折磨，为不间断的繁重的野战勤务所苦，没有被服和粮食，没有帐篷和营房，因而每天数以百计地死亡；增援部队到达得有多快，他们被猖獗的疫病吞噬得也有多快。这种状况究竟是谁的过失呢？对这个问题，目前英国广泛流传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拉格伦勋爵的过失，但这样说是不公正的。我们并不赞赏勋爵大人的作战方法，而且我们坦率地批评过他的严重失策^①，但是根据事实的真相，我们要说，士兵在克里木死于那样可怕的恶劣条件，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英国军事机构的那一套管理方法。

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23、658—659页。——编者注

英军设有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国家的军队里都被精简了。^①要是认为这个总司令真能指挥些什么,那就错了。如果说步兵和骑兵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能控制,炮兵、工兵和坑道爆破兵却完全不受他管辖。如果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掌管裤子、上衣和袜子,大衣却全都不归他管。如果说他能使每个步兵带两个弹药盒,他却不能给他们找到一支步枪。如果说他可以把所有的部属送交军事法庭审讯和痛打,他却不能指挥他们移动一步。军队的调动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至于军粮的供应,那同他完全无关。

再有就是军械总长。这个人物是旧时代的可怜残余,那时认为技术不是军人干的事,炮兵和工兵等所有技术兵种都不算是军人,而是既非学者又非工匠的一批难以确定名称的人,他们单独组成行会或团体,归这样一个总长管辖。这个军械总长除了管辖炮兵和工兵外,也掌管军中所有的大衣和轻武器。因此,一切军事行动,不论属于什么性质,就都得有他参加。

接着再说军务大臣。如果说上面两个人物已经是不起多少作用

①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为题,发表在1855年1月8、9日《新奥得报》第11、13号。发表于1855年1月8日《新奥得报》第11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一文从这一段开始,不过从开头到这里的这段话被改写为:“英军在克里木的状况是谁的责任呢?看一看军事管理部门的奇妙的构造,就会清楚,责任被如此巧妙地分配给各个部门,以致每个部门都有责任,但每个部门又都不负责任。整个英国军队设有最高职位‘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也可以说是元帅,这个人物在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国家的军队里都被精简了。几乎所有的军事任命都出自近卫军骑兵大楼——也用这个称呼来指代总司令部,因为它就设在近卫军骑兵的兵营里。”——编者注

了,那么这个人物比不起作用更糟。^① 军务大臣不能给任何一个部队下达命令,但是他可以阻碍每个部队的任何行动。因为他掌管着军事财务,又因为一切军事行动都需要钱,所以如果他拒绝拨款,就等于完全否决一切军事行动。但是即使他愿意拨款,他仍然起不了作用,因为他不能为军队提供给养,那是超越他职权范围的事。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负责军队给养和随时都能为军队提供运输工具的军需部是被置于财政部控制之下的。因此,首相兼财政首席大臣直接插手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安排,并且能够任意加速或延缓其进程,或根本停止这一行动。大家知道,军需部几乎是比士兵更为重要的军队组成部分;^②正因为如此,大不列颠的集体智慧认为,使军需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军队独立并把它置于性质根本不相同的部门的控制之下是合适的。最后,从前由殖民大臣调动的军队,现在则要听命于新设的陆军大臣。^③²⁶他把军队从英国派到中国,从印度派到加拿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权力,也像上述四个军事长官

① 在发表于1855年1月8日《新奥得报》第11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因此,一切军事行动……那么这个人物比不起作用更糟”这几句话被改写为:“因此,没有他,一切军事行动,不论属于什么性质,都不可能进行。他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接着再说‘Secretary at War’,军务大臣。但他也不是真正的军务大臣,其实是陆军部在下院的代表,不过陆军部倒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编者注

② 在发表于1855年1月8日《新奥得报》第11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这句话被改写为:“大家知道,军需部在每个国家的军队中都像士兵本身一样重要。”——编者注

③ 在发表于1855年1月8日《新奥得报》第11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这句话被改写为:“最后,由谁来调动军队呢?以前是殖民大臣,现在则是陆军大臣——陆军部名义上的首脑。”——编者注

中任何一人那样,是不能单独起作用的;即使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也必须由所有五个长官进行合作才能办到。^①

英国就是在这种奇妙的制度的管理下开始当前这场战争的。40年的和平使英国军队在国内吃得好,养得好,他们出征时精神饱满。人家告诉他们,不论敌人采取怎样的行动,英国都一定会让自己的勇士们什么也不缺,他们深信不疑。^② 但是当他们刚在第一个停泊地加利波利登陆,同法军一比较,就暴露出英军的整个管理水平低得可笑,英国的官长个个无能得可怜。虽然那里一切必需品都比较容易

① 在发表于1855年1月8日《新奥得报》第11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这里补充了一段话作为结尾:“这五个权力机关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官僚制度以及自己的日常事务,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职责行事。”

这一套制度原本显然是为了从体制上采取措施对常备军加以防范。它不是实行能赋予军队以最大灵活性的分工,而是实行把军队的灵活性降到最低限度的分权。然而保持这一制度却绝非出于议会或体制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如果在军事管理上实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改革,则寡头的影响至少在这一领域内就要同时遭到破坏。在前次议会会议上,大臣们除同意把陆军部同殖民部分开以外,拒绝同意实行任何革新。威灵顿从1815年到他去世,一直顽固地维持这一制度,尽管他深知,如果不是恰巧他的哥哥韦尔斯利侯爵进入了内阁,他凭着这套制度是决不能使比利牛斯半岛战争²⁷胜利结束的。1832年和1836年,他在议会为改革旧制度²⁸而成立的委员会面前,全面地替旧制度进行辩护。他是不是担心改革会使他的后继者更容易成名呢?”——编者注

② 发表于1855年1月9日《新奥得报》第13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一文从这一段开始,开头的这几句话被缩减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英国的军事管理制度,当前的战争就是在这种制度的管理下爆发的。”——编者注

得到,一切必要的指示也都已预先下达,而且登陆的部队数量也很少,可是却一切都弄得很糟。每个人都忙个不停,可是谁也不想去履行和平时在国内没有落到过自己头上的那种职责。这样一来就找不出一个人去执行战争本身所要求完成的任务。^①因此,整船整船的储备品在海岸上卸货后都被丢弃在原地烂掉,而军队则因缺少住房而被送到斯库塔里去。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混乱现象,但是既然战争刚刚开始,还可以期待在取得经验之后情况将会好转。

军队开到了瓦尔纳。同英国的距离增大了,人数增加了,管理方面的混乱也更严重了。五个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各向国内一位不同的大臣负责,这种状况在这里第一次引起了公开而明显的矛盾。营地物资极为匮乏,而瓦尔纳的驻军却应有尽有。军需部慢慢吞吞地从当地征集了一些运输工具,但是因为总司令^②没有派遣护送队,所以保加利亚的车夫是刚召集起来就又都马上逃掉。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中心兵站——有点像主要作战基地;但是它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却增添了一个新的中心,在这里困难重重,办事拖拉迟误,权限不清,军队和军械部门、财务部门、军需部、陆军部等各个方面相互纠缠不休。在凡是有事情要做的地方,每个人都力图把它推给别人。大家都以躲避一切责任为目的,结果事事都弄糟,什么也干不成。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意识到如此下去只有眼看着自己的军队在无所事事中垮掉,这大概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拉格伦勋爵决心去冒克里木远征之险。

① 在发表于1855年1月9日《新奥得报》第13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没有“每个人都忙个不停……所要求完成的任务”这两句话。

——编者注

② 亨·哈丁子爵。——编者注

这次远征是约翰牛军事组织的杰作之最。正是在克里木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① 只要军队实际上还处于平时状态,就像在加利波利、斯库塔里和瓦尔纳时那样,混乱无序的程度未必能够充分表露出来。但是现在,在敌人面前,在打一场实际的包围战的过程中,情况就不同了。俄军的抵抗使英国的官长们认真求实的作风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且应当承认,断送一支军队这种事,从来还没有谁干得比这些先生更加卓有成效。去年2月以来派往东方去的6万多军队中,目前能执行任务的不超过17 000人;而且这些人当中每天死亡60—80人,每天病倒200—250人,病员中很少有康复的。而在那43 000名死亡或病倒的人员中,直接被敌人杀伤的还不到7 000人!

最初传到英国的消息说,军队在克里木缺衣、缺食、缺住处,总之无一不缺;找不到药品,也找不到外科医疗器材;伤病员不是躺在潮湿寒冷的地上听任日晒雨淋,就是被塞到停泊在近岸锚地的拥挤的船上,没人照管,连最简单的医疗必需品也没有。当人们听说数以百计的人由于缺乏起码的必需品而死亡的时候,谁都以为是政府忽略了向战地运送应有的补给品。但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如果说起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那么现在情况已经不同。补给品都运去了,应有尽有,甚至绰绰有余,但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送到需要的地方。药品在瓦尔纳,而伤病员不是在克里木就是在斯库塔里;被服和给养已运到克里木近岸处,但无人去把东西运上岸;偶然被运上岸的任何东西也都是被丢弃在海滩上烂掉。必须有海军的协作,这给本已矛

^① 在发表于1855年1月9日《新奥得报》第13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没有“在凡是有事情要做的地方……‘决定性的打击’”这段话。——编者注

盾重重的各部门领导机构带来了一个新的不和因素,而这些部门之间的互相掣肘都是为了保证英军的胜利。^①无能,在为和平时期制定的条例保护下,支配着一切。在欧洲一个最富庶的国家,在其掩蔽的海岸边,停泊着数以百计的满载补给品的运输船,而英国兵却只靠半份口粮活命;周围有无数成群的牲畜,而他们却由于只能吃到咸肉而患败血症;船上有大量的煤和木柴,而在岸上却少到使他们不得不吃生肉,被雨淋湿的衣服也无法烘干。发给的咖啡不仅没有磨成粉,而且居然也没有烘焙过!粮食、饮料、衣服、帐篷、弹药等储备品成吨、成百吨地放在那些船上,桅杆都几乎碰到设有营地的陡岸了,然而英军却像唐达鲁士一样,什么也不能得到。人人满腔怨恨,个个坐卧不宁,全都咒骂和指责别人玩忽职守,可是没有人知道——用俗话说——“哪个是哪个”,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精心拟定并经主管当局批准的条例,这些条例表明,现在需要做的事偏偏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他自己是没有权力来解决的。

现在,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季节的天气越来越恶劣,暴雨开始来袭,把整个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变为一片泽国,泥水至少深达膝盖;士兵们四个夜晚至少有两个夜晚在战壕里度过,其余两个夜晚就干脆睡在沼泽地上,浑身湿透,沾满污泥,下面没有垫板,上面也难得有帐篷遮盖;警报不断更使得他们根本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和足够的睡眠;长期的潮湿和寒冷引起了痉挛、腹泻和其他疾病;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分散于整个营地;医疗站的帐篷内住了3 000名病员,他们

① 在发表于1855年1月9日《新奥得报》第13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中,这句话被改写为:“必须有海军的协作,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不和因素,一种连在阿格拉曼特的营地里都闻所未闻的新责任。”——编者注

都躺在湿地上,几乎同在露天一样。想想这一切就不难相信:英国军队在克里木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都变成了“乌合勇士”;士兵们宁愿挨一颗俄军子弹来摆脱这一切不幸。^①

但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如果你不想坐等议会拟出五六条法令来,先照例让皇家律师进行审查然后交付讨论、修正、表决和颁行;不想坐等通过这种办法使有关军队的全部工作都集中于一位名副其实的陆军大臣之手;不想坐等这位新的陆军大臣^②——假定他称职的话——把他管的这个部的人员组织好并发布新的条例;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坐等英军在克里木消失得连最后一点影子都没有,那么,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远征军总司令^③自己掌握全权,负全责,对所有互相矛盾互相争斗的军事管理部门实行独裁。任何别的总司令都有这种实行独裁的权力,没有这样的权力,总司令就无法完成所负的重任,结局只能是毁灭。如能做到这一点,情况就会立即好转。但是,英国将军谁愿意按这种古罗马人的方式行事、在受到审判时能像罗马人那样用如下的话为自己辩护:“是的,我承认犯了拯救祖国罪”呢?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创立并保持了这种奇妙的管理制度?不是别人,正是老威灵顿公爵。他处处坚持按此制度行事,好像他本人蓄意要尽可能地使他的继承人难以与他争夺军事荣誉。威灵顿是

① 发表于1855年1月9日《新奥得报》第13号上的《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一文到这一段结束,最后这句话被改写为:“安置伤病员的船只和医院在斯库塔里和君士坦丁堡。——想想这一切就不难相信:英国军队在克里木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士兵们宁愿挨一颗俄军子弹来摆脱这一切不幸。”——编者注

② 亨·纽卡斯尔公爵。——编者注

③ 菲·詹·拉格伦男爵。——编者注

个了不起的头脑健全的人,但绝非天才,他作为拿破仑这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的同时代人和敌手,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认识得尤为清楚。因此,威灵顿非常忌妒别人的成就。他贬低助手和盟友功绩的做法之卑鄙是人所共知的;他从未原谅布吕歇尔在滑铁卢³⁰对他的解救。威灵顿深知,西班牙战争²⁷期间,假如不是他哥哥^①当大臣的话,他是决不能胜利结束那场战争的。威灵顿是不是担心后来者的战功盖过自己,因而要把这套最适于束缚将军们手脚和断送军队的制度完完整整地保存下去呢?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1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2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9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理·科·韦尔斯利。——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工商业危机³¹

伦敦,1月8日。此间的俱乐部和报纸正在煞有介事地大谈“内
阁危机”,却没有工夫来承认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实,这就是:英国的大
工商业危机又一次来到了,而且其破坏性的规模比1847年和1836
年的危机还要大。如果说三个月来偶尔发生,而最近在数目和强度
上有所增加的破产还不能证实这种看法,那么,现在在贸易年度报告
和商业部编制的关于11个月进出口的报表发表以后,这个看法终于
无法否认了。从上述报表中可以看出,如果同1853年同期的11个
月相比较,出口减少了1 710 677英镑,如果仅仅拿这两年的最后一
个月——从11月5日到12月5日——相比较,则减少了1 856 988
英镑。我们现在从出口报表中抄出下列表明几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产品出口减少的具体数字:

	1853年 (单位:英镑)	1854年 (单位:英镑)
棉织品.....	23 757 155	22 877 050
棉纱.....	6 322 639	6 055 640
亚麻织品.....	4 379 732	3 735 221
亚麻纱.....	1 069 812	852 763
毛织品.....	9 470 413	8 566 723

丝织品·····	1 492 785	1 144 506
机器出口·····	1 368 027	1 271 503 ^①

当然,贸易报告力图把 1854 年危机的责任推到战争上面,就如同把早在 1847 年就已爆发的危机的责任推到 1848 年革命上面一样。但是这一次连伦敦的《经济学家》——它总是习惯用与工商业无关的偶然情况来解释危机——也不得不承认,1854 年的商业萧条和萎缩是对 1853 年的“痉挛性繁荣”的一种合乎自然的反应的开始。换句话说,商业周期又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转为危机的那一点。北美合众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它受东方战争³²的影响只是在如下方面,即战争造成了美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贸易的空前发展,给美国的某些中间产品找到了销路,而过去这些产品大半主要是由俄国一家提供的。美国的危机已经延续了四个多月,现在还在继续发展,虽然在 4 208 家银行中有 109 家银行,即约 2.5% 的银行已经破产,而且在东部各工业州里,一种使工资大大降低的工业停滞已经到来,以致上月有 4 000 多欧洲移民又“流回”欧洲。美国 1837 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 1836 年的危机而来的。而这次危机的进程正好相反。破产首先从美国开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充斥着英国的产品。这个事实对于英国的贸易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从下列数字看出:在 1853 年,大不列颠出口了大约 1 亿英镑的商品,其中 2 500 万出口到美国,1 500 万出口到澳大利亚。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就要算东印度了。但是东印度市场早在 1852 年就已经饱和,只是由于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经过旁遮普和信德省转到

① 《1854 年贸易年度报告》,载于 1855 年 1 月 6 日《经济学家》第 593 期。——编者注

布哈拉、阿富汗和俾路支,再从这里一方面进入中亚细亚,另一方面进入波斯来扩大贸易,才勉强使出口额保持旧有的水平——800万英镑。而现在,那里所有的销售渠道也都被堵死了,以致最近只好用船把商品从印度斯坦转运到澳大利亚去,这样一来就等于“把猫头鹰带到雅典”³³。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由于东方战争而“谨慎地”把商品运去的唯一市场是黎凡特市场。但是在西蒂区,下面这一点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自从美国的危机和澳大利亚的停滞迫使商人挖空心思地探寻一切也许尚未饱和的的市场的时候起,君士坦丁堡就成了堆存各种需要推销的商品的货栈,而现在这个地方也被认为“门户关闭了”。有人还利用西班牙最近发生的运动,企图通过走私贸易把西班牙所能吞下的尽可能多的英国商品运到那里去。现在又在南美各国进行最后的这种尝试,但是这些国家购买力很小是不用证明的。

因为英国的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必须回头来更加详细地和具体地谈一谈英国1854年以前的贸易史。

伦敦,1月9日。关于1849—1853年这段时期英国工商业的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来判断。不列颠港口进出的载货船只总吨位1846年为9 499 000吨,1850年增加到1 202万吨,1853年已经不下15 381 000吨,即刚好比1843年增加了一倍。不列颠工业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1846年为57 786 000英镑,而1850年已经达到71 367 000英镑,1853年则超过了9 800万英镑,即超过了1842年出口总额的一倍多。出口增加这么多,北美合众国和澳大利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1842年,不列颠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还不到100万英镑,1850年几乎达到了300万英镑,而1853年甚至达到了

14 513 000 英镑。1842 年对美国的出口额为 3 582 000 英镑,1850 年几乎达到了 1 500 万英镑,而 1853 年已不下 23 658 000 英镑。

从这些数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854 年同 1825、1836、1847 年十分相似,也是现代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二,美国的危机只是英国危机的因素之一;最后,1854 年的战争——《国家报·帝国报》十分正确地把这场战争称为和平战争——绝对没有对这次社会灾难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说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起了一点遏制和阻碍的作用。个别的工业部门,如制革业、制铁业、毛织业以及造船业,都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需求而得到了直接的支持。在 40 年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宣战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在短时期内抑制了投机势头。欧洲各国因战争而签订的贷款使利率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防止了工业活动的急剧发展,从而延缓了危机的到来。但是,和平协会³⁴说,难道战争没有使粮价上涨吗?难道粮价的上涨不等于国内贸易的缩减,也就是英国国内工业品消费的缩减吗?难道国内市场的缩小不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吗?

首先应当回忆一下,1853 年,即英国最繁荣的一年,是粮价高昂的年头,1854 年的粮价平均比 1853 年低;因此,无论是 1853 年的繁荣,还是 1854 年危机的征兆,都不能用粮价的高低来解释。这里我们把粮价对工业的影响问题撇开不谈;战争对粮价的影响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粮价的上涨是不是因为从俄国进口的粮食减少了呢?在大不列颠进口的谷物和面粉的总额中,俄国约占 19%;由于全部进口只是满足国民消费的 20%左右,所以从俄国进口的粮食约占国民消费的 2.5%。1854 年 11 月初公布了一个最近的官方报告^①,其中

① 1854 年 11 月 4 日《经济学家》第 584 期。——编者注

列举了大不列颠从世界各洲和各国进口的谷物和面粉的比较数字，并且列出了 1853 年头九个月同 1854 年头九个月的比较表。根据这个报告，1853 年小麦的进口总额为 3 770 921 夸特，其中从俄国进口 773 507 夸特，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进口 209 000 夸特。面粉的进口总额为 3 800 746 英担，其中从俄国进口 64 英担，而从多瑙河两公国根本就没有进口。在 1854 年这个战争年份，大不列颠从俄国进口小麦 505 000 夸特，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进口小麦 118 000 夸特。谁也不会硬说这种减少（况且从其他国家进口面粉增加额已抵补了这个数目）使丰收的 1854 年的粮价几乎猛涨到了歉收的 1852 年和 1853 年的水平。相反，完全停止从俄国进口粮食，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多瑙河两公国进口的减少仍然是个谜，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问题是无要紧要的。这个谜很容易解开。如果说联军对俄国的黑海港口的封锁仅仅是名义上的封锁，那么恰好相反，它先是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对多瑙河口的封锁则是实际上的封锁；不是封锁俄国，而是封锁了土耳其和多瑙河两公国。谁不知道，俄国在 1812 年³⁵、1828 年³⁶、1848 年（当时以镇压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叛乱者为借口）和 1854 年对土耳其的十字军征讨，部分地是由俄国南部各省同多瑙河两公国和在多瑙河一带从事贸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贸易竞争引起的。英国内阁让敖德萨和塔甘罗格自由地贸易，而压制多瑙河一带的俄国竞争者，封锁他们，并以此隔断英国自己的进口，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俄国；这是多么英明！

伦敦，1 月 16 日。关于目前的工商业危机，伦敦的《经济学家》指出：

“不管其他商品的出口减少到什么程度,机器出口却没有受到影响。出口机器的价值不但没有减少,1854年反而比1853年有所增加。就是说,别的国家现在都使用我国出产的机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比它们优越的地方。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美国现在都是工业大国,其中有些国家的优势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面临着—场竞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胜利。大家从经验中都认识到,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想出来的那些限制,反而给地主带来了损害;为了厂主的利益而想出来的那些限制,反而限制了厂主;工厂工人们也将逐渐发觉,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规定的那些法律限制只能使他们受到损害。然而,但愿他们在上述那些国家取得进步从而能够把英国从它们国内市场和与其他国家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并使我国的工厂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之前,发觉这一点。”^①

威尔逊先生是《经济学家》的出版者和那个一本正经的、道貌岸然的格莱斯顿的财政部的总管,是一个自由的使徒,又是一个官迷;此人在其杂志的这一栏上根本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而在另一栏上则具体地论证,决不能没有联合内阁。就是说,威尔逊先生以故意歪曲事实开始自己的说教。在1854年的出口报表中,有两栏是关于机器出口的。关于铁路机车的第一栏表明,1853年机车的出口额为143 254英镑,而在1854年为525 702英镑,确实增加了82 448英镑。相反,包括工厂使用的机器和其他各种机器(机车除外)的第二栏表明:1853年的出口额为1 368 027英镑,1854年为1 271 503英镑,即减少了96 524英镑。因此,把这两栏数字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出口额减少了14 076英镑。这个细节刻画出了曼彻斯特学派³⁷先生们的特征。他们认为现在正是应该取消现行的那些对工厂工人有利的“限制”,即废除对18岁以下的少年、妇女和12岁以下的儿童

^① 《出口。——工厂法》,载于1855年1月13日《经济学家》第594期。

——编者注

的工作时间的法律限制的适当时机。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捏造一些数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根据贵格会³⁸会士布莱特的专用刊物《曼彻斯特观察家》以及来自工厂区的所有商业通报来看,“作为我国工业剩余产品的传统销售渠道的国外市场,现在正在我国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的沉重压力下呻吟。”如果说,尽管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新的黄金市场³⁹,尽管电报已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交易所,尽管铁路和轮船使得交通因而也使得交换扩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世界市场上仍然达到如此饱和的状态,那么请问:要是允许厂主让工人劳动 18 小时而不是 11 小时,危机还要等多久就会到来呢? 这道算术题太简单了,简直不需要解答。其实,这不仅会相应地加速危机的到来,整整一代工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和生命力都将丧失一半。曼彻斯特学派对我们的这种疑虑可能要回答说: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①

然而正是这个学派满怀忧伤向着英国呼号,哭诉对俄战争同任何战争一样造成人员伤亡! 过几天我们将会听到科布顿先生在利兹发表演说,抗议基督徒相互残杀。过几个星期我们又听到他在议会中发表演说,抗议那些阻止快速耗尽工厂儿童生命的“限制”。他是否认为在所有的英雄业绩中,只有希律的业绩是唯一合理的呢?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学派的看法:在法律上对工作时间进行硬性限制并不表明社会发展水平高。但是,我们认为过错不在于法律,而在于使得法律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

①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伦敦,1月22日。大家知道,1825年财政大臣鲁宾逊在议会开幕的时候,曾发表了一次兴高采烈的演说^①,大谈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可是过了几个星期,英格兰银行就到了停止现金支付的地步。从那时起,鲁宾逊就得到了科贝特给他起的“繁荣的鲁宾逊”的绰号。因为在英国人们崇尚历史先例,所以繁荣的鲁宾逊难免也有追随者。在议会的最近一次非常会议开幕的时候,女王发表御座演说^②,祝贺国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发展欣欣向荣。其实,现在连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能迷惑鲁宾逊的那些假象都已经消失了。大臣们的祝贺看来也不过是英国不失身份地用来宣布世界市场发生震荡的仪式。此时此刻比大臣们的致辞更使人惊奇的是报刊的沉默。报刊是不是认为它能够像巴黎的文人集团用沉默“压制”^③不合乎心意的书籍那样,也用沉默这种阴谋把商业危机“压制”下去呢?但是,行市表在说话,《官报》上发表的破产名单在说话,“商务伙伴”的来信在说话。报纸不久也会出来说话。在最近一周内,西蒂区有很多大公司已经停止支付了;其中最大的几家是:同西班牙和西印度做生意的洛涅尔甘公司,同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工厂区有商业来往的罗杰斯—劳里公司,同美洲做生意的科特林格顿公司以及作为最老最有信誉的公司之一的奥伯提乌斯兄弟公司。这些商行的债务平均为10万—15万

① 弗·约·鲁宾逊《1825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25年伦敦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女王《1854年12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第21922号。——编者注

③ 原文为“burken”,有个姓“Burke”的英国人用窒息的方法杀人,然后出售尸体供解剖,于1829年被处绞刑。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压制”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编者注

英镑。在本周内西蒂区至少又有七家大商行要宣告停止支付。

我们从1月20日伯明翰寄来的一份商业通讯里,摘录如下一段有关斯塔福德郡南部的工业状况的详情:

“除了根据政府的订货生产军用物资的制铁企业以外,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还有订货,而且价格压得极低。现在8英镑10先令就可以买1吨条铁,而在仲夏,每吨报价12英镑;但是即使价格这样低,也很难找到买主,因此,生产只得缩减。在北美合众国各大利益集团中,没有几家遭受商业危机之害比制铁业更大。投资额巨大的合众国各大铁工厂几乎都把自己的工人解雇了,而且没有很快再把他们招回来的希望。因此应当认为,在美国铁的消费几乎完全停止了,我们不能再指望从那里得到新的订货。

上星期六(伯明翰的)锡工厂有很多工人被解雇,今天晚上(1月20日)又要有更多的工人被解雇。炼铜厂和铸铜厂工人人们的处境也不比他们好一些,因为这里大多数的大企业都是开工不足。

现有的时新货品的订货非常之少,到各地去寻找这方面的春季订货的推销员寄回来的都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消息。

货币市场的情况继续给各商业部门造成混乱。银行抬高利率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而眼下兴隆的只有贷款这一种业务。在各小贷款处的门前申请者如潮,票据贴现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①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
8、9、16和22日

载于1855年1月11、12、20和
25日《新奥得报》第17、19、33
和4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1855年1月22日《晨报》第19840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四 项 条 款⁴⁰

伦敦,1月9日。维也纳发出的关于俄国方面接受四项条款³的电讯,一方面使此间交易所里的统一公债上涨——一度比星期六^①的利率提高2.5%。另一方面在动物脂肪油、植物油和粮食市场上造成真正的恐慌,因为对这几个市场来说,很快缔结和约将成为大批破产的信号。今天西蒂区人们的紧张情绪又消失了,他们相当一致地把四项条款的谈判看做是“维也纳照会”⁴¹的谈判的再版。在十足的内阁报刊《纪事晨报》看来,谈论俄国方面真正接受要求它作出的那些保证,未免为时过早。俄国只不过表示愿意在三个强国共同解释的那个四项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泰晤士报》认为可以庆祝西方政策的胜利,并借此机会宣称: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这场战争势必通过那些根本不能使我国得到好处的征服或革命而对欧洲地图进行所谓的修订。”^②

《晨邮报》说:

① 1855年1月6日。——编者注

② 1855年1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46号。——编者注

“盟国已经作了足够的努力,以便在它们的条件被接受的时候,光荣地撤离战场。”^①

在《每日新闻》看来,俄国恢复谈判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更加相信俄国是温和的,是要煽起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不和,离间西方强国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该报认为四项条款中只有补充条款才是重要的,根据补充条款,1841年7月13日的达达尼尔海峡条约⁴²应当“按照限制俄国的黑海海军的精神”加以修改;西蒂区传说内阁打算放弃这项补充条款。最后《晨报》断言,俄国最新的这个步骤是同奥地利商量好的,为的是让后者有可能摆脱对西方强国承担的义务。从新近收到的电讯来看,已经约定,谈判过程中不中止军事行动。

伦敦,1月12日。俄国无条件接受四项条款——而且是按“三个”强国的意思所解释的“四项”条款——,现在看来纯粹是《晨邮报》和《泰晤士报》所设的“骗局”。我们所以乐意听信这个“骗局”,是因为我们从波措-迪-博尔哥的秘密的,但是由于华沙起义⁴³而公之于众的紧急报告⁴⁴中得知,这位外交能手制定了如下原则:

“俄国应当做到:在任何冲突中欧洲各强国强迫它接受的是它自己的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四项”条款不过是“四条”俄国原则。如果俄国暂时不接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能手波措-迪-博尔哥那里找到解释。他解释说,俄国只能从胜利夺得的营地上对西方作出这种表面的让步。这是保持它的实力赖以存在的“威望”所必需

① 1855年1月9日《晨邮报》第25279号。——编者注

的⁴⁵。俄国至今虽然取得了“营地”，但是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锡利斯特里亚陷落⁴⁴，“四项条款”早就会被提出来了。根据《泰晤士报》和《晨邮报》的报道，按照“三个强国”的意思所解释的这“四项条款”已被接受为谈判的基础，可以作为最低条件继续谈判。现在弄清了，哥尔查科夫公爵是把它们理解为某种有争议的最高条件，认为可以通过讨价还价降低这个条件，或者它们的作用总的来说不过是为召开第二次“维也纳会议”⁴提供借口。今天《晨邮报》在一篇以权威自居的、作出外交预言的社论中告诉我们，在维也纳目前召开的外交会议不过是为在2月1日才召开的真正的会议做准备，真正的会议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使世界震惊。

昨天在劳埃德氏大厦贴出了一张海军部的通告：

“我在11月8日（1854年）的信的最后一段曾通知说，黑海的法英海军将领奉本国政府之命把对多瑙河口的封锁扩大到对黑海和亚速海的所有尚在敌人手中的海港；海军大臣责成我通知你们，并借此公告商界，英法政府已决定自2月1日（1855年）起开始上述封锁，而有关每个海港的封锁情况，一俟此种封锁实施，当在伦敦《官报》上另作通知。——署名：威·亚·贝·汉密尔顿”

可见，这里公开承认，联军舰队迄今只封锁了自己在多瑙河口的盟国，而没有封锁黑海和亚速海的俄国海港。而内阁却多次——在4月、8月和10月——在议会中宣布，它已“严令”封锁俄国的海港和海岸。在12月21日格兰维尔勋爵还代表内阁向上院宣布说：

“敖德萨已由五艘军舰封锁，军舰不断在这个海港外巡航，政府不间断地收到这方面的报告。”^①

英国一个有名的评论家在写给一家日报的信中对联军在实施封

① 1854年12月22日《泰晤士报》第21934号。——编者注

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的结果,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采取措施的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

“(1)英国政府从英国供给英国的敌人以继续对英国作战的费用。(2)封锁多瑙河为的是制造多瑙河两公国的经济困难并使我们自己不能输入粮食。(3)敖德萨、塔甘罗格、刻赤和其他地点仍然没有受到侵扰,因而得以向克里木的俄军输送增援部队、弹药和给养。(4)虚假的封锁使我国商人破产,却让希腊、俄国和奥地利的商人大发其财。”^①

《泰晤士报》也利用汉密尔顿先生的通告对内阁的“封锁外交”进行激烈的攻击。印刷所广场的雷公^②的特点是它的雷总是事后才响。从1854年3月26日到今天,《泰晤士报》一直为“封锁外交”辩护。现在,当它发出的隆隆雷声已经不可能阻碍内阁的措施,却或许给自己带来声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有先见之明了。

海军大臣,或者像这里所称的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因为那次暗检室里的壮举使邦迪埃拉兄弟被送上断头台⁴⁶而闻名大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事实:这个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44年沙皇尼古拉登上英国海岸时,不敢握沙皇向他伸出的手,而只敢吻了吻这只手。(见1844年《公文集》第2辑)

伦敦,1月15日。关于四项条款的评论:

“2月1日以前(《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说在2月5日或6日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不会取得什么进展。这样一来,沙皇有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军队调往目的地。如果对四项条款一条一条地进行争论(这大概是给俄国大使

① 1855年1月12日《晨报》第19832号。——编者注

② 印刷所广场是《泰晤士报》编辑部当时的所在地,雷公是当时《泰晤士报》的别名。——编者注

的指示的内容),那么俄国由于接受四项条款而赢得的一个月时间也可能延长到两个月;同时完全可能竭尽全力地争取以英国和法国所不能接受的条件来满足奥地利的要求。离间这三个大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①

这就是《晨邮报》的看法。

比英国报刊关于俄国的秘密意图的这种种说法更重要的是,英国报纸(当然,内阁的机关报除外)公开承认,作为谈判基础的四项条款不值得谈判。

《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

“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企图使全世界相信,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摧毁俄罗斯帝国,或者至少是为了获得维持欧洲和平的物质保障。如果必须以所谓的四项条款为基础缔结和约,那也就意味着过去没有做过什么而且将来也不会做什么来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的。如果这里也有胜利可言,那也仅仅是俄国所取得的胜利。”^②

《先驱》写道:

“极其无能的内阁越不出这四项条款;它应当以四项条款内阁这个称号载入史册。无目的战争这出无聊的喜剧的结果不过如此!只是因为害怕各国人民在战争的喧嚣中取得太重要的地位,也可能是为了阻碍英国人争回克伦威尔为他们争得的那些权利,才会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又把同俄国策划的旧阴谋重新缝补起来,为什么又允许俄国在军使旗的掩盖下恢复它对欧洲的侵犯。”^③

《观察家》——它在中等阶级周刊中无可争辩地堪称一流——刊载了一篇论和谈“基础”的详尽的文章;我们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

① 1855年1月15日《晨邮报》第25284号。——编者注

② 1855年1月1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第1684期。——编者注

③ 1855年1月13日《先驱》第251期。——编者注

摘引如下。文章写道：

“如果认为那些甚至是按照对四项条款的最严厉最苛求的解释所作出的让步，可以抵偿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耗费的财富和它所流的鲜血，那么俄国沙皇在发动战争时就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俄国甚至还不必赔偿它违反维也纳条约⁴⁷而每年从我国榨取去的巨额款项…… 从不久前公布的一则官方通讯中看出，俄国曾经千方百计地封锁起来不让英国进行贸易的多瑙河口，仍然在俄国手里。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的条款⁴⁸实际上造成了这种现状，因为俄国从来没有否认维也纳条约的有关内河航行的协定对多瑙河也是有效的。废除凯纳吉条约⁴⁹和阿德里安堡条约⁵⁰也无济于事，因为各方都公认这些条约没有给予俄国向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应当是负责共同保护多瑙河两公国和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五强国之一，那么我们认为，期望从这个变化中得到好处纯粹是幻想，因为这个变化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害处，使得俄国瓜分土耳其的阴谋具有合法的性质。当然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四项条款中包括修改 1841 年条约，以利于强国的均势的条款。但是措辞相当含糊和费解，从最近的所有迹象来看，我们绝不相信，已筹划的变更对我们的盟国（土耳其）的独立的威胁会比对我们的敌人的霸权的威胁小一些…… 如果不是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科布顿时曾庄严地在议会中宣布：政府决不想剥夺俄国的任何一块领土，我们就会把目前大概正在维也纳讨论的那种‘基础’的一切可能性斥之为完全不可信的东西。”^①

其实，最后一条是最关键的，因为，例如，即使多瑙河的航行自由也只有在俄国放弃在多瑙河口的“领土”的情况下才有保障。俄国强占了这块领土，部分是由于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从而破坏了 1827 年的伦敦条约⁵¹，部分是由于发布了 1836 年的二月敕令⁵²，从而破坏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观察家》避而不谈的一条同 1841 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有关。这个条约跟 1840 年帕麦斯顿勋爵所签订的条约²⁴的区别，仅在于法国也是缔约的一方。两个条约的内容则是

^① 1855 年 1 月 13 日《观察家》第 2450 期。——编者注

相同的。几个月以前,帕麦斯顿勋爵还宣布 1840 年的条约,当然还有 1841 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是英国对俄国的胜利,而他自己则是这个条约的倡议者。标志着英国对俄国的胜利的条约被废止,怎么又突然变成俄国败在英国手下呢? 或者,如果那时英国被自己的大臣们所迷惑,在它为俄国效劳的时候还认为它是在做反对俄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现在不会是这种情形呢? 在议会的最近一次非常会议上,迪斯累里大叫:“不要四项条款!”从上面摘引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迪斯累里的叫喊在自由派报刊上得到了响应。人们对俄国有保留地或无保留地接受四项条款产生的惊异正开始让位给对英国提出四项条款所产生的惊异。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9、12 和 15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13、15 和 18 日
《新奥得报》第 20、23 和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⁵³

在我们的栏目中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危机的一些预兆^①，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英国总商会和王国各大贸易公司发表的年度通报——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破产企业增多、工厂缩短工作时间以及表明出口减少的报表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最近官方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在12月5日截止的一个月内，所列举的出口商品的申报价值是：

1852年	1853年	1854年
(单位：英镑)	(单位：英镑)	(单位：英镑)
6 033 030	7 628 760	5 771 772

1854年比1852年减少了261 258英镑，比1853年减少了1 856 988英镑。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态》。——欧洲缺粮》和《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两公国的局势》。——西班牙》。——不列颠的对外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13—120、281—294和347—356页及第13卷第605—615页。——编者注

Handwritten manuscript page with dense, illegible text, likely a draft of a work by Karl Marx. The page is heavily inked and shows signs of being a working draft, with some lines appearing crossed out or heavily scribbled ov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age is tilted slightly to the right.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 number "673" is visible.

卡·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草稿)一文的手稿一页

毫不奇怪,大不列颠自由贸易派³⁷的专家们竭力想证明,现在的危机不是英国现代制度运行的必然产物,也完全不同于那些大约从18世纪末起每隔一定的时期就会出现一次的危机,相反,是由偶然的特殊的情况造成的。根据自由贸易派的信条,既然英国的立法机构废除了谷物法⁵⁴,也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商业危机了。然而现在摆在自由贸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涨,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已经加入了世界市场,源源不断地大量提供黄金³⁹;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百倍。如果说自由贸易派的灵丹妙药应当经受一次考验,那么,恐怕再找不到比工商业史上从1849年到1854年这段时期更为有利的条件了。

自由贸易派的诺言并没有兑现,自然,战争现在成为自由贸易的替罪羊,就如同1848年革命成为替罪羊一样。然而他们无法否认:东方的冲突抑制了轻率的钻营精神,使部分剩余资本转向最近大多数欧洲强国所签订的贷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到来;某些行业,如制铁业、制革业和毛织业,由于战争引起的对这些行业的产品异常需求而得到了某些支持;最后,在其他一些行业,如航运业、染料业等,由于过高估计战争的影响,造成了大西洋两岸投机过度,在目前已经出现的普遍商品积压的趋势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一部分商品打开了销路。然而自由贸易派的主要论点是:战争引起了各种粮食价格的提高,正是这些高昂的价格造成了危机。

然而应当回想一下,1853年粮食的平均价格比1854年高。如果这种高昂的价格不能说明1853年的空前繁荣,那它们同样不能说明1854年的停滞。1836年发生了工商业的停滞,虽然这一年的粮价是低的;1824年同1853年一样,都是非常繁荣的年头,然而各种

粮食的价格是高的。问题在于虽然高昂的粮价使国内市场缩小,可能使工商业的繁荣受到损失,但是如果不是国外市场全部存货过多,根本无法销售。在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国内市场决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粮价的高昂能够加深和延长停滞,但是不能引起停滞。而且,不应当忘记,根据曼彻斯特学派的正统学说,粮价的高昂如果是自然进程造成的而不是保护关税制、禁令和滑动比率制⁵⁵造成的,它就会完全失去破坏力量,甚至可能给农场主带来好处,从而产生良好的影响。由于无法否认 1852 年和 1853 年的两次大歉收是自然现象,自由贸易派就转到 1854 年,并断言东方战争起了与保护关税制同样的作用,造成了粮价的高涨,虽然这一年是丰收。因此,我们撇开粮价对工业的一般影响,来研究一下目前的战争对粮价的影响问题。

从俄国进口的小麦和面粉约占联合王国整个粮食进口的 14%; 由于全部进口只占总消费的 20% 左右,所以俄国供给英国的只占总消费的 2.5% 多一点。根据官方的最近一个仅仅涵盖 1853 年头九个月的报告,大不列颠的小麦进口总额为 3 770 921 夸特,其中从俄国进口 773 507 夸特,从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进口 209 000 夸特。面粉的进口总额为 3 800 746 英担,其中从俄国进口 64 英担,而从多瑙河两公国根本就没有进口。战争爆发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在 1854 年同期,直接从俄国港口进口的小麦为 505 000 夸特,而 1853 年为 773 507 夸特,从多瑙河两公国进口的为 118 000 夸特,而 1853 年为 209 000 夸特,共减少了 359 507 夸特。如果注意到 1854 年是特大丰收,而 1853 年又是严重歉收,就不会有谁硬说这种减少对粮价起了比较显著的影响。相反,从官方关于英国市场上本国生产的小麦每周出售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只包括全国全部交易的一小部分)可

以看出,1854年10月和11月售出了1 109 148夸特,而1853年同期售出了758 061夸特,补偿据说是对俄战争引起的进口的减少是绰绰有余了。我们还可以指出,要没有英国内阁的好主意使储存在两公国谷仓里的大量土耳其小麦烂掉(英国愚蠢或背叛性地封锁了多瑙河口上的苏利纳河,从而切断了它自己的供应),对俄战争对小麦进口额连目前这点少量的减少也不至于造成。在运到伦敦港口的外国面粉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因此必须承认,对粮食贸易来说,185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从美国输入的缩减,要比对俄战争更重要。^①

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英国粮食丰收而粮价仍然高昂,我们说,1853年《论坛报》曾不止一次指出下述事实^②:自由贸易派的错误看法造成了不列颠粮食交易的极其严重的反常和错乱,在夏季月份把粮价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然而只有提高粮价才能保证有必要的供应和足够的订货以满足将来的收购。这样一来,在1854年的7、8、9、10四个月里进口的只有75万夸特,而1853年同期却有2 132 000夸特。此外,毋庸置疑,由于废除了谷物法,英国有大量的耕地变成了牧场,因此在新的体制下,即使大丰收相对而言也还是歉收。

① 马克思于1855年1月10—11日所写的本文的草稿保存了下来,在草稿中,本段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这一次,英国自由贸易派在著述方面的最大权威——伦敦的《经济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它的传统,与曼彻斯特学派发生了公开矛盾。它不仅承认‘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关系不大,或者说没有关系’,而且还认为‘1853年的繁荣’是‘阵发性的’,‘1853年出现高烧,留给1854年一些病后虚弱症’,‘无论战争爆发与否,商业停滞都会来临。’”——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和《战争。——罢工。——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47—356、509—519页。——编者注

赫尔商会的通报说：

“结果，联合王国在 1855 年开始的时候，储存的进口小麦非常少，而价格几乎同 1854 年初一样高，因此直到春天，联合王国几乎要完全依靠本国农场主供应。”^①

1854 年英国工商业的停滞未必会在今年春天以前达到高潮。这次停滞的原因可以由下面不多的数字来说明：不列颠出口的原料和成品的价值，在 1846 年为 57 786 000 英镑，在 1853 年竟达到 9 800 万英镑的庞大数字。在 1853 年的这 9 800 万英镑中，澳大利亚（它在 1842 年购进的货物不到 100 万英镑，而在 1850 年大约为 300 万英镑）几乎吞下了 1 500 万英镑的货物；美国 1842 年仅仅消费了 3 582 000 英镑的英国货，1850 年消费了将近 1 500 万英镑的英国货，而现在购买的英国货达到 2 400 万英镑的庞大数字。美国的危机对英国贸易必然产生反作用以及澳大利亚市场的商品极度过剩，就无须进一步说明了。美国 1837 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 1836 年危机而来的，现在英国的危机却跟着美国的危机来临；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机都出自同一个原因——英国工业制度致命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本国造成过度生产，在所有其他国家则造成过度投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市場决不是例外；它们都同样依赖于英国，不过是世界市场的总情况的最高表现而已。

曼彻斯特的一个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写道：

“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国外市场商品过剩和做买卖无利可图，只有少数例外。”^①

^① 《1854 年贸易年度报告》，载于 1855 年 1 月 6 日《经济学家》第 593 期。——编者注

另一个关于丝纺织业的报告写道：

“通常吸收我们的剩余产品的大多数国外市场正经受着商品积压的沉重后果。”^①

关于布拉德福德毛纺织业的报告写道：

“生产已经极度扩大，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商品在国外市场是找得到销路的。但有很多交易都是通过轻率地把货物运到国外而做成的不正常的交易，根本无需我们多言，结果总的来说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从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关于大贸易公司的通报中，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摘录许许多多。^②

西班牙的革命和随后在这个地区的走私的盛行，给不列颠的产品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市场。由于东方战争³²引起的种种顾虑，黎凡特市场看来是唯一没有商品过剩的市场，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兰开夏郡在三个来月以前就着手在这个地区捞回过去忽略掉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得到消息说：君士坦丁堡也被大量的棉织品、毛织品、小五金、刀具和其他的英国商品压得喘不过气来。可以说，政治事件对商业停滞的漫延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

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写道：

“对于我国能逐渐发展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所抱的希望，现在几乎已完全成为幻想，目前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动起初被认为有利于对外交往，现在看来是对这个国家的劫掠，是对商业的彻底破坏。我们对于同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曾寄予很大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①

① 《1854年贸易年度报告》，载于1855年1月6日《经济学家》第593期。——编者注

②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我们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当中国革命⁵⁶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就曾预言过今天英国出口公司所抱怨的那些破坏性的后果。^①

我们否认战争同工商业危机有任何联系,这次危机的征兆,在谁也没有想到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当然懂得,战争会大大加深大不列颠将要经历的严酷考验。战争的延续意味着捐税的增加,而增加捐税绝不是解决收入减少的手段。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1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9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战争。——罢工。——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18—119、512—513 页。
——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⁵⁷

我们昨天引证了伦敦《泰晤士报》，大意是：英国骑兵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作为一支力量已不复存在。^①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来是从巴拉克拉瓦运送重武器和军粮来的马匹已筋疲力尽，无论是炮兵还是军需部都缺乏驮畜。然而，泥浆太深了，火炮和弹药的运输已经中断，还在继续进行的只是一般的食物供应。每天被送进医院的人平均达 150 人，其中大约有 50 人死亡。同时，堑壕已挖掘到离敌人的工事更近的地方，第三道平行壕已掘成，但还不能配置火器，尽管必须防守以阻止敌人出击。现在堑壕距离最近的攻击目标有多远，无法说清，因为消息有矛盾，当然也不是官方发表的；有些消息说相距 140 码或 150 码，但法国的一个消息称，距离最近的攻击点还有 240 码。法国的炮队，尽管已经全部装备完毕，却不得不闲着，因为，11 月份莫名其妙的、现在看来是完全无用的乱射，已使弹药贮备减少，再这样乱射将同样毫无用处。这样，俄军有足够的时间，不仅可以用来修复在以往受攻击时遭到破坏的全部工事，而且可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以用来构筑新的工事。俄军干得非常起劲，使目前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现在，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强攻已完全不可能了，要强攻，就得先后拿下好几道彼此相继的防线，并且这个分散的城市最后一道围廓内的全部大型石质建筑都已改建成了多面堡。

不管什么时候再进行围攻战，一切都必须再从头做起，不同的只是炮队离城近多了，因而射击会更有效一些。然而花了多少生命的代价——被敌人击毙或被疾病夺去——才换得这种优势啊！正是因为要防守如此长的堑壕，这项任务剥夺了士兵的睡眠，才使得英军中出现大量人员病亡。况且俄军频繁出击，尽管不是每次都成功，然而足以使本来就已劳累过度的敌人更加疲惫不堪。

看来英国和法国的增援部队也已几乎全部到达，因此，除非下令运送新的团队，否则在克里木的这两支军队的力量只能得到微小的补充。土耳其军队正陆续开到叶夫帕托里亚，将从该地进攻辛菲罗波尔，同时监视塞瓦斯托波尔的北区。这一行动使土耳其军队和他们的盟军完全隔开，形成两支孤立的军队，又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误，给俄军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然而这个失误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把更多的军队集中在小小的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那么错误也许更大。因此，我们看到，著名的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¹⁰的后果正一次又一次地在新的错误行动中重演。土耳其人很可能会遭到沉重打击；他们不再是在卡拉法特¹²和锡利斯特里亚¹⁴时的那支军队。涣散、玩忽职守和极端匮乏已经改变了这支军队。土耳其没有第二支军队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和谈因塞瓦斯托波尔被攻陷而中断是极不可能的。自从联军登陆以来，攻陷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这场克里木战争是所有战史上最大的失败，这

样说并不过分。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5 年
1 月 18—1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2 月 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

——克兰里卡德⁵⁸

伦敦,1月19日。目前《晨报》上正非常热烈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指责联合内阁“迟钝”是不是公正? 乌尔卡尔特从确信内阁和俄国之间订有密约这一前提出发,成功地维护着内阁而抵挡了说它无能的指责。《晨报》是伦敦报界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家报纸是“享有专利权的啤酒店主保护协会”的财产,是为了慈善目的,即为了扶助业内的孤儿、老弱和破产者而创办的,它无疑是伦敦除《泰晤士报》外发行最广的日报。这决不是那个姓格兰特的、曾做过速记员的人所领导的编辑部的功劳。这位格兰特娶了“保护协会”的头号人物的女儿,也就是娶了荷马或者如联合起来的啤酒店主所称呼的伟大的荷马的女儿。伟大的荷马让自己渺小的女婿做了《晨报》的主编。因为这个协会凭借自己的势力让《晨报》进入了每一家小酒店,甚至大部分客厅,所以这家报纸成为一家大报的物质基础也就奠定了。然而,它之所以有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报纸并不是经过编辑的,而是一个论坛,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伦敦“有身份的”报人不许《晨报》加入自己的行列,认为它不够资格,所以《晨报》为了对这些哥儿们进行报复,除了给自己的读者外,有时也给

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

谈到《晨报》，自然就要谈到啤酒和威尔逊-帕滕先生最近的啤酒法案⁵⁹。不久前的这次教士政变⁶⁰引起了不少笑话，并且表明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19世纪下半叶也还在涌现。然而这件事的严肃性在于，群众对教会干预并且控制世俗生活的蛮横态度表示惊异。群众对教会已经如此陌生，以致认为教会的这种干涉举动只不过是“恶作剧”而已，不过当它令人生厌的时候，人们就要抵制它了。教会派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昨天晚上竟厚着脸皮在诺丁汉召开公开大会，会上建议向议会请愿，要一切酒店不仅在威尔逊-帕滕不久前规定的白天的时段内，而且在礼拜日全天停止营业。当时有很多的工人听众在场，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由一个名叫霍尔顿的工厂工人提出的如下修正案：

“请求议会每逢礼拜日关闭所有教堂和小礼拜堂。”

可以肯定的是，林德赫斯特勋爵在议会复会后将马上在上院把对内阁提出的各项指责加以总结。大家知道，在1853—1854年的议会会议期间，克兰里卡德侯爵曾自命为议员当中反俄派的首领。但是，他和他的儿子邓克林勋爵——在后者从俄国俘虏营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当然不允许他再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了。著名的幽默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在《劳埃德氏周刊》上评论邓克林的信说：

“邓克林勋爵认为尼古拉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所根据的惊人的理由就是尼古拉释放了他邓克林勋爵！女巨人在谈到大拇指汤姆时说，我之所以把他称做伟人，是因为他征服了我，而这里是侏儒把沙皇称为伟人。”^①

① 1855年1月14日《劳埃德氏新闻周刊》第634期。——编者注

谁熟悉 1841 年由于土耳其—埃及事件而发表的蓝皮书⁶¹，并且从中知道克兰里卡德侯爵在彼得堡宫廷中当大使时所处的地位，谁也就明白克兰里卡德侯爵在上院所作的反俄的长篇空论，完全属于每个道地的辉格党人只要上帝不给他个一官半职就会本能地搞起的那一类反对派活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19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2 日《新奥得
报》第 3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⁵⁷

伦敦,1月19日。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再版了他的名著《论海军炮》,并增添了评论这次战争的某些事件的附录。例如,他根据最新的经验和只有他才能弄到的官方资料证明:如果穹窿炮台构筑得好,防守得法,单靠舰队来对付它是不够的;用爆炸弹轰击坚固的石砌体是无效的;最后,要想在博马尔松德^①和塞瓦斯托波尔所构筑的那种棱堡和穹窿炮台上打开缺口,就只能使用重炮,至少是三十二磅攻城炮,并且按照老方法进行轰击,而军舰由于从船舷瞄准不够准确,不冒船只必然被击毁的危险,便不可能打开缺口。专就克里木战局而言,尽管道格拉斯偏袒克里木远征军的司令官们,并且由于本人所处的官方地位不能畅所欲言,但他还是得出结论,认为克里木远征终将表明是一次失策。然而,雷公^②《泰晤士报》难道不是发表过一条特大新闻,说在40小时炮击后定会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吗?该报称,它的消息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只是为了使这个情报不被俄国人得到,它对于正是在这几天里将发生的事件没有加以详尽报道(见该

① 恩格斯《博马尔松德的夺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90—499页。——编者注

② 雷公是当时《泰晤士报》的别名。——编者注

报 12 月 26—31 日各号)。毫无疑问,塞瓦斯托波尔日内即可攻占。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泰晤士报》曾经激烈地反对外籍军团法案⁶,因为它和一般老百姓是同时得知这项措施的。于是它开始埋怨,发牢骚,又找内阁的麻烦。而内阁表现得十分怯懦,为了堵住这家报纸的嘴,便抛给它一条新闻——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同时内阁把将军们在一定条件下所提出的只适用于一定场合的意图变成了一项实际的作战计划。至于法国报纸——同样是一些半官方的机关报——也刊载了类似的新闻,这并没有使人们感到惊奇,因为当时正是发行 5 亿法郎公债⁵的前夜。而《泰晤士报》上当也是可以理解的。它相信比其他报纸早一天获得的任何消息。

克里木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法军因病减员的人数较少,骑兵的马匹状况良好,步兵士气旺盛,战斗力强;而英军仍同过去一样,每天都有 150 人被送进医院,40—50 具尸体被抬出。英军的炮兵没有马匹,不得不用骑兵的马匹从巴拉克拉瓦把重炮拖运上来,这样,马匹就被完全累垮了。天气每隔两三日就发生变化,不是下雨,就是下小雪,以致“泥泞”程度丝毫未减。因为几乎全部运输工具都在运送给养,——这仍然是首要任务,——所以不论是火炮还是弹药都不能运到发射阵地。同时,堑壕已挖掘到离敌人的工事更近的地方;第三道平行壕已掘成,但还不能配置火器,尽管必须防守以阻止敌人出击。堑壕距离最近的攻击目标有多远,无法说清,因为消息有矛盾,当然也不是官方发表的。有些消息说相距 140 码或 150 码,但法国的一个消息称,距离最近的攻击点还有 240 码。与此同时,法国的炮队,尽管已经全部装备完毕,却不得不闲着,因为,11 月份莫名其妙的、完全无用的乱射,已使弹药贮备减少,再这样乱射就未免太荒唐了。这样,俄军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足够的时间,不仅可以用来修复在以

往受攻击时遭到破坏的全部工事,而且可以用来构筑新的工事。俄军干得非常起劲,使目前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现在,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强攻已完全不可能了,要强攻,就得先后拿下好几道防线,并且这个城市最后一道围廓内的全部大型石质建筑都已改建成了多面堡。不管什么时候再进行围攻战,一切都必须再从头做起,不同的只是炮队离城近多了,因而射击会更有效一些。然而花了多少代价才换得这种优势啊!正是因为要防守如此长的堑壕,这项任务剥夺了士兵太多的睡眠,才使得英军中出现大量人员病亡。况且俄军频繁出击,尽管不是每次都成功,然而足以使本来就已劳累过度的敌人更加疲惫不堪。在此期间,土耳其军队正陆续开到叶夫帕托里亚,将从该地进攻辛菲罗波尔,同时监视塞瓦斯托波尔的北区。这一行动使土耳其军队和英法军队完全隔开,形成两支完全孤立的军队,又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误,给俄军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然而这个失误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把更多的军队集中在小小的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那么错误也许更大。著名的“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¹⁰的后果就这样正在重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1月19日

载于1855年1月23日《新奥得
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前景⁶²

当联军的远征军在季节已晚的情况下,以对一次突击来说人数太多、而对一场会战甚至围攻来说人数又太少的兵力,起航开往克里木的时候,当英国和法国的报刊大肆预言这支队伍必将获取胜利的时候,我们曾谈到1809年英军对瓦尔赫伦岛的灾难性远征⁶³。我们指出,以一支舰队为基础的远征,一旦退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疾病就比敌人的刺刀还要可怕,而由于英国军队已经暴露出来的管理不善,因此可能出现与瓦尔赫伦岛远征相似的后果。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得到的消息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证明,瓦尔赫伦岛远征的命运正向克里木的英国军队稳步靠近,虽然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从昨天通过大西洋号轮船带给我们的通讯和报刊中,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瓦尔赫伦岛远征正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重演,甚至是变本加厉地重演。

我们上周收到发自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其中援引了1月20日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的摘录,今天早上我们将这篇社论全文转载。这篇社论宣布,面对克里木愈演愈烈的管理不善和国内政府的束手无策,再向英国公众隐瞒全部真相就是一种犯罪。于是,它使用下面的消息让约翰牛大吃一惊:在派往东方的5万或6万将士中,只

有不超过 14 000 名步兵以及大约 1 500 名炮兵和坑道爆破兵还能执行任务,其余的不是死了、病了就是受伤了,而骑兵作为一支部队已经解散,马匹被移交给军械部门,用来向堑壕运输枪炮和粮食。甚至在这 15 000 人中,大多数也仅仅是名义上能够执行任务。他们身体虚弱,筋疲力尽,体内蕴藏着各种病菌。他们以每周 1 000 人的速度因为生病而失去战斗能力,死亡人数则是每周 300 或 400 人;而且死亡率没有任何降低的可能,因为这支部队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而要做的工作却保持不变,过度疲劳在士兵中是像其他原因一样厉害的病因。据报道,在 1 月 1 日时身体良好的士兵实际上不足 2 000 人,其中很多人现在肯定在受高烧和痢疾的折磨而绝望无助。我们还转载了这同一家报刊 1 月 25 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对可怕的事实进行总结时说,按现在的减员速度,到 3 月中旬,这次远征的幸存者就只剩下拉格伦勋爵和他的幕僚了。约翰·罗素勋爵在解释他辞职原因的议会演说中说,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报告“不单是痛苦的,而且是可怕的,令人心碎的”。^① 约翰勋爵也说军营里的死亡人数是一天 90—100 人。因此,不能把伦敦报刊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说成是像某些方面妄加发表的评论那样的纯粹片面夸大之词。^②

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因为法军,英军可怜的残余人马恐怕早就被切断,被消灭了。但是法军令人钦佩的管理总算是让这支军队没有受到损害。这种管理不是任何特殊行政机关的功劳。它是法国人的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法国人出类拔萃的其他品质,如把细节安排得十

^① 《约翰·罗素勋爵的辞职》,载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1962 号。——编者注

^② 本文到这里为止的文字经《纽约每日论坛报》修改过。——编者注

分协调和实用的结果；最后，是 25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⁶⁴ 积累的经验的
的结果。这种制度不是路易-菲利浦、共和国或路易·波拿巴发明的，它是具体环境的产物，是一系列连续的必然性的产物，是众多师、
旅级将官和他们的部下努力的产物。

虽然法军部署在赫拉克利亚半岛的最外端，完全依靠自己的舰队补给，而英军凭着技巧和勇气可能已经把富饶的拜达尔谷地的粮草全都征集了起来，但是法军的各类物资都很丰富，因为在法军中服役的人员，十个中有九个都是行家里手，而在英军中服役的人员，一百个中也许只有一个是这样，并且这个非凡人物通常都被安排在这种一种位置上：如果要他提建议，他就会目空一切、毫无纪律。如果英军可以免受在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之前就要登船返回，或者说，不能随身携带枪炮就要登船返回的耻辱，那么他们就让法军谢天谢地了。现在，几乎不用怀疑，我们很快就会听到英军部分防线已经移交给法军的消息^①。英军减少到只有区区一个师的兵力，由数千不屈不挠、勇敢无畏，但疾病缠身、不知所措的人组成，他们会坚守自己的光荣岗位，但是如果得不到比他们强大、也比他们老练的盟军源源不断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

任何亲历过真正的战争的人都知道，士兵的个人勇敢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缺乏组织，缺乏好的军官，特别是好的指挥官以及好的军需部门和医疗人员，这种勇敢相对来说意义就不大了。英国的克里木远征军是这方面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例证。由于司令官^②的无能和冷漠，由于军官的无知，由于军队中每个人都茫然不知

① 见本卷第 250—251 页。——编者注

② 菲·詹·拉格伦。——编者注

所措,由于除了阅兵场所要求的组织外就完全没有任何组织,士兵令人钦佩的无畏精神不仅无用,反倒有害。在法军中,士兵把个人的勇敢和个人的聪明结合在一起,军官把军事科学和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各个部门的分工明确而完备,行政管理简明而有效,这一切使得法军总的来说成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一支军队,使得法国人能够保持杰出的军事民族的声誉。

但是,不要以为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法军处于令人羡慕的状态。他们派出了9个足额满员的师,其中8个半(17个旅)在克里木,占据着非常小的一块地方,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肯定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法国的步兵旅一般包括两个团,每团两个野战营,还有一个步枪营,共计5个营。法军的每个营按战时编制平均1100人。因此每个旅有5500人,每个师至少11000人,此外还有骑兵、炮兵和坑道爆破兵。因此法国派到克里木的全部步兵应该有94000人,加上炮兵、骑兵和工兵部队,全部武装力量至少有11万人。目前在赫拉克利亚半岛的法国人实际上不可能超过65000人。就法军在这个岛上占据的地盘而言,他们不可能都在这块弹丸之地驻扎下来。^①因此,法军因死亡和伤病实际上已经损失了45000人,如果我们把在瓦尔纳和在多布罗加远征中折损的人员计为1万人,在阿利马河、巴拉克拉瓦、因克尔曼,他们折损了4500人,而在铎壕里折损的人员应该差不多有1500人,那么还有29000人应该算做是疾病的牺牲品。减员虽然严重,但在一场历时长达四月之久并伴有像克里木在目前这个季节里那样的艰难困苦的战局中,这种损失

^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16—625页。——编者注

也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一支正在作战的军队战斗力每月减少10%，这完全是普遍可以接受的，法军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比例。不过，尽管如此，从法国派出11万人，到克里木只剩下65 000人能够执行任务。这样一支队伍虽然由于安排合理而健康状况良好，也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能够把病员送到医院，能够使道路、堑壕和炮台得到良好的维护，但是这样的一支队伍绝对没有力量在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即使只是南区——的同时又在野战战场上把俄军逼入绝境。

土耳其的军队竟然在阿利马河北岸登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最好在遭到重大损失前设法回撤。有望在1月份登陆的土军约为6万人（不过其中一部分尚未集中），但他们已不再是参加过最近多瑙河之战的那支队伍了。参加过多瑙河之战的那些士兵已经和英国近卫军一样阵亡了。目前的土军大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或是预备军（列季弗），前者太缺乏经验，后者过惯娇生惯养的家庭生活已不再是好的士兵。土军的管理不善和管理混乱更甚于英军。如果俄军没有在战场上消灭土军，土军自己一塌糊涂的管理和致命的疏忽大意也会同样有效地让自己灭亡。此外，我们以前指出过，联军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他们兵分两路，在面对积极进攻、行动敏锐的敌军时不能互相支援，这就使俄军可以单独袭击土军，在法军摆脱赫拉克利亚半岛这个捕鼠器之前把土军赶回大海。

同时，俄军也远不是毫无作为。最初克里木的守军是由第六军以及第五军的一部分组成的。第四军在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⁰的前几天到达；现在第三军也在这个半岛上；12月28日第八师开到了巴赫奇萨赖；同一天，第七师、第九师连同第一龙骑兵师和将近140门火炮和4个哥萨克团占领了位于这个半岛颈项位置即位于

彼列科普的阵地；该军（第三军）的轻骑兵师已向叶夫帕托里亚推进，该地已在它的监视之下。这样一来，大约有一半俄国作战部队（不含预备部队）部署在克里木或者驻守在敖德萨、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而由帕纽亭指挥的第二军的一部分据说也要开过来增援。这 12 个步兵师和 6 个骑兵师由于战局失利和长途行军而减员后的实际兵力有多少，当然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部分减员是否已经补足。不管怎样，它们至少应当有 10 万人可以投入野战，在塞瓦斯托波尔驻守的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还不算在内。现在，敌方的两支部队分头行动，相互不能提供支援，因克尔曼的士兵因疾病而减员，而塞瓦斯托波尔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固，除非俄军空前绝后地不依兵法行动，否则这支军队肯定会把联军赶回大海。

现在来看看英国为了弥补过去的不足而采取的奇特的方式。一支远征军开始着手修建一条从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不错，一条铁路，双轨、固定发动机等一应俱全。看来，没有人想过修好公路是更简单更实用的计划。不仅如此，从布加勒斯特到瓦尔纳的电报线离完成还差得很远，居然又开始铺设从瓦尔纳到巴拉克拉瓦的海底电报线。约翰牛先是本末倒置，贼去关门，然后便在热情冲动中忙成一团，完全不知自己所作何为。他让自己的士兵饿死，现在却修建铁路来运送尸体。他把医疗部门管理得一团糟，把不合格的人派到医疗服务的各个部门，而两个月后医务主管就能通过电报直接打报告了。他的总司令低能愚笨，而据他自己的军务大臣说，他的军官都不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工作。但是，谁又知道此刻一种比战死还要悲惨万分的灾难是否已使他们永远不能免除人类的谴责和惩罚呢？这是一种悲哀，一种可怕的奇观，它让批评几乎全都充满忧

伤,让真理本身几乎完全失声无言。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2—25 日之间

载于 1855 年 2 月 10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31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
——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骚动⁶²

伦敦,1月23日。西方强国宣称,它们的军事行动将不因维也纳谈判而停止片刻。那么,俄国究竟能从这种假谈判中获得什么直接的军事利益呢?《太阳报》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完全确定的回答。最初克里木的守军是由(俄国的)第六军以及第五军的一部分组成的。第四军在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⁰的前几天到达;现在第三军也在这个半岛上;12月28日第八师开到了巴赫奇萨赖;第七师、第八师连同第一龙骑兵师和将近140门火炮和4个哥萨克团布防在彼列科普一线;第三军的轻骑兵师已向叶夫帕托里亚推进,该地已在它的监视之下。这样一来,大约有一半俄国作战部队(不含预备部队)部署在克里木或者敖德萨、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的驻防区,而第二军(由帕纽亭指挥)的一部分据说也要开过来增援。这12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由于战局失利和长途行军而减员后的实际兵力有多少,当然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部分减员是否已由新的增援部队补足。但是不管怎样,它们至少应当有10万名有作战能力的人员,在塞瓦斯托波尔驻守的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还不算在内。

在克里木集结了至少占俄国全部武装力量四分之一这样庞大的军队表明,在最近的军事调动给沙皇尼古拉驻沃伦·波多利斯科的军队造成的缺口尚未得到填补之前,把奥地利卷入新的谈判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现在,在议会召开例会的前夕,刚刚公布的最近时期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的公函被用来大做文章,就像在议会召开非常会议的前夕,12月2日的条约²被用来大做文章一样。内阁的机关刊物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外交的攻击来回敬对英国军事行动的攻击。《地球》报和《纪事晨报》这两家最亲内阁的报纸在攻击普鲁士时措辞最为激烈。

上礼拜日^①这里发生的一次雪球骚动是又一个实例,说明教会派蛮横无理的要求和他们暗中使议会通过的关于严格过礼拜日例假的法案⁵⁹只是促使英国人民采取粗鲁而放肆的耍闹形式进行抗议。在上礼拜日早祷的时候,圣马丁教堂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上聚集了近1500人,人群向公共马车、出租的四轮马车、行人投掷雪球取乐。由于教堂门口的喧闹声,祈祷不得不完全停止。当警察开来的时候,警察便成了攻击的主要对象,几分钟以后,部分警察已经不能向左右看东西了,因为他们的肩膀上、帽子上等等都落满了雪。一些想要离开教堂回到营房去的士兵也被迫立即退回去,他们的英国人的冷静性格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在交战的地点不得不又增派了近100名警察。最后警察动用了棍子,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搏斗。4个闹事首领被抓起来了,并且被押送到警察分局,尽管在钱多斯街和罗素街人们曾多次试图把他们从秩序的卫士手中抢救出来。昨天这几位先

^① 1855年1月23日。——编者注

生在弯街的治安法庭受到审讯。圣马丁教堂的教会主管人也出庭为控告他们作证。每个主犯被判罚款 40 先令或两周的监禁，雪球骚动的史篇也就此结束。不管怎样，这次骚动驳倒了利涅公爵的论断。这位公爵在尼德兰反对约瑟夫二世的暴动⁶⁵中拒绝参与，理由是：正值冬天，而雪和暴动是互相排斥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3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新奥得
报》第 4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常会开幕⁶⁶

伦敦,1月24日。议会于昨日复会。埃伦伯勒伯爵在上院宣称^①,2月1日星期四,他将建议有关方面提交一份官方材料,说明派往克里木的军队(步兵、骑兵和水兵)人数以及死者、伤号、病号和一切丧失作战能力的人员的数目。里士满公爵质问陆军大臣,为什么在颁发奖章时不考虑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⁰的参加者。不仅巴拉克拉瓦会战的参加者,而且所有驻黑海的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水兵都应当得到奖章——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就是用这样的回答吃掉了里士满公爵的一张牌。针锋相对,里士满公爵与埃伦伯勒伯爵和哈德威克一起提出了亚当·斯密早就发现的定律^②:奢侈品的价值,因此也包括奖章的价值同其数量成反比。经过这场大约半小时的激烈争辩,上院议员们决定会议延期举行。

下院的会议厅挤满了人。但是期望落空了。迪斯累里缺席,本杰明·霍尔爵士发了言。会议在3点3刻开始,还不到6点就结束

① 爱·埃伦伯勒《1855年1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编者注

②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354页。 编者注

了。罗马元老院接到在坎尼吃了败仗⁶⁷的消息时所表现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曾经使人感到吃惊。但是英国下院议员现在已胜过了罗马元老院元老。在克里木看到他们这种神态的人们决不会相信英国军队会覆灭。看来,克里木驻军的健康状况促使本杰明·霍尔爵士提出关于改善英国卫生警察管理的两个法案。本杰明·霍尔爵士属于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奥斯本等人那样的所谓激进派。这帮先生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他们为自己谋求内阁职位上,虽然他们不是寡头政治家,也不具有平民的才能。但是单是他们进入内阁,就已经是一个激进的事实。他们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因此,当1854年夏季霍乱在英国十分猖獗,而此前一直受内务大臣帕麦斯顿监督的“卫生委员会”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医务部门一样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联合内阁认为这正是个好时机,可以设置一个新的内阁职位——卫生委员会的独立的主席——并用吸收“激进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入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本杰明·霍尔爵士就成了卫生大臣。虽然在《官报》报道他上任的消息之后霍乱在伦敦并没有绝迹,但是曾经在《笨拙》杂志上嘲笑过联合内阁和俄国沙皇^①的一个叫泰勒的人却在这本杂志上消失了。原来本杰明·霍尔爵士任命他为卫生委员会秘书,薪俸1 000英镑。作为激进派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喜欢激进疗法。关于他的法案的优点,等法案提出来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而昨天这两个法案只是为了给他作为大臣进入下院提供机会。

对于莱亚德的质问:

“内阁是否反对提交在1854年12月2日的条约问题上与外国交换的信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件,特别是英法方面就解释四项条款而交给俄国政府的——不是为了就条款进行谈判而是为了要它接受条款——一切可能的文件?”^①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②,他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交上述任何文件。这不符合议会的惯例。不过,有关四项条款³这件事,他可以向自己值得尊敬的朋友概述如下:11月底,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通知说,愿意接受所谓的四项条款;紧接着缔结了12月2日的条约²;此后,12月28日,哥尔查科夫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使节在维也纳会晤。法国使节代表盟国宣读了解释四项条款的文件。这一解释应当被视为谈判的基础。在第三项条款中提出要结束俄国在黑海的优势地位。哥尔查科夫不接受这种解释,但说准备请示自己的政府。10天后,哥尔查科夫通知布奥尔伯爵说,他已接到了有关指示。1月7日或8日,在奥地利外交大臣的办公室又举行了会晤。哥尔查科夫宣读了阐明其政府观点的备忘录。布奥尔伯爵、威斯特摩兰勋爵和布尔克奈男爵宣称,他们没有被授权接受备忘录。谈判的基础应当是接受对四项条款所作的解释。于是哥尔查科夫便收起备忘录,接受了这一解释,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罗素补充说,俄国虽然接受了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明确确定下来以后,俄国仍有权对它的“每一项条款”提出异议(当时这个基础已经以条文的形式提出)。英国政府宣称,它愿意在上述基础上参加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授权它的使节进行谈判”。后面这句话是罗素向“下院议员”透露的唯一的³新东西。

^① 奥·亨·莱亚德《1855年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编者注

^② 约·罗素《1855年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编者注

会议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罗巴克的发言。他宣布,他

“将在下星期四建议任命专门委员会来查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军队的人数和状况,以及调查负责满足军队需要的政府各部门的活动。”^①

《泰晤士报》“恳求”罗巴克“大声疾呼,不要有任何顾惜”。而《泰晤士报》的恳求和罗巴克先生的往事都不能完全消除这样的怀疑:他大叫大嚷,或者确切地说哇啦哇啦地叫,是想妨碍别人讲话。据我们所知,乌利斯从来没有利用过瑟息替斯;但是同乌利斯一样机灵的辉格党人却在利用罗巴克。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新奥得
报》第 4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约·阿·罗巴克《1855 年 1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1959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论内阁的危机⁶⁸

伦敦,1月26日。当马里克沙赫苏丹的使者到阿拉穆特要求哈桑·萨巴赫投降的时候,“山中长老”吩咐他的一个殉道派教徒⁶⁹自杀以代替一切回答。那个青年立即用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倒在石板地上咽了气。联合内阁的“长老”^①也要求约翰·罗素勋爵为他牺牲,在下院自杀。但是罗素这位议会仁爱老人,总是把“爱别人如爱自己”^②这一戒条解释成人莫不先爱其身,因而他宁愿杀死“长老”。我们没有把罗巴克估计错。他的提案是同罗素商量好的,为的是在沉船时救出“精华”——辉格党⁷⁰人。

果真如此!罗巴克的提案并不是反对内阁,而是反对直接负责进行战争的那些“部门”,也就是反对皮尔派⁷¹。此外,罗素因此在议会开幕时声称,只要俄国保留对四项条款中的任何一项提出异议的权利,谈判的基础就不成其为基础;只要英国内阁尚未授权任何人进行谈判,谈判也就同样不成其为谈判。他这么说显而易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此罗巴克刚一宣布要提出自己的提案⁷²(在星期二),

① 乔·阿伯丁。——编者注

② 《旧约全书·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编者注

罗素当天晚上就写信给“长老”说,这个提案是针对陆军部(皮尔派)提出的一个谴责案,因此他不得不递交辞呈。阿伯丁前往温莎城堡去觐见女王,劝她接受辞呈,结果就这样办了。如果人们知道,帕麦斯顿并没有递交辞呈,那么,“长老”的勇气是可以理解的。

下院在星期四的会议上知道了这些重要的事件。下院把会议推迟到今晚,罗巴克也要到今晚提出自己的提案。所有的下院议员都奔到上院去,等待阿伯丁作出解释。但是阿伯丁非常机灵,借口又到温莎去了而没有出席会议,纽卡斯尔公爵则在上院讲述^①帕麦斯顿在下院讲述^②过的那一套故事。这时候,下院的辉格党人在上院吃惊地发现,他们的计划被识破并且退路也被切断。托利党⁷³人决不愿意靠牺牲皮尔派来重新使辉格党人享有他们旧有的“大不列颠帝国天生的承租人”的特权,他们怂恿林德赫斯特勋爵提出一项提案,这项提案与罗巴克的提案不同,它不是针对内阁的个别部门,而是针对整个内阁,不是像罗巴克那样仅仅谴责一番,而是正式把内阁置于被告的地位。林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案的原话是这样的:

“2月2日,星期五,我将提出一项提案:本院认为,克里木远征是女王陛下各部大臣在动用极不充分的作战手段并且对可能遭到的敌人反抗的性质和规模缺乏应有的预见和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在指导战局上所表现的失察和失职造成了极其不幸的后果。”^③

① 亨·纽卡斯尔《1855年1月2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1855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编者注

③ 约·林德赫斯特《1855年1月2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纪事晨报》第27484号。——编者注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德赫斯特的提案反对的是辉格党人,就像罗巴克的提案反对的是阿伯丁的拥护者一样。顺便提一下:约翰·罗素勋爵通过海特告诉下院,一有机会,也就是在今晚,他将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无所希望的人也就不会失望”。⁷⁴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新奥得
报》第 4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状况⁷⁵

伦敦,1月27日。昨天下院会议的语调和形式清楚地告诉人们,英国议会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大约下午4点,议会开会了,会议厅挤得满满的,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一出戏,一出丑戏:罗素勋爵解释他辞职的原因。当关于人事的辩论刚一结束,开始对罗巴克的提案⁷²进行专门性辩论的时候,这些激愤的爱国者匆匆忙忙地去吃饭了;会议厅里已经没有人了,个别人在叫喊:“表决!表决!”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间歇,直到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站起来对着空荡荡的席位作冗长的、咬文嚼字的报告。随后,吃饱了的议员们一个个慢吞吞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在晚上9点半左右莱亚德开始讲话,在场的约有150名议员;在他结束讲话时,大约在会议结束前一小时,会议厅里又挤满了人。但是在会议剩下的这段时间里却很像是议会在午睡。

约翰·罗素勋爵的全部优点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熟悉议会策略。他讲话时不像通常在这种场合下那样站在演说者的讲台上,而是站在大臣席后面的第三排,即不满意的辉格党⁷⁰人端坐的那一排席位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嘶哑,语调拖得很长,像平时一样,

英语发音很蹩脚,并且常常严重地违反句法规则。(顺便说一下,千万不能把报上发表的讲演稿同口头讲话混淆起来。)一般的演说家是用漂亮的演讲来代替糟糕的内容,罗素却试图用比内容更糟糕的演讲^①来为糟糕的内容开脱。他说话的方式仿佛是在为他所说的话赔罪。

确实有必要赔罪!他说,上星期一他还没有想到要辞职,而在星期二,当罗巴克声明要提出自己的提案时,他马上就认为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番话使人想起那种丝毫不反对撒谎而当谎言被戳穿时才良心发现的奴才。他说,他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要求议会进行调查的提案,这本来就是他这个下院里的内阁负责人应当做的事!难道因为灾难并未大到非要求调查不可的地步!没有人会否认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的悲惨处境。这种处境不单是痛苦的,而且是可怕的,令人心碎的。莫非他应当向议会断言,议会调查委员会是没有用的,因为正在采用有效的办法来消除灾难?这个问题提得很圆滑,因为罗素不仅是内阁的成员,而且首先是枢密院院长,他对采取这些办法直接负责。罗素承认,他同意委任纽卡斯尔公爵为陆军“首席”大臣。他不能否认,最晚在八九月份必须采取为军队提供给养、服装和医疗的措施,以防万一。根据罗素自己的表白,他在这个紧急时期做了些什么呢?他跑遍全国,在“文学协会”发表无关紧要的演说,出版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通信集^②。当他在英格兰游历时,阿伯丁在苏格兰游历,内阁从8月到10月17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在

① 约·罗素《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编者注

② 指约·罗素编辑出版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伦敦版第1—3卷,第4卷于1857年出版。——编者注

10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根据约翰勋爵自己的报告^①,他没有提出任何值得向议会通报的东西。此后,约翰勋爵又思考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1月17日给阿伯丁呈上一封信,在信中建议把陆军大臣的职务同军务大臣的职务合并,并且让帕麦斯顿勋爵去担任这两个职务,换句话说,就是免去纽卡斯尔公爵的职务。阿伯丁没有接受这个建议。11月28日,罗素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阿伯丁。阿伯丁11月30日的回答一语中的,他说,罗素的整个建议无非就是要用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即用帕麦斯顿代替纽卡斯尔。当初殖民部同陆军部分开²⁶时,罗素曾欣然同意把后者交给纽卡斯尔,以便把自己辉格党的一名成员——乔治·格雷爵士安插到殖民部去。接着,阿伯丁私下问罗素是否打算向内阁会议提出自己的建议。罗素放弃了这个打算,用他的话说,为的是“不搞垮内阁”。可见首要的是内阁,其次才是克里木的军队。

罗素承认没有采取消除灾难的措施。军事管理方面的一切改革只限于使军需部隶属于陆军大臣。然而,尽管罗素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但他还是心安理得地待在内阁里,而且从1854年11月30日到1855年1月20日再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然后在1月20日这一天,即上星期六,阿伯丁转给罗素一些关于改革军事管理的建议,罗素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够完备的,因此用书面形式提出了自己的反建议。仅仅过了三天,他认为必须呈请辞职,因为罗巴克声明要提出自己的提案,而罗素不乐意同内阁分担责任,虽然他在内阁任职并直接参与其事。罗素解释说,他听说阿伯丁从来没有决定任命帕麦斯顿为陆

^① 约·罗素《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编者注

军部的独裁者。如果真是这样，他，库尔齐乌斯，庆幸自己不是白白地从内阁这块坚实的地盘跳进反对派的深坑。当我们的约翰勋爵在这条陡峭的路上往下滚了这么远之后，他把他能够说得出口的辞职的最后一个借口也推翻了，他说：(1)战争的前途根本不是引起普遍的绝望情绪的原因；(2)阿伯丁是伟大的大臣，克拉伦登是伟大的外交家，格莱斯顿是伟大的金融家；(3)辉格党不是由追求官位者而是由热诚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后，他罗素在表决罗巴克的提案时将弃权，虽然他退出内阁据说是因为一个爱国者不能反对罗巴克的提案。罗素发言时态度冷淡，而听众对他的发言的反应则更加冷淡。

帕麦斯顿代表内阁发言。他的处境很滑稽。库尔齐乌斯-罗素辞职是因为阿伯丁不想任命帕麦斯顿为军事独裁者。布鲁土斯-帕麦斯顿攻击罗素是因为他在危急关头抛弃阿伯丁。在这种滑稽的处境中，帕麦斯顿却感到很得意。他利用这种处境，把严峻的局面变成一幕闹剧，像他通常在紧急关头所做的那样。当帕麦斯顿指责罗素没有在12月就作出自己英勇的决定的时候，迪斯累里——他至少没有掩饰住因威尼斯宪法⁷⁶破产而引起的喜悦——大声笑了起来，而擅长于摆出一副严肃面孔的格莱斯顿显然在嘟哝着皮由兹教派⁷⁷的各种祈祷文以免笑出声来。帕麦斯顿声称，通过罗巴克的提案就意味着内阁倒台。如果提案被否决，内阁将讨论它本身的改组问题(包括帕麦斯顿的独裁问题)。

这个帕麦斯顿真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他一只脚虽已跨进坟墓，但仍能使英国相信他是一个新人，他的官运才刚刚开始！这个当了20年军务大臣，并在这个职位上仅仅以在军队中一贯维护体罚和出卖军衔⁷⁸而著名的人，现在居然伪装成一个单靠自己的名字就足以消灭制度的缺点的人！在所有的英国大臣当中，他是唯一在议会

中屡次(在 1848 年特别郑重地)被揭露为俄国代理人的人,他居然伪装成唯有他才能领导英国同俄国作战,帕麦斯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对罗巴克的提案的辩论延期到星期一晚间进行,有关情况下次再谈。这个提案写得十分巧妙:内阁的反对者宣称将投赞成票,虽然这个提案是乏味的;但内阁的拥护者表示赞成这个提案,虽然他们将投反对票。上院的会议没有特别的趣闻。阿伯丁对罗素的声明没有作任何补充,只是对罗素使整个内阁吃惊这一点表示吃惊。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30 日《新奥得
报》第 4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⁷⁹

随着新的维也纳会议⁴开幕日期的临近,希望俄国方面作出某些让步的可能性已日益渺茫,而且是极端靠不住了。沙皇^①出色的外交步骤的辉煌胜利,即迅速同意所提出的谈判基础,使他至少在最近时期处于掌握控制权的地位。为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沙皇虽已表面上同意和谈建议,但实质上他在目前同意调解的唯一现实基础是维持现状。沙皇以接受四项条款³的手段重新使奥地利处于十分摇摆的地位,同时继续控制普鲁士,并且还赢得了时间,以便在军事行动开始前把所有的预备部队和新编的部队调往边境。

同意谈判这件事本身,就使俄国能够从驻在奥地利边境的监视军中立即调走至少6万—8万人,然后在2个月或10周内补充上同等数量的部队。由于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作为一个军团而言已不存在,第四军10月底到了克里木,第三军在12月底到了那里,而第五军的剩余部分连同骑兵和预备部队也正在向那里推进,这些军队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一带的防务就必须由从驻在波兰、沃伦和波多利亚的西方军团中抽出的生力军接替。可见,如果战争转移到大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陆中部,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俄国来说就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目前俄军从卡利什到伊兹梅尔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没有增援便不能长久地对抗与它相峙的数量日渐增加的奥军。现在俄国赢得了这段时间,下面我们将说明俄国的军事准备目前正处于什么状态。

俄国军队的组织情况我们以前已经作了概述^①。用于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庞大的作战部队起初有:6个基干军,每军48个营;精锐部队2个军,每军36个营;另外有相当多的正规骑兵、非正规骑兵和炮兵。我们以前曾经报道过,沙皇政府不仅召集预备兵员,编成了精锐部队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以及其余六个基干军的第五、第六营,甚至还用新兵在每个团内编成第七、第八营。这样一来,6个基干军内营的总数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锐部队(近卫兵和掷弹兵)内营的总数则增加了一倍多。现在俄国军队的数量可大致评估如下:

近卫兵和掷弹兵(每团的	
前4个营)	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
近卫兵和掷弹兵(每团的	
后4个营)	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
第一和第二军(尚未参加	
战斗,每团的前4个营	
即基干营)	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
第一和第二军(每团的后	
4个营)	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
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	
(基干营)	共192个营,每营500人,共96000人

^① 恩格斯《俄国的军事力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50—655页。——编者注

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

(每团的后 4 个营) 共 192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134 400 人
 芬兰军 共 1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14 400 人

合 计	784 个营	552 000 人
另有: 正规骑兵		80 000 人
非正规骑兵		46 000 人
炮兵		80 000 人
总 计		758 000 人

这些数字中有些可能显得估计过高, 但实际上并不高。尽管俄军有伤亡, 但是有伤亡的只是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 96 个基干营, 所以自战争开始以来所征召的大量新兵仍应使军队的人数更大于这个数字, 但新兵在到达团队以前常常大量死亡, 因此我们打了折扣。此外, 我们估计的骑兵数字是大大压缩了的。

上述数字中有 8 000 人(第五军的一个师)驻高加索, 这部分军队应当除外, 因为这里我们不谈用于欧洲地区以外的军队。其余 75 万人的部署情况大致如下: 驻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弗斯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团, 由芬兰军以及近卫兵、掷弹兵和第六军的预备部队组成, 连同骑兵和炮兵, 共约 135 000 人, 然而其中一部分是未经严格训练的新兵和仓促编成的营。驻波兰和驻加利西亚边境自卡利什至卡缅涅茨一线的是近卫兵、掷弹兵、第一军、第六军一个师以及掷弹兵和第一军的部分预备部队, 连同骑兵和炮兵共约 235 000 人, 这是俄国军队的精华, 由精锐部队和最好的预备部队编成。在比萨拉比亚以及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 有第二军的两个师和该军的部分预备部队, 总共约 6 万人。这些部队本属西方军团, 但自多瑙河军团开往克里木后, 就被调到多瑙河军团的原来驻地。现在, 他们同驻

多瑙河两公国的奥军对峙，由帕纽亭将军指挥。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已开到的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一个师、第六军的两个师、部分预备部队以及尚在途中的第二、第五军的各一个师；这些部队连同骑兵和炮兵估计不少于 17 万人，由缅施科夫指挥。其余的预备部队和新编部队，尤其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军的这些部队，现在正由切奥达耶夫将军组成一个庞大的预备军团。这个军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约 15 万人。至于这个军团有多少人开赴波兰或南方，自然还不清楚。

这样算来，尼古拉皇帝在其帝国西部自芬兰起到克里木止的边境上部署的军队，去年夏季不到 50 万人，而现在已有 60 万人，另外还有在内地编成的为数 15 万人的预备军团。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的兵力相比，他现有的兵力却比过去的弱。去年八九月间，在波兰和波多利亚驻有俄军 27 万人，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地区还驻有约 8 万人的多瑙河军团，这个军团驻在那里主要也是防范奥地利人。因此，当时可以动用总数达 35 万人的部队对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仅有沿奥地利前哨线配置的 295 000 人，而奥地利到目前为止应该有 32 万人直接与他们对峙，而且还可以把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 7 万—8 万人调来支援。俄军眼下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至于新军何时能从内地开来，在目前这种季节，在这样一个全部行政机构腐败透顶的国家里，这是非常难以确定的，这些原因就足以使俄国政府力争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数量上的劣势使俄军不能采取进攻行动；在一个如波兰这样地形开阔的国家里，两军之间又无大江大河相隔，这意味着只要一发生接触，就只好向可以扼守的阵地退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意味着把俄军割裂为两部分，一部分被迫退向华沙，另一部分被迫退向基辅，而且这两部分之间还隔

着无法通行的、起于布格河(不是南布格河,而是维斯图拉河的支流)止于第聂伯河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实际上,如果大量的俄军没有被赶进沼泽地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是他们罕见的幸运。这样一来,甚至不经过战斗就必须放弃波兰南部的大部分、沃伦、波多利亚和比萨拉比亚,也就是从华沙到基辅和赫尔松的整片土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俄军在数量上占优势,无须冒险进行决战,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奥军赶出加利西亚和摩尔多瓦,并占领去匈牙利的通路;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这种战争中,首次进攻的胜利,确实对任何一方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交战双方都将竭尽全力,以求最先在对方的领土上站住脚跟。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奥地利不向俄国宣战,这场战争便不会具有真正的欧洲战争所具有的那种军事意义。^① 甚至克里木的战事也不过是一场小范围的大战争而已。俄军的超长距离的行军以及联军所遭到的灾难,已使双方作战部队大为减员,以致到目前还没有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会战。如果交战的一方只投入 15 000—25 000 人,那还称得上什么战斗! 在赫尔松涅斯角与巴赫奇萨赖之间的小小空间里,又能够进行什么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战略行动! 甚至在这里,不论发生什么事件,军队都少得无法占据整个战线。所以,引人注意的,与其说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倒不如说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至于其他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具有历史意义,只不过是趣闻而已。

不过,如果目前在加利西亚边境上对峙的两支大军都行动起来,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战况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96—703 页。——编者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指挥官的意图和能力如何,庞大的军队本身,再加上地形的性质,将使有名无实的战争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不再存在。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翼侧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说,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在这里就成为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了。这时,受政治因素影响或优柔寡断的统帅,不可避免地会葬送自己的军队。在这样的地区展开这样规模的战争,将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转折。正因为如此,奥俄战争一旦爆发,就将成为 1815 年以来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

至于缔结和约的前途,目前已不如数星期前那么明朗了。如果同盟国愿意在基本上维持现状的条件下结束斗争,就可能缔结和约。但读者不需要解释便可明白,这种希望是多么渺茫。目前,俄国能得到半个德国至少精神上的支援,并且已部署了如前面所说的大量兵力,这时,我们自然不能期望俄国会接受法国和英国可能向它提出的或为法英所能够同意的条件。俄国从彼得大帝时期到阿德里安堡条约⁵⁰为止几乎不停地缔结一连串有利的和约,现在,当塞瓦斯托波尔还没有被攻克,俄军还只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的时候,想要它缔结意味着放弃黑海霸权的和约,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如果说在塞瓦斯托波尔尚未陷落和联军远征尚未完全展开以前和约不可能签订,那么当克里木战局的胜负决定后,就更不可能签订了。如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或者联军被击败并被赶入大海,那么,俄国的荣誉,或者同盟国的荣誉都不允许它们在没有取得更具决定意义的战果之前签订和约。如果在会议准备期间订立停战协定,——我们在得知沙皇接受四项条款时,曾暗示有这种可能——那就还有和平的希望;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却不得不

承认,发生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1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1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⁷⁹

伦敦,1月29日。今天,英国报纸证实了我们对英国议会的判断。^①

《晨报》说:

“英国议会又开会了,并且第一个晚上就在哄堂大笑中散了会,这种笑声比一个白痴在自己父亲的棺材旁开的玩笑还令人作呕。”^②

《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指出:

“无疑,没有几个人在读过星期五举行的会议的报道后不被忧郁的情绪所笼罩。经过仔细分析,这种情绪其实代表着一种看法,即认为我们在最紧迫的情况下为讨论最严肃的问题而召开的立法会议把极重要的事情摆在次要的事情之后,把应当完全用来讨论我军在克里木的绝望处境的时间都浪费在个人利益或党派利益的问题上。”^③

借此机会,《泰晤士报》建议任命帕麦斯顿为首相,因为他“太老”了,不宜担任陆军大臣。就是这同一家《泰晤士报》曾建议克里木远

① 见本卷第68—69页。——编者注

② 1855年1月29日《晨报》第19846号。——编者注

③ 1855年1月29日《泰晤士报》第21963号。——编者注

征³²应当在什么季节进行,应当投入多少兵力,而根据英国最大的军事评论家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看法,这种打法几乎肯定会使远征失败。

谈到星期五会议的特点,还可以作一点补充。虽然罗巴克因其多年所患的慢性病在开始发言 10 分钟以后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发言而突兀地提出自己的提案,但他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提出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我们把一支总共有 54 000 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派到东方去,现在只剩下 14 000 人了;所差的这 4 万人到哪里去了呢?英国虔诚派即书册派⁷⁷的伟大的保护人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又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说,这个制度运转不灵。但是几个月以前,当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的时候²⁶,是谁反对对这个制度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呢?是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悉尼·赫伯特不满足于拿“制度”当挡箭牌,他还责备旅团的指挥官毫不中用。熟悉这个制度的人谁不知道,这些指挥官同管理毫不相干,因而同管理不善也毫不相干。现已承认,是管理不善使一支模范的军队成了牺牲品。但是虔诚的赫伯特还不满足于忏悔别人的罪过。据他说,英国士兵不灵活。他们不懂得自救。他们虽然勇敢,但愚蠢。

“他们打起架来是好汉,
动起脑筋来是笨蛋。”^①

他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都是被埋没了的天才。赫伯特的说教使古怪的德拉蒙德激动起来,并促使他提出是否到了应该暂时停止宪法生效并为英国任命一个独裁者的时候的问题,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最后,前辉格党大臣弗农·史密斯用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反

① 这两句话是作者根据歌德《箴言》第 395—399 行改写的。——编者注

映了普遍的混乱状态,他说,他不知道提案真正要求什么,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新内阁是否正在组成,旧内阁是否存在过,因此他不打算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泰晤士报》认为,今晚提案将被通过。大家知道,1810年1月26日,波切斯特勋爵的关于成立瓦尔赫伦岛远征⁶³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曾经在英国议会里遭到反对。1855年1月26日又发生类似的反对提案的情况。1810年1月29日通过了提案,而英国是一个崇尚历史先例的国家。

同意和平谈判这件事本身,就使俄国能够从驻在奥地利边境的监视军中调走至少6万—8万人,然后在2个月或10周内重新补充上同等数量的部队。现在我们知道,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俄国的)作为一个军团而言已不存在,因为第四军10月底到了克里木,第三军在12月底到了那里,而第五军的剩余部分连同骑兵和预备部队也正在向那里推进。这些军队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一带的防务就必须由从西方军团(驻扎在波兰、沃伦和波多利亚)中抽出的部队接替。这种重新部署军队的需要,加上第二军和骑兵预备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向克里木进发这一事实,即使不考虑其他一切外交上的附带目的,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一刻也不迟疑就又同意在所谓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俄国来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军从卡利什到伊兹梅尔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没有增援部队便不能长久地对抗与它相峙的数量日渐增加的奥军。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以下关于用在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庞大的俄国作战部队的人数和布防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极可靠的来源搜集到的,对俄国兵力的估计只会过高,不会过低。这支军队起初有:6个基干军,每军48个营;精锐部队(近卫兵和掷弹兵)2个军,每军36个营;另外有相当多的正规骑兵、非正规骑兵和炮兵。后来俄

国政府召集了预备兵员，编成了精锐部队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以及其余几个军的第五和第六营。此后，它又通过招募新兵的办法，为每团增加了第七和第八营，这样一来，基干军内营的总数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锐部队内营的总数则增加了一倍多。

这些武装力量的人数大致估计如下：**近卫兵和掷弹兵**——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一和第二军**（尚未参加战斗）——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每团的前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500人，共960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700人，共134400人。**芬兰军**——14400人。合计784个营，552000人；**骑兵**（正规的）——8万人，**骑兵**（非正规的）——46000人；**炮兵**——8万人。总计758000人。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96个基干营有伤亡。

除了驻在高加索的第五军第一师以外，还剩下75万人，他们现在的部署情况如下：驻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弗斯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团，由芬兰军以及近卫兵、掷弹兵和第六军的预备部队组成，连同骑兵等等，共约135000人，其中一部分是未经严格训练的新兵和仓促编成的营。驻波兰和驻加利西亚边境自卡利什到卡缅涅茨一线的是近卫兵、掷弹兵、第一军、第六军第二师以及掷弹兵和第一军的部分预备部队，连同骑兵和炮兵共约235000人。这是俄国军队的精华，由哥尔查科夫指挥。在比萨拉比亚以及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有第二军的两个师和该军的部分预备部队，总共约6万人。这些部队本属西方军团。但自多瑙河军团开往克里木后，就被从西方军团调到多瑙河军团的原来驻地。现在，他们同驻多瑙河两公国的奥军对

峙,由帕纽亭将军指挥。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第三军和第四军、第六军的两个师和预备部队以及尚在途中的第二、第五军的各一个师,连同骑兵总共 17 万人,由缅施科夫指挥。其余的预备部队和新编营,尤其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军的这些部队,正由切奥达耶夫将军重新组成一个庞大的预备军团。这个军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约 15 万人。至于这个军团有多少人会开赴波兰或南方,还不清楚。

这样算来,俄国在其帝国西部自芬兰起到克里木止的边境上部署的军队,去年夏天不到 50 万人,而现在已有 60 万人,另外还有 15 万人的预备军团。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的兵力相比,俄国现有的兵力却比过去的弱。去年八九月间,在波兰和波多利亚驻有俄军 27 万人,在普鲁特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一带驻有俄军约 8 万人——共计 35 万人,当时他们可以共同对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现在那里只剩下 295 000 人,而奥地利却有 32 万人直接与他们对峙,而且还可以把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 7 万—8 万人调来支援。因此,俄国目前还不敢采取进攻行动;在一个如波兰这样地形开阔的国家里,两军之间又无大江大河相隔,这意味着俄军必须退到可以扼守的阵地上去。如果奥地利现在开始进攻,那么俄军将被割裂为两部分,一部分被迫退向华沙,另一部分被迫退向基辅,而且这两部分之间还隔着无法通行的、起于布格河止于第聂伯河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为此,目前赢得时间对俄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俄国有它的“外交上的考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 日《新奥得
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阿伯丁内阁的倒台⁸⁰

1855年2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代议制的全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届内阁像英国著名的“群贤”内阁⁸¹那样在下台时蒙受那样大的耻辱。任何人都可能有朝一日成为少数派,但是,被 305 票对 148 票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击败,而且是在大不列颠下院这样的议会里被击败,这种殊荣就只能保留给以可爱的阿伯丁为首的一代天才人物。

无疑,内阁明白,只要议会一开会,自己的寿命就不长了。在克里木干了丑事,全军覆没,参与军事管理的一切机关和人员束手无策,举国愤慨,而《泰晤士报》的抨击对此更是推波助澜,约翰牛显然决心一举查明谁是罪魁祸首,或者至少要拿谁来出出自己的气——所有这一切都向内阁表明,死期已到,它该准备后事了。

很多人立即宣布要提出具有威胁性的质问和提案;特别具有威胁性的是罗巴克先生宣布要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提案⁷²。这个委员会将对作战情况和参与军事管理的各方的活动进行调查。这马上有了结果。政治敏感立刻使约翰·罗素勋爵意识到,不管少数派⁸²是否投票赞成,罗巴克的提案总会被通过,而像他这样一位以

成为少数派的次数多于岁数而自豪的国务活动家，不能容忍现在又被多数票压倒，因此，生来就怯懦和卑鄙的约翰·罗素勋爵（这些品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常常从他那煞有介事的夸夸其谈和维护宪法的装腔作势的假面具下暴露出来）认为，明智是勇敢的最好表现^①，于是没有向同僚打个招呼便从自己的岗位上溜走。虽然罗素是个平常的人，没有他也无所谓，但是看来“群贤”都由于他的突然弃职而不知所措。英国报刊一致谴责这个矮小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这能起什么作用呢？所有报刊和它们的所有谴责都不能消除内阁的混乱现象。正是在这种紊乱的时刻，即纽卡斯尔公爵从陆军部引退，而帕麦斯顿勋爵还没有接管的时候，内阁却遇到了罗巴克先生的可怕的提案。

罗巴克先生是个小律师，假如他在议会生涯里比较一帆风顺的话，他也可以像约翰·罗素勋爵一样成为一个风趣而不得罪人的小辉格党⁷⁰人。但是，这位未开业的前律师，现在的议会饶舌家，尽管用尽了全部计谋，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能捞到什么显著的政治资本。他对任何一届辉格党内阁来说总像是个受委托的秘密差役，却始终没有取得可以保证他得到“官职”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乃是一切不列颠自由党人的最高目的。我们的朋友罗巴克被自己的美好希望所迷惑，他遭到自己党的轻视和反对者的嘲笑，他意识到他的心已经变得冷酷了，而且充满了悲哀，于是他渐渐变成了一只总喜欢在议会里尖吠一通的凶恶、不合群、令人讨厌和惹人生气的劣种小狗。他以这种身份来轮流为所有善于利用他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服务，甚至不希望得到任何方面的感激或尊重。但是，谁也没有像我们的老朋友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5幕第1场。 编者注

帕麦斯顿那样能够高明地利用他，他在上月 26 日又充当了帕麦斯顿的工具。

罗巴克先生的提案本身在英国下院这样的议会里未必能有什么意义。大家知道，下院各个委员会工作得很差劲，拖拖拉拉，慢条斯理；而由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作战情况，即使能够提供一些东西，实际上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的结果要晚许多个月才能揭晓，想补救也来不及。只有在像 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那样的革命专政的议会里，这种委员会才能带来良好结果。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政府官员就是议会本身的代表，因此，在这样的议会里这样的提案就是多余的了。悉尼·赫伯特先生毕竟没有完全错，他曾经指出，这个提案（当然，罗巴克先生完全没有这种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宪法的，他还以他特有的对历史事实的精确知识询问说，下院是不是有意像督政府⁸³（原话如此！）对付杜木里埃将军⁸⁴那样派委员到克里木去。我们在此要指出，在这个宝贵的年表上，派委员到杜木里埃将军那里去的是督政府（成立于 1795 年），而这些委员早在 1793 年就被这位将军逮捕并被引渡给奥地利，——正是这个年表从侧面清楚地反映出，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们的全部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何等混乱。至于罗巴克先生的提案，他的上述形式上的错误就使许多有可能取得官职的候选人不投赞成票，从而为自己参加任何一个可能拼凑起来的内阁留一条后路。然而，反对内阁的多数竟占了如此压倒的优势！

政府各主管部门之间的争吵成了这次辩论的特色。每一个主管部门都企图把过错推在别的主管部门身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声称，一切都要怪运输部门；海军部政务大臣贝尔纳-奥斯本声称，所

有毛病都出在总司令部那种腐败透顶的制度上。海军大臣之一贝克莱海军上将相当明白地向赫伯特先生示意,他应当引咎自责,等等。同时,在上院,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和总司令哈丁子爵之间也进行着这一类的寒暄。由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发言,赫伯特先生的处境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约翰·罗素在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时承认,报刊上关于克里木军队状况的所有报道实质上都是正确的,军队的情况“很糟糕,令人心碎”。因此,悉尼·赫伯特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最多只能用一些极其蹩脚的、缺少根据的理由来辩护。他不得不承认,甚至是比较明确地承认军事管理机关的彻底无能和混乱不堪。赫伯特说,我们比较顺利地把 24 万吨各种储备品和大批军队调到了 3 000 英里以外的巴拉克拉瓦——接着他激动地陈述军队各种服装、帐篷、食物甚至奢侈品的供应情况,供应都很充分。但是,唉!需要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巴拉克拉瓦,而是离海岸 6 英里的内陆地点。把所有的储备品运送到 3 000 英里以外是可能的,而运送到 3 006 英里以外却不可能了!储备品必须再往前运送 6 英里这件事毁了一切!

假如不是莱亚德、斯塔福德和他的同僚格莱斯顿发言,赫伯特哀求宽大的态度也许最终会引起对他的某种怜悯。前两位下院议员刚刚从东方归来,他们所讲述的事情都是他们亲眼目睹。他们不只是重复报纸上已经谈过的东西,还举出了玩忽职守、管理不善和缺乏能力的事例;他们所描述的恐怖情景远远超出了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用帆船把马匹从瓦尔纳运往巴拉克拉瓦,却不备任何饲料。行囊从克里木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回运送了五六次,而饥寒交迫的士兵却因穿不上这些行囊里的衣服而冻僵,湿透。“初愈的病号”被遣回克里木担任战地勤务,但他们还很虚弱,连站

也站不稳；在斯库塔里，像在巴拉克拉瓦和运输船只上一样，伤病员无人照顾，缺这少那，满身污垢，他们的处境惨不忍睹。所有这一切构成的图景使“本报通讯员”的描述或来自东方的私人消息全都黯然失色。

为了消除这些描述所造成的沉重印象，聪明自负的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挺身而出充当挡箭牌；但是，对于悉尼·赫伯特来说，不幸的是格莱斯顿否认了他的同僚们在辩论的第一个晚上所承认的一切。当时赫伯特受到罗巴克直截了当的质问：您从英国派出了54 000名士兵，现在处于战斗状态的只有14 000名，其余4万名哪里去了？赫伯特对罗巴克回答得很干脆，他提醒说，其中一部分早在加利波利和瓦尔纳就死亡了；他从不怀疑关于死亡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的总的统计数字的正确性。然而现在看来，格莱斯顿比军务大臣的消息还要灵通，他竟然说：“到我们所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标明的日期为止”，军队的实际人数不是14 000名，而是28 200名，此外还有担任岸防勤务的3 000—4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当然，格莱斯顿很谨慎，没有说出他所指的“最新统计数字标明的日期”是什么。但是，鉴于在各级机关特别是旅部、师部和总参谋部中盛行着无与伦比的疲沓作风，所编制的伤亡名单总是姗姗来迟，我们有理由推定，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统计数字所注明的日期大概是1854年12月1日，而且还把在这以后的六个星期内由于气候恶劣和过度疲劳而离队的大批士兵也计算在内。看来，格莱斯顿现在还像他曾经指望舆论界对待他的财政报表那样，盲目地相信官方文件。

我不想对这些辩论作更详细的分析。除了许多“二流人物”以外，发言的还有迪斯累里，其次是托利党⁷³的前任内务大臣沃尔波

尔,最后是“慷慨地”为自己受到抨击的同僚们辩护的帕麦斯顿。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帕麦斯顿在没有最后确信辩论会得出怎样的结果以前一句话也不说。在他确信以后,仅仅是在这以后,他说话了。通过下属传到大臣席上的流言,议院的普遍情绪,表明内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失败必将使他的同僚们完蛋,但未必会损害到他本人。虽然帕麦斯顿看来也将同所有其余的人一起下台,但他确信他的地位巩固,确信同僚们的离职会给他带来好处,以致他几乎认为送他们下台是他出于礼貌应尽的义务。这个义务他履行了,因为他恰恰在表决以前作了发言。

帕麦斯顿实际上巧妙地玩弄了他的手段。他由于帕西菲科事件而博得“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⁸⁵以后,非常善于保持自己的这种声誉,以致尽管有许多惊人的揭露,但是每当帕麦斯顿一离开外交部,约翰牛总觉得自己被出卖给了某一个外国。帕麦斯顿被约翰·罗素勋爵非常不礼貌地赶出这个部以后,便用威胁的办法迫使这个小个子不谈他被赶出的原因,从这时起人们对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就产生了新的兴趣,他成了功名心重而又没有才能的同僚们的无辜牺牲品,成了一个被辉格党人出卖的人。在德比内阁⁸⁶倒台后,帕麦斯顿被安置在内务部,在这个职位上他仍然被看做是牺牲品。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大家都憎恨的大人物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给他那个属于他的职务,于是就用一个辜负这种天才的职务来敷衍他。约翰牛就是这样想的,它越来越以自己的帕麦斯顿而自豪,因为它看到,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官职卑微却忙个不停:插手治安法官的案件,干预马车夫,申斥主管下水道的机关,就特许证制度问题作娓娓动听的发言,为烟尘这样重要的问题而搏斗,硬要把警察集中起来,反对在市内埋葬。好一个真正的

英国大臣！对于他说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家长”^①的接连不断的来信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和情报来源，就是新的措施和改革的宝库。自然，感到最满意的还是这位“家长”，英国大多数中等阶级选民也同他一样，对他们来说，帕麦斯顿已成了一尊偶像。“瞧吧，大人物在小职位上可以干些什么！历任内务大臣有谁曾经想到过要消除这些混乱现象！”诚然，马车依然如故，烟尘并未消除，墓地也没有在市内消失，警察也没有被集中，一句话，这些伟大的改革一件都没有实现——但这都是他那些贪婪而愚笨的同僚们的过错！帕麦斯顿的忙碌碌和到处插手的欲望渐渐地被看做是他的旺盛精力和积极性的证明。而这位最反复无常的英国国务活动家从来没有能够使议会里的任何一次商议、任何一个法案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位政客只是为了消遣而忙个不停，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仍然是一纸空文——就是这位帕麦斯顿被推崇为国家在危急关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应该说，帕麦斯顿本人为颂扬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他不满足于做《晨邮报》（这家报纸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于是他雇用了像威科夫那样的花花公子在法国和美国替他捧场；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闻》，把某些电讯和其他有用的提示透露给它；对几乎所有的伦敦报纸的管理部门，他都插上一手。军事部门管理不善导致了危急局面的出现，他想乘机在联合内阁的废墟上扶摇直上，爬到别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争得这一点，他同德莱恩先生订立了什么契约，自然说不清。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伦敦的日报，除了《先驱报》，都异口同声地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应当说，

① 马·塔珀。 — 编者注

他认为自己竭力追求的目标现在已经达到。不幸的是,女王看透了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如有可能,不会对他作出让步。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2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31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内阁危机⁸⁷

伦敦,2月2日。昨天晚上,在帕麦斯顿发表关于内阁辞职的正式声明以后,下院会议又延期了。

在上院,阿伯丁宣读了给“群贤内阁”⁸¹的悼词。他说,他反对罗巴克的提案⁷²,并不是因为他的政府害怕调查,而是因为这个提案违反宪法。然而,阿伯丁没有像自己的朋友悉尼·赫伯特那样,举出历史上的例子来证实这种说法,而赫伯特曾经质问下院,它是不是有意仿效派委员去逮捕杜木里埃的法国督政府⁸³(成立于1795年),而大家知道,杜木里埃在1793年就把这些委员交给了奥地利⁸⁴。这位苏格兰贵族不想显露这样渊博的学识。他满有把握地说,他的内阁只会因任命调查委员会而获益。他更进了一步。他大肆吹捧自己和自己的同僚——首先是陆军大臣,然后是财政大臣,再就是海军大臣,最后是外交大臣,从而预先确定了调查的结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伟大的,每一个人都是贤人。至于英国的军事情况,他承认克里木军队的处境的确是令人头痛的,但是波拿巴曾向欧洲宣布,法国军队共有581 000人,此外他还下令再招募14万人。撒丁交给拉格伦勋爵指挥的有15 000名优秀的士兵。如果维也纳和平谈判失败,他们可以得到拥有50万大军的军事强国的帮助。

无论如何,这位苏格兰贵族没有大经济学家兼历史编纂学家西斯蒙第身上的那种缺点,西斯蒙第自己承认,他用一只眼睛看一切都是漆黑的。阿伯丁用两只眼睛看一切都是玫瑰色的。例如目前,商人、工厂主和工人都自称经受着严重的商业危机,而阿伯丁却发现英国各地是一片繁荣景象。阿伯丁用俏皮话(拜伦勋爵曾用这种俏皮话来赞扬这位苏格兰贵族^①)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德比勋爵:

“尊敬的议员们!国家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用什么方法建立这个政府,这不该由他来说。盛传德比勋爵奉女王陛下之命负责组阁。但是他看到德比勋爵还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以他就想,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传言是不可信的。”^②

为了理解这段话的俏皮之处,有必要引证德比勋爵的回答来对照一下

“阿伯丁伯爵阁下过低估计了他获得消息的来源。不是谣传,而是他自己(德比)在到上院来之前,告诉阿伯丁本人,他已接到女王的委任。由此可见,所谓谣传促使伯爵阁下相信他(德比)有可能谒见过女王陛下,不过是伯爵阁下由于一贯谨小慎微,为了避免夸大事实和不偏不倚地阐明他的诉讼的每个部分而使用的说法。”^③

德比趁这个机会还声明,目前各政党的状况和下院当前的形势,使他无法负责组阁。

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的解释和他对“和睦家庭”内部情景的描

① 见乔·拜伦的讽刺作品《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编者注

② 乔·阿伯丁《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编者注

③ 爱·乔·德比《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编者注

述,不仅转移了上院的听众和高贵的贵族本身对克里木军队的注意力,也转移了他们对内阁危机的注意力。纽卡斯尔公爵说,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的解释使他不得不说明他自己在垮台的内阁中所处的地位。他说,罗素的陈述既不全面又不真实。罗素暗示,似乎在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的时候,他同意把陆军部交给纽卡斯尔公爵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对公爵的“强烈愿望”作出的让步而已。实际上,当内阁决定把两个部分开的时候²⁶,他(纽卡斯尔)就曾声明:“至于他个人,他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负责这两个部中的一个部也行,哪个部都不负责也行。”他不记得罗素曾经表示愿意把陆军部交给帕麦斯顿勋爵,但是清楚地记得,罗素曾经打算自己来主持这个部。他(纽卡斯尔)根本不想在这方面挡着罗素的路。他在接管陆军部时就充分意识到,事情如果顺利,功劳不会记在他的账上,事情如果不顺利,各种各样的责难却会落到他的头上。但是,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不逃避这个既危险又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有些人说这是他“自命不凡”,罗素勋爵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称这是他的“值得称赞的功名心”。罗素勋爵故意不把阿伯丁给高贵的勋爵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告诉下院:

“我把您的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纽卡斯尔公爵和悉尼·赫伯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两人都极力敦促我在他们担负职务的问题上作出将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国家事务的决定。”^①

他(纽卡斯尔)还顺便向阿伯丁伯爵作了口头声明:

“您不要让罗素勋爵有退出内阁的借口。您可不要违背他想使我离开这个

① 亨·纽卡斯尔《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编者注

职位的愿望。请您按国家事务的最高利益所要求的那样来处理我的问题。”^①

纽卡斯尔说,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神秘地提到他曾向阿伯丁书面指出过的错误。他很谨慎,没有宣读有关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没有把第九十七团从雅典调到克里木的问题,但是外交大臣曾经说明,把英国军队从雅典调出来是不可取的和危险的。至于他谈的第二个错误,即拒绝派遣3 000名新兵,那是因为拉格伦勋爵反对继续增补年轻的和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况且当时运输船只根本不够。这两个所谓的错误就是罗素所能想出来的一切,罗素和自己的同僚在海滨疗养地休养,而他(纽卡斯尔)在1854年整整一年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过,罗素在10月8日给他本人的信中谈到这些“错误”时最后是这样说的:“您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我对您获得成功充满信心。”

此外,纽卡斯尔说,阿伯丁向内阁会议提出了罗素关于人事变动的建议。这个建议被一致否决了。12月13日,他(纽卡斯尔)在上院发表详尽的讲话,为自己的管理工作作了辩护;12月16日,罗素对阿伯丁说,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调换人员的打算。罗素从来没有提出过关于改革军事管理机关的措施和建议,只有两次例外。在他提出辞呈和罗巴克提出提案的前三天,举行了内阁会议。罗素提出一项建议,即承认一段时间以来在陆军大臣办公厅召开的各军事部门首长的会议具有正式的和官方的性质。他的建议被通过了。此后不久,罗素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其中除了已经由内阁会议赞同的新措施以外,仅仅包括两点建议:(1)设立一个由陆军大臣为首的

^① 亨·纽卡斯尔《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编者注

并吸收军械局参加的最高委员会,监督军队的一切非军事管理机关;
(2)除现任各军事部门首长外,这个最高委员会还应当吸收两个高级军官加入。罗素在下院说,他有一切根据认定他的“书面建议”将被否决。但这不正确。第一个建议被纽卡斯尔采纳了;第二个建议被否决了,理由之一是,罗素想拉进来的“总军需官”多年来已经成了子虚乌有的人物,英国军队中再没有这种人了。可见,罗素从来没有提出过未被采纳的建议。不过他(纽卡斯尔)在1月23日就对阿伯丁伯爵说,不管议会的决议如何,是支持内阁还是反对内阁,他都要退出内阁。他只是不希望给别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在议会作出决断以前就逃跑了。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生,用老科贝特的话来说,就是一连串“为生存编造出来的骗人的借口”的组合,现在,正像纽卡斯尔的发言所表明的,他也是毁在骗人的借口上面。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2日

载于1855年2月5日《新奥得
报》第5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被推翻的内阁⁸⁸

伦敦,2月3日。1852年12月16日,迪斯累里预算的第一项,即扩大直接税首先是扩大房产税,被19票的多数否决了。托利党⁷³内阁辞职。经过10天的阴谋斗争,联合内阁组成了。组成这个内阁的是:辉格党⁷⁰的一部分寡头政治家(格雷氏族这次被排挤掉了),皮尔派⁷¹的官僚集团,混杂在所谓梅费尔激进派⁸⁹里的人,如莫尔斯沃思、奥斯本,以及萨德勒、基奥、蒙塞尔等爱尔兰旅⁹⁰的捐客——他们在12月16日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得到了次要的内阁职位。内阁自称为“群贤内阁”⁸¹。它也真的几乎收罗了30多年在政府中互相轮换的所有贤人。《泰晤士报》在宣布“群贤内阁”上台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千年王国⁹¹的开端。”实际上,对执政的阶级来说,自从他们发现他们的党派组织已经瓦解,他们的内部矛盾仅仅是产生于个人的怪癖和虚荣心,他们彼此间的摩擦再也不能引起全国的注意的时候起,“政治千年王国”就已来临了。联合内阁不代表某个特殊的派别。它代表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英国执政的阶级的“群贤”。因此,回顾一下联合内阁的功绩是很重要的。

德比内阁⁸⁶倒台以后,议会放了圣诞节假。后来议会又放了复活节假。在这以后,会议才真正开幕,但已是1853年。这次会议几

乎完全是讨论格莱斯顿的预算、查理·伍德爵士关于印度的法案和杨格关于调整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的法案⁹²。

格莱斯顿在把自己的预算提交下院审议之前，宣布了减少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重大举措。在短期国债方面的举措是，他把国库券的日息从 1.5 便士降低到 1 便士，并且是在市场利率提高的时候降低的。结果，格莱斯顿不得不先兑付 300 万国库券，然后再按更高的利率发放出去。他在数额巨大的长期国债方面的试验更加可观。减少国债是公开声称的目的。格莱斯顿操作得那样巧妙，以致在财政年度终结时他不得不按票面价值收回 800 万英镑南海公司⁹³证券，这些证券按当时交易所的牌价只值票面价值的 85%。同时，格莱斯顿把他新发明的有价证券——国库债券抛到交易所去。他争取到议会准许发行为数 3 000 万英镑的这种证券。但是他费尽气力才推销出去 40 万英镑。一句话，格莱斯顿减少国债的举措的结果是：长期国债的本金增加了，短期国债的利率提高了。

联合内阁引以自豪的格莱斯顿预算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像降低茶叶税、降低消费税（固然，格莱斯顿谈的是降低肥皂消费税，而迪斯累里谈的则是降低麦芽消费税）和提高直接税这些项目，是格莱斯顿从他的前任的预算中照抄下来的。其他一些最重要的规定，例如对地产征收遗产税和废除报纸广告税等等，都是格莱斯顿在下院两次否决他的反提案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他的方案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例如重新调整特许证制度，他只得完全收回了。他向下院提出的那种作为无所不包的系统的东西，结果表明不过是五花八门的互相矛盾的项目的大杂烩。预算中只有一项是他自己提出的，这一项由于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使所有报纸中唯一出附刊的《泰晤士报》每年可以免去 3 万—4 万英镑的税金。但是格莱斯顿更

积极地坚持保留报纸正刊的印花税。这样一来，他博得了《泰晤士报》的特别好感，这家报纸也就希望在新的内阁中也能看到他。这就是联合内阁在 1853 年整个会议期间赖以活命的格莱斯顿的杰作。

东印度公司⁹⁴的特许状于 1854 年 4 月 30 日期满。因此，应当重新调整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联合内阁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再延长 20 年，结果没有成功。印度没有再“租给”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特许状只能存在到下达“废止通知”时为止，而议会随时都可以下达这个通知。印度法案中的这项唯一重要的条款，在违反内阁愿望的情况下被通过了。除了印度的司法方面的某些小改革和准许一切有才能的人担任文职和技术性军事职务之外，印度的改革法案的真正核心可以归纳为以下一点：在伦敦执行管辖权的印度事务大臣（督察委员会主席^①）的薪俸从每年 1 200 英镑增加到 5 000 英镑。东印度公司的 18 个董事中有 6 个今后由内阁选出，只有 12 个由公司的股东会选出。这些董事的薪俸由 300 英镑增加到 500 英镑，而两位董事长的薪俸则由 400 英镑增加到 1 200 英镑。此外，孟加拉省督的职位（以及他的参事会）以后同印度总督的职位分开；同时，在印度河地区设置一个新的省督以及参事会。群贤内阁在印度方面的改革仅仅是提高薪俸和设立新的领干薪的闲差。

联合内阁的关于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的几个法案，是从自己的前任托利党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联合内阁不应该落后于他们。它提出了这些法案，并在议会会议经过长达十个月的辩论之后，闭幕之前不久在下院通过了这些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说，让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阿伯丁却在上院同意否决这些法案，借口

① 查·伍德。——编者注

是这些法案要在下次会议上加以仔细审查并再次提出讨论。

关于议会改革⁹⁵、国民教育、法律和司法改革等等的内阁法案，根据内阁的要求，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群贤”的伟大创举——关于整顿伦敦马车夫的法案居然成了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刚出议会的大门就送回来修改了。它是行不通的。

议会会议终于在8月20日结束了。帕麦斯顿在遣散议会时说的几句话概括了这个会期内内阁的对外政策：议会可以安心地散会了。“他完全相信俄国皇帝^①的荣誉和品质”，皇帝将自愿地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

在1853年会期内，帕麦斯顿公开干预对外政策的表现，就是发表这个声明；其次就是在下院闭会前几天在议会发表一次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把俄国人对多瑙河苏利纳河口的封锁说成是拙劣的玩笑；最后，就是在1853年4月15日的会议上——在谈到有关所谓科苏特火药阴谋⁹⁶的问题时——被迫承认，他受大陆各宫廷的委托，利用英国警察来监视政治流亡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3日

载于1855年2月7日《新奥得
报》第6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尼古拉一世。 — 编者注

卡·马克思

政党和集团⁹⁷

伦敦,2月5日。目前内阁危机的持续时间,多少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在英国,这样的危机平均要持续9—10天。凯特勒在他的名著《论人的能力》中证明,在文明的国家里,每年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犯罪行为等等的数字几乎可以数学般准确地预先计算出来,这使人大为惊奇。^①相反,19世纪各个不同时期英国内阁危机有一个大致的持续时间,却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大家知道,这里总是要经过一定的组阁过程,总是要谈判如何瓜分一定数量的职位,总是要有一定数量的钩心斗角使得彼此筋疲力尽。只有这次由旧政党的瓦解所决定的组阁的性质才是不寻常的。这种瓦解的事实曾使得已被推翻的联合内阁的成立成为可能和必然。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执政的阶层(这个阶层在英国同统治阶级绝不是一回事)已经丧失执政的天职之前,这个阶层不得不忽而进行这种联合,忽而进行那种联合。大家知道,德比派曾极其慷慨激昂地反对联合。在德比勋爵奉女王之命组织新内阁之后,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企图搞联合,不仅同帕麦斯顿

^① 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16—624页。——编者注

(迪斯累里在讨论罗巴克提案⁷²时曾经明确地向帕麦斯顿说过,要求对谴责案进行表决,既是反对纽卡斯尔公爵和阿伯丁,也是反对帕麦斯顿本人)联合,而且同格莱斯顿和悉尼·赫伯特,也就是,同被托利党⁷³人当做瓦解自己政党的直接祸首而深恶痛绝地加以迫害的皮尔派⁷¹联合。当罗素受命组阁的时候,他也想同皮尔派进行联合,但他曾把这些皮尔派参加上届内阁当成他辞职的借口,而他们则在庄严的议会会议上揭穿了他的谎话。最后,如果帕麦斯顿能组成内阁,那么这个内阁只能是旧联合内阁的改动不大的再版。很可能是辉格党⁷⁰人的格雷帮派来代替辉格党人的罗素帮派,等等。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宗派罢了;但是,使这些宗派丧失建立政党和各自独立的能力的那些原因,也使得这些宗派失去了联合的能力。因此,在英国议会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像联合内阁时期那样出现这么多无足轻重的和偶然拼凑的集团。只有德比派和罗素派这两个集团人多势众。追随他们的是一个有许多分支的集团,这个集团由实力雄厚的古老家族及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组成。但人数众多恰恰又是德比派和罗素派的弱点。要组成独立的议会多数,他们的人数太少,但同时他们的人又太多,其中有太多的追求名位的人,必须加以照顾,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把一些重要职位分配出去以换取外界的充分支持。因此,皮尔派、格雷派、帕麦斯顿派等等这些人数少的集团就比较适合于组织联合内阁。使得他们能够组织内阁的,是这些集团中的每一集团都弱小,这一点又使得他们的议会多数带有偶然性,只要德比派同罗素派或曼彻斯特学派³⁷等等组合起来,这个多数随时可能被打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来成立的几届内阁的人员组成也是有趣的。在所有新内阁中,都有旧内阁的成员。最新的这一届内阁的首

脑是前一届内阁中最重要的成员^①。难道下院在接受罗巴克反对旧联合内阁全体成员的提案时不是表明——像帕麦斯顿本人在答复迪斯累里时所说的那样——它不仅赞成对谴责案进行表决，而且赞成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吗？委员会还没有任命，调查还未开始，而被告不是又执掌权柄了吗？如果议会有权推翻内阁，那么内阁也有权解散议会。而解散的前景会怎样地影响目前的议会，从约翰·特罗洛普男爵于1853年3月1日在下院所作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他说：

“现在下院已经有14个由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开始对最近议会选举期间发生的贿赂事件进行调查。如果这样搞下去，那么整个议会很快就会分解成各种调查贿选事件的委员会。不仅如此，被指控的议员会非常多，以致剩下的没有嫌疑的议员少得不可能对他们作出裁决，哪怕是对他们进行调查也难。”^②

出于爱国主义，要是在议会第三次会议开始时就失掉用高价买来的职位，那是很难受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2月8日《新奥得
报》第6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21364号。马克思的评论参看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65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上一届英国政府⁸⁸

在谈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我们认为这肯定是一届寿命短暂无大作为的政府——上台执政⁹⁸的同时，似乎也不妨来看看上一届政府的历史。提起上一届政府，很难说将来在写它的历史时，最突出的一笔究竟是写它上台时高调唱得多么响亮还是写它参与过的事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写它罕见的无能还是写它倒台的耻辱。

人们都记得，阿伯丁勋爵及其联合内阁是靠 1852 年 12 月 16 日的投票表决推翻德比政府⁸⁶而上台执政的。迪斯累里在他的预算案提付表决时以 19 票之差落到了少数地位，理由是他的扩大房产税范围和直接税总征收面的主张同辉格党⁷⁰和皮尔派⁷¹的无懈可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一致。实际上决定表决结果的是爱尔兰旅⁹⁰，而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出发点带有的理论性质要少得多；甚至所谓自由党人和自由保守党人也无法言行一致，他们在自己的预算案里也重复了迪斯累里的许多主张和他的大部分论据。不管怎样，托利党人是被赶走了；经过了一些斗争和毫无结果的尝试之后，组成了这个联合内阁。由于这个内阁的组成，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英国现在已经到达“政治千年王国⁹¹的开端”。但这个千年王国精确算来只存在了两年零一个月，就在英国人民的普遍激愤中一败涂地了。

正是那个把“群贤”之治⁸¹捧为千年王国并为之鸣锣开道的《泰晤士报》，在促使这届内阁的倒台方面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报纸都大。

群贤于 1853 年 2 月 10 日来到议会。他们又原封不动地重新搬出了约翰·罗素勋爵在 1850 年就已经提出过一次并很快导致内阁倒台的那个辉格党政纲。至于议会改革⁹⁵这个主要问题，那是在“下一期会议”以前不能加以考虑的事情。国人暂时还只能满足于一些次要的但是数量比较多和比较实际的行政改革，如司法改革，铁路管理和教育的改革。约翰·罗素勋爵从外交大臣职位上退下来并由克拉伦登勋爵接替，这是首例最能代表这个群贤政府的改革。它进行的所有改革结果都是为它的忠实支持者设置新的官职、新的闲职，规定新的薪俸。罗素当了一段时间的内阁成员，除了履行下院领袖的职责以外，没有任何职责，也没有薪俸；但是很快他就去谋求这后一种奇货，终于爬上枢密院院长的宝座，拿到丰厚的年薪。

2 月 24 日，约翰勋爵向议会提出了他的取消对犹太人权利限制的法案⁹⁹，结果不了了之，因为上院把这个法案束之高阁了。继此之后，4 月 4 日他又提出了教育改革法案。这两个法案都是不痛不痒无伤要害，一个懒汉内阁提出这样的法案也是意料之中的。与此同时，任内务大臣的帕麦斯顿发现了一个新的火药阴谋，这就是科苏特—黑尔火箭大案⁹⁶。人们还会记得，帕麦斯顿下令搜查了黑尔先生的火箭工厂，查获了一批火箭和爆炸物；此事被大肆张扬，4 月 15 日在议会讨论这个案件时，帕麦斯顿又使用了神秘的语言以更加夸大其严重性。但有一点帕麦斯顿却没使用神秘语言。他宣布自己是大陆警方对付流亡者的总情报员，毫不隐讳，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 1844 年在拆看马志尼书信⁴⁶一事上的表现完全一样。可是，这位高贵的情报员最后也只好实际上把此事丢开，因为黑尔先生只能被

控以在靠近伦敦郊区法律所不允许的距离之内制造爆炸物的罪名。炸毁整个欧洲的大阴谋变成了一件仅能处以罚款的违反治安条例的小事！

现在又该罗素出场了。5月31日他在下院发言时大大冒犯了天主教徒¹⁰⁰——是这些人给他弄到了职位——以致政府的爱尔兰籍成员立即提出辞职。这可是那个“巩固的政府”所禁受不起的。爱尔兰旅的支持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阿伯丁在给一位爱尔兰籍政府成员的信中只好表示他不接受他的同僚的那种说法，而罗素也只好在议会中收回自己的话。

这一期会议的主要大事就是东印度法案。内阁在这个法案中提出把东印度公司⁹⁴特许状再延长20年，而对印度的治理却不作任何重大改进。连这样的议会也认为这个建议太糟糕了，只得放弃。议会将有权废除特许状，只要在一年之前发出通知即可。前罗素内阁愚蠢的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在督察委员会即印度事务委员会里显示了他的才能。所有提出的改革只不过是一些司法制度上的很难说会有什么效果的小变动，还有就是，文职人员的聘用和技术性的军职都向社会开放，实行公开竞争。但是这些改革仅仅是借口而已；法案的实质则是：督察委员会主席查理·伍德爵士的薪俸从1200英镑增加到5000英镑；由公司选举的24个董事，只剩下了18个，其中6个由政府任命；政府方面增加的这项任命权可不能小看，因为董事们的薪俸从300英镑增加到了500英镑，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每人要拿到1200英镑。这样浪费国家钱财还嫌不够。印度总督过去也是孟加拉的省督，现在在总督下面将另设一名该管区的省督。同时，还将在印度河上成立一个新的管区，设置一名新的省督。这两名省督每人当然必须要有自己的参事会，而这种参事会里的职

位都是薪俸很高排场很大的舒适闲职。印度终于按照赤裸裸的辉格党原则如此治理,该有多么幸福啊!

随后讨论了预算。这一绝妙的财政杰作连同格莱斯顿先生消除国债的计划一起在《论坛报》上已有详尽介绍^①,无须一一列举它所包含的各项内容。这些内容之中有许多是照搬了迪斯累里那个预算,而那个预算曾使格莱斯顿义愤填膺,可是降低茶叶税和扩大直接税是两个预算里都有的。预算中有些非常重要的措施都是这位大金融家在他的反对意见被议会一再否决以后被迫接受的,例如取消广告税¹⁰¹和扩大地产继承税就是如此。特许证制度改革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几次重新拟定,结果还是只好放弃。这个预算在提出时声称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在辩论过程中却变成了一堆混乱的大杂烩,里面包含的都是些互不相关的小事,这些东西恐怕连讨论它们所花费时间精力的百分之一都不值。

至于减少国债,格莱斯顿失败得更彻底。这个提出时被说得比预算还要冠冕堂皇的计划得到的结果是:发行利率二厘五的国库债券以代替利率一厘的国库券,这就使国库损失了总额的1.5%;必须不仅兑付800万南海公司⁹³股金,而且还要兑付全部的国库券,这给国库造成极大的麻烦;他的国库债券没有人要,彻底破产。经过这一番绝妙的安排,格莱斯顿先生高兴地发现,1854年4月1日的国库

① 马克思《内阁的成就》、《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3—61、69—76、77—86、100—106和125—136页。——编者注

结存从一年以前的 780 万英镑降低到了 280 万英镑。这样,恰恰在一场战争的前夕,国库的现款减少了 500 万。所有这一切是在下述情况下发生的:政府从汉·西摩尔爵士发来的密报¹⁰²中,定然早在一年以前就知道同俄国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托利党人纳皮尔在德比勋爵内阁时期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新法案⁹²在下院通过了,内阁方面至少有过某种同意的表示;上院否决了这个法案,而阿伯丁在 8 月 9 日却声称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流放法案¹⁰³、航海法案¹⁰⁴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成为法律的法案,都是从德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国民教育改革法案以及几乎所有有关司法改革的法案,都只能将来再说了。英国辉格党人好像觉得,如果他们的哪个议案逃脱了这种命运就是一件不幸之事。唯一被通过的,并且可以被认为是这届内阁合法财产的法案,就是马车大法令,而这个法令在通过以后第二天就不得不重新修改,因为马车夫群起反抗。群贤甚至连一套管理马车的条例都不能顺利颁行。

1853 年 8 月 20 日帕麦斯顿宣布议会闭会,并对议会表示,相信人民对于东方的麻烦会保持镇静;俄国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保证能够实现,因为“他相信俄国皇帝^①的荣誉和品质会促使皇帝从两公国撤出其军队”! 11 月 30 日,土耳其海军在锡诺普¹⁰⁵被俄国人击溃。12 月 12 日,四强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出一份照会¹⁰⁶,照会中要求土耳其政府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比先前维也纳会议的照会⁴¹所要求的让步还要多得多。14 日英国政府打电报到维也纳,说它并不认为锡诺普事件是继续谈判的障碍。帕麦斯顿对这一点是明确表示同意的,但第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二天他却提出辞职,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对罗素的议会改革法案持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是为了要舆论界相信他是由于外交政策和战争问题上的政策而辞职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了内阁,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在议会里作解释的不愉快。

1854年,好戏是从一位财政副大臣萨德勒先生辞职开始的。萨德勒先生还是爱尔兰旅在政府里的掮客。爱尔兰一家法院揭露出的丑事使政府失去了他这样一位贤人。后来新的丑事又出来了。格莱斯顿先生,德高望重的格莱斯顿,企图为他的一个名叫劳利的亲戚、他的私人秘书——人们只知道他是赛马场的赌徒和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谋求澳大利亚总督的职位,然而此事不凑巧过早地暴露了出来。同样的情况,同样是这位格莱斯顿,还尴尬地与下面的丑事有牵连:一个名叫奥弗莱厄蒂的人携带大笔公款潜逃,此人是他的下属,其职务是他亲自安排的。还有一个名叫海沃德的人写了一本篇幅很长的抨击迪斯累里的小册子,毫无文学和科学价值,格莱斯顿奖赏给他一个济贫法委员会里的职位。

2月初议会开会。2月6日帕麦斯顿声明,他要提出一个组织爱尔兰和苏格兰民军的法案,但是当3月27日真的宣战时,他却认为他有责任在6月底以前不提出此法案。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法案,结果在10个星期之后就“含着眼泪”撤回了,也是因为业已宣战之故。3月间,格莱斯顿提出了他的预算,要求的仅仅是“把正要离开英国海岸的25 000名士兵弄回来所必需的一笔钱”。多亏了他的同僚们,他现在免去了这个麻烦。就在那个时候,沙皇公开了秘密通信¹⁰²,使英法两国内阁不得不宣战。从1853年1月11日一封给罗素的急电开始的这些秘密通信证明,英国的大臣们当时是完全了解俄国的侵略意图的。他们所说的什么尼古拉的荣誉和品质以及

俄国爱好和平的温和态度,现在看来全都是纯粹为蒙哄约翰牛而制造出来的无耻谎言。

4月7日,格雷勋爵发言猛烈抨击当时陆军部的组织机构,因为他一心想当陆军大臣,以便破坏军队的纪律,就像他在以前管理殖民地时几乎把每一个英国殖民地都弄得不再听话一样。他要求把陆军部的所有部门统一在陆军大臣一人的领导之下。这篇发言给内阁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得以在6月份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从而设置一个新的陆军大臣职位。²⁶结果,一切仍像过去一样糟,只是新设了一个职位,多付了一份薪俸。议会的整个这一期会议可以总结如下: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修改定居法的法案¹⁰⁷、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修改议会誓词的法案⁹⁹——另一种形式的犹太人法案——被否决了;另外三个法案即防止贿选法案、行政部门改组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撤回了;只有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但已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里没有必要来谈战争进行的情况和联合内阁在外交上的努力。对这些大家都记忆犹新。议会去年8月12日休会,12月又开会,匆忙通过两个十万火急的议案:外籍军团法案⁶和准许民兵志愿到国外服役的法案。这两个法案直到今天也还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却传来了英国军队在克里木处于灾难境地的消息。这引起了公愤。事实昭然若揭,不容否认,大臣们不得不考虑引退了。1月,议会开会,罗巴克声明他将提出他的提案,约翰·罗素勋爵马上就不见了,只经过了几天的辩论,群贤就遭到了议会史上空前的失败而被推翻。

大不列颠可引以自豪的烂污政府有过不少了,但是,像群贤内阁这样又烂又穷又贪同时还这样高傲的内阁却从未出现过。它以无边

无际的吹牛开始,过着充满无谓的诡辩和失败的日子,最后在人世间最大的羞辱中告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5—8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2月23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两种危机⁸⁸

伦敦,2月6日。舆论界目前正专心致志地谈论着两个危机:克里木军队危机和内阁危机。前一个是民众谈论的,后一个则是俱乐部和沙龙谈论的。据最近来自克里木的笔调非常低沉的报道,英国军队的人数已经从14 000人减少到12 000人,撤出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同时下院正在讨论沙龙阴谋。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先生占用了会议的全部时间,他们再一次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赞成和反对伟大的罗素退出再也不存在的内阁的意见。哪一方也没有举出新的事实,只是对旧的事实进行辩解。约翰勋爵是他自己的辩护人,格莱斯顿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辩护人。关于纽卡斯尔是否适合担任陆军大臣职务的问题的深入探讨,由于不再存在需要加以管理的军队,而显得特别可笑。格莱斯顿在结束他的咬文嚼字的发言时说,“他希望(罗素和纽卡斯尔之间的)一切误会一笔勾销”。这时甚至连这个下院也以人所共知的传统的嘟哝声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因而,不是下院的不信任投票,更不是英国军队的覆没,而只是一个年老的勋爵和一个年轻的公爵之间的“误会”才是内阁危机的根源。克里木不过是沙龙阴谋的借口。内阁和下院之间的误会甚至不

值一提。即使对这个下院来说,这已经太过分了。罗素垮台了,格莱斯顿垮台了,整个会议垮台了。

两院都得到通知,帕麦斯顿勋爵已受命组阁。但是他遇到了没有预料到的障碍。格雷勋爵拒绝担任领导军事部门的职务,他一开始就不同意战争,现在也不同意战争。这对军队倒是件幸事,否则他一定会像过去破坏殖民地的纪律一样破坏军队的纪律。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格雷厄姆也显得很勉强。他们要求让所有的皮尔派⁷¹复职。这些政治家意识到,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在下院中只能指挥大约 32 票的非常小的集团。只有把自己的“伟大的”贤人团结起来,这个小集团才有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如果皮尔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加入内阁,而另一部分却留在内阁外面,这就等于这个坚实的政治家俱乐部的消失。这时帕麦斯顿采取了极端手段,企图像迫使女王服从自己一样,迫使议会服从自己,因为在议会里,他没有自己的政党。他的内阁还没有组成,他就在《晨邮报》上威胁说,他要从诉诸立法会议转向诉诸民众。他威胁说,如果下院胆敢“不像威斯敏斯特宫以外的民众那样尊敬他”,他就要解散下院。这个“民众”只不过是一半属于他或全部属于他的报纸而已。在最近发出民众呼声的地方,例如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从那里给议会送来了要求控告内阁的请愿书,帕麦斯顿被斥为倒台的联合内阁的幕后领导人。

为了给“群贤内阁”⁸¹发一份完整的悼词,还要补充几点。1853 年 11 月 30 日发生了锡诺普事件¹⁰⁵;12 月 3 日,这个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尽人皆知了;12 月 12 日,代表们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要求对俄国作出比臭名远扬的维也纳照会⁴¹更大的让步;12 月 14 日英国内阁打电报到维也纳,说锡诺普事件不应该使维也纳的媾

和会议中断。帕麦斯顿勋爵出席了那次通过这个决定的内阁会议。他同意这个决定,但是第二天就借口罗素起草的议会改革法案⁹⁵同他的保守见解相抵触而退出了内阁。帕麦斯顿的真正目的是想在公众面前洗刷掉在锡诺普事件上的罪责。这个目的一达到,他马上就回到了内阁。

1854年2月初,议会恢复工作。关于东方纠纷的外交文件据说都提交给了议会。缺少最重要的文件。议会是通过彼得堡从尼古拉皇帝那里得到这些文件的,而不是从英国的大臣们那里得到的。在彼得堡公布的“机密通信”¹⁰²十分清楚地向吃惊的议会表明,在过去的1853年整个议会期间以及在1854年,内阁大臣们蓄意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欺骗议会。这些公布出去的通信迫使内阁于3月27日宣战。帕麦斯顿曾于2月6日声称,他要提出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征集民军的法案。但是,刚一宣战,他就把自己的法案搁置起来,并且一直到6月底也没有提出来。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法案,他把法案的二读延迟到4月底,但是在3月,他就装腔作势地抽搭着把法案收回去了,他的同僚们为他所作的牺牲给他一个奖赏:让他这位过去一直是无职无薪的所谓特别大臣得到内阁中一个拿干薪的闲差,即枢密院院长。3月6日,大金融家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他只满足于把所得税提高一倍,期限为6个月。他所要求的仅仅是“把正要离开英国海岸的25 000名士兵弄回来所必需的一笔钱”。

现在,他的同僚纽卡斯尔使他用不着操这份心了。5月8日格莱斯顿已经不得不提出第二个预算草案。4月11日他表示反对发行任何公债,而4月21日他请求议会同意发行600万英镑的公债来抵偿他用在转换国债的不成功的试验上的费用。4月7日,格雷勋

爵作了关于英国军事管理方面存在缺点的发言。6月2日,内阁以改革为理由——正像利用印度改革和涉及霍乱的改革一样——设立一个新的职位。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了。²⁶其他一切照旧。在这次会议期间,内阁在立法方面的成就可归纳为: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三个法案即修改定居法的法案、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修改议会誓词的法案⁹⁹被否决。三个法案即防止贿选法案、对行政部门进行全面改组的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但已修改得面目全非。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壮举,人们还记忆犹新。“群贤内阁”就是如此。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6日

载于1855年2月9日《新奥得
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斗争¹⁰⁸

阿利马河会战⁹和联军向巴拉克拉瓦的进军¹⁰刚一结束,我们就曾说过,克里木战局的最终结果,必然取决于交战双方谁能最先调来足以使自己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超过对方的生力军。^①从那时起,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许多幻想都破灭了。但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与同盟国双方展开了一种调兵增援的竞赛,而且我们不能不承认,俄国人在这一竞赛中领先了。尽管在机械技术和运输工具方面有那么多值得夸耀的进步,但是一支野蛮的俄军在陆上行走 300—500 英里,仍然比一支高度文明的法英联军在海上航行 2 000 英里要容易得多,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军队硬是不注意利用高度文明所给予他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野蛮的俄军则能够承受对联军二比一的兵员损失而无碍于自己的最终优势。

现在,联军之一——英军,连到俄军面前去送死的希望都不抱了,他们认认真真地干起自我消灭的事情来,而且干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起劲,那么成功,致使过去任何方面的成就都为之逊色。如

① 恩格斯《阿利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43—649 页。 编者注

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同盟国还能指望什么呢?然而事情确是如此。据我们现在所知,英国军队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54 000 人中有作战能力的只剩下数千,而这数千人之所以被说成“能够服役”,只是因为医院已经没有地方让他们去死了。在法军中有作战能力的可能还剩 5 万人左右,而原来的人数两倍于此。不管怎样,从比例上说,他们总算保存了至少五倍于英军的兵员可投入战斗。可是,要在整个冬季把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守住,要从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要防守堑壕,而春天还要用可能剩下的兵力转入进攻,这 5 万—6 万人算得了什么呢?

眼下英国人已经暂停派遣增援部队。事实上,拉格伦在对自己的军队失去信心后,看来也不想再要增援了,因为就连剩下的军队,他都不知道拿什么给他们吃,拿什么给他们住,派他们干些什么。法国人可能正在组建若干个新的师,准备在 3 月间登船起程,但他们要为大陆上可能爆发的春季大战进行准备¹⁰⁹,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十有八九他们派去的增援部队将要么是太弱,要么是太迟。为了补救当前这种形势,同盟国采取了两项措施,而这两项措施都说明同盟国完全无力防止那种看来正在缓慢地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向它们在克里木的军队逼近的厄运。首先,为了纠正因克里木远征迟了四个月而铸成的大错,它们又犯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错误:在它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克里木后过了四个月,正值严冬季节,把土耳其残存的唯一像样子的部队派到那里去。这支军队由于土耳其政府的玩忽职守和腐败无能,已经在舒姆拉陷于崩溃瓦解的状态,一旦到了克里木,将会因寒冷和饥饿而消失,消失之快甚至会使英国陆军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显得逊色。如果俄军聪明一些,对土军暂时听之任之,不去进攻他们,情况就会是这样。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俄军发动攻击,土军

便会立即被消灭,当然这会使俄军付出较高的代价,而且除振奋一下士气之外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其次,同盟国雇用了——只能说雇用了——15 000—20 000 名皮埃蒙特人¹¹⁰,以补充缺额的英军,他们的给养由英国军需部供应。在1848年和1849年,皮埃蒙特人曾表明自己是勇敢的和优秀的士兵。他们大都是山民,他们的步兵就其身体条件来说甚至比法国人更适于在复杂地形上进行散兵作战和白刃战;波河平原提供的骑兵,则身材高大、体格匀称,就像英国精锐的近卫军骑兵团一样。而且他们在革命时期的严酷战争中都不是毫无收获地白白过来的。这两个皮埃蒙特师,无疑将是这场战争中好样的“外籍军团”。但是他们却由一个英国老顽固^①来指挥。此人根本不懂得机动灵活,他只要求他的士兵具备对英国军人说来既是荣誉同时又是唯一必备的军事素质的那种坚韧顽强精神。在这样一个人指挥下,这些步伐轻快、灵活敏捷、个子不高的小伙子能干什么呢?他们将被配置在不适于他们的作战方式的阵地上,不能发挥他们之所长,却被要求干有理智的人决不会派他们去干的事。像在阿利马河那样,把一支英国军队愚蠢地、毫无道理地径直领进屠场的做法,也许就是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任务的最好捷径了。老公爵^②做事通常就是这样轻率。德意志军队也许可能听从指挥去做这样的事,虽然具有高度军事素养的德意志军官们终究不会容忍如此无方的指挥。但是,要对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军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是行不通的。这些军队主要适于执行轻步兵任务、长于机动灵活的行动、善于利用地形,他们的战斗力

① 菲·詹·拉格伦。——编者注

② 阿·韦·威灵顿。——编者注

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每一单个的士兵都手疾眼快,行动敏捷。那样一种笨拙的作战方法对于这些军队是绝对不适用的。然而,可怜的皮埃蒙特军或许能免于按英国方式作战的折磨。皮埃蒙特军的给养是由英国军需部供应的,而这个名声很坏的机关只能供养自己不能供养别人。因而,皮埃蒙特军将会与新补充的英国军队共命运。他们会像这些英国军队一样,每周死亡100人,而送进医院的还要比此数多两倍。如果拉格伦勋爵以为皮埃蒙特军会像英国军队一样默不作声地容忍他和他的军需官们的无用,那他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英国人和俄国人,而且我们要指出,这对他们的民族性来说不是光彩的事。

这个像遍地污泥的塞瓦斯托波尔台地一样凄凉阴惨的战局的发展进程可以预计如下:一旦俄军的兵力完全集中起来,天气又允许,俄军大概会首先攻击奥美尔帕沙¹¹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预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很清楚,给土军指定的可不是什么有利的阵地。不管怎样,这表明,把土军调到北区完全是有意识的。联军自己的将领们无意中承认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联军已陷入绝境。土军将被击溃可以说是已成定局。那么联军和皮埃蒙特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关于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话现在收起来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题目发表了爱·纳皮尔上校2月6日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联军攻打塞瓦斯托波尔的南区,那么他们突入城内的可能性极大,但他们将被北区的堡垒和炮台的强大火力彻底消灭,同时也将遭到俄国野战部队的围困。他说,应当首先打败这支部队,然后从北、南两面把该城包围起来。他举例子说,威灵顿公爵曾两次撤除对巴达霍斯的包围,去迎击前来解围的军队¹¹¹。纳皮尔上校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有名的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¹⁰时,《论坛

报》也曾发表过几乎相同的看法。^①至于说联军能够突入塞瓦斯托波尔,他显然是忽略了俄国防御工事的特点,而正是由于这种特点,要想一举攻下该城是不可能的。那里最外面有外围工事,往里有主墙,主墙后面有由城市建筑物改建成的多面堡;街道上筑有街垒,各个街区的房屋都凿有射孔,最后,岸防炮台的后墙上也凿有射孔,这一个接一个的炮台每一个都需要进行单独的攻击,可能还需要进行单独的包围,甚至还需要进行地道爆破。而除这一切以外,俄军最近几次胜利的出击还充分证明,围攻部队已经向该城推进到一个交战双方势均力敌的距离,围攻部队除了在炮火方面,无任何其他优势可言。只要还不能做到让俄军无法出击,任何强攻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围攻者如果不能把被围者困在要塞围墙以内,那就更不能指望打一次白刃战就能攻克要塞。

这样一来,围攻部队就得继续在他们的营地挨下去。这些部队将由于自己兵力的薄弱和俄国野战部队的威胁而被困在营地,继续减员,同时俄军却不断调来生力军。如果英国新政府拿不出一出奇制胜的办法来,总有一天,英军、法军、皮埃蒙特军和土军都将统统被从克里木土地上一扫而光。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2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2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56—661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军队¹⁰⁸

伦敦,2月9日。帕麦斯顿和悉尼·赫伯特由于接受了新的内阁职务,必须履行重新选入议会的手续。由于这个原因,两院在昨天都把会议延期一周。德比勋爵和兰斯唐侯爵在上院报告内阁危机的幕后经过时,只是重复了以前多次说过的话。重要的仅仅是德比揭露帕麦斯顿勋爵地位的秘密的一番话。大家知道,帕麦斯顿在议会中没有任何政党或者隐藏在政党的名称之下的集团作为自己的后盾。辉格党⁷⁰人、托利党⁷³人、皮尔派⁷¹都同样地对他不信任。曼彻斯特学派³⁷公开反对他。在梅费尔激进派⁸⁹(不同于曼彻斯特激进派)中,他的亲信充其量不过十来个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和什么东西使他有可能把自己强加给女王和议会呢?是他的名声吗?这是不可能的,正像坏名声并没有妨碍格莱斯顿、赫伯特、格雷厄姆和克拉伦登重新执掌权柄一样。或许,这个从来不属于任何政党,轮流为各个政党效劳,轮流离开各个政党并且经常在各个政党之间保持平衡的人,是企图组织联合内阁来阻止历史进程的那些瓦解了的政党的天生领袖?这种情况在目前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这个情况不足以使帕麦斯顿在1852年代替阿伯丁当上联合内阁的首脑。

德比泄露了谜底。帕麦斯顿是波拿巴的公开的朋友。他仓促承

认 1851 年 12 月的政变¹¹²，当时曾是他被开除出辉格党内阁的所谓的原因。¹¹³所以他对波拿巴来说是个“受欢迎的人”，值得信任的人。而同波拿巴结成联盟在目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帕麦斯顿就借助于外国这个因素而在组阁时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是第一次，只要进一步了解 1830—1852 年期间英国内阁的历史，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实。

由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现时已经不可能再用来搞内阁的阴谋，约翰·罗素勋爵在昨天的下院会议上放弃了自己的悲观看法，准许英国军队再增加几万人，并且同虔诚的格莱斯顿互相庆贺。尽管英国军队“在议会里获得再生”，但是毫无疑问，现在英国军队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只有数千人还被说成“能够服役”，因为医院里没有地方接收他们。10 万名法国军队还剩下区区 5 万人。可是，要在整个冬季把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守住，要从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要防守堑壕，而春天还要用可能剩下的兵力转入进攻，这 5 万—6 万人算得了什么呢？法国人可能正在组建若干个新的师，准备在 3 月间登船起程，但他们要为大陆上的春季大战进行准备，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从一切迹象看来，他们由水路运去的部队要么是太弱，要么是太迟。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为挽救败局所采取的两项措施，证明它们已经束手无策，只能让克里木军队听天由命。

为了纠正因克里木远征迟了四个月而铸成的错误，它们又犯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错误：在它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克里木后过了四个月，正值严冬季节，把土耳其残存的唯一可用的部队派到那里去。这支军队由于土耳其政府的玩忽职守和腐败无能，已经在舒姆拉陷于崩溃瓦解的状态，一旦到了克里木，将会因寒冷和饥饿而消

失,消失之快甚至会使英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显得逊色。

一旦俄军的兵力完全集中起来,天气又允许进行野战,俄军大概会首先攻击奥美尔帕沙¹¹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和法国人预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很清楚,给土军指定的可不是什么有利的阵地。这清楚地表明,现在把土军调到北区,是有意识犯下的战略性错误。只有俄军犯下最不可理解的错误,土军才能免遭覆没的命运。

其次,英国人和法国人雇用了 15 000 名皮埃蒙特人¹¹⁰,以补充缺额的英军,他们的给养由英国军需部供应。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皮埃蒙特人曾表明自己是勇敢的和优秀的士兵。他们大都是山民,他们的步兵甚至比法国人更适于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小规模作战、散兵作战和白刃战。另一方面,波河平原提供的骑兵可以同英国的近卫军骑兵媲美。最后,他们在上一次革命战争中经过了严酷的锻炼。这些步伐轻快、灵活敏捷、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适合当要他们当的英国兵,不适合用于简单而笨拙的正面攻击,但那位拉格伦却只会使用这种战术。此外,他们的给养还要由英国军需部供应,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军需部只知道自己供应自己!因此,雇用 15 000 名皮埃蒙特人可能又是一次新的失策。

眼下英国人已经暂停派遣增援部队。看来是拉格伦本人禁止派遣的,因为他连现有的残余部队都应付不了。谁能相信,在英国的兵营内患病、过度疲劳和休息不足现象越是严重,惊人的鞭笞制度采用得也就越是广泛呢?有些人早该送进医院了,却成周地穿着湿衣服在潮湿的土地上睡觉和执行勤务,以超乎常人的坚毅精神来忍受这一切,如果他们在堑壕里打瞌睡被逮住,就要受到九尾鞭^①和棍棒的

① 旧时英国军队中的一种体罚刑具。——编者注

款待。“打懒汉五十！”——这就是拉格伦勋爵常常下达的唯一的战略命令。如果著名的向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¹⁰的发动者所指挥的士兵模仿他，向俄军方面“侧敌行军”来逃避棍棒，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像《泰晤士报》的通讯员所报道的，开小差跑到俄国兵营里去的人日益增多。

关于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话自然收起来了。据说首先应当在开阔地上打击俄军。例如，威灵顿曾两次撤除对巴达霍斯的包围，去迎击前来解围的军队。¹¹此外，我们先前已看到，由于俄军新近修筑的防御工事，要想一举攻下该城是不可能的。^①最后，俄军最近的几次出击证明，联军只是在炮火方面对俄军还有一点优势。挫败不了俄军的出击，关于强攻的任何想法都是可笑的。围攻者如果不能把被围者困在要塞围墙以内，那就更不能指望打一次白刃战就能攻克要塞。这样一来，围攻部队将由于自己兵力的薄弱和俄国野战部队的威胁而被困在营地，只好这样挨下去。他们将继续减员，而俄军却会调来生力军。如果发现不了出奇制胜的救援办法，那么在克里木演出的欧洲战争的序幕将以联军的覆没而结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7—9日

载于1855年2月12日《新奥得
报》第7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55—57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格莱斯顿的发言¹¹⁴

伦敦,2月10日。格莱斯顿——教义学方面的财政大臣和财政学方面的邓斯·司各脱——对一句古老俗语“信仰万能”提供了新的证据。他依靠信仰使死人复活,依靠信仰使克里木的英国军队从11 000人增加到3万人。他要求议会也有这种信仰。很不幸,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的医务主任霍尔医生的报告恰巧寄来了。根据这份报告,第六十三团全团覆没,去年11月离开英国时有1 000人的第四十六团只剩下30人具有战斗力;不仅如此,霍尔医生还说,仍在执勤的部队中有一半是应该送进医院的,在兵营里顶多只剩下5 000—6 000名真正具有战斗力的人。凡是了解那些笃信宗教的辩护士所要弄的花招的人都不会怀疑,格莱斯顿像福斯泰夫一样,能把6 000个“穿麻衣的人”^①变成3万人。在星期四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他不是曾对我们说过,两种估计是由不同的观点出发的,例如,低估克里木军队数量的人就不像他本人那样把骑兵计算进去——似乎在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⁰后还存在什么值得一提的骑兵!格莱斯顿认为把“失踪的人”计算进去是简便易行的。他在星期四的会议上就自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编者注

己军队的现有兵员所作的“估算”把每个借方都当做了贷方，把每个赤字都当做了余额，而他在结束这番估算时煞有介事的架势则是无与伦比的。他竟然说，他“原谅反对政府的人的夸大其词”。他在劝说议员不要“感情”用事时的腔调和姿态也是无与伦比的。恭顺地和泰然地承受别人的痛苦——这就是虔诚的格莱斯顿的座右铭。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0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3 日《新奥得
报》第 7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欧洲面临的战争¹¹⁵

除非在维也纳目前出乎所有欧洲人的预料,立即签订和约,否则,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会亲眼看到欧洲大陆上爆发一场战争。同这场战争相比,克里木战争将下降到在一场全球三个最大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本来一直就应该属于它的无足轻重的地位。迄今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独立进行的军事行动,那时将被一条横贯这两大内海之间的整个大陆的战线联结起来,有足够能力驰骋于辽阔无垠的萨尔马特平原^①的各方大军,将为争夺这一片平原而战。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战争成为真正的欧洲战争了。

至于克里木战局,我们只需要作一些简要的补充说明。我们曾多次详尽地描述过它的性质,谈论过它可能的结局,因此现在只列举几个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论点。一星期以前我们曾说过^②,这一战局已变成增调援军的竞赛,并且俄军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现在几乎无须怀疑,到了能够按照一个预定计划进行不间断的军事行动的季节,俄军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兵力将为12万—15万人,而联军

① 指俄国欧洲部分的南部至巴尔干半岛东部之间的地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4--128页。——编者注

在尽了非凡的努力之后,可用来对抗俄军的也许只有9万人。即使法国和英国都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派往克里木,但已开往黑海的轮船每四艘就有三艘在各种借口下被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到哪里去找运输工具呢?英国横越大西洋的邮船航线已完全瘫痪,现在那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海洋轮船,但是供应已告罄。唯一能够拯救联军的办法,是将奥地利大约3万人的一个军在最需要的时刻从多瑙河口海运到克里木。没有这支增援部队,不论是皮埃蒙特军¹¹⁰和那不勒斯军,还是英法为数不多的补充兵员以及奥美尔帕沙的军队,都起不了什么真正的作用。

现在来看看英法已把各自的哪一部分军队用于克里木。下面我们只谈步兵,因为配属给这种远征军的骑兵和炮兵所占的比例变动极大,以致无法对他们的数量作出任何肯定的结论。此外,一个国家的全部作战部队动用的程度总是同步兵动用的程度成比例的。我们不准谈土耳其,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动用了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就是动用了它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军队。至于它在亚洲剩下的那一部分,已不能算军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英国总共有步兵99个团,或者说106个营,其中驻殖民地的至少有35个营。其余部分又有大约40个营编入了派往克里木的头5个师,后来至少又有8个营被派到那里去增援。因此,还剩下约23个营,其中恐怕连一个营也抽调不出来了。由此看来,英国最近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实际上就等于公开承认它平时在编的军队已经全部用尽。为了弥补漏洞,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允许为数约5万人的民军志愿到国外去服役⁷;把他们派往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科孚岛,以便把驻守这些殖民地的约12个营腾出来调往克里木;

宣布要建立一个外籍军团⁶，但很可惜，似乎没有外国人愿意前来报名接受九尾鞭^①的统治；最后，2月13日又下令为93个团组建第二营，其中43个营各为1000人，50个营各为1200人。这样就将增加103000人。此外，还将补充骑兵和炮兵大约17000人。但是这12万人迄今连一个都还没有招募到；而且谁来训练和指挥他们呢？英国军队的奇妙的编制和全军的管理，这样一来那样一来，竟把除后方连和几个后方营¹¹⁶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步兵——不仅士兵，而且还有军官——都用到了克里木和殖民地。列入英国军队名册中领取半薪^②的将官、上校和少校倒是多得很，他们可以在这些新编的部队中任职。但据我们所知，领取半薪的上尉却完全没有或者说极少，而现成的中尉、少尉和军士则根本找不到。生坯子有的是，但用生坯子军官来训练新招的生坯子士兵是绝对不行的；谁都知道，任何军队的支柱都是经验丰富的、久经锻炼的老军士。此外，我们还从最高权威——威廉·纳皮尔爵士那里知道，^③要用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把旧英国的乌合之众训练成约翰牛所说的“世界一流士兵”和“英国最优血液”。在有现成的军官可用，只需要补充兵员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在缺少下级军官或军士的情况下，想把还没有找到的12万人培养成英雄，又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我们可以认为，英国的全部军事力量被拖入这场战争如此之深，以致在今后12个月当中英国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维持一支四五万人的“小小的英勇队伍”对付敌人而已。这个数目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超过，但是要严重

① 旧时英国军队中的一种体罚刑具。——编者注

② 退役或非现役军官领取的薪饷要打折扣，故称半薪。——编者注

③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年伦敦版第3卷第271页。——编者注

影响为以后增援进行的准备工作。^①

法国军队的数量比较多,组织也完善得多,已动用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也小得多。法国有 100 个基干步兵团、3 个朱阿夫团¹¹⁷、2 个外籍军团¹¹⁸,每团有 3 个营;此外,还有 20 个步枪营,6 个非洲营¹¹⁹,共计 341 个营。在这 341 个营中,有 100 个营,或者说每个基干团各有 1 个营为后方营,由它来接收和训练新兵;每团只有头两个营被派出作战,后方营则为使头两个营经常保持足额而准备补充兵员。这样,一下子就得从营的总数中减去 100 个。如果今后这些后方营被用来作为核心编成第三野战营,就像拿破仑时代常常做的那样,那么就需要编入更多的新兵,因此,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用来作战。这样,目前法军可以使用的兵力不超过 241 个营。其中至少有 25 个营必须驻防阿尔及利亚。4 个营现驻罗马。9 个步兵师,或者说至少 80 个营,已派往克里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总共可以说已经动用了 110 个营,几乎占法国常备步兵平时编制的一半,后方营除外。法国军队管理得当,预先建立了后方营,可以召回在服役期最后一年当中归休的士兵,每年的征兵数额都能全部征足,此外还可进行超常规征募,最后一点是,法国人本来就适合服兵役——所有这一切都使法国政府有可能在 12 个月内把步兵的数量增加一倍。法国自 1853 年

^①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军队的状况》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2 月 24 日《新奥得报》第 93 号。《军队的状况》一文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段文字如下:

“我们已经说过,在今后 12 个月当中,英国自己的部队中可用来同敌人作战的只有 5 万人,这支战斗队伍尽管数量不大,如果指挥有方,管理得当,却不可小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因克尔曼会战¹⁵就够了。”——编者注

年中开始就不断地暗中扩充军备,现已建立了10—12个营的皇家近卫军¹²⁰。去年秋季法军各兵营都曾集结兵力,鉴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认为,现在法国国内步兵的实力同9个师调往国外以前完全一样;如果再考虑到法军能够以各团的后方营为基础编成第三野战营,而且又不太影响其作为后方营的职能,那么步兵的实力甚至还要更强一些。然而,如果我们说,到3月底在法国本土上的步兵将达35万人,那么这种估计只能是偏高而不会是偏低。按照法国的现行编制推算,这样一支步兵再加上骑兵、炮兵等,就是一支50万人的军队了。其中至少有20万人要留在国内作为后方营的骨干,用来维持国内的秩序和军事工厂以及医院的安宁。这样看来,到4月1日时,法国可能有30万人,约200个步兵营投入战场。但这200个营不论在组织和纪律方面,还是在战斗顽强性方面,都不能同以前派往克里木的部队相比。这些营将有很多年轻的新兵,许多营都将是临时编成的。凡是这样的部队——官兵互不相识,只是出发前才按指定计划仓促编成——在许多方面都比老部队要差。那些老部队的官兵经过长期服役,共历艰险,多年朝夕相处,养成了一种团体精神,这种精神能很快地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使最年轻的新兵也被同化。所以必须承认,已派往克里木的80个营是法国军队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重要性比仅由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如果说英国把它最精锐的部队几乎不留一兵一卒地投入了战争,那么法国已把将近一半的精锐部队派到了东方。

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关于俄军兵力的材料,因为不久以前我们曾报道过俄军的人数和部署^①。只要指出下面一些情况就足够了:在

^① 见本卷第80—86页。——编者注

俄国作战部队或者说用于帝国西部边境的部队中，参加作战的迄今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而近卫军、掷弹兵和第一军都还没有动用，第二军似乎分出了约一个师的兵力到克里木去。除这些部队外，还有8个预备军已经组成或正在组建，这8个预备军在营的数目上——即使不是在兵员的数目上——与作战部队的8个军相等。这样，俄国用以对抗西方的兵力约有750个营，但是其中可能有250个营尚在组建中，并且永远也不会足额，另有200个营曾在两次会战中遭受严重的损失。预备部队，就每个团的第五、第六营而论，如果执行的是原来的组建计划，一定主要都是老兵；而第七、第八营则肯定是由新兵编成的，战斗力也肯定很差，因为俄国人虽然易于管教，但是学起军事勤务来却慢得很。此外，整个预备部队的军官配备情况都很不好。由此看来，目前俄国已经动用了其正规作战部队的一半。可是迄今尚未动用的另一半军队——近卫军、掷弹兵，第一军和第二军——则是俄国军队的精华，是皇帝心爱的部队，他对这些部队的战斗力特别关注。俄国把作战部队的一半投入战争，取得的成果如何呢？^① 俄国几乎全部摧毁了土耳其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迫使英国牺牲了一支5万人的军队，使它至少在12个月内没有战斗力；此外，还迫使法国也像俄国自己那样，把同等比例的部队投入了战争。而当法国精锐的非洲团已同敌人交战的时候，俄国自己的精锐部队却还一枪未放。

可见，虽然在欧洲作战的俄国部队并无任何胜利可以夸耀，而且相反，在所有重大行动中总是退让，任何宏图大计都付诸东流，但是

^① 在《军队的状况》中此句为：“只有外交对西方各国战略所起的作用能够解释俄国已获得的成就。”——编者注

迄今为止优势还是在俄国方面。然而，只要奥地利一参战，情况就将完全改变。奥地利约有 50 万军队已做好战斗准备；此外，在各兵站还有 10 万人，另有预备兵员 12 万人；通过极少量的超常规征募，军队总数就可能达到大约 85 万人。但是我们把它算做 60 万人，在兵站的兵员包括在内，而不包括尚未征召的预备兵员。这 60 万人中，有 10 万人是在兵站，还有约 7 万人驻在意大利和受不到俄国威胁的国内其他地区。其余 43 万人编成数个军团，配置在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多瑙河下游一线，这样就能在很短时间内向任何指定地点集中 15 万人的兵力。一旦奥地利对俄国开战，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将立刻造成对俄国的优势；因为自从俄国原多瑙河军团全部调往克里木后，奥军已在各个地点超过俄军，而尽管俄军目前已抢先一步把预备部队调往边境，但奥军预备部队的调动也会同样迅速。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在预备兵员的数量方面，奥地利远比不上俄国，12 万预备兵员征集后，兵员的进一步增加就得靠征召新兵了，那是很慢的。所以，奥地利宣战的时间越迟，对俄国就越有利。据说为了弥补这一点，一支法国辅助部队将开进奥地利。但是由第戎或里昂到克拉科夫的路程十分遥远，除非安排十分得当，或者是经过改编的奥地利军队靠本身的素质能够抵挡得住在数量上甚至还稍占优势的俄军，否则法军的到达就可能太迟了^①。

于是，奥地利就成了局势的主宰。它自从在自己的东部边境建立军事阵地以来，就保持了对俄军的优势。如果由于俄国预备部队补充及时而使它暂时失去这个优势，那么它也可以依靠那些经验丰

^① “除非安排十分得当……法军的到达就可能太迟了”这句话，在《军队的状况》中为“外交的时间拖得越长，这支部队及时到达的可能性就越小”。——编者注

富的将军——近年来除很少的几个匈牙利人外，唯有他们显露了军事才干——和那些组织良好、大部分经历过战火的部队。只要几次巧妙的机动，一次小小的后撤，就能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为自己造成有利时机。从军事观点看，只要奥军一开始行动，俄军立刻就会被迫完全转入防御^①。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必须谈一谈。假如法国把国内的军队扩充到50万人，奥地利把全部军队扩充到80万人，那么这两个国家在12个月内至少还能够各征召25万人入伍^②。而在俄国方面，如果沙皇有一天完成了各步兵团的第七、第八营的兵员补充，从而把作战部队增加到比如说90万人，那么他就已经是为防御做了几乎所能做到的一切。据说，最近一次征兵工作到处都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征足所需人数不得不降低身高标准，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沙皇征召南俄罗斯的全部男性居民入伍的命令¹²¹，并不意味着军队数量真的有所增加，而是等于公开承认今后再也不能正常地征召新兵了。1812年法军入侵，俄国真正遭到了侵略，那时采用过这个办法，不过只是在17个省内。那时，莫斯科提供了8万志愿兵，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斯摩棱斯克派出了25000人，如此等等。可是在战争当中却哪里也看不到他们，这几十万志愿兵未能使俄军在到达维斯图拉河时免于像法军一样的狼狈，一样的溃不成军。^③这次大征兵还说明尼古拉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① 在《军队的状况》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即使在短时间内进攻顺利，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编者注

② 在《军队的状况》中，这里还加有：“而英国的补充兵员也将会从第二年起不断增加。”——编者注

③ 《军队的状况》一文至此结束。——编者注

但是,如果从军事观点看,奥地利的参战将迫使俄国转入防御,那么从政治观点看,情况就不一定如此。沙皇手中厉害的政治进攻手段——我们曾不止一次提醒读者注意——就是唆使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起来反抗并宣布匈牙利独立。奥地利的国务活动家们多么害怕这些手段,我们的读者是知道的。无疑,沙皇在必要时将采取这些手段;其结果如何,有待分晓。

我们没有谈普鲁士。看来它最后会同西方一起反对俄国,虽然也许只有在发生了谁也无法预见的风暴之后才会这样。不管怎样,只要还没有发生某种民族运动,普鲁士军队就不大可能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它暂时可以不加考虑。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2 月 1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3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3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帕麦斯顿勋爵¹²²

伦敦,2月12日。帕麦斯顿勋爵毫无疑问是官方英国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非凡人物。虽然他已经年迈,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去世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事务精通的政治家,但他无疑是一个样样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捶胸顿足和私语缠绵、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虽然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丰富的经验,他无比圆滑,从来不露声色,他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多面才能,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遇到困难时能应付裕如,每一次都能够迎合听众的偏见。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发事变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灵巧的头脑使他能从来不作任何忏悔自责;极端的轻佻和贵族的冷漠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插科打诨,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

跳如雷的敌手。即使拿不出像样的看法,他也随时都能用老生常谈编出成套的漂亮话来。当没有本领搞清某个问题时,他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手来凑合。

他事实上屈服于外国势力,而口头上却抗拒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不过,坎宁在临终时曾警告要提防他)继承了英国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迎合民族偏见,而与此同时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可憎的东西,自然在本国也就肯定能被树立为“真正的英国大臣”⁸⁵。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⁷³,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知道怎样把民主的词语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合起来;怎样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庇护鼓吹和平的资产阶级;怎样在默许纵容的时候扮演进攻者,在出卖的时候扮演防御者;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所谓的盟友气恼;怎样在争执的决定性关头站到强者一边去欺压弱者,怎样一边说大话一边溜之大吉。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怀疑他是烧炭党¹²³。1848年,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人控告他和俄国订有秘密协议;1850年,他却深感满意,当时外国大使们的一次反对他的阴谋活动在上院获得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¹²⁴。他出卖别的民族,但他总是做得非常有礼貌。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总会得到大量慷慨的辞令。每当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等遭到迫害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正好在担任政府要职,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联系,其实他们对受害者的迫害还是得到帕麦斯顿默许的。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对手,那多半不会错;谁要是把

他当做朋友,那肯定会倒霉。但是,如果说他的这种外交手腕没有使他在和外国谈判中获得怎样辉煌的实际结果的话,它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把空话当做事实,把幻想当做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在1807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副大臣。1809年他开始担任军务大臣,在1828年5月以前他在派西沃、利物浦、坎宁、葛德里奇和威灵顿的内阁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如何,看到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河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平达当上托利党内阁重要的常任阁员是令人奇怪的!要知道,托利党内阁曾颁布谷物法⁵⁴,在英国土地上驻扎外国雇佣兵¹²⁵,不时地给人民“放血”(西德茅斯勋爵的说法),堵塞报刊喉舌,禁止集会,解除整个民族的武装,废除正常的司法,同时剥夺个人自由——总之,宣布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处于戒严状态。1829年,帕麦斯顿投奔辉格党⁷⁰,于1830年11月被该党任命为外交事务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政变¹¹²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下一次的通讯将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政绩作一概述。

伦敦,2月14日。最近几周的《笨拙》经常把帕麦斯顿勋爵描述成木偶戏中的小丑。大家知道,这个小丑是专门破坏安宁的人,是吵闹打架的爱好者,是制造有害的误会的祸首,是闹事的能手。他只有在他自己造成的普遍混乱中才觉得自在,他在这种混乱中把妻子、儿女乃至警察从窗户扔出去,最后,在无端胡闹了一通之后,他几乎安然无恙地从中脱身,并以嘲弄的态度对所发生的丑事幸灾乐祸。从

形象生动的角度来说,帕麦斯顿勋爵确实表现得像一个这样的小丑——一个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人物,他寻找各种困难、阴谋和动乱来作为他活动的必要材料,从而在没有发现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外交大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表现得如此活跃。封锁斯海尔德河¹²⁶、塔古斯河、杜罗河¹²⁷,封锁墨西哥¹²⁸和布宜诺斯艾利斯¹²⁹,那不勒斯远征¹³⁰,帕西非科事件引起的远征⁸⁵,波斯湾远征¹³¹,在西班牙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¹³²和在中国为输入鸦片而进行的战争¹³³,北美边境事件¹³⁴,阿富汗远征²³,炮轰圣让达克¹³⁵,西非船只搜查权的争吵¹³⁶,甚至在“太平洋”上制造不太平,——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和附着着不可胜数的威胁性照会、一摞一摞的议定书和外交抗议书。所有这些纷扰看来通常是化为激烈的议会辩论,而在辩论中勋爵阁下总能确保获得短暂的胜利。帕麦斯顿似乎是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外交冲突,他把冲突推进到一定的地步,当冲突一有可能引起过于严重的后果或者为他创造出他所需要的那种戏剧性的紧张效果时,他就立刻打退堂鼓。世界历史本身就好像是专为满足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个人欲望而发明的消遣品。这就是帕麦斯顿的光怪陆离的外交给予没有偏见的人们的第一个印象。然而,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从他的东摇西摆的外交举措中得到好处的总只是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帕麦斯顿的朋友休谟在1841年曾经对他说过:

“如果俄国皇帝^①在英国内阁中有他的代理人,那么这个代理人未必能比勋爵阁下更好地代表俄国皇帝的利益。”

帕麦斯顿勋爵的一个最热烈的崇拜者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在 1837 年曾用以下的话谈起过他：

“勋爵阁下还打算让俄国侮辱大不列颠和损害不列颠的贸易多久？勋爵阁下让英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损害，因为他把英国打扮成吹牛大王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礼和残酷无情，对强者俯首恭顺和奴颜婢膝。”

至少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所有对俄国有利的条约，从阿德里安堡条约⁵⁰到巴尔塔利曼尼条约¹³⁷和关于丹麦王位继承权的条约¹³⁸，都是在帕麦斯顿的庇护下签订的。诚然，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时，帕麦斯顿并没有参加政府，而是在反对派内，但是，一方面这项条约最先得到他承认，虽然是偷偷摸摸地承认，另一方面，他当时领导辉格党反对派，攻击阿伯丁倒向奥地利和土耳其一边，并且说俄国是文明的捍卫者（参看 1829 年 6 月 1 日、1829 年 6 月 11 日^①、1830 年 2 月 16 日等的下院会议记录）。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这一点曾经在下院说过：“他弄不清帕麦斯顿究竟是谁的代表。”1830 年 11 月帕麦斯顿担任了外交大臣。他不但鉴于“圣詹姆斯内阁和圣彼得堡内阁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拒绝法国提出的为维护波兰利益⁴³进行共同干涉的建议，而且还禁止瑞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对已派兵去俄国边境的波斯威胁说，如果它不把军队撤回，将诉诸战争。帕麦斯顿甚至担负了俄国的部分军事费用，因为他在所谓俄荷贷款协定被比利时革命废除之后，在没有得到议会授权的情况下，仍继续支付这笔贷款的利息和本金。¹³⁹1832 年，他准许放弃希腊国民议会向 1824 年希英贷款¹⁴⁰的英国契约一方保证的以领土所作的抵押，并把它移作在俄国

① 1829 年 6 月 11 日英国议院没有开会，这里所指的应是亨·帕麦斯顿 1830 年 2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410 页。——编者注

庇护下签订的另一项贷款的保证。帕麦斯顿在给英国驻希腊的驻办公使道金斯先生的专函中总是指示：“您应该在俄国代表的同意下进行活动。”1833年7月8日，俄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¹⁴¹，这项条约规定不让欧洲各国的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在土耳其实行八年独裁（见条约的第2条）。苏丹^①被迫签订了这项条约，因为俄国舰队已停泊在博斯普鲁斯，俄国军队已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门口，据说是为了防御易卜拉欣帕沙¹¹。帕麦斯顿一再拒绝土耳其提出的为土耳其的利益而加以干预的迫切请求，这样来迫使土耳其接受俄国的帮助（这从帕麦斯顿在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24日等等日期的会议上以及1834年3月17日的会议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当帕麦斯顿勋爵进入外交部的时候，英国在波斯的势力占绝对优势。英国代表经常得到他的指示：“你们在一切场合下都应该在俄国大使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依靠帕麦斯顿的帮助，俄国使自己支持的一个王位追求者^②登上了波斯的王位。帕麦斯顿勋爵允许俄国和波斯进军赫拉特。这次进军失败之后，帕麦斯顿才发出英印远征军向波斯湾进军的命令，这是虚张声势，旨在加强俄国在波斯的势力。1836年，在勋爵阁下的主持下，俄国在多瑙河口侵占的地盘、它实施的检疫和关税条例等等⁵²第一次得到英国的承认。同年帕麦斯顿利用英国商船雌狐号被驻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的俄国军舰没收一事（雌狐号是在英国政府怂恿下派出的），正式承认俄国对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要求。在这个事件中发现，帕麦斯顿早在六年前就已秘密承认了俄国对高加索的要求。在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② 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

这个事件中,子爵阁下仅靠 16 票的多数逃脱了下院对他的谴责。当时最激烈地指责他的人之一是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即现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1836 年英国一位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①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帕麦斯顿拖延批准这项协定,而在 1838 年却偷偷摸摸地签订了一项对俄国十分有利而对英国十分有害的新条约,结果在黎凡特的一些英国商人决定今后在俄国商行的保护下来进行贸易。国王威廉四世的逝世诱发了有关《公文集》的恶名远扬的丑闻。在华沙革命期间,俄国外交官和大臣们的一批秘密通信和专函等连同康斯坦丁大公的宫殿一起落到波兰人手里。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子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带到了英国。在这里,根据国王的命令,这些文件在乌尔卡尔特的编辑和帕麦斯顿的监督下在《公文集》上发表。国王一死,帕麦斯顿马上否认与《公文集》有关联,拒绝付给印刷厂主费用等等。乌尔卡尔特公布了他同帕麦斯顿的副大臣巴克豪斯的通信。《泰晤士报》(1839 年 1 月 30 日)就这件事评论道:

“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另外一个有绅士身份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2、14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6、19 日《新
奥得报》第 79、8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戴·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卡·马克思

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 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¹⁴²

伦敦,2月16日。昨天在索尔兹伯里市政厅演了一出把悉尼·赫伯特先生重选为威尔特郡南部地区的议员的滑稽剧。威尔特郡甚至在英格兰各郡中也以地产集中而著名,那里的全部土地集中在十来个家族的手里。除了苏格兰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威尔特郡那样干净地把居民从土地上“清扫”出去,那样彻底地实行现代农业制度。要不是为数不多的领主之间偶尔爆发家族纷争,威尔特郡就不会有什么选举斗争。

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作为悉尼·赫伯特的竞争对手。因此,主持选举的郡长在会议一开始就马上宣布,赫伯特按照一切法律形式重新当选了。于是悉尼·赫伯特站了起来,向自己的佃农和家奴说了几句老掉牙的客套话。这时,一些没有选举权的市民渐渐聚集在市政厅里,英国宪法赋予他们一种特权,即在选举会议上可以给候选人找点麻烦。悉尼·赫伯特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交叉火力一样猛射到他神圣的头上:“给我们士兵吃生咖啡豆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军队在哪里?”“昨天《泰晤士报》上是怎样谈论您的?”“为什么

您要放过敖德萨?”“您的舅舅俄国的沃龙佐夫公爵在敖德萨有没有宫殿?”等等。当然,对这些非议会的提问者,悉尼·赫伯特根本没有去理睬,相反,却抓住了喧嚷声稍微静一下的时刻,提议向如此“公正地”主持了“讨论”的郡长表示感谢。这个提议在议会听众的掌声中和非议会听众的嘘声和怨声中被通过了。接着是第二轮冲击性问题的齐射:“谁让我们的士兵挨饿?”——“送他自己去打仗吧!”等等。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此后,郡长宣布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于是闭幕了。

新改组的内阁的最初措施绝没有受到称赞。新任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是个残废,因此他的工作的主要负担落在陆军副大臣的肩上。任命已故的皮尔的小儿子弗雷德里克·皮尔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引起了很大的愤怒,特别是因为弗雷德里克·皮尔是一个公认的庸才。虽然他还年轻,但他却是陈规陋习的活的化身。别人都是被培养成官僚的,而他生来就是一个官僚。弗雷德里克·皮尔是靠皮尔派⁷¹的势力得到职位的。因此应当在天平的另一端加上一个辉格党⁷⁰人。因此弗兰西斯·贝林爵士被任命为兰开斯特王室直辖领地的主管大臣。他曾经在墨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中担任过财政大臣,当时得到了“赤字先生”这个罪有应得的绰号。新的军职任命还完全是按元老掌权制度办事。例如,80多岁的西顿勋爵被任命为爱尔兰军事长官。年迈、耳聋、患痛风病的罗克比勋爵被派到克里木去当近卫旅的指挥官。驻克里木的第二师原先由莱西·伊文思爵士指挥,现由辛普森将军指挥;这位将军与参孙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朴次茅斯市长的悠闲职位对这位老人倒是十分合适的。1811年就当上旅长的萨默塞特将军到东印度去担任总司令。最后,被《泰晤士报》称为老“无政府主义者”的,曾在君士坦丁堡把整个运输服务等等弄得毫无秩序的海军上将博克瑟,现在被派到巴拉克拉瓦去整顿那里的港湾“秩序”。

《泰晤士报》说道：

“我们怕是不得不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内阁的力量了，向那些无所顾忌和不加考虑地浪费国家最好的资源的人去控诉这种浪费行为是徒劳的。如果不是长期执掌政权（政权经常由他们本阶级的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让他们昏了头，他们至少不会恰恰挑选这个时候来表现这样可恶的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自我保护的本能似乎应当教会他们某些东西，而我们要郑重地问一问英国民众：他们能容许他们的同胞去做冷酷无情或庸碌无能的牺牲品吗？”^①

《泰晤士报》威胁地宣称：

“不是政府，甚至不是下院，而是不列颠宪法在受审判。”^①

来自东印度的最新消息很重要，因为它叙述了加尔各答和孟买不景气的经营状况。在工业区，危机缓慢地但是不可避免地临近了。曼彻斯特精纺工厂的厂主在前天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从2月26日起在自己的工厂里每周只干四天活，并在此期间要求附近地区的工厂主也采取类似措施。在布莱克本、普雷斯顿和博尔顿的工厂中，工人们已经得到通知：往后他们只能“短时间”工作。破产的事例将会更多和更严重，特别是因为去年有许多工厂主为了占有市场，不通过代销商而把出口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上星期三《曼彻斯特卫报》承认，不仅工业品，而且工厂本身都发生了过剩。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16日

载于1855年2月20日《新奥得
报》第8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1855年2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979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 会¹⁴³

伦敦,2月17日。昨天议会又开会了。下院的情绪明显低落。它似乎痛苦地意识到,最近三个星期的交易使它威信扫地。执政的依旧是以前的内阁,只是刷新了一下。两个不能和睦共处的老勋爵^①在内阁中消失了,但是同他们分享不信任票的第三个老勋爵,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升到最高一级。帕麦斯顿勋爵受到了庄重的冷遇。没有“鼓掌”,没有热情。人们破例地用显而易见的冷淡、不佳的心绪、满腹的怀疑来听取他的演说。同时,他的记忆力也破例地不听使唤了,他迟疑地翻着放在他面前的笔记本,最后还是查理·伍德爵士悄悄地提醒他应该继续说什么。看来,听众并不相信,换一块招牌就能使老商行免遭破产。帕麦斯顿的全部表现令人回想起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对奥伦治的威廉的评价:

“当这个人握住天平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但从他把自己投到天平的一个秤盘上的时候起,他就软弱无力了。”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无可争辩地出现了与改组过的旧联合相对立的新联合——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党⁷³人同激进派中最坚定

① 约·罗素和乔·阿伯丁伯爵。——编者注

的部分,即莱亚德、邓库姆、霍斯曼等人的新联合。正是在激进派中,在梅费尔激进派⁸⁹中,帕麦斯顿一直有着自己最忠实的拥护者。一家内阁的报纸私下议论说:莱亚德想在陆军部弄个低级职位的希望落空了。另一家报纸则偷偷议论说:随便给他一个职位吧!

帕麦斯顿勋爵在介绍自己的新内阁以前,叙述了内阁危机的大致经过。然后他就开始吹嘘自己的货色:他组织的内阁

“具有充分的行政管理本领,充分的政治洞察力,充分的自由主义原则,充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履行自己职责的决心”^①。

克拉伦登勋爵、潘缪尔勋爵、格莱斯顿先生、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他的恭维。他说,这个内阁尽管十分出色,但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出席这次会议的罗巴克先生坚持下星期四要任命调查委员会。议会为什么需要一个委员会呢?他让大家回忆一下理查二世时代瓦特·泰勒暴动¹⁴⁴时期的一件逸事。这个年轻的君主遇到了一群暴动者,他们的首领刚刚在他们的眼前死去。于是君主勇敢地走到他们面前大声地说:“你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朋友们,我来当你们的领袖吧。”“而我(年轻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就说:如果你们,下院,想放弃这个委员会,那么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委员会。”

这样大不恭敬地把议院比做一群“暴动者”和毫不客气地要求把内阁变成审判自己本身的法官,使帕麦斯顿受到了讥笑。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帕麦斯顿提高了嗓门,用大家知道的爱尔兰的挑衅方式仰起头大声地问道。调查委员会要干什么?改善管理?那很

① 亨·帕麦斯顿《1855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17日《泰晤士报》第21980号。 编者注

好！那就听听我们决定采取哪些改善措施。过去你们有两个陆军大臣：军务大臣和陆军大臣。今后你们只会有一个，即陆军大臣。军械部门的军事指挥权归总司令（近卫军骑兵大楼）^①，行政管理权归陆军大臣。²⁶ 运输局将要扩大。按照 1847 年的法律，过去服兵役的期限是 10 年。而现在，可以自由选择服役年限，从 1 年到 10 年的任何一个年限均可。不得征召小于 24 岁、大于 32 岁的人入伍。现在谈谈战区情况！为了保证作战指挥和管理方面的步调一致、坚强有力 and 有条不紊，帕麦斯顿在这里选择了一个不寻常的办法：在每一个职位上增设一个具有未加明确限定的权力的监督。拉格伦勋爵留任总司令，但是辛普森将军将出任总参谋长，拉格伦应当“认为自己有义务执行他的建议”。约翰·伯戈因爵士将被召回，而哈里·琼斯爵士则被任命为军需部的总全权代表，具有未加明确限定的独断权力。但是同时将派一个文职人员——约翰·麦克尼尔爵士（著名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的作者）到克里木去调查军需部的贪污、无能和失职的问题。在土麦那和斯库塔里将建立新的医院，在克里木和国内将实行医务部门的改革；在克里木和英国之间运送伤病员的运输船只每隔 10 天定期启航。同时，陆军大臣将向卫生大臣借调三名文职人员到克里木去，以便在春季到来的时候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以预防鼠疫，并对医务部门的人员和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由此可见，权限冲突问题正在设法得到解决。为了使拉格伦勋爵由于现在他的“最高指挥权受到宪法制度的限制”而得到补偿，他被授权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关于建立一支由 300 名土耳其的清道夫和掘坟人组成的队伍的谈判。这些工人应当在解冻天气来临时把死亡的军

^① 见本卷第 16 页。 编者注

人、腐烂的马匹以及其他垃圾抛到海里去。在战区将建立专门的陆上运输。因此一方面在备战,而另一方面,约翰·罗素勋爵在维也纳也准备在可行的情况下签订和约¹⁴⁵。

迪斯累里:听了勋爵阁下对自己的同僚的“行政管理本领和政治洞察力”的赞语,很难相信他说的就是下院在 19 天以前所谴责的那些“无与伦比的犯错误的能手”!假定他所许诺的改善会付诸实现并且是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那么这些改善难道不是对这个唯一反对实现它们并把下院关于过去管理不当的调查解释为对自己投不信任票的内阁的最大的讽刺吗?就连约翰·罗素勋爵也说,军队神秘地消失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调查造成这种情况的秘密原因是必要的。难道要下院自己愚弄自己,撤销它刚在 10 天以前通过的决定?如果那样,它就会丧失它的社会影响,多年难以挽回。勋爵阁下和他的焕然一新的同僚举出了什么样的论据诱使下院自己愚弄自己呢?不过是一些诺言,而如果不威胁要建立调查委员会,这些诺言是决不会提出的。他[迪斯累里]坚持议会进行调查。帕麦斯顿新官上任,就威胁要反对议会的独立活动。还从来没有一届内阁像阿伯丁勋爵的内阁——“上一届”内阁,要么该怎样说呢!——那样得到反对派方面这样心甘情愿的支持!这两个特洛米奥完全把他搞糊涂了;因此,他想说:“上一届内阁和它目前忠实的继承者——它在内阁席位上的孪生兄弟。”

罗巴克声明,下星期四,他将提出已由下院批准成立的委员会的人选。政府仍然是旧的,只不过把牌重洗了一下,但是这些牌又落入了过去那些人的手中。只有下院直接干预才能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消除使政府甚至在愿意改革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必需的改革的那些障碍。

托·邓库姆：勋爵阁下向他们声明说，他和政府愿意充当他们的委员会！他们万分感激！下院要求调查的正是勋爵阁下和他的同僚们的工作情况！勋爵答应改革，但是谁来实行呢？还是那些因治理不当而被迫进行改革的人。在管理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还是罗巴克提案提出以前的状况。约翰·罗素勋爵胆怯地从自己的岗位溜走了。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是从利物浦勋爵的内阁¹⁴⁶开始到目前的内阁为止的13届已经寿终正寝的内阁中残留的一朵“枯萎的花”。所以他应当无可争辩地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行政管理才能”。他的潘缪尔勋爵根本抵不上纽卡斯尔公爵。任命委员会不是谴责，而是要调查。谴责大概接着就会来的。至于维也纳的谈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和人民对立的。人民要求对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⁴⁷作有利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修改。而且人民把反对俄国的战争理解为不折不扣地摧毁俄国的优势。

可见，帕麦斯顿内阁的开场和阿伯丁内阁的收场一样，就是反对罗巴克提案。下星期四以前它将会施展一切手段来拼凑反对调查委员会的内阁多数。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17日

载于1855年2月22日《新奥得
报》第8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¹⁴⁷

伦敦,2月19日。我们在上篇报道中谈到的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①,现在已被伦敦所有的日报作为既成事实在评论了。内阁的《纪事晨报》就这一点指出:

“那些注定要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而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们的神经质、受伤害的虚荣心、不安分的功名心或者十足的愚蠢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从来没有一次革命不是如此。德比派同与罗巴克先生结为一体的自由派杂凑起来的联合,正在步法国众议院议员的后尘。这些议员创办1848年改革宴会¹⁴⁸时,只想除掉内阁,而结果却推翻了王位。”^②

该报说,罗巴克打算扮演什么罗伯斯比尔或者(十分值得注意的或者!)赖德律-洛兰。他企图组织一个“救国委员会”¹⁴⁹。他毫无疑问地推举以下的人作为参加他提出的调查委员会的人选:罗巴克、德拉蒙德、莱亚德、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世界工业博览会大厦¹⁵⁰的建筑师)、斯坦利勋爵(德比的儿子)、埃利斯、怀特赛德、迪斯累里、巴特、娄(《泰晤士报》秘密委员会委员)和迈尔斯。

① 见本卷第154—155页。——编者注

② 1855年2月19日《纪事晨报》第27504号。——编者注

《纪事晨报》继续写道：

“我们面临着向我国贵族进行革命的十字军征讨的公开威胁，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是无益的。蛊惑家们力图推翻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他们正在巧妙地利用迪斯累里和罗巴克的联合起来但还不协调的战斗力量来反对它。民主派企图发动一场革命，他们正在有步骤地把内阁一个接着一个地推翻。”^①

最后，一家政府的机关报像波拿巴在政变¹¹²前几个月所做的那样，以解散议会，“诉诸人民”相威胁。

财政部次官威尔逊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宣称，“代议制”和进行战争是不相容的。因此，当过制帽工人的威尔逊建议，担任国家职务的议员不必经过重选，应根据职位把下院的席位和投票权分给内阁大臣。这样，内阁就不依赖于选民和下院，而下院却要依赖于内阁。就此，《每日新闻》警告说：

“英国人民应当有所警惕，并准备保卫自己的代议机关。应当料到，有人企图让政府摆脱下院。这也许会造成政府和下院之间的冲突，结果可能发生革命。”^②

事实上，下星期三，在被认为是伦敦最激进的一个区的马里勒本区将举行群众大会，会上将就“政府企图抗拒议会调查”作出决议。

正当《纪事晨报》这样预告革命，而《每日新闻》这样预告反革命的企图的时候，《泰晤士报》也暗示二月革命¹⁵¹，但它指的不是改革宴会，而是普拉兰谋杀案。因为刚好在几天前，爱尔兰大法官法院审理了一起遗产案。在这个案件中，克兰里卡德侯爵——英国贵族、墨尔本内阁时期驻彼得堡宫廷的大使和罗素内阁时期的邮政大臣——

① 1855年2月19日《纪事晨报》第27504号。——编者注

② 1855年2月19日《每日新闻》第2731号。——编者注

的所作所为和巴尔扎克描写谋杀、通奸、非法占有遗产和欺骗的小说中的主角一模一样。¹⁵²

《泰晤士报》指出：

“在 1847 年阴郁的秋天，当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一种模糊的预感惊动着法国人的心灵的时候，巴黎社会的上层集团里发生的一件大丑闻更加震惊了本来就饱受刺激的公众，并且大大加速了灾难的来临。凡是细心观察到日前舆论界极端激动的状况的人，就不能不同样激动地去注视在爱尔兰大法官法院里揭露出来的大丑闻。”^①

随着执政集团的狂妄自大和软弱无能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它内部的犯罪行为，英国精锐部队的覆没，旧政党的瓦解，下院中没有多数，在早已过时的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内阁，在极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的情况下的欧洲战争开支——这些征兆足以预示大不列颠正面临着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幻想破灭的同时，自由贸易的幻想也在破灭。前者保证了贵族对行政权的垄断，而后者则保障了资产阶级对立法权的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9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新奥得
报》第 9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1855 年 2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1981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和军事问题¹¹⁵

伦敦,2月20日。虽然下院的会议昨天又从下午4点开到深夜2点,并且决定拨款大约750万英镑作为陆军的经费,但是这次辩论并没有提供值得报道的趣闻。因此,要指出的只是,帕麦斯顿在答辩时说些生硬的鄙俗话,而且在说这些话时态度蛮横无礼,带有挑衅性,因而使他的自由派反对者们大为光火。他用阿斯特利马戏院的风格有声有色地高谈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⁰,却斥责莱亚德“庸俗地高谈贵族”。他说在军需部门、运输部门、医务部门的并不是贵族。他忘记了在这些部门的是贵族的奴才。莱亚德准确地指出,帕麦斯顿所发明的委员会只会在远征军中造成权限上的冲突。帕麦斯顿叫喊道:怎么!——他又摆出理查二世的姿态,而议会则扮演瓦特·泰勒的暴民¹⁴⁴——你们希望设立一个只适合于编辑蓝皮书⁶¹的议会委员会,而反对我的“应当工作!”的委员会。帕麦斯顿对议会的态度非常傲慢,甚至认为这一次没有必要使用自创的俏皮话。他借用了放在议员面前的桌子上的内阁晨报里的俏皮话。这里既有《纪事晨报》上的“救国委员会”¹⁴⁹,也有《晨邮报》上的拙劣的俏皮话——把对调查感兴趣的议员送到克里木去,并让他们留在那里。这类俏皮话只有这样七拼八凑的议会才忍受得了。

这样,帕麦斯顿在议会里表现得比老阿伯丁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在联合起来的啤酒店主的那份轻信的报刊^①上——而不是在直接受他支配的报刊上——放话,说什么他不是自由的代理人,宫廷把他拴住了,等等。

既然和平会议不久就要在维也纳召开,那么来谈一谈战争,估计一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参战的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就是适时的了。这里说的不仅是军队的总数,而且是可以用来进攻的那一部分军队的数量。我们只详细地谈谈步兵,因为其他兵种同步兵有一定的比例。

英国总共有步兵 99 个团,或者说 106 个营,其中驻殖民地的至少有 35 个营。其余部分又有 40 个营编入了派往克里木的头 5 个师,后来至少又有 8 个营由海上前往增援。因此,还剩下约 23 个营,其中恐怕连一个营也不可能调到国外去服役。5 万名以上的民兵则已被授权到国外去服役。他们将被派往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科孚岛,以便腾出约 12 个营调往克里木。外籍军团⁶,正如帕麦斯顿昨天在下院所说的,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最后,2 月 13 日又下令为 93 个团组建第二营,其中 43 个营各为 1 000 人,50 个营各为 1 200 人。这样就将增加 103 000 人,此外,还将补充骑兵和炮兵大约 17 000 人。但是这 12 万人连一个都还没有招募到;而且还需要训练他们,给他们配备军官。

目前的这种奇妙的编制,使除了后方连和几个后方营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步兵(不仅士兵,而且——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还有军官)都用到了克里木和殖民地。列入英国军队名册中领取半薪的将

^① 《晨报》。——编者注

官和校官倒是多得很,他们可以在这些新编的部队中任职。但是领半薪的上尉却几乎完全没有,领半薪的中尉和军士则根本找不到。大家知道,军士是任何军队的基石。按照这方面的最高权威、撰写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的威廉·纳皮尔将军的意见^①,要想把旧英国的“乌合之众”(流氓无产阶级)训练成“英国最优血液”和“世界一流士兵”,需要整整三年时间。而且还要在有现成军官可用,只需补充兵员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把这12万人培养成英雄,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在今后12个月当中,英国政府最多只能拿出一支5万人的“小小的英勇队伍”来同敌人对抗。这个数目可能在短时期内被超过,但是要严重影响为以后增援进行的准备工作。

邮班要出发了,我们只能谈到这里。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20日

载于1855年2月23日《新奥得
报》第9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年伦敦版第3卷第27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论新的内阁危机¹⁵³

伦敦,2月24日。下院昨天挤满了人,因为已经宣布大臣们要说明第一届帕麦斯顿政府瓦解¹⁵⁴的问题。挤成一团的议员们迫不及待地等候着高贵的子爵的到来,议会宣布开会后过了一小时,这位子爵终于出现了,议席的一侧对他报以嘲笑,另一侧则对他欢呼。变节的大臣们——格雷厄姆、格莱斯顿、赫伯特——在所谓激进派(曼彻斯特学派³⁷)的议席上坐了下来,布莱特先生似乎在那里欢迎他们。在他们的议席前面端坐着也已退出内阁的卡德威尔。帕麦斯顿勋爵提议立即审议有关罗巴克委员会的事情⁷²。接着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开始陈述他作为大臣的意见,但他刚一迈进他用辞藻建造的空中大厦的门槛,帕麦斯顿就发出明确无误的酣睡声为他伴奏。

格雷厄姆反对调查委员会的辩词原则上可以归结为:任命这样的委员会就是下院侵犯王室的特权。我们知道,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大臣们就有一种习惯,即在反对王室时援用议会的特权,而在反对议会时则援用王室的特权。实际上格雷厄姆是以委员会的调查会危及英法联盟这一点来吓唬人。这岂不是暗示,法国同盟者将被看成是被指控的失败的主要罪魁!至于格雷厄姆的退出内阁,据他说,内阁从一开始就把罗巴克的提案完全看做是一种隐蔽的不信任案。因

此阿伯丁和纽卡斯尔公爵就成了牺牲品，旧内阁也就被解散。新内阁除了坎宁^①和潘缪尔以外，仍由原班人马组成；那么为什么罗巴克的提案能够突然得到一种新的解释呢？不是他，而是帕麦斯顿勋爵从上星期五到本星期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而是他的高贵的朋友是一名逃兵。此外，格雷厄姆宣称——这是一种天真的表白——，他退出改组的内阁的原因在于他确信：

“现在的政府并不比几星期以前垮台的政府能得到下院更大的信任。”^②

格雷厄姆在发言中说了如下的话：

“在组织新政府的时候，我曾问过勋爵阁下（帕麦斯顿），是否会对阿伯丁伯爵的对外政策作某种修改，是否会对已经提出的媾和条件作某种修改。帕麦斯顿勋爵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在这方面一切都将照旧。”^③

（我们援引的这些话是在下院所讲的原话，而不是在报纸上刊登的经过改写的话。）

布莱特马上接过格雷厄姆的这段话，来表明他并不想推翻帕麦斯顿政府，他对勋爵阁下个人并不怀有敌意，相反，他确信帕麦斯顿和罗素拥有受到不公正攻击的阿伯丁所缺少的东西，即足够的声望，可以在四项条款³的基础上来签订和约。

悉尼·赫伯特：罗巴克的提案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第一，罗巴克提议调查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的状况；第二，调查直接负责军队给养的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议会有权做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赫伯特不就是根据这个理由在1月26日激烈地反对“后者”，就

① 查·约·坎宁其实也是阿伯丁内阁成员。——编者注

② 詹·格雷厄姆《1855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86号。——编者注

像现在,2月23日又激烈地反对“前者”?当他(赫伯特)接受本届内阁的职务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声称委员会是违宪的,随着阿伯丁和纽卡斯尔的离职,委员会也已经不存在了——这与他上星期五^①发言的调子是一致的。帕麦斯顿甚至不怀疑,下院会不经讨论就否决罗巴克的提案。既然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弹劾政府,而是调查军队的状况,那么这个委员会就将证明自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骗局。帕麦斯顿勋爵没有勇气根据他不止一次表明过的信念来行动,这就削弱了政府。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行的是软弱的政策,那他还有什么用处呢?

格莱斯顿对自己同僚们的解释实质上并没有作任何补充,只是使用了这样一种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曾使已故的皮尔就格莱斯顿退出他的政府¹⁵⁵一事(那时事关梅努特神学院问题¹⁵⁶)指出,关于他的朋友退出政府的原因,他认为在他的朋友就此向议会作两小时的发言以前,他就已经理解了。

帕麦斯顿认为谈自己以前的同僚们的解释是多余的。他对他们的离职表示遗憾,但是他懂得宽慰自己。在他看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弹劾,而是调查军队状况。他反对任命委员会,但是确信,下院的决定是不可能撤销的。国家不能没有政府,因此不管有没有委员会他仍将留在政府里。对于布莱特的问题,帕麦斯顿回答说,和平谈判是认真的,给罗素的指示是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拟定的。关于他的内阁的情况,他什么也没有向下院报告。

尽管帕麦斯顿的第一届政府突然发生分裂,但是帕麦斯顿即使不是在舆论界,至少是在内阁和议会里已经无可争辩地取得了胜利。

^① 1855年2月16日。——编者注

他派罗素到维也纳去谈判,使他自己摆脱了一个讨厌的滑稽的对手¹⁴⁵。他同罗巴克妥协,把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变成了政府的委员会,使它仅仅成为同他自己设立的三个委员会并列的第四个委员会。用悉尼·赫伯特的话来说,帕麦斯顿用“骇人听闻的骗局”代替了事实。皮尔派⁷¹退出内阁使他有可能用一些等于零的人物组成内阁,而其中只有他自己是实数。然而毫无疑问,要成立这个真正的帕麦斯顿内阁必将碰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27 日《新奥得
报》第 9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休 谟¹⁵³

伦敦,2月24日。休谟死了,下院失去了一员老将。他的长期的议会生涯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展的精确晴雨表,该派在1831年达到鼎盛时期。在下院改革¹⁵⁷后的初期,休谟起了议会的沃里克即议员制造者的作用¹⁵⁸,八年以后,他同丹尼尔·奥康奈尔和菲格斯·奥康瑙尔一起成了“人民宪章”¹⁵⁹的起草人。“人民宪章”直到现在还是宪章派的政治纲领,按其实质来说,就是要求普选权和创造在英国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权利的条件。

在这以后不久,工人和资产阶级鼓动者之间发生了分裂,休谟就站到了资产阶级鼓动者这一边。在罗素内阁时期¹⁶⁰,他拟定了被所谓“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当做纲领的“小宪章”。¹⁶¹“小宪章”提出三条代替了人民宪章的六条,并且用大致来说“扩大了”选举权代替了“普遍”选举权。最后,在1852年,休谟宣布了新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小宪章”,而只要求一条——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¹⁶²。此外,休谟还是所谓“独立”反对派的典型代表,科贝特曾恰当地、精辟地把这个反对派称为旧制度的“安全阀”。晚年,休谟养成了一种先向议会提出提案,然后在大臣们的暗示下于最后一刻收回这些提案的习惯,这成了他真正的癖好。他那句哗众取

宠的话“节约公款”已经成为谚语了。历届内阁容许他抨击和缩减小的支出项目,以便使大的支出项目能更加顺利地在下院获得通过。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28 日《新奥得
报》第 9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¹⁶³

仍然没有来自克里木的确切消息。联军处境“略有好转”。终于采取了令人十分不快但又难以回避的一步。英军步兵撤出堑壕，调往巴拉克拉瓦“进行整编”，然后在该港口周围高地设置阵地对港口加以防卫。在调出的六个师中，除几个补充团足以编为另一个师外，有作战能力的就只剩下 10 500 名步兵了，而且其中有一半还必须首先彻底休整才能在战场上有些用处。由于国内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一团糟，加之军队本身的指挥官们无能和玩忽职守，英军步兵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兵力，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撤离堑壕而把整个围城任务和最后的攻击留给法军，甚至把自己已做好战斗准备的炮兵旅和海军旅¹⁶⁴也实际上交由法国将军指挥。这样的一天恐怕是令英军步兵很难过的一天了。可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挽救英军残余人马的办法。法军现在据说共有 75 000 人左右，但我们估计可能 6 万人较为接近实际，因为他们也遭到了严重损失。这样算来，包括英军炮兵旅和海军旅在内，集中在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上的可能有 70 000—75 000 人，但这是最大限度的估计了。这些兵员中，用于围城行动至少需要 4 万人，因为现在堑壕离俄军工事非常近，这就使得围城的部队必须在平行壕内始终保持一支重兵以击退出击之敌，而这些兵

员必须每日替换,否则他们将很快遭到与英军同样的命运。英军正是因长时间在堑壕值勤得不到休息而累垮的。余下 30 000—35 000 人,用以防守巴拉克拉瓦与黑河下游之间的包围线并在战场上量力向前推进。但是,在俄军现有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这 35 000 人显然不能冒险离开他们的堑壕阵地很远。拉格伦勋爵本人在他上次的报告中承认 2 月初满载弹药和其他物资的庞大车队进入了塞瓦斯托波尔,这表明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能够完成对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包围。一旦俄方援兵突然开到,俄军就能出击,其兵力至少足以把法军赶出前两道平行壕。他们还会同时向巴拉克拉瓦和黑河高地进攻从而牵制掩护部队。如果说那些车队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被拦截下来,那么,如何能阻挡突然开到的俄方援兵进入呢?

迄今我们还很少就围城行动的工程技术方面发表评论。各条堑壕线在发表的地图上当然没有标出,而据称标出了这些堑壕线和炮台位置的地图又都不可信。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工程方面的作业做出评判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待事实来为难以得知的详情细节提供一些线索了。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即使考虑到工兵遇到过或可能遇到过种种困难妨碍他们作业,围城作业的水平迄今看来仍然要算是极其平庸的。塞瓦斯托波尔位于一个很长的沟壑纵横、高低不平的缓坡的最低处,可见它的位置对一个处在地面进攻之下的要塞来说是最不利的了,因为它处在被瞰制的地位。从军事上说,一个要塞处在被瞰制的地位指的就是:在它周围有几个地点处于大炮射程内,从那里能看到要塞的腹地,尤其能看到它部分防线的内部或后方。而在大炮射程内的外围高地一般说来则处于瞰制地位。由于塞瓦斯托波尔城内城外的地势都是高低不平的,显然它的内部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处于被瞰制的地位,因

此,只要敌军知道如何设置炮位,这些地方就直接暴露在敌军的平射火力之下。情况是这样的极端不利,而俄军工程师却成功地构筑了具有这样强的抵抗能力的防御设施,这真是他们的最大光彩。要避免由于外围瞰制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就只有采用掩蔽(défilement)的办法或者说加高壁垒的办法,壁垒的高度要超过周围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使那里的视线不能达到壁垒以内。但是这样的掩蔽不仅有一定的限度,而且修筑这样的工事所需劳动力数量太大,大规模地使用这个办法是不可能的。果然,来自营地的报告证实,在大炮射程内有些地点可以俯瞰要塞以内很大一部分地方。各种报告、地图以及各种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没有一个被围地点不为外面某地所瞰制因而直接暴露于该地的平射火力之下。情况虽然如此,英法工程师们却连这种罕见的有利条件都不会加以利用,我们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呢?任何部队的任何一名工兵军士至少都懂得,在包围战中找到一个制高点,那应该看做是一个意外的天赐良机,可是这些将军们却无视这一点。人们会记得,一两个月以前从联军营地发来的报告说,夺取一个正规的要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做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并且事先就已安排好,可是对于一个像塞瓦斯托波尔这样不合规范的要塞,全体工程师都一筹莫展!这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围城一方的工兵部队只知墨守成规。塞瓦斯托波尔被四面八方所瞰制,其防御工事不是按照一个总体规划修建,而是在遇到紧急军情时抓紧时间一个一个构筑的;正规要塞的情况则是,各种可能性都预先估计到,每一座单个的工事均和其余所有工事配合得协调而紧密。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地方竟比夺取正规的要塞更难!不谈昏头昏脑的英军工程师,法兰西衰落帝国¹⁶⁵的工程师们也不

例外。派他们去攻打一条正规的沃邦防线^①，他们可能有办法把它攻下，但是一遇到超出常规的情况，尽管敌方有明显的弱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不是说法国的工兵部队没有很多一流的军官，相反，它在世界上可能是首屈一指的。但在路易·波拿巴、圣阿尔诺、马尼昂、佩尔西尼、富尔德这样一帮人当政的时代，专业方面的才能同指挥职位的任命毫不相干。

也许有人说，多石的地面带来的困难太大，使联军不能在最佳制高点构筑炮台。但该城城内的地面也像城外一样多石，而俄军却能在一个空间小得多，而且必须修筑大量纵横交错的掩蔽工事的地方建起令围城一方也不得不赞叹的炮台。再说，法国人难道就忘了普鲁士人至少是在同样多石的地面上，怎样在一两天之内就用沙袋炮台攻下了他们的梅济耶尔？¹⁶⁶ 当今的铁路不就是对所有这些论调的明明白白的驳斥吗？

但是不能只责怪工程部门。总的作战指挥也决不比这好一些。所以我们只好说康罗贝尔也和拉格伦一样，指挥才能实在平庸。现在无可否认，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在9月28日联军一登上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时就提出立即突袭那些尚欠完善、武器装备很差的工事的主张的人是正确的。当时，联军本可以投入35 000左右的步兵兵力进行突袭；他们正处于胜利之初的高涨情绪之中；他们见到的俄军则处于惊慌失措没有准备的状态；被围者很难抵挡得住15 000人以上的步兵；更重要的是，只要一次冲锋成功，就能拿下该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本该进行突袭的尝试，即使成功机会与失败机会之比仅为4:6。但是将军们却让这次机会溜掉了，他们决定采取围

^① 以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塞·勒·沃邦得名。——编者注

城的办法。然而,如果他们的力量不足以立即发起突袭,用于围城当然就更是差得远了。不过他们要进行的不是正规的围城,而是一次加快的、速决的行动。修几天工事,打几天炮,然后就发起强攻。这个行动完全失败了。俄军的工事比联军修得快得多,有序得多。三个星期以后才具备了开火条件。待到炮台撤去掩蔽物的那一天,联军亮出一门大炮俄军就能亮出两门大炮来对付它。但还是开了火,法军大炮半天就被打哑了。英军大炮打哑了俄军几处炮台,但怎么也压不住城里射出的火力。几天的时间联军就打光了弹药而无任何结果。开炮的次数减为一天只打几炮,目的不过是为了让官方有理由宣称炮台还在起作用。这样浪费掉的弹药需要几个月才能补上,这种无谓消耗又是一大错误。俄军工事的朝向,他们的大炮数目以及联军炮台的距离(1 200—2 500 码)马上就使任何明眼的军官看出,这样距离长、时间短的火力,对防护墙起不了任何作用,也不能掩护强攻纵队前进。但联军将军们的表现就像塔克文面对向他兜售的《西维拉占语集》¹⁶⁷时一样。9月28日他们决定不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就等于让第一部书被烧掉;在一场每个炮手都明知是毫无用处的炮击中糟蹋了全部弹药,等于让第二部书被烧掉;而他们将比塔克文还要倒霉,不但不能按原来全套书的价钱拿到第三部书,而且连一部也拿不到了。

我们毫不怀疑,实际情况是联军的将军们那时深信,以他们现有炮兵和步兵的人力物力而论,任何突袭行动都是不可行的。三道防线,有些地方是四道防线,一道接一道,一次进攻是不可能拿下的。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攻打这一道接一道的防线必须同样用一次接一次围攻的办法,每一道防线攻克以后,下一道防线的围攻过程就可能短一些。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重新挖堑壕,重新组织炮击,重新

发起强攻,当然还需要新的增援。所有这些都有一個假设作前提,那就是掩护部队始终守住其阵地,而且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彻底攻克后12小时之内,港口北边的炮台不至于把联军弄得在那里无法待下去。关于掩护部队,我们在下面马上还要谈。至于北边的炮台,如果南边落入联军之手,这些炮台定会立即发挥可怕的威力。由于联军掌握的人力物力有限,所负的任务艰巨,每次袭击必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量援军开来的可能性很小,围攻部队又得忍受气候造成的超乎寻常的损伤,因此,联军十之八九永远也攻不下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将军们肯定知道这一点。可是,为使军心不致完全涣散,必须经常宣布强攻在即。但这样不可能持久,因而还必须要其他的行动。他们必须设法走出他们那“著名的侧敌行军”¹⁰使他们陷入的致命的死胡同。为此,想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主意,那就是派奥美尔帕沙¹¹去叶夫帕托里亚。

我们多次指出,联军在进攻计划的基本构思方面犯了个大错误。但是这一错误难以避免,因为它是以前的错误的结果。用两支彼此分离的军队,从两个不同的基地,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进攻比这两支军队加在一起还强的敌军,这实在是对一切作战规则的最大藐视。但还是这样干了。这样干是唯一在野战战场上战胜俄军,把俄军打退到克里木半岛腹地,并把塞瓦斯托波尔的北区也包围起来的机会。但这种打法结果又会怎样呢?土耳其军队一经集中在叶夫帕托里亚,就非得立即投入进攻不可,因为他们在该地无法驻留。他们约有25 000人,最多3万人,所到之处找不着可供利用的坚固的防守阵地,他们只有向前推进。要么他们只能在毫无遮挡的野外行动,在这样的地方,决定每一次战斗胜败的是灵活机动——在这方面俄军甚至也比他们强得多——,要么他们就得把俄军赶出阿利马河或卡恰

河的阵地。这样的行动远非他们所长。因此,他们很可能被打败和消灭,除非是俄军让他们在严酷的气候中和恶劣的管理下自行死去。至于驻在黑河的联军,如果他们向前推进,兵力不可能超过 25 000 人,距离不可能超过离开他们目前阵地一段短行军的路程。由于需要派出保卫交通线和侧翼的小分队以及侦察兵等等,进军的第二天兵力就得减少到 2 万人。而且所到的地方找不到像赫拉克利亚半岛“颈项地带”上的那种托里什韦德拉什式的阵地¹⁶⁸。他们也必须采用机动的作战方法。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在开阔的战场上,每一个阵地都可能为敌军所包抄。包抄可以是战略上的——在交战前就用机动的办法包抄该阵地以威胁其交通线;也可以是战术上的——在交战中派出一支队伍袭击其侧翼与后方。因此,只要有机动的余地,较强的军队,无论战或不战,总是能够迫使较弱的敌军后撤。一旦联军决定向前推进越过黑河,那很快就会让他们体会到这一点。而土军从叶夫帕托里亚向前推进这一情况本身就将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行动,那时就到了克里木战争的危机时刻。本报刊登的来自太平洋号和阿非利加号邮船的报道中称,那里打了一场击败俄军的胜仗,实际上那只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冲突。^①

俄军看来是在等待他们的第三军从彼列科普开来,等待一旦天气好转,能够露天宿营,那时他们就能开始反攻。这两件事现在都不大可能受阻。所以,到 3 月中或 3 月底左右,只要不因尼古拉之死^②而停战,只要天时稍稍有利,我们就可望看到塞瓦斯托波尔争夺战的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② 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病逝于 1855 年 3 月 2 日(俄历 2 月 18 日)。——编者注

最后分晓。我们对最后分晓作何估计,迄今已经谈得够多、够清楚的了。^①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2 月 25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17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34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本段文字可能出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或者经过他们的修改。
——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¹⁶⁹

伦敦,2月27日。帕麦斯顿对反对贵族的喧嚷作出了讽刺性的回答,他成立了一个由10个勋爵和4个从男爵组成的内阁,而且在这10个勋爵中有8个人是贵族院成员。他用辉格党⁷⁰集团内的各个家族之间的妥协来对付人们对各寡头政治集团之间的妥协的不满。在他的内阁中,格雷家族、萨瑟兰公爵家族以及克拉伦登家族都如愿以偿。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是格雷伯爵的堂兄弟,而海军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是格雷伯爵的姐夫;格兰维尔伯爵和阿盖尔公爵代表萨瑟兰家族。财政大臣乔·康·刘易斯爵士是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的姐夫。只有印度分给了没有爵位但同辉格党家族也有姻亲关系的弗农·斯密斯。理查三世曾经大声疾呼:一个王国换一匹马!^①帕麦斯顿模仿卡利古拉^②大声叫嚷:一匹马换一个王国!把弗农·斯密斯变成印度的大莫卧儿¹⁷⁰。

《晨报》抱怨道:

“帕麦斯顿勋爵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在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贵族的政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编者注

②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把自己喜爱的马封为执政官。——编者注

府,而且用可以找到的最坏的贵族材料拼凑成自己的政府。”^①

但是,天真的《晨报》聊以自慰地说:

“帕麦斯顿始终还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他始终还带着镣铐和桎梏……”^①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②,帕麦斯顿勋爵用一些等于零的人物组成内阁,而其中只有他自己是实数。约翰·罗素勋爵在1851年不策略地将他从辉格党内阁中撵了出去¹¹³,而今他却策略地派罗素去出差¹⁴⁵。他为了继承阿伯丁的职位,曾利用了皮尔派。首相职位一稳固,他就撇开了阿伯丁派^③,并且像迪斯累里所说的那样,从罗素那里不仅盗走了辉格党人的衣帽,而且还盗走了辉格党人本身。尽管目前的政府和1846—1852年罗素的辉格党政府很相似,几乎一模一样,但把它们混为一谈则大错特错了。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内阁,而在于代替内阁的帕麦斯顿勋爵。虽然内阁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旧人,但是,内阁职位的分配不同了,内阁在下院中的支持者不同了,而且内阁本身是在完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组成的,所以,如果说过去它是一个软弱的辉格党内阁,那么现在,只要帕麦斯顿不是假皮特,波拿巴不是假拿破仑,而约翰·罗素勋爵还继续出差在外,它就是一个人的强有力的专政。英国的资产者虽然对局势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烦恼,但是帕麦斯顿用来欺骗和愚弄朋友和敌人的厚颜无耻的把戏可以暂时让他们开开心。西蒂区的商人们说,帕麦斯顿再次表现出他“clever”。但“clever”是一个不好翻译的修饰语,它有各种意

① 1855年2月28日《晨报》第19872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

③ 这里指詹·格雷厄姆、威·格莱斯顿和悉·赫伯特。——编者注

思、各种含义。它包含着一个善于推销自己并懂得如何损人利己的人的一切品质。英国资产者虽然讲道德,讲礼节,但他们仍然首先佩服所谓的“clever”的人,道德约束不了这种人,礼节骗不了这种人,这种人把原则看成是搞垮他周围的人的圈套。既然帕麦斯顿十分“clever”,那么他就不能像用巧计战胜罗素那样再用巧计战胜俄国人吗?——英国中间阶级上层政治家发出这样的议论。

至于托利党⁷³人,他们以为美好的旧时代又回来了,联合内阁的凶恶魔力已被摧毁,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传统的轮流执政已重新恢复。一种不仅仅限于消极瓦解的真正变动,事实上只有在托利党执政时期才可能发生。只有在托利党人执掌政权的时候,才开始有强大的外界压力(*pressure from without*)和实行不可避免的变革。例如,天主教徒的解放¹⁷¹是在威灵顿内阁时期,废除谷物法⁵⁴是在皮尔内阁时期;如果改革法案¹⁵⁷不是如此,那么至少改革鼓动也是如此,而改革鼓动比它所带来的结果更为重要。¹⁷²

当年英国人专门从海外请来一位荷兰人做国王,目的是随同新的王朝的建立¹⁷³,开辟新的纪元——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联姻的纪元。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看到,血统特权和金钱特权一直保持着立宪均势。例如,由于血统特权,军队中一部分职务是由有家族关系、裙带关系和受宠爱的人来担任的,但是金钱原则也有它的用武之地,因为一切军官职位都是可以用现金买卖的。据统计,目前在各个团中供职的军官用于购买自己军衔的资本已达600万英镑。为了不失去自己在供职期间所获得的权利,为了不致被年轻的富人排挤出去,不太富裕的军官只好去借债,以求得晋升,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抵押债务人了。

在教会中像在军队中一样,除了家族原则也盛行现金原则。教会的一部分职务落到不是长子的贵族子弟手中,另一部分职务则落

到肯花大价钱的人的手里。买卖属于国教会的英国人民的“灵魂”和在弗吉尼亚买卖黑人一样经常化了。在这种交易中不仅有买者和卖者,而且还有经纪人。昨天就有一个这种“教会”经纪人,名叫辛普森,向“王座法院”¹⁷⁴提出诉讼,要求一个叫拉姆的人付给他应得的酬金。这位拉姆根据契约有义务为他推荐约瑟亚·罗德韦尔教士到西哈克尼教区任职,辛普森在这当中从买者和卖者那里抽取5%的佣金和某些额外收入。据他说,拉姆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拉姆的父亲是一个70岁的教士,在萨塞克斯有两个受薪神职,这两个职位的市场价格估计为16000英镑。当然,这种价格与教士的收入成正比,而与占有这个职位的人的年龄成反比。小拉姆是老拉姆所占有的教区的保护人,又是一个更小的拉姆——西哈克尼的受薪神职占有者和教士的哥哥。因为这位西哈克尼的教士还很年轻,他的高薪闲差的继任者的推荐权价格比较低。虽然这个职位每年的收入是550英镑(教士住宅除外),但是它的占有者把下一任的推荐权只卖1000英镑。他的哥哥答应在父亲去世后把萨塞克斯的职位交给他,但是把他的这样空缺下来的西哈克尼的职位通过辛普森按3000英镑卖给约瑟亚·罗德韦尔。这样一来哥哥就捞到2000英镑的纯收入,弟弟则得到更好的受薪神职,而按5%的佣金计算,经纪人本可以从这笔交易中赚300英镑。不知为什么这个契约不算数了。法院判给了经纪人辛普森50英镑作为他“花费劳动”的赔偿费。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
27—28日

载于1855年3月3日《新奥得
报》第10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危机¹⁷⁵

在大西洋号轮船从欧洲带来的一切消息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沙皇的逝世和这一事件对当前复杂局势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一事件或其他欧洲问题的消息即使重要,也未必能使深思熟虑的观察家感兴趣,因为更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目前英国不由自主地卷入的那种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逐渐发展的征兆。^① 企图保持被称为不列颠宪法的那种过了时的妥协(即官方统治阶级和非官方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的最后一次尝试,显然已失败了。联合内阁是历届内阁中最合乎宪法的内阁,不说它已在英国倒台,就连宪法本身在受到战争考验的一切地方也全部破产了。死于黑海沿岸的4万名不列颠士兵是不列颠宪法的牺牲品! 军官、总参谋部、军需部、医务部门、运输部门、海军部、总司令部、军械局、陆军和海军——全都不起作用了,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自己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颠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失败得心安理得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次全面失败写道:不列颠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② 它可能没有想到,它的这句话倒总算说得比较接近事实!

① 这段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1855年2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979号。——编者注

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有罪的。这部不列颠宪法无非就是过了时的妥协,由于这种妥协,国家政权完全转入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手里,条件是:整个政府、全部行政权,甚至立法权执行机构,即在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而土地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般原则,却无限制地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这个占据了不列颠宪法十分重要的半壁江山的阶级,现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它不得不承认自己已无力继续治理英国。内阁一个接一个地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又自行解散。危机是永久性的,政府不过是临时性的。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个人所企求的只是给这台政治机器上足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顿下来。拥护宪制的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下院本身,已经弄到瘫痪的地步。下院分成了许许多多的派别,它们在现有的派别数目中尽可能去拼凑各式各样的组合,这样下院就再也认不出自己了。它甚至在按照自己的模样组成(其唯一目的是重新解散)的各种不同的内阁中,也已认不出自己了。真是彻底的破产。

一种束手无策的毛病已感染了全国,它像克里木的流行病一样,渐渐蔓延到了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一个比俄国危险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比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内阁,所有格莱斯顿派、卡德威尔派、罗素派和帕麦斯顿派的内阁加在一起还要厉害。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就带有极其尖锐、极其普遍和猛烈的性质,以致人们已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它那无情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浅薄的自由贸易派³⁷信徒的嘴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废除⁵⁴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现在,急剧发生的商品过剩及其种种后果已成为事实;面对这一事

实,那些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断言生产永远不会过剩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谁都叫喊得响亮,责备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见之明。我们早就提醒大家注意这种慢性病的存在。美国最近的困难和引起美国商业停滞的危机无疑加深了这种病症。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满了商品,但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继续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没有可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商品,或者说,为了不降低价格而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便采取了荒谬的应急办法——把商品运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应急办法使生意能在短时期内有所进展,避免了把全部商品一下子抛向国内市场而造成的大麻烦;然而,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即引起了麻烦,到去年9月底,这种后果在英国也已经感觉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转变成了急性危机。印花工厂的厂主们首当其冲;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老商号在内的许多企业破产了。接着轮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行,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轮到了;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许多商行不得不歇业,而且无论对谁来说,危险都还没有过去。相反,这种危险还在日益增大。丝织工厂的厂主也被波及了;丝织品的生产几乎缩减到零,丝织品生产地区经受了而且还在经受着极端的困难。随后就轮到棉纺织工厂的工人和厂主。从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来看,他们当中某些人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还获悉,精纺工厂每周已只工作四天,粗纺工厂很快也会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些工厂有多少能在较长的时期内支持下去呢?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1846年以来,甚至可能自1842年¹⁷⁶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普遍感觉到危机的影

响,近六年来处于沉寂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那时,英国工人就会重新起来进行斗争;并且恰好是在资产阶级最终把贵族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时候,给资产阶级以威胁。到那时,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的假面具将会脱落下来。英国的两股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这个国家终将被纳入欧洲社会的总的社会发展轨道。当英国同法国结成联盟的时候,它就彻底丧失了那种因岛国而产生的,但早就被世界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所破坏的孤立性质。今后,它也未必能够逃避其他欧洲国家所卷入的那些伟大的国内运动。

不列颠宪法的末日同路易-菲力浦君主政体的末日一样,社会腐败的事例层出不穷,这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已经报道了议会和政府的丑事,报道了斯托纳、萨德勒、劳利的丑事^①,但是,最为丑恶的当属汉德科克和德·伯格案件暴露出的内幕,英国贵族克兰里卡德勋爵如果不是这件十分可恶的事情的直接参与者,至少也是主要参与者。¹⁵²毫不奇怪,这样似乎就能一一对应了,人民在读到那些可耻细节时,就会不由自主地高呼:“普拉兰公爵!普拉兰公爵!”英国也已经到了它的1847年;谁知道它的1848年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和将是什么样子呢?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
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3月2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4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116—118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不列颠宪法¹⁷⁵

伦敦,3月2日。不列颠宪法在受到战争考验的一切地方全部破产了,而在国内,英国历史上历届内阁中最合乎宪法的联合内阁也倒台了。死于黑海沿岸的4万名不列颠士兵是不列颠宪法的牺牲品!军官、总参谋部、军需部、医务部门、运输部门、海军部、总司令部、军械局、陆军和海军——全都不起作用了,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自己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颠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心安理得了!《泰晤士报》就这次全面失败宣告:“不列颠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①它可能没有想到,它的这句话倒总算说得比较接近事实。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有罪的。

但是,这部不列颠宪法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是否就是代议制或者限制行政权呢?这些特征并没有使它同北美合众国的宪法或是同无数精通“自己生意”的英国股份公司的章程有什么区别。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妥协。最初,在1688年“光荣”革命¹⁷³以后,

^① 1855年2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979号。——编者注

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金融贵族。1831年的改革法案¹⁵⁷容许另一派别，英国人称之为“工业巨头”的人，即工业资产阶级显贵参加了妥协。1831年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的历史——从新济贫法¹⁷⁷到废除谷物法⁵⁴，从废除谷物法到实行地产遗产税。

如此说来，资产阶级——其实只是中间阶级的上层——一般也在政治上被承认为统治阶级，不过，这种说法只有在整个政府的全部行政权，甚至立法权执行机构，即在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在1830年前后，资产阶级宁愿再同土地贵族妥协而不愿同英国民众妥协。而土地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某些原则，却独自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正是这个占据不列颠民族相对来说最重要的半壁江山的阶级，现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并且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不再有治理英国的使命。请看一看吧，为了使它起死回生进行了多少次的尝试！内阁一个接一个地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又自行解散。危机是永久性的，政府不过是临时性的。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个人都承认，他只是想给这台政治机器上足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顿下来。下院本身在按照它自己的模样组成的那些内阁中，也已认不出自己了。

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同一个比沙皇尼古拉危险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日益加剧，日益普遍。它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浅薄的自由贸易派³⁷信徒的嘴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和社会危机就永远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现在，市场上商品过剩已成为事实，正是那些仅

仅在五个月前还以武断的、绝对正确的口吻教导说生产过剩永远不会再发生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谁都叫喊得响亮,责备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见之明。

这个病症早在普雷斯顿罢工¹⁷⁸时期就以慢性病的形式出现了。此后不久,美国市场商品过剩引起了合众国的危机。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满了商品,但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继续对生产过剩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没有可能不降低价格而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商品,因此他们只好采取冒险的办法——把商品运到国外,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应急办法使生意能在短时期内有所进展,避免了把全部商品一下子抛向国内市场而造成的大麻烦。然而,商品一到达目的地,立即就影响到那些地区的行情,到9月底,这种后果在英国也已经感觉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转变成了急性危机。第一批破产的厂家是印花工厂,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一些老商号。接着轮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行,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轮到了;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许多商行不得不歇业,而且对这些商业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说,危险都还没有过去。相反,这种危险还在日益增大。丝织工厂的厂主也被波及了;丝织品的生产目前几乎缩减到零,而丝织品生产地区现在极端困难。随后就轮到棉纺织工厂的工人和厂主。他们当中某些人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以前曾经指出过^①,精纺工厂只能缩短工作时间,粗纺

① 见本卷第153页。——编者注

工厂很快也会不得不这样做。这些工厂中的一部分现在就已经一周只开工几天了。它们这样又能维持多久呢？

再过几个月，工业区的危机即使不超过也将达到 1842 年危机¹⁷⁶的规模。近六年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沉寂状态，只保存下来一些进行新的鼓动的骨干。但是，一旦工人阶级普遍感觉到危机的影响，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必将重新开始。到那时，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而不让外国看见的假面具将会脱落下来。然而，只有不知道这个国家拥有多么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人，才会对这个国家能胜利地摆脱面临的大危机而振兴起来这一点发生怀疑。^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6 日《新奥得
报》第 10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这句话可能经《新奥得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卡·马克思

莱 亚 德¹⁷⁹

伦敦,3月2日。研究尼尼微的大学者莱亚德前天在向自己的艾尔斯伯里选民们发表的演说中,谈到一段有趣的情节,一方面说明寡头政治在分配最为重要的国家职位时所采取的方式,另一方面说明所谓自由和独立的议员们对这种寡头政治所抱的十分暧昧的态度。

莱亚德说,格兰维尔勋爵任命他为外交部副大臣;在罗素内阁¹⁶⁰倒台和德比内阁⁸⁶组成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个月。德比建议他在指定为他的继任者的斯坦利勋爵(德比的儿子)从印度回国以前仍留任原职。以后他打算派他(莱亚德)出国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莱亚德说:

“我所有的政界朋友都认为我应当接受这个建议,只有罗素勋爵除外,他提出相反的意见;我毫不迟疑地听从了罗素的劝告。”^①

这样,莱亚德拒绝了德比的建议。妙极啦!罗素勋爵又成了内阁大臣,莱亚德也没有被遗忘。罗素邀请他出席内阁宴会,要他担任

① 《莱亚德先生和他的选民们》,载于1855年3月1日《泰晤士报》第21990号。——编者注

“督察委员会”即印度事务部的副大臣。莱亚德表示同意。但是罗素突然想起,有一个以前曾经负责过爱尔兰事务,但从未负责过亚洲事务的上了年纪的辉格党⁷⁰绅士,名叫托马斯·雷丁顿爵士,“还没有得到照顾”(原话)。因此,罗素暗示莱亚德,要他不妨碍安排这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莱亚德又作了让步。于是,罗素被这位学者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谦虚态度所鼓舞,就劝他索性让路改任驻埃及的领事。这一次莱亚德却大为恼怒,拒绝了 this 建议,并且发表了反对内阁的东方政策的重要演说,在议会中颇为引人注目。

帕麦斯顿组阁以后,就想用军械局秘书的职务来满足莱亚德。莱亚德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据说是因为他对火炮等等东西一窍不通,多么天真啊!好像已经离职的军械局秘书、爱尔兰旅⁹⁰的捐客之一蒙塞尔先生能够把普通的滑膛枪和针发枪区别开来似的!于是帕麦斯顿建议莱亚德担任陆军部副大臣的职务。他接受了,但是第二天帕麦斯顿突然发现,弗雷德里克·皮尔这个官场上的小人物此时此刻是陆军部绝对不可缺少的,而尽人皆知,皮尔对陆军部的职能一无所知。最后,帕麦斯顿以罗素的名义建议莱亚德担任殖民部副大臣作为补偿。莱亚德认为,目前要去熟悉从来没有研究过的 50 个殖民地,这太困难了。他表示拒绝,于是这个颇有教益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内阁的报纸从这里得出的唯一教训是:莱亚德在处世方面还很缺少经验,从而很不体面地失去自己在亚述学方面的名望。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5 日《新奥得报》第 10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¹⁸⁰

伦敦,3月3日。大家知道,葛德里奇勋爵关于把军士直接提升为上尉的提案在前天的下院会议上被否决了。帕麦斯顿运用了古老的两难推理:局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旧制度的一个环节关联着另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个别的实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而制度的全面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也就是说,改革在理论上是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实际上行不通。这个遵循“抵制诱惑”^①原则的下院,自然是从善如流,或者更确切些说,不需要别人说服,因为它在开庭前就已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帕麦斯顿就这个问题指出,买卖军衔证书的制度⁷⁸由来已久。这一点他说得对。我们以前已经说过^②,这种制度是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¹⁷³开始的,随着国债、银行券的采用和荷兰王朝的引进开始的。早在1694年惩治叛乱法¹⁸¹中就曾指出,必须防止

“在皇家军队中买卖军衔这个大祸害”,并且规定,“每个有军衔证书的军官(只

① 奥维狄乌斯《爱的医疗》第91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有军士没有军衔证书)必须发誓:他的军衔证书不是买来的”。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得到贯彻;1702年,掌玺大臣纳·莱特爵士反倒作出了相反的决定。1711年5月1日,女王安的一项命令明确地承认了这个制度。这项命令写道:

“未经国王批准,不得出卖军衔证书,服役未满20年或尚未被认定不宜服役的任何军官都无权出卖军衔证书等等。”

从这种对军衔证书买卖的正式承认到军衔证书市价的正式确定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在1719—1720年第一次规定了市价。军衔证书的价格在1766年、1772年、1773年、1783年都作了调整,而最后在1821年确定了目前这种价格。早在1766年,陆军大臣巴林顿就公布过一封信,信中说:

“买卖军衔证书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这样:怀着最热切的志向来从军并且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色的人一生的军衔都被定得很低,因为他们穷。这些功勋卓著的军官常常受到极大的屈辱,竟受入伍晚得多但出身豪门的恶少们的指挥,这些人有钱,可以在团队外寻欢作乐,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待在营房里替这些绅士们执行任务和苦练自己的本领。”

英国的普通法固然认定,因得到某一公职而给予馈赠或“佣金”是非法的,正像国教会章程中规定把买卖宗教职位¹⁸²的人逐出教门一样。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法律不能决定实践,实践也不能取消同它对立的法律。

最近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给人心浮动、恐慌和不稳定增添了新的成分。我们应当把巴拉腊特(靠近墨尔本)的暴动¹⁸³和席卷维多利亚全省的革命运动区别开来。前者现在大概已经被镇压下去了;后者只有通过彻底的让步才可能平息。前者只是后者的征兆和偶然

的爆发。至于巴拉腊特的暴动,事情不过是这样的:在巴拉腊特金矿区,有一个名叫本特利的人是厄夫里卡旅馆的老板,他同采金人发生过各种冲突。在他的旅馆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这更加剧了人们对他的仇恨。在验尸官检验以后,本特利被认定无罪而释放。但是,在验尸现场行使职责的12位陪审员中,有10位对 coroner(验尸官)企图扣压对被捕者不利的证词的偏袒态度提出抗议。根据居民的要求,进行了第二次检验。尽管根据证词本特利的嫌疑很大,但他又被释放了。这时才弄明白,原来有一个法官跟这个旅馆有经济关系。许多过去的和后来的控告,都说明巴拉腊特地区的政府官员行为可疑。在本特利第二次获释的当天,采金人举行了可怕的示威,放火烧了他的旅馆,然后便撤退了。根据维多利亚省总督查理·霍瑟姆爵士的命令,逮捕了三名祸首。11月27日,采金人代表团要求释放被捕者。霍瑟姆拒绝了这个要求。采金人便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总督从墨尔本调来了警察和军队。结果发生了冲突,有一些人被打死。根据截至12月1日得到的最新消息,采金人举起了独立的旗帜。

这个基本上从一家政府机关报上引用的报道,对英国法官和政府官员也并不有利。它表明了普遍不信任的情绪。维多利亚省的革命运动所围绕的实际上有两大争端。采金人要求废除采金特许证,也就是要求取消直接对劳动所课的税收;其次,他们要求取消对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企图以此把对税收和立法的监督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难看出,这些动因和那些促使合众国宣布独立的动因¹⁸⁴是基本相类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澳大利亚,对立是由工人反抗那些同殖民官僚相勾结的垄断者开始的。在墨尔本《阿尔古斯报》上,我们一方面看到要求改革的大规模集会,另一方面则看到政府的大规模军事准备工作。该报写道:

“在一次有 4 000 人参加的集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特许证税是一个沉重负担,是一种对自由劳动的非法税收,因此会议决定,立即烧毁全部特许证以废除这种税收。假如有人因没有特许证而被捕,人民就要联合起来支持和保护他。”

11 月 30 日,专员里德和约翰逊带着骑兵和警察在巴拉腊特出现了,他们拔出剑和刺刀要采金人出示特许证。采金人举行群众集会,大部分武装起来了,决定全力抗拒征收这种可恨的捐税。他们拒绝交验特许证,声称已经把特许证烧毁了;有人便向他们宣读骚乱取缔令¹⁸⁵,这时,暴动也就真正开始了。

这里只要引证以下事实就足以表明,坐在省立法机关里的垄断者和那些与他们勾结的殖民官僚都干了些什么。这个事实就是:1854 年,维多利亚省的政府开支为 3 564 258 英镑,赤字为 1 085 896 英镑,即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面对目前的危机和普遍的破产,查理·霍瑟姆爵士竟要求 1855 年的开支达到 4 801 292 英镑! 维多利亚总共不过 30 万居民,而要从上述总额中拿出 1 860 830 英镑(每人摊到 6 英镑)用在公共工程方面,即修筑道路、船坞、堤岸、营房、政府建筑物、海关、植物园、官府马厩等等。如按每人 6 英镑这个标准计算,大不列颠居民单是在修建公共工程方面每年就得缴纳 16 800 万英镑,也就是说,比他们所交的全部税款还多两倍。工人居民奋起反对这种过重的税收,是可以理解的。而官僚和垄断者串通一气靠别人出钱来这样大规模搞公共工程,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3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7 日《新奥得
报》第 11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¹⁸⁶

伦敦,3月3日。所有今天出版的日报和周报自然都发表了关于俄国皇帝^①逝世的社论,但是,所有这些社论无一例外全都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泰晤士报》至少企图以100马力的激情把自己的文笔提到帖木儿(跛帖木儿)的高度。我们只举出两个地方,两句对帕麦斯顿勋爵说的恭维话:任命“沙皇的死敌”帕麦斯顿为首相,更加重了对沙皇的过度刺激,加速了他的死亡;在1830—1840年期间(实行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头十年),沙皇放弃了自己的侵略和统治世界的政策。这后一种说法和前一种说法是等值的。

相反,《晨报》与众不同地发现,米哈伊尔是皇帝的长子,因而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¹⁸⁷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在悼词中对英国公众宣称:

“维也纳会议⁴虽然要拖延一些时间,但是将在新的背景下开幕”,“今天午后克拉伦登勋爵将在布洛涅同拿破仑皇帝会晤,届时两国政府将就这个意外的和重要的事件交换意见”。^②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1855年3月3日《晨邮报》第25325号。——编者注

《每日新闻》不相信“意外事件”会导致和平，因为西方列强不会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以前撤军，而俄国也不会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以后撤军。

伦敦，3月6日。尼古拉皇帝的逝世促使这里的报刊登出一些离奇的消息。格兰维尔医生还不如没有做过医疗监护的詹姆斯·李先生高明¹⁸⁸。李在今天的《晨报》上写道：

“2月6日我曾寄给贵报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俄国皇帝，从我发信的日子算起，过不了三个星期就会变成尸首”。^①

《晨报》编辑部在附言中说明，他们的确收到过李的信，但认为这是精神有毛病的人的幻觉，所以把它扔到纸篓里去了。李还更进一步，他提出要在《晨报》上预告另一个君王行将死亡，唯一的条件是他的消息一定要登出来。看来，李的预言比《西维拉占语集》¹⁶⁷还要廉价。

皇帝的逝世也促使作为苏格兰高地居民天生具有预言本领的乌尔卡尔特发表了几句皮蒂娅格言¹⁸⁹，其中最典型和最易懂的就是下面这些话：

“尼古拉和波兰人之间流过血，不能只让波兰人留在后面接受监督，并且要从他们那里得到50万名战士。尼古拉的前辈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大教堂宣布要恢复白色双头鹰——斯拉夫种族联合的象征，在尼古拉一生中未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

① 1855年3月6日《晨报》第19877号。——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关于尼古拉皇帝之死》，载于1855年3月6日《晨报》第19877号。——编者注

可见, 乌尔卡尔特认为, 现在到了俄国变成大斯拉夫帝国的时候, 正像从前莫斯科王国变成俄国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3、6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6、10 日《新奥
得报》第 109、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¹⁹⁰

伦敦,3月6日。今天的《先驱晨报》由于发表了下面的消息而使伦敦感到震惊:

“我们有极其可靠的根据断定,法国皇帝^①曾经对战争情况调查委员会的任命表示抗议,并且声明,如果这个委员会继续工作下去,两国军队就不能再采取一致行动,虽然它们致力于同一目的。因此,为了满足路易·拿破仑,同时又不致触怒英国人民,议会将尽早解散。”^②

我们并没有特别重视《先驱报》的这段话,我们认为这是海峡两岸的秘密势力正在谋求破坏英法联盟的许多征兆之一。

人们不妨回忆一下几位大臣的说明。

现已离职的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调查委员会的压力下,我们的海军上将将被迫说出推迟封锁的一切原因,而且调查会涉及我们同我们强大的盟友之间的关系,而当前最重要的却是避免发生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误会。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英国和法国。议会可能解散》,载于1855年3月6日《先驱晨报》第22372号。——编者注

悉尼·赫伯特：他要求委员会注意问题的实质，同时不要损毁我们在克里木的军队的声誉，尽可能地不要动摇我们盟国的信任。如果委员会中没有委员能够阻止委员会在危险的地方动土，就会发生极不公正的行为，甚至那些被委员会讯问的军官都可能成为牺牲品，因为可能会对他们提出指控而又不准许他们进行辩解，因为要辩解就必须揭露危险的和难以应付的秘密。至于赫伯特本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让不列颠军队的军官处于被告地位，而又被束缚住双手，不能为自己申辩。

格莱斯顿：除了其他事情外，委员会首先应当查明为什么不早一点从巴拉克拉瓦修一条路！如果委员会不调查这个问题，那它就什么事也别干了。如果它调查这个问题，那么答案会是：缺少劳动力。如果它接着问，缺少劳动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答案就会是：人们都在挖堑壕，由于分给法军和英军挖掘的阵地的长度不同，英军需要挖掘的堑壕距离很长。我还要说：如果调查不查明道路问题，那么调查就完全是虚有其名，如果要查明这个问题，那么被告方面的申辩就会直接触动英法之间最深层的关系。

显然，大臣们的这些说明是把已经播下的不信任种子放进温室里促其成长。把在克里木的英国军队的作用贬低为在巴拉克拉瓦执行卫兵勤务，已经严重地触犯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随后，在《通报》上出现一篇半官方文章^①，披露了“皇帝”对英国宪法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遭到了此间周刊的尖锐批驳^②。在这以后，发表了布鲁塞尔《回忆录》¹⁹¹。在这个《回忆录》里，路易·波拿巴一方面被描绘成

① 1855年2月17日《总汇通报》第48号。——编者注

② 《〈总汇通报〉评英国宪法》，载于1855年3月3日《先驱》第258期。
——编者注

克里木远征的倡议人,而同时又被描绘成向奥地利让步的倡议人。对这个回忆录的评论,例如《晨报》所发表的评论^①,其言辞之尖刻,使人想起了评论十二月二日政变¹¹²的《一个英国人的信件》^②。所有这一切在民间刊物中究竟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可以根据宪章派¹⁹²机关报《人民报》的下面一段话来判断:

“波拿巴把英国引诱到克里木……我军既已落入圈套,就被他置于这样的境地:在俄国军队先锋同他自己的军队发生接触前,我军已打垮了它。在阿利马河,在巴拉克拉瓦,在因克尔曼,在塞瓦斯托波尔,英军都被置于危险的阵地上。他们不得不打硬仗,不得不承受最大的损失。根据条约,英国应该派出的兵力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兵力必须参加几乎所有的战斗,这三分之一的兵力必须扼守塞瓦斯托波尔城郊一半以上的阵地。由于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这些物资在巴拉克拉瓦腐烂了),我们的军队被消灭了;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是因为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没有道路,而没有道路是因为拿破仑坚持要占全部兵力三分之一不到的英军完成一半以上的堑壕作业;因此英军不可能拨出人力来修筑道路。格雷厄姆、赫伯特和格莱斯顿所暗示的秘密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拿破仑就蓄意谋害了我们军队的44 000名士兵,等等。”^③

对法国同盟者表示不信任和恼火的所有这些迹象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领导政府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个人每次都利用同法国的联盟作为阶梯向上爬,取得要职,然后又突然把英法联盟颠倒成一场

① 《克里木远征秘史》,载于1855年3月3日《晨报》第19875号。——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1851年12月—1852年11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路易-拿破仑和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文章,1852年这些文章以《一个英国人的信件》为题结集出版。——编者注

③ 厄·琼斯《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堂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第148期。——编者注

几乎不可避免的英法战争。在 1840 年土耳其—叙利亚事件和签订 7 月 15 日公约²⁴时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用该公约结束了同法国的十年联盟。1842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就这一点说过: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废除同法国的联盟——勋爵阁下总是自称为这个联盟而骄傲。”^①

1847 年在同西班牙联姻问题¹⁹³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帕麦斯顿——他在 1846 年之所以能重新取得他的职位,就是因为他参谒了路易-菲力浦,郑重地同他言归于好,并且在下院的一次讲话中奉承了法国人——硬说路易-菲力浦废除了联盟,因为路易-菲力浦破坏了乌得勒支条约¹⁹⁴(这个条约在 1793 年失效,此后未再重新签订),并且因为他对英国王室采取了“背信弃义”的行为。至于谈到背信弃义,那倒是真话,但是,正如后来发表的文件所表明的,是帕麦斯顿为了找到决裂的借口,用最狡诈的方法诱使法国宫廷背信弃义的。狡猾的路易-菲力浦本来指望智胜帕麦斯顿,可是自己却落入了“爱开玩笑的”子爵所精心设置的圈套。只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二月革命¹⁵¹,才阻碍了英法战争的爆发。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6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9 日《新奥得
报》第 11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罗·皮尔《1842 年 8 月 10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2 年伦敦版第 65 卷。——编者注

卡·马克思

调查委员会¹⁹⁵

伦敦,3月7日。借口调查委员会⁷²破坏了同法国的联盟因而即将解散议会的传说,看来已经得到了证实。关于这一点,《晨报》记者指出:

“谁把委员会搞成公开的?是帕麦斯顿勋爵。据说,他存心要解散议会。要求调查并且强制进行调查的罗巴克主张保守秘密。而反对调查但又不得不让步的帕麦斯顿勋爵却赞成公开。起初他迫使委员会选择了一条在我们的国外同盟者看来是最有失体统的办法,然后,这种有失体统的办法就成为首相解散议会、停止调查和对这两者幸灾乐祸的理由。”^①

关于这个问题,《先驱晨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当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占据自己的阵地时,英军派出的兵力多于法军;后来我军溃败,完全是由于在地中海缺乏预备部队和在本土缺乏有组织的民军,由于这些原因,英军没有必要的增援部队。把我们盟国的声誉纠缠到辩论中去的做法是一些绝望了的和没有良心的人用以逃避调查的难以掩盖的策略,他们知道,这种调查必然危及他们未来的政治前途。克拉伦登勋爵通过违宪的途径设法会见法国皇帝^②,其唯一目的就是迫使他发表可以被解释为不赞

① 1855年3月7日《晨报》第19878号。——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同调查委员会的声明或意见。现在,当这一目的达到以后,这些爱国的大臣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解散来威吓议会,并在‘同法国的联盟在危急中!’这个口号下向全国呼吁。”^①

十分明显,如果这个借口有助于英国政府摆脱调查委员会,那么它也同样会使同法国的联盟受到损害,因此就恰好准备下了它口口声声要预防的东西。必须放弃委员会,因为据说它能揭发出“难以应付的和危险的”秘密,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损害,这种论断本身就已经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撤销委员会要比委员会本身更能说明是反对法国同盟者的。何况,只要对英国舆论的潮涨潮落稍有了解就会让人相信,如果人们知道向外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撤销议会的委员会或者解散议会据称都是根据波拿巴的要求干的,那么一遇到机会,他们就会对法国的影响作出强烈的反应以求得平衡。

我们把调查委员会头两次会议的报告中将军德·莱西·伊文思爵士的陈述归纳在一起。在军队从英国出发前不久,曾经派过一位军需官到马耳他岛,他在岛上惊异地发现,连一匹骡子都没有征购到。在斯库塔里,屠宰牲口和烘干粮食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充分做好。当时已经表明,财政部的一些规章制度非常误事。伊文思坚信,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曾抱有一种幻想,似乎用不着放一枪事情就能解决,也就没有必要修建各种各样的仓库。军需部虽然受总司令监督,但是它同财政部(因而同首相)也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军需部的官员一定是被灌输了这样的看法:为打一场真正的战争支付所必需的那么多费用是一种过分的举动。在瓦尔纳,几乎完全没有收容伤兵的地方。显然,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这是一场没有创伤的战争。没有做

^① 1855年3月7日《先驱晨报》第22373号。 编者注

好准备使军队能够立即投入战斗。当俄军越过多瑙河时,奥美尔帕沙¹¹曾经向英军求援,得到的答复是,军队没有必要的运输工具,这本来早就应当准备好。政府总是在等待着维也纳的照会和议定书,而没有作很大的努力使军队做好开拔的准备。当然,要对这种拖拉行为负责的是政府,而不是军需部。俄军已经开始围攻锡利斯特里亚,而英军却仍然没有做好出动的准备。军队的粮食供应由军需部和补给部两个主管部门负责。同军需部发生冲突是常见的现象。军需部的官员也许可以成为财政部的好文书。事实上他们经常忙于给财政部写公文。在战地他们根本没有用处。甚至在距离瓦尔纳 18 英里的地方,得到粮食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在那儿,军需部的人员太少了,它不得不派出 100 名军士去担任军需勤务。驻瓦尔纳部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由于部队令人难受的长期无所作为造成的压抑情绪所致。

在谈到驻克里木的部队的状况时,德·莱西·伊文思部分地重复了大家所知道的事实——缺乏粮食、被服和木板房等等。现在我们只举出他叙述的如下一段细节:

“在进军比利牛斯²⁷期间就已领导军需部,现在是总补给官的年迈的非尔德,从来没有和他(伊文思)商量过有关他的师的需要问题,这本是他应当做的事情;他(伊文思)曾要求他这样做,但是非尔德拒绝这样做,非尔德虽然是拉格伦的属下,但同时与财政部有直接的公文来往。”“使用炮兵和骑兵的马匹来运送粮草是极不妥当的。结果是他(伊文思)的火炮最近只有半数配备了马匹。”“从巴拉克拉瓦港到兵营的道路泥泞不堪。本来 1 000 人干上 10 天就能修通这条道路,但是他认为,可以节省下来的人力都派去挖堑壕了。”^①

① 乔·德·莱·伊文思《向调查克里木英军状况的委员会所作的陈述》,载于 1855 年 3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1994 号。——编者注

最后,伊文思谈了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减员的情况:

“我深信,如果部队不是由于挖堑壕而疲劳过度,那么被服、粮食和燃料的供应不足,是不会造成军队中惊人的死亡和生病现象的。事实表明,把士兵搞得筋疲力尽是极其有害的。士兵的人数一开始就根本不足以应付指派给他们的那种劳动。夜间过分劳累,无疑是军队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10 日《新奥得
报》第 11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乔·德·莱·伊文思《向调查克里木英军状况的委员会所作的陈述》,载于 1855 年 3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1995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布鲁塞尔回忆录¹⁹⁵

伦敦,3月7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今天刊登了著名的布鲁塞尔《回忆录》的英译文,并加了简短的按语。在按语中推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拿破仑亲王。这家报纸同时还刊登了一篇社论,通篇都是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恶毒攻击,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论点:《回忆录》¹⁹¹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俄国奸细”。

《晨邮报》借口保护路易·波拿巴使其免受他的堂弟的陷害和保持对纯洁无瑕的阿希尔·勒鲁瓦,也就是弗洛里蒙或德·圣阿尔诺的怀念,显然只是要为英法之间的矛盾收集资料。圣阿尔诺是法国历代常见的属冒险家之列的圣者,例如圣热尔曼、圣乔治等等当中的一个。《晨邮报》的功绩就是追封圣者,把他们变成与其身份相当的圣人。说什么《回忆录》向俄国人泄露了“军事”秘密,这种论断无聊至极。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和德国的评论家都早在《回忆录》出版前就已说明,克里木远征是一种失策。虽然《回忆录》的功绩是不客气地描绘了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发号施令的庸碌之辈的群像,但是《回忆录》并没有为迄今为止的那些评论添加一个字。对克里木远征依然抱有幻想只对俄国人有利,《晨邮报》谈到俄国的代理人和奸细时所表现出的激情使人想起了埃斯基涅斯。此人一方面指责狄

摩西尼受了菲力浦的收买,同时又吹嘘自己最先识破了马其顿国王^①的计谋。当然我们并不是把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当成狄摩西尼。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11 日《新奥得
报》第 11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菲力浦二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复仇¹⁹⁶

伦敦,3月13日。爱尔兰向英国报了仇:在社会方面,爱尔兰使得英国每一个较大的工业城市、海港城市和商业城市中都有了爱尔兰人区;在政治方面,爱尔兰使得英国议会中有了“爱尔兰旅”⁹⁰。1833年,丹尼尔·奥康奈尔痛斥辉格党⁷⁰人,说他们“下流、残忍和野蛮”。但到1835年,他却变成了辉格党人的最得力的工具,墨尔本政府尽管遭到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还是靠着奥康奈尔和他的爱尔兰旅的支持,从1835年4月维持到1841年8月。1833年的奥康奈尔和1835年的奥康奈尔为什么这样不同呢?原来有了一个所谓“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¹⁹⁷。根据这个协定,辉格党内阁向奥康奈尔保证爱尔兰得到政府的“保护”,而奥康奈尔则保证爱尔兰旅在议会中投辉格党内阁的票。辉格党刚一下台,这位“丹王”^①就开始了取消合并的鼓动¹⁹⁸,但当托利党⁷³遭到失败的时候,“丹王”就又变成一名普通的律师了。奥康奈尔去世后,爱尔兰旅丝毫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影响。相反,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并不是某个人的天才造成的,而是时势的力量造成的。英国议会中的传统大党——托利党和

① 丹·奥康奈尔。——编者注

辉格党——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在改革后的议会里占有议席的新兴的小派别——曼彻斯特学派³⁷和爱尔兰旅——必然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议会中的“爱尔兰人区”的重要性就是由此产生的。奥康奈尔去世后,已经不能用脱离英国的“取消合并”的口号来发动爱尔兰群众了。“天主教”问题¹⁷¹也只能偶尔利用一下。自天主教徒解放以后,这个问题已不再是鼓动的固定主题了。因此,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就必须干奥康奈尔始终回避和拒绝的事情,去触及爱尔兰的祸根,把地产关系和改革这种关系作为竞选口号,即作为能帮助他们被选入议会的口号。他们一进入议会,就立即利用租佃者的权利等等(像从前利用取消合并一样),来缔结新的“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

爱尔兰旅推翻了德比内阁⁸⁶。它在联合内阁里谋得了一个职位,虽然是一个从属的职位。它利用这个职位干什么了?它帮助联合内阁“扼杀”了改革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措施,这些措施本来是托利党信赖爱尔兰旅的爱国精神并想把它争取过来而决定自己提出的。帕麦斯顿作为一个在爱尔兰出生的人,深知自己的“爱尔兰人区”,因而主动地恢复了1835年的“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并尽量扩大其适用范围。他任命爱尔兰旅的首领基奥为爱尔兰的检察总长,任命同样代表爱尔兰的天主教自由派议员菲茨杰拉德为副检察长,任命爱尔兰旅的另一成员^①为爱尔兰总督的法律顾问;这样一来,爱尔兰政府的整个司法总部现在就成了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的天下。原来联合内阁的军械局秘书蒙塞尔,虽然像芒茨(伯明翰选出的议员、军火制造商)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连滑膛枪和针发枪也分辨不清,可是帕麦

① 乔·威·弗·霍华德。——编者注

斯顿在稍经犹豫之后,仍然重新起用了他。帕麦斯顿指示各郡副郡长,在任命爱尔兰民军中的上校职位和其他高级职位时,一律优先考虑与议会内的爱尔兰旅有联系的爱尔兰僧侣所保护的人。高级律师希氏倒向内阁表明,帕麦斯顿的政策已经起了作用。此外,这还表现在阿斯隆的天主教主教使得基奥重新当选和天主教僧侣也帮助菲茨杰拉德重新当选。不论在哪个地方,只要天主教下层僧侣把“爱尔兰的爱国精神”真当一回事并反对倒向政府一边的爱尔兰旅成员,这些下层僧侣就要受到知悉外交秘密的主教们的申斥。一家新教派的托利党报纸悲戚地感叹道:

“帕麦斯顿勋爵与爱尔兰僧侣之间有着充分的谅解。如果帕麦斯顿把爱尔兰交给神父,这些神父所选出的议员就会把英国交给帕麦斯顿勋爵。”^①

爱尔兰旅为辉格党控制英国议会服务;辉格党赏赐给爱尔兰旅职位和薪俸;天主教僧侣则允许一方收买和另一方出卖,条件是,他们的势力得到双方承认,并得到巩固和扩大。然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社会势力在削弱。看来,议会中的“爱尔兰人区”和爱尔兰僧侣都同样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背后,一场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正使爱尔兰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革命就是爱尔兰的农业制度正在让位于英国的农业制度,小租佃制度正在让位于大租佃制度,同样,旧土地所有者让位于现代资本家。

为这一变革做好准备的主要因素是:1847年的饥荒¹⁹⁹,饥荒中大约饿死了100万爱尔兰人;向美洲和澳洲的移民,移民又把100万人从土地上席卷而去,而且还在继续把成千上万的人带走;遭到失败

^① 1855年3月13日《先驱晨报》第22378号。——编者注

的 1848 年起义²⁰⁰, 结果使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信也丧失了; 最后是议会法令⁹², 这个法令迫使负债的爱尔兰旧贵族拍卖地产, 把这些贵族从土地上赶走了, 正如饥谨把这些贵族的小佃农、转佃农和雇农从土地上赶走了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13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16 日《新奥得
报》第 12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战果²⁰¹

由于官方的无能和民族的自负^①而产生的对克里木战事的幻想,现在开始随冬季这几个月覆盖战场的积雪一同消失了。拿破仑·波拿巴最近的小册子¹⁹¹明确提到:正当在克里木诸事不利的时候,两位总司令^②

“肯定是奉政府指示掩饰和隐瞒妨碍他们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困难”。

这种假设完全为这两位总司令的报告,尤其是被他们不止一次特意拐弯抹角地从兵营里送来的预定某日强攻的报告所证实了。大家记得,自去年11月5日到今年3月初,欧洲的公众一直等待着最后的大戏。虽然这场戏不断地往后推,但每次延期都说只是很短时间,公众的好奇心与日俱增。然而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长期的围攻终于在兵营内造成了以有见识的军官们公开发表的意见为根据的某种舆论,总

①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克里木事件》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19日《新奥得报》第131号。在《克里木事件》中,从开头到这里的文字被修改为:“由于官方的无能、英国内阁的阴谋和自私的波拿巴主义”。——编者注

② 菲·詹·拉格伦和弗·康罗贝尔。——编者注

司令部的先生们虽然身居要职,喜欢故弄玄虚,但再也不能在兵营里散布将于某日进行强攻和城市将被攻占的谣言了。^① 现在每一个普通士兵都已知道这一点。防御工事的性质,敌人火力的优势,围攻部队的兵力与它所担负的任务的不相称,特别是北炮台的决定意义,——这些此时此刻已是众所周知,如此荒谬的谎言再重复已无人肯信。^②

据称,在2月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58 000名法军,1万名英军和1万名土军,共约8万人。这与我们在不同时期的估计完全吻合。^③ 但是即使联军有9万人,也未必能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坚持围攻,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进攻巴赫奇萨赖的俄军。因为联军能调往巴赫奇萨赖的野战部队不会超过4万人,而俄军却至少能以6万人在开阔的原野和他们对抗。在那里,不像在因克尔曼和巴拉克拉瓦之间一样具有有阵地可依的优势;而且在那里,由于俄军在巴拉克拉瓦和因克尔曼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联军不能有效地展开机动,因此在士气上的优势势必受到一定的影响。^④ 这样一来,联军将继续被困于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直到他们

① “这种假设完全为这两位总司令的报告……城市将被攻占的谣言了”这段话在《克里木事件》中被修改为：“这完全为这两位总司令的报告，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散布的预定某日强攻的谣言所证实了。自去年11月5日到今年3月初，海峡两岸的公众一直等待着最后的大戏。同时，长期的围攻在兵营内也造成了以有见识的军官们公开发表的意见为根据的某种舆论，总司令部的先生们已经再也不能散布将于某日进行强攻和城市将被攻占的谣言了。”——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事件》中，后面还增加了如下文字：“我们曾有机会读到英国军官的信件，他们对于这种情况是丝毫也不怀疑的。”——编者注

③ 在《克里木事件》中删除了这句话。——编者注

④ 在《克里木事件》中，“在那里……受到一定影响”这句话被修改为：“联军不会像在因克尔曼和巴拉克拉瓦之间时那样，两翼都有无法攻击的阵地。”——编者注

能够以大约 10 万军队渡过黑河时为止；而这正是他们所陷入的那种恶性循环：投入这个染有病菌的捕鼠器的部队越多，因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而从那里安然脱身的唯一办法，却是往那里派遣尽可能多的部队。

联军想出的另一个摆脱困境的计策，是土军向叶夫帕托里亚远征²⁰²，而现在看来，这却是原先在克里木所犯错误的直接翻版。在叶夫帕托里亚登陆的土军兵力过于薄弱，不能向腹地推进。看来，这个据点周围的工事分布甚广，需要 2 万多人的部队防守。从有关 2 月 17 日叶夫帕托里亚“会战”的报告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集结在那里的 4 万人中，至少有一半实际上参加了这次防御战。^① 另外，以容纳 4 万人为设计目标的防御营垒也一定相当大，以致当敌人来袭击时，需要大约以半数的军队积极迎战。这样一来，城市本身的防御大致需要 2 万人，而只剩下 2 万人可以进行野战。但就是这 2 万人，也只敢离开叶夫帕托里亚几英里，否则就会遭到俄军从两翼和背后的各种袭击，甚至与城市的联系也有被俄军切断的危险。而俄军却能够向彼列科普和辛菲罗波尔这两个方向退却，而且由于是在本国领土上，随时都能避免同来自叶夫帕托里亚方向的 2 万土军进行任何决战。

因此，部署在距这个城市一日行程的 1 万俄军，就足以钳制集中在城内的 4 万土军。如果俄军再后退 10—12 英里，那么不管敢于离开自己作战基地前进同样距离的土军数量有多少，俄军都能与之较量。^② 换句话说，叶夫帕托里亚是第二个卡拉法特¹²，所不同的只是，卡拉法特背后是多瑙河而不是黑海；卡拉法特是防御阵地，而叶

① 在《克里木事件》中，删除了“从有关 2 月 17 日……参加了这次防御战”这句话。——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事件》中，这句话被修改为：“俄军每后退 10—12 英里，敢于离开作战基地到更远的地方活动的土军人数将相应减少。”——编者注

夫帕托里亚是进攻阵地。如果说在卡拉法特的3万人能成功地进行防御,并且能不时同样成功地进行一定距离的出击,那么用叶夫帕托里亚的4万人来防守这个由1000名左右的英法联军扼守了五个月之久的地点就嫌太多,而用来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则又嫌太少。结果是,俄军一个旅或者至多一个师,就足以钳制叶夫帕托里亚的全部土军。

所谓叶夫帕托里亚会战,就俄军方面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侦察行动。约有25000—30000人的一支俄军部队,自唯一易于攻击的西北面接近叶夫帕托里亚,因为该城南面有海掩护,东面有多沼泽地的萨瑟克内陆湖掩护。城市西北是岗峦起伏的低矮平原,根据地图和这次战斗的经验来判断,它并不瞰制在野炮有效射程以内的城市。俄军比守军少1万人,并且两翼特别是右翼处在海湾中军舰炮火²⁰³的威胁之下,决不会真正企图以强攻夺取这座城市。因此,俄军只限于进行积极的侦察。他们在不会造成严重损失的距离上进行了全线炮击;然后使炮队逐渐前移,并把纵队尽可能地留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以外;接着把纵队也向前推进,做成攻击的样子,以迫使土军暴露自己的兵力,随后以一块教堂墓地的石碑和树木作掩护在能接近防御工事的地点进行了攻击。在弄清土军工事的分布情况及其防御力量以及守军的概略人数以后,他们就撤退了,而其他任何一支指挥得当的军队也都会这样做。俄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于他们的损失比土军大,这是事先就料到的。这件极平凡的事却被联军司令官们夸大为辉煌的胜利。如果他们企图以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方式欺骗公众,那么他们一定非常需要拿点什么来夸耀。^①

^① 在《克里木事件》中,这句话被修改为:“难道这不正好说明了联军非常需要真正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又太少这一事实吗?”——编者注

俄军让联军占据叶夫帕托里亚达五个月,直到土军到来,这是无可争辩的重大失策。俄军只要用一个旅和必要数量的十二磅炮就足以把联军赶到海里;而在海滩上构筑一些简单的土堡,就甚至可以把军舰阻挡于相当远的距离以外。如果联军舰队向叶夫帕托里亚派遣一支能够制胜的分舰队,那么俄军就可以烧光这个地方,使它以后完全不能用做登陆部队的作战基地。但是在目前形势下,俄军只会乐于让叶夫帕托里亚留在联军手中。4万土军——土耳其拥有的唯一值得重视的军队的最后残余——被封锁在狭窄的营垒中,俄军用1万兵力就可以把他们钳制在那里,而且土军还遭受到人群密集造成的一切疾病和痛苦;这4万动弹不得的土军,使联军的进攻兵力打了不少的折扣。

法军和英军在损失5万—6万人之后^①仍被困在赫拉克利亚半岛,土军被困在叶夫帕托里亚,而俄军却与塞瓦斯托波尔北区和南区保持着顺畅的联络,这个城市的防御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固得多^②——这就是克里木五个月试验的辉煌结果。^③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3月
14日前后

载于1855年4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
- ① 在《克里木事件》中删除了“在损失5万—6万人之后”这句话。——编者注
- ② 在《克里木事件》中删除了“这个城市的防御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固得多”这句话。——编者注
- ③ 在《克里木事件》中最后还有一句话：“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次通讯中分析。”——编者注

弗·恩格斯

大冒险家的命运²⁰⁴

前两天我们登出了从拿破仑亲王不久前发表的小册子¹⁹¹中摘录下来的几段有趣的话,读者想必已经给予了应有的注意。^①这本小册子揭露了一个令人惊异而且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波拿巴本人的首创,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详尽的远征计划,为了避免瓦扬元帅的反对,他把计划亲笔写下来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所犯的最明显的军事错误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首创者的王朝需要中找到了解释。在瓦尔纳军事会议^②上,远征克里木的计划不得不由圣阿尔诺通过直接求助于“皇帝”的权威强加给到会的陆海军将领,这位皇帝却转而把所有相反的意见公开斥为“怯懦之见”。一到克里木,拉格伦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军的真正的怯懦之见却被圣阿尔诺积极采纳了,因为实现这个建议,即使不能直接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至少也逼近了它的大门。没有充足的装备却狂热地强行围攻;迫不及待地开

① 本文开头这句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马克思《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17—323页。——编者注

火,因而使法军如此忽视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他们的炮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敌人打哑了;士兵在堑壕里长时间过度疲劳,现已证明,这是导致英军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盲目和无效的炮击^①;忽视各种防御工事,甚至忘记牢固地占领通往黑河的山脊地带,结果在巴拉克拉瓦¹⁰和因克尔曼¹⁵遭到了损失——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再清楚不过的解释。波拿巴王朝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攻下,联军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贝尔^②如果成功,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他想当什么都行,同时享有在财政方面“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如果失败,他就要成为皇帝的叛徒,并将像他过去的老朋友拉莫里谢尔、贝多、尚加尔涅一样被流放。拉格伦简直是个老太婆,竟屈从于他的自私的同僚。

然而以上这些不过是皇帝的这个作战计划必然造成的后果中最次要的方面。法军已将9个师,即81个营投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无谓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们现在从可靠的材料得悉,法军的堑壕距离俄军工事仍然有整整400码远,而英军的堑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视察围攻作业的尼埃尔将军声称,强攻是根本谈不上的;他把主要的攻击点从法军方面转移到英军方面,这样一来,不仅推迟了围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一个郊区,而这个地方即使打下来,它与城区之间仍被南湾隔开。简单地说,制定一个个计

① 恩格斯《克里木战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66—669页。——编者注

② 远征克里木的英法联军中法军的总司令原为阿·圣阿尔诺。1853年9月圣阿尔诺死于军中,总司令由弗·康罗贝尔接任。——编者注

划,玩弄一个个花招,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了装出还有胜利希望的样子而已。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在目前航行季节内必须取得成功,因此必须配备比1854年多得多的登陆部队)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路易·波拿巴却出于自己的固执又把五个步兵师投入了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士兵们一个一个不见了,甚至整个整个的团没有了,就像被魔法变没了一样!而且好像这还不够,他还决定亲自到那里去²⁰⁵,亲眼看着他的士兵们进行最后的强攻。

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的第一次战略试验使法国所陷入的处境。这个人,凭着某种理由,自以为肯定会成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堪与他那个王朝的创始人^①媲美的伟大统帅,其实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不过是个狂傲的无能之辈。他根据非常有限的情报,在远离克里木大约3000英里之外拟定远征计划,而且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制定得很详细,并秘密地将计划发给他的总司令^②。而总司令虽身在距离进攻点仅数百英里之处,但是对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遇到敌人多少兵力的抵抗,竟也同样一无所知。远征开始了,灾难接踵而来,甚至打了胜仗倒不如没打胜仗;得到的唯一结果是远征军本身的折损。拿破仑在他全盛时期决不会坚持这样干下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想出新的办法,出其不意地将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点,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使暂时的失败本身看起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如果他在阿斯珀恩²⁰⁶抵抗到底,那结果会怎样呢?只是在他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阿·圣阿尔诺。——编者注

没落的时期,当1812年的惨败动摇了他的自信心之后,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例如,在莱比锡²⁰⁷他就是死守那些凭他的军事判断力本该判明是完全无用的阵地。然而,两位皇帝之间的差别恰恰就在这里:拿破仑以此告终,路易·波拿巴却以此开始。

路易·波拿巴很有可能铁了心要前往克里木,要亲自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他可以推迟行期,但是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的决心,除非是签订和约。作为他第一次军事行动的这次远征,实在是他个人命运之所系。但是可以认为,他真正出发的那一天,将是法国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的开始。欧洲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都劝他放弃此行。在提到他的克里木之行的时候,法国资产阶级都不禁发抖。但是这位斯特拉斯堡的英雄²⁰⁸是百折不挠的。他一生就是个赌徒,近来又成了惯于下巨注的大赌徒,他正在凭着自己的“福星”,无视形势之险恶而孤注一掷。此外,他很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把他留在巴黎以求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是空想。不论他在不在巴黎,将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堑壕里决定的是法兰西帝国的命运,也就是现行社会制度的命运。如果他出乎意料地在克里木获得成功,那么凭借亲临战场这一招他就将迈过拦路的强盗和英雄之间的界限,至少在欧洲舆论界面前是如此;如不成功,则他的帝国无论怎样也要灭亡。他把他的竞争者和假定继承人,身穿中将制服的小日罗姆·波拿巴带在身边,这就说明他估计到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次克里木远征目前对奥地利最为有利。如果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斗争再持续几个月,那么这个把法俄两国的兵力一个军又一个军地吞掉的泥潭,一定会使奥地利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者,它在欧洲大陆的60万名荷枪待命的士兵是一支坚实的庞大力量,举足轻重,足以左右局势,然而幸好还有一个能抵消奥地利的这种优势地位的

因素。一旦法国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支奥地利军队就将分解为它的互不协调的各种成分。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都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欧洲将没有今天那些危机四伏的胡乱拼凑起来的联盟和各种敌对关系,而是分为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阵营。那时将只存在着以民主革命为一方和以君主反革命为另一方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14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5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²⁰⁴

伦敦,3月17日。小日罗姆·波拿巴的小册子¹⁹¹披露了以下事实: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拿破仑的首创,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详尽的远征计划,为了避免瓦扬元帅的反对,他把计划亲笔写下来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所犯的最明显的军事错误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首创者的王朝需要中找到了解释。在瓦尔纳军事会议^①上,远征克里木的计划不得不由圣阿尔诺通过直接求助于“皇帝”的权威强加给到会的陆海军将领,而这位皇帝却把相反的意见公开斥为“怯懦之见”。一到克里木,拉格伦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军的真正的“怯懦之见”却被圣阿尔诺积极采纳了,因为实现这个建议,即使不能直接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至少也逼近了它的大门。没有充足的装备却狂热地强行围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军如此忽视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他们的炮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敌人打哑了;士兵在堑壕里过度疲劳,现已证明,这同军需部门、运输部门、医务部门等等一样是导致英军崩溃的重要

^① 马克思《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17—323页。——编者注

原因；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盲目和无效的炮击^①；忽视各种防御工事——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攻下，联军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贝尔如果成功，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他想当什么都行，同时享有财政方面的无限权力。如果失败，那就是他的官运的终结。拉格伦简直是个老太婆，竟屈从于他的自私的同僚。

然而这不是皇帝的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结果。法军已将9个师，即81个营投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几乎被认为是毫无希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无谓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们现在从可靠的材料得悉，法军的堑壕距离俄军工事仍然有整整400码远，而英军的堑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视察围攻作业的尼埃尔将军声称，强攻是根本谈不上的；他把主要的攻击点从法军方面转移到英军方面，这样一来，不仅推迟了围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一个郊区，而这个地方即使打下来，它与城区之间仍被南湾隔开。简单地说，制定一个个计划，玩弄一个个花招，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了装出还有胜利希望的样子而已。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军（这支远征军这次必须取得成功，因此必须配备比1854年多得多的登陆部队）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又把五个步兵师投入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士兵们一个一个不见了，整个整个的团没有了，就像被魔法变没了一样。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那里去，要不是签订和约的可能性

① 恩格斯《克里木战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66—669页。——编者注

极小或者波兰边界的严重事件迫使他改变决定的话,他就一定会到那里去。这就是波拿巴的第一次战略试验使他本人在“皇帝的”法国所陷入的处境。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他的固执,还有他那种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命运要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堑壕里来决定的不祥的直觉。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马伦戈²⁰⁹能证明雾月十八日的再版²¹⁰是正当的。

复辟的帝国不管怎样战战兢兢地模仿自己的原型,还是不得不到处做和拿破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这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拿破仑攻击同他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心脏,今天的法国攻击俄国偏僻的地方。目标不是放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面,而是放在侥幸的突袭、奇袭和冒险上面。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及各自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整个差别就在于这种不同的意图。拿破仑惯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现代欧洲各国的首都。而他的继承者则以各种借口——保护教皇^①、保护苏丹^②、保护希腊国王^③——把法国的守备部队分驻在古代欧洲各国的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结果并没有增强实力,而只是分散了力量。拿破仑的高招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高招却在于分散。当拿破仑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²¹¹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把自己的绝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在对奥战争中是斯特拉斯堡—维也纳一线),而把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战场上(意大利);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战线上的胜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反之,他的继承者却把法国的兵力分散在许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取得任何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③ 奥托一世。 编者注

最小的胜利都要付出最大的牺牲。除了在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克里木的军队以外,还得向奥地利接近波兰的边境派遣一支辅助部队,向波罗的海派遣另一支辅助部队。这样,法国军队起码要在三个彼此相距最少也有1 000英里的战场上作战。按照这个计划,法国的兵力还在欧洲战争真正打起来以前,就几乎全部使用上了。当拿破仑认识到他已经开始的行动不合理时(例如在阿斯珀恩²⁰⁶),他并不坚持这一行动,而总是想出新的办法,出其不意地将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点,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使暂时的失败本身看起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只是在他没落的时期,当1812年动摇了他的自信心之后,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使得他死守那些根据他的军事判断力本该放弃的阵地(例如在莱比锡²⁰⁷)。可是先辈以此告终,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以此开始。在一个人那里是无法解释的失败的结果,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则是无法解释的幸运的结果。在一个人那里,他所信赖的福星是他自己的天才,在另一个人那里,对福星的信赖必然代替天才。一个人战胜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他是能够实现这场革命的唯一人物;另一个人则战胜了重新唤起的对过去革命时代的回忆,因为他承袭了这个唯一人物的名字,因而他本身就是一种回忆。不难证明,第二帝国作战方法上的这种自命不凡和平庸还反映在它的内部管理中,在这方面也是外观代替了实质,“经济的”征讨决不比军事的征讨更有成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3月16—17日

载于1855年3月20日《新奥得报》第13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²¹²

伦敦, 3月19日。为了说明这里报刊反普鲁士的情绪, 我们引证两段摘录——一段摘自托利党⁷³的机关报《先驱晨报》, 另一段摘自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先驱晨报》在引证刚被任命为海军副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他的朴次茅斯选民发表的演说时指出:

“罗伯特·皮尔爵士要求说, 必须迫使普鲁士采取明确的政策, 否则我们第二次远征波罗的海就会像第一次远征那样劳而无功, 他这样说完全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感情。我们的议定书够多了, 条款⁷³也够多了; 是切断俄国的物资来源, 引发俄国内部的反应的时候了。”^①

《晨邮报》收到了下面一篇关于韦德尔将军的使命的巴黎通讯:

“韦德尔将军把他接到的指示通知了拿破仑内阁。这些指示是什么呢? 韦德尔将军告诉法国政府:(1)普鲁士国王陛下^②对他的内弟——俄皇^③之死深感悲痛;(2)关于12月28日的议定书, 普鲁士同西方大国的意见完全一致, 并

① 1855年3月19日《先驱晨报》第22383号。——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准备按任何正式的形式签字,因此普鲁士应在维也纳磋商⁴中占有席位。然而全部问题在于:12月28日的议定书并没有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它其实不过是一份外交上的历史文件的草稿而已。由于普鲁士拒绝在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正式的联盟条约上签字,韦德尔将军的使命可以看做是结束了。”^①

大家知道,提尔和迦太基的统治者们为了让诸神息怒,不是牺牲自己,而是收买穷人家的孩子,把他们扔到摩洛赫炽热的怀抱里。英国官方规定人民要顺从上帝,要斋戒,要忏悔——为前任政府的管理不善给他们带来的耻辱忏悔,为政府从他们身上白白榨取的数百万英镑,为政府昧着良心夺去他们数千条生命而忏悔。须知,枢密院已规定下星期三^②为忏悔和祈祷日,

“以便求得对我们的罪孽的宽恕,用最恭顺和虔诚的方式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和恳求,请赐福我们,保佑我们的士兵,给女王和她的国家恢复和平”。^③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像在举行宫廷仪式时的宫务大臣一样,还为这种宗教仪式颁布了一套“规则”,其中规定了应怎样称呼万能的上帝。在英国国教会和也祈求上帝保佑自己的士兵的俄国国教会之间的这场不寻常的竞争中,优势显然是在后者。《先驱》指出:

“沙皇的臣民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规定的祈祷文,会感到这是胆小鬼的祈祷文;英国人读了它,会感到这是伪君子的祈祷文;非国教徒²¹³读了它,会感到这是想操纵其他所有教派的某一个教派的祈祷文;而工人读了它,会感到它是同属于这一教派的有钱人的祈祷文,这些有钱人搞这种伪善的仪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仪式能间接地帮助他们保留对高官厚禄的垄断。大主教的伪善的喋喋不休引起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愤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斋戒日和顺从

① 1855年3月19日《晨邮报》第25338号。——编者注

② 1855年3月21日。——编者注

③ 1855年3月17日《先驱》第260期。——编者注

日是一种现实的东西。对于所有其他的信仰(穷人的信仰除外)来说,这一天不过是意味着在平日的吃喝中加上鸡蛋和鱼汤,并且像星期日那样关门歇业。而对于工人来说,斋戒日意味着丢掉工资,因而也就意味着丢掉吃喝。”^①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我们曾指出:“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必将重新开始。”^②

上星期五^③在伦敦饭店举行的大会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明显的证明。在报道这次大会之前,我们先提供一些关于最近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议会内外所发生的小冲突的材料。就在不久以前,曼彻斯特的厂主们举行了几次会议,决定开展取消官方的“工厂视察员”的宣传鼓动,因为这些视察员不仅敢于对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的情况进行监督,而且甚至要求在工厂里切实落实议会为防止机器给工人的人身造成伤害所规定的种种措施。南兰开夏郡的工厂视察员,著名的伦纳德·霍纳由于在最近一次报告中坚持在纺纱厂执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而引起了厂主们对他的强烈不满。一位工厂主——当然是和平协会³⁴的会员——很无辜地宣布,由于忽略这项措施,“去年只使五个成年工人丧了命”。

议会外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下院内,亨利·哈尔福德爵士提出的宣布“扣除工资”为非法的法案在二读时被否决了。“扣除工资”就是从名义工资中扣款,所扣的款有的是因违反雇主自行规定的工厂制度而处的罚金,有的是在还没有实行现代制度的工业部门中扣除工人租赁织布机或其他机器的租金等等。

① 1855年3月17日《先驱》第260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0页。——编者注

③ 1855年3月16日。——编者注

上述制度特别盛行于诺丁汉的织袜厂。亨利·哈尔福德爵士已经证实,这个地方的工人在许多情况下不但不能从企业主那里领到工资,反而要倒付钱给企业主。这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名义工资中扣的款太多了,以致工人还得偿付资本家记在账面上的欠款。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了雇主的债务人,不得不在越来越不利的条件下同雇主续订合同,直到工人完全变成农奴,但是还不如农奴,农奴至少还能得到维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

如果说亨利·哈尔福德爵士要求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法案在下院二读时被否决,那么,对于英国杂文大家^①的儿子科贝特的法案,下院则根本不予理睬。这个法案所要达到的目的是:(1)以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²¹⁴代替1850年的十小时半工作日法²¹⁵; (2)以每天在法定的工作日结束后强制停歇机器的办法来“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对工厂劳动时间的限制。

明天我们再来谈谈伦敦饭店集会的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
19日

载于1855年3月22日《新奥得
报》第13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威·科贝特。——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的消息²¹⁶

伦敦,3月20日。纽卡斯尔公爵发布了召回卢肯勋爵的命令,潘缪尔勋爵公开了拉格伦反对卢肯的信件,而哈丁勋爵这位非凡的英军元帅则拒绝卢肯所要求的调查和军事审判。卢肯勋爵不顾两个部的反对,不顾克里木的总司令和伦敦的总司令的反对,昨天在上院详细地说明,要对巴拉克拉瓦¹⁰城郊轻骑兵覆灭负责的不是他,而是拉格伦自己;阿伯丁内阁和帕麦斯顿内阁为了拯救克里木的这位顺从、笨拙和容易驾驭的总司令而把卢肯勋爵作为替罪羊抛给愤懑的公众。公众这个庞然大物的胃口必须予以满足。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卡思卡特将军尸体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寄给他妻子的,写信的日期是11月2日,即因克尔曼会战¹⁵前三天,骑兵在巴拉克拉瓦城郊发起攻击后的一星期。这封信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论是卢肯勋爵,或是卡迪根勋爵,都不应受到谴责,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是服从命令。”^①

《泰晤士报》在今天的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⁴的报道中提出了下

① 1855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006号。——编者注

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意见：如果会议能认真进行，那么主要障碍预计来自土耳其方面。必须逼迫苏丹^①，而不是逼迫沙皇^②在四项条款³范围内作出重大让步。

前天《泰晤士报》又一次以下列“可靠”消息蒙骗读者：3月19日以前确实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最后的强攻。从令人绝望的悲观到盲目的乐观这种突然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泰晤士报》开始对已被推翻的联合内阁进行克里木远征并“一再重复”^③：调查委员会⁷²是必要的，恰好是在格莱斯顿建议废除印花税和把邮资是一便士的报纸的重量限制在四盎司（比一份《泰晤士报》的重量还轻），从而威胁到《泰晤士报》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格莱斯顿刚被推翻，他的继任人乔·康·刘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这时《泰晤士报》希望他能让一切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悲观看法，而换上了一幅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动人图景，就连它三个月以前还为之致悼词的那支军队也在这时活跃起来。今天《泰晤士报》的看法又变得忧郁了，因为昨天乔·康·刘易斯爵士出乎意料地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¹⁰¹。《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怀旧的评论家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刘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评论》的发行人。

一旦这个法案的详文提交下院，我们再谈；而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这个法案是对曼彻斯特学派³⁷的让步，这个学派的功绩就是孜孜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③ 原文为“ceterum censeo”，本义：“此外我认为”，本是老卡托在公元前157年之后每次在元老院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此外我认为必须消灭迦太基”的头两个词，转义：“一再重复”。——编者注

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自由竞争。帕麦斯顿内阁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企图博得好感,以防解散下院和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3 日《新奥得
报》第 13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²¹⁶

伦敦,3月20日。《晨报》几个月来忙于组织一个名叫“国民和立宪协会”的鼓动团体,其宗旨是推翻寡头政治制度。经过许多准备工作、呼吁、征集签名等等,终于上星期五在伦敦饭店召开了一次公开的大会。于是这一天就成了被大肆宣扬的新协会的誕生日。在集会开始以前,大厅早已挤满了工人,当那些自己把自己选出来的新运动的领袖终于来到时,他们好容易才在讲台上找到位子。被指定为主席的詹姆斯·泰勒先生宣读了莱亚德、德·莱西·伊文思爵士、韦克利、詹姆斯·杜克爵士、约翰·雪莱爵士等人的来信,他们表示完全赞同协会的宗旨,同时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让他们亲自出席会议的邀请。然后又宣读了一份《告人民书》,其中分析了东方战争和内阁危机。接着声明说:

“每一个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的实干家,都具有接管政府所必需的素质。”^①

对资产阶级的特殊要求作出的这种笨拙的暗示引起了满堂嘘声。

^① 1855年3月19日《晨报》第25338号。——编者注

《告人民书》接着写道：

“协会的首要目的是要消灭贵族阶级对行政权和官职的垄断，因为这种垄断对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十分有害的。次要目的是废除秘密外交。协会的特殊使命是向联合王国的选民呼吁，提醒他们要认真考虑国家的物质资源和自由应当托付给什么人，尤其是不要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贵族和财富的傀儡及其走卒。”^①

在这以后，比尔斯先生站起来，作了详尽的发言，为第一个建议辩护：

“国事危急，在篡夺了政府职权、垄断了高官要职和特权并给国家招来耻辱和不幸的现行寡头政治制度的条件下，任何改进都已显然无望，因而有必要把人民联合起来打破旧制度的继续存在……为此应当建立一个名叫国民和立宪协会的团体。”^①

马里勒本的巨星之一尼科莱先生支持这个建议。议员阿普斯利·佩拉特也表示支持，他说：

“人民将以克伦威尔铁骑军的坚定、克制、恒心和决心担负起政府改革的事业。英国的选民如果决心派遣正派的人到议会里去而无需花钱，那么他们就有把握消灭一切舞弊行为。但是如果像埃布林顿勋爵那样的人只是因为付出5 000英镑（而他的倒霉的对手却白白花了3 000英镑）就可以代表马里勒本参加议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指望会有正派的代表。”^①

接着议员默罗先生走上讲台，但在很多人的反对下他不得不让位给乔治·哈里逊（诺丁汉的工人，宪章派¹⁹²）。哈里逊说：

“这个运动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在他们中间分配职位和年金并建立比现

^① 1855年3月19日《晨邮报》第25338号。——编者注

行寡头政体更坏的寡头政体所作的一种尝试。”^①

接着他宣读了一个修正案,把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同样都斥为人民的敌人,并且声明,复兴国家的唯一手段是实行包括下列五条的人民宪章¹⁵⁹: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厄内斯特·琼斯(宪章派领袖,出身于上层贵族家庭)支持这个修正案,并且指出:

“人民如果支持这种以夺取政权和官职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运动,那么他们就破坏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讲台上有很多一心想当首相的人”(喝彩声),“有很多追求高薪闲职的人”(喝彩声)。“然而,人民不应当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之流以及金钱集团缔结联盟。不是土地贵族,而是金钱集团抗拒人道的工厂法,否决了反对扣除工资(从名义工资中扣款)的法案,阻挠通过有益的结社法——也正是这个金钱和工业集团首先力图压迫和凌辱人民。他本人随时都准备参加旨在摧毁德文希尔公爵等人的势力的运动,但他决不是为了让工厂尘埃公爵和纱锭勋爵们来代替他们”(喝彩声和笑声)。“有人说,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已经死了。他在此向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先生们说明,工人阶级还活着,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任何一个运动。如果资产阶级不肯把人民宪章及其五条列入它的纲领,工人阶级就不会允许资产阶级搞什么运动。资产阶级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休要重温旧梦。”^①

又经过短时间的辩论后,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主席企图撤销修正案,说这不是修正案,但他还是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修正案被提付表决,并且至少以 10:1 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人们大声地鼓掌欢呼,挥舞着帽子。主席宣布修正案通过后,在哄堂笑声中声明,他像以往一样相信大多数与会者是拥护成立“立宪和国民协会”的。因

^① 1855年3月19日《晨邮报》第25338号。——编者注

此,他们先着手这个协会的组织工作,然后再向公众发出呼吁,同时暗示(纵然是用隐讳的形式),今后为了避免别人的反对,只允许持有会员证的人出席会议。兴高采烈的宪章派为了对主席略表恭维,提议向他致谢,于是集会就散场了。

不能否认,甚至从被公开宣布的协会原则这个角度来看,道理也是在宪章派这方面。协会想推翻寡头政体。通过由内阁向议会发出呼吁的办法。但内阁是什么呢?是议会多数的产物。或者协会想通过向选民发出呼吁的办法来推翻议会?然而议会又是什么呢?是自由选举出来的选民代表机关。可见,只有扩大选民范围。谁拒绝采纳人民宪章因而拒绝把选民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谁就是承认,他们想用新的贵族制来代替旧的贵族制。他们想以人民的名义对现存的寡头政体讲话,同时在向人民发出号召时又想避免使人民自己登上舞台。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新奥得
报》第 14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²¹⁷

伦敦,3月21日。在昨天的上院会议上,利物浦和卡斯尔雷的旧同僚林德赫斯特勋爵终于提出了他早就说要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对维也纳会议⁴的态度”的提案。他指出,最近有两个情况使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是俄国皇帝^①临终前写给普鲁士宫廷的信,另一个是亚历山大二世发表的宣言,他在宣言中保证贯彻彼得、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②和他父亲的政策。俄国本身是怎样理解普鲁士的政策,这可以从波措-迪-博尔哥在1828—1829年战争³⁶爆发前不久发给涅谢尔罗德的一封密函的下列一段摘录中看出:

“如果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强制手段,那么有充分理由相信,普鲁士决不会以任何方式反对它;相反,普鲁士的既白又亲善的立场将对其他各国产生强大的牵制作用,使它们接受符合俄国的尊严和利益的结果。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向柏林内阁透露这一点,并使它相信,我们分配给普鲁士担任的角色将促进双方君主和双方宫廷之间良好的亲密关系。”^③

① 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2日去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③ 约·林德赫斯特《1855年3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编者注

林德赫斯特惊叹地说道，难道当时就能够像先知一样预言普鲁士宫廷最近半年或一年所奉行的方针吗？诚然，普鲁士在12月5日、1月13日和4月9日的议定书²¹⁸上签了字。这些议定书的目的就是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使苏丹的独立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障。普鲁士宫廷有没有遵照这个目的行事呢？曼托伊费尔男爵在谈到将3000万塔勒贷款用于军事行动时声称^①，在上述议定书中，普鲁士已经表明它对俄国政策的看法，即认为俄国做了一件很不公正的事，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进一步采取行动并积极参与。难道这是一个大国该说的话吗？难道1840年的条约²⁴和1841年的条约⁴²没有明确规定普鲁士有义务保护土耳其吗？曼托伊费尔男爵又补充说道：这场冲突没有影响到德国的独立或德国的利益，因此普鲁士没有义务作出任何牺牲。然而曼托伊费尔男爵自己在另一个文件^②里又讲出相反的话。不过，要是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再来谈德国的独立和德国的利益也就多余了。那时这些东西都要屈从于一个占优势的强国。接着，林德赫斯特勋爵还提到陆军大臣博宁被免职、本生大使从伦敦被召回和普鲁士议会拒绝回应御座演说^③的问题，然后他把话题转到“这出政治悲剧的第二幕”。他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奥地利认为是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时候了。这个要求拟就后送到柏林去签字。柏林给维也纳送来了反建议，这些反建议根本不充分，但造成了时间上的浪费，因为还得把它们提交同盟国研究。

① 奥·冯·曼托伊费尔《1854年4月22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信贷委员会的演说》。——编者注

② 奥·冯·曼托伊费尔《1854年4月25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4年11月30日的演说。——编者注

在此期间俄国撤出了多瑙河两公国,但是以军事上的理由继续占领着一部分领土,并且声明,今后打算采取单纯的防御立场。于是普鲁士就退出了联盟,因为俄国已经满足了一切合理的要求。从这时起,普鲁士就千方百计地来破坏奥地利的计划。为此目的,它向联邦议会²¹⁹和德意志各邦提出建议,而且大多如愿以偿。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对德意志两个邦拒绝参加同盟公开表示感谢。他(林德赫斯特)现在把话题转到这出悲剧的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他说,同盟国确定8月8日在维也纳进行会谈,以决定向俄国提出哪些要求作为初步谈判的基础。于是,按照惯例向普鲁士发出了通知,而且不止一次地发出这个通知。普鲁士没有明确拒绝参加会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到会。由于普鲁士的缺席,同盟国没有草拟议定书,而是签署了一个照会,提出四项条款³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然后把这四项条款递交给俄国,让它接受,但是俄国拒绝接受。普鲁士方面却公布并散发了一个文件,反对四项条款。不仅如此,它还在联邦议会上和德意志各邦的宫廷那里,阻止德意志各小邦参加同盟。12月2日的条约²签订后,曾经通知普鲁士说,它还有加入这个条约的机会。普鲁士拒绝加入,但声明它准备单独同法国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从英法两国接受这个建议时起,普鲁士在各次谈判和各种提议中明明知道法国和英国必然不会同意,却无数次要求修改。当他(林德赫斯特)谈到普鲁士时,是指官方的普鲁士。他知道,普鲁士人绝大多数是有反俄情绪的。令人不解的是,普鲁士在拒绝加入12月2日的条约后,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吸收它参加维也纳的谈判。他希望各同盟国都不要以任何借口让普鲁士代表参加。否则,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就不是拥有一票,而是两票了。普鲁士的外交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

他提起了1794年、提起了奥斯特利茨会战²²⁰前后不久的那个时期等等。

克拉伦登勋爵说：他只打算对英国和普鲁士之间互通消息的情况作几点补充。在俄国政府拒绝同盟国提出的条件后，曾经召集有关各国全权代表的会议，但是会议始终没有开成，因为普鲁士政府的代表不愿参加。虽然后来普鲁士驻伦敦大使^①对他说，他的政府打算给予它驻维也纳全权代表^②以所需要的许可令，但是他（克拉伦登）回答说：“现在太晚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通信是对俄国有利的。早在12月2日的条约签订以前，就曾经邀请普鲁士参加这个条约，但是没有结果。普鲁士要求无条件地允许它参加下次会议，其理由是，这次会议是上一次尚未结束而且普鲁士根本没有退出的会议的继续。对于后面这种说法，英国政府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先那次会议并未开成，因为普鲁士不顾屡次邀请而不愿参加。下次会议也根本不是上次会议的继续，因为，当奥地利在10月和11月提请英法两国重开会议时，英法两国答复说，签订议定书和举行会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是如果奥地利愿意同它们一起承担战争义务，那它们就愿意看一看，是否能争取到和平。这样就产生了12月2日的条约。它们以后还准备同普鲁士签订专门条约。

“但是，允许普鲁士享有一切特权而不分担任何危险，在普鲁士没有申明它的目的和政策的情况下，在它同我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或可能的约定的情况下，在不知道它是作为中立者，作为敌人，还是作为朋友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允许它无条件地参加一次可能以和平而告终，但也可能使战争升级的会议，——

① 阿·伯恩施托尔夫伯爵。——编者注

② 亨·弗·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尔贝洛伯爵。——编者注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①

普鲁士后来派出的专门代表团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都受到了同样的友好接待,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过他并不认为谈判已经中断了。三天前还在提出新建议。遗憾的是,维也纳会议已经开幕,而普鲁士因其本身的行为被排斥在外。像普鲁士这样的大国是不该把自己关在德国这个极其狭窄的范围内的。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这种态度,但回答总是,普鲁士的政策就是和平。而实际上它的政策“既非欧洲的,又非德国的,也非普鲁士的”;与其说是要牵制俄国,不如说是要挫败奥地利。尽管如此,一旦欧洲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普鲁士就不能再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了。它不能不顾普鲁士和德国内部的民族感情而站到俄国方面。普鲁士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它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它就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它也不愿意站在奥地利一边。相反,它对奥地利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

“因此我说,普鲁士采取了孤立的和错误的立场。这种做法也许是它的敌人所喜欢的,但是它的盟邦和它本国人民中的爱国者却为此深感痛心。”^①

最后,克拉伦登勋爵保证,将竭尽全力以争取普鲁士的合作。

威·格雷厄姆勋爵在下院质问首相道: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再度当选时说过,不恢复波兰和匈牙利,就不能满意地解决东方问题。不知奥地利大使有没有要求克拉伦登勋爵对这些话作解释?”^②

① 乔·克拉伦登《1855年3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编者注

② 威·格雷厄姆《1855年3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编者注

帕麦斯顿勋爵没有对这个问题作任何答复，而是首先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政府中任职表示高兴。至于谈到匈牙利，他说，奥地利早就知道，英国会认为把匈牙利从奥地利帝国分离出去是欧洲的一大不幸，因为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欧洲中心的存在是保持大国均势的一个重大因素。至于谈到波兰（帕麦斯顿在回答时作了片刻停顿，在继续讲话时又用了一种奇腔怪调，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说，他的看法是，目前这种状况的波兰王国对德国是一个经常的威胁。然而现在维也纳正在讨论的各项条款中并没有包括关于改组波兰的协议。但是，英国和法国保留权利，根据情况或战争事态，用它们认为对欧洲未来的安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协议来补充目前作为谈判基础的四项条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1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新奥得
报》第 14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拿破仑最近的诡计²²¹

“如果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他将把一个大帝国毁灭。”^①这个回答吕底亚国王^②的德尔斐神谕²²²，现在送给路易·波拿巴作为他克里木之行²⁰⁵的预言，同样适用。他此行预计要毁灭的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他自己的帝国。

特殊的、不正常的立场产生不正常的需要。任何人如果处在他的地位，进行这种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为一比十的亲征，都会被看做是傻子。路易·波拿巴肯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还是一定要去。他是整个远征的首创者；他把联军引到了现在所处的不妙境地，他在全欧洲面前有责任使联军摆脱这种处境。这是他第一次要在军事上干一番事业，其结果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将决定他作为一个统帅的声誉。他为此举的成败，连自己的皇冠都拿来用做赌注了。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同样使这次充满危险的亲征成为帝国的需要。在东方的士兵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对争取新帝国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53节。——编者注

② 克罗伊斯。——编者注

的军事荣誉已经大感失望。在瓦尔纳和巴扎尔吉克^①，假查理大帝的那几个武士^②被自己军队赠以“猢猻”的称号。“猢猻们滚蛋！拉莫里谢尔万岁！”²²³——朱阿夫兵¹¹⁷被圣阿尔诺和埃斯皮纳斯弄到保加利亚的荒原上在霍乱和寒热病肆虐下去送死的时候这样喊道。现在，在军队里人们已不再单单是把遭放逐的将军们的荣誉和名望同目前率领法军的名声可疑的指挥官们加以对比了。小日罗姆·拿破仑在东方作战时的奇特行为²²⁴，使在阿尔及利亚打过仗的老兵想起了奥尔良亲王们在非洲^③时截然不同的作风。那些亲王，不论他们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可指责的，却一向身先士卒，恪守军人天职。年轻的奥马尔和年轻的拿破仑之间的鲜明对比当然足以使士兵们这样议论：要是奥尔良家族仍然当政，亲王们定会和我们同在战壕里，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可是他们的名字都不叫拿破仑！士兵们真是这样说的。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呢？这个“被允许穿师长制服”的人，竟然玷污了同拿破仑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军事传统；而这个家族的其余成员全是些四平八稳的文职人员、自然科学家、教士，要么就是些地道的冒险家；老日罗姆^④由于年迈不能前去，况且他昔日的战功并没有给他的脑袋罩上光环。所以路易-拿破仑不能不亲自出马了。再者，关于克里木之行的传闻已散布到法国的穷乡僻壤，并且受到农

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21—622页。——编者注

② 讽喻路易-拿破仑的亲信阿·圣阿尔诺、沙·埃斯皮纳斯等人。——编者注

③ 指19世纪30—40年代法国为占领阿尔及利亚而进行的殖民战争。——编者注

④ 指拿破仑第一最小的弟弟日·波拿巴。——编者注

民的热烈欢迎，而正是农民使路易-拿破仑当上了皇帝。农民们深信，一个由他们亲手造出来的名叫拿破仑的皇帝，一定真的是拿破仑复生；在他们看来，路易-拿破仑应当率领军队，而军队在他率领下必定堪与大军²²⁵的军团相媲美。塞瓦斯托波尔所以没有攻下来，就是因为皇帝还没有到那里去；只要他在那里一出现，俄国要塞的壁垒就会像耶利哥的城墙²²⁶一样土崩瓦解。既然如此，他即使想收回前往亲征的诺言，现在也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消息业已广泛传开。

因此正在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①除克里木现有的10个师之外，再新增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在战局一开始时先作为预备军驻在君士坦丁堡。这四个师中，一个由皇家近卫军¹²⁰组成，另一个由精锐连队即巴黎军团的掷弹兵和轻步兵组成；另外两个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在土伦和阿尔及尔已经登船，或者是正在集结。这支新的增援部队将使法军在克里木的人数达到10万—11万人左右；而到4月底，15 000人的皮埃蒙特军¹¹⁰和大批英国增援部队也将开到。^②

① 恩格斯的《拿破仑最近的诡计》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的部分内容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26日《新奥得报》第143号。《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是从这里开始的。开头一句是：“当和平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时候，战争准备在法国却正在升级。”——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从这里至本文末尾压缩改写如下：“除所有那些纯属地域性的困难之外，这种在克里木的作战方式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法国可用的武装力量整整有四分之一被用到一个即使大获全胜也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次要战场上。对克里木战场上的顺利与挫折所赋予的虚构意义，反过来使这套计划的首创者吃到加倍的苦头。塞瓦斯托波尔对亚历山大二世来说远非就等于俄国，但是对波拿巴来说它已经就等于法国。——至于地域性的困难，很清楚，赫拉克利亚半岛目前已经成为成千上万人和牲畜的坟场，只要晴朗天气一开

但是,几乎不能指望联军可以在5月份以15万人的兵力开始这一战局。已经成了一个管理得很糟的大坟场的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按其现状来看,随着炎热潮湿天气的到来,定然会整个地变为一个各种疫病的温床;不论有多少军队驻在那里,都将面临甚至以往任何时候的由疾病和死亡造成的惨重损失。在全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联军的作战部队没有任何可能从现在的阵地向前推进,而增援部队要在5月中旬才能开到,那时候流行病恐怕已经爆发了。

在最好的情况下,联军也必须留4万人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边上,只有9万—10万人能够派出去同俄军野战部队作战。除非联军特别成功地使用机动战术而俄军又犯了大错,否则这支军队从赫拉克利亚半岛出动后首先得击败俄军,把他们从辛菲罗波尔打退,然后才能同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土军会师。然而我们先假定实现会师没有特别的困难,但是土军向这支由法军、英军、皮埃蒙特军组成的杂牌军至多也只能提供2万人的增援,而且这些人对野战都不太适应。这样,总共将组成一支约12万人的军队。这个地区已经被俄军自己搜刮干净,产粮极少,主要资源就是牲畜,而牲畜一定会被俄军处心积虑地赶往彼列科普。很难设想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一个地区如何生存下去。军队即使前进一步,也必须筹措大批的粮秣并派出许许多多的分遣队以保障翼侧和通往海上的交通线。迄今尚无机会出动的俄国非正规骑兵那时将开始进行骚扰性的袭击。与此同时,

始,它将变成一个各种疫病的温床。假定联军把兵力增加到15万人,那么,在克里木这样一个已被俄军刮尽地皮、产粮极少的地区,要保证他们的供应将难上加难,因为俄军决不会忘记在他们自己撤退之前及时把牲畜赶走。”——编者注

俄军也将得到增援；由于法国对最近六个星期的军事准备工作大肆宣扬，俄军得以及时采取自己的对策。无疑，俄军从沃伦和比萨拉比亚的部队中或从新组成的预备部队中抽调的两三个师，目前正开往克里木，以保持那里的兵力对比。

可是，联军却不能不用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这就需要去 2 万人，而剩下的部队，必定为供给问题所困扰，而且受着长串的辎重车辆的拖累，那时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俄国野战部队赶出克里木，是很值得怀疑的。

可以肯定的是，路易·波拿巴企图在克里木靠胜利来获取拿破仑的声誉，而这棵胜利之树长得相当高，要攀折它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指出的一切困难都只是地域性的。这种在克里木的作战方式的主要缺点归根到底是，法国可用的武装力量的四分之一被用到一个即使大获全胜也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次要战场上。这样死抱住塞瓦斯托波尔不放的荒唐的顽固态度，正是整个作战计划根本大错之所在，这一顽固态度已经恶化为一种迷信，对顺利和挫折都赋予虚构的意义。而正是赋予克里木战事的这种虚构意义，反过来使这套计划的不幸的首创者吃到加倍的苦头。对亚历山大来说，塞瓦斯托波尔并不就是俄国，远远不是；但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拿不下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21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135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²²¹

今天早上本报刊登了法、英、俄官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敌对双方的一次战斗的报告。此次战斗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需要我们除发表官方文件之外再作某些说明和评论。^①

大约一个月以前,根据俄军的出击通常都是成功的这一点判断,我们作出了如下结论:堑壕已推进到使被围一方和围攻一方势均力敌的距离上。^②换句话说,堑壕已构筑到这样近的地方,以致俄军在出击时能够以至少相当于联军在一两个小时内才能调集的兵力袭击任何一部分堑壕。既然一两个小时就足够用来把铆钉统统破坏,把一个炮群的大炮火门统统封死,结果自然是联军不能使自己的接近壕再向前推进。从这时起围攻的行动停止了,^③直至法军三个旅(第

① 本段内容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8页。——编者注

③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从这里与上文相接。本段开头至此处在该文中是这样写的:“关于主要是由俄军工程师给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制造的障碍(其中也有法国人造成的),马拉霍夫冈一战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众所周知,大约一个月以前围攻的行动停止了,但是法军三个旅……” 编者注

八师的一个旅和第九师的两个旅)开到使得联军可以把一部分英军步兵替换下来并加强堑壕的警卫。与此同时,尼埃尔将军、琼斯将军和工兵部队的到来使围攻作业又展开了,并纠正了主要由于法国比佐将军的固执,其次也是由于英军步兵人数不足而造成的错误。新的接近壕已向前推进,特别是在离马拉霍夫冈的俄军工事约300码的英军配置地段上,挖了一条平行壕。现在配置的一些炮群由于靠近因克尔曼那一边,只要一开火,便能击毁或以纵射火力射击俄军后方的部分炮群。俄军为了对付这几道新的工事,刚刚采取了一个步骤,干得非常巧妙而大胆。^①

从每一张平面图上都可以看出,俄军的防线由卡兰亭湾的顶端到内军港,再到基连湾的顶端,成半圆形围绕着城市。基连湾是由一条深谷的末端形成的不大的海湾,这条深谷从大湾即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一直远远地伸向联军兵营所在的台地。^①这条深谷西面有一长串高地,构成了俄军的防线;其中最大的一块高地是马拉霍夫冈;此冈居高临下,是俄军整个右翼的关键阵地。在这条深谷和基连湾的东面也有一块高地,由于这块高地完全处在俄军炮群和军舰的火力范围之内,所以,只要联军不能彻底切断塞瓦斯托波尔和因克尔曼之间的那条受到停泊场北面炮台和炮群火力保护的交通线,这个高地就不会落入联军手中。但是,由于联军在马拉霍夫冈东面和东南面设置了阵地,以使炮群能够袭击俄军防线的翼侧和后方,所以这个不属于任何一方的高地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俄军在2月21日夜间派了一个作业队在高地上修筑一个由俄军工程师预先设计好的多面堡^②。早晨的

^①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② 指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没有“由俄军工程师预先设计好的”这一修饰语。——编者注

时候,联军看到了长长的壕沟及其外面刚刚开始修筑的胸墙,但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悟出这意味着什么,因而也就未加理会。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多面堡几乎筑成了,至少是初具规模,之所以说几乎筑成或初具规模,是因为后来的战事表明,从断面看,也就是说,护堡壕的深度和胸墙强度还很不够。这时联军才开始明白,这个堡垒的位置选得非常好,能够以纵射火力射击联军的纵射炮群,从而使这些炮群几乎失去作用。工程师们坚决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夺下这一堡垒。于是,康罗贝尔极其秘密地组织了一支约由1 600名朱阿夫兵¹¹⁷和3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强攻纵队。由于命令必须在夜晚而且以突然的方式下达,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时就有所耽搁。当朱阿夫兵冲在前面发起攻击时,已经是24日凌晨2时了。他们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行军即到达离护堡壕20码的地方。照例在突击中一枪也不准放;士兵们奉命取下枪上的火帽,以防止不必要的和过早的射击。突然听到几声用俄语下命令的声音,多面堡内一支俄国强兵一跃而起,他们把枪架在胸墙上,一齐对着进攻的纵队开火。由于是在黑暗中,而且士兵在堑壕内作战有一个人所熟知的老习惯,即永远是朝胸墙外正前方射击,所以这一番齐射仅能对进攻纵队正面不宽的队首起到一点点作用。^①朱阿夫兵的前进几乎一点没有被尚未筑好的护堡壕和垒墙的斜坡所阻滞,他们转瞬间就冲入了多面堡,端着刺刀扑向敌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过了一段时间,朱阿夫兵攻占了半个多面堡,又过一段时间,俄军便完全放弃了这个多面堡。与此同时,跟在朱阿夫兵后面不远的海军陆战队不知道是迷了路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在高地斜坡上停了下来。他们在这里遭到一支俄

^①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军纵队两翼夹攻,虽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仍被俄军赶下高地。显然,在这一阵战斗中或战斗后不久天已经亮了,因为俄军迅速地撤离高地,把多面堡留在朱阿夫兵手中,随后便以所有能动用的火炮一齐向那里轰击。有一段时间,朱阿夫兵卧倒了,一些随他们同来的志愿兵射手爬到马拉霍夫冈上的工事前面,企图对准炮眼向俄军炮手射击。但俄军炮火太猛烈,不久朱阿夫兵便不得不退到朝向因克尔曼的那一边,在那里可以避开大部分炮群的火力。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把伤员也都全部带回来了。

在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朱阿夫兵和一位名叫莫奈的将军作战非常勇敢,俄军的表现则是高度的技巧与其固有的顽强精神相结合。俄军的兵力为两个团,即色楞金斯克团和沃伦团,这两个团的人数在打过几仗之后每营已不超过500人,总共不超过4000人。他们由赫鲁晓夫将军指挥。^① 俄军的行动如此成功,以致法军宣称,整个攻击计划一定是先被他们知道了。俄军对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几乎是一瞬间就大获全胜了。他们由未完工的多面堡一撤出,就把倒霉的、失去支援的朱阿夫兵置于猛烈的炮火之下,而当战斗还在多面堡内进行的时候肯定是一炮也没有开。

康罗贝尔将军发现,这次失败在他的军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的急躁情绪,现在来了一次大爆发。士兵要求攻城。“有人背叛”——这是法军在为失败找理由时一向使用的一句话——被大声地喊出来了,而且福雷将军,甚至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就被点名指为把法军作战会议的秘密决议出卖给敌军的人。²²⁷ 康

^①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此处没有“在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由赫鲁晓夫将军指挥”这两句话。——编者注

罗贝尔非常慌张,急忙写了一道命令,把整个行动描写为辉煌的虽然是相对的胜利;同时致信拉格伦勋爵,建议立即攻城。这一建议当然被拉格伦勋爵拒绝了。^①

俄军方面守住了新的多面堡,自那时至今一直在努力修补。这个阵地非常重要。它可以保障同因克尔曼的交通以及从那个方向运送来的给养,可以威胁联军围城工事的整个右方。^② 威胁从翼侧构成,要消除这种威胁只有构筑新的接近壕才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还证明,俄军不仅有能力守住自己的阵地,甚至能够向阵地以外推进。2月下半月,俄军在他们的新多面堡前方对着联军的工事构筑了反接近壕。但是,报告里没有指出这些工事的确切方向。不管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基干团,这就说明到目前为止仅由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的守军已得到很大的补充,并且现在已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任何情况。

现在有报道称,联军的炮群在3月10日或11日之前应该就有条件开炮轰击俄军的防御工事。然而,在俄军实力雄厚和联军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怎能指望联军具备首要的条件呢?这条件就是:围攻一方的火力要比被围一方的火力强,而且要强到足以在英军和法军弹药耗尽前就能把俄军炮群打哑。但是即使联军做到这一点,即使俄军野战部队在这种决定性的关头忘记攻打因克尔曼和巴拉克拉瓦

① 在《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中,本段被缩减为一句话:“福雷将军在法军兵营里被点名指为把作战会议的秘密决议出卖给敌军的人。”——编者注

② 《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同本文相对应到此为止。该文在后面补充了一句话即告结束,这句话是:“最后,多面堡既已夺回,俄军就采取了攻势。”——编者注

那边的阵地,即使联军攻打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并且攻克它,那时又会怎样呢?在强攻纵队面前将会出现新的防御工事、新的炮群和改成小型碉堡的坚固建筑物,要加以摧毁又必须配置新的炮群。一阵弹雨就会把联军打退,联军最多也只能守住夺得的俄军第一道防线。

这以后将是对第二道防线实行围攻,接着又是对第三道防线实行围攻,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小型障碍物了,而俄军工程师——我们现在已经对他们有所认识了——是不会忘记在他们所管的范围之内设置这种障碍物的。在此期间,酷暑之后是阴雨,阴雨之后是酷暑,如此两相交替,在一块掩埋着成千上万人马的腐臭尸体的土地上,这将引起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疫病。诚然,不仅在城外,而且在城内也将会疫病猖獗,但是,谁知道哪一方将首先为疫病所征服呢?

春天的来临将给欧洲三大强国正顽强激战于其上的这个五英里宽十英里长的小小半岛带来许多可怕的东西;路易·波拿巴等到他这次伟大远征终于结出它全部果实的时候,将有充分理由替自己庆贺一番。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21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5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²²⁸

伦敦,3月24日。迪斯累里的报纸《新闻报》上星期断言,“路易皇帝”^①是缔结和约的唯一障碍,他用一项秘密“协定”把奥地利拴在自己身上,而奥地利力求摆脱这项协定,这种说法引起了一场杯水风波。托利党⁷³人在此以前一直把英法联盟当做自己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们的马姆兹伯里勋爵确认了同波拿巴的联盟?²²⁹难道迪斯累里未曾在议会中嘲笑格雷厄姆和伍德,说他们在自己的选民面前恶毒地诽谤十二月二日政变¹¹²?难道两年来托利党人无论在讲坛上或在报刊上不都是调门最高的战争鼓吹者?而现在没有转变过程,怎么突然就莫名其妙地诋毁同法国的联盟,讽刺“路易皇帝”并鼓吹和平呢?老托利党人的老朽的报纸《先驱晨报》不知道党的领袖的秘密,怀疑地摇晃着脑袋,嘟哝着激烈的词句来反对它所不能理解的《新闻报》的妄想。然而,《新闻报》今天又回到这个不祥的话题上来,在报头用大字标题刊登了以下的报道:

“重要的情况已经出现。当我们不久前发表文章的时候,一无所获的会议

① 拿破仑第三。 编者注

可能要中断,约翰·罗素勋爵可能会突然回国。奥地利在尼古拉皇帝去世^①后对俄国口气的改变,特别是奥地利皇帝^②向亚历山大二世所作的声明,无疑促成了这个结果。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国皇帝^③已消除了全面和解的障碍,法国会同意完全撤出克里木,而不会对拆毁或缩减这个地区的工事提出任何条件。”^④

《新闻报》为了说明这个预言,让读者参阅“它社论中的可靠的细节”。奇怪的是,这些细节恰好同根据这些细节作出的并在此之前预言的结论相矛盾。社论写道:

“维也纳的事态每小时都在发生不合理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变化;因此,重要的是要使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意见产生作用,以防止可能引起令人不快和令人惋惜的后果…… 如果 1853 年我们的大臣们真诚地对待英法联盟,那么也许就没有机会打一场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战争很可能胜利、顺利告终。可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同法国真诚地结成联盟,却为了它所说的争取德意志大邦加入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西方列强同俄国作战不可能有别的理由,只能是决心切实地削弱俄罗斯帝国在南部的势力范围。这是解决东方问题的唯一办法。1853 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是错过了。时间、金钱、军队和声誉也都葬送掉了。如果 1853 年我们真诚地同法国协商,那么德意志各邦就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而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奥地利皇帝向俄国亚历山大皇帝保证说:‘奥地利既不想缩小俄国的疆界,也不想让俄国的领土遭受任何侵犯’。这些话只能有一种解释。至于谈到我们过去已经暗示过的法奥秘密协定,那么,高层权威人士向我们保证说,虽然这个协定显然带有两个帝国永久同盟的性质,但是其中丝毫不包含什么必然导致奥地利进攻俄国的事情。

俄国皇帝准备接受媾和条件,这些条件虽然并不能使东方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是对侵略彻底失败的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暴行的一

① 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于 1855 年 3 月 2 日去世。——编者注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④ 1855 年 3 月 24 日《新闻报》第 99 期。——编者注

种赎罪。我们认为,实施更为高明的政策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能够保证欧洲独立的局势不会马上再现;但是,现在毕竟还可以求得总的来说对欧洲有利,对土耳其有益,而对西方列强不失体面的和平。我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和平谈不成。障碍在哪里?……法国皇帝。假如他不顾现在不利的条件,仍认为应着手解决东方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说英国应当撤回了,但是我们知道,皇帝完全是别有意图……在缩小俄国疆界和进行拟议的和平谈判之间,法国皇帝想出了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或许造成不幸。他期盼的是一次功绩显赫的战争,要让这次战争恢复他的 prestige(威信)并以一个和约告终,而这个和约对欧洲或亚洲的疆界的更改将丝毫不超出英国驻维也纳特命全权代表^①已准备同意的奥俄建议。撇开计划中关于仅仅为了挽回威信而决心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那一部分不说……我们认为,这个方案的不明智与不道德都是显而易见的。假定为了威信而发动的战争不成功呢?……除了俄军在克里木设置的障碍之外,瘟疫像武器一样也是一大威胁。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这场战争失败了,那么英国和法国又将如何呢?那时德意志大邦将站在哪一边呢?前途只能是欧洲的衰落和毁灭。即使时机对我们有利,我们是否有理由去冒这样的风险,况且还不是为着一定的政策,而是单纯为着示威去冒险呢?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错过这种良机也许是很痛心的;对于英国人民来说同样是痛心的。但是国务活动家们应当面对现实。无论法国、英国还是俄国,1855年的处境都与1853年的处境不同。背叛了欧洲最高利益的人们不会有好下场。让他们自作自受吧。法国统治者^②和英国女王^③并没有过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像失掉理智的赌徒那样,总是在极度的悲观绝望中一意孤行,加速他们厄运的来临。”^④

在同一期周报上还提到了日拉丹的小册子《和平》,该小册子十分赞成把同时解除塞瓦斯托波尔和直布罗陀的武装作为真正的和平解决办法。《新闻报》叫喊道:

① 约·罗素。——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④ 1855年3月24日《新闻报》第99期。——编者注

“别忘了,这本小册子,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出售,是得到法国政府准许的,而它的作者是皇位的可能继承者^①的亲密的朋友、顾问和同伙!”^②

这里只需指出,把《新闻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的德比派力图同(爱好和平的)曼彻斯特学派³⁷联合,而内阁这方面也想利用报纸印花税法¹⁰¹(关于这个法案,我们回头还要谈^③)把曼彻斯特学派争取过来。进行纯粹示威性战争的观念,进行欧洲战争不是为了打击敌对势力,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的观念,进行一场闹剧似的战争的观念,必定会使任何一个清醒的英国人失去自制力。问题是:这种观念是否就是复辟帝国所理解和必须理解的“拿破仑观念”^④之一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7 日《新奥得
报》第 14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指小日罗姆·波拿巴,他是拿破仑第三的堂弟。——编者注

② 1855 年 3 月 24 日《新闻报》第 99 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265—267 页。——编者注

④ 暗指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观念》(1839 年巴黎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

不列颠军队²³⁰

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由下院任命去调查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状况的著名委员会⁷²的十几次会议的报告。社会各界的证人,从剑桥公爵起,都被讯问过,他们的证词是惊人的一致。政府各部门都受到了检查,结果发现这些部门都不仅缺点很多,而且简直是丑恶的。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和违警法庭、巴拉克拉瓦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受到一致的谴责。

每一个部门就其本身来说是糟糕的,但制度的整个灵光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展现出来。规章条例订得如此出色,以致当第一批部队在土耳其登陆,这些规章开始生效的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其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发生问题时应当同谁打交道。因此,出于审慎,出于害怕负责,大家都把自己担负的责任推给别人。在这种制度下,医院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疏忽大意和玩忽职守严重地影响到在运输船上的以及到达指定地点的伤病员。揭露出来的事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从莫斯科退却^①时

① 指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于1812年秋天从莫斯科撤退。——编者注

都没有出现过这类骇人听闻的现象。然而这些事实确实发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个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库塔里。所有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哥萨克追踪退却者，切断其供应线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作战还顺利的时候，发生在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不到的地方，发生在大不列颠为自己的军队积存储备物资的巨大中心仓库内。而且制造这些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事件的祸首不是残酷无情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是那些性情温和、慈悲为怀和笃信宗教的人。毫无疑问，作为普通的人，他们是乐意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的；作为官方人士，他们的责任则是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所有这些卑劣行为，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种事例在女王陛下规章制度中的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一项条文中都没有规定。宁可让 1 000 名士兵去送死，也不得违犯女王陛下的规章制度！即使士兵们能看到，甚至伸手便可触到那些能够挽救他们性命的东西，他们还是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

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魄力去打破这套陈规陋习，能够不顾规章而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而且是一个女人，即南丁格尔小姐。就像报道所说的，当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时，便带领一些胆大的人，真的破门闯入了女王陛下的仓库！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事务的老懦夫们决不敢采取这样的勇敢行动，要不是他们自己坦白承认，很难相信他们胆小到如此程度。有人曾问他们当中一度总管过各医院的安德鲁·斯密斯医生：难道在君士坦丁堡就没有购买必需物品的资金和能够买到这些东西的市场吗？他回答道：

“有是有啊！但是请您相信，在国内经历了40年之久的因循守旧和拖拉作风以后，我很难在几个月内就明白我真的可以支配那些资金！”^①

报刊上和议会发言中对情况所作的极其阴暗的描述与我们面前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某些极为令人发指的事实早经宣扬，但甚至这些现在都带有更加阴暗的色彩。虽然这幅图景还远不是完整的，但从中我们已足以判断全部状况。在这幅图景中，除了随军的女护士以外，没有一点令人感到宽慰之处。一群群的工作人员都同样的恶劣而愚蠢，如果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报告中敢于按照证词那样来写，他们就很难在英语里找到足够有力的词句来表示谴责。

经过所有这些揭露以后，人们不仅对于直接的祸首，而且首先对于组织这次远征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非常明显的事实为捏造的政府，无法抑制强烈的愤恨和蔑视。这个群贤⁸¹的大联合，这批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本来说他们的上台就意味着英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在哪儿呢？辉格党⁷⁰人和皮尔派⁷¹、罗素的信徒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爱尔兰人⁹⁰和英格兰人、自由保守党人和保守派自由党人——所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彼此间的议价和交易而已，而且所有那些被他们任命担任国家职务的人不是些老朽的懦夫，就是些十足的笨蛋。这些国务活动家深信他们操纵了30年的机器一定能出色地运转，居然没有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到克里木去应付不测事件；当然，政府治理得那么好，还会发生什么不测事件呢！这些英国大臣，就其天性和习惯来说，只善于服从别人，现在突然担负了指挥的职务，也就使英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就拿拉格伦这个老头子来说，

^① 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编者注

这个人终身都是威灵顿的一个头等办事员，从来没有得到许可独立负责地采取行动，他活到65岁，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让干什么就一丝不差地干什么。这样一个人却突然得到任命要去带领一支军队对付敌人，一切事情都要当机立断，自己做主！于是他就弄得一团糟。他的每个举动都透露出动摇、胆怯、毫无自信、优柔寡断、缺乏主动精神。现在我们知道，当克里木远征的决定获得通过的时候，他在军事委员会里表现得多么软弱。他竟然听命于像圣阿尔诺那样的善于吹牛的无赖，而威灵顿老头子只要语气稍带讥讽就能使圣阿尔诺哑口无言！在向巴拉克拉瓦进军¹⁰时他犹豫不决，在围攻和冬季灾难时期他又束手无策，除了躲起来之外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其次是哈丁勋爵，就其性格来说，也只适合于担任下属的角色，但在国内却是军队的司令官。虽然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但是从他的一套管理制度以及他在上院坚持他的制度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的营房和办公室。说他根本不了解野战部队最起码的需要，或者说他懒得去考虑这些需要，这是对他的最温和的评语。再其次是皮尔的官员们——卡德威尔、格莱斯顿、纽卡斯尔、赫伯特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的年轻绅士，他们的文雅风度和崇高感情不允许他们行动粗鲁或者对世上的事务表现出当机立断。他们的座右铭是“考虑考虑”。他们对一切都考虑；他们考虑着每一件事；他们考虑着每一个人，他们在考虑每一个人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考虑他们。他们喜欢一切都圆满和平稳。他们最厌恶的就是作为实力和毅力的象征的那种棱角分明。

只要是来自军队的关于领导无能而使军队遭到毁灭的消息，这些性情温和、老实而虔诚的绅士就无耻地加以否认；既然他们事先已经认定他们的政府是无可指摘的，当然是他们最有权利来否认。当事

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当来自战场的官方消息甚至使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承认指控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带着一丝刻薄和愤懑加以否认。他们对罗巴克关于进行调查的提案表示反对是一个顽固地当众撒谎的前所未有的可耻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莱亚德、斯塔福德乃至他们自己的同僚罗素都指责这些绅士在撒谎,然而他们却进行顽抗。整个下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都指责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仍然进行顽抗。现在他们受到罗巴克委员会的审查并且被揭露了,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是在继续顽抗。然而现在他们顽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怕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不列颠军队在体制和管理上进行改革。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3 月 2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6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²³¹

伦敦,3月27日。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波拿巴可望于4月16日访问圣詹姆斯宫²³²,这将成为大规模抗议性示威的导火线。宪章派¹⁹²已邀请法国流亡者阿尔芒·巴尔贝斯也在4月16日到伦敦来,伦敦将举行街头游行和大规模集会迎接他。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他作海上旅行。²³³

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¹⁰¹。这项法案的主要规定如下:(1)取消强制的报纸印花税。(2)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定期刊物像以往一样,享受免费邮寄的特权。第三条有关邮寄印刷品的体积,还有一条规定,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报纸应当提交保证金以用于可能发生的诽谤诉讼。为了说明旧的报纸课税制度,只要举出两件事实就够了。在伦敦,出版一种日报至少需要五六万英镑的资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极少数例外,为反对新法案,掀起了一个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通过征税来保护现有的报刊,而禁锢以自由精神进行创作的一种制度吗?在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独享的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报(当然谈不上日报),只能靠工人的每周捐助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英国的工人为了公益事业能够作出与大陆

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英国新闻界的巨头——《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它时而谦逊地自比德尔斐神谕²²²宣示所，时而断言，英国只有一家值得保存下来的报纸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⁴⁹——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

《泰晤士报》的所有这些“侈谈”在下院昨天的会议上受到古怪的德拉蒙德的应有驳斥：

“现在的报刊是商业投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沃尔特家族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印花布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废话工厂…… 《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经营。沃尔特家族手上总是有一帮狡猾的人——从业七年的律师和类似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斯特林、德莱恩、莫里斯、娄和达森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这些绅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例如《纪事晨报》，则投靠某一个特殊的党派。一家报纸是皮尔派⁷¹，另一家报纸是德比派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皮尔派一衰败，它的报纸也就衰败。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生意人。真正的艺术——在这方面《泰晤士报》是行家——在于雇来一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让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观点自相矛盾，同一个人可能始终坚持同一观点；如果说这些撰稿人单个来说是前后一致的，但是假如把他们凑合在一起，那世界上再没有更自相矛盾的了。新闻工作的真正完美在德拉蒙德看来就是：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个人的正派，集体的无耻。这一套是很有用的，《泰晤士报》经常使他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建议这个佃农排干一块沼泽地。佃农说：千万不能！可不要排干！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那么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长不出喂猪的东西，那么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

至于谈到报纸受贿问题，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实在的证据，拿破仑^①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在谈到《泰晤士报》时曾经说过：“他们给我寄过《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奥马拉在一本书^①中说，《泰晤士报》每月从波旁王朝那里得到6 000法郎。奥马拉掌握着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领钱收据。奥马拉还说，拿破仑在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前曾接到各种报纸提出的给它们写稿的建议，其中包括《泰晤士报》，拿破仑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②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只补充一点，《泰晤士报》1815年曾坚决主张把它称之为欧洲蛊惑宣传中心的拿破仑交付军事法庭处决。而在1816年，这家报纸则打算使北美合众国“这个叛乱成功的不祥的榜样”重新置于英国的专制统治之下。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
27日

载于1855年3月30日《新奥得
报》第15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巴·奥马拉《流放中的拿破仑，或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编者注

② 亨·德拉蒙德《1855年3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012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调查委员会的揭露²³⁰

伦敦,3月28日。下院调查委员会已经开了十几次会议。它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已经公之于众。社会各界的证人,从剑桥公爵到《泰晤士报》的麦克唐纳先生,都被讯问过。他们的证词是罕见的一致。政府各部门都受到了检查,结果发现这些部门不仅缺点很多,而且简直是丑恶的。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巴拉克拉瓦和君士坦丁堡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受到一致的谴责。每一个部门就其本身来说是糟糕的,但制度的整个灵光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展现出来。规章条例订得如此出色,以致当它们生效时,任何人都不知道其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应当同谁打交道。请读一读有关医院状况的文章以及有关伤病员在运输船上和到达指定地点时因有关人员玩忽职守或疏忽大意而受到极其野蛮对待的文章。在从莫斯科退却^①时都没有出现过这类骇人听闻的现象。然而这些事实发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库塔里,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哥萨克追踪退却者,

① 指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于1812年秋天从莫斯科撤退。——编者注

切断其供应线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到那时为止作战还顺利的时候,发生在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不到的地方,发生在大不列颠为自己的军队积存储备物资的巨大中心仓库内。而且这些残暴事件的祸首不是野蛮人,而是属于“一万个上层人”之列的绅士,一些性情温和的人。规章条例万岁,让军队去毁灭吧!^①“请找别的部门吧,这件事不归我们管!”——“但是去找谁呢?”——“弄清楚哪一个部门是主管部门,这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即使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也没有资格把这一点告诉您。”——“但是病员需要衬衫、肥皂、床单、住房、药品、面包和波尔图酒。他们死了好几百人。”——“英国的精英这样快地毁灭,我实在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们帮不了忙。即使我们有东西,没有六个人签署过的正式调拨令,我们也不能下发,而这六个人中有四个人不在这里,他们在克里木或者在其他地方。”即使士兵们能看到,甚至闻到那些能够挽救他们性命的东西,他们还是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那个时候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魄力去打破这套陈规陋习,能够不顾规章而根据情况的需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而且是一个女人,即南丁格尔小姐。当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时,便带领一些胆大的人,真的破门闯入了女王陛下的仓库。她向吓得呆若木鸡的军需官们说:

“我终于有了我所需要的东西。现在请你们回国报告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吧,全部责任由我个人来负。”

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事务的老懦夫们决不敢采取这样的勇敢行动,要不是我们有他们自己公开的供状,很难相信他们胆小到

^① 这句话套用了拉丁语的一句格言:正义万岁,让世界去毁灭吧! ——编者注

如此程度。比如,调查委员会曾问过他们当中一度总管过各医院的安德鲁·史密斯医生:难道在君士坦丁堡就没有购买必需物品的资金和能够买到这些东西的市场吗?他回答道:

“有是有啊!但是请您相信,在国内经历了40年之久的因循守旧和拖拉作风以后,我很难在几个月内就明白我真的可以自由支配那些资金!”^①

不列颠军队就是委托给这样一些老懦夫的!实际上,报刊上和议会内的那些极其生动的描述与听证会上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对于赫伯特们、格莱斯顿们、纽卡斯尔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对于皮尔的那些高级官员(他们在议会内不止一次地把目前已经证实的事实说成是谎言,并且以在此之前很难在这些“最受尊敬的”先生身上发现的那种激愤驳斥了这些事实),又能说什么呢!对于埃克塞特会堂²³⁴的这些纨绔子弟、皮由兹教派⁷⁷的花花公子来说,区别“变体”和“实际存在”是一个生死问题,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用谦虚掩饰着的狂妄自大指挥战争,并且在不列颠军队的“变体”方面获得那么大的成就,以致使它的“实际存在”完全消失。格莱斯顿反驳道:“它并没有消失”,“1月1日驻克里木的不列颠军队有32 000人。”但不幸的是,我们掌握剑桥公爵提供的证据:在因克尔曼会战¹⁵以后,在11月6日,不列颠军队已不到13 000人,我们知道,11月和12月以来,这支军队又损失了将近3 000人。

同时,关于下院对内阁表示愤慨的消息、关于罗巴克委员会以及关于国内群情激愤的消息传到了克里木。这些消息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但使将军们和各部门的长官们感到恐惧。一星期以后又传来消息说,受权进行调查和谈判的特派员已在途中。这个消息就像

^① 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编者注

一股电流那样刺激了那帮麻木不仁的人。同时,不受传统、规章和官僚恶习束缚的铁路工人行动起来。他们控制了一个登陆地点,拿起了铁锹,修建了船厂、掩蔽所和堤坝,而且当滑稽可笑的老绅士们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第一批铁轨已经铺成了。对于围攻来说,这条铁路也许没有什么意义,铁路所能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用更省钱更简便的办法也可以取得,但是它的极大好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例,把墨守成规的无可救药的英国与现代化的工业英国作了活生生的对比。铁路工人的“前进”行动破除了使整个不列颠军队执迷不悟的魔法,这种魔法是由于幻想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这种幻想把英国官兵引向土耳其人的愚昧的宿命论,诱使他们平心静气地把确定无疑的毁灭看成是命中注定的厄运。由于铁路工人的行动,在军队中又出现了“自助者天助之”的说法。在六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样。拉格伦和他的司令部,各个师和旅的将军们天天都到堑壕里视察和指挥。军需部找到了马匹、大车和车夫,而部队也为自己的病员、同时部分地也为自己找到了住的地方。医务主管部门消除了医院帐篷和隔离病房内的骇人听闻的景象。开始有了弹药、军服以至鲜肉和蔬菜。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来,虽然还有许多应该加以克服的旧弊病,但是状况的改善则是无可置疑和令人惊异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3月28日

载于1855年3月31日《新奥得
报》第15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弗·恩格斯

战争的进程²³⁵

正当外交家们聚集在维也纳讨论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同盟国试图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缔结和约的时候，俄军在克里木却利用自己在这一地区所处的中央位置以及敌人所犯的错误，再次全面转入进攻。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联军在入侵之初的大话，那么目前的状况就很可笑，而且好像是要把人的自恃和愚蠢大大嘲弄一番。然而，这出戏虽然因此而具有滑稽可笑的一面，但毕竟是个大悲剧。我们再次请我们的读者把亚美利加号轮船在星期日^①早晨带来的邮件中所披露的最新情况认真地加以研究。^②

在叶夫帕托里亚，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实际上已被从陆地方面封锁住。俄军在骑兵数量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前哨和骑兵哨一直派到城边，在城外巡逻，切断敌人的供给线，遇到敌人猛然出击时，就退到自己的步兵阵地。可见，俄军正做着我们以前预料^③他们会做的事，即以可能还不超过土军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钳制

① 1855年4月15日。——编者注

② 从“然而，这出戏虽然……”到本段结尾，显然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改动过。——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15—218页。——编者注

着土军的优势兵力。因此，奥美尔帕沙等待着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他还到英法营地去，向联军声明他此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迫切需要法军派出约1万人的增援部队。毫无疑问他需要增援部队，但是康罗贝尔自己同样也需要增援部队。康罗贝尔到这时候必定已经发现，他所掌握的军队既太多又太少。如果只是继续进行包围并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是要强渡黑河，把俄军击退到半岛的腹地并围攻北炮台，兵力就不够了。派1万人到叶夫帕托里亚，不足以使土军顺利地进行战斗，而应该在春季增援部队到达后进行战斗的法军，如果少了这1万人，战斗力就会受损。

现在这场包围战的情况真是一团糟。朱阿夫兵¹¹⁷2月24日夜袭的结果，比我们一星期前所报道的甚至更糟^①。从康罗贝尔自己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他下达袭击命令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说：

“袭击的目的既已达到，我军即行撤退，因为不可想象我军能在一个完全被敌人火力控制的地方坚持下来。”^②

但究竟达到的是什么呢？既然这一地点不能扼守，那么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干。摧毁多面堡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在敌人火力下当然也无法完成，即使如第一次报告中所称，朱阿夫兵一度完全攻占了多面堡，这个任务也是无法完成的，何况朱阿夫兵也根本没有完全占领多面堡。俄国人的报道也对朱阿夫兵曾完全占领多面堡一事坚决否认，而且康罗贝尔现在也绝不妄称确有此事了。

① 见本卷第251—254页。——编者注

② 弗·康罗贝尔《电报。1855年2月27日》，载于1855年3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08号。——编者注

那么,这次袭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不过是这样:康罗贝尔看到俄军占据的阵地使围攻者既难办又难堪,于是不假思索,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后果,就命令军队进攻。简直是让士兵白白送死。这将严重损害康罗贝尔的军事声誉。如果要找一个辩解的理由,那就只能这样设想:法军士兵要求强攻太心切,这位将军有意让他们先稍微尝一尝强攻的滋味。但是这种辩解,正如这场袭击本身一样,也是使康罗贝尔丢脸的。

通过马拉霍夫冈一战^①,俄军在紧靠自己防御工事前面的地段上占了优势。朱阿夫兵未能攻下的那座位于高地顶端的工事,俄军按照防守它的那个团的名称,叫它色楞金斯克多面堡。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信心倍增地巩固自己的优势。色楞金斯克多面堡扩大并加固了,运来了火炮,当然,肯定是冒着围攻者极为猛烈的射击运来的。在多面堡的前方还挖掘了反接近壕,可能是为了在堡前再构筑一两个小型工事。在另一处,即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俄军在原有的工事前方 300 码处还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按照英国人以前的报告来看,俄军能够这样做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我们一直听说,联军已经在距俄军防线比这还要近的距离上修了自己的堑壕。但是在大约一个月以前就有一流的权威性专门资料让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法军战线距俄军的外围工事仍然还有大约 400 码,英军战线甚至还要远一倍。现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终于在 3 月 16 日的通讯中承认,到当时为止,英军的堑壕仍然还有 600—800 码之远,而且准备向敌人开火的炮位,还是去年 10 月 17 日开火的那些炮位!这就是围攻的巨大进展,这就是以三分之二的英军牺牲生命为代价所取得的堑壕

^① 见本卷第 251—254 页。——编者注

的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两军炮位之间有足够的地方供俄军构筑这些新的工事，但在这样的地方构筑工事毕竟是被围守军从未采取过的最大胆最巧妙的做法。这无异于对着联军在距离他们的工事 300—400 码的地方构筑一条新的平行壕，一条对付围攻者的最大限度的反接近壕，从而使围攻者立即转入守势，而围攻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围攻者要使被围者处于守势。这样一来，形势整个逆转，俄军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不管俄国工兵在希尔德的指挥下在锡利斯特里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做过什么样的荒唐试验，¹⁴但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联军要对付的显然是另一种人。俄军工兵在构筑塞瓦斯托波尔周围防线中的表现是：眼力准确而敏锐，施工快速、大胆、无误，不懈地密切防护任何被敌人发现的薄弱环节，火力配系组织得极为出色，能向正面任何地点集中优于敌人的火力，在第一线工事之后构筑第二、第三、第四线工事——总之，这里的全部防御工作堪称典范。最近在马拉霍夫冈和科尔尼洛夫棱堡前面以进攻态势向前推进，在包围战中是史无前例的，这说明策划者是第一流的专家。还必须公正地补充一点，塞瓦斯托波尔的工程长官是托特列本上校，他是俄军中一位不太出名的人物。然而，不应当把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看做是俄国筑城术的典型，介于锡利斯特里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水平比较切合实际情况。

不论在克里木，还是在英国和法国，人们现在已开始懂得（虽然很慢），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泰晤士报》就这种窘境请教了“大军事权威”并得知，正确的做法是采取攻势：要么渡过黑河，在同俄国的监视军打一仗之前或之后同奥美尔帕沙的土军会

合；要么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军分散兵力。既然现在联军的兵力据推测有 11 万—12 万人，这样的行动应该是联军力所能及的。其实康罗贝尔和拉格伦比谁都清楚，渡过黑河同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会合是非常迫切的；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多次证实的那样^①，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的联军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达到过 11 万—12 万人。到 3 月 1 日，有作战能力的不超过 9 万人。至于远征卡法，那是俄军求之不得的事。联军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怎么可以将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大军事权威”一本正经地奉劝《泰晤士报》提出再走远征叶夫帕托里亚²⁰²老路的主张，肯定是在捉弄它！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3 月 2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6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135—136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论克里木局势²³⁵

伦敦,3月30日。关于和谈进程的报道腔调一天一个样。今天说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说战争是不容置疑的。帕麦斯顿在《邮报》上以利剑和火炮相威吓——这证明他想尽早缔结和约。拿破仑命令自己的报刊大唱和平赞歌——这最确凿地证明他打算继续战争。克里木事件的进程绝难说明塞瓦斯托波尔即将被攻陷。在叶夫帕托里亚,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实际上已被从陆地方面封锁住。俄军在骑兵数量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前哨和骑兵哨一直派到城边,在城外巡逻,切断敌人的供给线,遇到敌人猛然出击时,就退到在他们后面的步兵阵地。可见,正像我们以前所预料的那样^①,俄军以相当于土军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钳制着土军的优势兵力。在伊斯肯德贝伊(波兰名字叫伊林斯基,他是在卡拉法特之战¹²中出的名)指挥下的土耳其骑兵进行了出击,但是被三支从三个不同地点同时向土军攻击的俄军分遣队所击退。像所有训练得不好而又缺乏自信的骑兵一样,土军没有拔出马刀向俄军狠命冲击,却停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用马枪向俄军射击。这种显然是不果断的表现使俄军

^① 见本卷第215—218页。——编者注

转入进攻。伊斯肯德贝伊企图带领一个骑兵中队猛冲,但是除了巴希布祖克²³⁶外,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不得不在俄军包围中杀出一条退路。奥美尔帕沙等待着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他还到英法营地去,向联军声明他此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迫切需要法军派出约1万人的增援部队。毫无疑问他需要增援部队,但是康罗贝尔自己同样也需要增援部队。康罗贝尔已经发现,他所掌握的军队既太多又太少。如果采用老办法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和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要强渡黑河,把俄军击退到半岛的腹地并围攻城市的一侧,兵力就不够了。派1万人到叶夫帕托里亚,不足以使土军顺利地进行战斗,同时还会削弱法军在开阔地上的战斗力。围攻使围攻者一天天陷入困境。

我们看到,俄军在2月24日坚守住了萨蓬山上的多面堡(在马拉霍夫冈工事前面)。^① 俄军现在已扩大和加固了这个多面堡,并设置了火炮,还在多面堡前挖掘了反接近壕。在另一处,即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俄军在原有的工事前方300码处还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这对《泰晤士报》的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联军早就在距俄军防线比这还要近的距离上修了自己的堑壕。现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终于承认(例如3月16日的通讯),到当时为止,英军的堑壕仍然还有600—800码之远,而且实际上,准备向敌人开火的炮位,还是去年10月17日开火的那些炮位。这就是围攻的巨大进展,这就是以三分之二的英军牺牲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所取得的堑壕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两军炮位之间有足够的地方供俄军构筑这些新的工事。这无异于对着围攻者在距离他们的

^① 见本卷第250—255页。——编者注

工事 300—400 码的地方构筑一条新的平行壕，一条对付围攻者的最大限度的反接近壕，从而使围攻者转入守势，而围攻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围攻者要使被围者处于守势。

像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营里一样，人们现在在英国也已开始发现，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泰晤士报》就这种窘境请教了“大军事权威”并得知，必须采取攻势：要么渡过黑河，在同俄国的监视军打一仗之前或之后同奥美尔帕沙的土军会合；要么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军分散兵力。既然现在联军有 11 万—12 万人，这样的行动应该是联军力所能及的。《泰晤士报》就是这样报道的。

其实拉格伦和康罗贝尔比谁都清楚，同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会合是非常迫切的。但遗憾的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的联军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 11 万—12 万人，有作战能力的最多不过 8 万—9 万人。至于远征卡法，那是俄军求之不得的事。联军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務，怎么可以将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泰晤士报》的建议像是从“俄国”军事专家那里讨教来的。

由于法军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在途中，而其余部分以及第十三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皮埃蒙特师¹¹⁰已准备随后开来，所以到 5 月底联军的兵力将达到使它能够而且不得不从黑河的防御阵地向前推进的程度。各路军队将在君士坦丁堡集中，他们可能同时乘船出发，以便在不祥的赫拉克利亚半岛停留尽可能短的时间。这个办法可能会使行动迟缓一些，然而会确保很大的好处。到目前为止，一小队一小队分批派到克里木的增援部队虽然合在一

起算是一支军队,但是始终没有使远征军加强到能够发动进攻的程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3月30日

载于1855年4月2日《新奥得
报》第15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立法团的丑事。——
德鲁安-德路易斯的
影响。——民军的现状²³⁷

伦敦,4月3日。来自巴黎的报道:

“波拿巴的立法团中上演了一出戏,有关这出戏的消息没有传到英国的报界。在辩论代役法²³⁸时,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在蒙塔朗贝尔发言之后从座位上跳了出来,激愤之中说漏了嘴。他说,只有让这个法律生效,军队才会成其为军队——效忠于秩序和皇帝^①,我们就不会再看到士兵倒戈(soldats à baionnettes renversées)这种丢人的场面。讲话中这个公然颂扬土耳其近卫军²³⁹制度是军队的楷模的结论,甚至在这次会议上也引得举座哗然,格朗尼埃只得坐下。立法团的另一个议员站起来抨击格朗尼埃。如此大的丑闻,甚至莫尔尼也不得不要求卡桑尼亚克(众所周知,基佐还在卡桑尼亚克编辑无聊的小报《地球报》时就把他叫做丑角之王)进行解释。格朗尼埃十分沮丧地表示了正式的歉意,甚至提议在《通报》上对这场风波保持缄默。会议开得如此激烈,简直就同路易-菲力浦时代众议院极盛时期一模一样。”

今天的《纪事晨报》写道: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英国公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德鲁安 德路易斯先生到维也纳去，是为了给约翰·罗素勋爵私底下出主意打打气，罗素勋爵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既没有使自己的同胞，又没有使我们的盟友感到满意。这位高贵的勋爵名声不佳，因为他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一阵没一阵的，当他处于反对派地位或者必须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候，他就极度地热心于公益；只要直接的必要性一消失，他就偃旗息鼓。看来眼下他又有了类似的表现，人民开始抱怨了……在德鲁安 德路易斯先生来过伦敦以后，上层集团中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坚定的语调。甚至有传闻说他的使命完成得十分成功，以致使约翰·罗素勋爵的和平努力遭到官方反对，使我们的实力人物（帕麦斯顿）也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提出很可能会遭到俄国轻蔑拒绝的最后通牒。”^①

英国的军队已经消失了，英国的民军也正在消失。根据德比勋爵执政时期⁸⁶的1852年议会法令所建立起来的民军，按照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服役期一年应当不超过28天。但是，在发生外敌入侵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时，民军应当能够长期服役。可是，根据1854年的议会法令⁷，所有在1854年5月12日以后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义务服役到战争结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规定那些根据1852年法令应征入伍的人的义务。王室法律顾问们声称，他们认为这一类人也应当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与法学家们的这项裁定相反，潘缪尔勋爵在几个星期前颁布了一项命令，规定所有在1854年法令颁布前应征入伍的人都可以退役，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再服役五年，他们就可以得到1英镑的报酬。因为目前在正规军队中服役两年的新兵的报酬，步兵是7英镑，骑兵是10英镑，所以在民军中服役五年报酬不过是1英镑这一点，就成了解散民军的最可靠的方法。将征募民军一事几乎拖延了一年之久的帕麦斯顿勋爵，看来一有机会便想重新甩掉民军。据此我们得知，最近两个星期来民军团一个

^① 1855年4月3日《纪事晨报》第27541号。——编者注

接一个地减少了三分之二到八分之五的人员。例如,萨默塞特民军第一团 500 人中有 414 人退役,北达勒姆民军 800 人中有 770 人退役,莱斯特民军 460 人中有 340 人退役,萨福克炮兵 130 人中有 90 人退役等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4 月
3 日

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新奥得
报》第 16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²⁴⁰

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处境上周未见改善。气候好转当然使疾病大为减少,使军营恢复了几分喜悦。但是俄军也同样分享着这些好处。越是两军都处于能够履行其军事职能的状态,纯粹属于军事性质之事就越是意义重大了。

我们的读者知道,俄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于2月20日左右,占据了基连湾以东一个名叫萨蓬山的山冈,并冒着联军的搅扰在山冈上建成了一个名叫色楞金斯克的多面堡。他们在24日上午遭到法军纵队的进攻,但守住了他们的阵地,很快就给该多面堡配备了大炮。3月11日他们采取了更大胆的步骤,占据了位于马拉霍夫冈即圆塔冈东南不远处的另一个山冈。马拉霍夫冈是俄军在基连湾西南防线的重点。他们在新占据的这个山冈上也修了一座多面堡之类的工事,这样就使马拉霍夫冈有了两个新的外围工事来掩护,一个在正前方,另一个在其左侧。以其居高临下的位置而被联军的将军们视为俄军防线之锁钥的马拉霍夫冈,因此就有了可靠的屏障,防御力得到加强,即使是由一支不太顽强、指挥官不太高明的驻军防守,攻破这个屏障也要多花一周或10天的时间。围攻一方的指挥官竟容忍被围一方就在他们炮台的护墙下构筑这些工事,这是他们永远也洗

刷不掉的耻辱。^①

同时,俄军不仅给这第二个更靠前一点的多面堡配备了16门大炮,而且还在它的前面修了一排散兵壕,共有六个,都是小型堑壕,用堑壕中挖出的泥土筑成胸墙,墙面覆以沙袋。这些堑壕内约有60名最佳射手,从射孔向外射击,严重地骚扰敌方堑壕内的守军和炮队。法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在大炮的掩护下对这些散兵壕进行了三次徒劳的夜袭。每一次他们最后都不得不放弃尝试,而被他们放弃的那些散兵壕很快又被俄军射手重新占领,从3月17日以来一直掌握在俄军手中。法军在这几次战斗中的总体损失肯定是惨重的,因为他们只能冒着俄军炮台近在头顶之上的交叉火力毫无掩护地战斗。

22日夜晚,俄军在预料敌军已准备再次发起进攻的情况下抢先出击。这次夜战双方又是打得十分顽强,肯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有关此次战斗的简短电讯中,双方均自称获得胜利。康罗贝尔甚至还补充说联军损失600人,俄军损失2000人。不过伦敦《先驱晨报》记者关于此事的报道显然要可信得多,他的叙述本报也刊登了,他所谈的各点都为拉格伦勋爵的正式报告^②所证实。看来俄军是向城东面联军防线全线出击的,意在占领和摧毁英法军队的前沿工事。战斗是在晚上10点过后不久,在城内大炮猛烈射击的掩护下开始的。英军防线有1500人左右的守军防守。他们一如英军远征军登陆克里木半岛以来在每次短兵相接时所表现的那样,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俄军的猛攻遇到殊死抵抗,英军工事未受损坏。但是法军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被赶出堑壕。堑壕被俄军占领足有半小时之

^① 这段话可能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② 指菲·詹·拉格伦《1855年3月24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编者注

久。在此时间内很大一部分工事被摧毁。正如英国记者所说,如果进攻英军防线的俄军不是被一举击退,那联军肯定要遭受重大损失。按照报道的描述,堑壕内战斗十分激烈,交战双方相距不过20码,彼此排枪齐射。^①英军的损失按照拉格伦勋爵的说法是68名官兵伤亡和失踪;法军的损失估计是伤亡500人,而俄军的损失更大,当然不可能达到康罗贝尔报告中所提供的数字。《泰晤士报》记者的估计是600人或700人。双方都有一些人被俘。

从这次战事中得到好处的显然是俄军。他们突破了敌军防线,捣毁了一部分工事,封死了三个炮群的大炮火门。而这也就是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投入兵力不超过15 000人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从英国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向英军进攻的部队约为6 000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当然他们是撤退了,因为每次出击均以撤退告终,他们的损失也比联军大,但是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抢在敌人进攻自己工事之前破坏敌人的工事。这肯定不是康罗贝尔所声称的那种胜利,也没有任何一点可算做成功的东西能够拿来抚慰和平息法军的不驯和不稳的情绪。

这种情绪我们以前曾提到过,但是可能不够详细,不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法军的状况,就纪律而言,的确令人担忧。老是无所行动,或者更糟糕,干些无益的行动,这在任何军队里最终的结果将是使秩序和服从的约束力化为乌有,在一支法国军队里尤其如此,而且这样的结果来得极快。而另一方面,在取得成功和指挥确实坚强有力、英明果断的情况下,法国军队的纪律也会恢复得比任何别国军

^① 从“不过伦敦《先驱晨报》记者……”到“……彼此排枪齐射”这段话可能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 编者注

队都快。法国军队从 1849 年以来经历了许多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军纪削弱的趋势。军队先是被资产阶级,后是被路易·波拿巴吹捧为秩序的救星,国家的精英。它被公然宣布为法兰西命运的主宰。它的广大官兵为路易·波拿巴的香肠加白兰地和鸡鸭加香槟酒所购买。为使他们更加支持波拿巴主义大业,放松了纪律,多次宣布对军人罪犯实行赦免。只有一条是用非常严厉的办法对待的,这一条就是政治。波拿巴主义连同其伴随物——荣耀、掠夺和隐约可见的晋升前景——就成了军队当然信奉的宗教。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被禁止,其拥护者被流放到非洲,编入劳役连和劳役营,去干最苦最危险的活。军队的广大官兵很少有人受到这种待遇。士兵有随意喝醉酒的自由,甚至归营号响过以后才回营也可以不受处罚,还有什么必要谈论自由!士兵享受到的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帝国宣布成立以后,曾试图制止这种无纪律的行为。但是像圣阿尔诺、马尼昂以及埃斯皮纳斯这样的人能对士兵们施加什么影响?前两人私吞公款的事人人议论,后者靠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背叛行为换得其将军肩章。军官越来越不受尊敬,衰落帝国¹⁶⁵的武将们正是将把帝国断送得干干净净的人。在这次战争爆发时法军就处于这种可悲的状态。第一次受挫是愚蠢地远征多布罗加地区——连敌人没有见到。^①就是这第一次挫折几乎导致整整一个师公开哗变。朱阿夫兵¹¹⁷几乎都是代役兵²³⁸,这些人来历可疑,绝无原则,性喜冒险,桀骜不驯,但却身强力壮,不乏勇气——这些朱阿夫兵利用这个机会也像利用其他一切机会一样,带头大喊大叫发泄不满,制造事端。如果是在别

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16—625 页。——编者注

的时候,这样制造事端结果一定是队伍被强制解散,立即受到惩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好视而不见。阿利马河⁹和因克尔曼¹⁵暂时缓和了一下闹事部队的情绪,但是长时间无所行动又受着冬季的折磨,吃苦受累而无任何结果,这很快就又加剧了桀骜不驯的状态。他们采取了推出大批代表要求攻城以及其他种种形式对将军们表示不信任。有一次,朱阿夫兵甚至前来威胁总司令。近来遭到的挫折更使这种不驯服的状态达到极点,除非确实取得一次胜利,或者士兵们有了其他某种能够取得成功的事情可做,否则后果实难逆料。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2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²⁴¹

1855年4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请允许我在中断一段时间之后恢复与《论坛报》的通讯。^①

昨天和今天大概是维也纳会议⁴的头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因为会议定于9日在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出席的情况下开幕,同时,估计俄国大使^②已经接到关于第三和第四项条款³的指示。在所有的交易所里,一开始就把德鲁安-德路易斯此行吹捧成确定无疑的和平征兆。据说,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如果不确信谈判会获得成功,肯定不会亲自参加这种谈判。至于这位外交家的“杰出品质”,那就完全带有神话般的特性,而且主要是存在于由他支付报酬的那些报纸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他把自己打扮成达来朗第二,似乎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多年经历中,不曾很早就树立过“杰出的”庸碌之辈的名声。他这次出行的真实原因是:约翰·罗素勋爵靠人所共知的不懂法语,竟在数星期之内用他从来不打算作的让步束缚住了盟国,因此现在需要花费大力气来收回这些让步。约翰勋爵的法语

① 这句话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亚·米·哥尔查科夫。——编者注

是典型的约翰牛的语言,是《弗拉·迪亚沃洛》以及过去在法国流行的其他剧本中的“大人”^①所使用的语言;他从“老板先生”这句话开始,而以“很好”这句话结束。如果他只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的一半,那么他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他感到别人能听懂他的话还更少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朋友和竞争者帕麦斯顿勋爵才把他派到维也纳去,估计在这种场所只要有两三次重要的失误,就足以把可怜的小个子约翰彻底毁掉。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罗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听不懂谈话的内容,对于哥尔查科夫或布奥尔的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快速插话,这位不走运的初次登台的外交家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很好”。这就使俄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奥地利以为,某些条款,至少就英国而论,已经达成协议,尽管可怜的约翰勋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作出这种让步。帕麦斯顿自然不会反对,反正全部过错都落在他的不幸的同僚头上。但是,路易·波拿巴不能容许别人用这种欺骗的办法来诱使他缔结和约。法国政府希望结束这种外交,因此决定立刻了结这件事情。它拟定了一份最后通牒,由德鲁安-德路易斯带着去伦敦,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然后又带着这份文件前往维也纳。这样一来,德鲁安-德路易斯现在可以看做是法国和英国的共同代表,而且毫无疑问,他会利用这种地位尽可能地为自己主子的利益服务。既然路易·波拿巴唯一关心的是:在他还没有为法国取得新的荣誉和新的优势之前,在战争还没有充分达到其作为“统治手段”的目的之前,他就不缔结和约,那就很明显,德鲁安-德路易斯的使命绝对不是和平的;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无疑是在尽可能漂亮的借口下

① 指科伯恩勋爵,他是法国作曲家丹·弗·奥柏根据奥·欧·斯科里布的脚本创作的喜歌剧《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兄弟》)中的人物。

编者注

保证战争继续进行。

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集团内，这场战争根本不受欢迎。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从12月2日¹¹²起，这个阶级对“社会救主”的政府始终采取完全反对的立场。在英国，资产阶级有分歧。它的大部分将自己对法国人的民族仇恨转移到了俄国人身上。虽然约翰牛自己不时地在印度搞点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很近让它感到不自在的地方也这样干。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焦虑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黎凡特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佩宗特同亚洲内地的贸易大规模增长，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多瑙河沿岸各国作为谷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这些国家，也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此外，在英国常常流传着关于俄国向中亚挺进这样一些捉摸不定的、使人惶惶不安的谣言；不熟悉地理的英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那些与此事有利害关系的印度事务政客和吓破了胆的幻想家所大力散布的这种谣言。因此，当俄国开始侵略土耳其时，民族仇恨马上就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也许，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那样深得人心。主和派只好暂时保持缄默；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员也跟着大流走。但是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肯定会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直接的个人利益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肯定会比对全民族的大优势

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皮尔派⁷¹——与其说由于真正爱好和平,不如说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和胆怯(这种局限性和胆怯总是使他们在碰到任何大危机和果断行动时就感到恐慌)而反对战争——采取种种措施,企图使一个美妙的时刻加快到来,到那时每个英国商人和工厂主都能分毫不差地计算出他个人每年要为战争付出多少钱。格莱斯顿先生轻视发行公债,认为这个主意太俗,于是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财政改革。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主和派²⁴²又重新抬头了。约翰·布莱特以他固有的毅力和顽强精神大胆地起来反对公众的情绪,终于使工业区倒向他这一边。在伦敦,情绪仍然有利于战争,但是主和派影响的增长甚至在这里也明显可见。此外,还应当提到,和平协会³⁴以往在首都从未产生过任何重大的影响。然而它正在全国加紧鼓动工作,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的农民从1789年起,就是战争和军事荣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次农民们都确信,他们不会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重担,因为在土地无止境地分散在小私有者之间的国家里,征兵不仅使农业区摆脱剩余的劳动力,而且每年使约两万年轻人有可能作为代替者去服兵役²³⁸,使他们有机会挣相当多的钱。只有持久的战争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至于战争税,皇帝不敢把它加在农民身上,他不会拿自己的王冠和生命去冒险。他在农民中间维护波拿巴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免除农民的战争税以收买农民的好感;因而在最近几年内农民大概能免于这种压迫。

在英国,情况也大致相同。农业劳动力通常存在过剩现象,士兵

基本来自农业劳动力,只是在战争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才从城市的不安分的人中间得到大量的补充兵员。战争开始时商业多少还令人满意,在农业方面又作了一系列的改进,所以这次农村新兵的数量比过去少一些,而目前民军中市民显然占多数。但是即使应征入伍的人数减少,工资也还是提高了,而农村居民的同情心又总是在来自他们中间的、现在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士兵这一边。直接税并不触犯小佃农和农业工人,必须经过几年战争他们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上间接税的增加。在这些人中间,好战热情一如既往地强烈;没有一个乡村在新开设的啤酒店的招牌上不写着“阿利马的英雄”等诸如此类的题词,乡村里几乎每一家的墙上都装饰着描绘阿利马河会战⁹、因克尔曼会战¹⁵、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攻击¹⁰的漂亮彩画以及拉格伦勋爵等人的肖像。但是,在法国,小农由于占巨大优势(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且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特殊态度,因而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而在英国,仅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则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只不过扮演了土地贵族的附属品和应声虫的角色。

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业工人对战争采取了几乎是同样的特殊态度。无论英国无产者还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见。同胞们的胜利能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法国人鲁莽地过于自信地指挥战争,而英国人胆怯地愚钝地指挥战争,则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动机会来反对现政府和执政阶级。除此之外,战争对他们就很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下面这一点:这场战争与商业危机(目前还只有一些初步表现)结合在一起,由那些没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的人们所指挥,同时又具有欧洲规模,就必然会引起一些事件,而这些事件将使无产者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在法

国 1848 年六月战斗²⁴³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

在法国,任何新的革命风暴早晚会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对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在英国,事态很快就會发生同样的变化。贵族阶级希望继续战争,但是又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它在去年冬季指挥战争不力,声誉已经完全扫地。资产阶级不希望继续战争,但是战争现在又不可能结束;资产阶级为了和平而不惜牺牲一切,从而证明它没有能力治理英国。如果事件迫使贵族阶级连同它的各种派别离开政权,同时也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阶级能执掌政权:小资产阶级即小商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在每一次需要它把言论变成行动时,都暴露出缺乏毅力和果断精神;后者则在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行动时,常常因表现出过多的毅力和果断精神而受到指责。

究竟哪一个阶级能使英国经受住目前的搏斗和摆脱即将由此而产生的纷杂局面呢?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4 月
10 日

载于 1855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拿破仑的辩白²⁴⁴

拿破仑第三以《通报》总编辑的身份就克里木远征发表了一篇冗长的社论^①，其中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及时刊登了。^②这篇宣言的目的显然是，就所采取的行动遭到失败一事安慰公众；特别是推卸这位皇帝对失败所负的责任；同时回答拿破仑亲王最近出版的那个著名的小册子¹⁹¹。这篇以半亲昵、半威严的笔调（这是同时为法国农民和欧洲各国政府撰写文章的这个人特有的风格）写成的文章很像是在讲述这场战争的历史，其中夹杂着为每一个步骤所臆造的根据。有些根据需要特别加以研究。^③

① 指拿破仑第三在1855年4月11日《总汇通报》第101号上匿名发表的《东方远征》一文。——编者注

②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为题，发表在1855年4月17日《新奥得报》第177号。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从开头到这里的文字为：“伦敦，4月14日。公众，甚至法国的公众，看来都已识破塞瓦斯托波尔围攻的秘密。因此，路易·波拿巴以《通报》总编辑的身份就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一篇冗长的社论。”——编者注

③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没有“有些根据需要特别加以研究”，这句话被修改为：“这个文件极为拙劣，因为它论理极其苍白无力，极其不充分。但是，既然波拿巴被迫用这种办法讲话并替自己辩护，可见‘外界的压力’是很大的。”——编者注

这位皇帝冒险家告诉我们，^①联军之所以被派到加利波利，是因为如果不这样，俄军可能在鲁斯楚克附近强渡多瑙河，迂回瓦尔纳至舒姆拉一线，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在可以引来为加利波利登陆辩护的所有理由中，这是最坏的一个。首先，鲁斯楚克是要塞，而似乎不像《通报》的这位尊贵的编辑想象的那样，是不设防的城市。^②至于谈到俄军这一侧敌行军的危险性，那就应当想到：俄军如果不派强大的兵力去监视固守在四大要塞^③之间的6万土军，那么这6万土军是不可能让他们毫发无损地通过的；这一侧敌行军会使巴尔干山脉峡谷中的俄军陷于杜邦在拜伦和旺达姆在库尔姆²⁴⁵那样的境地；在最好的情况下俄军能够到达阿德里安堡的人也不会超过25 000人。至于认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土耳其的这个大城市造成了威胁的那些人，如果他们读一读最近在伦敦出版的毛奇少校那本有关1829年战争的著名著作的英文版^④，就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⑤

①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本段开头的文字为：“在冗长的前言之后，公布了圣阿尔诺在作战初期所接到的指令的部分内容。”——编者注

②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这句话后面补充了如下文字：“这令人联想到不久以前《通报》所出的历史性洋相，它竟然在关于尼古拉皇帝的讣闻中将阿德里安堡条约⁵⁰和库楚克·凯纳吉条约⁴⁹混为一谈。”——编者注

③ 即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亚、舒姆拉和瓦尔纳。——编者注

④ 赫·卡·毛奇《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该书英文版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标题为《俄军1828—1829年在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编者注

⑤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这句话被修改为：“至于认为这样

我们从《通报》得知,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危险,那么联军就应派几个师向瓦尔纳推进,以便粉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任何企图。在这以后可能的行动有两个:或者在敖德萨附近登陆,或者攻占克里木。联军的将军们应当就地讨论这两个行动。这就是给圣阿尔诺的指令,指令末尾是用箴言和格言形式写的几点英明的军事忠告:要经常了解敌人在做什么。要集中兵力,绝对不要分散兵力;当被迫分散兵力时,要使他们能在 24 小时内重新集结于指定地点,等等。^① 的确都是非常宝贵的行动准则,但却是老生常谈和人所共知的东西,以致使阅读者必然会立刻得出结论:圣阿尔诺在他的主子眼中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笨蛋和最大的不学无术之徒。然后指令用下面几句话结束:

“元帅,您享有我的充分信任! 出发吧,我相信在您富有经验的指挥下,法兰西之鹰将获得新的光荣。”^①

至于谈到主要的一点,即克里木远征,波拿巴坦言,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想法,后来他为此给圣阿尔诺发出一批新的指令。但是他否认拟定过详细的计划并把计划送到大本营。按他的说法,将军们是可以选择在敖德萨附近登陆的。作为证明,波拿巴引用了新指令中的一个段落,在这段话里波拿巴提出在费奥多西亚(卡法)登陆,因为考虑到那里有安全而宽阔的停泊场,可供必然成为军队作战基地的舰队使用。至于什么是作战基地,他早在最初的指令中就向圣阿

的一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的那些人,他们可以从毛奇少校撰写的关于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书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编者注

① 1855 年 4 月 12 日《每日新闻》第 2776 号。——编者注

尔诺作过解释,他解释的方式让人确信,这位著名的元帅肯定从没读过任何专业的专业书籍。^①军队应该从卡法这个地点开往辛菲罗波尔,把俄军赶到塞瓦斯托波尔,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墙前面也许要打一仗,最后再围攻该城。“不幸得很,联军的将军们没有执行”这个“计划”。但对这位皇帝来说,这却成了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因为它使皇帝摆脱了对整个事件的责任,而把一切推到将军们的身上。

这个以6万士兵在卡法登陆并由该地进击塞瓦斯托波尔的计划的的确是别出心裁。按照一般的规则,在敌人领土上的军队离作战基地的距离增加多少,其进攻能力至少就会减弱多少,试问:经过120多英里的行军以后,联军还会有多少人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必须留在卡法的有多少人?扼守和巩固中间地点需要多少人?保护运输和肃清地盘又需要多少人?也许,在要塞的城墙下连集中2万人都办不到,然而仅是封锁这座要塞就需要比这多两倍的兵力。如果路易·波拿巴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么他便可以立刻在伦敦的米瓦特饭店²⁴⁶给自己订下套房,因为他永远回不去巴黎了。^②

至于谈到卡法安全的停泊场,那么黑海的每个水兵都知道而且任何航海图都标出:卡法是一个暴露的停泊场,只能挡住北风和西

-
- ①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这句话被修改为:“至于什么是作战基地,他早在最初的指令中就尽力最详尽最通俗地对这位著名的元帅作过解释。”——编者注
- ②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这句话被修改为:“如果波拿巴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么两个出自同一家族的人无疑将会成为战史上最鲜明的对照。”——编者注

风,而黑海上最可怕的风却是南风 and 西南风。例如 11 月 14 日的风暴²²便是这样。如果舰队那时停泊在卡法附近,那它一定会被刮上海岸。这样,我们的英雄就卸脱了他的堂弟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又不便牺牲拉格伦和康罗贝尔。因此,为了证明这两位将军的才干,他又根据沃邦的原理,一本正经地对围攻法作了概略的描述,他的描述假定阅读者对这一领域是全然无知的,从中可以看出,这可能是写给圣阿尔诺元帅看的。^①

但是这个描述只是证明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能攻克的,因为它最后断言所有的规则都不适用于塞瓦斯托波尔。例如:

“在一般的围攻中,一个方向受到攻击,最后一道平行壕的长度大约有 300 码,垂直壕全长不超过 4 000 码。而在这里,平行壕却长达 3 000 码,垂直壕的全部直线长度则达 41 000 码。”^②

的确是这样,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为什么当全部情况要求把火力尽最大可能集中到一两个确定地点的时候,却反而把攻击线拉得这样长呢?答案是:

“塞瓦斯托波尔不同于其他要塞。那里只有一条不很深的护城壕;没有石质内岸,代替这些防御工事的是鹿砦和防栅,因此,我方火力只能对土质胸墙起很小的作用。”^③

①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从“这样,我们的英雄”到“这可能是写给圣阿尔诺元帅看的”这段文字被修改为:“接着,是社论最棘手的部分。路易·波拿巴自以为他自己已侥幸地卸脱布鲁塞尔小册子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又不便牺牲拉格伦和康罗贝尔。因此,为了证明这两位将军的才干,他又对围攻法作了概略的描述。”——编者注

② 1855 年 4 月 12 日《每日新闻》第 2776 号。——编者注

如果这不是为圣阿尔诺元帅写的,那肯定是特地为法国农民的需要而写的。在法军中,连海军中尉都会对这派胡言哈哈大笑。防栅只要不是设在护城壕底,至少不是在敌方的视野之外,那就很容易为霰弹所毁。鹿砦可以烧毁,应当设在斜堤脚附近,距胸墙约60—80码,否则就会妨碍炮兵射击。此外,鹿砦必须是粗大的树木,横放在地上,使砍尖的枝干朝向敌方,并且要把它们牢固地连接起来。然而,在一个像克里木那样的无林区哪里有树木呢?关于这一点《通报》却只字不提。没有石质内岸与久攻不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据《通报》自己的描述,只有在攻城炮队已经在斜堤顶部固守下来时,石质内岸才能发挥作用,而联军至今为止离这个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说什么防栅比石质内岸进了一步,这真是新发现;要知道,这种木质工事即使位于壕沟的底部,也很容易被纵射炮火烧掉,因而当防守方的炮火被压制以后,它们并不能阻碍进攻。^①

这位新的军事权威在社论的结尾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表明,联军的将军们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超过了在这样条件下所能期望于他们的,甚至还获得了荣誉。^② 他们之所以不能包围塞瓦斯托

①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从“此外,鹿砦必须是粗大的树木”到“它们并不能阻碍进攻”这段文字被修改为:“但是从哪里能取得做这些鹿砦用的树木呢?——这要粗大的树木,并且要把它们牢固地连接起来,横放在地上,使砍尖的枝干朝向敌方。在这个无林区哪里有树木呢?关于这一点《通报》却只字不提。说什么防栅比石质内岸进了一步,这真是新发现;要知道,这种木质工事很容易被烧掉,因而当敌方的炮火被压制以后,它们并不能阻碍进攻。”——编者注

②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这句话后面还补充了如下文字:“这正是这篇社论所要证明的一点。如果荣誉需要证明,而且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这是不光彩的荣誉!”——编者注

波尔,他们之所以没有能赶走俄国的监视军,他们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塞瓦斯托波尔,那只是因为他们力量不够!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可是,究竟谁该对这一切错误中的最大错误负责呢?不是别人,正是波拿巴!这就是全体法国民众从他们皇帝喋喋不休、拐弯抹角、含糊其辞和荒谬可笑的解释中肯定会得出的必然结论。^①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1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3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中,没有结尾这句话,而是补充了如下文字作为结尾:“这就是《通报》社论所导致的必然结论。至于这篇社论在巴黎造成的印象如何,那可以从平常是那样奴颜婢膝的《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的一篇通讯的摘录中看出:

‘有些人认为这篇社论不过是军队完全撤离克里木的先声。在正统主义人士当中有人说:我们曾被许以拿破仑式的战争,但看来现在将得到路易-菲利浦式的和平。

另一方面,在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居民中也充满着这种情绪。他们认为发表这篇社论是公开承认自己软弱无力。”注文中的引文出自 1855 年 4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2027 号,注文中所提到的拿破仑指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²⁴⁷

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仍旧进展缓慢,毫无生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个别无结果的冲突和零零星星的攻击才带来了一些生气,不过每次的攻击都是上次的翻版和下次的蓝本而已。撇开守方在工程方面的优点不谈,确实很少见到像现在这样能表明指挥人员庸碌无能的如此长期对峙的战例。这整件事对全世界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都讨厌的对象,而对那些不得不在报刊上对这种显然是静止的作战行动所具有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析的人来说,这整件事尤其令人生厌。^①

我们几天前刊登了法国和英国关于3月23日出击的报道^②;俄军方面详尽的报道我们还没有见到。同往常一样,联军将军们的报告写得含糊不清,以致我们无法从中得知任何肯定的东西。但依靠我们手中现有的几封在欧洲发表的私人信件和几份报纸的通讯,我们还是弄清了事实的概貌,情况如下:

①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为题,发表在1855年4月18日《新奥得报》第179号。《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一文中本段最后一句话被删除。——编者注

②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针对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防线，即从内港顶端到基连湾顶端的防线的联军“右翼”，借助三条末端由所谓第二道平行壕连接起来的接近壕，即锯齿形堑壕，推进到了距俄军第一道防线 600 码的地方。而这三条锯齿形堑壕又从第二道平行壕起毫无规则地缓慢向前延伸，以便由第三道平行壕把它们连接起来，并在中央那条接近壕内建立兵器库或足够容纳一支预备队的隐蔽地。这三条接近壕中，中央那条接近壕由英军占领，左右两侧的接近壕由法军占领。两侧的接近壕比中央的接近壕推进得远些，因此法军堑壕比英军阵地距要塞大约近 50 码。

3 月 23 日拂晓前，俄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大约 12 个营），从城内冲向围攻工事。俄军非常了解联军构筑堑壕时完全忽视了传统的并合乎操典规定的预防措施，堑壕的翼侧向后弯得不够，也没有多面堡防护，因此攻击方向平行壕的两端翼侧大胆地猛攻必然能突入堑壕；于是俄军以突然而迅速的运动开始了攻击，结果迂回了平行壕的东西两端。当俄军的正面攻击牵制住堑壕的警卫部队及其预备队时，他们的迂回纵队不顾法军的英勇抵抗，跳进围攻工事，沿堑壕迅速前进，一直冲到英军防守的中央阵地。正面受不到严重威胁的英军阵地，在来自左右两方的步枪射击迫使英军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前一直没有遭到攻击；甚至在这以后，俄军的正面攻击仍然不猛烈，因为他们的主攻力量都集中在迂回纵队内。但是这些迂回纵队沿堑壕通过了很远的一段距离以后，便丧失了最初的锐气，自俄军同英军接触时起，他们的军官时刻放在心上的便是寻找最终退却的机会。这样一来，战斗很快就转入双方相持不下的阶段，而在此时，出击部队正是应当考虑如何安全退却了。俄军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真正打算把英军逐出阵地，而是继续坚持战斗，直到大部分部队退到距

塞瓦斯托波尔已相当近时为止；此后，后卫也撤退了，在同法军和英军的预备队的战斗中，后卫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看来，俄军原以为在第二道平行壕内能发现许多火炮、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他们出击的目标只能有一个，即毁坏所有这一切。但是在那里这样的物资非常之少，因此，俄军通过这次出击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确信：就是在距自己工事这样远的地方，他们也能在出击的第一个甚或第二个小时内，在敌人集中预备队之前，打出十分强大的声势。这当然有某些价值，但是未必能补偿出击所受的损失。俄军给围攻工事造成的物质损失在一两天内就得到了弥补，而这次出击对鼓舞士气的作用则可以说等于零。因为任何出击都必然以退却结束，所以围攻者总是把自己看做胜利者。除非被围攻者的损失大大小于围攻者，否则出击通常对围攻者更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正当康罗贝尔和拉格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次表面的胜利时，俄军这种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效果而最后仓促退却的出击真让他们喜出望外。法军大肆夸耀自己把敌人一直追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线跟前。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这点并不怎么困难，因为要塞炮怕误伤自己的部队而不能进行射击。至于英军方面，由于他们的阵地过于缩在后面，因此与其说是起了第一线部队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起了预备队的作用，但他们避开这一情况不谈，却大肆吹嘘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说英军士兵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因而不会后退一步，但是，这一次的吹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根据了。就在这些不屈不挠的士兵中间被俄军抓获后安全地押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国军官们^①肯

①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中不是“英国军官们”，而是“凯利上校和其他英国军官们”。——编者注

定知道,这种自夸究竟有多少价值。

与此同时,英国新闻界的大战略家们继续极力强调说,在考虑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之前,无论如何必须先攻占俄军新构筑的外围工事;他们还希望能很快就实现这一点。自然,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是陈腐的。问题在于,联军既然在自己炮队火力的控制范围内都不能阻止俄军构筑这些工事,又怎样能攻占它们呢?对色楞金斯克多面堡^①的攻击^②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巨大的生命损失作代价可以攻占这样的工事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既然这些工事攻占后甚至还守不到为破坏它所需的时间,那就很难说攻占它有什么用处。问题在于,俄军这些新工事^③的翼侧和背后都处于俄军主要防线的控制之下,不采取攻夺主要防线时所必需的那些手段,是无法夺取它们的。对攻击和占领这些外围工事作认真考虑之前,必须使接近壕向前延伸到合适的距离上,构筑带兵器库的隐蔽平行壕,修建射击俄军主要防线用的炮台并加以装备。鼓吹夺取外围工事最卖力的伦敦《泰晤士报》,没有说出用什么新方法才能够在“几小时内”达到这一十分想达到但又十分难以达到的目标。该报几天前声称,几个小时内就会收到这一壮举已经成功的消息,但不幸的是,该报刚刚表露出自己乐观的希望,就接到驻克里木记者的来信,这位记者不仅宣称俄军新的外围工事似乎是攻不破的,而且还说那些工事仅仅是第一道界标,俄军还打算从那里向前延伸自己的反接近壕。马梅隆

①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中,“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后面加有“(在萨蓬山上)”。——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0—255、272—276页。——编者注

③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中,后面加有“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编者注

多面堡^①正面的散兵壕,已经被一条整齐的堑壕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道新的防线。在马梅隆多面堡与萨蓬山,即色楞金斯克多面堡之间,挖掘了一条形状很是奇怪的堑壕,它形成正方形的三个边,从这里可以对法军的部分接近壕进行纵射。又据说,法军的接近壕有一部分受到了纵射。不过,关于这个新工事的整体情况描述得很不完备,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弄清它的精确位置和用途。^② 总之很清楚,俄军企图建立完整的前沿工事体系,以便由两翼和正面掩护马拉霍夫冈,而最后也许要攻占联军的堑壕。这一企图一旦实现,自然就相当于联军在这个攻击地段的围攻线被突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联军仅仅是扼守自己的阵地,加强自己的炮台,而没有向前推进自己的炮台,但俄军在一个月內却向联军阵地推进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推进。比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更出色的防御战的确不乏其例,但是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毫无章法、愚不可及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战²⁴⁸以来的战争编年史中却一个也找不出来。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12 日

载于 1855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
- ①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中,“马梅隆多面堡”后面加有“(俄军称堪察加多面堡)”。——编者注
- ②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中,从“又据说”到“还不能完全弄清它的精确位置和用途”这段文字被删除。——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国与斯拉夫民族²⁴⁹

I. 历史导论。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之间持续了千年的斗争正迫近决战关头。斯拉夫人攫取最高统治权的要求日益以不容抗拒之势向我们步步进逼。1812年,斯拉夫人以俄国为代表第一次作为世界强权登台亮相。——紧接着竟然在1814年和1815年就产生了超乎一切合理限度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人可以信赖)。神圣同盟²⁵⁰会议(夏多勃里昂被收买²⁵¹)。七月和波兰人²⁵²[……]①对神圣同盟起了钳制作用。1848年的形势促使匈牙利人求助于俄国。俄国的入侵是它第二次大规模地干预欧洲政治²⁵³——这是赤裸裸的泛斯拉夫主义行动。然后是维也纳会议²⁵⁴,俄国充当了德国的直接仲裁者。——最后是第三次事件,即当前的战争³²,这场战争正在开始转变为欧洲西部地区反对斯拉夫人的战争。

与此同时出现了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起初是学术的——多布罗夫斯基,沙法里克。²⁵⁵后来是诗歌的:科拉尔,素朴的、具有民族的和哀歌体的风格。最后是双重政治的:一是直接的俄国的:古罗夫斯基;二是自由主义的、带有幻想色彩的: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巴枯宁

① 手稿中这里大约有4个字母无法辨认。——编者注

等等。——此外还有在民间开展的带有希腊文化特征的南方斯拉夫人的运动。

这一整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仇恨德国，通过征服德国建立一个斯拉夫人的世界帝国。

德国是不可征服的。法国人曾企图征服德国²⁵⁶；打了17年的仗，只换得3年的屈服。而此后德国就昂然奋起，以致四分之一德国就能够把边境上几近被歼的俄国军队接收过来，并且取而代之，在消灭法国的世界君主政体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激进党²⁵⁷既不是德意志狂，也不是民主派中要吞噬德意志的人。这个党的观点实质上是历史的观点，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理论上讲，这个党并不在乎运动的中心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在英国，也不在乎历史的发展是把这个民族还是把那个民族打倒或者消灭。但是这个党的理论并没有表明：德国已经衰朽陈腐，或正在走向这样的命运。在实践上，这个党知道：每一个大的民族都需要一定的领土范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任何以牺牲一个民族为代价来抬高另一个民族的做法都会损害普遍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德国发展，要么根本不发展。对于阿尔萨斯来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是学习的榜样。德国非常需要这样的领土；五百年来，一方面德国的领土被别国侵夺，另一方面德国实际上也占领了别国的领土，前一方面与后一方面至少一样多。因此，如果把国外的属地同德国拴在一起，而这些属地又使德国抛开自身的利益，卷入别国的纷争，那么这种补偿就太不合算了。然而在民族活力离析涣散的情况下，这毕竟是提供活动舞台的唯一方式。

因此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领土是德国为了自身发展所必需的。

(参看格林关于其他日耳曼人的论述^①。)

可见这里涉及的是边界问题。法国总的说来已经很好地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它只需要获取少量的别国领土。因此,法国也差不多达到了自身领土的极限——占据莱茵河左岸对它来说不是力量的增强,反而是一种削弱,即便有战略方面的原因也仍然如此;那会使600万—700万日耳曼居民成为法国的组成部分。意大利的情况同样清楚:它失去了殖民地,现在它完全满足于拥有自己的领土。与此相反,德国在自己的全部边界上都必须进行修补。在西部、北部和南部,情况终归还算简单——然而在东部,却存在着由斯拉夫人引起的语言混杂!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困难,也正是在这里显现出对德国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斯拉夫帝国的西部边界从波美拉尼亚延伸到菲希特尔山脉,并从那里延伸到的里雅斯特。五分之二个德国并入泛斯拉夫地区;勃兰登堡人和萨克森人重新说劳西茨语—索布语,西里西亚人重新说波兰语,假如他们还不愿意立即说俄语的话。^②

这个问题与民族统一问题,与国外属地问题以及德国人同斯拉夫人之间的争执问题,属于同一个问题。

①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第26章《其他东方部落》。——编者注

②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本段文字接在“并宣称这就是‘批判’”(见本卷第311页)这段文字之后,但恩格斯在本段文字的开头以及上一段文字的结尾标有符号“*)”,表明这两段是前后相接的。可能是由于手稿中这一页余下的空间不够,恩格斯才把本段文字写到下一页。——编者注

此外,还有一点使德国面临着另一个利害攸关之处,特别是在同斯拉夫人对抗的时候:德国在1848年十分自觉地积极投入了现代运动。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起来的:美国、法国、1794年的波兰²⁵⁸;1848年建立的民族国家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尽管它们当时只是表达了基本的要求。1848年以后,我们又可以站出来维护德国和德国人了;面对外国,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坚持德国人的立场,哪怕联邦议会²¹⁹成立十次,这种立场也是根除不了的。1849年的阿尔萨斯人。莱茵河左岸通过1848年革命回归德国。我们的党在面对外国的时候总是自豪的。没有卢格式的怯懦和自卑——我们在向德国人自己讲述真相的时候是多么理直气壮。²⁵⁹

德国人同斯拉夫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在德国,为争取内部统一和占据民族运动地盘而进行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相重合,以致最坚决的党派同时也是最具有民族意识的党派;而在斯拉夫人那里则相反。迄今为止,泛斯拉夫主义的一切真实的表述都是反动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²⁶⁰开得混乱不堪——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尝试。从奥地利的运动变得稍许明朗时起,捷克人就是反动的,斯洛伐克人也是如此,南方斯拉夫人也是如此[……]^①就连波兰人中坚持泛斯拉夫主义的那一部分人也是如此。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在奥地利战败了。斯拉夫人被骗了。而沙皇统治的代理人古罗夫斯基之流对此竟一言不发。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近出现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直截了当地把斯拉夫人视为代表未来的民族,视为肩负使命

^① 手稿中这里大约有3个字母无法辨认。——编者注

去实现西欧各种理论的人。事实上,道地的斯拉夫民族即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已经这样认为:不是俄国人要向西方人学习,倒是西方人要向俄国人学习。这种说法听起来倒还十分天真,然而此外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已经衰老、破落、陈腐了,而斯拉夫民族则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斯拉夫民族必将征服欧洲,并将从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发,²⁶¹建立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千年王国⁹¹。

可笑的是,那个极端的反动分子哈克斯特豪森正是这段历史的最初发现者。²⁶²赫尔岑就是从他那里了解了这段历史,了解自己的俄罗斯祖国,而布·鲍威尔则照抄这两个人的东西,他的做法是以这些东西为依据发表关于政治神学的空洞议论和自作聪明的无稽之谈,并宣称这就是“批判”。²⁶³

I. 在边界问题产生之前出现的是独立问题。德国的反动分子把俄国当做他们的精神庇护所来膜拜,在历史运动面前瑟瑟发抖;心怀不满的、不得志的批判者²⁶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同群众划清界限;野心勃勃、爱慕虚荣的俄国人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妒忌德国人,因为这些德国人尽管四分五裂、发生内耗,却对历史特别是对斯拉夫人产生不可消除的影响,——上面这几种人提出了独立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回应。而首先要对付的是俄国人,只要我们压倒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让其余的斯拉夫人不再轻举妄动。

1. 源头,参看老施勒策尔^①,哈克斯特豪森,这只带有贵族式的

① 奥·路·施勒策尔《奈斯托尔。用古斯拉夫语写的俄国编年史,比较、翻译和解释》1802年格丁根版第1—2卷。——编者注

官僚习气的母鸡孵出了一群鸭子,现在看着它们“离开了此岸,还没有抵达彼岸”,而另一方面,他却相信肃穆宁静的俄国:“我坐在岸边,等待好风吹来”²⁶⁴——确实,他深信不疑的是:俄国想要掌控的只是自身的心灵,此外别无他求。其次是赫尔岑,1849年他在哈克斯特豪森之后出场,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认识了俄国肩负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使命,并炮制了有关衰老欧洲和年轻斯拉夫民族的泛斯拉夫主义滥调。赫尔岑著作的标题和内容:来自彼岸^①;然后是有关欧洲的未来的整个问题,以及有关俄国的未来——希腊人的未来的问题等等,其提法与哈克斯特豪森如出一辙。此外在他有关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的描述中毫无新意可言,纯粹是哈克斯特豪森言论的翻版,这是一种无耻的做法:你们不相信赫尔岑,却不能不相信哈克斯特豪森!!!^② 赫尔岑添加的只是民主的、社会的滥调以及这样一种说法:俄国究竟是不是必须经历全部资产阶级制度?²⁶⁵——最后是布·鲍威尔:批判²⁶³的手法就在于:既然一个反动分子和一个所谓革命者两人关于俄国的说法完全一致,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于是我就照抄这两个人的说法;为了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我再加上自己对法国恼恨不满的言论,加上关于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以及针对未指名道姓的光明之友²⁶⁶和包括教皇在内的其他德国神学家的种种诽谤;

① 可能指亚·赫尔岑署名“一个俄国人”在1849年11月19、26日和12月10日巴黎《人民之声报》第50、57和71号发表的文章《俄国》,该文译成德文后收入赫尔岑的著作《来自彼岸》1850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是一种无耻的做法……哈克斯特豪森!!!”是一段插入文字,写在这一行的上方,但没有标出它应该插入的位置。——编者注

同时我也赞成赖德律-洛兰先生关于英国走向衰落的说法。——

2. 赫尔岑先生。

a. 为了向赫尔岑先生表示尊重,避免产生错误的看法,这里插入一段关于俄国教育的话:“使用的语言最多,宗教色彩最少,具有普遍性的品格”(林顿,第33页)^①;再插入一段关于俄国文学的话:“上流社会文学,它表现了某种高雅的教养和贵族形象,这是上流社会人士交谈的特点。在德国文学中有时可以看到的粗野、庸俗的元素从未渗透到俄罗斯著作中去。”(《思想》第56页)^②——

首先。教育。参看普希金,他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奥涅金是一个标准的俄国人(另一位是绝妙的小伙子连斯基)。炫耀是他们最看重的事情。²⁶⁷

炫耀表现在:能说会道。俄国人不是相互交谈,而是挥洒自如地运用自己背熟的套语——甚至那种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平板语调也证明了这种毫无头脑的特征。当然,这样做也仍然免不了出现语法错误,同时也并不妨碍自我吹嘘。其次是自诩博学多才而实际上——一窍不通。彼得堡高级中学的学生竟连初等科学中的起码的知识也不懂。人们惯常的做法始终是:“东鳞西爪也好,浮光掠影也罢,总算学了一点皮毛!”^③整个俄国贵族都是如此。哗众取宠是他们最看重的事情。这里简直就像是住满了商品推销员的布拉德福德市。谁企图哗众取宠,谁就把自己毁了。——在一切事情上,这种浅薄无聊的表现都会有如此下场。现在,这种现象的影响已经波及无神论和共产

① 亚·赫尔岑《俄国和旧世界》,载于威·林顿在伦敦出版的杂志《英格兰共和国》1855年第3期。——编者注

② 亚·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3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5节。——编者注

主义,在欧洲,有人借此来自吹自擂,而在俄国,这一切则被看做是一种可以玩弄的把戏、一种理论上的消遣。单个的人是怎样的,整个民族也就是那样。他们注重的只是如何在欧洲面前哗众取宠,而骨子里则隐含着对自身精神野蛮的愧疚——参看居斯丁^①。

赫尔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光彩夺目的外表后面隐藏的是纯粹的无知、谬误和厚颜无耻的自夸,以及对哈克斯特豪森的剽窃。

b. 赫尔岑先生的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著作。

α. 欧洲衰老—俄国年轻。上文已经证明,“衰老的”欧洲是如何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忧惧中产生的。现在可以深入地谈一谈这个问题了。说俄国年轻,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在那里,自遥远的年代以来一切都凝固不变。年轻的是俄国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而这是由西方的工业以及对谷物的需求造成的。赫尔岑先生应当去看看兰开夏,而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普里姆罗斯山的雾霾等等之中。²⁶⁸彼得堡和利物浦年龄相仿;彼得堡甚至更老一些,而且是依靠强力建成的,而利物浦则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在曼彻斯特等地,处处都散发着石灰的气味,与俄国大不相同,在俄国人们还用木材建造房屋。1789年以来的法国比1700年以来的俄国年轻得多;甚至1848年以来的德国也比俄国年轻。这种有关各民族逐渐变老的空谈还是产生于古老的东方时代,那个时代一直延续到日耳曼人出现时为止,那时候,总是有一个民族拥有世界统治权。从日耳曼人时代起,情况就不同了:各个国家比肩并立,特别是从1500年起,世界变大了,再也不可能用上述方式来统治了。假如斯拉夫人愿意同我们并行发展,那是非常值

^① 阿·居斯丁《1839年的俄国》(四卷集)1843年巴黎版。——编者注

得欢迎的,但首先要打消他们那些狂妄的野心;面对这样的斯拉夫人,整个西方团结一致,特别是当斯拉夫人像迄今为止这样以反动姿态出现的时候。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我们这里无事可做。——工业已经终结了各民族逐渐衰老的过程。那些古老的民族因自身的生产条件完全枯竭而走向衰落;现代的生产条件则在自身中包孕着它们自己的发展,这种发展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实现,没有斗争就一事无成,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这样,他们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此岸”。——正是我们所遭遇的那些突变,那些随着领土扩大而变得日益剧烈和频繁的突变,证明了欧洲生命力的坚韧顽强和朝气蓬勃。危机越严重、越普遍,新生点就越是频频出现。确实,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共同的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共同意识而联系在一起。在俄国呈现的是僵死不变的稳定,这种稳定有时被毫无觉悟、无果而终的农民起义所打破,那些农民起义到处都一模一样,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联合。

β. 俄国公社。这里我们来回答哈克斯特豪森,他比赫尔岑知道得多一些。哈克斯特豪森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对公社民主制的补充。^① 可以对照没有土地私有制、在公社和国家之间没有中间环节的整个东方。在这方面,日耳曼人和旁遮普人,日耳曼人的区行政建制,都是合乎自然逻辑的进步。只有哈克斯特豪森才会把这样的东西说成是共产主义,也只有赫尔岑这个愚昧无知的人才会相信哈克斯特豪森。——劳动组合是公社在工业道路上的延续。其利润分割的情况至今仍然一点儿也不清楚。

^① 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52年柏林版第3册第138—139、145—152页。——编者注

γ. 赫尔岑对沙皇制度、对“德国的”沙皇制度的态度。紧接β。

δ. 赫尔岑先生的泛斯拉夫主义帝国。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他要在这里建成发起进攻的阵地，特别是对付德国人的阵地。他的历史哲学。

3. 俄国的实力。1828—1829年的土耳其战争³⁶。1831年的波兰战争。1853—1855年的战争。用来对付德国的军力。牢不可破的地位因人口稠密而削弱。而这恰恰是德国抗击俄国的力量。

II. 其余的斯拉夫人或边界问题。——一些正在走向衰落的民族

1. 南方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伊斯特里亚人—卡朗坦人^①。

2.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3. 波兰人。

III. 结束语：国外的属地，伦巴第；匈牙利，加利西亚。德国在多瑙河的利益，德国的厄运。匈牙利人不得不维护我们的利益，即使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也非常需要我们。瓦拉几亚的多瑙河邦联。——尽管有泛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人之间还是存在争吵。希腊和罗马的教会——波兰人、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之间的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初—
4月15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时代》
1990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斯洛文尼亚人的旧称。——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²⁴⁹

—

据来源可靠的消息证实,俄国当今的皇帝^①给某些宫廷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

“从奥地利无可挽回地同西方结成联盟,或者对俄国采取任何一种公开敌对行动的那一刻起,²⁶⁹亚历山大二世就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把他目前的全体俄罗斯人的皇帝的称号换成全体斯拉夫人的皇帝的称号(?)。”

如果亚历山大的这个声明确实可信,那么它就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直言不讳的表白。这是赋予这场战争以欧洲战争的性质的第一步,迄今这种性质一直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伪装、议定书和条约、法特尔的言论和普芬多夫的语录^②所掩盖。土耳其的独立问题,甚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指埃·法特尔《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1758年莱顿版和赛·普芬多夫《自然法和民族法》1672年伦敦版。——编者注

至它的生存问题从而也退居次要地位。问题将不再是应当由谁来统治君士坦丁堡,而是应当由谁来号令整个欧洲。斯拉夫民族由于内部纷争而长期分裂,他们被德意志人赶回东方,部分地被德意志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1815年之后由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逐步高涨,他们的各支系又悄悄地重新联合,现在斯拉夫民族破天荒第一次宣称自己是统一的,而且这样做也就等于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凯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决一死战。泛斯拉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还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化为乌有的运动;这个运动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实现。而且,它一旦取得这个成果,就必须征服欧洲,否则不能保证自己的继续存在。泛斯拉夫主义现在已经从信仰变成了政治纲领,掌握有80万大军。它使欧洲只有一个抉择: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斯拉夫人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我们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被俄国统一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把奥地利感染到什么程度?在居住在波希米亚森林和克恩滕山以东的7000万斯拉夫人中,大约有1500万人处在奥地利君主的统治之下,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变种的斯拉夫语的代表。波希米亚系或捷克系(600万人)全部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波兰系有约300万加利西亚人,俄罗斯系有住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东北部的300万小俄罗斯人^①(卢西人^②和卢田人^③),这是在俄罗斯帝国境外的唯一

① 小俄罗斯人是源自俄语的对乌克兰人的古老称呼。——编者注

② 卢西人是对19世纪居住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的称呼。——编者注

③ 卢田人是19世纪出现的对生活在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匈牙利东北部的乌克兰人的称呼。——编者注

的俄罗斯系；南方斯拉夫系大约有 300 万斯洛文尼亚人（克恩滕人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²⁷⁰，以及分散在各地的保加利亚人。可见，奥地利斯拉夫人分为两类：其中的一类是由一些民族的残余组成，这些民族过去有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历史发展则与具有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往的大民族的这些可怜的残余在奥地利境内连个民族的组织都没有，相反，他们散居在各个省内，因而他们的民族地位岌岌可危。斯洛文尼亚人虽然有将近 150 万人，却分散在克赖因、克恩滕、施泰尔马克、克罗地亚各省以及匈牙利西南部。波希米亚人虽然是奥地利斯拉夫人中人口最多的一系，但是一部分住在波希米亚，一部分住在摩拉维亚，一部分（斯洛伐克系）住在匈牙利西北部。因此，这些民族虽然全都在奥地利境内，但未被承认为已经形成不同的民族。他们或者被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附属部分，或者被看成是匈牙利民族的附属部分，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而已。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另一类是由不同的系的残余构成的，这些残余在历史进程中同本民族的主体分离，因而他们的重心处在奥地利以外。因此，奥地利的波兰人的自然重心在俄属波兰，卢田人的自然重心在另一些同俄国合并的小俄罗斯省份，而塞尔维亚人的自然重心在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他们这些与本民族分离的零星部分，都倾向于自己的自然重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中间文明的传播，并因此对民族历史活动的需要的日益增长，这种向心倾向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斯拉夫人都不过是力图重新统一的零星的部分，他们力图或者彼此统一起来，或者各自同本民族的主体合而为一。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俄国的而是奥地利的发明创造，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复兴，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系就开始为欧洲所有斯拉夫系

联合起来而奋斗。俄国本身是强大的，波兰则深深意识到民族生存的不可战胜的顽强性，而且公开地敌视斯拉夫俄国——这两个民族显然都不适于创造泛斯拉夫主义。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还很不开化，不会提出这种思想；保加利亚人顺从地屈服于土耳其人，而塞尔维亚人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要做的事就够多了。

二

泛斯拉夫主义的最初形式是纯粹文艺的形式。它的创始人是多布罗夫斯基(波希米亚人、斯拉夫方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和科拉尔(匈牙利喀尔巴阡山的斯洛伐克诗人)。多布罗夫斯基富有科学发现者的热情，而在科拉尔身上政治思想很快占了优势。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起初还只是满足于一些哀诗，它的诗歌的主题是过去的伟大，现在的耻辱、不幸和异族的压迫。“啊，上帝！难道世间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吗？”关于建立一个向欧洲发号施令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梦想，当时还不敢表露出来。但是，悲叹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单纯要求“给斯拉夫人以正义”的呐喊也随之过去了。

有关斯拉夫人的政治、文学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在奥地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语言学家沙法里克、科皮塔尔和米克洛希奇以及历史编纂学家帕拉茨基带头，追随他们的还有许多其他科学才能较差或根本没有科学才能的人，如汉卡和盖伊等人。与波希米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日前受屈辱的悲惨处境相对照，他们把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的光荣时代描绘得光彩夺目；正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人们在“哲学”的庇护下批判政治和神学一样，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者在梅

特涅的眼皮底下利用语文学来鼓吹斯拉夫人统一的学说,并建立一个政党,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根本改变奥地利各民族的现状,甚至要把奥地利变成一个大斯拉夫帝国。

从波希米亚和克恩滕往东,一直到黑海,普遍存在的语言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相分离,中间夹杂着芬兰民族的700万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插入斯拉夫各系之间——所有这一切造成了许多种语言的混杂并存。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不同。波希米亚本身,500万居民中除300万斯拉夫人有200万德意志人,而且它三面受到德意志人的包围。奥地利的斯拉夫各系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全部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蒂罗尔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意味着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会同意这种行动的。另外,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²⁶⁰令人可笑地证明了这一点,会上人们曾经想找出一种所有与会者都能听懂的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因此,我们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统一。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只局限于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要同时反抗奥地利政府以及他们提出挑战的对象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

不够了。缺乏统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统一原则是纯粹理想的东西,第一次实现这种统一原则的尝试因语言上的差别而遭到了失败。只要泛斯拉夫主义还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它就不会带来很大的危险,但它所需要的统一和群众的中心很快就给它找到了。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²⁷¹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居住在土耳其的700多万斯拉夫人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他们的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在奥地利有了一些基础的时候,俄国就立刻把它的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宗教方面的问题就搁在一边,俄国仅仅表明它是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是凝聚复兴的各个斯拉夫系的核心,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德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大帝国。就是说,在这里找到了所缺乏的统一和群众!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落入了圈套。它就这样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为了重新维护想象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了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与过的文明。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并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

梅特涅在自己权力鼎盛的年代就已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并且看穿了俄国的阴谋。他使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手段镇压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概括为一个词:那就是迫害。唯一有效的手段是自由发展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这种发展完全可以驱走斯

拉夫怪影,但同他的狭隘的政策体制不相容。结果,在梅特涅 1848 年垮台²⁷²以后,斯拉夫运动爆发了,它空前强大,并席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居民阶层。然而这个运动的完全反动的性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如果说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运动肯定是一种进步的运动的话,那么斯拉夫人却挽救了旧制度,使之免于毁灭,使得拉德茨基能够向明乔河推进,使得文迪施格雷茨能够夺取维也纳。²⁷³为了使奥地利完全依从于斯拉夫民族,强大的斯拉夫后备军——俄国军队于 1849 年开进了匈牙利²⁵³,在那里强迫匈牙利接受和约。

如果说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同俄国的结合决定了它自身的厄运的话,那么奥地利也同样认识到自己缺乏生命力,因为它接受,甚至请求这种斯拉夫人的援助来反对它境内的三个唯独具有并表现出历史生命力的民族,即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从 1848 年起,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欠的这笔债一直压抑着奥地利,对这笔债的意识是奥地利政策的主要着眼点。

奥地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本国领土上反对斯拉夫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哪怕有一点进步性质的政策。各省的特权都废除了,实行了中央集权制来代替联邦制,只承认一个人种的民族——奥地利民族,以代替各种不同的民族。虽然这些革新有一部分也是针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但是它们的重点却落在不大密集的斯拉夫各系身上,并且使德意志人占有了相当大的优势。如果说国内对斯拉夫人的依赖因此而消除了,那么对俄国的依赖却仍旧存在,结束这种直接的和屈辱的依赖状态——哪怕是暂时的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仍旧存在。这就是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奉行虽然是动摇的,但至少是公开宣布的反俄政策的真实原因。

另一方面,泛斯拉夫主义并没有绝迹;它深受凌辱,它愤怒、沉默,并从俄国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时候起就把俄国皇帝当做它命中注定的救世主。一旦俄国公开充当泛斯拉夫主义的首领,奥地利能否采取向匈牙利和波兰让步的对策而不至于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威胁?考察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不再仅仅是俄国,而是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威胁着要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帝国。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由于具有并能够保持不可否认的强大力量,很快将会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波兰人——他们大部分人以坚决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为荣;也没有谈到泛斯拉夫主义所谓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质上同普通的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它的漂亮言辞和假仁假义。我们也没有谈到德国的思辨哲学²⁶³,它由于高尚的无知而堕落为俄国阴谋的工具。以后我们还要来详细谈这些和另外一些与泛斯拉夫主义有关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16 日以前

载于 1855 年 4 月 21、24 日《新
奥得报》第 185、18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欧洲的斗争²⁴⁹

在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消息中,最引人注意的情况是:维也纳会议中断²⁷⁴和奥地利虽然不是彻底地,至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同盟国分道扬镳。这两件事对于我们说来都并非出乎意料。在这场战争目前所处的形势下,俄国拒绝接受任何在实质上不承认它战前所提出的要求的解决方案,是理所当然的事。奥地利又恢复了它的摇摆不定的观望政策²⁶⁹,也是某些非常重要的情况使然。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些情况。

一段时间以来,法国政府发现了一个连英国内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即约翰·罗素勋爵在维也纳犯了大错误^①,错误就在于任凭会议首先形成对奥地利有直接利益的条款。这些条款涉及多瑙河流域的自由和两公国的问题。从这时起,奥地利显得满意了。它期待着在迟早瓜分土耳其时分一杯羹——在它看来,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几个省份只能归属于它而不能允许别国染指。它感兴趣的是使土耳其基督教徒问题继续悬而不决。而且由于它想要与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相周旋实属无望,所以它也不太愿意在那个地

^① 见本卷第 289—290 页。——编者注

区使俄国难堪。从这个观点看,奥地利就完全有理由满足于它已经取得的收获,而把它的貌似公正的仲裁砝码移向不利于英法的一端。但是这种外交上的成功同它目前的摇摆政策没有多大关系。原因在于一个远为强大的因素。

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间接地提到尼古拉的私人密电。他在密电中让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都知道:假使它们同西方结成联盟来反对他,他就将宣布匈牙利独立和重建波兰,以回击这样的联盟条约。^①从那时起,每当我们想到在波兰和沃伦地区可能发生一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总是想到,如果俄国在征服了加利西亚、占有了喀尔巴阡山脉居高临下的地势、使匈牙利暴露在它的胜利之师面前时宣布匈牙利独立和重建波兰,那会给它带来多么大的军事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总是指出,奥地利除非有能力立即对俄国采取攻势,并通过连战连胜、向俄国推进来抵消俄国此举所带来的影响,否则它是无法同俄国作战的。^②因此,只要驻在加利西亚和两公国的奥地利军队有足够的力量向华沙和基辅进军,俄国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直接危险并不大。

然而我们现在获悉,继尼古拉的电报之后,不久前他的继承者^③又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文包含着十分不同的而且严重得多的威胁。其中说道,从奥地利无可挽回地同西方结成联盟,或者对俄国采取任何一种公开敌对行动的那一刻起,亚历山大二世就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把他目前的全体俄罗斯人的皇帝的称号换成全体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战况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592—59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1—142页。——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斯拉夫人的皇帝的称号。

果然如此！如果亚历山大迈出这样一步，那么，土耳其基督教徒问题的斗争、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塞瓦斯托波尔、两公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地区性的小事现在就可以视为已告结束。亚历山大的这一声明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直言不讳的表白；这是朝着把欧洲大陆作为这场战争的战场，公开而坦率地赋予这场战争以欧洲战争的性质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迄今这种性质一直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伪装、议定书和条约、法特尔的言论和普芬多夫的语录^①所掩盖。土耳其——它的独立与生存问题——退居次要地位。问题将不再是应当由谁来统治君士坦丁堡，而是应当由谁来号令整个欧洲。斯拉夫民族由于内部纷争而长期分裂，他们被德意志人赶回东方，部分地被土耳其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1815年之后由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逐步高涨，他们的各支系很快又重新联合，现在斯拉夫民族破天荒第一次宣称自己是统一的，而且这样做也就等于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大陆的罗曼—凯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决一死战。泛斯拉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将会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化为乌有；这个运动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德意志的一个很大部分从地图上抹掉才能实现。而且，它一旦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征服欧洲才能保持得住。泛斯拉夫主义现在已经从信仰变成了政治纲领，或者更确切地说，变成了巨大的政治威胁，因为有80万持枪待命的军队支持着它。

而这80万军队还不是它所掌握的全部兵力。只要俄国皇帝在率

^① 指埃·法特尔《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1758年莱顿版和赛·普芬多夫《自然法和民族法》1672年伦敦版。——编者注

领大军挺进喀尔巴阡山时一声呼唤，奥地利境内的 900 万—1 000 万斯拉夫人就会像 1848 年时那样骚动起来；只要奥地利人一被打败，这些斯拉夫人就会彻底造反；同时匈牙利和意大利受到的革命触动也不会少。上述这种危险很可能使得弗兰茨-约瑟夫踌躇不前。因为除非他能够在边界上一举击败庞大的斯拉夫军队并把战事推进到敌国境内，否则他可能还是在登台决斗之前罢休为妙。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20 日以前

载于 1855 年 5 月 5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38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²⁷⁵

4月9日晨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第二次轰击。根据最新消息，直到22日连续轰击了13天，炮火之猛烈，连俄军自己都称之为“地狱之火”。结果如何呢？据电讯报道，“无疑确立了联军的火力优势”。13天几乎不停顿的狂轰，结果竟然仅仅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满足——这是怎么回事呢？

像这样的炮轰总是用于非常规进攻。所谓非常规进攻指的是用沃邦首创并由后人加以完善的缓慢但稳妥有效的方法不能接近敌人防御工事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进攻。常规进攻是沿着人所熟知的Z形壕从一条平行壕向另一条平行壕推进；前面每夺得一个新据点就在后面炮台火力掩护下筑起新的炮台；在斜堤脚下将第三或第四平行壕加以扩展；沿着双坑道爬上斜堤；在紧靠护城壕边叫做斜堤顶端的地方形成一道最后的平行壕；在那里为打开突破口和压制敌方炮火筑起炮台；然后打开突破口；形成一条向下通到护城壕的地下道；最后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果断地发起突击。这种方法是，每前进一步都利用以前夺得的一切阵地作为每一次新的推进的行动基地。每一个行动都是规范的，并有良好的支援，尽管可能发生短时间的争夺，但只要不犯错误，最终肯定会达到目的。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按部就班的方法却不适用。凡是设防的城市,如果其本身实力不强,例如防御工事破旧毁损,守军力量薄弱,武器装备不足,工事前面地形高低不平以致围攻者可以逼近城市而不被守军发现;又例如这个设防城市有几千或几万人口,一旦引起居民的惊恐就可能影响守军官兵的斗志——凡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用一支有足够实力的劲旅采取强攻或者说非常规进攻的办法,遇到的麻烦要少一些,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而能获得同样的结果。如果要夺取的设防阵地属于有壕沟防守的营地的性质,而壕沟并无砖石砌成的陡坡,而且既不宽也不深,因而无须打开缺口就能实施突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常规进攻的方法同样不适用。

凡是成功地采用强攻办法的情况都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攻取一个居民多而防御条件差的薄弱要塞,要么是攻取一个有壕沟防守的营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鼓起高昂的士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即使是强攻一个最小的要塞,如果没有事先打一次决定性的胜仗,没有形成完全的包围,没有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力量,没有把一切解围的希望都彻底摧毁,以前从来不曾有过成功的先例,将来也决不会成功。所以说 1815 年在法国进行的战争⁸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规进攻成功的范例。法军被歼灭,法国北部遍地都是入侵部队,他们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挺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重兵包围了北部边境上较小的要塞,这些要塞相继在抵抗了几天以后陷落。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的方式非常简单。必须利用守军自然产生的沮丧情绪。为达到这一目的,围攻部队在紧靠要塞比如说 300—400 码之内的地方开挖堦壕,只要他们有数量充裕的兵员来守卫工事,就可以这样做。在这一平行壕中他们架设迫击炮和榴弹炮向城内轰击,同时以若干纵射重

炮直接袭击敌人的大炮。主要必须靠轰击。部分城区被破坏，整夜炮火不断，很快就会使居民对本已因夜间紧急行动得不到休息而苦不堪言的守军产生怨恨。如果防御墙上的大炮有几门被打翻在地，如果有一两处弹药库被炸毁，指挥官很快就会产生继续抵抗无益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样，再轰击几小时就会使其投降。可见，在这第一种情况下，主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一支气势夺人的大军，还需要有足够的弹药把守军弄得疲惫不堪。

在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攻取有壕沟防守的营地的情况下，按常规挖壕沟的办法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使敌人有时间以同样的规模加固他们的工事。即使是分散的单个炮台也只能在地形本身有利的地方修建。这些炮台通常必须在一夜之间建成，因此一般只是切入实土层三英尺深左右。很少超过或根本不会超过十二磅口径的大炮，主要必须利用地形的天然起伏来掩蔽。由于攻城炮不能向前移动——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而且也只是极少量威力很小的炮——进攻火力的主要目标是击毁敌军的大炮和杀伤敌军守护工事的兵员。一俟纵射火力成功地打哑了守军的大炮，并对眼镜堡或多面堡守军造成一定影响，所有进攻的大炮立即进到霰弹炮的有效射程以内，不停地发射密集的霰弹，为实际攻打守军防御工事做准备。这样的轰击几乎纯粹是野战炮作业，如果不是联军犯了一个很奇怪的错误，在这次围攻中把攻城炮和野战炮的使用相混淆，我们这里讲述围攻的时候是不会提到它的。

现在塞瓦斯托波尔既不是一个应该用上述那种强攻办法攻取的小要塞，也不是一个有壕沟防守的营地或设防草率的无墙城镇。联军初到时，此地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无墙城市，防护壕沟仓促挖成，但建有坚固可靠的多面堡，整个城市相当于一个有壕沟防守的军营。

如果是这样,采用攻取有堑壕防守的营地的办法就很有可能成功。那时应该把全部野战炮和一切能移动的舰载轻型炮与攻城炮调到前方,把前者作为移动炮台,把后者作为后盾,只要俄军火力一被压制就向前推进;经过四小时或六小时的炮轰后就应该发起冲锋。那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运送围城所需辎重和弹药时遇到的困难却说明可能没有这样做。可是如果这样做了,那会比实际上所做的一切都要好。这种办法弃之不用,而是决定采取一种介于常规与非常规之间的围攻办法,在实施过程中究竟采取按部就班推进的方式还是采取强攻和轰击的方式,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要由围攻者做出选择。不过塞瓦斯托波尔防御设施修建的速度比联军的堑壕快一倍。到进攻一方准备开炮时,那里已经是一个有围墙环绕的要塞。的确,围墙是仓促筑成的,而且墙体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但是如果说墙体不衔接使此地易于强攻,那么,林立于防护墙之上的无数大炮却使得强攻这种办法根本无法实行,除非守军的炮火被完全打哑。

第一次轰击是10月17日—11月5日进行的,因为常规的进攻进展太慢。常规进攻之所以进展迟缓,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是因为在实施中违反了一切准则,进攻目标把所有南部防线都包括了进去,而不是只选择一两条防线,兵力和火力分散而不是集中。塞瓦斯托波尔已不再是一个适于用任何一种非常规方法进攻的地方。只有采取火力集中的常规进攻方法才能够成功。这里没有胆小怕惊的居民可以利用,甚至也不是真正被包围了起来。这个地方的范围较大,使得炮轰的效用分散以致显得微乎其微。由坚实的砂石砌成的房屋不易燃起大火。因此,第一次轰击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效用,唯一的结果就是联军浪费了宝贵的弹药,磨损了大炮,进攻力量失去战斗力达五个月之久。

第二次轰击必须做大量的准备。炮膛已经用坏和口径太小的旧

炮必须更换成重型炮。炮弹和火药需要大量补充。围城部队备受疾病折磨,只是大地回春才使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一些活力。假定目前的重型炮每发射一次使用的铁和火药平均大约是 50 磅,这样,仅仅 40 发弹药就重达 1 吨,那么联军行动的迟缓就容易解释了。现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各炮台总共至少有大炮 350 门——有人说 500 门。假定每门炮每小时发射 10 次,每天开火 14 小时,那么 4 月 9—22 日的 13 天炮轰就要用多达 637 000 发的弹丸,连同火药重量当在 14 500 吨以上。即使把弹丸的这个数目减为 40 万发,重 1 000 吨,那么,投在那里的铁块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却是出于一个愚蠢决定的需要。这个愚蠢的决定就是:用非常规进攻的办法来夺取一个范围这样大又有这样多大炮防卫的地方,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先前实施常规进攻时犯了错误。

在选择进攻方式时起了主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攻打守军力量薄弱的城市和攻打有壕沟防守的营地这两种适用强攻的情况混淆了起来。因为最初的时候塞瓦斯托波尔表现出有壕沟防守的营地的一切特征,所以即使其性质完全改变以后,攻打时也硬要按照这种情况来对待。唯一可允许的差别是用攻城炮代替野战炮。可是这次的进攻计划夹杂有挖战壕、筑常规炮台和进行轰击之类的围攻方式。把塞瓦斯托波尔既当做要塞也当做有壕沟防守的营地来轰击,而且在全部弹药快要用完时,尽管防护墙上没有挂出白旗,可是却命令部队像俄军 1831 年在华沙那样向前冲锋⁴³。

这样一个设计得很拙劣、规定得很不清楚的进攻计划,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轰击城内所起的作用肯定几乎等于零,炮轰防御工事的效果也肯定微乎其微。余下可以谈的就是打哑敌人炮火的可能性了。双方的大炮数目和操作技能几乎相等,使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因

为每日白天被打坏的夜晚就可以修好。但是假定俄军的大炮真的被打哑,那又怎样呢?能够下令强攻吗?那样,强攻纵队就得冲过一段600码的距离,这时即使俄军没有一批掩蔽的后备大炮可用以向他们发射霰弹,也会用步枪和火枪射击他们,而且正因为有强攻纵队在行动,所以围城部队不能使用自己的大炮。更何况,几乎可以说直到轰击开始的那一天,俄军的表现都证明他们的进攻手段高超,他们已经从原有防线向前推进。在双方争夺的地点筑起并守住了新的工事,而且还在那里架设了大炮。像这样一支把自己防线之前的地带牢牢掌握在手里的守军,完全可以静待敌军强攻,无所畏惧。

10日,第二天,联军声称已取得火力上的优势;但是每到次日清晨他们却发现俄军的工事已修补好,并和以前一样坚固。14日,法军试图攻占俄军的一个外围工事;他们把俄军赶走了两次,报告发出时这个地方是在他们手里的。但是以后来自联军营地的报告就没有再提到长时间占领的阵地;因此很可能这个地方又不得不放弃了。15日,哥尔查科夫宣称,经过认真修复,防御工事几乎像轰击以前一样完好。最后,17日,联军能送到维也纳的最好消息是,他们现在确信他们在火力上对俄军占了优势。

本报已作过报道的^①这13天轰击,肯定是彻底耗尽了围城者的弹药。的确如此,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报告里就说,从19—22日他们的火力已经大大减弱^②,但英国政府虽然通过新开通的海底电报已

① 这几个字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有关米·德·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报告的内容英法报刊是在1855年4月28日刊登的,因此这段话有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加的。但也有可能是恩格斯提前一两天从曼彻斯特交易所获悉报告内容而自己写的。——编者注

收到截至 27 日的消息,却不公之于众,这一事实表明,联军并未取得重大优势。在打完了储藏的大量火药和弹丸之后,他们所能做的就只剩下强攻了,而强攻也只能以外围工事为目标。假定外围工事被攻占,联军的进攻力量肯定又得被耗尽,因为为了守住他们夺得的这些外围工事,他们要做的事很多。他们的大炮都损坏了,大多无法再继续使用,弹药也耗尽了。他们的部队因进行强攻而削弱,因所受的损失和投入的力量同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而沮丧。再像冬天那样静止不动已不可能,而春天的阳光所产生的热量会使他们的脚底下散发出一种毒气,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说:这次轰击塞瓦斯托波尔不过是从那里撤围的第一步。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再增派 4 万—5 万士兵到克里木半岛,同俄国人打一场野战,这里也得撤围,堑壕、炮台等等都得丢弃给俄国人,除非在不确定的将来出现某种机会,那时也许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再攻此城。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撤围的消息。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2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8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轰击²⁷⁶

在仔细研究了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报刊之后,我们得出一些关于对塞瓦斯托波尔第二次无效轰击的更准确的信息。本报读者中凡是始终密切关注此次军事上特大惨败之始末的,大概都会对这些信息感兴趣。因此我们这里就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有关的事实。现在我们假定读者手中已有一张关于该地和围城者阵地位置的示意图。从围城开始以来已有大量此类示意图见诸报端。^①

塞瓦斯托波尔南部的防御工事被内港分为两大侧翼,内港的位置在市区与被称做军港区的郊区之间。西面的一翼从卡兰亭湾起到东南方的内港顶端止,其间有要地三处:卡兰亭炮台,围在一座土质棱堡中间的圆塔,还有南棱堡或者叫做弗拉格斯塔夫棱堡(即法国人所说的马奇塔棱堡)。所有这三座位置向外突出的工事都遭到法军的进攻,使用的方法早被以前所有的工程师否定,但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者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不是只攻打防线的一部分,而是攻打全线。圆塔是这一侧翼的中心,在第一次轰击时遭到部分损坏,但它

^① 这一段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周围的土质工事尚完好无损。这些工事这次又遭到炮火的攻击。不过,这次进攻有一点进步:看来对这些工事的攻击是一次佯攻,目的仅仅要么是转移俄军对真正要攻击的地点的注意力,要么是配合主要的进攻行动。主要的进攻行动首先是攻打卡兰亭炮台。但是由于这个阵地的正面、侧翼和后方有卡兰亭湾和延续的俄军防线的保护,法军火力的目标只能是破坏卡兰亭湾那一面和以纵射火力压制朝向外湾那一面的火力。所以,真正要认真攻打的还是俄军防线最南面的工事弗拉格斯塔夫棱堡。法军在第二次轰击开始之前已经在这里一连挖了三道平行壕,不过最后的第三道平行壕离俄军堑壕仍然约有四五百码。这样一段令人高度敬畏的距离足以证明,在最近的六个月里守军的防御是积极主动的,而围城者的推进则是微乎其微。法军在这里肯定已经集中了至少 70—80 门大炮的火力,但是仍然未能取得很大进展。4 月 9 日刚一开火,法军工程师们便从堑壕向外挖掘新的坑道,以便在他们的炮兵掩护下修建新的接近壕。但是看来俄军没有被这猛烈的炮轰所吓倒。他们没有上当把炮火指向法军炮兵,而是完全正确地任凭法军炮兵射个不停,却把自己的大炮指向新的坑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一切在掩护下接近此地的企图完全落空。从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估量出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为,如果进攻一方的炮兵力量不足以把防守一方的全部火力吸引过来,从而使工兵能够开挖接近壕,顺利进攻的首要条件就不具备。因此法军被迫采取只有在最必要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步骤。他们放弃了在四五百码的距离内使用全坑道甚至双坑道的办法,而是修一条地雷坑道,通向他们第三条平行壕前面约 50—80 码的地方。从那里再修一条与他们的堑壕同方向的地下平行壕或地雷坑道,并在里面每隔不远处放置一些爆炸力较弱的炸药。这些炸药同时起爆,在上面炸出一

条长的不规则的壕沟,也可以说是第四条平行壕的雏形,它足以掩护工兵置身其间,用柴捆和堡篮来把它完成。经过这样一个拖沓冗长的过程,法军才于4月16日或17日得以夸口说开辟了第四条平行壕。他们怎么能够在俄军枪炮的火力下把它完成并配好武器,还有待分晓。十之八九是,在这条平行壕还没有完成以前,他们的弹药就已用尽,轰击已经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修筑第四条平行壕非但无用反而有害,因为被围者如果猛烈出击,这个阵地自是首当其冲,从而成为一个带来无谓伤亡的持久因素。

左翼这一线全部由法军实施的进攻,根据前述情况,我们认为在指挥上无疑比第一次轰击时更灵活、更明智。他们把火力集中于一个主要目标,集中程度远远超过前一次,并用尽各种办法把堑壕向前推进。但是我们也发现使用的都是极其难以奏效的方法,因此,这个现在看来已成定论的一无所成的结局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东面那条环绕军港区的防线只有两处要地,一个是所谓的大凸角堡炮台,这里有一个大棱堡,位于内港东面几百码处,另一个是马拉霍夫棱堡,它建在一个山冈的斜坡上,山顶有一座同名的塔。这些棱堡的控制范围很大,它们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棱堡与棱堡之间的防线侧翼,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延伸至内港顶端和基连湾顶端的防线侧翼。马拉霍夫冈因地势高而瞰制着其前后两边的地面,可以视为整个郊区的锁钥,正如弗拉格斯塔夫棱堡和它所在的山冈(它位于这个山岗的斜坡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区的锁钥一样。因此,正是为了使这个要地更加稳固,俄军先在基连湾东面修筑了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以便为马拉霍夫冈挡住任何来自右侧的攻击,然后又修筑堪察加多面堡——也叫马梅隆多面堡,作为马拉霍夫冈跟前正面的一个独立工事。

如果说对左翼防线的进攻还有一点值得称赞之处,那么,向东南这段防线的进攻所采用的办法,就连那样一点点值得称赞之处都没有了。马拉霍夫冈是这一带的锁钥,它原来只在一面有大凸角堡作为其侧翼屏障,而朝向基连湾的另一面则没有俄军的工事作为依托。因此,在这条防线上应该选择的进攻点就是此地以东的那一段或者说是马拉霍夫棱堡的凸角。可见,占领基连湾和黑河之间的全部台地和山冈就是首先要保证做到的事情。几个炮队就能把大湾里的舰艇赶走,并压制基连湾俄军一侧的炮火;然后,自然应当赶在俄军之前占领马梅隆高地。但是所有这些都忽略了,从而使被围者能够占领他们被围六个月以来认为不可能占领的阵地。联军方面的这个看似无法解释的疏忽,其实起因于围攻安排上的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不集中力量攻打一段防线,而是用许多平行壕把全部防线包围起来,这些平行壕现在自因克尔曼附近的炮台伸展到从内港延伸出来的大峡谷,在那里同左翼的塹壕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远至卡兰亭湾的半圆。

这以大凸角堡和马拉霍夫冈为目标的“右翼进攻”是从被三个深谷分隔开的四个斜坡台地进行的。与攻打弗拉格斯塔夫棱堡的法军炮队相邻的是“英军进攻部队的左翼”(查普曼的炮队),只有这支部队我们能说出其火炮的准确数目(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材料)。火炮数目如下:

	24 磅 滑膛炮	32 磅 滑膛炮	8 英寸 线膛炮	10 英寸 线膛炮	10 英寸 迫击炮	13 英寸 迫击炮	总计
第 1 炮队	10	—	2	—	—	—	12
第 2 炮队 (水兵)	—	8	2	—	—	—	10

第3炮队 (水兵)	8	—	—	—	—	—	8
第4炮队 (水兵)	4	2	2	1	—	—	9
第5炮队 (水兵)	—	—	1	1	—	—	2
第6炮队	1	2	—	—	3	—	6
第7炮队	—	6	—	—	—	—	6
第8炮队	—	6	2	—	—	—	8
后卫	—	—	—	—	4	10	14
	—	—	—	—	—	—	—
总计	23	24	9	2	7	10	75

这么多的钢铁只不过是用来攻打大凸角堡的一面和该堡与内港顶端之间的武装幕墙，并给攻打弗拉格斯塔夫棱堡的法军一点协助而已。

第二台地为英军右翼进攻部队，即戈登的炮队所占据。他们火炮的数目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不大可能与查普曼的一样多。这部分平行壕的攻击方向是大凸角堡的左面和马拉霍夫棱堡的右面，堪察加多面堡建成后，也是它的攻击目标。这一线所攻打的是俄军方面这样一部分工事，对这部分工事无论如何至少也应该来一次佯攻或非主力进攻；而且这一线的进攻以纵射火力袭击了马拉霍夫棱堡的左面，因此对攻打这一关键阵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一线进攻所使用火炮的数目是刚好够用还是同其他更重要的进攻点相比用得过多，我们只有在了解了各炮队的武器装备情况后才能作出判断。

接下来我们谈谈直接攻击马拉霍夫棱堡左面，纵射其右面，同时还要攻打堪察加、色楞金斯克、沃伦这几个新多面堡的“右翼法军的

进攻”。这一线是真正决定性的进攻，十分可悲的是，也是最被忽视了的一线，直到俄军大胆向前修筑了新工事，给进攻者制造了许多障碍才引起注意。要扫除这些障碍或许还得再猛烈围攻半个月。现在进攻的战线拖得很长，但设置的炮台却稀稀拉拉，能够对俄军在上面修筑了新工事的那些制高点进行有效炮击的恐怕没有几个。这一线的进攻如果是在2月中以前全力推进的话，基连湾附近以至马拉霍夫冈的那些炮台现在可能就被打哑了。而且那个时候，既然俄军能够修筑起多面堡，那就不能说天气和地面条件妨碍了联军扩展他们的工事。这里是阵地的锁钥，这里是最有利于进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先是英军由于拉格伦愚蠢怯懦地想在弗拉格斯塔夫棱堡附近尽量同法军主攻部队靠拢而错过了时机，后来这一线被交给法军，法军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不知道这是由于疏忽还是由于懒惰的缘故。

右翼攻势现在整个看来，其指导思想之谬误令人难以想象，因而得到的结果是零，确实如此，甚至还是个负数——俄军把他们的工事推进得比联军的还快，大大地抵消了联军能说得出的进展。新的多面堡，只要还在俄军的手中，就是参加这一翼攻势的全体官兵和将军们难以抹去的耻辱，联军每个有理智的勇敢的军官看到这些多面堡肯定会不禁赧颜。

联军在右翼攻势中所取得的进展唯一见诸报端的就是，俄军为步兵所挖的掩体和堑壕有一些已被联军夺得，并被改成联军所称的第三道平行壕。这第三道平行壕只能用来对付距离最近的散兵壕，这些堑壕的确距联军阵线很近。但从2月20日以来俄军占据的地方还是比联军多得多，并且利用得更好。

关于联军在这次轰击中所使用的火炮的总数，我们所能做出的

最接近实际的估计是，法军约 220 门，英军约 130 门。至于所使用的弹药，我们认为最乐观的看法是，开始时总储备不超过 35 万发，因此有必要把我们昨天提供的数字^①修正一下。现在，我们发现英军在 10 日以后已奉令每天每炮发射不超过 120 发，迫击炮发射 40—50 发。在此之前发射的更多。但是假定火炮只有 300 门，每天平均发射 100 次，一天就要发射 3 万发炮弹，到 15 日为止（包括 15 日），七天的时间就要发射 21 万发炮弹。16 日及以后几天火力减弱；假定每天只发射 2 万发炮弹，到 21 日就又多发射了 12 万发，共计 33 万发。因此，除非把火力减弱到只是围城状态下一般地缓慢地开上几炮而不再是轰击，否则至迟到 22 日联军的弹药就必定已经耗尽以致必须停火了。

另一方面，用 300 门火炮发射 35 万或者说 30 万发炮弹，平均每门火炮发射 1 000 发，而发射 1 200—1 400 次就足以损坏任何铜制或铁制火炮的炮膛和烧毁其火门，使其无法准确射击。有些火炮甚至在发射 1 000 次以后就几乎完全不能用来进行攻坚射击了。所以我们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联军还会怎样做，他们一连犯了那么多错误，再加上刚刚进行过的这场孤注一掷的无效轰击，他们就不能指望攻克塞瓦斯托波尔。除非改弦易辙，否则他们很快将不得不放弃整个克里木半岛。

但是路易·波拿巴 5 月初将到那里去²⁰⁵。他必须有所作为。究竟有何作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不管怎样，如果他不带着比他在最近发表于《通报》的军事回忆录^②中所阐发的军事思想高明的主张

① 见本卷第 333 页。——编者注

② 指 1855 年 4 月 11 日《总汇通报》第 101 号所载《东方远征》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文的评论，见本卷第 295—301 页。——编者注

前去,那他就最好带着手续齐全的护照以便去国外旅行,因为法国他将永远不可能回去了。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2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1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8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²⁷⁷

星期六晚间这里收到的亚美利加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再次使我们有可能就克里木的战况向读者作一些明确的报道,尽管互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官方报道和报纸通讯使我们的工作做起来仍然很不容易。十分明显,维也纳和谈的破裂²⁷⁴使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联军兵营里的气氛紧张活跃起来,虽然可以说炮击在4月24日就已停止,但是以后的两周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行动。目前还很难说联军取得了哪些战果,倒是的确有一个作者宣称,俄军的前沿工事——色楞金斯克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这些工事构成的整个防线前的步兵壕均已为驻守的部队所放弃²⁷⁸。因为这无疑是联军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所以我们暂且算它是真的。有些记者报道,弗拉格斯塔夫棱堡都已经被法军突袭并占领,但这个消息不可信。这只不过是把4月21日的事胡乱加以夸大而已,那天法军曾利用地道爆破的方法在这个棱堡前面炸开了一条前沿堑壕。^①

① 这一段有的地方可能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改动过。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为题,发表于1855年5月11日《新奥得报》第217号。《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从本段开始,不过文字如下:

我们假定俄军确实已被击退到原来的防线,虽然很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联军占领萨蓬山^①和马梅隆高地的报道。然而,即使这些高地上的多面堡都已不在俄军手中,可谁也不能否认,俄军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多面堡。俄军在萨蓬山从2月23日守到4月底,在马梅隆高地上的堪察加多面堡从3月12日守到4月底;在此期间,联军的堑壕不是遭俄军炮火的纵射,就是处在来自这两处的正面密集火力之下,而俄军整个阵地的关键所在——马拉霍夫冈,在15天的炮击期间却充分地得到这两个地方的掩护。俄军在很好地利用了它们之后,失去亦无妨。

关于联军多次以夜袭占领俄军步兵壕和反接近壕,以及俄军出

“巴拉克拉瓦同伦敦与巴黎之间电报联系的开通,迄今为止对公众而言,只是给他们所获得的消息增添了更大的混乱。

英国政府什么都不公布,最多只是含糊其辞地讲些什么确已取得战果之类的话。法国政府公布了由康罗贝尔签署的一些电文,但是经过删节和窜改,以致从中几乎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例如,法军主要攻击的棱堡过去一直说是弗拉格斯塔夫棱堡即马奇塔棱堡。现在,我们听到的却是法军在攻击中央棱堡时后来又在攻击第四棱堡时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把这些报告同过去的、特别是同俄军方面的报告仔细核对之后便可以看出来,讲的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马奇塔棱堡,只是名称叫法变了。这样故弄玄虚完全是有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注定如此’。

但是,电报虽没有给公众带来好处,倒的确使联军兵营有了一些生气。无疑,在康罗贝尔收到的第一批电报里就有严格的命令,要他更坚决地行动,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务求取得一些战果。据一则非官方报道称,俄军已经撤出全部前沿工事——色楞金斯克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这些工事构成的整个防线前的步兵壕。”
——编者注

① 这里指色楞金斯克多面堡。——编者注

击将这些堑壕夺回等情况,都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叙述。这种战斗从战术观点来看,除非是亲自观察过那里地形的人才会对它感兴趣,因为这种战斗主要取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机智、勇猛和顽强。英法军队在这些素质方面优于俄军,所以他们能够在紧靠俄军工事的某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据点。^① 双方之间的距离在有些地方已经缩短到手榴弹可及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联军距俄军隐蔽通道只有大约20—30码,距主体壁垒只有40—60码。俄军方面说,围攻部队距主体壁垒30俄丈^②,即60码。^③ 特别在弗拉格斯塔夫棱堡、中央棱堡和大凸角堡前面,情况正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地面形成死角,洼地的位置使俄军大炮达不到足够低的角度以直射这些洼地。但是由于俄军炮兵的火力并非已被打哑,所以要同这些洼地保持交通往来并使之成为完整的堑壕体系很困难,而俄军的侧射火力对联军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④ 事实上,只要联军的炮群还在前沿堑壕后方400—500码处,他们就无法指望能够在俄军突然以重兵出击时保住这些没有掩护的阵地;而在这场已公认失败的炮击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新的向前推进得更远的炮群可以动用。

这次联军突然直抵俄军壁垒脚下,虽然看起来不同于过去那种松懈迟疑的作风,但实际上仍然是那么一回事。联军的这场包围战,

①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从“俄军在很好地利用了”到“建立起自己的据点”被删去。接下去是“由于联军最近节节取胜,双方之间的距离……”——编者注

② 俄国旧时的计量单位,1俄丈=2.1336米。——编者注

③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没有这一句。——编者注

④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没有从“在这些地方,地面形成死角”到“严重的威胁”这两句话。——编者注

一直进行得既无系统性又无坚定的恒心。而包围战实质上是一种有系统的战斗,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立即使之化为某种新的优势,否则这一步就是徒劳无益。因此,十分明显,联军行动所依据的是糟得不能再糟的作战方案。尽管联军的将军们初到战地一看就满心失望,尽管去年秋季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包围的那个阶段有过失策,但是联军本来还是能取得更大进展的。这里,我们也像联军的将军们那样完全撇开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不管。这些将军毅然下定决心单攻南区,要冒险进入一个他们无法攻克的堡垒俯瞰之下的地区。于是这就有了两种可能:要么是联军的将军们那时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南区,那他们现在就必须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要么是他们感到自己太弱,那他们为什么不调援军来呢?现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这场“值得纪念和史无前例的”包围战中,失误层出不穷。看来,冬季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已经使得部队和将领们都陷入了一种无法克服的消沉、淡漠和委靡的精神状态。在2月间,俄军大胆越出自己的防线之外,在前面又建立了新的防线,这对联军来说应当是个相当大的刺激,应当足以使他们振作精神;然而,康罗贝尔却只会利用这一严重的警告信号来冷却朱阿夫兵¹¹⁷的战斗热情,派他们去进行他已预知必败的袭击。^①掘壕作业恢复了,然而这更像是为了给强攻纵队开辟隐蔽通道,而不像是为了把炮群推进到离敌人更近的地方。甚至在俄军阵地之前待了六个月以后,联军的每个行动都仍然证明他们还没有既定的明确计划,也没有选定主攻点;相反,支配着联军头脑的仍然是用**突袭**的方法一举拿下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固定不变的老主意,排斥一切合理的建议,阻碍一切有系统地推

^① 见本卷第252—254页。——编者注

进的尝试。联军所做的那一点点事,也比正规围攻作业多费了两倍的时间,而且全都做得既无章法又无计划,甚至令人产生不出对这种正规作业应有的成功信心。^①

可是,联军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不久前进行的炮击上面。这就是被用来为一切拖延和无所作为的表现辩解的主要理由。尽管很难说以远离目标 600—1 000 码的炮群进行炮击这一壮举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但终归真的开炮了。头两三天,每门炮打了大约 150 发炮弹,后来打 120 发,再往后是 80 发、50 发,最后是 30 发,这以后炮击就停止了。除火炮破损弹药用光外,几乎看不到什么结果。如果尽全力炮击 5 天,那也许会比用开始时快速猛轰随即同样快速地减弱的方式炮击 15 天能使俄军受到更大的损失,使联军有更多的获胜机会。但是,联军在弹药用尽、火炮损坏的情况下,还能抓住这样的有利机会吗?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像目前这个样子,而俄军因为目睹联军炮火减弱,因为免于在连续五天里每天挨 5 万发炮弹的猛轰,他们的处境就比本来可能陷入的处境好得多。^② 联军以减弱火力强度

^①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这一段改写如下:

“就连这次联军的突进,也只是许多次无计划的袭击行动中的一次,这场包围战的特点就是无计划的袭击——时而正规封锁,时而强攻,时而妄想用突袭的方法一战成功,各种打法乱用一气。就在 10 月 17 日—11 月 5 日第一次炮击之前,联军曾决定撤开城市北区不管,单攻南区,也就是说,要冒险进入一个他们无法攻克的堡垒俯瞰之下的地区。此外,第一次炮击就暴露出缺点:火力被分散于一条长长的战线上而不是集中于一两个点。第一次与第二次炮击之间的五个月不是用来选定主攻点,而是重蹈覆辙,即详细地、慢慢腾腾地制定对一个巨大半圆形战线上所有各点平均使用火力的进攻方案。”——编者注

^②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没有“但是,联军在弹药用尽”到“比本来可能陷入的处境好得多”这几句话。——编者注

来延长炮击的时日,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严重违背了一切军事原则,归根到底这必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头两天的炮击已使联军的期望落空的情况下仍然这样白白地浪费弹药,必定是由于在维也纳会议⁴期间必须保持虚张声势的炮击所致。

现在炮击停止了,维也纳会议中断了,电报开通了。情况立即起了变化。巴黎发来了命令,要求迅速而坚决地采取行动。旧的攻击方法不再使用了,无效果的大炮轰鸣改为局部强攻,用坑道爆破夺取阵地,用步枪和刺刀拼杀。联军夺得了一些前沿地点,甚至还击退了被围者的第一次出击,守住了这些地点。但是,如果不能在俄军防线的近处配置炮群从而使被困者觉得在这些防线待不下去,那就是毫无所得。要守住这些前沿地点,就必须每天付出重大的代价,经常进行结局难料的战斗。即使第二和第三道平行壕内的炮群已经架设好,并且为了架设这些炮群一开始就已将俄军赶出他们的步兵壕,但是又需要多少时间这些新的炮群才能有足够的火炮,成功地回击在两次炮战中已证明足以与联军相匹敌的俄军火力呢?炮群的配置距离敌人工事越近,可能向它们集中的交叉火力就越猛烈,配置火炮的空间也就越有限,换句话说就是,攻守双方的火力更加不相上下,除非守方的火力已事先被较远的炮群打哑了,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①

俄军究竟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抗击联军的攻击呢?第一是由于联军本身的错误和犹豫不决;第二是由于守军的英勇和工程长官托特列本上校的才干;第三是由于阵地本身的天然坚固。因为必须承认,这是个坚固的阵地。按照直到不久前唯一能找到的质量很差

^①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至此结束。——编者注

的地图来看,塞瓦斯托波尔位于一个坡地的下方,后面有高地瞰制;但最新的质量最好的地图表明,该城坐落在几个独立的圆形山丘上,这些山丘与台地的坡地有深谷相隔,实际上对台地和城区均成俯瞰之势。这种地形也许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什么去年9月联军不敢强攻要塞;不过,联军的将领们似乎也被它过分地吓倒了,他们甚至不敢试探一下敌人究竟能调动多少兵力用于防御。俄军工程师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天然优势。在塞瓦斯托波尔所有面向台地的坡地上,都构筑了两排甚至三排炮台,而且一排比一排高,这使得防御力量增强了一倍甚至两倍。在其他筑城设防的工事中(如在巴黎的蒙瓦莱里安山坡)也有过这种炮台,但工程师们一般并不赞成这种炮台,并称之为受弹台。它们的确是围攻一方的大靶子;炮弹在未命中所瞄准的炮台时,也会射中其上方或下方的炮台,因而守方总是要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是,在要塞还根本没有被围住的情况下,比如在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弱点同炮台给防御火力带来的巨大威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我们猜想,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场包围战结束以后,对这种受弹台的非难就会很少了。在防守有充分物资储备且不易被围的第一流要塞时,如果地形有利,就可以非常有效地使用这种炮台。除了这种受弹台以外,俄军在另一点上也摆脱了工程学上的陈规。按旧式的棱堡体系,要塞周围构筑15个甚至17个棱堡可能还不够用,对要塞的防御作用可能还很差。现在俄军改变了这种做法,只在向前突出的高地上构筑六个棱堡,而连接棱堡的幕墙则成折线形,可以不依赖棱堡本身的火力进行侧射,而配置在折线突出部的重炮则能射击前方的整个地区。在这些幕墙上几乎处处都配置了火炮,这又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一般棱堡的幕墙上通常只配置1—2门有专门用途的火炮,整个火力防御则依靠棱堡和半月堡。无须在技术方面进行

更详细的探讨,仅就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俄军极为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条件,即使联军攻占了弗拉格斯塔夫棱堡或马拉霍夫棱堡,他们的面前还会有第二和第三道防线,要突破这些防线他们必须更加绞尽脑汁。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4—7 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鼓动运动的历史²⁷⁹

伦敦,5月7日。在英国历次举行大规模鼓动的时候,伦敦西蒂区一次也没有能够在运动中打过先锋。到目前为止,伦敦西蒂区参加某次鼓动只是表明,这次鼓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它已是既成事实。由伯明翰发起的**改革运动**¹⁵⁷是这样,由曼彻斯特领导的**反谷物法运动**²⁸⁰也是这样。1797年的**银行限制法**²⁸¹却是一次例外,那时伦敦西蒂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们所组织的集会**使皮特得以下令禁止英格兰银行继续用现金支付**——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提前几星期知会皮特说,该银行濒于破产,只有通过一次政变,也就是说通过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才能挽救该银行之后。当时的情况不仅要求英格兰银行服从**禁止用现金支付的法令**,而且要求西蒂区商人(他们的信用与该银行的信用息息相关)也同样以服从的态度支持皮特的禁令并向国人加以推荐。^① 挽救英格兰银行就是挽救西蒂区。由此当时出现

① 马克思在此处加了一个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最新的国民经济学史中,把当时西蒂区的行为引为英国爱国主义的证据。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在他论述俄国的书(1852年版第3册)中,竟抱着那样轻信的态度,以致断言,皮特用中止银行支付现金的办法阻止了货币流出英国。在俄国,要用什么样的谎言才能让一个

了西蒂区的“爱国主义”集会以及它的“鼓动性”倡议。西蒂区上星期六^①在伦敦饭店和市政厅举行了集会，成立了“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它此时发起这种倡议功绩在于新鲜，在于在英国非常罕见，史无前例。另外，在这些集会上不吃不喝，这也是西蒂区史册上的新鲜事，因为它的“海龟肉汤的爱国主义”早就被科贝特永久保存下来了。最后，西蒂区的商人们在伦敦饭店和市政厅举行的集会是在大白天营业时间举行的，这也是新鲜事。目前的商业萧条可能与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关系，就像萧条整个说来可能成为导致西蒂区思想动荡的一种酵素一样，而且是一种重要的酵素。不管伦敦西头的人怎样竭力嘲笑西蒂区的这个运动，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报纸《每日新闻》、《晨报》、《纪事晨报》（这家报纸一段时间以来已属于这一类）竭力向自己的反对者展示西蒂区协会的“远大前途”。它们忽视了近在眼前的事情。它们不懂得，召集这些集会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一些非常重大和非常关键的问题：（1）分裂了议会外的统治阶级和议会内的执政阶级；（2）把直到现在还在政策上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分子排挤掉；（3）使人民对帕麦斯顿不抱幻想。

大家知道，莱亚德宣布今晚要在下院提出他的改革提案。²⁸³大家知道，大约在一星期以前下院曾向他发嘘声，给他喝倒彩，嘲笑他。

人相信这种事情呢？对于不折不扣地信赖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并为了证实这一点而照抄他的说法的柏林批判²⁶³，我们又应怎样评论呢？”注文中所说的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论点见他的《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52年柏林版第3册第526页。——编者注

① 1855年5月5日。——编者注

西蒂区的英国商界巨子们则针锋相对,在自己的集会上疯狂地高呼莱亚德万岁。莱亚德成了伦敦饭店和市政厅里的风云人物。西蒂区的欢呼声是对下院的喝倒彩作出的挑衅性的回答。如果今晚下院表现胆怯,那么它的威信就要丧失,它也就该解散了;如果下院还再喝倒彩,那么对手的欢呼声会更加强烈。从《阿布德拉人》²⁸⁴一书中可以知道,欢呼声和喝倒彩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什么结果。西蒂区的集会是对下院的直接挑战,这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威斯敏斯特选举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的情形差不多。²⁸⁵

大家知道,过去领导英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学派³⁷及其布莱特们和科布顿们。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现在被西蒂区的商人们排挤掉了。他们正统的反战立场使得在英国一刻也闲不住的资产阶级确信,他们至少是现在已失去了领导资产阶级的使命。曼彻斯特的大亨要在现时保持“领导权”,就只能胜过西蒂区的大亨。布莱特们和科布顿们被排除在西蒂区集会之外,而且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参加这些集会,这些集会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的两个最大的派别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预示着对人民运动将会有好处。我们已经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西蒂区委员会书记写信给伦敦的宪章派¹⁹²,请求他们派一名成员来参加它的常务委员会。宪章派就派了厄内斯特·琼斯到那里去。在商人与工人之间自然没有像在工厂主、工业巨头与工人之间的那种直接的对抗,因此,他们至少能在开始时采取宪章派和曼彻斯特派之间所不可能有的共同步骤。

帕麦斯顿在国内的最重要的选区第一次被人嘲笑,被人喝倒彩,这是西蒂区集会的最后一个重大事件。他的名字的魅力永远消失了。使他在西蒂区声名狼藉的,不是他的比三十年战争²⁸⁶年头更长久的俄国政策。使他声名狼藉的,是他煞有介事地用随意的嘲讽、傲

慢的玩世不恭,尤其是用“拙劣的玩笑”,来医治英国所经历的最为可怕的危机。这激怒了资产阶级的良心,虽然这一套在堕落的“下流”议院^①里很受欢迎。

要借助目前这样的议会进行行政改革,任何人都会一眼看出这种善良的愿望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纪里经历过教皇们实行的改革²⁸⁷。我们经历过奥迪隆·巴罗领导的改革宴会¹⁴⁸。所以,将会冲走古老英国的雪崩一开始作为雪球出现在要求改革的西蒂区商人们手中是毫不奇怪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7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0 日《新奥得
报》第 21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双关语:“Haus der Gemeinen”意为下院,亦有“下流议院”之意。——编者注

卡·马克思

皮亚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²⁸⁸

伦敦,5月9日。《纪事晨报》、《晨报》、《每日新闻》等等对《通报》的某一号使用了一些多少有些胆怯的言辞进行指责,从而结束了它们对刺客皮亚诺里²⁸⁹的一切痛骂。这一号《通报》发表了对皮亚诺里的起诉书,同时刊载了一项命令,规定向前法国军士,现在在布鲁塞尔的老朽之人康替龙支付拿破仑遗赠款1万法郎,以奖励他图谋刺杀威灵顿。最可笑的是,一向严肃的《纪事报》竟兜起了圈子。它认为,拿破仑第三想必并不知道为了向拿破仑第一表示敬意而作出的这一奇怪的、在目前来说极不恰当的举动。“康替龙”这个名字想必是由于笔误而误入《通报》清白的版面上的,或者,也许是某一位过分热心的下级官吏擅自奖给康替龙1万法郎的,等等。看来,可尊敬的《纪事报》以为,法国的官僚制度是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的;在英国,正如我们从议会调查委员会⁷²进行的最近一次讯问中看到的,军械局的下级官吏确实可以背着他的上司擅自动用几千英镑订购某一种火箭;在英国,正如帕麦斯顿向下院说明的,提交议会的外交文件可以因为外交部负责翻译这些文件的“人”得了感冒或风湿病而积压几个星期。

伦敦的报刊几天来已经不再赞扬奥地利了,它要让读者对向相

反语调的急剧转变有个准备。同往常一样,打先锋的必定是“本报通讯员”。例如,《纪事晨报》发表了下列柏林通讯:

“不能指责普鲁士内阁有什么确实的欺骗行为或正式的违约行为。如果西方各国内阁受了骗,那是它们自己的过错,或者是那些应当向它们说明真相的人的过错。但是能不能这样去说奥地利呢?奥地利的行为是不是也像普鲁士那样毫无掩饰呢?普鲁士尽其所能地百般伤害西方大国,而且是公开地和毫无掩饰地干。普鲁士蔑视和讥笑我们是不加掩饰和毫无保留的。而奥地利在20个月内一直在向英法献媚,偷偷地讥笑我们,利用官方的和私人的途径唤起我们的希望,引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让步,对我们作最正式的保证。可是现在,正如那些没有被过分的信任所迷惑的人们早就预言的,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些对俄国大大有利,而对英法绝对有害的媾和条件,那么奥地利就打算背弃我们,确实如此!奥地利之前在普鲁特河上充当俄国的盾牌,使得哥尔查科夫能够把他几乎所有的作战部队从比萨拉比亚调到了克里木,而现在它又站出来坚持缔结一个保持现状的和约。如果这就是我们从奥地利的友谊中所能期望得到的一切,那么这种假面具撕掉得越早越好。”^①

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发表了下列维也纳通讯:

“统率第三和第四军的赫斯男爵不久前草拟了一份备忘录,递交给他的皇帝陛下^②。其中论证,在目前情况下,向俄军宣战对奥地利来说是不明智的。我这样坦率地谈及一个如此微妙的问题,可能会引得人们对我群起而攻之。但是,依我之见,告诉英法只应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他们很难指望得到奥地利的援助,那么这就是为英法效劳了。如果奥地利能说服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²⁹⁰抽调一支10万人的军队来掩护它的左翼,那么,尽管障碍重重,奥地利大概也早就担当起进攻俄国的义务了。赫斯男爵在备忘录中提出了哪些论据,具体的还不知道,但是那些亲俄的奥地利人总是深知内情,他们确信,这些论据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一点:西方大国明显地证明,为了能在克里木同俄军相对抗,他们必须调用自己的以及土耳其的全部力量。因此,如果奥地利不能保证自己得到

① 1855年5月9日《纪事晨报》第27571号。——编者注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德意志联邦的支援就同俄国打仗,那就太不明智了。大家都承认,俄国在波兰有一支为数 25 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近卫军和掷弹兵军团;由于这支军队驻扎在具有俄罗斯帝国七个最强大要塞的地区,因此至少必须用比俄军多一倍的兵力,才有望取得对俄军的优势。同样还应当考虑到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很紊乱,法国不可能提供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让奥地利支配,英国政府显然无能为力,普鲁士不可靠等等。上一周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论据——事物一般是变化无常的,特别是人的命运变化多端,如果在奥地利同俄国交战期间路易·拿破仑遇到什么不测的话,奥地利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9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新奥得
报》第 21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1855 年 5 月 8 日《泰晤士报》第 22048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²⁹¹

伦敦,5月11日。法军的急躁情绪迫使康罗贝尔泄露了联军的作战计划。按这个计划,25 000人的预备军团将海运至克里木,随后还要派去3万—4万名法军和皮埃蒙特军¹¹⁰。预备军团一开到,法军将立即出动,渡过黑河,攻击在任何地点遭遇到的俄军,力图在阿利马河和卡恰河附近某处同奥美尔帕沙的部队会合,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①与此同时,舰队的蒸汽舰应向卡法和刻赤进

^① 本文由马克思从恩格斯的《克里木的新攻势》一文翻译而成。恩格斯的原文发表于1855年5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02号,发表时被《纽约每日论坛报》作过一些改动。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从开头到这里的文字为:“昨天刊登的本报巴黎通讯员的来稿,根据巴黎最可靠的消息对联军在克里木的夏季战局中将要遵循的计划作了一个概述。这个计划与康罗贝尔将军在军营里泄露的计划基本一致,我们可以放心地得出结论,现在至少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是清楚了。简单地说,现在分散在马斯拉克、加利波利和阿德里安堡的法军预备部队25 000人将被运送到克里木,随后还要派去3万—4万名法军和皮埃蒙特军。预备部队一开到,无需等待后续增援部队,法军将渡过黑河,如能通过辛非罗波尔,则在野外迎击俄军,然后随着增援部队开到,一起展开野战,把俄军赶出半岛,占领并扼守彼列科普,之后主力部队将调头,轻松完成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编者注

行袭击,如果成功,即占领并扼守这两个城市,作为野战部队可能利用的枢纽或据点。的确,这是使联军能胜利结束克里木战局的唯一可行的计划。但是,要在开阔地上采取这样的行动,联军必须在兵力上占相当大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他们就不能指望获得对俄国监视军的决定性的胜利。而目前双方兵力的对比究竟怎样呢?

法军在克里木有9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非洲猎骑兵)。每个师按7000人计,则共有步兵63000人,骑兵1500人。英军有5个步兵师,每师至多6000人,有1个骑兵师,为2000人。此外,在克里木还有1个土耳其步兵师,约6000人。^①这里还应加上法国的预备军团,其中在康罗贝尔规定的战局开始以前能调到克里木的不超过2万人,包括5月3日^②已登陆的4000名皮埃蒙特军在内。这样,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力总数如下:

①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没有这句话,而有如下文字:“此外还有最初派到克里木的土耳其军队的余部,可能不会超过步兵6000人。加上可以从叶夫帕托里亚抽调的部队(奥美尔帕沙必须留下至少15000人驻守那里庞大的工事),联军大约可以增加步兵12万人,骑兵3000或4000人。我们从本报伦敦通讯员获悉,这些部队已经被运送到了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驻扎在巴拉克拉瓦后方的卡德柯伊,已为即将开始的野战作好准备。比起让土军和英法军队各自从陆路实现会师,这种部署要明智得多,因为前一种方式会使土军和英法军队分别遭到俄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关于奥美尔带到卡德柯伊的部队,本报通讯员所说的人数比我们估计的要多,但是他认为有一支兵力相当的英军被调去补充驻守叶夫帕托里亚的兵力,因此总的来说,我们的估计与本报通讯员的估计相差不大。”——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是“5月9日”。——编者注

法军	步兵	83 000 人	骑兵	1 500 人
英军	步兵	30 000 人	骑兵	2 000 人
土军	步兵	6 000 人		
共计：	步兵	119 000 人	骑兵	3 500 人

我们对留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预备军团的编制了解得很少，因此不知道目前是否能再调一些骑兵到克里木去。在战局开始前，联军的骑兵最多能增加 2 000 人，这样，骑兵总数将增加到 5 500 人。为了继续围攻，至少必须有相当于目前担任围攻任务的兵力，即 46 000 人（法军 4 个师，每师 7 000 人；英军 3 个师，每师 6 000 人）。^① 此外，还应加上水兵和守卫巴拉克拉瓦和由此到因克尔曼一线的工事、同

①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从“这样，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到“每师 6 000 人”这一部分的文字如下：“联军在赫拉克利亚半岛的兵力总数如下：

法军	步兵和炮兵	83 000 人	骑兵	1 500 人
英军	步兵和炮兵	30 000 人	骑兵	2 000 人
土军	步兵和炮兵	26 000 人	骑兵	4 000 人
皮埃蒙特军	步兵和炮兵	4 000 人		
共计	步兵和炮兵	143 000 人	骑兵	7 500 人

我们不知道法军预备部队中是否有炮兵随行，如果有的话，它能否在军事行动开始的季节开到还不确定；但是，为了给我们对联军的估算尽可能多地留下余地，我们在上述数字中再加上 2 000 名骑兵，这样骑兵总数就达 9 500 人。

该计划的一部分是继续围攻，为此至少必须有相当于目前担任围攻任务的兵力，也就是说：

法军 4 个师，每师 7 000 人	28 000 人
英军 3 个师，每师 6 000 人	18 000 人

共计 46 000 人”——编者注

时又作为围攻部队预备队用的部队,其数量至少为 12 000 人,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 6 000 名土军^①。如果这些部队中有 4 000 人是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那么从步兵总数 119 000 人^②中应该减去 54 000 人^③,这样,用于野战的则为 65 000 名步兵^④和 5 500^⑤名骑兵,共计 7 万余人^⑥。此外,还应考虑到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它大约有步兵 35 000 人,骑兵 3 000—4 000 人。其中 15 000 人必须留守要塞,因此奥美尔帕沙大概能够出动步兵 2 万人,骑兵 4 000 人,共计 24 000 人。

这样算来,联军这两支独立的部队中可用于野战的兵力总数为:

	步兵	骑兵	总数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的部队……	65 000	5 500	70 500
叶夫帕托里亚方面的部队……	20 000	4 000	24 000
	85 000	9 500	94 500

从俄国人自己所提供的关于他们目前在克里木的部队的总数的材料中取其最小的数字来看,俄军步兵为 12 万人,骑兵为 2 万人。

- ①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没有“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 6 000 名土军”。——编者注
- ②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步兵总数 119 000 人”被改为“上述 143 000 人”。——编者注
- ③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54 000 人”被改为“56 000 人”。——编者注
- ④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65 000 名步兵”被改为“87 000 名步兵和炮兵”。——编者注
- ⑤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5 500”被改为“9 500”。——编者注
- ⑥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7 万余人”被改为“约 96 500 人”。——编者注

这一数字中应除去防守塞瓦斯托波尔的 5 万人,其中 26 000 人防守南区,24 000 人防守北炮台和营垒。所以用于野战的还有步兵 7 万人和骑兵 2 万人。^①至于野战炮兵,甚至连大概的数字也无法估计。但是,考虑到联军很难搞到马匹,而每支俄军都随带大量火炮,那就几乎不用怀疑俄军在炮兵方面将占优势。他们在骑兵方面的优势也同样是明显的。至于步兵,联军兵力合起来超过俄军,但两个方面的野战部队的每一支单独算都比俄军少。然而俄军最大的优势条件还是它所占有的阵地。俄军配置在阿利马河、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菲罗波尔之间的三角地带,在北面同奥美尔帕沙对峙的俄军占领着沿阿

①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从“此外,还应考虑到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到“所以用于野战的还有步兵 7 万人和骑兵 2 万人”这一部分的文字如下:“我们已经说过,这只是一个非常不严格的估算。

那么,根据《奥格斯堡报》的俄国军事通讯员的报道(他常常把俄军的人数估计得很低),俄军目前在克里木的兵力为:

正规步兵	93 000 人	正规骑兵和非正规骑兵	2 万人
水兵、海军陆战队等等	8 000 人		
黑海哥萨克	6 000 人		
炮兵、工兵等等	13 000 人		
共计步兵	12 万人	共计骑兵	2 万人

这些兵力的部署情况大致如下:

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守军(步兵、炮兵等等)	26 000 人
北炮台和营垒守军	24 000 人
共计	5 万人

剩余的可用于野战的步兵和炮兵有 7 万人,骑兵有 2 万人。

因此联军在步兵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他们的人数比对手多 26 500 人。”——编者注

利马河的筑垒阵地,这个阵地可用 15 000 名步兵在正面防守,同时俄军骑兵采取侧敌运动还可能切断土军同叶夫帕托里亚的联系。所以,如果奥美尔帕沙决定单独向阿利马河推进,那是决不能渡过该河的,除非等到英法军队把俄军击退到辛菲罗波尔并从而迫使他们放弃阿利马河的阵地。只有那时,这两支军队才有可能会合。因而英法军队向前推进是全局胜利的基本条件。但联军向前推进的路线,看来只可能是沿着向马更些庄园^①去的那条道路。^② 这条通向阿利马河和辛菲罗波尔方向的道路设有两道防御工事:一道构筑在俯瞰黑河的山脊上,另一道构筑在从马更些庄园附近的山岭到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的峡谷的北面。这第二道防线是主要的,全长仅约两英里,据说构筑得非常坚固,联军必将在这里进行第一次决战,其结果

① 马更些庄园是塞瓦斯托波尔东北面的一个农庄。——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从“至于步兵,联军兵力合起来超过俄军”到“看来只可能是沿着向马更些庄园去的那条道路”这一部分的文字如下:“即使我们必须从他们的 2 万人中减去 8 000 名哥萨克,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开到是为了巡逻、担任前哨和传令,剩下的骑兵中还有整整 12 000 人可供派遣,而联军只有 9 500 人,到交战之日,中能上战场的至多 7 000 人。”

联军只能沿着通往马更些庄园的那条道路,在这条路与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或因克尔曼之间的区域向内地推进。因为马更些庄园以东环绕着拜达尔谷地的峭壁向东南一直延伸到雅尔塔附近克里木的南部山脊,形成一个石壁屏障,骑兵和炮兵无法通过,而步兵也只能沿着少数几条山径通过。从雅尔塔开始确实有一条道路穿过山岭,但是这条路以及山径只需很少的部队就能防守,毫无疑问,俄军早就在此筑有工事。此外,由于这条道路的走向,由于从雅尔塔到巴拉克拉瓦路途遥远,由于在这条线上活动的任何部队都有可能被俄军切断,因此它不大可能被联军用做主要的行动路线。”——编者注

将决定：联军是仍然被困在赫拉克利亚半岛呢，还是能够突入半岛的腹地。联军不得不在狭窄的正面上行动，这对俄军是有利的。^① 如果俄军在此遭到失败，阵地被夺，那么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退往别利别克河，并扼守这道防线以抗击联军，^②同时将派出一支部队去牵制在阿利马河的土军。即使俄军在此遭到失败，但由于他们在骑兵方面占优势，而联军因运输工具不良不能在远离海岸的地点站稳脚跟，所以俄军仍能撤离联军的活动地区。俄军可能退却的路线，是其左翼的延伸部分，这是很不利的阵地。

可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即俄军一开始就力图将联军牵制在黑河地区，而以主力对付奥美尔帕沙，以便在骑兵的协助下围歼土军，然

①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没有“联军不得不在狭窄的正面上行动，这对俄军是有利的”这句话，但有如下文字：“在这种阵地上打仗比在阿利马河还难，因为除非俄军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否则双方力量将更加旗鼓相当。俄军可以轻松地集中 75 000 人来防守这些堑壕，如果联军用 8 万—9 万人来进攻，那么这种人数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会由于堑壕、由于联军不得不在狭窄的正面上行动而抵消。如果俄军表现正常，他们肯定会立即在这里遏制联军的推进，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赫拉克利亚半岛的营地。”——编者注

② 在《克里木的新攻势》中，从“并扼守这道防线以抗击联军”到本文结尾，文字如下：“并扼守这道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守军将不得不处于联军的监视之下，而其投入野战的军队就会因此减少大约 8 000—10 000 人；如果俄军遭受第二次失败，他们在骑兵方面的优势将确保他们安全撤退，不过，他们退却的路线位于其左翼的延伸部分，这是很不利的阵地，除非通过一些相应的优势来弥补。

以上就是对克里木事件的最新变化的几点思考，远没有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谈到，因此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个话题。”——编者注

后再将全部兵力调转头来对抗英法军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5月11日

载于1855年5月14日《新奥得报》第22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晨邮报》反对普鲁士。——
辉格党和托利党²⁹²

伦敦,5月14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今天登载了一篇威胁普鲁士的文章,其中写道:

“1854年4月,枢密院决定许可用中立国船只把俄国产品输入联合王国。普鲁士以惊人的速度利用了这种许可。下列统计资料(引自向议会呈报的官方统计表)表明1853年和1854年从这个国家输入英国的油脂、大麻和亚麻的比较数字。尽管我们严密封锁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港口,但是去年进口数量的增加却清楚地表明,俄国产品已找到经过梅梅尔和但泽到达不列颠市场的道路。从普鲁士输入联合王国:

	1853年	1854年
	(单位:公担)	
油脂	54	253 955
大麻	3 447	366 220
亚麻	242 383	667 879
亚麻籽	57 848	116 267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这个新的贸易领域对普鲁士的意义。结果,尽管我们实行封锁,俄国仍然能够像在和平时期那样自由地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我们却必须为这些产品多花费50%,以支付各种费用和普鲁士商人的利润。我们承认,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很不彻底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撤除对敌人港口的封锁,而是尽我们所能消灭经过普鲁士领土的陆上贸易。”^①

反对贵族的运动在英国只可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使托利党⁷³,即典型的贵族政党执掌政权。如果结果不是这样,那么运动首先必然演化为辉格党⁷⁰人的一些平淡无奇的小花招,即几项不值得一提的假行政改革。莱亚德声明他打算提出关于“国家状况”的决议案,而这个声明又受到了下院的欢迎,这样就引发了西蒂区的集会。但是在西蒂区集会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埃伦伯勒在上院的提案²⁹³。托利党人借这个提案掌握了这次新的改革鼓动^②,使之变成他们进入内阁的阶梯。莱亚德本人在提案中把“贵族的影响”这个字眼变换成“家族的影响”,这是对托利党人作出的让步。议会外的一切运动在议会内采取的形式,就是执政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吵。反谷物法同盟²⁸⁰在辉格党人的手里成了推翻托利党人的手段。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在托利党人的手里将成为推翻辉格党人的手段。只是不应当忘记:旧制度的基础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这两个派别轮流拿着去作牺牲,然而我们可以补充说一句,制度本身却仍然保持着。我们早就说过,只有托利党人才会被迫作出大的让步,因为只有在他们执政时,外来的压力才具有威胁性甚至具有革命性^③。辉格党代表英国真正的寡头政治,代表像萨瑟兰、贝德福德、卡莱尔和德文希尔等少数大家族的统治。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也可以说是代表容克派,尽管在英国地主和北德意志容克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托利党人是英国有关教会和

① 1855年5月14日《晨邮报》第25386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5—238、352—355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的一切旧偏见的集大成者。辉格党人是开明的寡头政治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们保持占据国家职位的世袭权利的偏见。辉格党人的友好态度总是束缚着资产阶级运动；托利党人的友好态度则经常把人民群众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而资产阶级又把人民群众交给辉格党人支配。现在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不再有什么区别，除了后者代表贵族中的平民，而前者则代表贵族中的上层。贵族中的平民用的是旧贵族的词句，而贵族中的上层用的则是自由派的词句。实际上，在老的托利党人（博林布罗克勋爵等）没落以后，领导托利党的一直是像皮特、阿丁顿、派西沃、坎宁、皮尔和迪斯累里这样的一些新贵。新人总是出在托利党内。在德比（德比本人就是从辉格党阵营投奔过来的）组阁⁸⁶时，在阁员中除了德比本人外，也就还有两个人出自古老的家族。所有其余的人都是一般的地主，还有一位文学家。相反，根据时势而毫不犹豫地更换自己的礼服和观点并经常在表面上革新自己和改变自己的辉格党人却不需要新人。他们能够使家族的名称永垂不朽。如果人们概观一下1688年“光荣”革命¹⁷³以来的英国历史，那么就可以发现，一切针对人民群众的法律，从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²⁹⁴起，到最近的济贫法¹⁷⁷和最新的工厂立法²⁹⁵止，都是辉格党首倡的。但是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程度大于反对人民群众。因此辉格党人有了自由派的声誉。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5月
14日

载于1855年5月18日《新奥得
报》第22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上院会议²⁹⁶

伦敦,5月15日。昨天下午,上院走廊里在开会以前就挤满了人。已经宣布要演一出好戏——埃伦伯勒勋爵的提案²⁹³和朝野之间的一场正规战斗。此外,亲眼看一看世袭的立法者怎样扮演反对贵族的十字军骑士的角色,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戏演得很糟糕。演员们经常忘记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演出以正剧开始,而以闹剧告终。在假交锋的时候,甚至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幻想,一点戏剧性的幻想。一眼就可以看出,高贵的战士们不仅竭力保持彼此的人身不受伤害,而且甚至竭力保持彼此用来交锋的武器不受损害。

围绕着对当前战争进行批评的那部分辩论,甚至达不到伦敦的任何一个辩论俱乐部的水平,在这种辩论上哪怕是停留一分钟,也意味着白白浪费时间。但我们打算费点笔墨概述一下高贵的上院议员们是怎样倡导行政改革的,怎样反对贵族独霸国家管理大权的,怎样充当西蒂区集会的应声虫的。埃伦伯勒勋爵叫喊道:“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为了证明荣誉应归于有功绩的人,而且仅仅归于有功绩的人,他举例说,他(埃伦伯勒)和哈德威克勋爵能够待在上院,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以自己的功绩为自己进入贵族院开辟了道路。相反,在我们看来,这正好是一个例证,说明借助于别人的功绩,自己

父亲的功绩,不仅可以取得一个终身的职位,而且甚至还可以取得英国立法者的尊号。王座法院¹⁷⁴首席法官老埃伦伯勒和哈德威克勋爵的父亲查理·约克先生^①为自己进入上院开辟道路的功绩,究竟是什么?这段历史是可资借鉴的。已故的埃伦伯勒^②,这个英国律师,后来的法官,在审理皮特和他的继承人执政时期所发生的新闻出版案、阴谋案和警察间谍案的过程中巧于行事,取得了小杰弗里斯的声誉。在他的领导下,特别陪审法庭在英国取得了甚至连路易-菲力浦时代的“正直而自由的法庭”都未曾享有的荣誉。这就是老埃伦伯勒的功绩,这个功绩为他进入上院开辟了道路。

至于说到哈德威克勋爵的先辈查理·约克先生,那么就功绩而言他还超过了老埃伦伯勒。这位查理·约克,当了20年剑桥地区的议员,是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选定“为他们干肮脏勾当”的人物之一。当时每一个“表忠心的”恐怖措施都有他充当平达大唱赞歌。他把每一次反对公开买卖下院席位的请愿都说成是“雅各宾阴谋”。查理·约克把每一个反对在英国已经出现赤贫现象的时候还在实行的无耻的领干薪制度的提案都斥之为图谋破坏“我们神圣的宗教的幸福安宁”。这位查理·约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庆贺自己高升到了上院的呢?瓦尔赫伦岛远征⁶³于1810年在英国引起了同克里木远征在1855年引起的类似的后果。当时波切斯特勋爵在下院提出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查理·约克激烈反对,说这是阴谋,这是要激起人们的不满等诸如此类的话。尽管如此,波切斯特的提案还是被通过了。于是约克决定不让公众了解调查材料,为此,他以一项

① 这里的查·约克先生不是哈德威克勋爵的父亲,而是他的叔叔。——编者注

② 指埃伦伯勒勋爵的父亲,即埃伦伯勒男爵。——编者注

旧的荒谬的议会特权为依据,坚持要把听众和记者从公众席上清除出去。结果是这样做了。这时有一位盖尔·琼斯先生,伦敦一个辩论俱乐部的主席,发表了一则告示,说俱乐部将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查理·约克破坏新闻出版自由和粗暴地谩骂舆论的问题。这样查理·约克就以盖尔·琼斯侮辱一名议员和破坏“议会特权”为名把他传唤到下院,下院不顾英国的一切法律,未经审理,未移交给法官就直接把琼斯送进了新门监狱,“下院想把他在哪里押多久就押多久”。查理·约克在完成这些英雄业绩的时候,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独立的架势,似乎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老实的“乡村贵族”、“国王的朋友”、“忠诚的反雅各宾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但是,约克封闭议会走廊后还不到三周,就传出消息说,其间他向派西沃内阁呈交了自己的账单,并获得了国库检查员(类似“绿蜡保管员”)这个领干薪的终身职位,也就是说,终身每年收入2700英镑。由于接受了这个领干薪的职位,查理·约克必须到他的剑桥选民那里去参加重选。在选举大会上,人们用口哨声和嘘声、烂苹果和臭鸡蛋来欢迎他,于是他只好逃之夭夭。派西沃则抬举他,授予他贵族的称号,作为对他的补偿。查理·约克就是这样摇身一变而成为勋爵,埃伦伯勒勋爵教导帕麦斯顿勋爵说,功绩也应该能够在管理良好的国家财政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除了这一次极其天真的、富有特色的失言之外,埃伦伯勒这个无疑与一副可怜相的骑士^①相类似的人物多半还是使用西蒂区集会的语言。

他的朋友德比竭力减少这种哪怕是纯粹用词上的让步。德比驳斥了他同莱亚德结盟的谣传。他的全部天才在于慎重,所以他抱怨

^① 唐·吉河德。——编者注

莱亚德不慎重。他说,在西蒂区先生们的观点中有很多正确的东西,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太过分(!!)了。一个大臣应该在议会里寻找自己的同伴,不仅要在议会里,而且要在他所加入的党内,不仅要在这个党内,而且要在他的党内那些在议会里有影响的人中寻找。在这些人当中,取舍的标准当然应当是才能,而这一点直到现在常常被忽视。德比认为,错误在于1831年的议会改革¹⁵⁷。“腐败选区”²⁹⁷即“rotten boroughs”被消灭了,但恰恰是这些选区曾经提供了清醒的英国国务活动家。这些选区使有势力的人们能够把有天才但没有资产的年轻人送进议会,并经过议会去担任国家职务。因此,甚至连德比勋爵都认为,不进行议会改革——不过,是相反意义上的议会改革,即恢复“腐败选区”——行政改革²⁸²也是可能的。如果注意到下院有85个席位至今还属于60多个小的“腐败选区”(仅仅在英格兰),其中任何一个选区都没有超过500名居民,有些选区还派出两名议员,那么德比的抱怨似乎就不那么有根据了。

代表内阁发言的潘缪尔勋爵使上院的辩论触及了实质性问题。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们打算利用议会大墙外面的喧嚣,堂而皇之地把我们赶出内阁,让你们自己进入内阁。为什么德比三个月以前在接到女王^①的委托时不组织内阁呢?德比得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是的,三个月以前!但在三个月内情况变了。三个月以前帕麦斯顿勋爵还是一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一个伟大的、不可或缺的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现在大势已去,该轮到我们的了。

上院的辩论表明,在这里任何一方都没有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人的人。至于下院,埃伦伯勒正确地指出,它已经腐朽了,丧失信誉了,

①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不应该在议会内部,而应该到议会外面去找政治影响。

上院的辩论清楚地表明,贵族反对派居心不良,他们既想变个戏法把资产阶级运动化为乌有,同时又想利用它当做反对内阁的攻城槌。在下篇通讯中^①,我们还将有机会证明,西蒂区改革派对待工人阶级也是居心不良,他们打算玩弄工人阶级,就像他们被贵族反对派玩弄一样。人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目前的运动按其性质来说是极其复杂的,正如我们早先已经指出的^②,它本身包含着两个彼此对立和敌对的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5 日或 16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新奥得
报》第 22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375—378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67—369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²⁹⁸

伦敦,5月16日。资产阶级反对派对上院就埃伦伯勒提案²⁹³进行的表决表示愤怒,这是软弱的标志。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当反过来把这个提案的否决当做一种胜利来庆祝。迫使上院这个贵族最高会议在公开而庄严的辩论过程中声明它对迄今进行的战争表示满意,迫使上院大声地承认帕麦斯顿是贵族的先锋和代表,对行政改革和任何一切改革,即使只是良好的愿望也断然加以拒绝——贵族的敌人从埃伦伯勒的提案中还能期待什么更有利的结果呢?他们本来应当首先竭力破坏上院这个英国贵族的最后堡垒的威望。而他们却抱怨上院看不上不是以自己的特权而是以现在的内阁为代价换取来的短暂的威望。如果是托利党⁷³机关报,宣扬“我们无与伦比的宪法”的诸多偏见的报纸《先驱晨报》这样抱怨,那倒是理所当然的。《先驱晨报》聊以自慰地希望,在辉格党⁷⁰寡头政治家充当了一个半世纪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朋友以后,现在角色将有所更迭,在以后一个半世纪内,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贵族”代表这一角色将由托利党人来担任。《先驱晨报》有理由,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来抱怨。可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呢?难道它以为西蒂区的商人举行一次温和的示威就足以迫使贵族自杀和放弃政权吗?然而真实情况是,资产阶级希望妥协,它期待对方作出让步以便自己也能作出让步,它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真正的斗

争。一旦斗争真正开始，“千百万人”，即他们所谓的“下层”阶级就会跟着挤上舞台，他们不仅会作为旁观者或公断人，而且会作为斗争的一方出现在舞台上。而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都想避免这一点。正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辉格党在 1808—1830 年间曾被排除在内阁之外。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赶走自己的对手，只是不能以对资产阶级作真正的让步为代价（而没有资产阶级的援助就不能赶走托利党人），只是不能以进行议会改革为代价。我们已经看到^①，埃伦伯勒和德比是怎样模棱两可地耸着肩膀，带着保留条件，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一种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方式宣布自己是资产阶级行政改革的拥护者，同时又全力抵制他们所谓的同盟者。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西蒂区的商人改革家是怎样胆怯而阴险地首先竭力防止来自宪章派¹⁹²方面的一切反对，并使他们暂时保持沉默，然后便不知不觉地把他们从他们自愿让出的阵地上请出去。西蒂区的商人同托利党人一样，对所谓的同盟者的恐惧和反感超过了对所谓的对手的敌意。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害怕宪章派的反对。读者一定还记得，在圣马丁堂和萨瑟克召开的两次大规模集会上，宪章派打败了“国民和立宪协会”，迫使它退出了它所选定的地盘。^② 4 月 26 日，行政改革协会派詹姆斯·阿克兰先生（过去是反谷物法²⁸⁰的鼓动者）登门拜访厄内斯特·琼斯，他自称是行政改革协会的“使节”，协会指望得到宪章派的支持，因为协会希望废除“阶级立法”和建立人民政府。他邀请厄内斯特·琼斯第二天同这个协会的委员会会晤。琼斯表示，他没有受权代表宪章派作出答复。伦敦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²⁹⁹将在这

① 见本卷第 370—374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35—238、352—355 页。——编者注

个星期天召集会议,在同委员会商量以前,他不得不拒绝会晤。

在4月29日星期天的晚上,琼斯把这一切通报了宪章派委员会,委员会授权他继续进行谈判。第二天早晨,琼斯同西蒂区运动领导人英格拉哈姆·特拉弗斯先生会晤,英格拉哈姆·特拉弗斯先生亲自任命詹姆斯·阿克兰为他那一方的全权代理人和代表。英·特拉弗斯先生向琼斯保证,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人民政府。他说,在《泰晤士报》上登载的决议只是临时的;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待于由伦敦饭店举行的集会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来确定。为了表示对行政改革事业的支持,宪章派应委派一位发言人来代表宪章派出席集会。这个发言人应当应主席的要求支持某一项决议。此外宪章派还应当任命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将在集会上根据西蒂区商人临时委员会的提议被任命为改革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最后,达成了—个协议:由于参加集会必须凭票入场,宪章派将得到应有的那一部分入场券。琼斯不同意这件事仅仅以口头协议为依据,他对英格拉哈姆先生说,他应当将上述各点用书面形式转达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来信作了种种保证。但是送来入场券时却只有12张。宪章派委员会对这种违背诺言的行为提出抗议,对方表示歉意,并说入场券就只剩下这么多,但是,如果宪章派委员会愿意派两个宪章派成员站在饭店门口的话,那么他们将有—权不要票而把他们所希望的人放进去。为此,宪章派选出了斯洛科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他们也得到了特拉弗斯先生的授权。为了消除—切猜疑,行政改革协会在举行集会的当天^①,在开会前几小时,派专人送给琼斯—封信,提醒他说,主席将要求他支持第四项决议,他将在集会上以

^① 1855年5月5日。——编者注

宪章派代表的身份被提名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集会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饭店门前聚集了大批宪章主义者。大门一开,斯洛科姆先生和沃克曼先生却被禁止让任何没有票的人入内。门外的拥挤状况大有严重之势,为了拖延时间,就勉强地分发了八张入场券。拖延时间是为了把在附近街道上待命的一队警察召过来。从这一刻起,除了“著名的商人和银行家”外,谁也不放进去了。身穿工人服即大家所熟悉的绒布短上衣的人,即使有入场券也不让进去。为了欺骗在街上等待的工人群众,大门突然关上了,门上贴出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会场已满。停止入内。”其实这时会场里连一半也没有满,而乘坐马车来的“绅士们”,被允许从窗户和由后门从厨房进去。工人群众没有识破这种背叛行为,他们平静地散去了。在集会上,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拿出了他的“发言证”,但是没有让他上讲台,当然更不用说允许发言了。协会达到了两个目的:阻止宪章派的反对,并且可以声称在街上的群众就是他们的拥护者。然而群众只应当在街上扮演不说话的配角。

厄内斯特·琼斯在告英国工人书^①中揭露了这个阴险骗局的过程,并用宪章派的名义向行政改革协会挑战。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6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新奥得
报》第 22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厄·琼斯《政治上的犯罪。行政改革协会的无耻奸计和欺骗》,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人民报》第 158 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金 融 市 场³⁰⁰

伦敦,5月19日。根据此间报界的一些乐观主义者的看法,英国的工商业危机已经结束了,工商业又在沿着上升线发展。他们得出这种令人快慰的结论的事实根据是,货币市场有了改善。因为,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有了增加,另一方面,银行降低了利率。1855年1月20日黄金储备只有12 162 000英镑,到1855年5月12日,黄金储备已达到16 045 000英镑——增加了3 883 000英镑。1855年1月20日利率是5%,3月31日,银行把它降低到4.5%,4月28日,又降低到4%。然而这些先生没有考虑到,银行地窖里黄金的积累和利率的降低,除了工商业繁荣以外,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恰好相反的原因:工商业停滞和与此相关的对资本需求的减少。英格兰银行每周公布的统计表表明,这一次后者是真正的原因。人们千万不要像上面提到的乐观主义者那样,把眼睛仅仅盯住这些统计表中的黄金储备和利率两栏。人们必须把另外两栏——预备银行券和贴现票据对比一下。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由两个不同部门组成的:即 issuing department(发行部)和 banking department(银行部)。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英格兰银行的造币厂。它的全部业务就是发行银行券。1844

年罗伯特·皮尔颁布的法令³⁰¹在法律上对银行券的发行作了限制。这就是说,在国家应给予英格兰银行的资本1400万英镑之外,该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不得超过保存在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①因而,如果银行比如说发行银行券2000万英镑,那么在它的地窖里就应有600万英镑的黄金。发行部的业务仅限于按照这个规定来印制和发行银行券。银行将其按规定印制的全部银行券转交给银行部,即真正的银行。这种银行和一切其他的储蓄银行和贴现银行一样,与公众发生业务关系,通过票据贴现、给有息证券预支、给国债债权人支付股息、支付银行存款等办法使银行券进入流通。把英格兰银行分成两个互不依赖的部门以及对所发行的银行券的总额进行调节,这是罗伯特·皮尔的一大发明,因为罗伯特·皮尔以为,这样就能防止一切未来的货币危机,纸币的流通就将借助于自动的机械规律而同金属货币的流通协调起来。但是这位备受称赞的国务活动家忽略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事实:他的调节只是调节了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门即发行部和银行部之间的流通,而决不能调节银行部和外界之间的流通。银行发行部把它根据法律所允许印制的那么多银行券(例如2000万,假定在它的保险库里有600万黄金)转交给银行部。但是,在这2000万中究竟有多少数目能真正进入流通,这取决于经济状况,取决于商业界的需求。银行不能使之进入流通因而留在银行部的保险库中的那个余额,则以预备银行券的名义列入银行的账目。

我们既已看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55年1月20日至1855年

① 马克思《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36—346页。——编者注

5月12日增加了3 883 000英镑,那么我们就发现,预备银行券的总数在这个时期从5 463 000增加到9 417 000,即增加3 954 000英镑。预备银行券,即存在银行部保险库中的银行券数量越多,真正在公众中流通的银行券数量就越少。但是从上面举出的数字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银行地窖中黄金积累的同时,在公众中流通的银行券数量减少了。这种流通量缩减的原因何在呢?完全在于流通的缩减和商业交易的减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我们从银行的账目中可以看出,银行贴现的票据价值在1855年1月20日达到25 282 000英镑,到1855年5月12日反而下降到23 007 000英镑,即减少了2 275 000英镑。可是银行贴现的票据价值是银行同商业界成交数字的最可靠的尺度。如果考虑到,银行在4月28日把利率降低到4%,因而它所提供的商品——资本——比过去的1月份便宜20%,那么这个结论就更加令人信服了。同时,从4月28日银行降低利率的时候起,到5月12日,银行为票据贴现而支付的银行券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证明,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资本即使按4%的利率计算,也还是太贵了,它甚至找不到像在1月初按5%的利率计算时还能找到的需求;这证明,利率的降低并不是因为资本供应量增大,而仅仅是因为工商业的需求量减少;最后,这证明,银行地窖里的金属储备的增加只不过是闲置的目前使用不了的资本的增加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5月
19日

载于1855年5月22日《新奥得
报》第23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改革运动³⁰²

伦敦,5月21日。伦敦各家报纸今天刊登了西蒂区改革派^①(或者确切些说是他们的执行委员会)的《告英国人民书》。这个文件写得枯燥无味,官腔十足,完全不像该地定期出版的那些用比较脍炙人口的华丽辞藻向全世界推销咖啡、茶叶、糖、香料以及热带地区的其他产物的商业通报那样有气魄。协会答应提供关于政府各部门的真正的生理学材料,并揭露唐宁街^②——世袭贤人的唐宁街的全部秘密。这就是协会许下的诺言。协会方面要求英国的选民们把按照自己的心愿自由选举的和仅仅由于有功绩而被推荐的候选人派到议会中去,而不要像过去那样,把贵族俱乐部强加给他们的候选人派到议会中去。可见,它承认现存的享有特权的选民集团是正常的,它也承认,由于这些选民集团被收买、它们对某几个俱乐部的依附关系和缺乏独立性才产生出现今的下院,从而也产生出现今的政府。协会不想取消这些特殊团体,更不想扩大这些团体;它只想规劝这些团体。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规劝寡头集团本身而非威胁要取消它的特权呢?使

① 见本卷第352—355页。——编者注

②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唐宁街10号为英国首相官邸。——编者注

寡头集团的头目们回心转意无论如何要比使寡头集团的选民集团回心转意容易一些。西蒂区协会显然想煽起反贵族运动,但这只是在合法的(按照基佐的说法)官方的英国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运动。它想如何让这些选民集团的一潭死水掀起风暴呢?它想如何强迫这些选民集团从促使他们成为某几个上流俱乐部的仆从和执政寡头集团的支柱的那些利益和习惯中解放出来呢?依靠唐宁街的生理学吗?不全然。还要依靠外部压力,即依靠群众集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但是,它打算怎样使非官方的没有选举权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从而影响这些有特权的选民集团呢?办法是:号召人民群众放弃人民宪章¹⁵⁹(在这个宪章中除了要求普选权和在英国真正实现普选权的那些条件以外,实质上没有别的东西),并承认西蒂区改革派自己所说的这些正趋于腐朽的团体的特权。西蒂区协会面前有“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的先例。它知道,这个由休谟、布莱特、科布顿、沃姆斯利和汤普森领导的运动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所谓“小宪章”¹⁶¹用来代替人民宪章,是因为他们只想向人民群众作出让步,只想同人民群众达成妥协。他们作出让步仍未能达到的目的难道协会认为不让步就能达到吗?或者,协会也许从反谷物法运动中得出结论,认为可以发动英国人民参加局部性改革?然而反谷物法运动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非常受人欢迎和非常清楚的。大家知道,与保护关税派的小个面包不同,反谷物法同盟²⁸⁰的象征是大个圆面包。特别是在饥荒的1846年,大个圆面包当然跟“唐宁街的生理学”完全不同,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无需我们多言,大家肯定都知道那本题为《西蒂区的生理学》^①的小册

① 戴·莫·伊文思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编者注

子。小册子确凿地证明,不管这些先生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办得多好,他们在管理社会事业方面,如管理各种保险公司,多多少少忠实地仿效了官方唐宁街的模式。他们在铁路管理方面所采取的严重的欺诈哄骗手段以及完全忽视安全措施的态度劣迹昭彰,以致在报界、议会内和议会外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要不要把铁路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和把铁路从私人资本家手中收回的问题!因此,唐宁街的生理学毫无“用处”,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先生,这个行不通!”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1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新奥得
报》第 23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³⁰³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前些日子所谈的在准备中的克里木野战行动^①想必已经开始。随着野战行动的开始，这场战争，就半岛范围而言，便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发展阶段。皮埃蒙特军¹¹⁰和法军的预备队迅速开到，特别是司令官突然易人，康罗贝尔调任军长，总指挥权被授予佩利西埃，这无疑表明联军改变战术的时候已经到来。

关于转移后的新战场的地形以及将投入战斗的兵力，读者可以从我们以前的一篇文章^①中找到全面的介绍。应当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同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保持联系的俄国监视军的基本阵地，设在从因克尔曼起到巴拉克拉瓦—辛菲罗波尔大路同黑河和别利别克河分水岭的交叉点止这一线的台地上。俄军在这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阵地上到处挖掘了战壕。这个阵地从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延伸到不能通行的山岭为止，长达四英里左右；俄军在这里至少可以集结5万—6万名步兵和炮兵，——这些兵力用来防御是足够的了。

要想从正面攻击这一阵地，必须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和付出极

① 恩格斯《克里木的新攻势》，参看本卷第359—366页。——编者注

大的代价；然而这两点，联军都做不到。即使他们攻占了俄军的工事，其损失之大也将使他们无法认认真真地把仗继续打下去。因此，他们必须将部分俄军从这一阵地上诱开，并设法对该阵地进行迂回。为此向刻赤进行了神秘的远征。³⁰⁴联军约 15 000 人乘船在俄军眼前经过雅尔塔开往刻赤，后来又返回原地。他们为什么没有试图登陆，可能找到的解释就是接到了巴黎的电令。不管怎样，这个勉强算做佯动的行动应当被宣布为彻底的失败。没有哪一个头脑健全的将军，会分兵去进行一次连装装打仗的样子都不敢的远征。向卡法的进攻，即使司令部曾经有此意图，大概也终于放弃了。向叶夫帕托里亚调动部队，以便由该地出击目前也不可能考虑；否则，皮埃蒙特军和法军的预备队就会立即调到那里去了。由于不论在巴拉克拉瓦和卡法之间，还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之间，沿岸都没有别的港口或良好的停泊场，因此从海上迂回俄军的想法显然终于打消了，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从陆上迂回，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行动将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因克尔曼以北在俄军占领下的那条大路外，仅仅还有一条从巴拉克拉瓦通到辛菲罗波尔的大路。它沿南海岸到阿卢什塔，在那里折向半岛腹地，在海拔 2 800 英尺的高度上穿过克里木最高的恰特尔达格山（即帐篷山）以东的山地，然后向下经过克里木最大的河流萨尔吉尔河的河谷通到辛菲罗波尔。从巴拉克拉瓦到阿卢什塔是四天行程，从阿卢什塔到辛菲罗波尔是三天行程，共约 95 英里。但是，由于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部队成几个纵队齐头并进，因此所有的部队必须成一路特别长的纵队沿一条道路行进；这就需要有一个拉得很长的纵队至少行军四五天。在阿卢什塔附近和在山口上原来就有若干个旧工事，而且不用怀疑，山口本身也一定是牢固地设了防的。

本来 7 天可以走完全程,现在也许需要 12 天才刚刚通过恰特尔达格山口——这段时间足以使俄军采取行动:或者向留下的围城部队进攻,或者用大部分兵力去对付迂回的敌人,当敌人走出隘路时以优势兵力迎击,而轻装的机动纵队则可沿卡恰河和阿利马河上游的山径前进,打击敌人的翼侧和后队。但是,联军经过阿卢什塔的侧敌运动的最大缺点,还在于那里根本找不到一个作战基地。由于阿卢什塔的停泊场是暴露的,因此,这个地方即使用做临时基地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甚至在联军还未通过阿卢什塔以前,俄军轻步兵就会沿山径而下,非常有效地切断阿卢什塔与巴拉克拉瓦之间的交通线。

所以,取道阿卢什塔行军的办法大概不可能被采用。这样行军所冒的危险远远超过可能带来的好处。然而还有迂回俄军的另一个方法。既然联军取道阿卢什塔行军时俄军利用山径进行袭击的便利条件远远超过大路提供给联军的全部优越条件,那么联军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利用这些山径呢?不过,这样就意味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就得把野战部队的基本兵力,包括准备用来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部队,直接配置在因克尔曼北边的俄军兵营前,以迫使他们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战壕内。同时,按照从拜达尔谷地和从阿卢普卡(距巴拉克拉瓦 30 英里)附近的南海岸通向别利别克河和卡恰河河谷的山径的数量,把朱阿夫兵¹¹⁷、法国猎兵、轻步兵、英国步兵,甚至非洲猎骑兵以及能调集到的山地炮兵编成若干纵队。经过一夜行程,担任迂回俄军极左翼的部队就可能顺利通过拜达尔谷地,到达南海岸,在这里就再也不会为敌人所察觉了。再经过一天行程,他们便可到达阿卢普卡。阿卢普卡以北矗立着亚伊拉的一连串陡峭的山岭,在山岭的北坡海拔约 2 000 英尺处形成一片台地,是牧羊的好地方,台地的边缘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比尤克-乌津

和乌津-巴什两条小河的河谷,这两条小河汇合成别利别克河。有三条山径通到阿卢普卡附近这块台地上,然后进入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河的河谷。这整个地区对惯于在非洲复杂得多的条件下进行山地作战的朱阿夫兵或法国猎兵这样的步兵来说,是完全可以通行的。其次,从黑河上游河谷(通常叫做拜达尔谷地)至少有两条山径通向别利别克河上游河谷;最后,巴拉克拉瓦-辛菲罗波尔大路在山口前又分出一条山径,在马更些庄园东南三英里处越过山脊,直通俄军筑垒阵地的左翼。不论这些山径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轻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一两匹马就能勉强通过;而最后连野炮也可能拖过去。”^①其实,我们如果发现地图上标示的羊肠小道和山径原来竟是乡村大路,那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些道路,尽管很不好,却完全可用以进行侧敌运动,甚至运动中的纵队还可以有炮兵相随。在这种情况下,应尽量以较多的兵力进行迂回运动,那时,甚至不用认真地从正面进攻,俄军也会很快被迫撤离战壕。如果这些山径是野炮所不能通过的(火箭发射管和山地榴弹炮则到处可以通过),那么迂回部队将改为普通的机动纵队,把俄军向回赶到尽可能远离别利别克河上游河谷的地方去,深入卡恰河河谷,威胁俄军的后方,切断俄军的交通线,消灭俄军的运输队,收集确实的情报,侦察地形,吸引尽可能多的俄军兵力,直到困难最少的一条道路改建得炮队也能够通过时为止。然后,可随这些机动纵队之后派出强大兵力,使俄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迫使俄军放弃他们的工事。我们并不认为,单靠步兵和轻骑兵通过这些山岭向俄

^① 这里是转述拿破仑第一关于山地战的一条原则。——编者注

军左翼和后方前进,便能取得这种结果,因为这些部队要给俄军交通线造成严重威胁就必须先下到这样一个地区,在这里炮兵能重新充分发挥作用,从而给占有该地区的一方带来优势。然而毫无疑问,只要想出一些办法,炮兵便能随迂回纵队一起行动。拿破仑在耶拿会战¹⁶时显示了可以怎样利用一条普通的绕着陡峭山丘盘旋的山径:在五个小时内把它开辟成足以供大炮通行的大路,打击了普鲁士军队的翼侧,从而保证了次日的胜利。克里木的四轮大车能通过的地方,野炮也能通过;我们所谈的一些山径,特别是从黑河通向别利别克河的那些山径,看来都是这种通行四轮大车的旧乡村大路。

但是进行这种机动,首要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兵力。无疑,俄军将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对地形比较熟悉也是他们的有利条件。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如果从叶夫帕托里亚向阿利马河大胆挺进,便可能抵消俄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虽然由于俄军在骑兵方面占优势,奥美尔帕沙不能前进得又快又远,但是他只要巧妙地机动并很好地保障交通线,还是能迫使哥尔查科夫公爵分出更多的步兵来对付他的。然而,联军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次要的行动上,那是非常没有把握的。因此,为了从巴拉克拉瓦向前推进,联军最好是在实际进攻开始前一两天把大约2万名土军调到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据前些时候的报道^①,联军已经这样做了)^②,在那里,一个兵的作用可以抵得上在叶夫帕托里亚的两个兵。这就使联军能够以将近11万人的兵力(包括约6000名骑兵)攻击俄军,而俄军能用来对抗的兵力约为65000—75000名步兵(包括来自北区守备部队中的15000—20000人)和

① 恩格斯《克里木的新攻势》,参看本卷第359—366页。——编者注

② 括号里的话可能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1 万名骑兵。但是,进行迂回的部队一开始威胁俄军的左翼和后方,俄军可能用来对抗他们的兵力就将比较弱,因为从北区调动的部队不能冒同城砦周围营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危险;因此,联军由于能够将全部现有的野战部队用于任何一点而占有了很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疑可以指望获胜;但是,假如他们攻击俄军时没有外援,假如最可靠的权威人士所提供的双方兵力对比合乎实际情况,那么联军取胜的机会就将很少。联军进行迂回的部队的兵力就会太弱,俄军就可以对他们完全置之不理而从自己阵地上大胆出击,把兵力已经减弱的联军赶下悬崖峭壁,让他们落入黑河。

有人认为联军也可能采取另一种打法:立即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甚至有消息说,巴黎已经用电报断然下了一道进行强攻的命令,康罗贝尔辞职就是由于他认为没有理由采取这种打法,在他看来,这种打法要损失 4 万人。从路易-拿破仑在对当前战局的干预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思想来看,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决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更可能的是,就连像佩利西埃这种鲁莽的一介武夫也不肯执行这样的命令。最近一个月的情况肯定已经使法军士兵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强攻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而且一场非损失 4 万人(占所有可用于强攻的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可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也无疑是很小的。佩利西埃也许渴望拾起从康罗贝尔手中滑落的元帅节杖,但我们还是非常怀疑他是否够得上一个敢于拿自己的命运和名誉去冒这样大危险的波拿巴主义者。因为,即使强攻成功了,联军不但夺取了第一道防线,而且夺取了第二道防线,甚至隔断岸防炮台通路的街垒、设防民宅和营房以及这些岸防炮台本身也都被攻占,整个南区落入联军手中,联军的损失姑且只算 3 万人,俄军的损失算 2 万人,那又怎样呢?联军比俄军多损失 1 万人,所夺取的

地方又不得不立即放弃,而野战也会比原来更加困难。

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以一下子排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立即进行总攻的想法。在以前的一篇关于这场包围战的文章^①中,我们根据一些半官方的报告,而且纯粹是从辩论的角度,曾经暂时肯定俄军是被赶出了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新构筑的外围工事。但同时我们又指出,我们有一切理由怀疑这些报道的准确性,因为凡是像这样的胜利,联军都会毫不含糊地大喊大叫加以宣扬。现在我们果然得到来自俄军方面的可靠消息说,堪察加(马梅隆)多面堡、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都还在俄军手中,而来自联军营地的报道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承认被围俄军又构筑了新的外围工事。这样,联军把自己的前沿接近壕推进得离要塞更近所带来的优势,就完全被俄军的反接近壕所抵消,双方力量平衡的对峙线仍离主壕很远。可是在通常的包围战中,只有当进攻者兵力同防御者兵力相等的对峙线正好位于主壕时,才适于进行强攻。否则,很显然,强攻纵队在尚未冲到胸墙上面的时候就会被击溃和消灭。因此,只要联军还不能将俄军赶回到主壕后面,便不能强攻主壕后面的主墙。至于夺取主壕后面的第二道防线,那在目前就更谈不上了。

如果在法军正进行主要作业的地段即从卡兰亭棱堡到弗拉格斯塔夫棱堡这一地段上,对左面即对市区进行局部强攻,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策略,我们对俄军在这里的外围工事的长度和强度一无所知,而最近俄军方面的报告——现在全都是用电报发的——没有任何明确而详尽的说明。不过俄军自己已承认,在弗拉格斯塔夫棱堡那边法军的工事已靠近主墙,并在主墙下面进行

^① 见本卷第344—351页。——编者注

了一次爆破,虽然没有收到什么重大的效果。因此,在这一地段来一次局部强攻可能会成功,但这个棱堡的位置突出在前面,它后面(俄军的雅佐诺夫多面堡)的地形又居高临下,所以攻下这一棱堡能否带来什么好处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这个棱堡的后面,一定会有一两道横墙把它同其余的工事隔开,这就使强攻纵队不能在棱堡里待下来,至少不能再向前推进。

可见,不论联军进行强攻或野战,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不管怎样,联军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城外以来所采取的消极被动的作战方式就要告终,现在可望看到更激动人心的真正具有军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了。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5 月 2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³⁰³

伦敦,5月23日。召回刻赤远征军³⁰⁴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联军的陆海军中所引起的严重不满,在伦敦报刊上得到了反映,虽然这种反映是软弱无力的。人们开始担心,克里木战争这出戏的统一行动和表演过程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俄军,不如说是来自军事天才拿破仑第三这个解围之神^①的横蛮而滑稽的干涉。这位天才在《通报》刊载的那篇著名军事科学教学的“大作”^②中显示出的能耐,事实上一点不让人欣慰和安心。不过到目前为止,战地远离土伊勒里宫,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不受巴黎军事学门外汉的实际干涉。可是海底电报消除了这种距离,同时也消除了这种保证。一向自命为“世界上最有思想的人民”的约翰牛开始思考,发牢骚,并埋怨英国海军和舰队不该充当没有价值的东西,供那个世袭的、天生的“军事天才”做实验。

① 解围之神的原文为: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② 指《东方远征》,载于1855年4月11日《总汇通报》第101号。恩格斯对该文的评论见本卷第295—301页。——编者注

今天的《先驱晨报》十分肯定地说，召回远征军是因为波拿巴的脑袋里又冒出了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可恶想法。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怀疑，土伊勒里宫的军事天才醉心于这种固定观念，但是我们认为，甚至连佩利西埃这样普通的“一介武夫”也不会去执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毁灭性计划。因此我们相信，已经通过了全部人马渡过黑河的决定，人们对派出一支 12 000 人的队伍而造成兵力分散的做法表示忧虑。的确，不应该派出这 12 000 人，相反，应当在军队开拔之前让 15 000—20 000 名土军在叶夫帕托里亚上船去同主力军会合，而只留下防守那个地点所必要的守备部队。正像过去一篇通讯^①中指出的，战局的胜利完全取决于渡过黑河的军队的人数。无论如何，召回刻赤远征军又一次证明了缺乏自信、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拙劣作风，而现在这些都被当做“拿破仑观念”^②了。

同时，为了政变的需要而临时物色的英雄们转瞬间都报废了。这帮英雄中头一个是埃斯皮纳斯，他在不光彩的多布罗加进军³⁰⁵之后，在朱阿夫兵¹¹⁷的逼迫之下仓皇地逃回了巴黎。正是这个埃斯皮纳斯，在受命保卫国民议会大厦的时候，把大厦交给了敌人。³⁰⁶往下数第二名是勒鲁瓦，又名圣阿尔诺，12月2日¹¹²的陆军大臣。随后是福雷，此人在迫害法国东南部的不幸农民时非常勇敢，而对俄国佬却又非常体贴和友善。军队怀疑他曾把法国军事委员会的秘密泄露给俄国人，因此不得不把他从克里木调到非洲去。²²⁷最后一个是由于明显的无能而被降级的康罗贝尔。历史开了个玩笑，让佩利西埃

① 见本卷第 277—280 页。——编者注

② 讽喻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1839 年巴黎版)。——编者注

接替了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英法联军的统帅。关于这位佩利西埃,1841年在议会里,在伦敦军官俱乐部里,在郡的群众集会上,在《泰晤士报》和《笨拙》上,人们反复地说过,永远不会有有一个正派的英国军官能和这个“大怪物”(“that ferocious monster”)共事。而现在英国军队不仅同他共事,还要听从他的指挥,而且是整个英国军队要听从他的指挥!在辉格党⁷⁰人和他们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刚刚被托利党⁷³人推翻之后,帕麦斯顿在蒂弗顿召集了自己的选民³⁰⁷,并向他们证明他有权废除英法联盟而同俄国联合,理由是法国政府、路易-菲力浦竟任用像佩利西埃这样的“恶棍”!应该承认,如果说法国军队为自己的十二月叛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么同复辟的帝国结成联盟对英国来说也不全是“玫瑰花”。

昨天内阁在下院遭到了失败,这种失败只是证明议会不时地为它“在大门外”受鄙视而向大臣们进行报复。有一位怀斯先生提出了一项提案:

“本院认为,必须像1850年选出的官员薪俸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的那样全面检查我们的外交机关。”^①

怀斯先生是帕麦斯顿的朋友。他的提案列在下院的议程里面大概有两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讨论。昨天偶然的事件把这个提案抛给了不满的下院。怀斯发了言,他以帕麦斯顿提出的某些意见为由,以为又可以玩弄老一套花招,撤回自己的提案。然而贝利先生完全不管这种约定,竟支持怀斯所撤回了的提案,并违反怀斯和帕麦斯顿的心愿,使这个提案以112票对57票的多数通过。

^① 约·艾·怀斯《1855年5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61号。——编者注

这次失败丝毫没有使帕麦斯顿这样一个有经验的老策略家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下院为了挽救自己表面上的独立性,有时不得不判处内阁的提案以死刑而给反内阁的提案以生路。相反,迪斯累里的提案³⁰⁸倒像是对大臣席的一次电击。帕麦斯顿本人,这个演议会喜剧的老手,祝贺“这场无与伦比的戏剧的作者和演员”。这不是讽刺。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在他的专业内战胜了他的对手所给予的情不自禁的称赞。在星期一^①的会议上,帕麦斯顿曾非常巧妙地把米尔纳·吉布森、格莱斯顿、赫伯特、布莱特和魏恩勋爵戏弄了一番,看来,似乎可以使关于对外政策的一切辩论推迟到圣灵降临节以后举行,为内阁和下院规定了一定的行动方针而且似乎确保了高贵的子爵本人的好几个星期的独裁。唯一还可能进行辩论的日子是星期四^②,可是这一天已经规定用来讨论莱亚德关于改革的提案²⁸³。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妨碍帕麦斯顿在圣灵降临节期间签订和约,并且就像他不止一次地做过的那样,以自己的一个臭名远扬的条约使复会的下院感到意外。下院方面也可能不会反对这种令人感到意外的安排。背着下院签订的和约,甚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约,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为了面子,下院会事后采取一些抗议行动。但是,当下院和内阁不得不在推迟会议以前发表意见时,内阁就不再能使下院感到意外,而下院也不再能让自己遭到意外了。因此,当迪斯累里站起来提出自己的提案而莱亚德又把自己的那一天让给他的时候,引起了震惊。这样一来,这次如《邮报》所说的“莱亚德和迪斯累里之间的密谋”,就胜过了还没有

① 1855年5月21日。——编者注

② 1855年5月24日。——编者注

结束的维也纳会议²⁷⁴“中断”以来的一切诡计。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3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新奥得
报》第 24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必败无疑的围攻³⁰⁹

仔细研究了上一班轮船带来的那些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报刊,我们就能比较精确地向读者报道截至最新的报道为止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的战况了。^①的确,我们上次考察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②,此后事态几乎毫无进展。围攻者的推进十分缓慢,多半是间歇地而不是有规律地稳步推进。一个比较重大的行动就是对弗拉格斯塔夫棱堡的进攻,5月初,俄军的堡障已被攻陷,所以法军的工事一下子就向前推进了150码。这场战斗打得很成功,主壕几乎已伸手可及,那些护墙反而能用来对付俄军,确保新阵地能抵挡纵射炮火和后方炮火的攻击,在来自前方、侧翼甚至部分来自后方的密集炮火下,竟把它与后方堑壕连起来了,这要归功于从事这项工作的法军工程人员和坑道工兵的英勇无畏和高超技艺。我们以前曾说过,弗拉格斯塔夫棱堡随时都可能被攻占,只要是法军想去攻打它。这一点甚至俄军的不露声色的报道也如实承认了,似乎是让公众对此有所准备;不过,这样一次强攻会不会得不偿失,还是很令人怀疑的。

① 这句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5—392页。——编者注

弗拉格斯塔夫棱堡虽然与主墙相连,但它后方的地形居高临下,它本身的位置向前凸出,不管怎样只能被视为一个外围工事;攻下它,主墙受到的攻击也只局限于这块地方。在弗拉格斯塔夫棱堡稍微偏西的方向有一个多面堡,就在连接该棱堡与中央棱堡(俄军的第三棱堡,弗拉格斯塔夫棱堡是他们的第四棱堡,大凸角堡是他们的第五棱堡,马拉霍夫棱堡是他们的第六棱堡)的那个已报废的幕墙前面,这个多面堡迄今还仍在俄军手中。这在哥尔查科夫5月6日的报告中已说得很清楚了。

有关联军从右侧攻打大凸角堡、马拉霍夫棱堡及其外围工事的战况,我们仍然所知甚少,因为英国各报记者出于军事原因从不提供细节。这些堑壕离俄军的工事很近,这一点可以从再次展开积极的围攻以来英军工程人员所遭受的重大损失看出来。60名军官中有31人伤亡,或者病死,其中大多数是在堑壕中丧命的。一些新的炮台正在架设,很可能在5月底再次开火,这些阵地比上次更靠近俄军,因而对俄军的威胁也大得多。不过,在联军尚未攻占马梅隆高地并加以布防、俄军尚未被逐出萨蓬山之前,对那边的主墙还不会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

俄国人说,塞瓦斯托波尔的城防是高度有效的。在主墙的各个棱堡后面都修建了堑壕或第二道防线,万一敌人攻占其中一个棱堡,就会发现自己与这个城市甚至与主墙的附属部分已被隔开;此外第二道连续的总防线也已修完,这条线贯穿军港区(内港以东),在主墙后面大约150—200码,与主墙平行,就在当地把建筑物密集的内城与一些零星的建筑分隔开来,这些零星建筑往下直通主墙,几乎已被法军的炮火夷平了。最后,以坚硬砂石砌成的内城和船坞这些大型建筑,以及军港区的海军设施,据说尚未受到炮轰的严重损坏,连接

它们的是那些错综复杂的、以砖石砌成的路障街垒，就像形成了许多炮台，各家房屋上都凿有步枪射击孔，也可以用于炮击。这样，第二个萨拉戈萨³¹⁰就准备好了，不过用的是科学的方法，而且还利用了由完美的工程技术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这最后一个堡垒一旦受到联军的进攻，对它的防守无疑也会像保卫萨拉戈萨那样英勇无畏，但是会更加有条不紊，更加得心应手。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会得到什么结果，就不必多说了。

随着温暖潮湿的天气的到来，春季和夏季的流行病又开始蔓延了。联军的兵营中再次出现了霍乱和疟疾，暂时虽不很厉害，但是已足以警告部队将会发生什么了。在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尸体只埋了几英寸深，到处可以闻到大批腐烂尸体散发的臭气。据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描写，有些兵营就位于坟墓中间，在太阳的照射下臭气扑鼻，一旦酷暑真正来临，估计部队的健康就会令人提心吊胆。大家知道，腐烂的尸体在炎热天气会对健康产生可怕的影响。在赫拉克利亚半岛，死尸如此之多，在死者的坟地上又挤着这么多人，其后果必然可怕。此外，坟墓都是浅埋的，尸体上只覆盖几英寸的泥土。消毒剂也供应不足，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掩埋场，那一点点仅可觉察的用量实在无济于事。联军怎能指望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围攻，真是难以想象。令人疑虑的是，在这场日益临近的战局中，是否值得为死守自己的工事而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1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新任法军总司令³⁰⁹

康罗贝尔将军辞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的职务来得并非过早，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军队的士气已经处于一种令人非常不满意和难以捉摸的状态。士兵们经历了一个空前艰险的冬季战局之后，似乎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那是因为时值春回大地，而且他们总是一再地得到许诺说：这场包围战很快就会胜利结束。但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俄军倒确实推进了他们的防线，并在双方争夺的地带修起了多面堡。这一情况激怒了法军士兵。朱阿夫兵¹¹⁷闹事了，因此于2月23日被派到萨蓬山去送死。此后联军的指挥官们又稍有所动——很难称之为行动——但是显然既没有具体的目标，也没有始终如一的明确计划。

法军中的不满情绪又一次得到抑制，这是因为俄军连续地出击和联军开始了第二次炮轰。这次炮轰——肯定是最后一次了——本应最终形成一场宏伟壮观的强攻。炮击虽在继续，但在减弱，再减弱，终于停了下来，没有任何试图强攻的迹象。然后是挖壕作业，缓慢而艰难，起不到维持军队士气的效果。不久他们又对夜间堑壕战厌倦了，在这种战斗中数以百计的人战死而谁也看不出有任何意义。有人再次要求强攻，康罗贝尔不得不再次许下连他自己也知道不可

能兑现的诺言。是佩利西埃在5月1日发动了一次夜袭，才使他免于再次出现闹乱子的局面。据报道，不但这次夜袭出自佩利西埃的计划，而且就在出动部队的那一刻接到了康罗贝尔的撤销命令，佩利西埃是抗命行动的。据说，这件事又使得士兵重新振奋起来。

这时，预备部队和皮埃蒙特军¹¹⁰开到了。赫拉克利亚半岛变得拥挤起来。士兵们认为这些援军的到来使他们什么事都能干成。怎么不做点事情呢？于是决定进军刻赤，并登船出发了。³⁰⁴但在他们尚未到达该城附近海面时，从巴黎来了一道命令要康罗贝尔取消这次远征。拉格伦当然立刻就接受了。这次远征的英国陆、海军指挥官布朗和莱昂斯力劝他们的法国同僚不要服从这个命令，仍去攻打刻赤；劝说无效——远征军只得返航。甚至有人说康罗贝尔匆忙间把命令看错了，那只是附有条件的命令。现在军队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甚至英国人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态度；法国人则几乎要哗变。因此康罗贝尔只好辞去这支他已完全无力控制的军队的总司令职务，没有别的路可走。唯一可能的继任者就是佩利西埃。士兵们厌恶那些在波拿巴体制的快速温室里一步登天的年轻将军。他们一直吵着闹着要求有一位资深的老非洲派当他们的长官，也就是说，他们的长官应该是一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⁶⁴中曾担任重要指挥职务而且功绩卓著的人物。佩利西埃几乎是皇帝^①手下唯一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派他到这里来，显然就是迟早让他成为康罗贝尔的继任者，不论他别的方面条件如何，他得到部队的信任，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而，他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接任总司令职务的。士兵都相信肯定马上就有仗可打，这必然会激起他们的热情，而在这种热情引起的

① 指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新鲜感消退之前,他必须行动,而且还要迅速。强攻是不可能的了,只有进行野战,而进行野战就只能采取我们以前讲过的迂回俄军阵地的方式^①。果然,我们在伦敦《先驱晨报》上发现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得到一位英国军官的支持。他说,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野战要取得成功没有其他方法。

然而实行这个方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法军有那样多的兵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却最多只能运载3万人,而且只能运到离岸不很远的地方。至于英军,只要他们运送一个师,最远不超过黑河边的乔尔贡,就再无运输工具可用了。那么野战怎样打,如果打胜了,怎样把塞瓦斯托波尔北区包围起来,怎样追击退往巴赫奇萨赖的敌军,怎样和奥美尔帕沙会合?当然俄军将会力求在撤退时除一片废墟外什么也不留。车辆、马匹或骆驼,只有在联军彻底击溃敌人之后才能弄得到。看佩利西埃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吧。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
5月2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6月1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1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385—392、398—400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
序幕。——克里木最近
事件的经过³⁰⁹

伦敦,5月24日。当迪斯累里的议案³⁰⁸一有可能在下院朝野两派之间引发一场持久性的大战时,帕麦斯顿就决定敲起警钟。在开会前几小时把内阁的追随者们以及皮尔派⁷¹、曼彻斯特学派³⁷和所谓“独立派”邀请到他的唐宁街官邸来。到了202位议员,其中包括莱亚德先生,他感到自己无力抗拒内阁的诱人的召唤。帕麦斯顿运用了外交手腕,认错,道歉,抚慰和劝说。他含着微笑恭听了布莱特、娄和莱亚德几位先生的训导。他让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去同“激动的”议员们斡旋。自帕麦斯顿在他的官邸中看到不满分子同他的拥护者一起聚集在他周围的时候起,他就明白,他们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有情绪,但都渴望和解。下院会议的结局就这样预先安排好了;剩下的只是在公众面前上演一出议会喜剧。高潮已经过去。喜剧的最后一幕一演完,我们就将对这出喜剧作简短的介绍。^①

① 见本卷第408—412页。——编者注

随着温暖而潮湿的天气的到来,克里木春季和夏季所常见的各种疾病又开始蔓延了。联军的兵营中再次出现了霍乱和疟疾;暂时虽不很厉害,但是足以成为对未来的警告。在赫拉克利亚半岛,尸体只埋了几英寸深,到处可以闻到大批腐烂尸体散发的臭气。同时,围攻部队的精神状态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士兵们经历了一个空前艰险的冬季战局之后,似乎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那是因为时值春回大地,而且他们总是一再地得到许诺说:这场包围战很快就会胜利结束。但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俄军倒确实推进了他们的防线,并在双方争夺的地带修起了多面堡。朱阿夫兵¹¹⁷变得难以指挥了,因此于2月23日被派到萨蓬山去送死。此后联军的指挥官们又稍有所动——很难称之为行动——但是既没有具体的目标,也没有始终如一的确切计划。法军中的不满情绪又一次得到抑制,这是因为俄军连续地出击让他们有事可干,还因为开始了第二次炮轰。这次炮轰本应最终形成一场宏伟壮观的强攻。但结果却一败涂地。然后是挖壕作业,缓慢而艰难,起不到维持军队士气的效果。不久他们又对夜间堑壕战厌倦了,在这种战斗中数以百计的人战死而谁也看不出有任何进展。有人再次要求强攻,康罗贝尔不得不再次许下连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是佩利西埃在5月1日发动了一次夜袭,才使他幸免于再次出现闹乱子的局面。据报道,就在出动部队的那一刻接到了康罗贝尔的撤销命令,佩利西埃是抗命行动的。据说,这件事又使得士兵重新振奋起来。这时,皮埃蒙特预备部队¹¹⁰开到了。赫拉克利亚半岛变得拥挤起来。士兵们认为这些援军的到来使他们马上就有仗可打。当时必须做点什么事情。于是决定进军刻赤,并登船出发了。³⁰⁴但在他们尚未到达该城附近海面时,从巴黎来了一道命令要康罗贝尔取消这次远征。拉

格伦当然立刻就接受了。这次远征的英国陆、海军指挥官布朗和莱昂斯力劝他们的法国同僚不要服从这个命令，仍去攻打刻赤；劝说无效——远征军只得返航。现在军队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甚至英国人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态度；法国人则几乎要哗变。因此康罗贝尔只好辞去这支他已完全无力控制的军队的总司令职务，没有别的路可走。唯一可能的继任者就是佩利西埃。士兵们早已厌恶那些在波拿巴体制的温室里一步登天的年轻将军。他们一直要求有一位老非洲派当他们的长官。佩利西埃得到士兵们的信任，但他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接受最高统帅的职务的。他必须行动，而且还要迅速。既然强攻没有可能，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俄国人进行野战，而且不能采用我们以前谈过的办法，即全军沿着仅有的并且由俄军大力防守的一条道路前进，而应把军队分开，沿着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羊和牧人才走的小山道前进；这样，就可能从翼侧迂回俄军阵地。但这里有个困难。法军拥有的运输工具大约能载运 3 万人，而且只能运到离岸不很远的地方。而英军只要运送一个师，最远不超过黑河边的乔尔贡，就再无交通工具可用了。在这种缺乏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很难设想，野战怎样打，如果打胜了，怎样把北区包围起来，怎样追击退往巴赫奇萨赖的敌军，怎样和奥美尔帕沙会合？况且，俄军照例将会力求在撤退时除一片废墟外什么也不留。车辆、马匹或骆驼，只有在联军彻底击溃敌人之后才能弄得到。看佩利西埃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吧。

以前我们已经指出过同任命佩利西埃有关的一些奇怪的情况^①。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总司令

^① 见本卷第 393—397 页。——编者注

职务的是圣阿尔诺,一个真正的波拿巴主义的将军。他是这样为自己的皇帝^①效劳的:上任不久便死了。在头等波拿巴主义者中间,无论马尼昂或是卡斯泰朗,无论罗盖或是巴拉盖·狄利埃,谁都没有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却任用了康罗贝尔,一个波拿巴主义习气不那么重、资格也不那么老、但具有丰富的非洲经验的人。现在,指挥官又在更换,无论昨日的波拿巴主义者,还是明日的波拿巴主义者都被排除在外。这个职位给了一个普通的非洲将军,他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从军尚武多年并且在军队中颇有名气。沿着这条下行的线,将来不是必然会轮到尚加尔涅、拉莫里谢尔或卡芬雅克即非波拿巴派的人物吗?

“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同样也没有能力签订和约,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几天以前这样指出过。在他看来,整个帝国政权都岌岌可危。复辟帝国的每一个行动直到任命佩利西埃一事,都证明他是正确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 1855 年 5 月 24—25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新奥得报》第 24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 和恢复。——所谓歼灭性战争³¹¹

伦敦,5月26日。帕麦斯顿勋爵前天在下院举行会议前成立了拯救内阁委员会,有关这个委员会的细节已经披露^①,这些细节可以说明议会的机制和为内阁提供100票多数的各个不同派别的态度。帕麦斯顿一开始就威胁说:如果迪斯累里的提案³⁰⁸获得通过,他就辞职。他威胁说,将会出现一个托利党⁷³内阁。所谓激进派议员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享受着这样一种特权:从1830年起³¹²,每当他们开始哗变时,就受到这种最后的可怕威胁。而这种威胁每一次都使他们又变得规规矩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在托利党内阁治下必然要发生的群众运动。从一位激进主义者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的自白中可以看出,这个论断是多么的正确。这位激进主义者本人现在就是一位大臣——虽然只不过是一个王室森林大臣。这个职位完全适合于这个生来就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天赋的人。作为伦敦一个区——萨瑟克的代表,他接到了他的选民们的邀请,要他出席

^① 见本卷第404页。——编者注

上星期三^①举行的萨瑟克群众大会。(请注意:正像至今在各地举行的大多数群众大会一样,在这次群众大会上也通过一项决议称,不先进行议会改革的行政改革²⁸²是一种谎言和欺骗。)莫尔斯沃思没有出席,但是送来了一封信;他这个激进主义者和内阁阁员在信中写道:“如果迪斯累里先生的提案获得通过,那么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所谓“明显”意思是说:如果托利党人进入内阁,改革运动就会认真进行了。但是,以辞职相威胁并不是帕麦斯顿打出的重炮。帕麦斯顿暗示要解散议会,暗示了在三年前才以巨大牺牲在“值得尊敬的议院”中给自己买到席位的许多倒霉的议员们所要遭到的命运。这个论据是令人折服的。现在已经不是他辞职的问题,而是他们辞职的问题了。

帕麦斯顿对一些人用自己辞职相威胁,对另一些人用他们可能被赶出下院相威胁,他给一些人展示和平的前景,给另一些人展示战争的前景。因此,与迪斯累里的提案相比,他获得了100票的多数。尽管如此,新建立起来的联合立刻又解体了,而且正好是在事先排练好的喜剧公开演出的时候解体的。大臣们在辩论过程中被迫发表的声明,抵消了他们在小圈子内所发表的声明。把几个勉勉强强的派别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胶泥不是被飓风,而是被议会之风吹掉了。情况是这样的:罗巴克在昨天的会议上就有关重开维也纳会议的谣传向首相提出了质询。他要求知道,有没有委派英国驻维也纳大使^②参加会议。然而大家知道,自从不走运的外交家罗素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帕麦斯顿就借口不应妨碍“虽然中断了但根本没

① 1855年5月23日。——编者注

② 约·费·威斯特摩兰。——编者注

有结束的维也纳会议”²⁷⁴而拒绝任何有关战争和外交问题的辩论。上星期一^①，米尔纳·吉布森撤回或者推迟了他的提案³¹³，因为，依照高贵的勋爵的声明，“这个会议还是个悬案”。帕麦斯顿就此特别强调指出，英国内阁已经让“我们在一定范围内的盟友”奥地利去寻找举行和平谈判的新的出发点。他说，维也纳会议将继续召开，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罗素离开了维也纳，但是威斯特摩兰还留在那里，此外，各大国的大使还在维也纳商谈，可见，把会议继续开下去的一切因素都存在。

但是，自从星期一即帕麦斯顿开恩向议会透露上述信息的那一天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星期一的帕麦斯顿和星期五的帕麦斯顿之间出现了迪斯累里的提案和对这个提案的一整日^②的辩论，迪斯累里说明了他的提案的理由，他担心内阁在下院休会期间可能会“陷入可耻的和平”，就像在阿伯丁执政期间内阁“陷入”可耻的战争一样。因此，表决的命运就取决于帕麦斯顿对罗巴克质询的答复。帕麦斯顿不便在这个时候呼唤出维也纳会议这个幽灵并对议会声称，在维也纳是作决定，而在圣斯蒂芬大厅³¹⁴是讨论，这里是提建议，而那里是作处理。因为罗素在前一天晚上刚刚抛开奥地利、和约草案和维也纳会议，所以帕麦斯顿尤其不能这样做。于是帕麦斯顿回答罗巴克说：维也纳会议没有恢复，英国大使没有得到唐宁街的特别指示不得出席任何新的会议。这时，米尔纳·吉布森义愤填膺地站起来说，几天以前，勋爵阁下曾经声明，会议只是休会，威斯特摩兰拥有绝对全权参加会议进行谈判。难道他的这个全权被取消了吗？

① 1855年5月21日。——编者注

② 1855年5月24日。——编者注

什么时候被取消的呢？——帕麦斯顿答道：全权是有的！他的全权仍然像以前一样是完整的，但是他没有权利使用它。拥有全权和有权利用它——这是两回事。帕麦斯顿对罗巴克质询的这番答复破坏了内阁同依靠皮尔派⁷¹壮大起来的不惜任何代价的主和派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误会”。迪斯累里前天把罗素架在肢刑架上，拷问他，用烧红的针去刺他，达几个小时之久。迪斯累里一只手指点着这个辉格党阿兹特克人通常用来炫耀辞令的狮子皮，另一只手指点着隐藏在这块狮子皮后面的马来树胶小人。罗素由于多年的议会经验和冒险经历，就像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那样顶住了这些尖锐的言辞，虽然如此，当他的真正的自我被无情地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终究不能保持冷静。他在迪斯累里发言时一副怪相。当格莱斯顿在迪斯累里之后进行他的说教时，罗素在自己的席位上一直焦躁不安。当格莱斯顿的讲话出现停顿时，罗素就站起来，他听到会场上发出笑声，才意识到还没有轮到他发言。最后，格莱斯顿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罗素终于能够畅所欲言了。罗素向下院陈述了他明智地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和季托夫先生隐瞒了的一切东西。他在维也纳会议上主张维护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现在据他看来，俄国是一个毫无顾忌地力图统治全世界的强国，它缔结条约是为了取得进行掠夺性战争的借口，它进行战争是为了签订条约时制造紧张气氛。在罗素看来，不仅英国，而且欧洲都受到了威胁，因此除了歼灭性战争以外别无出路。他还影射了波兰。简单说来，维也纳的外交家突然变成了“街头蛊惑家”（这是他所喜欢的用语之一）。迪斯累里用巧妙的策略诱使他作了这篇情绪激动的发言。

在表决以后，皮尔分子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马上发言。他说，他没有听错吧？罗素向俄国宣布了“新的战争”，一次十字军征讨，一

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场民族的战争。事情十分严重，以致不能结束辩论。他说，人们对内阁的意图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不明确。罗素以为在表决以后他照例可以脱下狮子皮。因此他开门见山，说格雷厄姆把他“误解”了。他只是希望“保障土耳其的安全”。于是迪斯累里高喊道，请你们看吧，你们这些人否决了我的提案，从而宣告了对内阁“讲话模棱两可”的指责是无效的，现在你们见识他的真诚了吧！这位罗素在表决以后背弃了他在表决以前的全部讲演！我祝贺你们的表决！

下院无法反驳这种明显的证据。辩论延期到圣灵降临节以后举行；内阁所取得的胜利转瞬间又成了泡影。这出喜剧本打算只分两幕并以表决而告终。现在又增加了一场尾声，而这场尾声有变得比大型政治历史剧³¹⁵还要严肃的危险。然而议会假期倒使我们有可能更详尽地来分析前面的两幕。辩论在表决以后才变得认真起来，这是议会史册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议会斗争通常都是以表决而告终的，就像爱情小说以结婚而告终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30 日《新奥得
报》第 24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的提案³¹¹

伦敦,5月28日。一份如高雅的格莱斯顿所说的“丰盛的菜单”提供给了下院,让它在迪斯累里提案³⁰⁸和贝林对迪斯累里提案的修正案³¹⁶之间,在威·希思科特爵士对贝林修正案的补充修正案和娄先生对迪斯累里、贝林和威·希思科特爵士的反补充修正案³¹⁷之间进行选择。迪斯累里的提案包括一份对大臣的谴责案和一份给女王的战争奏本,第一个问题谈得明确,第二个问题谈得模棱两可,这两个问题是靠一种只有议会的思维过程才能理解的关系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战争奏本之所以采取软弱的形式,很快就弄清楚了。迪斯累里担心在自己的阵营里引起哗变。一位托利党⁷³人格兰比侯爵发言反对他,另一位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则发言赞成他,但是这两个人都主张和平。贝林的修正案是内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不同意将对内阁的谴责案付诸表决,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迪斯累里提案中的军事部分,使用的仍是迪斯累里的术语,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一句话:下院“遗憾地看到,维也纳会议没有使军事行动停止”。贝林吹了一口气,其中既有冷风又有热风。“遗憾”是对主和派说的,“继续战争”是对主战派说的,内阁对这两派都没有明确的义务——这既是对白票,也是对黑票设下的陷

阱,既是长笛的乐谱,也是长号的乐谱。希思科特的补充修正案用纯粹田园诗般的词句为贝林模棱两可的修正案加了个结尾,它补充了一句话:“下院仍然抱着(“cherishing”是一个让人听着十分舒服的说法)希望,继续沟通将获得成功。”相反,娄的修正案却声明,由于俄国拒绝第三项条款,和平谈判已经告吹,并且以这一点作为给女王呈送战争奏本的理由。可见,内阁的折中修正案中包括两个部分,它们彼此独立而又和平地对立着,而这份修正案则企图对它们加以掩饰和中和。希思科特高喊:继续举行维也纳会议⁴! 娄回答:中止举行维也纳会议! 贝林低声说道:要维也纳会议,也要继续战争! 这部三重唱曲的主题将如何发挥,我们过一个星期就能听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情况。头一个晚上^①发表意见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界要人,即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罗素。第一个人语气尖锐,言辞激烈;第二个人用语圆滑,满嘴诡辩;第三个人老调重弹,虚张声势。

指责迪斯累里由于个人反对罗素而忽略了“事情本身”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俄英战争的秘密不应当在战场上寻找,而应当在唐宁街寻找。罗素是与彼得堡内阁秘密通信¹⁰²时期的外交大臣,罗素是最近维也纳会议期间的特命代表,同时,罗素又是下院的首领;他是活的唐宁街,是唐宁街的被揭开了的秘密。这不是因为他是内阁的灵魂,而是因为他是内阁的喉舌。

迪斯累里谈到,在1854年年底,罗素曾经鼓吹战争并面对整个议会在全场热烈掌声下宣称:

“在没有得到把俄国的势力限制在对欧洲无危险的范围以内,从而确保未

^① 1855年5月24日。——编者注

来的完全安宁的物质保证以前,英国不能放下武器。”^①

而这个人就是批准 1853 年 12 月 5 日维也纳议定书²¹⁸的那个内阁的成员。在这份议定书中,法英全权代表曾经约定,战争不应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物质条件”的削弱或改变。克拉伦登在林德赫斯特提出对这个议定书的质问时,曾以内阁的名义声明:

“保持俄国在欧洲的势力不被削弱,这可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愿望,但不是法国和英国的愿望。”^②

罗素曾经在下院指责尼古拉皇帝的行为是“虚伪的和阴险的”。1854 年 7 月,他贸然宣布要进攻克里木,并声称,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对欧洲是必要的。最后,他推翻了阿伯丁,因为在他看来,阿伯丁实施战争太不得力。狮子皮就谈这么多,现在来谈谈狮子。罗素在 1853 年当过两三个月的外交大臣,当时英国从彼得堡获得“机密信件”。在彼得堡的这些信件中,尼古拉公然要求瓜分土耳其,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方式是,对在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实施所谓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就像涅谢尔罗德在他最近的一份函件中所承认的,是向来都不存在的。罗素做了些什么呢?他给英国驻彼得堡大使^③发去一份函件,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土耳其政府越是同意实行公正立法和公道管理,俄国皇帝就越认为没有必要行使在他看来是十分困难和会带来麻烦的特殊保护,虽然这种保护无疑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且是条约所批准了的。”^④

① 本·迪斯累里《1855 年 5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2063 号。——编者注

② 乔·汉·西摩尔。——编者注

由此可见,罗素一开始就在争执点上作了让步。他声称保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一种义务。这种保护是他从凯纳吉条约⁴⁹引申出来的。而维也纳会议的“第四项条款”是怎么说的呢?那里说的是“对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错误解释乃是目前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爆发前看到罗素是俄国权利(现在连涅谢尔罗德也放弃了这种权利)的辩护士,那么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在维也纳会议上,我们又看到罗素是俄国荣誉的代表者。当3月26日刚开始实质性工作,讨论第三项条款的时候,这位一向反对俄国的罗素竟起来郑重地声明:

“在英国及其盟国看来,最好的和唯一可取的媾和条件,就是那些能同俄国的荣誉和尊严最好地协调起来同时又能保证欧洲的安全等等的条件。”^①

在罗素发表声明以后,俄国全权代表深信同盟国全权代表提出的条件将比俄国自己所能想到的条件更符合俄国的精神,因此,4月17日他们拒绝主动提出有关第三项条款的建议。但是,限制俄国的海军力量难道能“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起来”吗?因此涅谢尔罗德在最近一次通报中牢牢抓住罗素3月26日的让步。他引用了罗素的话。他问罗素,4月19日的建议是否是“最好的和唯一可取的”?在战争开始时,罗素扮演了俄国的庇护者。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他又在布奥尔伯爵宫殿里的会议桌旁扮演了俄国的庇护者。

迪斯累里反对罗素的言论就是这些。然后他认为战场上的失利和国内的不满情绪是内阁的自相矛盾的行动造成的,他说,内阁在克里木的行动旨在战争,而在维也纳的行动旨在和平,从而把战争的外

^① 本·迪斯累里《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编者注

交同外交化的战争结合了起来。他高声喊道：

“我不认为，只要征税和装备远征军就足以进行战争了。你们必须维护人民的精神。如果你们经常给全国造成一种深刻的印象：和平就是目的，大家所争论的整个问题毕竟只有比较小的意义，你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人们确信将要同一个强大的敌人较量，那么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参加的斗争是一场涉及国家的荣誉、生存和强盛的斗争，那么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你们把所得税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你们驱使人们离乡背井去服兵役，如果你们用血淋淋的不幸事件给英国人的心灵蒙上阴影，如果你们做了这一切，那么你们就不应当告诉人民，问题在于俄国在黑海是应当拥有四艘巡航舰还是应当拥有八艘巡航舰……要有效地进行战争，不仅需要维护本国的精神，而且需要维护其他国家的精神。请相信，当你们要求别的国家充当调停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国……帕麦斯顿勋爵保证他不会签订可耻的和约。勋爵阁下给他自己担保，可是谁又能给勋爵阁下担保呢？……你们依靠维也纳会议是不能摆脱你们的困难的。你们利用外交只会增加困难和危险。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要是你们得不到热情奋发的人民和相信你们有决心的盟国的支持，你们永远也不能打赢进攻性战争。我希望下院今晚进行表决，放弃这种错误的双重手段，一种战争和外交兼用的手段；我希望下院公开而明确地声明，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我认为，凡是看过涅谢尔罗德通报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31 日《新奥得
报》第 24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本·迪斯累里《1855 年 5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2063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
提案的辩论^①

伦敦，5月29日。格莱斯顿的雄辩术表现得从来还没有像他在星期四晚上的“演说”^①那样完美无缺和淋漓尽致。文雅流畅，玄奥空洞，甜言蜜语中不乏毒素，软中有硬，对重大或细微的差别作繁琐的分析，既讲大问题，也讲小问题，或然主义³¹⁸及其诡辩良心和没有良心的保留、其不容置疑的理由和有理由的怀疑通通派上用场，用谦卑来表现优越，用道德来掩盖阴谋，用复杂难懂的句子来表达浅显易懂的道理，既谈拜占庭，又谈利物浦。格莱斯顿的演说与其说是围绕着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倒不如说是专门检讨不久以前还是主战内阁阁员的格莱斯顿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的主和派³¹⁹。他作了分析，他从各方面研究了自己的良心界限，并以他特有的谦虚态度要求不列颠帝国在格莱斯顿的良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他的演说带有外交心理学的色彩，如果说这种色彩把良心带进了外交，那么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把外交带进了良心。

① 威·格莱斯顿《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编者注

对俄战争最初是正义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再继续打下去，那就是罪恶的了。自从东方的动乱局面出现以来，我们一步一步地提高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往上提高我们的条件，而俄国却从决不退让的顶峰往下滑动。最初，俄国不仅要求获得对信奉希腊正教的土耳其基督徒的宗教保护权，而且还要求获得对他们的世俗保护权，它不愿意放弃任何旧条约，甚至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愿意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俄国拒绝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任何大国会议，而把土耳其大使叫到圣彼得堡，或者俄国大本营。俄国在 1854 年 2 月 2 日还持这样的言论。⁴西方列强当时的要求与四项条款³有多么大的距离！就是在 1854 年 8 月 26 日，俄国还声明，它决不会同意接受这四条款，除非是经过一场长期的、殊死的、不幸的战斗之后。³²⁰俄国 1854 年 8 月的这个言论与它在 1854 年 12 月许诺“无保留地”接受四项条款的言论³²¹又有多么大的距离！这四条款是我们所能提出的要求和俄国所能作出的让步的汇合点。所有超出这四条款范围以外的东西，都超出了基督教道德的范围。就算这样吧！俄国接受了第一项；它接受了第二项；它没有拒绝第四项，因为第四项没有讨论。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第三项，也就是说，只剩下四分之一，而且还不是整个第三项，而只是第三项的一半，也就是说，只剩下八分之一有分歧。这个第三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第二是削减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力量。对于第一部分，俄国或多或少表示了同意，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项的第二部分。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也表示不反对限制它在海上的优势，它所反对的只是我们实行这种限制的方法。西方列强只提出了一个方法。俄国提出的不是一个，而是另外两个方法；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俄国也走在西方列强的前面。至于西方列强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损于俄罗斯帝

国的尊严的。但是，不减弱帝国的力量，就不会损害帝国的尊严。另一方面，不能减弱帝国的力量，因为这样做就将损害它的尊严。对于“方法”有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是八分之一的分歧，考虑到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就可以视为是三十二分之一的分歧，难道应该为这点分歧再牺牲 50 万人的生命吗？恰恰相反，应该声明，我们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目的。既然这样，难道我们应该仅仅为了威信，为了军事荣誉而继续战争吗？我们的士兵已经使自己获得了荣誉。如果说，尽管如此，英国在大陆上已经丢了面子，那么，这位值得尊敬的绅士叫喊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不要因为丢掉了面子而用人类的鲜血去报复，你们应该向国外发出比较正确的信息来挽回面子。”^①

的确，为什么不去“纠正”国外的报纸呢？如果联军取得进一步胜利，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这种胜利会迫使俄国更顽强地反抗。如果联军失败了呢？这种失败会把伦敦人和巴黎人煽动起来，迫使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进攻。这样，为战争而战争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最初，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对俄国的要求是一致的。现在普鲁士已经退到一旁了。如果还坚持下去的话，奥地利也会退到一边去。同英国站在一起的就只剩下法国了。

如果英国根据那些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意的理由而继续战争的话，那么“它的立场的道德威信就会大大减弱和受损”。反之，如果英国同俄国缔结和约，即使这个和约有损英国得自这个世界的威信，也会增强它的“道德威信”，而这种威信是不会被虫子咬，

① 威·格莱斯顿《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编者注

不会锈坏的。^① 此外，那些不同意用俄国的方法来实行第三项条款的第二部分的人究竟要干什么呢？难道是要肢解俄罗斯帝国吗？不引发“民族战争”，这一点是不可能达到的。奥地利是否愿意而法国是否可能支持这种民族战争呢？如果英国想进行“民族战争”，那么它只能单独进行这场战争，这意味着，“它根本不会进行这场战争”。因此，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不提出俄国不同意的那些要求。

如果不按字面而按精神实质来看，格莱斯顿的演说就是这样。俄国已经改换了自己的语言；这证明它实际上已经作了让步。在这位可尊敬的皮由兹分子⁷⁷看来，语言是唯一的实际问题。他也改换自己的语言了。现在他诉说起战争的悲哀；他感受到人类的全部苦难。当他极力谴责调查委员会⁷²的时候，他曾作辩护性的发言，并认为让英国军队遭受饥饿和鼠疫的重重苦难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当时军队是为和平而作出牺牲的。自从军队为战争作出牺牲的时候起，罪恶就开始了。然而，格莱斯顿成功地证明，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同俄国作战；他成功地证明，无论现在的英国政府还是现在的法国政府都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同俄国认真作战；他成功地证明，战争的借口是一文不值的。格莱斯顿只是忘记了，这些“借口”原是他和他以前的同僚捏造出来的，英国人民迫使他们进行了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指挥这场战争只是为了拖垮这场战争和保持自己职位的一个借口。而从他们进行战争的虚假借口的产生和演变中，格莱斯顿又成功地得出结论说：他们在同样虚假的借口下也可以缔结和约。他同他的老同僚只是在一点上有所不同。他是在野的，而他们是执政的。但是，适用于前任大臣的虚假借口，并不是适用于现任大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0节。——编者注

臣的虚假借口，尽管母鹅肉的调味汁也就是公鹅肉的调味汁。

格莱斯顿的这种极度的概念混淆给了罗素以期待已久的信号。他站立了起来，在格莱斯顿替俄国辩白的地方给俄国抹黑。然而格莱斯顿是“在野的”，而罗素是“执政的”。罗素声嘶力竭地重复了一切众所周知的、庸俗的关于俄国征服世界计划的真正的老生常谈，然后他就转入了本题，即罗素的本题。他说，从来没有人像迪斯累里那样，把一个如此重大的民族问题贬低到如此彻底的程度。的确，除了把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和小个子约翰，即约翰·罗素等同起来，难道还能更彻底地贬低这个问题吗？不过，事实上，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开始和结束时，欧洲反对俄国是以罗素反对涅谢尔罗德的形式出现的，这并不是迪斯累里的罪过。当这个小个子谈到四项条款的时候，他奇怪地转起了圈子。一方面他不得不指出，他的媾和条件是与与刚才所描绘的俄国的可怕情况相符合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指出，他信守他自愿地、主动地向季托夫和哥尔查科夫许下的诺言，提出了“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起来”的条件。因此，他一方面证明，俄国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海军强国，因而很可能会同意对这种仅仅是想象中的力量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证明，俄国自己沉没的军舰是对土耳其因而也是对欧洲均势的一个可怕的威胁，因此“第三项条款的第二部分”构成一个意义重大的完整东西。有些人是被他们的对手赶到进退两难的绝境。而罗素是自己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他提供了说明他的外交天才的新证据。他说，不能指望奥地利会主动结盟，因为打一个败仗就会使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他就是这样来鼓励这个同盟者的。他继续说道：

“我们感觉到俄国有占有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打算，因为土耳其显然走上了衰落的道路；我也不怀疑，俄国在这个国家崩溃时的打算与英国

和法国相同。”^①

他还嫌不够，还补充说：“但是俄国想错了；不是英国和法国，而是英国应当独家占有君士坦丁堡。”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就这样鼓动奥地利站在英国一边，他就这样向土耳其泄露了土耳其的拯救者和朋友所持的，而且是“明显”持有的观点。不过，罗素作为议会的策略家已经有了进步。1854年7月他曾大放厥词，要夺取克里木，当时迪斯累里把他弄得不知所措，他不得不在议院投票表决以前吞食下他的豪言壮语。这一次他把这种自食其言的过程（取消他所宣布的全世界反对俄国的斗争）推迟到议院举行投票表决以后。这真是一大进步！

罗素的演说中还举了两个历史实例来说明问题：他对同尼古拉皇帝就凯纳吉条约⁴⁹所进行的谈判作了非常滑稽的描述，并对德国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这两件事都值得简略地提一提。读者一定还记得，罗素依据凯纳吉条约，从一开始就承认了俄国的保护权。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是一个比较难对付和比较多疑的人。他向俄国政府作了试探，而罗素天真到这般地步，竟把这件事的经过情形说成这样：

“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曾请求现已作古的俄国皇帝^②，把条约中可以作为他提出要求的根据的那部分条文给他看，皇帝陛下说：‘我不能给您看条约中可以作为我提出（保护权）要求的根据的那部分专门条文。请您去找涅谢尔罗德伯爵吧，他会给您看的。’因此，汉密尔顿·西摩尔向涅谢尔罗德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涅谢尔罗德伯爵回答说，他不熟悉条约的条文，而介绍汉密尔顿·西

^① 约·罗素《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摩尔去找布伦诺夫男爵，或者让汉密尔顿·西摩尔的政府去找布伦诺夫男爵；他说，这位男爵会告诉他们俄皇提出的要求根据的是条约的哪一部分条文。我想，布伦诺夫男爵任何时候都不打算出示条约中的这部分条文。”^①

关于德国，这位高贵的勋爵这样讲道：

“俄国通过婚姻关系同德国许多小君主保持联系。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些君主中的许多人在实行统治时都对他们所预见的臣民的革命情绪感到极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指望他们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然而这些武装力量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军官受到了俄国宫廷的腐蚀和败坏。俄国的宫廷给他们分发勋章、奖章和奖金，在某些情况下，俄国还定期发给他们津贴以支付他们的债务，结果，本来应当是独立国家的德国，本来应当站在保卫欧洲反对俄国统治的前列的德国，多年来由于俄国的阴谋和俄国的金钱已被削弱，已丧失了自己的独立。”^①

于是，为了使德国像火柱^②一样立在前面，为了唤起它服从“绝对命令”³²²，履行义务，罗素在维也纳会议⁴上宣布自己是“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捍卫者，并让德国倾听这位自由独立的英国人的傲慢语言。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1 日《新奥得
报》第 24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约·罗素《1855 年 5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2063 号。——编者注

②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 13 章第 21—22 节。——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³²³

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消息全是关于联军在克里木的大捷。^① 英国各报一片欢呼。对目前这场战争能否打赢早已沮丧失望的英国公众，又突然兴高采烈，信心倍增。他们想象：克里木已被征服，塞瓦斯托波尔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俄军无条件地求和，战争终于胜利而光荣地结束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期望是多么不符合事实真相。

促使西欧公众情绪转变的首要事件是联军的海军和陆军占领了刻赤和亚速海。³⁰⁴ 这件事是在俄军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刻赤，在阿拉巴特，既没有显眼的防御工事，也没有其他抵御进攻的设施。的确，根据最近的报道，令人费解的是，俄军怎么会竟然没有想到在这些重要的地方布防，而让它们这样的毫无遮蔽。这次失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严重打击。随着失败，他们大量的补给和物资以及在亚速海上的船只不仅会被毁坏，被缴获，而且他们主要赖以运送补给的渠道也将被切断。今后，除了克里木本地提供的物资，他们要想取得这些东西就不得不绕道偏远的彼列科普，或者走横贯锡瓦什浅滩^②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改动过。——编者注

② 亚速海最西边的部分，但它同亚速海的联系被阿拉巴特狭长沙嘴切断。——编者注

的那条路线。当然,这很不方便,但是,是否能很快使俄军忍饥挨饿,或者迫使他们投降,这还不能肯定。

英国报纸宣称,这场战争很值得赞颂。战争值得赞颂通常是指克服对方的顽强抵抗,不顾艰难险阻仍达到了目的。但是,自从这场克里木战争开始以来,以前的许多观念已被置于脑后,许多新的观念却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其中有:率领2万人的部队去攻打一个既没有人防守也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而且还居然把它占领,这也值得引以为荣。相反,我们认为,对亚速海上这一丰功伟绩的自我庆贺未能在几个月前实现,这应当是一件值得引以为耻的事情。为什么俄军能安然地占据这个海峡直到今天呢?为什么以前从不设法制止他们利用这片海域运送兵员与补给呢?为什么不调派一部分联军舰队去切断交通联系,清除海上每一艘俄国船只,封锁每一个港口呢?这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说明这场战争联军打得非常愚蠢,这样一件显然有利、轻而易举的事,凭他们拥有的众多船只,本来完全可以做到,在此以前却从未去做。当然,以前他们不可能抽调2万名士兵去驻守刻赤和阿拉巴特,但是也不必派兵去驻守,几艘军舰和炮船就能切断俄军的交通线,其效果同派兵驻守完全一样。很难说联军现在就能从目前正要开始野战的军中抽调出乔治·布朗爵士所率领的那个师。联军的兵力还远远没有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能精明地把兵力分散到这个半岛的各个偏远的地点去。

第二个巨大胜利是占领了一个屯兵场,俄军把它部署在大凸角堡和马拉霍夫棱堡的前面,就在自己的防线与法军之间,目的在于集结兵力进行重大突击。这个屯兵场我们以前未听说过,只能猜测它是新建的,完全是用于进攻的。换句话说,防御者没有被进攻者打得越来越弱,也没有一味防守,仍然有能力扩建用来对进攻者进行主动

袭击和破坏的工事。5月22日夜,约15 000名法军对这个屯兵场发动了猛烈进攻。据佩利西埃汇报,法军已部分地攻克屯兵场。哥尔查科夫说,俄军守住了屯兵场,但是已损失了2 500人。第二天夜里,战斗再次打响,俄军被赶走,整个屯兵场被占领。然而,这似乎是一次消极的胜利,因为这次胜利只是夺取了俄军用来进行破坏的工事,对于削弱这个城市的防守毫无作用。联军的战壕既没有因此而向前推进一码,也没有能让人至少有理由指望看到那种一再吹嘘却从未实现的强攻。

第三个新的、辉煌的行动是35 000名法军士兵^①调往黑河前线。就此而言,我们也算是听到了某种豪言壮语,令人感到胜利在望。其实,这不过是如今必须开始的野战的第一步。这股兵力可能要调去应付俄国军队,同时,联军的另一个师将经由阿卢普卡,攀越山路,去迂回目前控制着通往辛菲罗波尔的大道的俄军筑壕阵地。俄军当然会撤离黑河。他们必须为将在他们堑壕的后方打响的战斗养精蓄锐,据一份奥地利电讯说,联军准备以10万之众来进攻他们——要是我们亲眼见到,也会相信的。^②在黑河上打一仗对他们来说是很愚蠢的,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兵力像所说的那样薄弱的话。不过我们不太相信这种看法,在承认其正确性之前,我们要等待事实来证明伦敦《泰晤士报》是不是说对了,它那样乐观,竟轻蔑地说联军今后只会遇到微弱的抵抗。我们仍要看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所造成的灾难会不会因一次漂亮而轻松的奇袭而告终,从而让西方列强立即成为

① 这里法军士兵的人数可能是马克思补充的,但也有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根据当时报刊的报道加上去的。——编者注

② 有关奥地利电讯的这句话应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克里木的主人。无论如何,我们正在盼望这方面有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将来肯定也会采取积极的行动。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5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6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³¹¹

伦敦,6月1日。如果说格莱斯顿用表面上的深奥迷惑人,那么帕麦斯顿就是用表面上的肤浅迷惑人。他能够巧妙地用胡乱堆砌的动人词句和对当前的舆论作空洞的让步来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他在内阁的讲话一周前就为公众所知道了。日报和周刊就此进行了讨论、研究、评论。他的对手们说,他在过去许多个月内说的都是老阿伯丁的语言,而现在他又认为在一个晚上用老帕麦斯顿的语言讲话是适当的了。他们说:勋爵阁下为自己担保,可是谁又为勋爵阁下担保呢?他们把他的讲话叫做巧妙的把戏,因为他能够避免对他的政策作任何明确的声明,并能够讲出一些不着边际和令人难以捉摸的话,让人抓不住他。相反,他的朋友们却毫不迟疑地把他在演奏他的修辞风琴时利用的风宣布为音乐。他一开始就正确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议院和国家面前所应处的地位。他问,我面对的是些什么人呢?

“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我们进行战争不够坚决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企图促使国家接受可耻的媾和条件的人;一方面是那些责备我们同奥地利进行使战争打不下去的无益谈判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认为我们在这种谈判中做得还不够并且用过分的要求破坏了谈判的人。”^①

^① 亨·帕麦斯顿《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编者注

于是,他自己就采取了和事佬的立场。他把主战派的攻击转给主和派,而把主和派的攻击转给主战派。另外,他反对绝对主和派的行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表现他早就有意表现的爱国热情,表现他高调保证要拿出的干劲,卖弄他经常用来愚弄“傻瓜”的所有豪迈词句。他列举了英国所拥有的大量资源,来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这就是他对指责他没有能力管理大量资源的唯一答复。迪斯累里说:

“勋爵阁下使他想起了一个暴发户,他想用自己的财富来讨好情人,他说:我在乡间有别墅,在城里有房子,我还有绘画陈列馆,我有漂亮的酒窖。”^①

英国也是这样:有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每年 8 000 万英镑的国家收入等等。然而,帕麦斯顿成功地在他的讲话通篇所使用的空洞无物的美妙言辞的掩盖下,顺便发表了一项明确的声明,他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回到这个声明上来并把它宣布为经过议院批准的他的政策的准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没有强调过这个声明,但帕麦斯顿演说的高妙之处历来正是在于把他讲话的真正意思掩饰起来,用滔滔不绝的庸俗平淡的词句把这种意思从听众的记忆中洗刷掉。因为帕麦斯顿不像罗素一类人那样仅仅追求眼前的成功,因为他还考虑到将来,所以他不仅仅满足于在演说中说当前必须说的话,而是用心地为他以后的行动奠定基础。上面指出的声明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参加了黑海上的大规模行动,我们相信而且希望,我们将是胜利者,我们相信,胜利将使我们得到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目前的冲突状况下认为自

① 本·迪斯累里《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编者注

己有权要求的那些条件。”^①

可见,不论怎样扩大黑海上的行动,战争的外交基础依旧。不论在军事上取得怎样的胜利,最终的成果已事先确定,就局限于所谓的“四项条款”³。这一点是帕麦斯顿在莱亚德几小时以前扯下四项条款的亲俄面具以后声明的。但是帕麦斯顿转移了大家对莱亚德批评的注意。他反驳格莱斯顿,为第三项条款的第二部分^②辩护,并把这一部分称为是完整的,以此来回避讨论实质性问题——战争所公开声称的目的和目标的意义。

有一桩打断了帕麦斯顿讲话的事件是值得提一提的。一位英格兰伪君子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让帕麦斯顿忏悔,因为他在谈到军事上的胜利和讨论战争的胜机时,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厚意和恩惠,甚至“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因而他呼唤天神惩罚自己的国家。帕麦斯顿于是立刻作忏悔,他捶打着自己的胸口证明,在需要时他也可以传道说教,而且对天祈祷起来不会比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差。然而这次议会事件之后在民众中也发生了一件事。马里勒本(伦敦的一个区)的公民在考彼尔街的教育会馆召开了一个大会,抗议“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因为这里涉及选民,所以埃布林顿勋爵和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作为该法案的拥护者出席了大会;这个法案就是他们自己向议会提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去依靠上帝的庇护和恩惠,而是预先在会场的各处布置了十来个领取报酬的捧场者和捣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用的走狗立即被公民们抓住并

^① 亨·帕麦斯顿《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2页。——编者注

被赶到街上。“高贵的勋爵们”无法对抗此时会场上发出的嘘声、喝倒彩声和口哨声，只好狼狈不堪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们刚一离开会场，就有一伙“没有领取报酬的”人跟在他们的马车后面，毫无掩饰地表达尖刻的嘲讽和心中的怨恨。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4 日《新奥得
报》第 25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³²⁴

伦敦,6月5日。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在巴斯取得了胜利。它的候选人泰特先生击败托利党⁷³候选人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议员。今天自由派的报纸把这种在“合法的”国家的领域内所取得的胜利当做一件大事来庆祝。关于“选举”的公报是以一点都不亚于关于在亚速海的不流血胜利的公报的浮夸口气发表的。巴斯和刻赤!——这就是当前的口号。但是,各种报刊,无论是主张改革的报纸还是反对改革的报纸,无论是内阁的报纸还是反对派的报纸,无论是托利党的报纸还是辉格党⁷⁰以及激进派的报纸,都避而不谈行政改革协会最近几天在伦敦、伯明翰和伍斯特所经受的失败和失望。当然,这一次的斗争并不是在特权选民集团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斗争的结果也难以引起西蒂区改革派^①的对手方面的胜利欢呼。

改革协会在伦敦组织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大会(就是说,是不收入场券的群众大会)是上星期三^②在马里勒本举行的。一位宪章派针对西蒂区改革派所提出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案:

① 见本卷第352—355页。——编者注

② 1855年5月30日。——编者注

“西蒂区先生们所代表的金钱贵族也像土地贵族一样坏，在改革的幌子下，他们只是力图踩着人民的肩膀往唐宁街爬，以便在那里同寡头政治家分享职位、薪俸和荣誉；而宪章及其五点要求则是人民运动的唯一纲领。”^①

大会的主席，西蒂区的一个教会执事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第一，他究竟应否把这个修正案付诸表决；第二，先表决什么，决议案还是修正案；最后，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表决。听众对他犹豫不决的态度、策略上的种种考虑和不受欢迎的圆滑手段感到厌烦，宣布他不能继续主持大会，而让厄内斯特·琼斯来代替他做主席；后来进行了表决，绝大多数人反对决议案，而赞成修正案。

在伯明翰，西蒂区协会在市长的主持下在市政厅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针对协会的决议案也提出了和伦敦类似的修正案。但是市长断然拒绝把修正案付诸表决，除非把“宪章”这个词换成另一个不那么刺眼的词。不然他就不当主席了。因此“宪章”这个词就改为“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修正案在措辞上作了这样的修改后以10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在伍斯特，西蒂区改革派也举行了群众大会，宪章派¹⁹²的胜利和行政改革派的失败更为彻底。在这里“宪章”没费周折就宣布了。

由于在伦敦、伯明翰和伍斯特举行的这几次大会非常失败，行政改革派不再公开诉诸民意，而是在一切人口众多的较大城市里散发请愿书，征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签名。西蒂区的名流同联合王国商界大亨之间的多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些大亨对他们的伙计、商行职员和“较小的”商业同行的影响，无疑会使他们有可能悄悄地在暗地里给这些请愿书填满签名，然后再贴上英国人民的呼声这样的标签。

^① 1855年6月2日《人民报》第161期。——编者注

送呈“尊敬的议院”。但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用这些靠乞求、诡计和欺骗收集来的签名就可以吓倒政府。政府已经幸灾乐祸地看到，行政改革派是怎样在口哨声中被赶出公众舞台的。政府机关报暂时保持沉默，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不那样做就不得不提到宪章派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政阶级已经怀有一种想法：如果人民运动咄咄逼人，它就要出面领导“行政改革派”。这些报刊为自己保留着一种“误会”以防产生这样的危险，这种误会就是，有朝一日把行政改革派看成是人民的代言人。这类误会是英国的“历史”发展的最奥妙之处，谁也不像持自由思想的辉格党人那样善于利用这类误会。

宪章是一个十分简洁的文件，其内容除了要求普选权外，只提出下列五点，亦即实现普选权的五项条件：(1)无记名投票(Kugelung)；(2)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3)支付议员薪金；(4)议会每年改选一次；(5)各选区一律平等。1848年法国的实验败坏了普选权的声誉³²⁵，从此以后，大陆人就很容易倾向于低估英国宪章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们没有看到，在法国社会中农民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市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可是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因此，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反，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乡情况相反一样。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法国和英国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普选权是政治意识形态家的要求，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可以依照其信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事。而在这里，普选权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的分水岭。在那里，普选权是政治问题；而在这里，普选权是社会问题。在英国，在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就已经有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法国，普选权先实行，然后才

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失败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遭到失败的则是普选权的意识形态。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卡特赖特少校和科贝特所鼓吹的普选权还带有完全不确定的理想主义性质;这种性质使普选权成为一切不直接属于执政阶级的居民的善良愿望。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选权实际上只是它通过 1831 年议会改革¹⁵⁷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异的一般化的表现。而在 1838 年以后,普选权的要求在英国就不具有它的现实的特殊的性质了。证据是:休谟和奥康奈尔在宪章上签了名。1842 年,最后的幻想消失了。当时拉维特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企图把普选权表述为所谓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³²⁶,但是徒劳无益。从这时起,对普选权的意义就不存在任何怀疑了。对它的名称也没有疑问了。它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政治权力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1848 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结的口号,而在英国因此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在那里,普选权是革命的直接内容;而在这里,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内容。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么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对抗——工业进步所产生的对抗——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它的理想主义性质。

除了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政党,以及除了宪章派外,在英国还会看到一个“贤人”集团。它对政府和统治阶级以及对宪章派都是不满的。他们高喊道:宪章派想干什么呢?他们想把议会的权力提升为人民的权力,以此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无上权力。他们并不要废除议会制,他们是要把议会制升级。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废除代议制!领导这个集团的是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贤人——戴维·乌尔卡尔特。他想恢复英国的 Common Law(普通法),他想使 Statute Law(成文

法)退回它的范围以内,他想用地方化来代替集中化,他想从废墟中重新挖掘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老的和真正的法律源泉”。让这些泉水自然而然地涌出来灌溉和滋养周围的土地。可见,戴维至少是彻底的。他还打算把现代的分工和资本的积聚都恢复到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水平,最好是恢复到东方的水平。他原籍是苏格兰高地人,出于自由选择,当了切尔克斯人和土耳其人的义子,他能够指责而且有时甚至评判文明及其各种弊病。但是他并不像一些幻想家那样庸俗,把现代国家形式同现代社会分离开来,他并不幻想有与资本积聚同时存在的地方独立性和与反个人化的分工同时存在的个人特殊性。戴维是一位目光注视着过去的预言家,像古玩家那样迷恋古老的英国。因此,现代英国从他身旁通过而把他留在原地,他应当不会介意,尽管他也会肯定地和坚决地叫喊:“戴维·乌尔卡尔特是唯一能够拯救你们的人!”几天前他在斯塔福德群众大会上还这样叫喊过。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5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8 日《新奥得
报》第 26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³²⁷

伦敦,6月6日。帕麦斯顿又施展了他利用议会把持外交,又利用外交把持议会的惯用伎俩。内阁的政策应当在贝林、希思科特和娄的修正案^①的基础上来讨论。所有这些修正案都是以维也纳会议⁴为基础的。圣灵降临节的一周里,帕麦斯顿借口议会辩论已经结束而在奥地利面前把维也纳会议回避过去了,他在复会的议会^②面前又借口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他说维也纳会议还在举行只是一种传说)而把议会辩论回避过去了。维也纳会议不存在了,以维也纳会议为前提条件的修正案也就没有意义了;修正案没有意义了,关于内阁政策的辩论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个辩论没有意义了,内阁也就没有必要说明“新”战争的趋势、目标和目的了。正如戴维·乌尔卡尔特(又叫戴维老爷)所断言的,这个目的仅仅在于使联军在领教了克里木的冬季疾病后,再尝一尝克里木夏季疾病的滋味。如果说乌尔卡尔特并不了解一切,那么他对自己的帕麦斯顿却是了解的。他的错误只在于他不相信秘密的计谋能够左右公开的历史。总之,帕麦

① 见本卷第413—414页。——编者注

② 议会于1855年6月4日复会。——编者注

斯顿向复会的议会声明,再也没有讨论的对象了,下院所能做的莫过于向女王送呈一份战争奏本,换句话说,就是给内阁投信任票。由于那些背熟了关于修正案的长篇发言并希望贩卖自己货色的议员们的顽固态度,他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维也纳会议解散以后,这些发言也就无的放矢了,而害怕空虚、寂寞无聊将迫使议会通过他的奏本。为了从这些发言中解脱出来,议会将抓住这个奏本。

娄的修正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了它的含义。原先它意味着中断维也纳会议。现在这个修正案意味着认可维也纳会议和内阁的外交政策,因为修正案把罗素所提出的削减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要求升格为战争的最终目标和真正目的。修正案对主和派来说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的要求太多,对主战派来说也一样,因为它的要求太少,同时,它对内阁来说也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毕竟提出了战争的目的、公认的目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主和派和托利党⁷³人现在赞成继续辩论娄的修正案,而内阁却表示反对;由此帕麦斯顿有了抛弃这个修正案的打算。他的打算没有得逞。因此他把辩论推迟到星期四^①晚间。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在此期间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已经印出来了。议定书提交给了下院。这样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新议题,而帕麦斯顿有望通过他渐渐变换议题的手法使辩论的真正对象从辩论的视线中消失。

两天的议会辩论非常枯燥、拖沓、混乱,事先就已经无的放矢的发言只能造成这种局面。可是,这次辩论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场面:主和派在迪斯累里决议案³⁰⁸表决以前向内阁献媚,而现在又向反对派——我们指的是专业反对派——献媚。其次,这次辩论暴

① 1855年6月7日。——编者注

露了皮尔派⁷¹和曼彻斯特学派³⁷之间的友好协约。皮尔派显然认为自己可以在和约签订以后率领工业资产阶级治理英国。如此看来,皮尔派在经过长期的彷徨之后想必最终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政党作后盾,而工业家们想必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国务活动家。如果主和派这样得到了格莱斯顿、格雷厄姆之流,那他们就失去了他们 20 多年的老朋友,“激进的”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莫尔斯沃思在他编辑的霍布斯的著作^①中想必已经读到:“理智来自耳朵”。因此他不是向理智呼吁,而是向耳朵呼吁。他做了哈姆雷特禁止演员做的事^②。他比暴君还暴君,他比罗素本人更像罗素。他还在霍布斯的著作中读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能夺去别人的生命。因为他最关心的就是延长自己的大臣生命,所以他就按照那些能够夺去他的大臣生命的人的意思讲话。看见这架计算机唱赞歌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甚至拜比吉在自己的《机器哲学》^③中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曼彻斯特郊区的从男爵米尔纳·吉布森讲话单调无味,令人昏昏欲睡,内容枯燥,令人厌倦。他显然从邻近的英国工业中心学会了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费用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他这个人整个外表都透着无聊。为什么他还竭力给自己的同胞们逗乐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外,看来他把思想、幽默、活力都算做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了,而避免“非生产费用”则是他所属的那个经济

① 托·霍布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威·莫尔斯沃思编,1839—1845年伦敦版第1—11卷;托·霍布斯《霍布斯哲学全集》,威·莫尔斯沃思出版,1839—1845年伦敦版第1—5卷。——编者注

② 指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2场中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他要求演员表演时要有节制。——编者注

③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编者注

学派的第一条法规。布尔沃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¹⁵⁸的英雄气概，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的沉思心境。在前一种状态下，他向俄国挑战，在后一种状态下，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编织爱神木花花冠。

米尔纳·吉布森、莫尔斯沃思和布尔沃是第一个晚上的活跃人物。科布顿、格雷厄姆和罗素是第二个晚上的活跃人物。只有科布顿的发言是值得分析的，然而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分析了。我们只指出一点：他断言波拿巴已准备接受奥地利的最后建议。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干脏活的孩子^①最近转而诉诸“感情”、“破碎的心”和“对真理的爱”，他为他最亲近的人，即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作了一个自我辩护。他曾经禁止纳皮尔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直到任何行动都会毁灭英国舰队这样的季节到来。他曾经禁止邓达斯轰击敖德萨。这样，他就使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舰队形同虚设。他以他所装备的舰队的庞大来为自己辩解。这样的舰队存在本身就是英国强大的证明。因此舰队的活动是多余的。几天以前纳皮尔给乌尔卡特的一个朋友寄去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乌尔卡特在斯塔福德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此信的原文是这样的：“先生！我认为詹·格雷厄姆爵士是能干出任何卑鄙勾当来的。查·纳皮尔。”

最后，罗素的表现出人意料的高明。他在发言的开头宣称，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是：

“如果我们打算签订和约，那么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媾和条件？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战争，那么我们继续战争的目的是什么？”^②

① 詹·格雷厄姆。——编者注

② 约·罗素《1855年6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6日《泰晤士报》第22073号。——编者注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可以在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中找到,至于谈到第二个问题,即战争的目的问题,他的回答只能是非常一般性的,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回答。如果人们愿意把“土耳其的安全”这句话当做回答,那么他也不反对。在维也纳照会⁴¹里对这种“安全”作了一种解释,而在四项条款³中又作了另一种解释;寻找第三种解释,这不是罗素的事,而是战争的事。拿破仑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抵补自己的开支,罗素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确定自己的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6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9 日《新奥得
报》第 26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³²³

星期四夜晚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使我们能够在昨天发表佩利西埃将军关于5月22日晚间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战斗的报告，并刊登了联军在5月25日进抵乔尔贡的可靠报道。^① 大约有25 000人在康罗贝尔的指挥下渡过了黑河，占领了沿河一线，把俄军前哨赶出了俯临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阵地。由于这里并不是俄军真正准备会战的地方，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后撤了，以便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曼和它东面山峦之间的坚固防线上。这次向前推进使联军把占领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从而保证了部队人数增加后所急需的空间，并打通了进入拜达尔谷地的道路，这可能会有很大用处。恢复野战行动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完成，紧接着就应该有更重大的行动了。

5月22日的战斗是在卡兰亭湾和俄军的中央棱堡即第五棱堡之间的地段进行的。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血战。我们现在从佩利西埃的报告中得知，俄军凭着一些独立的工事和步兵壕守住自卡兰亭湾南端到墓地，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而按照英国海军部绘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修改过。——编者注

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这一重要地段上布满了堑壕工事。但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弗拉格斯塔夫棱堡和中央棱堡刚一受到严重威胁,掩护它们的外围工事刚一被法军攻占,俄军便把这一地段整个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事。他们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连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围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大大屯兵场或者说隐蔽地,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军攻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甚至从翼侧对法军的前沿工事进行强攻。佩利西埃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俄军构筑那样的工事有多么迅速,一旦完成,防守得有多么顽强。他立即对俄军发起进攻。5月22日晚,联军成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湾南端占领了俄军的堑壕,并加以驻守。右路纵队也曾攻占前沿堑壕,但由于敌军火力猛烈而不能行动,所以被迫在拂晓时撤出。次日晚,联军加强兵力再度进攻,结果大获全胜。联军占领了整个工事,并把堡篮从堑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了对付俄军的阵地。法军在这次战斗中极其英勇,可以说重现了过去使他们闻名于世的那种昔日的法兰西的猛劲,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将军在描写他的部队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我们来自哈利法克斯的消息曾报道说,对城市的第三次炮击³²⁸已在6月6日开始,随后在6月7日攻占马梅隆和白色堡垒^①。在这方面,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邮件没有提供新的消息,因此我们就无法对星期三的报道作任何补充。可是我们得知,在叶夫帕托里亚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有25 000人已调到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这显然是为了进行野战,因为如果是打算再进行一次炮击和强攻,这些土

① 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编者注

耳其部队最好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①但是,联军向腹地发起攻势,运输工具和物资供应又显得不足。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佩利西埃在等待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让部队重新积极投入围城的战斗行动,其用意并不是真的要立即攻城,而是要保持部队的士气。

从佩利西埃接任司令官以后的做法看来,他肯定是决心只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不管路易·波拿巴头脑里想着的可能是什么样的计划和方案。³²⁹为克里木制定作战计划现在在巴黎似乎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了。甚至年迈的瓦扬元帅也送去了一两份计划,可是佩利西埃却立刻回电说,如果瓦扬认为自己的计划那样高明,他最好是到克里木来亲自付诸实施。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有干劲但固执而蛮横的司令官将如何行动。不管怎样,他竟然敢于向英军、土军和撒丁军的参谋长下达“命令”,甚至不屑于把“命令”内容通知给他们各自的司令官,如果此事属实,那他很快就会在联军阵营里惹起严重的纠纷。在联军阵营里,迄今为止,除由各军司令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之外,还没有一名将军被认为是处于最高地位的。想想看,老师拉格伦勋爵竟在一名法军中将的指挥之下!

与此同时,俄军并没有白白浪费时间。由于奥地利重新采取了“观望”态度,³³⁰以及预备部队和新兵也从后方开到,俄军已经能调生力军到克里木去。那里在几个骑兵师之外,已经又有了步兵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六个星期以前就传说步兵第二军已到克里木,现在这个军真的离开沃伦开赴战场了,接着开去的是附属于掷弹兵军团的轻骑兵第七师。这相当肯定地预示着:再接下去开赴克里木

① “我们来自哈利法克斯的消息…… 这些土耳其部队最好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这段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的就是掷弹兵军的步兵和炮兵了。现在他们就已经在开往沃伦和波多利亚的途中,到那里去接替第二军。指挥第二军的是曾在匈牙利指挥过海瑙军团下属的俄罗斯师的帕纽亭将军。³³¹他的这个军将带到克里木去的兵力为 49 个步兵营外加炮兵和轻骑兵,总计可达 5 万—6 万人,因为这支迄今尚未投入战斗的部队无疑已经补充到战时编制的足额。第二军的部队将在 6 月 15 日—7 月 15 日之间陆续开到战场,很可能正好赶上决战的时刻,因此,他们在克里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可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6 月份必定会使这场克里木战争初见分晓。到 6 月底以前,或者至迟到 7 月底以前,要么是俄国的野战部队不得不离开克里木,要么就是联军不得不准备自己撤退。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评克里木事件³²³

伦敦,6月8日。由于继撒丁军的两个师以后又调来了法军的三个预备师,联军已经不能再留在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这一狭窄地区了。因此,5月25日,在佩利西埃将军接任司令官后不久,他们便把20 000—25 000人派到黑河,占领了沿河一线,把俄军前哨赶出了俯瞰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阵地。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指出^①,俄军这条突出在最前面的防线并不是他们真正准备会战的地方,因此他们大概不会扼守这一地段和在这一线应战,很可能在一遭到猛烈攻击时便放弃它,以便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曼和它东面山峦之间的坚固防线。情况果然如此。这次向前推进使联军把占领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并打通了进入富饶的拜达尔谷地的道路,这在今后可能会有很大用处。在取得这些优势后到目前为止却没有继续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刚前进了一步就又停滞不前。这可能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造成的。联军司令官之间的意见不一致也被认为是一个原因。联军在6月6日重新开始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即第三次炮击,使人怀疑联军似乎已打算在

^① 见本卷第362--366页。——编者注

一段插曲以后又回到以往的拖延手段上去。但是,在炮击之后很可能接着进行野战。不管怎样,终于采取了一项必要的措施(见《新奥得报》第 241 号^①)——把奥美尔帕沙亲自指挥的 2 万多名土军从叶夫帕托里亚调到赫拉克利亚半岛。这样,联军现在就增加到整整 20 万人。只要补给供应的组织工作和运输工具的调配能保障进行野战,联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便能有把握地开始积极行动。不过,这当中似乎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

我们在叙述主力部队作战经过时应当提到的另一事件,就是在卡兰亭湾和中央棱堡(按俄军编号为第五棱堡)之间的地段进行的战斗。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血战。我们现在从佩利西埃将军的报告中得知,俄军凭着一些独立的工事和步兵壕守住自卡兰亭湾南端到墓地,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而按照英国海军部绘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这一重要地段上居然布满了法军工事,大概是幻想出来的。当弗拉格斯塔夫棱堡和中央棱堡刚一受到严重威胁,掩护它们的外围工事刚一被法军攻占,俄军便把这一地段整个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事。他们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连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围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屯兵场或者说隐蔽地,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军攻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甚至从翼侧对法军的前沿工事进行强攻。为了不使俄军赢得时间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佩利西埃决定在俄军还没有完成土工作业以前立即对他们发起进攻。5 月 22 日晚,联军成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湾南端占领了俄军的堑壕,并加以驻守;右路纵队也曾攻占前沿堑壕,但由于敌军火力猛烈,所以被迫在拂晓时撤

^① 见本卷第 393—397 页。——编者注

出。次日晚,联军加强兵力再度进攻,结果大获全胜。联军占领了整个工事,并把堡篮从堑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了对付俄军的阵地。法军在这次战斗中可以说重现了他们闻名于世的那种法兰西的猛劲,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在描写必须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形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大家知道,联军向亚速海的远征³⁰⁴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一支大半是由英法两国舰队的轻型军舰组成的区舰队,搭载了15 000名英、法、土军的士兵,未遭抵抗便攻占了刻赤、叶尼卡列和通往亚速海的海峡。这些军舰在这个内海前进,出现在别尔江斯克、格尼切斯克和阿拉巴特,毁坏了或者迫使俄军自己毁坏了大量储备的粮食和弹药,以及一批轮船和大约200只运输船。联军幸运地在刻赤附近截获了哥尔查科夫给该地司令官的一些信件。这位俄军总司令埋怨塞瓦斯托波尔的粮食不够,迫切要求火速运送新的补给。原来,在整个这次战争中,亚速海是俄军向克里木运送储备品的主要渠道,而用来运输货物的工具则是500只帆船。既然联军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并毁坏了200只帆船,那么其余的300只必然是在更北的塔甘罗格或亚速附近。因此联军派出了一队蒸汽舰去搜索这些帆船。联军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于,它迫使俄军改道彼列科普走既缓慢而又不可靠的陆路或经臭水海^①内海运送一切储备品,并把主要仓库设在第聂伯河畔的赫尔松附近或别里斯拉夫附近,也就是说,设在比亚速海北部危险得多的地方。这次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远征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联军的作战方法却是一次最严重的非难。既然现在在四天内就取得了这样的战果,那么在去年的9月或10月为什么不派出这

^① 指锡瓦什浅滩。——编者注

样的远征队呢？当时俄军的交通线如受到这样的破坏，就可能被迫退出克里木和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随同这支远征队一起行动的陆军部队的使命，是在必要时保护军舰，派出兵力驻守已占领的地点，破坏俄军的交通线。这些部队的主力看来仅作为游动部队投入陆战；他们应当在适当时机进行闪电攻击，然后在舰炮的掩护下退回自己的筑垒阵地，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当他们受到远胜于自己的强敌威胁时，甚至再回到舰上。如果陆军部队的使命正是这样，那他们是能够担此重任的，而 15 000 人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也并不算太多。相反，如果他们的使命是作为有自己作战基地的独立部队来行动，对俄军进行认真的侧敌运动，企图对克里木的腹地造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 15 000 人（由于必须派出一些分遣队，兵力还要削弱）就未免太少了；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可能被切断、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以至歼灭。现在我们仅仅获悉，这些部队已在刻赤登陆，目前正在加固朝向陆地的防御工事。自从俄军自动放弃苏茹克-卡列以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留在俄军手中的唯一的要塞就是阿纳帕³³²。这是一个天然的坚固要塞，现在又进行了很好的加固。我们怀疑联军现在会去进攻阿纳帕。如果他们没速胜的把握就进攻阿纳帕，那他们就会犯大错误。他们就会在需要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时候分散兵力，并且在既得的地区尚未巩固的时候把兵力浪费在对新目标的攻击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8日

载于1855年6月11日《新奥得报》第26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英国议会中的辩论³³³

伦敦,6月9日。议会大辩论结束了,或者更确切些说,因唾沫已经吐干而完蛋了。贝林的动议³¹⁶“在议院的哄堂大笑中”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个本身乏味的动议的结尾是向女王送呈的一份战争奏本。议院宣布过战争是“开玩笑的战争”吗?或者,议院宣布过自己是“开玩笑的议会”吗?不管怎样,两周辩论的真正结局并不是通过了贝林的动议——这纯粹是一种手续——,而是哄堂大笑,是不由自主的、没有规律的肌肉痉挛,是放肆的狂叫。“值得尊敬的议院”把提案和反提案、修正案和反修正案、内阁和反对派、演说、反驳、说教、推论、刺耳的讽刺和动人的誓言、和平的祈祷和好战的叫嚣、有策略和无策略、自己和自己的投票统统淹没在这种气氛中。^①议院在自己把自己嘲笑一番之后才摆脱了令人发笑的窘况。这样它就承认了,在议院这个环境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严肃首先变成常规的严肃,然后造作的严肃突然转化为自然的逗乐。

任何想迫使帕麦斯顿表述内阁政策,说明战争的目的、趋向和目标的企图都完全失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能向大臣或哪怕是向

^① 见本卷第413—417页。——编者注

熟人打听战争的目的。”首先帮助他的是主和派。你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吗？理查·科布顿就坐在这儿，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和平。难道你们不认为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战争比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更好吗？打理查·科布顿吧！帕麦斯顿总是这样把科布顿或布莱特或格雷厄姆或格莱斯顿拖到自己和自己的对手之间。

棉花英雄们不仅作为他缝制军服的衬里来为他服务，更有甚者，他还用棉花做了火药。

同时，在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帕麦斯顿过去把阿伯丁当做避雷针，现在又把罗素当做避雷针，当做属于内阁而为他这个神圣人物专用的避雷针。为此目的，他把罗素派到维也纳去，也是要把他变成自己的避雷针。正如以前莱亚德之流宣布阿伯丁要对英勇的帕麦斯顿的“缺点”负责一样，现在罗巴克宣布罗素要对此负责。当年是皮尔派⁷¹，现在是罗素派妨碍着他的“自由的灵魂展翅飞翔”^①。黑林山的钟挂着钟锤是为了能够运行，相反，他身上挂着钟锤是为了乱报时辰。

经过这场常规的假交锋以后，下院的一切集团都受了损伤。皮尔派终于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军队的军官。他们放弃了建立独立派别的要求，而公开投靠了曼彻斯特学派³⁷。他们这些在战争的头一年曾受命指挥陆军和海军的人，由于承认信仰永久和平，愚蠢地暴露了自己是联合内阁的背叛者，使帕麦斯顿—罗素感到惊喜。他们自己损害了自己。

曼彻斯特学派愿意和平，实际上是为了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它追求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和英国本土的统治地位。在

① 这是格·海尔维格的诗《来自山上》中的一句。——编者注

世界市场上,应当仅仅使用它的武器——棉花包来进行战争;在英国本土,作为现代生产的累赘的贵族应该被消灭,作为现代生产的单纯工具的无产者应该被奴役,而它本身,作为生产的领导者,也应该领导国家和占据国家要职。但是现在科布顿在痛骂牧师格里菲思博士,因为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上院是多余的。而布莱特则为王室子弟的命运痛哭,因为战争带来的破坏将迫使他们自己洗自己的衬衣。他们两人都痛骂人民运动³³⁴。这就是反谷物法同盟²⁸⁰的英雄!当人民运动的波浪把他们抬高时,他们就痛斥“王冠的野蛮的光辉”、勋爵们、土地贵族等等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们的要旨,包括和平说教在内,就是反对贵族。可是现在他们却站在贵族一边痛骂群众!“为了活命而舍弃活命的根基”^①。曼彻斯特学派在这场辩论中放弃了自己存在的根基。

托利党⁷³人也发现自己的内部存在主和派,并且证明,他们并不那么坚持作为英国民族主义代表的传统,正像他们不那么仇恨“波拿巴王朝”一样。

最后,该谈谈内阁派了吧?再也没有比死死抓住一项动议不放这种情况更能说明他们的特点了。帕麦斯顿本人在一个星期以前曾不得不拒绝这个动议,提议人也想放弃它,可是沃尔波尔却以托利党的名义,格莱斯顿以主和派的名义,议院则以“皆大欢喜”的名义接受了这个动议。

《先驱晨报》收到了来自芬兰湾的下述报道:

“5月28日在距喀琅施塔得16海里处报道。奥里昂号进行了侦察。它报告,喀琅施塔得的俄国分舰队包括6艘适宜于远洋航行的战列舰、同等数量的

①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8首第84行。——编者注

几乎拆卸了索具的战列舰、13艘按其外形判断已被改装成浮动炮台的战列舰、8艘大蒸汽舰和大量炮艇，炮艇的具体数量尚不清楚。在访问博马尔松德时，我们发现那儿的一切和我们离开时一样；俄军根本没有着手修复工事。那儿一个居民也不露面。由于去年同联军分舰队做过生意的那些人受到了惩罚，居民现在都特别小心谨慎。”^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9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新奥得
报》第 26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1855 年 6 月 6 日《先驱晨报》第 22450 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³³⁵

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最近战况的官方材料。昨天我们已刊登了佩利西埃将军和拉格伦勋爵的急电。现在我们继续报道经这类材料证实的事实。^①

6月6日,联军的右翼炮群重新开始轰击城市。可是这一次不是全面的轰击,而是为了立即夺取某几个地方而对它们进行的一次集中炮击。^②俄军2月23日和3月12日在这一防御地段上构筑的外围工事——色楞金斯克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迄今一直把围攻部队及其炮群阻止在一定的距离上。在西段,即在联军的左翼,没有这样的外围工事。法军这时几乎已在防御工事的堑壕边或隐蔽路边(如果有隐蔽路的话)站住了脚,所以同左翼那边所取得的进展相比,前进较慢的右翼就落后得多了。按照联军的围攻计

① 这段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② 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为题发表在1855年6月15日《新奥得报》第273号。《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从开头到此处是这样说的:“电讯关于6月6日已恢复对塞瓦斯托波尔炮击的说法不准确。只是为了立即夺取某几个地方而对它们进行了一次集中的炮击。”——编者注

划,前线被分成两大地区——内港^①以西的市区和内港东边的军港区,这两大地区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要塞,对它们必须同时进攻,所以联军右翼这边就得更加努力向前推进并夺取外围工事,以便赶上走在前头的左翼而与之齐头并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夺取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多面堡和马梅隆(堪察加多面堡)右侧的采石场的一些小规模工事。于是,法军就在炮击 36 小时以后,于 6 月 7 日晚攻打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并越过基连谷攻打马梅隆,这时英军则攻打采石场。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联军攻占了这些工事,缴获火炮多门,俘虏敌军 400 名,其中有 13 名军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②

因此,目前这一地段上的情况现在几乎又同 2 月 22 日^③以前一样了。联军攻占的这些多面堡中,以马梅隆的那一个(俄军称它为堪察加多面堡)最为重要。它是在 3 月 12 日和以后几天内筑成的。那时我们就立即指出这一工事的重大意义和它在战争中将起的重要作用^④。当前的战事已完全证实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⑤这个仓促筑成的野战工事竟把占围攻线全长二分之一的地段上的围攻部队阻挡了 88 天。这样一段时间在一般的包围战中,可以说能把一个相当大的要塞攻克两次以上而且还绰绰有余。这种事在包围战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 1807 年普鲁士军队防守科尔贝格³³⁶,另一次是

① 即南湾。——编者注

②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损失都很惨重”这段话。——编者注

③ 2 月 22 日后,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尔的东面和南面修筑了外围工事。——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302—306 页。——编者注

⑤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那时我们就立即指出……证实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段话。——编者注

1813—1814年法军防守但泽³³⁷。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桩仅有两个先例的奇事。

随着野战部队数量的增多,沃邦时代的那种旧式的而且通常是小规模工事已失去作用。胜利者的主力部队可以安然从这些工事旁通过,其游动部队对它们也几乎不予理会,留待后续的预备部队找时间去占领。但是,当这些大军在行进途中碰到大的要塞时,军队的前进就总是要受阻。拿破仑1797年在曼图亚³³⁸,1807年在但泽³³⁹就是这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当一支15万人的军队进入敌国时,一些小要塞不会在它的后方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它们守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抵挡增援部队以及从兵站派来补充作战部队的预备部队。其次,这些兵力不大的守军也无力派出较强的队伍去搜索各个地区和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可是如果遇到驻有15 000—25 000名守军的大要塞,情况就不同了。这种要塞是整个地区的防御中心;①它可以向任何方向,而且向相当远的地方派出一支既能进行野战又能在遭到敌人优势兵力攻击时安全地退入要塞的大部队。对这种要塞,监视与攻占几乎要花费同等的力量,因此应该立即攻占。②

在沃邦和科尔蒙太涅式的旧工事体系中,全部防御力量都集中在主墙边和主壕内。所有的凹角堡、半月堡、堡障和塔楼式内堡密密

①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当一支15万人的军队进入敌国时……这种要塞是整个地区的防御中心”这段话被缩写为一句话:“这种驻有15 000—25 000名守军的大要塞是整个地区的防御中心。”——编者注

②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因此应该立即攻占”这几个字。——编者注

麻麻配置成一道几乎是单一的防线。这道防线一旦被敌人楔入，数日之内全线就会被突破；防线一旦被突破，要塞也就被攻占了。显然，这种工事体系完全不适用于本身就能阻止入侵的大军前进的大要塞。这种体系意味着牺牲守备部队，因为防线一旦被突破，要塞就毫无防护。^① 必须采用另一种体系——前沿工事体系。法国的蒙塔朗贝尔将军——卡诺的老师——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不顾当时盛行于他的专业领域中的偏见而大胆主张构筑独立堡垒。但是，构筑带独立堡垒的大要塞以形成完整防御体系这种方法，是在德国，特别是经过普鲁士的阿斯特将军的精心改进，才达到目前这种完善的水平。科隆、科布伦茨、波森、柯尼斯堡以及美因茨部分地区的那些出色的防御工事就是他修建的，这些工事标志着筑城史上的新纪元。最后，法国人也承认必须改用这种体系，于是建成了设计施工均属一流的带独立堡垒的巴黎防御工事。^②

独立堡垒体系需要立即有一套新的防御方法。大要塞的守备部队必须增加到这样的水平，即在向斜堤前进的敌军到达可以出击的距离之前无须仅仅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一支 20 000—25 000 人的守备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打到敌人阵地上去。要塞和它周围的地区在独立堡垒的掩护下，成为一个设防营地或者说成为守备部队进行野战的一个基地，守备部队本身也就变成了一支小野战军。原来的消极防御变成了积极防御，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必要性是很明显的，如 1807 年法军围攻但泽时，约两万人的普鲁士守军正是修筑了

①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这种体系……毫无防护”这句话。——编者注

②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科隆、科布伦茨……巴黎防御工事”这段话。——编者注

这种独立堡垒，因为他们当时一下就发现，这样一支兵力雄厚的守军要成功地防守该地，就必须利用当时那里所没有的这种独立堡垒才行。1813—1814年法军防守但泽对抗反法同盟军时，更成功地运用了这套方法^①。

从沃邦时代起，包围战一直是一种短时间的行动，如果没有什么外来的阻挠，它的目的几乎肯定能够在预定的期限内达到；而现在，包围战已成为像野战那样的一种军事行动，其结局要取决于很多因素。架在要塞围墙上的火炮一下子便退居次要地位，而野炮甚至在防守要塞时也比围墙上的火炮更重要了。工程师的技能已经不仅用于修整被围时遭到破坏的工事，现在他们还必须像在野战中一样，选择和加固堡垒前面的阵地，朝着敌人的堑壕挖掘堑壕，构筑从侧面威胁敌人工事的反围攻工事，突然地变换防御正面，从而迫使敌人改变主攻方向。在包围战中，也像在野战中一样，步兵成了主要的力量，而骑兵则成了几乎每一支守备部队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办法来确定一场包围战可能持续的时间，而沃邦的攻城法虽然就炮攻的细节而言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但对一场包围战的总体来说，就完全不适用了。

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②没有时间修筑独立堡垒。他们不得已而

① 本段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被缩写成：“独立堡垒体系改变了要塞的防御方法。大要塞的守备部队扩大到小野战军的规模。要塞和它周围的地区在独立堡垒的控制下，成为一个设防营地或者说成为守备部队进行野战的一个基地。原来的消极防御变成了积极防御，具有了进攻的性质。”——编者注

②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这里增加了一句话：“在那次臭名昭著的侧敌行军¹⁰之后”。——编者注

沿用了修筑要塞的老方法,构筑了一道主墙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确,当时最需要的是主墙。他们在主墙后面又修筑了第二和第三道防线,同时还一直在加固第一道防线。后来,俄军又逐渐地意识到甚至在主墙以外的一定距离上还有对他们有利的地方,于是就向前推进,修筑了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最后,还修筑了马梅隆的那座工事和一长串散兵壕;而在法军主力所在的西线上,他们只能在主壕近旁修筑几座眼镜堡,在这些眼镜堡前面不远的地方挖掘一些步兵壕。所以,俄军自从在马梅隆修了工事以后,东线就比较安全了;而在没有这种外围防护工事的西线,围攻部队就逐渐地推进到了主壕边。^①因此,围攻部队要接近他们右翼最重要的制高点——马拉霍夫棱堡,首先必须夺取马梅隆。可是马梅隆在掩护马拉霍夫棱堡的同时,本身也有自己后方的全部工事作掩护。从康罗贝尔在第二次炮击时未敢认真地强攻马梅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种掩护是多么有效。甚至现在也丝毫不用怀疑,法军在夺取这一工事时所遭到的损失肯定是非常巨大的。^②

联军恢复了炮击,佩利西埃将军毫不爱惜士兵生命,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有利时机逼近守军,而另一方面,黑河上的行动却完全停止了。这种做法立刻使我们看清了佩利西埃的性格,难怪他过去就有倔强、固执、鲁莽之名。他可以有两种打法:或者是打野战,把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也包围起来,然后加倍猛攻,这样,迅速取得胜利的机会

①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所以,俄军自从……推进到了主壕边”这句话。——编者注

②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没有“甚至现在……非常巨大的”这句话。——编者注

就会增加三倍；^①或者是继续采取最近八个月以来的错误做法，即固执地攻打南区，把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砸碎打烂，把俄军赶出要塞。这样，就算把要塞攻克，联军自己的部队也无法占领，因为北区还有俄军的炮台。

在东西两半球上都找不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军人，在获悉佩利西埃被任命为司令官和联军得到大量增援部队以后而不期待佩利西埃立即采取第一种打法。特别是在奥美尔帕沙率领的 25 000 人的土耳其军队来到巴拉克拉瓦以后，联军毫无疑问已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一面继续围攻，一面派 15 000 人到刻赤去，同时以比俄军可能用来进行抵抗的更大的兵力进行野战，向前推进。为什么联军没有这样做呢？是他们还缺少运输工具吗？是他们对自己在克里木作战的能力没有信心吗？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佩利西埃不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放弃野战，那他就是纯粹出于固执和任性而选择了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因为，以他目前一直迫使他的部队在强攻中所付出的同等代价，他能够在野战中获得更大得多的战果，其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也更大得多。没有把北区包围起来就去攻打完全处于北区控制之下的南区，这绝对违反一切作战原则，而如果佩利西埃偏要这样干，那他可能会葬送他所统率的这支大军。

我们还应尽量为这位新司令官的每个可疑的行动找些辩解的理由。也许左翼上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因为俄军构筑了反接近壕。也许围攻者在冒险把全部军队分成围攻部队和野战部队以前，

^① 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这里增加了一句话：“特别是在不但增援部队而且还有奥美尔帕沙率领的 25 000 人的土耳其军队来到巴拉克拉瓦以后，就更应如此。”——编者注

必须先把俄军封锁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以内,给他们进行几次狠狠的打击,让他们深信优势是在围攻者一边。但是,即使承认这一切,我们现在仍必须指出已经到了极限,如果联军不动用一切可用来打野战的兵力先把野战战场上的俄军拖垮,那么,任何攻打城市本身的新的重大企图都将是不折不扣的错误。^①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1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本文最后两段内容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中被缩写成这样一段：“以佩利西埃目前一直迫使他的部队在强攻中所付出的同等代价，他能够在野战中获得更大得多的战果，其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也更大得多。没有把北区包围起来就去攻打完全处于北区控制之下的南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做法。佩利西埃可能仍然缺少进行野战所需的运输工具。要么可能是俄军的反接近壕使得联军在进行野战之前必须把俄军赶回他们原来的阵地，让他们知道优势是在围攻者一边。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马拉霍夫冈既已攻克，那就再没有什么辩解的理由了。如果佩利西埃还是顽固地坚持认真攻打城市本身，而不去设法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摧毁野战战场上俄军的实力，那么，他所统率的军队遭覆灭就不是绝不可能的事了，特别是这样大批的人员挤在这里，只要夏季的热天一到，这个地区就将是一个弥漫着致命的瘴疠之气的大坟场。”——编者注

弗·恩格斯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³⁴⁰

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再一次告知全世界，今后几个月战争将如何进行。^① 这样的阐述现在不仅成了一种时髦做法，而且也成了定期的做法，尽管这些阐述时常互相矛盾，但在目前却能够让人们看清法国政府正面临什么样的有利时机。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是路易·波拿巴可能采取的各种对俄作战计划的总汇。正因为如此，这些论述是值得给予某种注意的，因为它们涉及第二帝国的命运和法兰西民族复兴的可能性。

现在似乎是不会有 50 万奥地利军队和 10 万法国军队兵临维斯图拉河和第聂伯河的“大战”了。那些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的“被压迫民族”也不会来一场普遍起义。也不会有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的军队在那个镇压过罗马共和国的人³⁴¹魔杖一挥之下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过去。奥地利对西方尽了自己的责任。普鲁士尽了自己的责任。全世界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大家彼此满意。目前的战争根本不是大战。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恢复法军在以往对俄战争中取得的

① 指 1855 年 6 月 18 日法国半官方报纸《立宪主义者报》第 169 号发表的该报主编阿·德·塞桑纳论述克里木战争的目标与前景的文章。——编者注

荣誉,尽管佩利西埃在他的一份报告中偶然说过那样的话。法军被派到克里木,不是为了在那里获得荣誉;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执行警察勤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纯粹局部性的问题:黑海上的优势,这个问题将在那里就地解决。扩大战争的规模是愚蠢的。联军将会“恭敬地,然而坚决地”击退俄军在黑海及其沿岸进行抵抗的任何企图;而在做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联军或者俄军,或者作战双方将提出议和。

这样,波拿巴的又一个幻想被放置到一边。以莱茵河做法国的疆界、把比利时和萨瓦兼并过来这样的梦想没有了,而是换成了异常清醒的谦让精神。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恢复法国在欧洲应有的地位,决不是的。我们甚至也不是像我们不久以前还经常说的那样为了文明而战。我们非常谦虚,决不会有这样大的奢望。其实我们打仗的原因只不过就在对维也纳议定书的第三项条款³⁴²的解释这个问题上!这位靠军队的恩惠和欧洲的宽容成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现在就是用这样的语言讲话。

但是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据说,战争是为了纯粹局部性的问题而进行的,因此用纯粹局部性的手段就可以顺利地结束。只要剥夺俄国在黑海上的实际优势,目的也就达到了。一旦成为黑海及其沿岸的主人,守住夺得的一切地盘,俄国就会很快让步。这就是来自巴黎大本营的许多作战计划中最新的一个计划。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计划。

首先谈谈目前的局势。这一边从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那一边沿切尔克西亚海岸到阿纳帕、刻赤、巴拉克拉瓦直至叶夫帕托里亚,全部海岸线都已经从俄军手中夺过来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守,卡法已受到猛攻,塞瓦斯托波尔则由于所处的位置,

只要一遭到严重威胁必将失守。不仅如此，联军的舰队正横扫亚速内海；他们的轻型船舰曾向北直抵塔甘罗格，并且袭击了所有沿岸重镇。除了从彼列科普到多瑙河这一段，即除了俄国在这个沿岸地区的大约十五分之一的领地以外，可以说再也没有任何一段海岸留在俄军手里了。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经攻克，克里木已经落入联军手中，那又将怎样呢？俄国处于这种境地，是不会缔结和约的，这一点它已经公开宣布过了。它这样做就等于是发疯，就等于在主力正好赶来的时候，却因前卫被击退而放弃战斗。那么，联军以巨大牺牲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据说，联军可以摧毁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甚至派一支大军在敖德萨登陆，在那里设防坚守，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军的进攻，然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他们还可以分兵到高加索去，把现在驻守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其他地区的由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的俄军消灭得差不多。可是，假定这一切都已做到，我们仍然要问：如果俄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而且肯定会——拒绝缔结和约，那又该怎么办呢？不应当忘记，俄国的处境与英法不同。英国胡乱签订个和约于己无损。实际上，约翰牛只要寻够了刺激，征够了军税，他会立即巴不得地爬出这个泥坑而不管他亲爱的盟友们的死活。英国要真正保证自己强大不衰，并不是绝对需要爬进这个泥坑的。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可能也是这样：对他来说，订一个不体面的和约比打一场殊死决战要好，因为不要忘记，当这样一个冒险家陷入绝境时，他那种把自己的统治再延长半年的希望，就会压倒其余的一切想法。在紧要关头，土耳其和撒丁会被抛下不管，只有依靠它们自己的微薄力量了。至少以上所述都是肯定无疑的。可是俄国同古罗马一样，只要敌人还在它的领土上，就不可能议和。近一百五十年以来，

俄国从未缔结过一次丧失领土的和约。甚至蒂尔西特和约³⁴³都给俄国增加了领土,而这个和约是在连一个法国人没有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缔结的。当俄国领土上有一支庞大的而且正在前进的军队的时候,缔结一个割让领土或者至少把沙皇的权力限制在他自己领地范围以内的和约,就等于一下子破坏了一个半世纪的传统。这样做,对一个刚刚即位,在人民心目中尚属生疏而且又被一个强有力的民族派以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沙皇^①来说,是想也不能想的。这种和约不可能签订,除非俄国的全部进攻力量尤其是防御力量已被动用而且消耗殆尽。这一天是会到来的,那时俄国将被迫放弃干涉他国事务,但强迫它这样做的将是与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不同的敌人,而且要经过比在它黑海沿岸领地上实行的“局部性”讨伐更坚决得多的斗争之后。但是我们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领而且驻扎了5万联军,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领地上的俄军已被肃清,一支联军把俄军阻止在庫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线,敖德萨已被占领并且变成了一个设防营地,驻有比如说10万英法军队,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和伊兹梅尔也都被联军摧毁或占领;甚至我们还假定,除了这些“局部性”的成就以外,联军在波罗的海可能还取得了一些什么重要的战果,虽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很难说这点战果是什么。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联军就只限于守住自己的阵地和消耗俄军的力量吗?联军在克里木和高加索因疾病将以很快的速度减员而来不及补充。他们的主力部队,比如说在敖德萨,将不得不依靠舰队得到给养,因为敖德萨周围百英里的土地不出产任何东西。俄军有哥萨克侦察兵的辅助——哥萨克侦察兵在这里的草原上是最有用不过的,——即使不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能在该城附近建立一个固定阵地，等联军一从他们的营垒里出来也能对他们进行袭扰。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俄军进行会战是不可能的；俄军总是具有可以把联军朝本国腹地吸引这样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对联军的每一次向前推进，他们都将以缓慢的后撤来对付。可是，让一支大军长期待在营垒里无所事事是办不到的。逐渐滋长的纪律败坏和军心涣散现象，将迫使联军采取某种坚决的行动。疾病也会使他们难以在此待下去。一句话，占领沿海重镇，然后在那里等待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作出让步，那将是一场绝无任何好处的游戏。结果十之七八会是这样：联军将首先厌倦这场游戏，黑海岸边联军士兵的坟墓将很快达到 10 万以上。

这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要想控制海岸，仅占领沿海重镇是不够的。只有占领内地才能确保对海岸的占领。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联军如果在俄国南部海岸站住了脚，这一情况本身就差不多会迫使它向内地推进。可是困难也就在这里开始了。北至波多利亚、基辅、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诸省边界，是一片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平原，灌溉条件很差，除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而且在夏天的酷热之后就连野草也没有了。假定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都变成作战基地，那么联军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城市不多，彼此相隔很远，而且没有一个按其重要性来说，在攻占以后足以使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最近的关键性要地是莫斯科，而莫斯科却远在 700 英里以外！进军莫斯科需要 50 万人，可是人从哪里来呢？情况无疑是这样：用现在这个办法，这场“局部性”的战争无论如何不会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而路易·波拿巴虽然满腹韬略，但也未必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

但是这一切不仅需要奥地利严守中立，甚至还需要它在道义上

给予支持。但这个大国现在站在哪一边呢？在1854年，奥地利和普鲁士曾经声明，它们将把俄军向巴尔干山脉的推进视为对俄国的宣战理由。³⁴⁴怎能担保它们在1856年不会把法军对莫斯科或者甚至对哈尔科夫的进攻视为对西方大国的宣战理由呢？不要忘记，任何一支军队由黑海向俄国腹地推进，其翼侧都是暴露在奥地利面前的，同俄军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进完全一样，因此在一定的距离上，这支军队同作战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捏在奥地利手中了。要想把奥地利稳住，哪怕是稳住一时，也得使用贿赂的办法，这就是把比萨拉比亚让给奥地利的军队。只要奥军到了德涅斯特河，就会把敖德萨完全控制，就像这个城市是奥军驻守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联军能够冒险进入俄国腹地去对俄军进行无益的追赶吗？蠢举！可是我们要记住，这种蠢举乃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局部战争”计划的必然后果。

第一个作战计划是同奥地利结盟，进行“大战”。这个计划会使法军同奥军相比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和实际上的从属地位，就像目前英军同法军的关系一样。它会使俄国首先闹起革命来。这两点都是路易·波拿巴不能做的。奥地利拒绝参战；计划破产了。第二个计划是“民族战争”。这个计划会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这一方和起义的斯拉夫人那一方之间掀起风暴，这一定会立刻影响到法国，会使路易·波拿巴的衰落帝国¹⁶⁵在比它建立所用的时间还要短的时间内倾覆。冒充拿破仑的这个假“铁汉”退缩了。第三个计划，即所有计划中最克制的计划，就是这个“为了局部目的的局部战争”。它的荒谬性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又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以后又怎么办？当个像样子的法国皇帝毕竟远不如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登上法国皇帝宝座那样容易。即使皇帝陛下通过长时间对

镜演习已完全学会端皇帝架子,也仍然一样。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1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³⁴⁵

伦敦,6月15日。查理·纳皮尔爵士公布了一批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信件,第一号信如下:

“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分舰队去年没有干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来,而今年大概也不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对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也就是说,因为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对我去年6月寄给他的计划不加理睬,而且还假托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其次,因为海军部对我去年9月寄给它的计划不予重视。如果能保证邓达斯海军上将获得我所指出的那些装备,那么,斯韦阿堡就已经挨了炮击,而且可能已被摧毁了。他们不去做这件事,却花了大约100万英镑去建造浮动装甲炮台,这种炮台只能勉强地游动,如果把它们送到波罗的海去,就未必能回得来。而在建造这些炮台之前,在朴次茅斯就已经证实,在400码的距离上,用六十八磅火炮就能击毁它们,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在800码的距离上它们还不能摧毁花岗石的壁垒。假如用同样的钱来建造臼炮艇,那还可以有一点指望;或者只用这些钱的一半来实施邓唐纳德勋爵同我谈过的计划,那么我相信,这个计划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在黑海都会取得成功。我可以揭露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对我所做的一切的那一天将会到来,而且很快就会到来。邓库姆先生已经证明他(在邦迪埃拉兄弟的案件⁴⁶中)曾拆开私人信件。格雷厄姆企图把对不幸的克里斯蒂船长之死所负的罪责推在莱亚德先生身上,而我指责他歪曲了我的信件。人们不许我提供证据,借口说公布出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这种借口很快就要不成立了,那时候国人就会知道,值得尊敬的从男爵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来唆使贝克莱海军上将和理查兹海

军上将签署那些一旦加以执行就会招致皇家舰队覆灭的指令。国人就会知道，海军首席大臣^①是否有权把一个军官的私人信件宣扬出去，然后又阻止这个军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海军首席大臣的信件。

查·纳皮尔爵士^②

罗巴克委员会⁷²昨天又召开了第四十九次会议，为的是对那个要呈交下院的报告作出一个决议。经过四个小时的辩论，委员会的委员们如同在以往各次会议上一样，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又把会议延到星期一，“指望”那时候最终能够宣布，他们的工作已告结束。

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昨天在德留黎梭剧院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然而，有必要指出，这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需要入场券的集会，即只有手持入场券的特邀者才能参加的集会。因此，先生们完全无拘无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他们公开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给“舆论”吹吹风。然而，为了防卫这种舆论不受外来的风吹袭，在德留黎梭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连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于成为舆论，这是组织得多么微妙的舆论啊！这次集会首先是支持莱亚德的一次示威，今天晚上莱亚德终于要向议院提出自己的改革提案了。

前天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举行的公开集会上，戴维·乌尔卡尔特痛骂了“叛变的内阁和低能的议会”。

关于宪章派¹⁹²目前在各地准备的集会，我们下次再来介绍^③。

当现状受到各个方面和各种观点的抨击时，阿尔伯特亲王抓住在领港会馆³⁴⁶举行的一次聚餐会的机会，说明了宫廷对普遍不满的

① 詹·格雷厄姆。——编者注

② 1855年6月15日《晨报》第19964号。——编者注

③ 后来未见《新奥得报》发表马克思在此提到的这类文章。——编者注

态度。原来他也有克服危机的法宝。这就是：“以爱国和克己的态度信任内阁！”阿尔伯特亲王认为，只有内阁的专制才能使立宪的英国有能力同俄国对抗，同北方的专制制度作战。他所作的英俄之间的对比既没有说服力，也不恰当。例如：他说女王^①无权招募军队，除了自愿为她效劳的以外，她手中再没有任何军队了！阿尔伯特亲王忘记了，女王手中差不多有 3 000 万英镑可以用来雇佣军队。从什么时候起强迫劳动比雇佣劳动更有生产效率了呢？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厂主抱怨莫斯科的厂主同他竞争，说什么他手中只有一些自愿效劳的工人，那么人们会说他什么呢？阿尔伯特亲王不去强调指出，俄国皇帝已下令在教坛上明确地和坚定地人民宣布他的“神圣”战争的目的，而英国打了两年的仗，首相^②在议会谈到战争的时候还承认“谁也说不清楚它的目的”，反而抱怨说：

“如果女王政府事先不向议会解释清楚，那么它就不可能实施继续战争的任何措施。”^③

好像罗巴克委员会不是在英军牺牲了三分之二以后才成立似的！好像关于维也纳会议⁴问题的辩论不是在维也纳会议闭幕以后才开始似的！实际上，除了罗素显然只是为了及时向彼得堡内阁发出警告而主动地和虚张声势地通报了一下塞瓦斯托波尔远征一事，政府在议会内一次也没有宣布过它为了进行战争而采取的措施！至于说关于封锁的辩论，那并不是因为内阁采取了这项措施，而是因为

①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②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1855年6月13日《每日新闻》第2829号、1855年6月14日《泰晤士报》第22080号。——编者注

内阁宣布要封锁而没有实行封锁。阿尔伯特亲王不去抱怨王室迫于议会阴谋而在对俄战争期间忍受自认亲俄和显然主和的内阁的专制独裁,反而抱怨议会中不利的表决结果“迫使女王撤掉了自己所信赖的仆人”。阿尔伯特亲王不去理直气壮地抱怨那些在俄国足以让将军、大臣和外交官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错误、无能和卑鄙勾当,在英国至多在报刊上和议会内引起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他反而抱怨

“没有一次失策,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失策,没有一个缺点和弱点不会马上遭到谴责,而且时常有人甚至怀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加以夸大”。^①

阿尔伯特亲王在向自己多年的朋友帕麦斯顿勋爵敬酒时作了这一番近乎病态的感情宣泄。但是帕麦斯顿根本不懂得宽大为怀。他马上利用亲王所采取的错误立场,拍着胸脯大声向亲王说道:“我必须声明,英国人民给予了我们最慷慨的支持。”^①帕麦斯顿继续讲下去。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享有英国人民的“信任”。帕麦斯顿反驳了亲王对人民所作的令人厌烦的训诫。在亲王奉承他之后,他却去奉承人民。帕麦斯顿甚至不愿花费一点口舌对王室说恭维话作为回报。阿尔伯特亲王自命为内阁的庇护者,因此宣称内阁“不依赖”于议会和人民;帕麦斯顿却断言王室“依赖”于内阁,以此作为回答。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新奥得
报》第 27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1855 年 6 月 13 日《每日新闻》第 2829 号、1855 年 6 月 14 日《泰晤士报》第 22080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³⁴⁰

伦敦,6月16日。关于莱亚德提案³⁴⁷的辩论,昨天没有结束,辩论将在星期一晚间会议上继续进行。因此,我们暂时把对于这次辩论的评论延搁一下。

在下院的会议上有一件事倒值得提一提。在磋商维也纳会议⁴的问题时,帕麦斯顿顺便谈到,皮尔派⁷¹曾把确定某些媾和条件作为他们加入他的内阁的条件。罗素在维也纳维护的正是这些条件。昨天,奥特韦要求帕麦斯顿表明态度,他是否支持皮尔派,也就是,一个自己承认是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党派所倡议的媾和条件?格莱斯顿站起来,要求提醒这位指责他和他的朋友叛变的发言人遵守秩序。奥特韦被提醒了。然而奥特韦还是重复了他对皮尔派的评语和对帕麦斯顿的质问。帕麦斯顿照例拒绝作任何回答。他说媾和条件当然取决于战事的发展。至于谈到皮尔派,那么他们同他特别商定,他必须保守秘密的“某个”条件不会成为媾和的必要条件。格莱斯顿在回答帕麦斯顿时否认自己曾经和帕麦斯顿商谈过媾和条件。也许他的朋友格雷厄姆的做法不同。此外,他反对帕麦斯顿的那一套:一方面装腔作势地摆出官方的矜持态度,另一方面又给予含蓄的指点、模棱两可的暗示和吞吞吐吐的披露。但愿内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或者干

脆沉默不语。格莱斯顿怀着恭顺而痛楚的心情给帕麦斯顿上了这一课。

法国政府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对于今后几个月战争将如何进行作了新的阐述。^① 这样的阐述现在不仅成了一种时髦做法,而且也成了定期的做法。尽管这些阐述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但是对于披露路易·波拿巴“可能采取的各种”对俄作战计划还是有价值的。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证实波拿巴的幻想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了。第一个计划是同奥地利结盟,以奥军 50 万人和法军 10 万人在魏克瑟尔河和第聂伯河进行“大战”。这个计划会使法军同奥军相比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就像英军在克里木同法军的关系一样。它会使俄国首先闹起革命来。奥地利拒绝参战。计划破产了。第二个计划是“民族战争”,即“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的被压迫民族”的普遍起义。这个计划会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这一方和起义的斯拉夫人那一方之间掀起风暴。这一定会影响到法国,使“第二”帝国有招致崩溃的危险。这个冒牌“铁汉”惊恐地退缩了。计划又破产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往事。奥地利尽了自己的责任,普鲁士尽了自己的责任,全世界都尽了自己的责任,于是波拿巴就作出了第三个计划,即最克制的计划。“为了局部目的的局部战争。”法军被派到克里木,不是为了荣誉而作战,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执行警察勤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纯粹局部性的问题:黑海上的优势,这个问题将在那里就地解决。扩大战争的规模是愚蠢的。联军将会“恭敬地,然而坚决地”击退俄军在黑海进行抵抗的任何企图。然后联军,或者

① 指 1855 年 6 月 18 日法国半官方报纸《立宪主义者报》第 169 号发表的该报主编阿·德·塞桑纳论述克里木战争的目标与前景的文章。——编者注

俄军,或者作战双方将提出议和。那些豪言壮语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有关文明的空话也没有留下,留下的只是为维也纳议定书的第三项条款³⁴²而作战。谕旨上还说,仅仅为了局部目的战争只能使用局部手段进行。仅仅剥夺俄国人在黑海的优势!在下一篇通讯^①中我们将要指出:在波拿巴从“大战”退到“民族战争”,又从“民族战争”退到“为了局部目的使用局部手段的局部战争”之后,这种局部战争也是“荒谬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16日

载于1855年6月19日《新奥得
报》第27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485—490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

——报纸印花税³⁴⁸

伦敦,6月18日。阿尔伯特亲王的演说和帕麦斯顿的答谢词的发表使人感到有些奇怪。这两篇讲话是6月9日星期六在领港会馆³⁴⁶作的。随后在星期一,各家日报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领港会馆一年一度的聚餐会,没有谈到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6月13日星期三《每日新闻》和6月14日星期四《泰晤士报》才发表了祝酒词和答谢词。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次发表是帕麦斯顿勋爵玩弄的把戏,指望牺牲他的王室祝福人而为自己赢得声誉。阿尔伯特亲王现在发现自己因为“以克己的态度信任”高贵的子爵,因为如此恳切地号召全国去信任他而付出了代价。大部分周报对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反应如何,可以根据《雷诺新闻周报》上的下面一段话来判断。应该强调指出,《雷诺新闻》的发行量是2 496 256份。这家报纸在作了一番详细的评论以后写道:

“这位王室审查官断言,任何一个弱点,任何一个缺点都遭到谴责,而且时常有人甚至怀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加以夸大。英国人民有耐心是尽人皆知的。英国人民像以萨迦^①一样,可以比做一头驴,驮着高利贷和土地垄断这两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0章第18节和第49章第14—15节。——编者注

副重担。然而女王的丈夫的这种指责是连英国人也难以忍受的最粗暴最骇人听闻的侮辱。幸灾乐祸！这就是说，英国人民看到叛变和贵族的愚蠢使我们英勇的士兵遭到可怕的苦难而幸灾乐祸；对我们受了奥地利的欺骗而幸灾乐祸；对浪费4 000万英镑和牺牲4万名最勇敢的士兵而幸灾乐祸；对引起我们表示过要予以帮助的同盟者的不信任和我们所打算加以惩罚的敌人的轻蔑而幸灾乐祸！然而，这种责难不仅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而且是诽谤性的和根本站不住脚的。不管英国人民有什么错误，——上帝知道，错误是很多的——英国人也决不会因自己的士兵和水兵遭受苦难和民族的品格蒙受耻辱而幸灾乐祸。诚然，王室中的德国人、贵族叛徒和他们的可憎可恶的食客们却是例外……不过，我们乐意相信，游手好闲、肠肥脑满的骄奢淫逸之徒和睡羽绒被的士兵是很难理解真正的士兵和水兵们所经历的苦难和考验的……然而，有一点我们同这位王室武士是一致的，那就是立宪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一种特别笨拙的、糟糕的、不公正的、不中用的政体。但是亲王认为除了专制制度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他就错了。我们请求他回想一下，还存在共和主义这样一种东西，这是一种选择，这个民族很可能投向这种选择；我们相信，舆论的潮流正在奔向这方面，而不欢迎好战的亲王所希望的那种无限制的专制制度。”^①

《雷诺新闻》就是这样写的。

废除报纸印花税¹⁰¹的新法令在上星期日得到了女王的批准并从6月30日起开始生效。根据这个法令，只向那些由邮局免费递送的报纸征收报纸印花税。在伦敦的各家日报中只有《先驱晨报》宣布把它的定价从5便士降到4便士。相反，在周报中却已经有许多家报纸，例如《劳埃德氏周刊》、《雷诺新闻》、《人民报》等等，宣布从3便士降到2便士。伦敦一家新出版的、和《泰晤士报》尺寸同样大小的日报《信使电讯报》宣布定价为2便士。伦敦到目前为止出版的定价2便士的新的周报有：《舵手》（天主教会的报纸）、《泰晤士画报》和查理·奈特先生的《城乡新闻》。最后，威洛特先生和列哲尔先生宣布

^① 1855年6月17日《雷诺新闻》第253期。——编者注

要在伦敦出版一份便士周报(定价 1 便士)。然而,由于废除报纸印花税,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 4 种新的便士日报。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目前为止每星期只出版一次或两次的报纸都将改成日报,定价 3 便士、2 便士和 1 便士不等。使地方报刊摆脱伦敦的控制,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³⁷在它长期顽强地反对报纸印花税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1 日《新奥得
报》第 283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奇怪的政策³⁴⁹

德·普拉特神父在他的《维也纳会议》一书中公正地指责了这次如德·利涅公爵所说的舞会式的会议⁴⁷，说它为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奠定了基础，并且批准了这种霸权。德·普拉特感叹地说：

“这样，欧洲为反对法国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就以欧洲隶属于俄国而告终了。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获得这样的结果真不值得。”^①

反对法国的战争，同时也是反对革命的战争，反雅各宾的战争⁸，这种战争自然会使政治势力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法国转移到俄国。维也纳会议是反雅各宾战争的自然产物，维也纳条约是维也纳会议的合法成果，而俄国的霸权则是维也纳条约的私生子。因此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伙著作家把全部罪过加在普鲁士头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根据的事实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由于对亚历山大皇帝盲目忠诚和断然指示他的全权代表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支持俄国而妨碍了可耻的三人同盟——卡斯尔雷、梅特涅和达来朗去实现他们的密谋，即建立防止俄国入侵的可靠的区域性壁垒³⁵⁰，从而

① 多·迪·德·普拉特《维也纳会议》1815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编者注

预防他们自己十分热心地强加于大陆的那种制度产生令人不快的，但是必然的后果。甚至这样一种厚颜无耻的秘密会议也没有能改变事件发展的逻辑。

俄国在欧洲所取得的优势是同维也纳条约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任何反对这个强国的战争，只要不是一开始就宣布废除条约，结果就必然只会是一系列的讹诈欺骗和秘密勾结。然而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 1815 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⁹¹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平息”欧洲舆论而作共同的努力。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小册子《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中有几段值得注意的话，从译文可以看出，早在会议期间，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保存土耳其就像瓜分波兰一样，是他们的“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³⁵¹

“让土耳其人留在欧洲！土耳其人对你们有什么损害？这是一个强大而正直的民族；只要你们不去干涉他们，他们就会一连几世纪在自己的家园和平地生活下去，他们是值得信赖的。难道他们欺骗过你们？难道他们在政策上不真诚不坦率？诚然，他们是勇敢的、善战的，但是就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好的、有益的。土耳其人是防止亚洲过剩人口入侵的最好的前沿屏障，正是因为他们欧洲有领土，他们阻挡着各种各样的侵犯。如果把他们赶出欧洲，他们自己就要入侵。暂且假定他们被赶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要么这些土地被俄国或奥地利侵占，要么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你们是否真的想使俄国变得更强盛？你们是否也想从这方面使这个庞然大物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俄国已经把腿从伏尔加河伸进涅曼河，又从涅曼河伸进维斯图拉河，而现在大概又要一直伸到瓦尔塔河，难道你们觉得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们是否打算使奥地利的力量用在亚洲方面，从而使奥地利无力保住强国中心的地位来防止西方侵犯，或对此采取漠视态度？请回想一下，扬·索比斯基、萨瓦亲王欧根和蒙特库利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难道起初法国争得了对德国的统治，不正是因为奥地利不得不经常派出兵力去防御亚洲的入侵？你们是否想使奥

地利靠拢亚洲而恢复从前的状况,并且更加深这种状况?

如果是那样,就应当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或拜占庭国家!但这会改善欧洲的状况吗?由于这个民族(希腊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况下,欧洲岂不是反而要经常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以防止土耳其人的卷土重来?由于俄国利用宗教、贸易和金钱对希腊产生影响,希腊岂不是会变为只是俄国的殖民地?有土耳其人的地方,最好别去打搅它,当不安分的力量沉睡时,就不要去惊动它。

心地善良的慈善家会感叹地说:‘可是那里对待人的态度是多么坏啊!包括古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住的却是野蛮人!’

我的朋友,这一切可能是真实的:那里正在摧残人,或者说过去一直在摧残人;但是在别的国家也有用棍棒和鞭子打人的,也有虐待人和贩卖人的。在改变一种状况前,应当想一下,改变之后是否会好些。棍棒和荆条以及希腊人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比土耳其人的细丝绳和教令要好受些呢?首先必须在欧洲消灭这一切,消灭贩卖奴隶的现象,不要再为土耳其人的野蛮而感到不安;在他们的野蛮中包藏着力量,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增添了勇气,而我们正需要力量和勇气,以便有可能沉着地观察莫斯科人是怎样在向瓦尔塔河推进的。

由此可见,土耳其人必须保存,而波兰人,作为民族来说则应当灭绝!对,只能如此。

一切有力量坚持下来的事物则生存,一切腐烂的东西则死亡。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波兰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保留下来,而且保留了他们所固有的一切特点,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从宫廷到茅舍,到处都是酗酒、贪食、谄媚逢迎、藐视一切更为优秀的东西和一切其他民族、刻薄地嘲笑各种规章和礼仪、挥霍浪费、淫逸放荡、卖身投靠、奸诈狡猾、隐瞒欺骗、道德沦丧——这就是波兰人的天性。为了这些他们唱着歌,奏着提琴或弹着六弦琴,吻着情人,用情人的小鞋喝酒,拔着剑,捻着自己的胡子,跃上战马去同杜木里埃和波拿巴或别的什么人战斗,他们过度地喝着烈性酒和潘趣酒,同朋友和仇敌搏斗,他们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农奴,他们变卖自己的财产,跑到国外去,他们骚扰着半个世界,并且当着考斯丘什科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发誓,说只要他们是波兰人,波兰决不会灭亡。

你们要求复兴波兰,你们看,你们支持的是什么。

这样的民族是否值得独立存在呢?这个民族配有一部宪法吗?要宪法首先要制度观念,因为宪法无非是制订规章并向每个社会成员指出他所属的位置;为此它规定国家应由哪些阶层组成,并且规定每个阶层的位置、社会地位、

体制、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器的活动方向和国家管理的基本方针。如果谁也不想要制度,又怎样来管理一个民族呢?一个波兰国王(斯蒂凡·巴托里)有一次曾经感叹地说:“波兰人!你们之所以能存在,不是由于制度——你们是不承认制度的,也不是由于政府——你们是不尊重政府的,而仅仅是由于侥幸!”

而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现在。杂乱无章、道德沦丧——这就是波兰人的天性。不,最好还是让这个民族忍受棍打吧。这是天意。人类究竟怎么好,只有天知道!

因此,今天不能再保存波兰人!”³⁵²

目前的战争看来是要实现老元帅克奈泽贝克的心愿,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扩大和巩固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在法国整个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³⁵³,曾经产生过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拿破仑主义意味着废除把欧洲置于俄国正式托管下而把法国置于欧洲的“公共监督”下的维也纳条约。现在这位模仿自己的伯父^①却总是遭到自己无法摆脱的处境的无情嘲弄的皇帝向全世界证明,拿破仑主义意味着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使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而是为了使土耳其服从这个条约。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存维也纳条约,而借口却是削弱俄国的实力!

这就是巴黎的那位使拿破仑观念死灰复燃的人所解释的真正的“拿破仑观念”。^② 英国人作为第二个拿破仑的骄傲的同盟者当然认为,他们有权像老拿破仑的侄子对待老拿破仑的观念那样来对待老拿破仑的名言。因此,当我们读到一位现代英国作家(邓洛普)的著作时就不应当感到惊讶,在这部著作中谈到,拿破仑曾经预言,同俄国进行的下一场战争会包括一个重大的问题:欧洲应成为“立宪的还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指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

是哥萨克的”。^① 据说拿破仑在衰落帝国¹⁶⁵形成以前这样说过：“共和的还是哥萨克的”。^② 然而人总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由于《论坛报》对维也纳条约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欧洲“制度”赞扬不够，人们竟指责它背叛人权和自由的事业！^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7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
- ① 亚·格·邓洛普《哥萨克的统治和俄国对欧洲和德国的影响》1855 年伦敦版第 21 页。——编者注
- ② 艾·奥·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日录》1823 年巴黎版第 3 卷第 80 页。——编者注
- ③ 最后这一句话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
——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³⁴⁰

伦敦,6月20日。波拿巴在《立宪主义者报》上^①宣称的局部战争,就是在黑海上的战争,其目的是消灭俄国在黑海上的所谓优势。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海上的优势从来没有得到过验证,甚至对土耳其人也是如此。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这一边从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那一边沿切尔克西亚海岸直到巴拉克拉瓦和叶夫帕托里亚,全部海岸线都已经从俄军手中夺过来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守,卡法已受到猛攻,塞瓦斯托波尔则由于所处的位置,只要一遭到严重威胁必将失守。不仅如此,联军的舰队正横扫亚速内海;他们的轻型船舰曾向北直抵塔甘罗格,并且袭击了所有沿岸重镇。除了从彼列科普到多瑙河这一段,即除了俄国在这个沿岸地区的大约十五分之一的领地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段海岸留在俄军手里了。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经攻克,克里木已经落入联军手中,那

① 指 1855 年 6 月 18 日法国半官方报纸《立宪主义者报》第 169 号发表的该报主编阿·德·塞桑纳论述克里木战争的目标与前景的文章。——编者注

又将怎样呢？俄国是不会缔结和约的，这一点它已经公开宣布过了。它这样做就等于是发疯，就等于在主力正好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却因前卫被击退而放弃战斗。而联军方面下一步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联军可以摧毁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他们可以向前推进，派一支大军在敖德萨登陆，在那里设防坚守，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军的进攻，然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他们还可以分兵到高加索去，消灭驻守在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其他领地的那支俄军（这支军队由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并且切断俄罗斯帝国同它的南亚领地的联系。但要是俄国还不缔结和约呢？只要敌人还在它的领土上，就不可能议和。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从未缔结过一次丧失领土的和约。甚至蒂尔西特和约³⁴³都给俄国增加了领土，而这个和约是在连一个法国人没有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缔结的。刚刚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不会试图去做甚至对尼古拉来说也是危险的事情。他不会突然破坏帝国的传统。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领而且驻扎了5万联军，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领地上的俄军已被肃清，一支联军把俄军阻止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线，敖德萨已被占领并且变成了一个设防营地，驻有10万军队，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和伊兹梅尔也都被联军摧毁或占领。如果是这样，联军是否就只限于守住自己的阵地，并把希望寄托在消耗俄军的力量上呢？联军在克里木和高加索因疾病将以很快的速度减员而来不及补充。他们集中在敖德萨的主力部队将不得不依靠舰队得到给养，因为敖德萨周围百英里的土地不出产任何东西。联军胆敢越出自己的营地就会遭到俄军首先是哥萨克的袭扰。迫使俄军进行会战是不可能的。俄军总是具有可以把联军朝本国腹地吸引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对联军的每一次向前推进，他们都将以缓慢的后

撤来对付。可是，让一支大军长期待在营垒里无所事事是办不到的。疾病以及逐渐滋长的纪律败坏和军心涣散现象，将迫使联军采取某种坚决的行动。可见，占领沿海重镇，然后等待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作出让步，那是行不通的。这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要想控制海岸，仅占领沿海重镇是不够的。只有占领内地才能确保对海岸的占领。联军如果在俄国南部海岸站住了脚，这一情况将迫使它向内地推进。可是困难也就在这里开始了。北至波多利亚、基辅、波尔塔瓦、哈尔科夫诸省边界，是一片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平原，灌溉条件很差，除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而且在夏天的酷热之后就连野草也没有了。假定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都变成作战基地，那么联军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这个目标只可能是莫斯科，而莫斯科却远在 700 英里以外，进军莫斯科需要 50 万人。但是这一切不仅需要奥地利严守中立，甚至还需要它在道义上给予支持。但这个大国现在站在哪一边呢？在 1854 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声明，它们将把俄军向巴尔干山脉的推进视为宣战理由。³⁴⁴那为什么在 1856 年它们不会把法军对莫斯科或者甚至对哈尔科夫的进攻视为宣战理由呢？一刻也不应当忘记，任何一支军队由黑海向俄国腹地推进，其翼侧都是暴露在奥地利面前的，同俄军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进完全一样，因此在一定的距离上，它的交通线和它的作战基地，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捏在奥地利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联军能够进入俄国腹地去对俄军进行无益的追赶吗？这是蠢举，是纯粹的蠢举，但却是波拿巴最近的“局部战争”计划的必然后果。无情的辩证法使得“局部战争”在各个点上都超出原定的地界而变成“大”战，只不过没有大战的前提、条件和手段而已。但是波拿巴的最新“计划”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认，要进行对俄战争，舞台上必须出现其他力量，

复辟的帝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不得不将一场只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的对俄战争转而在局部范围内进行。拿破仑的对俄战争转向“局部战争”的这种变化,超过“拿破仑观念”^①在复辟的帝国所经历的所有奇异的变化。

在今晚恢复的关于行政改革²⁸²的辩论中,布尔沃代表托利党⁷³提出的修正案³⁵⁴使政府能够以七票对一票的多数击败“行政改革派”。辩论从头到尾都带有小官吏的性质,它一分钟也没有超出这一特点。大谈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的详情细节,议论“最优等考试”的问题,对轻视功绩抱怨不已——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的。人们以为,这是在听取一位下级林务官向尊敬的阁僚们提出的书面申诉。格莱斯顿肯定地说,阿伯丁心中也赞成改革官僚制度。迪斯累里肯定地说,德比也是如此。帕麦斯顿则肯定地说,我的内阁也一样。因此,西蒂区的先生们^②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改革、开导、改组我们的官厅。不劳您大驾了!

英国资产阶级在自己过去的鼓动运动中曾出其不意地压倒执政阶层,并且吸引群众同自己唱一个调子,因为它在自己的纲领里走得要比自己的实际目标远一些。这一次它在自己的纲领里甚至不敢提高到实际目标的水平。你们一个一个地保证说,你们不想推翻贵族,而只想同我们一起友好地修复政府机器!很好!以友谊对友谊!我们来为你们改革行政机关——自然不越出它的传统范围。“行政改革”并不像你们断言的那样是阶级之间争执的问题。它只涉及“实际事务”、“善意的”改革。我们要求你们让我们自己来制定行政改革的

① 这里是以讽刺的口吻影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52—355 页。——编者注

细节以首先证明你们的善意,因为这里只涉及细节。我们自己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走多远,既不使我们的阶级受到损害,又不因疏忽而把行政改革变成阶级之间争执的问题,也不使它失去仁爱的性质。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这种贵族的善意的讽刺语言,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用虚伪的语言同群众讲话的。贵族、内阁和反对派,托利党和辉格党⁷⁰,一分钟也没有误解行政改革派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这种鼓动早在进入议会以前就已经破产了。他们怎么能误解呢?尽管行政改革协会只允许特殊人物出席在德留黎棱举行的大会,尽管它的听众是经过三番五次筛选过的,但是它对任何民众的提案或者议程没有规定的发言都非常恐惧,以致主席在大会开幕时宣布:与会公众只是为了“听取程序单上所公布的发言人的讲话”,任何“提案”都不付诸表决,“因此也不能提出任何修正案”,不能“对已登记的发言人的名单作任何增补”。当然,这样的鼓动是不能对顽固的英国寡头政治发生作用并迫使它让步的。

前天晚上在下院宣读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⁷²,用软弱的空泛的语言掩盖了尖锐的问题。报告小心翼翼地谴责各个主管部门,例如军械局、军需部、医务部门等等。报告指责帕麦斯顿对民军管理不善,指责整个联合内阁发动塞瓦斯托波尔远征是轻举妄动。由于委员会在讯问证人时千方百计地回避寻找惨败的真正原因,它自然也就不得不在报告中老是摇摆不定,不是泛泛地指责政治领袖,就是琐碎地列举行政机构的缺陷。一般说来,委员会完成了它作为减轻舆论压力的安全阀的任务。

所有报纸都对俄国人在汉科进行的“屠杀”³⁵⁵发出了愤怒的叫喊。然而《纪事晨报》承认,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等地,英国

人利用挂着军使旗的船只用探锤测量海洋深度,并且侦察俄军的阵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20日

载于1855年6月23日《新奥得
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
关于汉科暴行的辩论³⁵⁶

伦敦,6月22日。《梦行者》^①第二幕刚演完,德留黎梭剧院的幕布刚落下,突然响亮的击鼓声把拥向小卖部的观众又召了回来。幕布重新升起,剧院经理走上舞台,用演戏般的夸张语调激动地说了下面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地向你们宣布一件大事:联军已经占领塞瓦斯托波尔。”³⁵⁷

全场沸腾,为胜利欢呼,乌拉,万岁,花束如雨。乐队奏乐,观众齐唱《天佑女王》、《统治吧,不列颠》和《向叙利亚出发》^②。从上层席位上发出了“唱《马赛曲》!”的喊声,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剧院

① 意大利作曲家文·贝利尼创作的歌剧。——编者注

② 这三首歌分别是英国国歌、英国爱国歌曲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在官方庆典上经常演奏的歌曲。——编者注

经理的即兴讲话是以一则电讯^①为根据的,可是这则电讯没有报道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事,倒是报道说,6月18日法军强攻马拉霍夫冈和英军强攻大凸角堡都被击退了,而且损失惨重。³⁵⁸这位演员昨天晚上在德留黎棱的舞台上是在仿效另一个演出经理³⁵⁹,这个人大约在一年前的一次大型的军事闹剧中间曾即兴讲了一句出人意料的和令人难忘的话:“先生们,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占领了!”

伦敦,6月22日。佩利西埃继续坚持不可思议的固执态度,单方面攻击南区,致使联军兵力不断损耗。据说,这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大家知道,波拿巴以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为担保已经开出了几十亿票据,而且让法国国民来贴现这些票据。他还打算再发出8个亿或大致这个数目的票据。因此,分期偿付已流通的票据看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说,越过黑河^②已经有了实际的结果,那么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可以保证表面上的辉煌成就。“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会对发行新公债³⁶⁰产生良好的广告效应;既然为战争可以发行公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为公债进行战争呢!在这样的论点面前,任何军事科学评论都得把嘴巴闭上。总而言之,在克里木战争³²和巴黎交易所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电线都汇聚到土伊勒里宫,在这里最后成了“内阁的秘密”。人们已经注意到,巴黎发表最重要的电讯要比伦敦迟几小时。据说,在这几小时内,一个名字叫奥尔西的科西嘉人就在

① 这实质上是英国外交部的正式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7—428、443页。——编者注

巴黎交易所内大肆活动。在伦敦尽人皆知,这个奥尔西曾是当年的被放逐者^①在伦敦交易所的“命中注定的”代理人。

如果说英国内阁已经发表的邓达斯海军上将的电报还不足以证明,俄军的汉科屠杀³⁵⁵以在哥萨克号巡航舰的小艇上的军官或船员滥用军使旗为借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俄国残废者》的叙述就打消了在这点上的任何疑问。显然,俄国人没有料到有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水兵从那里活着回来,并且还会提出反驳他们的证词。因而《残废者》认为没有必要控告英国船只从事间谍活动、探测等等,并即兴编造了一套自己的说法^②,它同神父西哀士一样深信“死人不会说话”^③。昨天上院讨论了这个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泰晤士报》的论断:“这个出于习惯和原则一向冷静持重的上院”这一次却真正义愤填膺,激动不已。我们看到,口头上装腔作势地表示愤慨,而实际上却温情脉脉地关心着“俄国的荣誉”,谨小慎微地防止民族复仇。托利党⁷³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伯爵站起来,简略地分析了一下事实情况,然后激动地说道:

“我把英国历史翻了一遍,找不到这样残暴行为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欧洲每一个军官、每一支军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彻底追究这次事件,使这次罪行的实施者受到应有的惩罚。”^④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 指1855年6月1日《俄国残废者》第118号和1855年6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86号刊登的有关汉科事件的报道。——编者注

③ “死人不会说话”是一句俗语,1793年1月17日法国国民公会就处决路易十六一事进行表决时,据说西哀士神父说过这句话。——编者注

④ 詹·马姆兹伯里《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编者注

辉格党的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声明,他同自己的同僚一样“愤慨”。这个如此骇人听闻和无与伦比的暴行同文明国家的风俗习惯如此格格不入,可以设想,它的实施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长官的命令或在他们长官同意下干的。很可能这 500 名俄军的指挥官不是有皇家委任状的军官(所有英国军官包括尉官在内都有委任状,但是军士和士官没有)。因此可以相信,俄国政府并不同意这种行动。为此他已责成英国驻哥本哈根公使^①通过丹麦驻彼得堡公使^②向俄国政府表明,英国内阁十分殷切地期望知道,俄国政府已经采取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表明自己对这种行动的态度;这种行动如果发生在太平洋某一个野蛮的岛屿上,也许不会引起任何惊讶,但发生在文明的欧洲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俄国政府对此不予以严厉的和应有的惩处,它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报复。克拉伦登最后表示,英国内阁期待着俄国方面的声明,以便据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科尔切斯特勋爵认为,

“每逢发生这种事情,指挥官的职责就是通过打着军使旗的军使同他所能找到的俄国最高当局取得直接联系,向它说明情况,并要求谴责这种罪行”。^③

马姆兹伯里勋爵再次站起来发言,声称他总的来说同意政府的行动,但是当听到克拉伦登说出“报复”一词时,他就不寒而栗了。英

① 安·布坎南。——编者注

② 奥·普莱森。——编者注

③ 查·阿·科尔切斯特《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编者注

国不能同俄国人一般见识。它必须从道义上对沙皇^①进行报复,必须唤起欧洲各国宫廷都对彼得堡宫廷提出抗议,从而使俄国受到国际的判决。一切带有“报复”性质的办法只能加深公众的“反感”。英国内阁的挂名主席格兰维尔伯爵对这位托利党人的话如获至宝,并且像基督徒似的祈求:“不要进行任何报复!”

《泰晤士报》所说的上院里这种激动究竟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位托利党人义愤填膺地提出质问。那位辉格党⁷⁰人的愤懑情绪更为强烈,但自己同时却在给俄国政府暗示辩护的理由,给它指出一条出路:抛出一个下属充当牺牲品。他低低地说一声“可能”要报复,来掩饰自己的退缩。科尔切斯特勋爵想用再派一个打着军使旗的军使去同俄军接洽的办法来惩罚俄军杀害打着军使旗的军使的暴行。这位托利党人再次站起来发言,诉诸道义而非报复。那位辉格党人看到摆脱报复了,即使只是可能,也感到高兴,随声附和说:“不要进行任何报复!”真是一出喜剧。上院为了掩护俄国而置身于人民的激愤情绪和俄国之间。唯一举止不得体的上院议员是布鲁姆。他说:“如果说国家什么时候号召过流血的话,那就是现在。”至于谈到英国对“报复”,对“报复权”的敏感性,马姆兹伯里勋爵把英国历史翻了一遍,却没有找到关于爱尔兰、印度和北美的那几页!除了对待俄国,英国的寡头政治曾经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温情脉脉呢:

在向议院宣读过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⁷²中,最后一段话,罗巴克提出的由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一段话被莫名其妙地删掉。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在情报不充分的情况下筹划和着手的行动，又是在缺乏足够的防范措施和足够的慎重的情況下去完成的。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我军在克里木遭到不幸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2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5、26 日《新
奥得报》第 289、29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1855 年 6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2084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六月十八日的失利。

——增援部队³⁶¹

伦敦,6月23日。6月18日滑铁卢会战³⁰纪念日这一次自然不是在伦敦举行。本来打算在克里木通过一次不是对法国人的胜利,而是同法国人一起取得的胜利来庆祝这个日子。这个事件之所以特别耐人寻味,是因为威灵顿的助手拉格伦在一定程度上是听从拿破仑第三的一个将军^①的命令来进行指挥。题词已经拟就,只是本应使题词永垂不朽的事件却不作美。在复辟帝国的历史上,人们一眼就会看出那种致命的癖好:通过一个第二修订版来肯定成绩、否定失败,从而使帝国的伟大日子重现光辉。让拿破仑的日子光荣复活,在过去反对共和国的战斗中一直顺利,在目前反对外敌的战斗中却遭到了破灭。没有帝国胜利的帝国使人联想起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改写,经过改写,不仅见不到丹麦王子的忧郁心情,而且连丹麦王子这个人都没有了^②。巴黎原定在1854年12月2日^③在克里木建立军事上的丰功伟绩。

① 阿·佩利西埃。——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一句在英国很流行的话:“这是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意即在某件事情中缺少了主要的东西。——编者注

③ 1854年12月2日是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三个周年纪念日。
——编者注

但由于多雨和弹药不足而化为泡影。1855年6月18日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演出本应有另一种结局的修订版滑铁卢会战。结果是法英军队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失败。³⁵⁸

伦敦的气氛阴沉,有价证券下跌了,帕麦斯顿在一天之内就把他在几个月内利用极其巧妙的策略所获得的东西又丢掉了。遭到失败的那天是6月18日,报告失败消息的电报到6月22日才发表。上星期四官方报纸《地球报》按照帕麦斯顿的指示声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的晚间会议上郑重地重复了这个保证。现在已弄清楚,他早在6月20日星期三午后4点钟就接到了电报。《先驱》断定拖延发布的原因在于巴黎的坚决要求,在巴黎人们把战场上的失利变成了交易所中的成功。不管怎样,伦敦佬却对帕麦斯顿大为恼怒。被打败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大臣们的狡猾手段竟使人们在德留黎棱剧院和科文特园剧院中令人发笑地欢呼庆祝塞瓦斯托波尔的占领^①——这太不像话了,先生!

我们已经明白地预先告诉读者,佩利西埃坚持强攻南区的固执态度是联军失利的预兆。当他接受指挥权时,我们还指出过一个可以谅解的情况,即运输工具的不足会使佩利西埃在野战中遭到很大的困难。^②这两种情况现在在英国报刊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今天的《先驱晨报》中谈到:

“军队不能投入野战——而按照一切战略规则它本应当出动去粉碎驻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辅助部队。军队不能投入野战的原因是:上级的致命作风——玩忽职守和拖延时间——又在这里起着破坏作用,我们本来需要28000头役

① 见本卷第491页。——编者注

② 指由马克思从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一文翻译而成的《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参看本卷第455—462页。——编者注

畜,可是我们手里只有4 000—5 000头;而且这一切又是在疾病再度悄悄地蔓延到已经蕴藏着寒热病、霍乱和鼠疫病原体的兵营里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正像在瓦尔纳和死亡盆地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乃是我们的将军们不得不每天在对几乎是无法攻克的土堡作绝望的攻击中摧残我们士兵的生命的原因,而应当投入野战的精良部队由于缺乏骑兵和运输工具只好在黑河边按兵不动。”^①

刚刚公布的财政报告再一次证明了战争初期内阁在利用交给它支配的资金问题上采取了极端疏忽大意的态度。根据这个官方报告,到1854年1月1日,在拨给军队的款项中库存金额有1 835 882英镑,而到1854年4月1日,用在军队上的数目总共只有227万英镑;这样,招募新兵所用的钱还不到议会所表决拨付的数目的四分之三。根据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⁷²,军队覆灭的原因是什么呢?——疲劳过度。而疲劳过度的原因又何在呢?——兵员太少。而兵员太少,就像财政报告所表明的,是由于内阁搞阴谋的结果。可是阿尔伯特亲王还埋怨说女王^②自己没有掌握军队!说内阁的两手被束缚住了!^③在关于莱亚德提案³⁴⁷的辩论中揭露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内阁,一方面埋怨运输工具不够,一方面却派遣运输船只经过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到朴次茅斯去装运煤炭,或是派遣船只从克莱德河到利物浦、从德特福德到伍利奇,让检查员去进行巡视。

由于6月18日的失利,必须火速派遣增援部队。根据这种情况,昨天发布了命令,要不久前从锡兰回来的第十五步兵团立即登

① 1855年6月23日《先驱晨报》第22465号。——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71—473页。——编者注

舰；第五十一皇家轻步兵团，第八十和九十四步兵团，由各个后方连组成的原来预定派往印度的所有小部队以及 1 200 名骑兵必须立即开往战区。同时打电报到马赛命令急速调汽船给马耳他岛总督和直布罗陀总督以及伊奥尼亚群岛的高级专员使用，以便在派去换防的团和民军到达以前，利用这些船只把驻防军和近卫旅预备队的全部适于执行任务的人员以及一切可以调出来的预备营都调出来。而且要立即从直布罗陀调出第十三轻步兵团，从伊奥尼亚群岛调出第三十一步兵团，从科孚岛调出第四十八步兵团，从直布罗陀调出第五十四、第六十六步兵团和苏格兰高地的第九十二步兵团。这样一来，英国在克里木的兵力就将增加 13 000 人以上。此外还应加上四个野炮连、一个骑炮队以及攻城炮队的增援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只等待运输船只。然而英国现在就处在 1854 年的状况。它没有后备部队。而且情况比 1854 年更糟糕。在 1854 年，正如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断言的，帕麦斯顿阻挠建立民军，迟迟不实行这一措施，而在 1855 年，已经建立起来的民军几乎被他解散。从上面所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增援部队不仅吸干了军队的主力，而且还吞掉了后方营和骨干。这样，英国的处境就类似于孟德斯鸠著作^①中的那个野蛮人，他为了获取树上的果子，把树也砍倒了。这个最道地的节俭的国家所花费的是它的军事资本，而不是利钱。阿尔伯特亲王要求给予绝对信任的内阁玩弄手腕的结果就是这样！大陆上流行一种看法，说英国人口太少，提供不了军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在 1815 年，即在 22 年的战争⁸以后，英国的武装力量在 35 万人以上！然而内阁却故意忽

^①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5 章和第 13 章。——编者注

视这样两种办法：提高常备军的薪饷和征集民军！1827年，利文公爵夫人偿还了这位首相的债务，1830年公爵夫人又使他当上了外交大臣，首相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⁴¹使俄国对土耳其实行了八年的统治，而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期满前一星期又在达达尼尔海峡条约⁴²中使前者继续有效——对这样一位首相还能期望什么呢？

昨天罗巴克在下院宣称，7月3日（下个星期二）他要提出下列提案：

“议院对军队在克里木的冬季战局中遭受苦难深感悲伤，它同意它的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意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使军队遭到灾难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因而它严厉谴责这个内阁中由于自己的建议而导致这种悲惨结局的每一个成员。”^①

这样，罗巴克的提案就有意识地把帕麦斯顿、罗素、克拉伦登、格兰维尔和兰斯唐——这些既是本届内阁的成员同时又是上一届内阁的成员都包括进去。这个矮小的、刻薄的、与瑟息替斯很相像的，但又是老练的、完全掌握了议会策略的律师，是迫不得已提出这种提案的，因为他的设菲尔德选民鉴于他在星期二指责过帕麦斯顿而在星期四又投票信任同一个帕麦斯顿而发出威胁，要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对他投不信任票。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和议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倒霉的干涉以及他对议会自主权的挑衅行为，是提出这个再一次威胁女王要夺去“她所信赖的仆人”的提案的第二个原因。

① 约·阿·罗巴克《1855年6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88号。——编者注

关于行政改革派²⁸²最近的活动和命运以及教士们的阴谋,我们下一次再谈。^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新奥得
报》第 29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503—510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反教会运动。——海德
公园的示威³⁶²

伦敦,6月25日。历史上有一条古训说,过了时的社会力量,在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消失之后,在名义上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因为在写出讣告和公布遗嘱之前,继承者们就为争夺遗产而吵闹起来;这种社会力量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之前还要再一次竭尽全力,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行不通,而且早已受到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教会的表现就是这样。在国教会内部,高教会派³⁶³和低教会派³⁶⁴内部曾无数次地试图改组,试图与非国教徒²¹³和解³⁶⁵,以便集中力量来同全国不信上帝的群众相对抗,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一个紧跟一个地出台。从前那位以阿什利勋爵闻名的虔诚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上院悲痛地宣布:仅仅在英格兰就有500万人不但完全疏远了教会,而且疏远了基督教。国教会答道:“强迫他们进来”^①。国教会让阿什利勋爵和那些像他一样的非国教的、宗派主义的、兴奋过

①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编者注

度的信徒们从火中取出它想吃的栗子。

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啤酒法案⁵⁹；这个法案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诚的先生们答应伦敦的大啤酒店主继续维持特许证制度，即继续维持大资本的垄断从而换取了他们的支持以后，在下院会议快结束时会场上议员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偷偷地通过的。然后就是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这个法案现已在下院三读通过，个别条文刚刚在下院全院委员会³⁶⁶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肯定又能得到大资本的赞成票，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非常愿意假手议会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竞争。在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而且在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宗教的惩治法律是为了对付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的良心得到安慰。啤酒法案对贵族俱乐部并无妨碍。正如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并不影响上层阶级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级星期六很晚才领到工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他们而存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们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级。在18世纪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是给我们的，弥撒和什一税是给人民的。到了19世纪英国贵族说：虔诚的话由我们来说，基督教的实践由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代圣徒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答自己的肉体；现代有教养的圣徒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答世人的肉体。

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贪图享乐的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这个联盟，这个靠啤酒大亨和垄断大商人肮脏的利润算盘来维系的联盟，昨天在海德公园引起了自乔治四世这个“欧洲第一位绅士”死后伦敦从未

有过的群众示威。这个示威我们从始至终都看到了,如果我们说,英国的革命昨天已在海德公园开始,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夸大其词。最近从克里木传来的消息^①,对于这个“非议会的”、“议会外的”和“反议会的”示威来说是一块主要的酵母。

人们向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的起草人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提出了谴责,说他的法律只是针对穷人而不是针对富人,而格罗夫纳勋爵这样回答道:

“贵族已经极力克制自己,在星期日不使唤他们的仆人和马匹。”^②

上周的后几天,在伦敦的墙上到处可以看见宪章派¹⁹²用大号字体印刷的如下海报:

“新的星期日法案禁止读报、刮脸、吸烟、吃喝,以及穷人眼下还能享受的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饮食和休息。星期日下午,在海德公园将召开首都手工业者、工人和‘下层阶级’的露天大会,以便看一看,贵族究竟是怎样虔诚地遵守安息日制度的,他们究竟是怎样老实得像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的讲话所断言的那样,在这一天不让他们的仆人和马匹干活的。大会定于3点钟在瑟盆坦湖(海德公园里的一条小河)的右岸通向肯辛顿公园的路上举行。请来参加!并请带上妻子儿女!以便让他们也能从‘上等人’树立的榜样中吸取教益!”^③

人们应当知道,海德公园里沿着瑟盆坦湖畔的马路对于英国上

① 马克思在此指英国公众所期待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被再次拖延的消息。——编者注

② 罗·格罗夫纳《1855年6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4日《泰晤士报》第22080号。——编者注

③ 《在海德公园举行的露天大会》,载于1855年6月25日《纪事晨报》第27611号。——编者注

层人士正如朗香^①对于巴黎人一样，是他们在下午，特别是在星期日，带着大群仆役炫耀自己的豪华马车和服饰的地方，是他们遛马的地方。从上述的海报可以看出，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像英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斗争一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下等”人反对“上等”人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下午3点钟，约有5万人聚集在指定的地点，即海德公园瑟盆坦湖右岸的大片草地上。由于左岸的人不断涌来，聚集的人至少增加到了20万。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移动。在场的大批警察显然不想让大会组织者有个阿基米德为了撬起地球而要求的東西——支点³⁶⁷。终于，人数比较多的一群人把守住了一块地方，宪章派布莱就在这群人中间的一小块较高的地方站出来执行主席的任务。可是他刚一讲话，警察局督察员班克斯就带领40名手持警棍的警察走过来向他宣布，公园是王室的私产，不准在这里集会。于是进行了一番交涉，布莱试图向他说明，凡公园均属公共财产，而班克斯答复说，他得到严格的命令，如果布莱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将他逮捕。布莱随即在周围群众的怒吼声中喊道：

“女王陛下^②的警察宣布海德公园是王室的私产，女王陛下不愿把自己的地方借给人民开会，那么我们就到牛津市场去开会。”^③

人群一面讽刺地高喊：“天佑女王！”一面散开，前往牛津市场。可是在这时候，宪章派中央委员会³⁶⁸委员芬伦快步走到较远处的一

① 巴黎郊区的一个赛马场。——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③ 1855年6月25日《晨邮报》第25422号。——编者注

棵树旁。跟在他后面的那些群众转眼间就把他密密层层地围起来，以致警察只得放弃挤到他跟前去的念头。他说道：

“我们一个星期有六天受奴役，而议会还要抢走我们在第七天的一点点自由。这些和道貌岸然的牧师们勾结在一起的寡头和资本家，昧着天良杀害人民的子弟，使人民的子弟在克里木惨遭牺牲，他们自己不去赎罪，却要我们替他们赎罪。”^①

现在，我们抛开这一群人，去看看另外的一群人吧。那里有一个演说者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以这样平卧的姿势向听众讲话。忽然四面八方发出了喊声：“到马路上去，到马车那儿去！”这时大家已经开始冲着马车上的人和骑马的人辱骂。不断从城里获得增援的警察，赶开了在马路上闲逛的人们。这样，在警察的驱赶下，这些人就密密麻麻地站到了从阿普斯利大楼沿着瑟盆坦湖直到肯辛顿公园的要走一刻多钟的罗敦路两边，形成一个夹道。观众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工人，三分之一是资产阶级人士，全都带着妻子和孩子。而那些身不由己的演员，即那些坐着高大而华丽的马车、由身穿镶有边饰制服的仆役前呼后拥着的、温文尔雅的老爷和太太、上下两院的议员，以及年纪稍大的、葡萄酒喝得全身燥热的单个骑马的老爷，这一次却不能招摇过市了。他们在受夹道鞭刑。所有讽刺的、激愤的、侮辱的字眼（这些字眼在哪种语言里也没有像在英语里这样丰富）一起立即从两边倾泻到他们头上。这个音乐会是临时凑起来的，缺少乐器。因此合唱者们只好动用自己的器官，而且只限于声乐。讪笑声、嘘声、呼哨声、嘶哑的叫喊声、跺脚声、喃喃的埋怨声、咆哮声、高声尖叫声、呻吟声、呐喊声、哭诉声、咬牙切齿声，所有这些声音合成了一场魔鬼的

^① 1855年6月25日《晨报》第19972号。——编者注

音乐会。这是一种使人发狂、使石头有知觉的音乐。再加上爆发出来的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特地混杂在一起。唯一可以分辨清楚的喊声是：“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有一位太太为了使气氛缓和一下，从马车里递出一本老式手工装订的Prayerbook（祈祷书）。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地回答：“Give it to read to your horses!”（“给你们的马去读吧！”）当受惊的马前蹄腾空狂奔起来因而威胁着它们身上所负载的文雅的生命时，嘲笑声就来得更大、更猛、更无情。高贵的老爷和太太，其中有格兰维尔伯爵夫人，即一位大臣也就是枢密院院长的夫人，不得不走下车来，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当年纪大一点的绅士（他们穿的衣服，尤其是他们戴的宽边帽子，说明他们特别要装出一副笃信宗教的样子）骑着马走过的时候，就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样，怒吼声忽然变成了不可遏制的哄笑。这些绅士中间有一位忍无可忍了。他像靡菲斯特斐勒司一样做了一个无礼的动作^①——向敌人吐舌头。在路的一边有人喊道：“He is a word catcher! a parliamentary man! He fights with his own weapons!”（“这是个饶舌的家伙，是议员，他在用自己的武器打仗！”）路的另一边有人回喊：“He is a Saint! He is psalm singing!”（“他是个圣者，他是唱圣诗的！”）这时候，首都的电报通知所有的警察分局，说海德公园发生暴动，命令他们开赴战场。因此，过了不多工夫，就有一队队警察从站在阿普斯利大楼到肯辛顿公园的马路两旁的人群中间开过，人们每次都用下面这首民间小调来迎接他们：

“Where are gone the geese?
Ask the police!”

^①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魔女之厨》。——编者注

（“要问鹅哪里去了？
只有警察才知道！”）

这里暗指不久以前一个警察在克拉肯韦尔偷鹅那件尽人皆知的事情。这出戏持续了三个钟头。只有英国人的肺才能有这样大的功效。在这次演出中，在各个人群中都可以听到：“这只是开始！”“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恨他们！”等等。如果说我们在工人们的脸上看到的是愤怒的表情，那么我们在资产阶级的脸上看到的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那种怡然自得的笑容。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示威者们的激愤情绪更加强了。他们挥舞起棍棒要打马车，无休止的喧哗汇合成一句呐喊：“You rascals!”（“你们这些坏蛋！”）在这三个钟头里，积极的男女宪章派一直穿梭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传单上面用大号字体印着：

“改组宪章运动！兹定于下星期二，即6月26日在弗来尔街的文学和科学研究院民法博士会馆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参加首都的改组宪章运动会议的代表。自由入场。”

今天伦敦报纸关于海德公园的事件，一般只刊登了简短的报道。除帕麦斯顿勋爵的《晨邮报》以外，还没有一家报纸对此事发表社论。《晨邮报》写道：

“在海德公园发生了最可耻的、最危险的闹剧。这是公开违犯法律、不顾脸面的举动，是用暴力非法干涉立法机关的自由活动。必须防止下星期日再度发生有人已扬言要搞的此类闹剧。”^①

同时该报却又宣布“狂热的”格罗夫纳勋爵是这次骚动唯一“应

① 1855年6月25日《晨邮报》第25422号。——编者注

负责的”祸首和挑起这次“人民的义愤”的人。好像议会没有三读通过格罗夫纳勋爵的法案似的！也许高贵的勋爵也“用暴力”影响了“立法机关的自由活动”吧？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5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8 日《新奥得
报》第 29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³⁶⁹

伦敦,6月26日。昨天在下院的会议上奥特韦先生站起来问道:

“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采取某些措施以促使格罗夫纳勋爵撤回自己的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全场发出赞同的呼声)^①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如果我的高贵的朋友(格罗夫纳)听到了全场的这种赞同的呼声,那么,我想他是愿意听取这种呼声的。”(表示赞同的呼声)^②

显然,海德公园的群众示威吓坏了下院。下院拒绝了这个法案,并且强作欢颜。《泰晤士报》把海德公园星期日的场面叫做“正义的伟大报复举动”,把法案叫做“阶级立法”的产物、“有组织的伪善手段”,并取笑“议会的神学”。

关于汉科的屠杀³⁵⁵,海军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宣布,他今天收到了海军上将邓达斯的电报。据称,被俄军炮火击毙的有五名水兵和一名芬兰舰长,负伤被俘的有四名水兵和两名芬兰人,无伤被俘的有三名军官、四名水兵和两名芬兰人。海军上将邓达斯给赫尔

^① 1855年6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90号。——编者注

幸福斯的省督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实,并对炮击挂有军使旗的船只的残暴行为提出最坚决的抗议。邓达斯得到了答复,省督在答复中对这种行为表示道歉,并作了某种程度的辩白。他解释说,军官和士兵们供称,他们没有看见军使旗。因为在其他一些场合曾有船只悬挂俄国旗帜,而且报纸报道过,英国船只为了用探锤测量海洋深度曾在别的地方挂过军使旗,他们对此感到愤怒。这样一来,全部辩白都归结为俄国士兵和军官们的眼睛近视。不管怎样,俄国士兵能读报并且由于报纸的报道而感到“愤怒”,这已经是文明的标志。

行政改革协会²⁸²通知明天在德留黎梭剧院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和从前一样:凭票入场,演讲人是事先指定的。本丢·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①帕麦斯顿问道:功绩是什么?行政改革派回答说:功绩就是一个人的年收入。^②根据这一点,这些改革派在自己的组织内进行了改革。从前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实际上是自己选举自己的——表面上应由协会全体会员投票选出。而现在一个人每年向协会捐献50英镑以上,就自动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从前为了防止平民挤入“运动”,加上10个基尼和1个基尼的附带条件就认为足够了。现在10个基尼的先生已经不再足以“受人尊敬”了,而1个基尼的人们就完全被看做“贱民”了。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上是这样写的:

“仅凭发给协会会员的入场券入场。缴纳50英镑以上者为总委员会委员,缴纳10个基尼和1个基尼者为协会会员。”^③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节。——编者注

② 双关诙谐语:原文“Verdienst”既有“功绩”的意思,又有“收入”的意思。——编者注

③ 1855年6月23日《人民报》第164期。——编者注

由此可见,协会内会员的权利是按照所捐基尼的多少来计算的。这粗暴地宣布了基尼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统治。西蒂区改革派^①泄露了天机。怎么样的一些鼓动家!而且,近来他们时运不佳。德拉蒙德在议会内公开责备他们“一贯不道德”和“腐化堕落”。说明他们阶级纯洁性的例证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起初《柳叶刀》(医学杂志)举证说,销售各种假冒有毒商品和食品的决不只是小商人,批发商通常也干这类勾当。后来又披露,“受人尊敬的”西蒂区公司发行了假船坞仓库证。最后是斯特拉恩、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破产,这次破产是欺诈性的,与直接窃取寄存的抵押品有关。在后一事件中,贵族学会了去尊重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才能,因为这家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是受害者,克兰里卡德侯爵也是受害者,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尘世的财产,因为斯特拉恩、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以特别的虔诚而出名,他们有时在埃克塞特会堂主持“转变异教徒信仰”的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信用。他们是信教老爷们和独立基金会所宠爱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才能什么也不放过,孤儿寡妇的钱财也好,水兵们的几个小钱也好。为什么不让他们去管理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主要充当西蒂区改革派机关报的《每日新闻》忧郁地感叹道:

“现在在我们中间正出现一些预兆,这些预兆表明,应该尽快举出一件有关工业阶级非常不道德的行为的事例。”

^① 见本卷第 352—355 页。——编者注

斯特拉恩先生之流的危机自然造成了公众向西蒂区私人银行出纳处的“挤兑”。在这以前,这种私人银行具有的威信是股份银行远远比不上的。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查看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抵押品,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顾客来亲自查看信托给他们的动产。还有一个情况对西蒂区改革派先生们来得也极不凑巧,这就是,大家知道,他们的巨头之一路特希尔德正作为他们的当选代表站在下院的门坎,还没有被允许进入殿堂,因为他不愿宣读“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誓词”,而他的同僚约翰·罗素勋爵不想“实现”关于犹太人的法案。⁹⁹于是,昨天邓库姆发了言。他发现根据1782年的一项议会法令,每一个当选之后同政府订立任何供应合同的议员都要丧失在下院的席位,不久前路特希尔德提供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因此他宣布,明天晚上他要提出关于下令在西蒂区进行新选举的提案。不但如此。马林斯接着邓库姆发言,他宣布要对林赛提出类似的提案,因为在辩论改革问题时,查理·伍德爵士曾公开指责林赛同政府订立了船只供应合同,可是林赛现在是而且过去也是议员。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大出其丑的人竟然一个是西蒂区的巨头,一个是西蒂区改革派巨头!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提醒了公众,藐视1782年的法令的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正是把西蒂区的显赫人物,即议会内外的一些同政府订立贷款和供应合同的人物当做自己的靠山。这些金融贵族——在当时,比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更为腐败——曾是反雅各宾战争⁸的灵魂。当他们摘下赫斯贝里德姊妹的金苹果³⁷⁰时,他们在西蒂区的臭名昭彰的群众大会上向全国人民说明:

“为了把我们神圣宗教的美好安适从褻渎圣坛的法国人手中拯救出来,把自己从无神论的悲观绝望中拯救出来,要献出金钱和鲜血。”

这就使全国人民在最不适当的时候想到：现在起来反对寡头政治的西蒂区，恰好就是这个寡头政治赖以生长和开出绚丽花朵的温床。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新奥得
报》第 29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³⁷¹

出乎人们的意料,昨天早晨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中没有关于6月18日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受挫的详细报告。诚然,我们收到几篇仅仅涉及这次战斗中死伤人数的报道,这在下面将简略地加以评述。但是大家所期待的报道却没有,而我们终于收到的是佩利西埃将军关于攻占马梅隆和采石场的详细报告。不过就连这份报告也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位实际上在克里木统率着20万联军的人物在军事指挥上走的是什么路。如果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得出什么结论,那我们就得依靠反面的材料,而不能依靠正面的材料。要判断佩利西埃在作何打算,那我们就不要太注意他在干什么,而是必须注意他不干什么。但是,我们想再谈谈攻占马梅隆,此事有某些特点值得加以分析。^①

6月6日和7日,联军的炮群进行了全线轰击。这次轰击在左翼(自弗拉格斯塔夫棱堡至卡兰亭棱堡)仅是虚张声势,而在右翼(自

^① 本段应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本文由马克思译成德文,以《论克里木局势》为题,发表在1855年7月2日《新奥得报》第301号。在《论克里木局势》中,开头的一句话如下:“关于6月6、7、8日战况的官方详细报告,几天以前才到达这里。”——编者注

大凸角堡至萨蓬山)则是认真进行的。这里俄军的外围工事受到特别猛烈的轰击。6月7日傍晚,看来这些工事的火力已被压制到足够低的程度,守军的力量也被削弱到足够少的程度,于是联军下达了强攻的命令。由法军去夺取两个互不相连的阵地,它们是被一条深谷隔开的两个台地;由英军去夺取一个两侧都有深谷的台地。两支军队在准备强攻时采用的方法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传统。法军拿出4个师;每2个师攻打一个阵地,也就是,调集2个师攻打马梅隆绿地(堪察加多面堡),再调集2个师攻打萨蓬山。每个方向上都用2个旅以独立纵队的形式在前面打头阵,2个旅作预备队。这样就是18个营作前锋,18个营作后援——总共至少有28000—30000人。这种部署完全符合法军的操典和传统,他们在大规模进攻时总是列成纵队,有时队形相当庞大笨拙。英军如果以同样的战斗队形来完成自己的任务,那就需要2个师;2个旅担任强攻,2个旅作预备队。然而,他们却谨守自己的原则,派出了1000人左右担任强攻,这大约等于2个营,也就是说,几乎还不到法军半个旅的兵力。他们有强大的预备队,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法军要用3个人的地方,英军却只用了1个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军用横队而不用纵队的进攻方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国士兵在防御阵地上具有高度的顽强精神。这1000名英国士兵并不是一哄而上的,而是200人先冲上去,拿下了俄军的工事,然后200人被派去增援^①,其余士兵也都是这样投入战斗的。接着,1000名英国士兵在俄军阵地上一站住脚就抵住了连续六次进攻,而且是在俄军工事不间断的正面射击

^①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此处没有“然后200人被派去增援”一句。下一句中的“1000名英国士兵”为“这些英国士兵”,“连续六次的进攻”为“连续的进攻”。——编者注

和纵射炮火之下。到拂晓,英军伤亡过半;但他们守住了阵地,而且不时还有些英军追在俄军后面进了大凸角堡。1 000名法国士兵决不会取得这样的战果。英国士兵对炮火的忍耐力几乎是无限的。而且像那天夜晚那样,肉搏战简直就是他们最喜爱的消遣活动——街头打架,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感到如鱼得水,他们会一个打六个,无所顾忌,无比快活。

关于法军那边,佩利西埃将军给我们长篇大论地讲了参加攻击的各旅和各团的情况,对它们每一个都有褒奖之词;但是他对每个纵队各自的位置和攻击路线却说得很不清楚,战斗过程叙述得几乎不知所云,损失则根本没有提到。把这份官方报告同其他报道对照一下,我们便可知道:法军在第一次攻击时就夺取了马梅隆,追赶退却的俄军一直追到马拉霍夫棱堡,在多处冲了进去但被俄军逐出,马梅隆复失,于是在马梅隆的后面摆成半圆形阵势,发起第二次攻击,终于占领了这个地方。在基连谷的另一边,法军攻占沃伦多面堡时未受重大损失;争夺这个多面堡后面的色楞金斯克多面堡的战斗虽较为激烈,但决不能同争夺马梅隆的战斗相比。由于佩利西埃攻打这几个地方使用兵员人数之多超乎寻常,而且显然又是列成庞大的纵队,因此法军的损失一定很大。官方没有公布损失的数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依我们看来,如果把这次的损失估计为1 500—2 000人,并不夸大。^①

至于说到俄军,他们的处境特殊。他们不能派大量的士兵去守外围工事,如果那样,这些士兵会遇到还在强攻开始之前就被敌人炮火歼灭的危险。因此,他们在这几个多面堡里只能保持最低数量的

^①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守军,而且必须依靠马拉霍夫冈和大凸角堡上炮兵的俯射火力,还依靠要塞内预备队的行动。在马梅隆,他们有两个营,约800人。但是那几个多面堡失守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突入并加以固守。他们发现,被围攻的军队失去一个阵地可能很快,但要再把它夺回来就不容易了。^①此外,马梅隆多面堡构筑得非常复杂,那些护墙和掩体合在一起有点像临时性的暗炮台,所以那里的守军虽然能极好地躲避敌人的炮击,但在敌人强攻时却几乎束手无策,因为每个隔间只能勉强容纳一门大炮和所配备的炮手。因此只要大炮从炮架上卸下来,那些应在强攻时防守工事的步兵,就没有足够的地方用做射击位置来对强攻纵队同时进行猛烈的密集射击了。他们由于分散成小队,因此经受不住进攻者的猛攻。这又一次证明:俄国步兵在不能用众兵方式作战的情况下,在行动的迅速和机动灵活方面不如法军,而且也没有英军那种拼死的勇气。

在6月7日的战斗以后,平静了10天。在这段时间里,联军挖好了堑壕和交通壕,选定了炮兵阵地,备好了火炮和弹药。与此同时,向腹地派出了两支侦察队。第一支派往通向南海岸道路上距巴拉克拉瓦12英里处的拜达尔,只进行了初步的侦察。第二支派往靠黑河的乔尔贡以东6英里处的艾托多尔,这支侦察队取的方向是正确的。艾托多尔位于通往别利别克河上游河谷的高地上,正像我们早已指出的^②,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有效地迂回因克尔曼的俄军阵地。但是仅向那里派出一支侦察队,而不紧接着以强大的兵力去占领这一地区并立即开始战斗行动,那就只不过是给敌人指出危险来

①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此处没有“但是那几个多面堡……不容易了”这几句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5—392页。——编者注

自何方,而使之有所戒备。当然,也许是联军发现艾托多尔周围地区难以通行,但是我们对这点有怀疑;而且即使真的如此,在这次行动中也是过于明显地暴露了通过侧敌行军迂回敌人的意图。如果只是把这次侧敌行军作为一次佯动,那很好,但是我们深信,肯定是作为主要的行动,因此,联军不应当在真正付诸行动以前有所暗示。^①

可是佩利西埃将军不是把野战战场上的这些小规模佯动变为大规模行动,却要去干一种完全不同的事情。6月18日,滑铁卢会战³⁰纪念日那天,英军和法军齐头并进,在右翼对俄军阵地发起了强攻,英军攻打大凸角堡,法军攻打马拉霍夫冈。这是要洗雪滑铁卢之耻,但不幸事与愿违。两军都被击退,死伤惨重。官方公布损兵约5000人^②,但是人所共知,法军的报道一向是缺乏真实性的,因此我们估计这个数字还要高出50%。因为还没有拿到详细的材料,我们暂时只好把这次战斗的战术特点完全撇开不谈。我们现在能够加以研究的是它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欧洲的所有报刊都把佩利西埃描写成一个不听命于巴黎的电报而敢于按自己的判断行事的人。但我们有理由对这种独特的顽强精神持怀疑态度。他企图以“高尚”的方式,也就是以法军和英军的共同胜利,来洗雪滑铁卢之耻,这就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怀疑。要干出这样一件非凡业绩的想法只能出自法国的皇帝陛下——这是个迷信纪念日的人,无论哪一年的12月2日¹¹²,他从来不肯放过,而是非要

①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当然,也许是联军发现……有所暗示”这段话被缩减为一句话:“在这次行动中,通过侧敌行军迂回敌人的意图暴露得过于明显,俄军是不会看不明白的。”——编者注

②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没有关于伤亡的具体数字,这里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添加的。——编者注

搞一些奇特的把戏不可；他曾在贵族院说过，他的特殊使命就是洗雪滑铁卢之耻。毫无疑问，佩利西埃奉有严格的命令，必须隆重纪念滑铁卢会战。在这件事情上应由他来负责的，只是他所采取的那种纪念方式。^①

强攻军港区多面堡防线，应当认为是个错误，这一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不疑。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佩利西埃以前，对于每一个在我们远离战场的人看来显得可疑的情况，我们将仍然替他寻找辩解的理由。例如，也许是因为赫拉克利亚半岛²⁹的卫生状况恶劣——这是我们早就提请读者注意的一个问题^②——所以赶快结束那块狭小空间里的战事很有必要。在腐烂中的 25 000 具人尸和 1 万具马尸发出的恶臭，在夏季对于军队的健康有严重的危害。那里其他许许多多的可怕现象，我们就不谈了。也许佩利西埃认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俄军从南区赶走，将要塞彻底摧毁，只留下少数人在那里防守，然后再以强大的部队开始野战。我们作出这样的设想，是因为想从这位老兵的行动中找出一点哪怕是稍许合理的动机来。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他就是对塞瓦斯托波尔尔的坚固程度估计不

① 以上两段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被缩写为：“佩利西埃将军不是把野战战场上的这些小规模佯动变为大规模行动，却进行了 6 月 18 日的失败的强攻。他做此事是奉了曾在贵族院宣称‘自己的特殊使命就是洗雪滑铁卢之耻’的那个人的命令。佩利西埃只是对他执行此命令的方式负责。由于迄今尚未收到详细报道，目前还不能就这次战斗的战术特点作出判断。关于战略方面，任何一个小孩子现在都看得出，通向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捷径在于攻打因克尔曼和歼灭防守该地的俄军。”

自下一段开始至“俄军早就认识到必须增加克里木的兵力”这些内容在《新奥得报》上没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45—255、401—403 页。——编者注

足。我们那时曾说过^①，想扩大6月7日的战果去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那一定会遭到失败；我们的看法得到了战况的证实。我们说过^②，塞瓦斯托波尔的锁钥在因克尔曼以北；依我们看来，6月18日一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愿意承认，佩利西埃将军宁愿强攻军港区而不愿进行野战，是完全出于合乎逻辑的考虑；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人们在身处其境时很容易根据一些次要的事实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佩利西埃6月18日的受挫显然是因为受这一弱点的影响。因为，虽然顽强地坚持把正在做的事情进行到底是性格坚强的表现，但是同样可以说，只因此事已经开始所以就大走弯路继续进行下去，是缺乏才智的表现。佩利西埃无论如何都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看不到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捷径在于攻打因克尔曼和歼灭防守该地的俄军，那么他无疑是错了。

除非联军立即好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俄国早就认识到必须增加克里木的兵力。现在正规军的各预备营补充完毕，征集并组织了200个营的民兵，特别是奥地利的监视军已缩减到18万人——其余的或者已归休，或者已调驻帝国内地^③——这就给了俄国一个这样做的机会。结果在敖德萨组成了一个预备军团，其中约有25000人据说驻扎在尼古拉耶夫，距塞瓦斯托波尔约12—15天行程。又据说，两个掷弹兵师已由沃伦出发。因此到7月中旬，也可能更早一些，俄军就能够重新恢复数量

① 见本卷第459—46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③ 在《论克里木局势》一文中没有“18万人”这个数字，也没有破折号中间的话。——编者注

上的优势,除非在此期间同联军对抗的俄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诚然,据报道又有5万法军正在开往土伦和马赛准备登船,但是毫无疑问,等他们到来就已经太晚了,他们能起的作用恐怕最多不过是填补战斗和疾病(目前在联军营地重又出现)给部队造成的空缺。^①

亚速海上的行动破坏了俄军的一条供应线,但是由于第聂伯河是比顿河优越得多的俄国产粮区的天然出口,因此毫无疑问,在赫尔松有大量的粮食,比克里木俄军所需要的还要多。从那里运往辛菲罗波尔并不太难。因此谁期望亚速海的远征会立刻严重地影响塞瓦斯托波尔尔的粮食供应,那就大错特错了。^②

过去一段时间里向联军一方倾斜的天平可能又要恢复平衡了,甚至还可能向他们的对方倾斜。如果俄军行动迅速,克里木战争就决不能认为已成定局。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① 《论克里木局势》一文到此结束。——编者注

② 这一段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所加。——编者注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³⁷²

伦敦,6月30日。因为格罗夫纳勋爵拒绝自动撤回他的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所以今天伦敦最繁华的街道上出现了号召参加明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①的海报。当格罗夫纳问道:多数议员突然改变主意是不是受了海德公园平民的影响,下院热烈地回答说:不是!不是!^②下院的这种行为是相当幼稚的。

在回答一位托利党贵族的质问时,潘缪尔顺便提到:内阁以女王^③的名义向军队发出了一项文告,他们在文告中宣布大幅度增加那些正在战区的军和团的薪饷,不仅包括他们现在服役期间的薪饷,而且包括此前数月的薪饷,同时退休金也要增加。这件事暂且是以女王的名义宣布的,而这时下院正在开会,但是内阁什么也没有通知下院。这样,内阁便把按照宪法规定仅仅属于下院的权利——确定军队薪饷数额的权利攫为己有。不过,再过几个星期或几天,阁僚们还得在下院出现,以便使所许诺的增饷得到批准。但是文告已赶在

① 关于第一次示威游行,见本卷第503—510页。——编者注

② 罗·格罗夫纳《1855年6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091号。——编者注

③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下院表决前先走一步了。如果下院否决增饷要求,那么它就会同军队发生冲突。这就是对罗巴克委员会⁷²关于内阁要对军队所受灾难负责的判断的回答。这就是根据阿尔伯特亲王规定的方针^①所采取的一个步骤。

昨天在下院二读通过的包法利法案,对英国的商业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英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获得贸易公司一份利润的人,都算做股东,并因此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商业债务负责。按照包法利代表内阁提出的法案,这种法律职能应当废除。更为重要的是包法利关于股份公司的法案。到现时为止,这种公司的每个成员不仅对他的股份金额负责,而且也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全部债务负责。而现提出的一个法案规定,责任仅限于各个股东的股份金额,但是这个办法只适用于下述公司:全部资本最少为2万英镑,合同由股金不少于15 000英镑的股东签字,而且已投入的股金又不少于资本总额的20%。需要这类法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金融巨头多么牢固地操纵着立法权,金融巨头在世界上这个头等商业国家里已经能够使贸易合同受到最荒诞和最专横的法律限制。新法案宣称,它的原则是“使劳动和小资本家跟大资本(在商法中)处于同等地位”。这个原则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呢?方法是:少于2万英镑的股本不享受其中一项法律规定的优惠,而继续受到过去的限制。没有什么能够比英国的有关股份公司和一般贸易公司的法律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大资本不满足于它用来打击小资本竞争的优越的经济手段,在英国还求助于法律上的特权和特别法。例如几年以前,还规定银行不得有六个以上的股东。在股份公司取得以它的

^① 见本卷第471—473页。——编者注

董事会的名义起诉和应诉的权利之前,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为了享受这项特权,它们必须进行注册或者合并,而1837年的法律规定,王权应该根据商业部的报告才能批准合并,因此,某一公司能否合并实际上取决于商业部是否大发慈悲。银行、慈善协会、互助会等丝毫不受新法案的影响。

今天一家日报刊登了以下的议会统计数字:一共有327个选区^①。这327个选区受选举巨头控制的情况是:有1个选举巨头控制9个选区,有4个选举巨头各控制8个选区,有1个选举巨头控制7个选区,有3个选举巨头各控制6个选区,有8个选举巨头各控制5个选区,有26个选举巨头各控制4个选区,有29个选举巨头各控制3个选区;结果72个选举巨头控制着297个选区。所谓“独立的”选区仅仅有30个。下院总共有654名议员,其中594名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这594名议员中有274名不是贵族,就是贵族的直系亲属。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
30日

载于1855年7月3日《新奥得
报》第30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4卷翻译

^① 这327个选区不包括爱尔兰的72个选区。——编者注

弗·恩格斯
欧洲军队³⁷³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5 年
6 月底—9 月或 10 月

载于 1855 年 8、9 和 12 月《普特
南氏月刊》第 32、33 和 36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4 卷翻译

[第 一 篇]

近两年来席卷黑海沿岸的战争³²,使欧洲平时就保持着的 200 万军队特别为人瞩目,这些军队的数量可能很快就得增加一倍。如果战争仍继续下去——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将会看到这 400 万军队在两海^①之间横贯整个欧洲大陆的战场上投入激烈的军事行动。

因此,不仅对迄今已卷入东方冲突的那些国家的军队,而且也对欧洲其他较大国家的军队都作一评价,我们读者是不会不感兴趣的,特别是在大西洋此岸^②,我们还不曾有幸见到过哪怕是与欧洲二流军队规模相近的军队,所以我们公众中的外行人对这样一些军队的组织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从前每一个大国都出于猜忌而把自己军队的情况神秘地掩盖起来,如今已不再是这样了。说来也怪,在最不喜欢公开性的国家,一切民政部门至今仍然出于专制政体的需要而处于保密状态,但是军队的组织却完全为公众所熟知了。现在军队的编制都是公之于众的,不仅公布军队的各级建制,如军、师、旅、团、营和连,而且还公布这些军事单位的配置及其指挥官的人数和姓名。凡有大规模的检

① 波罗的海和黑海。——编者注

② 由于本文面对的是美国读者,“大西洋此岸”显然指美国。——编者注

阅,不仅容许甚至还希望外国军官参加;向他们征求意见,同他们交换观点,对各国军队独特的规章制度和发明创造都认真地加以讨论,于是一种公开的气氛就形成了,这种公开气氛与同一个政府的其他许多方面形成非常奇怪的反差。欧洲各国的陆军部现在真正能保守秘密的只不过是诸如火箭和信管所使用的几种化学制剂配方,而且就连这些配方也很快就为人所知,或者是被新的发明所取代。例如,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使用的配方就被黑尔先生的军用火箭配方所取代,这后一种火箭为美国军队所采用,现在英国军队也采用了。

由于这种公开性的原因,文明世界各国的陆军部在平时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事委员会,目的在于讨论一切新提出的改革措施的优点,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利用所有其他成员的经验。这样一来,几乎一切欧洲军队的体制、组织和一般管理制度就大体上趋向一致,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国的军队同任何别国的军队都是相近似的。然而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特别是不同的文明程度,却又造成了许多差异,使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各有其特殊的长处和短处。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成为同样优秀和干练的士兵;但是,尽管训练方法相同——这好像可以消除一切差异——各国士兵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同于对手而仍然各有所长。

这就使我们面对着不同国籍的爱国军人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哪一国的士兵最优秀呢?当然,每一个民族都热心维护本民族的荣誉;公众在一些可能极不准确但却极富爱国色彩的传奇轶事熏陶下,总认为本国的一个团就可以“吃掉”任何一个国家的两三个随便什么样的团。军事史,作为一门以正确评价事实为唯一要义的科学还很年轻,有关的著作数量还很有限。然而它是一门已确定的学科,它一

天一天越来越多地清扫着那些有如秕糠的无耻而愚蠢的大言狂语。惯出大言狂语,很久以来就是那些以歪曲所记述的每一件事实为本行专业的自命的历史著作的特点。过去,人们在编写一场战争的历史时,在由于已缔结和约而不能用钢铁炮弹轰击原先的敌人的情况下,却可以平安无事地用羞辱谩骂去轰击原先的敌人,在某种意义上单方面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①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军事史中有许多次要问题尚属未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资格因为它曾在某个时候产生过当时最优秀的士兵而自豪。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步兵、16世纪的瑞士士兵有一个时期曾号称无敌,就像继他们之后升格为“世界第一步兵”的优秀的西班牙士兵一样;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和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也曾一度相互争夺这一荣誉称号,到后来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军队把这两国军队都打败了,解决了这个问题;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吃了一次败仗¹⁶就又名声扫地,法国军队再度被公认为欧洲第一的军队。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军队在西班牙在某些情况下和在战斗的某些时刻表明自己胜过法国军队。拿破仑于1805年从布洛涅兵营³⁷⁴带到奥斯特利茨²²⁰去的军团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威灵顿无疑也知道自己在半岛战争²⁷结束时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威灵顿那时曾夸奖他的

① 在《普特南氏月刊》上这里加了一条注:“我们不能不指出,我国已经出版了一部一流的军事史。此书之所以堪称一流,是因为它立论公允,语言得体,对友对敌均能持公正态度,我们指的是里普利少校所著《同墨西哥的战争》一书。”注文很可能出自月刊编辑之手。该书1849年在纽约出版。马克思在1854年12月2日和15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曾谈到该书,并给予肯定的评价。但恩格斯对该书的评语,迄今尚未发现。——编者注

士兵说,他“凭着这样一支军队就无往不胜、无所不能”。但是,这枝半岛英军之花却在新奥尔良被击败³⁷⁵,而击败他们的只不过是既缺乏训练又没有组织的民兵和志愿兵。

从所有过去战争的经验中,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而且每个不抱成见、头脑健全的老兵都会证实这一结论,这就是:军事素质,就勇敢和善战这两点而言,在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间,总的说来都是相当均等的;各民族士兵的差别与其说在于他们能力的大小,不如说在于他们能力的特殊性质;在现今军事公开性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只有下功夫在国家的军事制度和资源利用方面多动脑筋,作出改进,有所创造,并发展那些为本国所特有的军事素质,只有这样,该国的军队才能在一段时间里跃居竞争者之首位。因此,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较高的文明程度使一个国家对它的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享有何等的优势。我们可以拿俄国军队为例。虽然它的士兵具备许多独有的一流军人素质,但是它却从未能取得超越文明欧洲任何一国军队之上的地位。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俄国人是会殊死奋战的,但是至少到目前这场战争³²为止,他们都是每战必败,不论敌军是法国人、普鲁士人、波兰人还是英国人。

在分别论述各国军队以前,需要作几点与它们全体有关的综合论述。

军队,特别是30万—50万人的大军队,它内部有着种种必要的区分,不同的兵种,有着人员、物资和组织方面的各种需要。所有这一切使得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团体,复杂到了非尽最大可能加以简化不可的程度。无法避免的繁杂部门如此之多,按道理不应该再由于人为的毫无意义的复杂化而增加了。然而,习惯和旧军队固有的那种讲究形式和排场的致命弱点,几乎在所有欧洲军

队里都使事情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每一个国家里,人员和马匹在体型、气力、性情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把轻步兵、轻骑兵和重步兵、重骑兵区分开来是必要的。要想完全消除这种区分,就是说要把具有天生相反的战斗素质的人员混合在一个部队里因而使这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那会削弱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两个兵种就自然而然地各自分为两支独立的队伍:一支由重体型的、不甚灵巧的人员(马匹也是如此)组成,主要用来进行大规模的决定性进攻和以密集队形作战;另一支由轻体型的和灵巧的人员组成,特别适合于散兵战,适合于担任警戒和前卫,适合于迅速机动等等。到此为止,区分得完全合理。但是,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除了这种自然的区分以外,各种区分之下又有区分,这些区分仅仅表现在光怪陆离的不同服装上,而且其理论上的借口经常被实践和经验所驳倒。

例如,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有一种兵,叫做近卫军,他们自命为军队的精粹,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所能征集到的块头最大的怪人。在这方面俄国和英国的近卫军是最突出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在两国的军队中比其他的步兵团队或骑兵团队更勇敢善战。拿破仑的老近卫军则完全不同,他们确实是军队的精粹,组建这支队伍时,完全不考虑体型。然而就是这支近卫军却削弱了军队的其他部分,因为它吸收了其中的最优秀分子。拿破仑有时也由于爱护这支无敌的部队而犯错误。例如,在博罗季诺³⁷⁶,他在决定性时刻没有把近卫军调到前面,结果坐失战机,使俄军从容地撤退了。在法国,除皇家近卫军外,每个营里也都有类似的精粹,由两个连组成,一个是掷弹兵连,另一个是轻步兵连。这样就使得一个营在战术上的机动复杂到了不必要的程度。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类似的部队。所有这

些精选的队伍除组织、服装与众不同之外，薪饷也比别人高。据说，这套办法能够激发士兵的雄心壮志，尤其对富于激情的民族如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些赢得如此殊荣的士兵留在他们各自的连里，而不是被当做妨碍一个营在战术上的统一和协调的借口，那么，上述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且效果也许会更圆满。

在骑兵方面还有更惊人的自欺欺人的蠢事。这里，把轻型和重型马匹的差别作为划分各类骑兵——胸甲骑兵、龙骑兵、马枪兵、枪骑兵、猎骑兵、骠骑兵等的理由。所有这些分类不仅毫无用处，实际上，这又使事情复杂到了荒谬的地步。骠骑兵和枪骑兵学的是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样子。但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两种骑兵是有其意义的；他们是本民族的军队，服装是本国的民族服装。而其他国家没有能够赋予这些特色以生命的那种民族精神，却要加以模仿，起码是可笑的。无怪乎在1814年，一个匈牙利骠骑兵回答一个称呼他为“伙伴”的俄国骠骑兵时说道：“不是伙伴，我是骠骑兵，你是小丑！”（“Nix Kamarad, ich Husar, du Hanswurst!”）另一种同样可笑的骑兵，是几乎在一切军队中都有的胸甲骑兵。实际上，这种骑兵连同他们的马匹，都被他们胸甲的重量（一副法国胸甲重22磅）弄得失去了战斗力；然而这种胸甲却不能抵御从150码距离射来的枪弹！所有的欧洲军队几乎都废弃过胸甲，然而由于拿破仑喜欢排场和迷恋帝王传统，在法国又采用了胸甲，不久，所有欧洲各国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做了。

除我们自己^①的规模不大的军队之外，撒丁军队是文明国家中唯一把骑兵仅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而不再细分，并彻底废弃了胸甲的军队。

① 这里“我们自己”显然指美国。——编者注

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野炮都有各种各样的口径,非常复杂。英军的火炮在理论上区分最多,共有8种口径和12种型号,但实际上,英国人由于物质材料储备雄厚,所以能够大大加以简化。例如在克里木,英军使用的几乎全是九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法军在最近几年中尽最大可能简化了炮兵,用一种轻型十二磅榴弹炮代替了4种不同口径的火炮,关于这种轻型榴弹炮我们将在有关的地方论述。在其余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火炮仍然还有三四种口径,炮架、炮车、车轮等的种种规格,这里就不说了。

技术兵种、工兵部队等等,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上司令部,它们的编制在各国军队中几乎相同,但英国军队除外,它的司令部完全不是独立的机构,这对它害处很大。至于其他次要的区别,我们将在各个有关的地方再谈。

我们首先来谈这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组织形式,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是欧洲各国军队的某种榜样。

一、法 国 军 队

目前的战争³²开始的时候,法国有基干步兵100个团(第七十六团至第一〇〇团直到不久前都称为“轻步兵”,但它们在训练和编制方面同基干团毫无区别)。每团有3个营,2个野战营,第三个是预备营。可是到了战时第三营很快就可以经过整编投入野战,而且还有个第四营,这个营是由3个营每营特设的后方连组成的,执行兵站的任务。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拿破仑甚至还组建了第

五营,有时还有第六营。不过现在每团只有3个营。每营由8个作战连(1个掷弹兵连,1个轻步兵连和6个中心连)组成;按战时编制每连有3名军官,115名军士和士兵。所以,一个法国的基干营战时编制约为960人,其中一个连(轻步兵连)专门用来执行轻步兵的任务。

担任轻步兵任务的特种部队由猎步兵³⁷⁷和非洲部队组成。猎兵在战前只有10个营,1853年增加到20个营,这样,军队的每个步兵师(4个团)在组编时差不多都可得到1个猎兵营。这些猎兵营每营有10个连,约1300人。专门在非洲服役的部队包括:朱阿夫兵¹¹⁷³个团共9个营、外籍军团¹¹⁸²个团或者说6个营、轻步兵6个营(其中有3个营是土著猎兵),总计21个营,约22000人。

骑兵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

1. 重骑兵或称预备骑兵12个团——马枪兵(披甲射手)2个团、胸甲骑兵10个团=72个中队;

2. 基干骑兵20个团——龙骑兵12个团、枪骑兵8个团=120个中队;

3. 轻骑兵21个团——猎骑兵12个团、骠骑兵9个团=126个中队;

4. 非洲轻骑兵7个团——非洲猎骑兵4个团、北非骑兵³⁷⁸3个团=42个中队。

按战时编制,预备骑兵和基干骑兵每中队190人,轻骑兵每中队200人。平时仅有差不多4个装备齐全的120人的中队,所以每次军队动员时,都必须召集大批归休兵回队并为他们准备马匹。在像法国这样缺马的国家里,不从国外大量输入马匹是绝对不行的。

炮兵经过不久前的改编以后,现有17个团:5个步炮团(执行驻守和包围的任务),7个基干团(在步兵师里执行任务),4个骑炮团和

1 个架桥团。步炮兵看来仅在紧急情况下投入野战。在基干炮兵中,炮架和前车的构造便于炮手在迅速移动时乘坐。骑炮兵的编制和其他炮兵相同。基干炮兵和骑炮兵共有 137 个连,每连 6 门火炮;还可能有 60 个步炮连作为预备队。总计有 1 182 门火炮。

除上述以外,炮兵还有 13 个工役连。

军队的专门业务部门包括:总参谋部,计有 560 名军官;要塞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和工程兵司令部,约有 1 200 名军官;3 个坑道爆破兵团,5 个驮载连,5 个辎重连,1 187 名医官等。军队的总数如下:

步 兵

基干步兵:300 个营和 300 个后方连	335 000 人
猎兵:20 个营	26 000 人
非洲部队:21 个营	22 000 人
共 计	383 000 人

骑 兵

预备骑兵:72 个中队和 12 个后方中队	16 300 人
基干骑兵:120 个中队和 20 个后方中队	28 400 人
轻骑兵:126 个中队和 21 个后方中队	31 300 人
非洲骑兵:42 个中队	10 000 人
共 计	86 000 人

炮兵和专门业务部门

1 200 门火炮	70 000 人
以上总计	1 200 门火炮 539 000 人

这里还要加上新组编的近卫军¹²⁰,兵力为 1 个步兵师(2 个掷弹兵团和 2 个轻步兵团)、1 个骑兵旅(1 个胸甲骑兵团和 1 个向导

团³⁷⁹)、1个猎兵营和4—5个炮兵连。此外还有由25 000人组成的宪兵部队,其中14 000人为骑宪兵。不久前又编成了2个步兵团——第一〇一团和第一〇二团,并且正在组编1个外籍军团新旅(瑞士人)。因此,法国军队按其目前的编制总共约有基干60万人,这可能就是对法军现有兵力相当准确的估计。

军队以抽签的方式在所有年满20岁的青年中征集兵员。估计每年可征集到约14万人,然而实际上平时入伍服役的仅有6万—8万人。其余的人在中签后8年内可随时征召入伍。此外,平时有一大部分士兵长期归休,所以就连已入伍的人员实际服役时间也不超过4—5年。这种制度虽然使实际服役的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却没有任何经过训练的预备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大陆战争,法国必须投入2—3个庞大的军团作战时,甚至在第二次会战中它就不得不把大批未经训练的新兵投入战场,而在第三次会战中,就会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军队素质的恶化。法国人学当兵真是容易得很,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把服役期限定得很长,从而使很大一部分可服兵役的青年失去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呢?

凡兵役制带有义务性质而服役期限又长的国家,出于欧洲社会的需要,都实行了这样的办法,即让较富有的阶级享有以某种形式出钱免除本人服役义务的特权。例如在法国,找人代服兵役的办法是法律所承认的,大约经常有8万这种代服兵役者在法国军队中服役。²³⁸他们大都是由所谓“危险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人很难控制,可是一旦被驯服,就会成为优秀的士兵。为了迫使他们服从,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他们对秩序和服从的理解有时是很奇怪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团里有大量的这种人存在,他们必定要在驻军中造成许多麻烦。根据这样的理由人们认为,最适合这些人的地点是

面对敌人的前线,因此非洲的轻装部队主要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例如朱阿夫兵几乎全都是作为“代役兵”入伍的。克里木战争充分证明,朱阿夫兵到哪里都保持着他们的非洲习惯——喜爱劫掠,在困难时刻更是胡作非为。已故圣阿尔诺元帅这位和他们气味相投的天才在他的阿利马河会战⁹的战报中说:“朱阿夫兵真是世界一流的士兵!”^①大概就是指此而言的。

法国军队的装备总的说来是一流的。兵器构造精良,尤其是马刀,它的式样很美观,虽然也许稍微长了一点。步兵的服装是按照法国和普鲁士同时实行的新制度置备的。挂子弹袋和剑或刺刀用的交叉式皮带已废弃。这些东西都挂在有两根背带的腰带上,背包则用两根带子舒适地背在背后,而不使用挎于胸前的旧式联结带。这样一来,胸部就完全不受束缚,因此现在的士兵已经一点不像在旧制度下被一种皮胸甲紧紧套扣起来的那种不幸的士兵了。服装式样简单朴素,但很美观;应当承认,不论在便服或军服的式样方面,法国人表现出的审美能力的确高于任何其他民族。蓝色的上衣或者叫做外衣盖住大腿,长及膝部,衣领低矮,前面开口;鲜红色的裤子肥瘦适中;轻便的军帽,这是迄今所设计出的最能表现军人气概的帽子;带护腿的皮鞋和穿着舒适的灰色斗篷——这全套军装简便实用,为欧洲各国军队所罕见。在非洲,他们头戴白法兰绒风帽以遮阳防晒,并发给法兰绒内衣。在克里木,士兵在去年冬季披着可以遮住头、颈和两肩的带风帽的厚呢斗篷。猎步兵全身衣服是灰色的,带有绿色镶边;朱阿夫兵穿着一种土耳其式的奇异服装,这种服装看来是为了很好地

① 阿·圣阿尔诺《驻阿利马河的总司令部。阿利马河战场。1854年9月21日》,载于1854年10月7日《总汇通报》第280号。——编者注

适应气候和他们所要执行的任务而制作的。猎兵和其他一些非洲步兵营装备米涅式步枪,其余的步兵装备普通的击发式滑膛枪。但现在似有增大装备线膛枪士兵比例的打算。

骑兵都是仪表堂堂,同其他许多国家的骑兵相比体重较轻,但决不因这一点而逊色。在平时的编制下,总的说来他们的马匹配备情况尚可,马是从国外运来的,或者是来自政府的养马场和把直到不久前还很不好的本地马种改进了的地区。但是一旦打仗,马匹的需要量突然倍增,法国马匹资源根本不够,势必要数以千计地从国外购买,但买来的马匹有许多很难用于骑兵。因此,只要战争的时间一拖长,法国骑兵的状况很快就恶化,除非政府能像1805、1806和1807年那样把盛产马匹国家的马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

炮兵目前装备的全是所谓由路易·拿破仑发明的新式轻型十二磅炮。但是,由于装药量等于实心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轻型十二磅炮在英国和荷兰军队中原已存在,由于比利时人已经在他们的榴弹炮内去掉了药室,由于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都习惯于在某些情况下用普通十二磅炮和二十四磅炮发射爆炸弹,因此路易·拿破仑的所谓发明,只不过是把这种轻型十二磅炮改装在普通的法军八磅炮的炮架上而已。然而法国炮兵由于这种革新显然得到了简化,并提高了效率,不过这是否影响炮兵的机动性,以及十二磅炮是否适于发射空心弹,还有待查明。不管怎样,我们听说已经发现有必要将更大口径的榴弹炮运送给在东方的军队。

法国军队的操典,是军人理智和陈旧传统的奇异结合。大概没有一种语言比法语更适于下达简洁、清楚而严厉的军令了。可是通常下命令时却又非常啰唆——本来用两三个词就够了,军官却必须喊一整句话,甚至是两句。演习弄得很复杂,操练方面有许多完全不

适用于现代战术水平的陈旧无用的东西。善于进行散兵战,看来是法国人天生的本领,但是在进行散兵训练时呆板保守,甚至与俄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骑兵和炮兵在操练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不过只要法国人一投入战争,情况就会很快地迫使他们抛弃所有这些过时的呆板方法。研究和采用新的作战方法以适应新的情况,谁也不及法国人来得那样快。

总的说来,轻装作战是法国军队最擅长的。他们可以说是欧洲最轻型的部队。哪国的军队平均身高也不像法国这样低。1836年,法国军队大约8万人当中,只有743人身高5英尺8英寸或在此高度以上,只有七人达到6英尺,足足有38000人身高4英尺10英寸半到5英尺2英寸!但是这些身材矮小的士兵不仅打仗出色,而且能够吃大苦耐大劳,其机敏灵活几乎为任何别国军队所不及。纳皮尔将军断言,英国兵是世界上身负重量最大的战斗动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在非洲的法国战士都带些什么,他们除了武器和个人被服之外,还背着帐篷、木柴、食品——这些东西在他们背后高高堆起,远远超过他们的高筒军帽,就这样,在炎热的阳光下每天行军30—40英里。现在请你们把平时军队中身高至少5英尺6英寸的笨拙的大块头英国兵同身高4英尺10英寸的短腿、灵巧的小个子法国兵比较一下吧!这种小个子法国兵虽然背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却仍旧是出色的轻步兵;他们擅长散兵战,善于疾走、迅跑、卧倒、跃起,同时装弹、射击、前进、后退、散开、集结并变换队形;他们不仅比“烤肉岛”^①上骨架高大的同行表现出双倍的灵活性,而且表现出双倍的才智。对轻步兵的使用在20个猎步兵团中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这些无与伦比的部队——其无

① 这是对英国的谑称,因为英国人喜食烤牛肉。——编者注

与伦比就在于其特殊的用场——被训练得能在敌军武器射程以内,以每分钟 160—180 步的一种叫做体操步的轻快步伐完成每一个动作。他们不仅能够跑步行进中每半个多小时才稍停片刻,而且还善于匍匐、跳跃、攀登、游泳等,一句话,凡是可能用得着的本领他们一概都掌握,同时他们的枪法也是一流的。在散兵战中,在同等条件下,谁能抵得住这些只要地形略有不平就能掩蔽自身的神枪手呢?

谈到法国步兵在密集队形中的行动,则法国人那种富于激情的性格既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害处。通常法国步兵第一次攻击的特点是有条不紊、迅速、坚决,甚至是狂暴的。如果占了上风,他们就是无可阻挡的。如果受挫,他们很快就整顿好队伍,重新投入战斗;但是在形势不利或者甚至在互有胜负的战局中,法国步兵很快就会丧失自己的坚定性。成功对一切军队说来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而对罗曼-凯尔特民族的军队尤其如此。同他们相比,条顿民族在这方面就具有无可争辩的优点。法国军队自从拿破仑一声令下动员起来以后,15 年间所向披靡,到后来打了败仗就一蹶不振了;而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打七年战争³⁸⁰时,多少次濒临毁灭,多少次吃了败仗,但最终却取得了胜利,像这样一场战争法国军队是决不能打胜的。1809—1814 年的西班牙战争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骑兵同步兵相反,他们在以密集队形行动方面比在执行轻装部队任务方面享有大得多的声誉。他们被认为是无敌的,就连纳皮尔也承认他们胜过当时的英国骑兵^①。威灵顿在一

①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1828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272 页。——编者注

定程度上也持同样的看法。说来也怪,这支无敌的骑兵却是由骑术很差的骑手组成的,他们在冲锋时总是只用快步,最多也不过是用轻跑步!但他们是以密集队形行动的,除非已有炮兵用猛烈火力为他们开好路,否则决不派他们上阵,而且必须是大队人马才能派出。这样,只要有勇气,有必胜的决心就行了。现在的法国骑兵,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各团,都是很优秀的部队,虽然他们的骑术仍不及英国人、普鲁士人,尤其是奥地利人,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很好的骑手,更擅长剑术。可是到了战时,由于军队必须将骑兵的编制加倍扩充,因此骑兵的质量无疑必然降低;然而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具备我们称之为勇猛的那种重要的骑兵素质,它可以弥补许多缺点。可是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的士兵像法国兵那样不爱惜自己的战马。

法国的炮兵一向水平很高。在过去三四个世纪中,火炮操作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几乎都从法国开始。拿破仑战争⁸时代,法国炮兵在选择发射阵地方面的高超本领对敌人威胁最大,那时其他国家的军队还不太懂得这方面的诀窍。一切证据都表明,谁也赶不上法国人配置火炮的本领,他们选定的炮位前面的地形总是既能挡住敌人的火力,又有利于发挥自己的火力。炮兵理论也一向是法国人喜爱的一门学问,他们的数学头脑是对此有利的;准确的语言、科学的方法、精辟的观点——法国炮兵书籍的这些特点表明这门学问是多么适合于法国人的天赋。

关于专门业务部门——工程部队、司令部、卫生部门和运输部门,只能说它们是非常胜任的。军事学校是这类部门的典型。对于法国军官,并不要求他们必须接受普鲁士军官所接受的那种全面教育;但他们必须在军事学校经过一流的专业训练,包括学好各种辅助学科并至少相当熟练地掌握一门现代外国语。法国军队里还有一类

军官,他们是从老军士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少晋升到上尉以上的军衔。因此,在法国军队里常见有小将军和老上尉,而这种制度实行得却很成功。

总的说来,法国军队在各个方面都表明,它属于尚武的和奋发的民族,而这个民族也以自己有这样的保卫者而自豪。这支军队由于有良好的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而克服了路易·波拿巴对它的腐蚀,1851年12月的御用军³⁸¹能够那么快就转变为克里木的英雄,这一切无疑都说明它是一支非常了不起的军队。从来没有过一支军队像1851年秋季时法国军队那样受到政府的谄媚与讨好,政府那样公开诱使其胡作非为;法国军队从来没有受到过像十二月内战时那样的纵容。然而他们却恢复了纪律,并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诚然,御用军作风在克里木曾数次复萌,但每次都被康罗贝尔成功地压了下去。

二、英国军队

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完全相反,^①在它们之间找不到一点相同之处。法国军队强的一面,正是英国军队弱的一面,反之亦然。正像古老的英国本身集丑事恶行之大成一样,英国军队的组织也是腐朽透顶的。一切的安排都好像是为了使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由于某种很难解释的偶然因素,最大胆的改进——尽管的确为

① 《英国军队》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by 马克思译成德文,分别以《英国军队》和《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为题发表在1855年8月28日、9月1日《新奥得报》第399、407号。发表在《新奥得报》上的《英国军队》一文从这里开始。——编者注

数不多——却也在陈腐愚昧包围之中站住了脚，而且这架笨重的吱吱作响的机器一开动起来，居然总还能够凑凑合合完成它的任务。

英国军队的组织很快就能说清楚。步兵由 3 个近卫团、85 个基干团、13 个轻步兵团^①和 2 个步枪团组成。在目前的战争中，近卫团、步枪团和某些其他的团各有 3 个营，其余的团，每团各有 2 个营，每营有 1 个连作为后方连。但是士兵的招募难以补充战争中的伤亡，因此各团的第二营是否存在还很难说。目前步兵实有兵员总数肯定不超过 12 万人。

除了正规部队外，民军作为一种预备兵或学徒兵也算步兵的一部分。根据议会的法令⁷，民军的数量可达 8 万人，但是现在他们的人数不会超过 6 万人，虽然仅在兰开夏郡就招募了 6 个营。^② 根据现行法律，民军可以自愿在殖民地服役，但不能派往外国战场。因此，目前他们只能够用来替换驻守科孚岛、马耳他岛、直布罗陀等地的基干部队，而以后也许还能到更远的殖民地去。

骑兵有 3 个近卫团（胸甲骑兵）、6 个近卫龙骑兵团（重骑兵）^③、4 个重龙骑兵团、4 个轻龙骑兵团、5 个骠骑兵团和 4 个枪骑兵团。每团按战时编制应达 1 000 人（4 个中队，每个中队 250 人，外加一个后方中队）。一些骑兵团派出时^④确实足额满员，但由于克里木冬季的灾难、巴拉克拉瓦那场毫无意义的攻击¹⁰以及兵源的稀少，总的来说兵员数额又回到了原来和平时期的水平。我们认为，目前这 26 个团

① 在《英国军队》中没有“13 个轻步兵团”。——编者注

② 在《英国军队》中没有“虽然仅在兰开夏郡就招募了 6 个营”。——编者注

③ 在《英国军队》中没有“重骑兵”。——编者注

④ 在《英国军队》中，“派出时”为“离开英国时”。——编者注

的总人数不会达到1万人,或者说每团平均不会达到400人。

炮兵有1个步炮团(12个营,96个连)和1个骑炮旅(7个炮连和1个火箭连)。每个连有5门加农炮和1门榴弹炮。加农炮的口径有三磅、六磅、九磅、十二磅和十八磅,榴弹炮的口径有 $4\frac{2}{5}$ 英寸、 $4\frac{1}{2}$ 英寸、 $5\frac{1}{2}$ 英寸和8英寸。而且每连几乎所有各种口径的加农炮又都有重型和轻型两种。可是实际上用于野战的是轻型的九磅、十二磅加农炮和 $4\frac{1}{2}$ 英寸、 $5\frac{1}{2}$ 英寸的榴弹炮。总的看来,现在可以说英国炮兵普遍采用的是九磅加农炮并辅以 $4\frac{1}{2}$ 英寸(十二磅)榴弹炮。除上述火炮外,还使用六磅和十二磅的火箭。

因为平时编制下的英国军队仅仅是战时编制的基干,而且补充兵员完全靠招募志愿兵,所以它在某时某刻的实际兵力是永远不可能有准确数字的。不过我们认为可以作如下的估计,即它现有的兵力大约是:步兵12万人,骑兵1万人,炮兵12000人,火炮约600门(其中骡马牵引的火炮不到五分之一)。在这142000人中,约有32000人在克里木,约5万人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其余的6万人(一半是未训练过的新兵,由另一半训练他们)留在国内。此外还有6万左右的民军。领优抚金者、义勇骑兵团³⁸²以及不能到国外服役的其他部队,我们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志愿兵制度³⁸³很难使军队在战时保持足够的战斗力,现在英国军队又遇到了这种困难。我们又看到了威灵顿时代的情形,即英国军队在一定的战区内所能集中并保持的兵力最多为3万—4万人,现在英国人的同盟者已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法国人,所以英国这支“英勇的小部队”在联军中就几乎看不见了。^①

① 《英国军队》一文到此结束。 编者注

在英国军队中,有一种制度能充分说明英国士兵是从哪些社会阶层招募来的。这就是用鞭笞来惩罚士兵。法国军队、普鲁士军队都不采用体罚;就是在小国当中也有几个国家的军队不采用体罚。甚至在大部分新兵为半野蛮人的奥地利,也明显地表现出废除体罚的意向;例如,夹道鞭打的刑罚³⁸⁴,不久前已经从奥地利的军事法典中取消了。在英国则相反,“九尾鞭”——一种与盛行一时的俄国皮鞭完全相同的刑具——仍继续大行其道。奇怪的是,每当议会里提出改革军事法典的问题时,那些军纪至上的老顽固总是极力维护“皮鞭”,威灵顿老头子本人比谁都积极。在他们眼里,没有受过鞭笞的士兵是不可想象的怪物。他们认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纪律性和不可战胜的气概这些素质,只有背上带有伤疤,至少挨过 50 鞭的士兵才会具备。

不要忘记,九尾鞭不仅是造成一个人肉体疼痛的刑具,它还给他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伤痕和终身的记号,给他打上烙印。现在甚至在英国军队里,这种体罚,这种烙印实际上也等于是终身的耻辱。受过鞭笞的士兵在自己的伙伴眼里抬不起头来。可是按照英国的军事法典,在 frontline 对士兵惩罚的方式几乎只有鞭笞;因此,同是这种惩罚,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在紧要关头维护纪律的唯一手段,而实际上它却是破坏纪律的手段,因为它损害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

这就说明了两件非常奇特的事实:第一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英国兵逃跑的很多。在冬季,英国兵为了防守战壕必须作出超人的努力,谁要是不能连续 48 小时或 60 小时不睡觉,就要受到鞭笞!试想一想吧!英国士兵经过了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战壕里的考验,在因克尔曼会战¹⁵中不管将军们怎样,士兵都打了胜仗。就是这样的堪称英雄的英国士兵却受到鞭笞!但是军法没有留下选择的余地。军队中最好的士兵因疲劳而受到鞭笞,他们在蒙受了这样的耻辱以后

就逃到俄军方面去了。这真是对鞭笞制度的无比有力的谴责。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过某个国家的士兵大批地逃到俄军那里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对待他们会比在家里更坏。第一次出现这种大批逃跑现象的荣誉留给了英国军队,英国人自己证明,正是鞭笞迫使士兵逃跑的。另一个事实是,想建立一个服从英国军事法典的外籍军团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大陆的人民是很爱护自己脊背的。遭受鞭笞的前景压倒了高薪厚赏的诱惑。到6月底,招募到的人数还不超过1000人,而需要的是15000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局试图对这听话的1000人也实行鞭笞制度,那就要面对一场风暴,结果是要么退让,要么立即解散外籍军团。

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可算是最不适用的。^① 直到现在通常穿

① 发表于《新奥得报》上的《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一文从这里开始。本段及以下四段被压缩改写如下：“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可算是最不适用的。直到现在通常穿着的服装还是同1815年以前军队所穿着的服装一样,只不过根据一项新的服装条例做了一点表面的改动,即红色上衣改成了普鲁士的样式,步兵戴奥地利式的高筒军帽或法国式军帽;骑兵戴普鲁士式的头盔。只有英国在军队中把红色上衣保留了下来,纳皮尔称之为‘proud red coat’(骄傲的红上衣)。丹麦人和汉诺威人过去也曾穿过红色上衣。石勒苏益格战争的第一次会战就向丹麦人表明这为敌人提供了多么好的靶子。

然而,英国军队实现了一项远为其他国家任何成就所不及的改进。这就是,步兵全都用上了经过普里切特改进的米涅式步枪。无疑,在因克尔曼会战中,米涅式步枪的绝对准确性是英国军队获胜的决定性因素。

骑兵兵员精壮,配备着优良的马匹和上乘的马刀;他们的本领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总的来看,骑手对马匹而言是超重的,因此英国骑兵打上几个月的仗肯定会被消耗殆尽。马匹由于负载过重,以致尚未被有效地用来同敌人作战就肯定要累垮。这在克

着的服装还同远在 1815 年时军队所穿着的服装一样,未作过任何改进。镶着丑陋花边的怪里怪气的旧式燕尾短上衣,仍然是英国士兵区别于任何别国士兵的一大特色。裤子瘦小,很不舒适。佩挂刺刀、子弹盒和背包用的旧式交叉皮带,几乎在所有的团里普遍使用。骑兵的服装比步兵的适用,而且质量要好得多,但它终究太瘦小,很不方便。此外,英国人是唯一在军队中保留了红色上衣的民族,纳皮尔称之为“骄傲的红上衣”。据说这种上衣——英国兵穿上它就像打扮起来的猴子——能用它耀眼的色彩给敌人造成恐惧。然而不幸的是,谁看见红砖颜色的英国步兵,谁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上衣穿上四个星期以后,给人的感觉就绝对不是可畏而是褴褛不堪;不得不承认,任何其他颜色都远比这种颜色更能引起人们的恐惧感,只要它耐尘土、耐脏、耐潮湿。丹麦人和汉诺威人过去也曾穿过红色上衣,但很快就不穿了。石勒苏益格战争³⁸⁵的第一次会战就向丹麦人表明,红色上衣和白色交叉皮带为敌人提供了多么好的靶子。

根据新的服装条例,红色上衣改成了普鲁士的式样。步兵戴奥地利式的高筒军帽或法国式军帽;骑兵戴普鲁士式的头盔。交叉皮带、红颜色和瘦裤子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这样,改进就等于零

里木又有了新的例证。

炮兵也同样都是身材过高的人。炮兵兵器是一流的。火炮是欧洲最好的,火药被公认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炮弹表面的光洁度为任何其他国家所少见。炮兵兵器产自现代的工业化的英国,而炮兵军官却产自古老的英国。因此,前者之高于欧洲军队水平,恰如后者之低于欧洲军队水平。英国炮兵军官的知识大都不超出那一点最基本的炮兵理论,在实践方面他们的全部本领就是操纵野炮,甚至连这也不是很精通。然而英国炮兵——不论军官或士兵——有两点特长:视力非常好,在战斗中极其沉着。”——编者注

了。同服装和装备比较合理一些的其他欧洲军队相比,英国士兵只能像过去一样令人看着奇怪。

然而,英国军队实现了一项远为其他国家任何成就所不及的改进。这就是,步兵全都用上了经过普里切特改进的米涅式步枪。统率军队的老将们通常都是那样固执己见,他们怎么能作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却这样做了,因而将自己步兵的战斗能力增强了一倍。无疑,在因克尔曼会战中,米涅式步枪的绝对准确性和巨大威力是英国军队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一队英国步兵只要开火射击,那火力必定压倒任何使用普通滑膛枪的敌人,因为英国的米涅式步枪装弹像任何滑膛枪一样快。

骑兵兵员精壮,配备着优良的马匹和上乘的马刀;他们的本领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总的来看,骑手对马匹而言是超重的,因此英国骑兵打上几个月的仗肯定会被消耗殆尽。这在克里木又有了新的例证。如果重骑兵的标准身高降低到5英尺6英寸,轻骑兵降低到5英尺4英寸甚至5英尺2英寸,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步兵现在所实行的那样,那么就会建立起一支更适合于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野战任务的队伍。而目前的情况是,马匹负载过重,尚未被有效地用来同敌人作战就肯定要累垮。

炮兵也同样都是身材过高的人。一个炮兵的身材的自然标准是能够使他十二磅炮从前车上卸下来,要做到这一点,身高5英尺2英寸至5英尺6英寸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根据许多亲身经验和观察知道的。^①事实上,凡身高约5英尺5英寸—5英尺6英寸的人,只

^① 恩格斯曾于1841年9月—1842年10月在柏林普鲁士炮兵队服役。

——编者注

要他们身强力壮,一般就是最好的炮手。但是英国人要是像样子的队伍,因此他们的士兵虽然身材高大外表好看,却不具备一个真正有用的炮手所必需的那种结实的身体。英国炮兵的兵器是一流的。火炮是欧洲最好的,火药被公认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圆形炮弹和长形炮弹表面的光洁度为任何其他国家所少见。虽然如此,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火炮都不会有那样大的发射误差,这说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操纵火炮。在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炮兵像英国这样以如此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充当军官。他们的知识很少超出那一点最基本的炮兵理论,在实践方面他们的全部本领就是操纵野炮,甚至连这也不是很精通。然而英国炮兵——不论军官或士兵——有两点特长:视力非常好,在战斗中极其沉着。

总的说来,英国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官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很无知而严重地削弱了。现在对军官进行的考试是可笑的;上尉要考的是欧几里得著作^①前三卷!但英国军队主要是为了给贵族家庭除长子以外的子弟们安排体面职位而设置的,所以军官的训练标准就不能由军事需要来决定,而必须由英国“绅士”一般只具备的贫乏的知识水平来决定。至于军官的实用军事知识,那也是欠缺的。英国军官认为,他们要履行的职责只有一条: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向敌人,给士兵作出勇敢的榜样。并不要求他们具备如何带兵、如何抓住战机等等方面的才能;至于关心自己的士兵以及士兵们的需要,他们的脑子里哪有这样一回事!英国军队在克里木经受的灾难有一半是由军官中普遍存在的这种不称职状态造成的。不过英国军官倒是有一种特长符合他们职务的要求:他们大都是酷爱

^①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编者注

打猎的人,具有迅速识别有利地形的本能。这肯定是得益于打猎的实践。

军官不合格在参谋工作上造成的危害最大。由于没有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参谋人员,所以每个将军都是从各团抽调对这门业务一窍不通的军官组成自己的司令部^①。这样的司令部比没有还糟糕。侦察工作总是特别草率,这是必然的,因为担任侦察的人对需要他们干些什么知之甚少。

其余各种专业人员训练得好一些,但与其他国家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总的说来,一个英国军官在任何其他国家同等地位的人心目中都会是个不学无术之徒。看看英国人的军事著作吧。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充满在任何其他国家对一个申请中尉军衔的人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对事实的叙述全都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不像军人的手笔,至关重要之处被遗漏,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不懂本行业务^②。结果是,对外国书籍中最荒谬的说法一下子就信以为真^③。不过,我们不应忘记,而应指出,有一些值得称赞的例外,其中首推威

① 在《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中,这里为:“……每个将军都是从各团抽调与自己有亲戚或师生之类关系的军官组成自己的司令部,根本不考虑专业知识。”——编者注

② 在《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中没有“对事实的叙述……作者不懂本行业务”这句话。——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这里加有一条脚注:“我们举切斯尼上校关于火器的著作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作者被认为是大不列颠最优秀的炮兵军官之一。”在《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中,这段话被放在正文中,接在“作者不懂本行业务”后面,而且“切斯尼上校”后面加有:“(现为将军)”。注文中所说的关于火器的著作是:弗·罗·切斯尼《简评火器及它的过去和现在》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廉·纳皮尔的《半岛战争》^①和霍华德·道格拉斯的《海军炮》^②。

行政、医疗、军需、运输及其他辅助部门都是一团糟，在克里木战争中受到考验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崩溃。^③现在，正设法改进这些部门，例如也实行集中管理，但是在民政方面，确切地说，在整个国家政权丝毫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不会有多大成效。

英国军队尽管有这样一些严重缺点，但是打起仗来每一仗无论如何都要打到底，即使不胜也不会丢脸。人员之伤亡、管理之不善、所犯错误之多，与同等条件下其他国家军队情况相比，都是使我们吃惊的。但是，丧失军人荣誉之事没有，受挫退却之事很少见，一败涂地的情况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士兵个人非常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和绝对服从的结果。尽管英国士兵在独立行动或执行轻装部队的任务时不灵活、不机智、显得无能，但在以密集队形行动的正规战中谁也不及他们。他们的特长是横队作战。成横列战斗队形的英国步兵，能够做到其他任何国家的步兵都未必做过的事——以横队迎击骑兵，子弹上膛以待最后时刻，等敌人进到 30 码的距离时一齐开枪，几乎每次都大获全胜。英国步兵甚至在最危急的关头也能十分沉着地射击，因而射击效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例如苏格兰兵在巴拉克拉瓦以横队行动，击退了俄国骑兵。英国步兵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在因克尔曼会战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那次

①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霍·道格拉斯《论海军炮》1820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在《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中，这句话是：“在此以前我们曾多次指出军需、运输以及其他辅助部门一团糟的状态。它们在克里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崩溃。”——编者注

会战,法国军队要是处在同样情况下,一定会被压倒;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法国军队却决不会让自己在那样一个阵地上毫无防备地遭到突然袭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这种坚定性和顽强性是英国军队具有的一种可补其短处的重要素质;正是这种素质,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军官无能、管理混乱和运动不灵理应当导致甚至简直是有意导致的失败。^①

三、奥地利军队

奥地利利用 1848—1849 年严峻考验^②后刚一出现的喘息机会,就按现代编制改编了自己的军队。几乎每一个部门都彻底改组,所以现在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强多了。

首先谈步兵。基干步兵包括 62 个团,此外还有 1 个步枪团和 25 个步枪营,14 个边屯步兵团和 1 个边屯步兵营。边屯步兵和步枪手一起构成轻步兵。

1 个基干步兵团包括 5 个野战营和 1 个后方营,共计 32 个连,其中每个野战连 220 人,每个后方连 130 人。这样,每个野战营约有 1 300 人,每个团将近 6 000 人,即多达英国 1 个师的人数。因而全部基干步兵按战时编制约为 37 万人。

边屯步兵每团有 2 个野战营和 1 个后方营,共计 16 个连,3 850 人;全部边屯步兵的人数为 55 000 人。

① 《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一文到此结束。——编者注

② 指 1848—1849 年革命。——编者注

猎兵,或者步枪手共有 32 个营,每营约 1 000 人;总数为 32 000 人。

军队中有重骑兵:8 个团的胸甲骑兵和 8 个团的龙骑兵;轻骑兵:12 个团的骠骑兵和 12 个团的枪骑兵(其中 7 个团原为轻龙骑兵,或称轻骑^①,但后来改为枪骑兵)。

重骑兵团由 6 个中队组成,另有 1 个后方中队;轻骑兵团由 8 个中队和 1 个后方中队组成。每个重骑兵团为 1 200 人,每个轻骑兵团为 1 600 人。全部骑兵按战时编制的人数约为 67 000 人。

炮兵包括 12 个野炮团,每团按战时编制有 4 个六磅步炮连和 3 个十二磅步炮连,6 个骑炮连,1 个榴弹炮连,共有 1 344 门火炮;还有 1 个岸防炮团和 1 个火箭团;20 个连,配有 160 个火箭发射管。共计 1 500 门火炮和火箭发射管及 53 000 人。

这样算来,按战时编制,作战人员的实际总数为 522 000 人。

这里还应加上 16 000 名左右的坑道工兵、地雷工兵及架桥工兵,2 万名宪兵和运输勤务人员等等,所以总数就增加到 59 万人左右。

如把预备兵员征集起来,军队可以增加 10 万—12 万人;如最大限度地利用边屯区³⁸⁶的兵源,则还有 10 万—12 万人可供征召。但由于这些兵力不能在某个一定的时刻调集在一起,只能慢慢地一批一批地调集,因此他们主要用于填补军队的空缺。所以奥地利未必能够一次性征集起 65 万人以上的武装力量。

军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正规部队和边屯部队。正规

^① 原文为“chevaux-légers”,指奥地利从 15 世纪末开始主要是在法国招募的一支军队。——编者注

部队的服役期限为8年,随后士兵还有2年的预备役。但是也像法国一样,奥地利士兵可以长期归休,因此他们实际在军队中服役的时间也就是5年。

边屯部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编成的。他们是南方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移民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他们靠给皇家服兵役获得土地。过去是用他们来保护从达尔马提亚到特兰西瓦尼亚的边境以防土耳其人入侵。现在这个任务已经仅仅是一种形式了,但是奥地利政府看来并不想放弃这个极好的兵源。正是由于有了边屯部队这个组织,1848年拉德茨基的军队在意大利才得到了解救,1849年文迪施格雷茨指挥的第一次入侵匈牙利才成为可能。弗兰茨-约瑟夫能保住帝位,除应归功于俄国外,也应归功于那些南方斯拉夫边屯团。在边屯团所占据的很长的一大片地区里,每一个租种皇家土地的人(那就几乎是每一个居民),凡年龄在20—50岁的,都有随时应征服役的义务。这些边屯团的主力当然是青年,年纪大一些的,主要是轮流在边防哨所值勤,直到发生战争时应征入伍。这就说明,为什么为数约150万—200万的居民在需要时竟能提供一支15万—17万人的队伍,占居民总数的10%—12%。

奥地利军队与英国军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好几个民族混合在一起,虽然每个团里通常都是同一个民族。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比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之间的差别大多少。不论在奥地利军队中还是在英国军队中,都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军官,甚至还有许多外国人。不论奥地利还是英国,军官的理论知识都是极差的。两国军队的战术队形都保留了很大一部分古老的横列队形,只是在很

有限的程度上采用纵队和散兵线。两国军服的颜色都是异乎寻常的：英国的是红色，奥地利的是白色。但在组织管理的效率、军官的实战经验和能力以及作战的机动灵活等方面，奥地利军队远远超过英国军队。

士兵的服装，撇开步兵滑稽可笑的白色上衣不谈，就其式样来说已经合乎现代的标准了。普鲁士式的短上衣、天蓝色裤子、灰色大衣、法国式轻便军帽，合起来是一套很好的便于执行军事任务的服装；只有匈牙利团和克罗地亚团总是穿瘦窄的裤子，这虽是他们民族服装的一部分但却很不方便。士兵的个人装备很不合规范，交叉皮带仍被采用。边屯部队和炮兵穿褐色上衣，骑兵穿白色的、褐色的或蓝色的。滑膛枪相当笨重，而猎兵和各连部分士兵所装备的步枪又相当陈旧过时，远不及米涅式步枪。一般的滑膛枪是用旧式燧发枪改制成的极不完善的击发式滑膛枪，这种枪常常打不响。

步兵较善于以密集队形作战而不太善于灵活敏捷地执行轻步兵任务，这一点也同英国步兵相似。不过，边屯部队和猎兵则另当别论。前者，至少是其中大部分，极善于打散兵战，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专爱打伏击战。猎兵主要是蒂罗尔人，他们都是一流的射手。步兵中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一般都有坚定顽强的特点，在拿破仑战争⁸时期，他们不止一次地表明在这方面完全比得上英国步兵。他们也不止一次地以横队迎击骑兵，甚至不用编成方队；凡是他们编成方队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很少能够突破他们的方队。阿斯珀恩会战²⁰⁶就是一个例证。

骑兵是卓越的。重骑兵，即“德意志”骑兵，由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组成，马匹好，武器好，战斗力一向很强。轻骑兵打败仗可能是由于把德意志轻骑和波兰枪骑兵混在一起的缘故，但轻骑兵中的匈

牙利骠骑兵永远是所有轻骑兵的典范。

炮兵——它的士兵主要是从德意志省份征集的——一向保持着高水平，这主要还不是由于及早实行了明智的改革，而是由于官兵的实际战斗力强。军士受过特别严格的培训，素质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军队的军士。至于军官，他们在理论知识方面的提高过分地听其自愿，但奥地利还是出了一些最优秀的军事著作家。在奥地利，学习乃是惯例，至少对下级军官说来是如此，而在英国，一个军官研究本行的专业却被看做是丢了他所在那个团的脸。奥军的专门业务部门、司令部和工程部队也是出色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测绘资料制成的漂亮地图，特别是伦巴第的地图，就是证明。英国全国地形测量局测绘的地图虽然好，相比之下也黯然失色。

军队多民族大混合的状况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英国军队中，至少人人都会说英语，可是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团队中，甚至连军士也都几乎不会说德语。这当然造成很大的混乱，产生许多困难，甚至军官与士兵之间也需要翻译。由于驻地经常变更，军官不得不把在奥地利使用的每种语言都多少学一点，这虽然减少了一部分困难，但这种不方便并没有消除。

靠经常用榛树条鞭打士兵臀部而维持的严格纪律以及长久的服役期限，使军队里不同民族之间不致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但是 1848 年却暴露出这支军队内部是多么不稳固。在维也纳，德意志部队拒绝镇压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部队连一仗也没有打就投到了起义者方面。这正是奥地利军队弱点之所在。谁也不敢说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或在多长时间内保持稳固，谁也不敢说有多少个团会在哪个特殊的时刻离开它，转而打自己过去的战友。在奥地利这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就有六个民族，两三种宗教信仰。那

么,这支军队中存在的各种倾向性,在目前这样一个各民族渴望自由使用其武力的时刻,就必定要彼此发生冲突。在一场同俄国的战争中,信仰希腊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影响下,会去打与自己同种族、同宗教的俄国兄弟吗? 在一场革命战争中,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会背弃自己的祖国,而为一个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吗? 不能这样指望。因此,不论奥地利军队的实力有多么强,还需要有很特殊的时机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威力。

[第二篇]

一、普鲁士军队

普鲁士军队有其独特的一套组织,因而值得特别注意。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平时编制基本上也就是军队的全部,不为一旦大战爆发立即扩编之需准备基干。但是据说普鲁士却为战时准备得非常仔细周到。例如,平时编制的军队简直就像一所学校,国民在这里学习使用武器,进行操练。这种宣称把人口中所有身体健全的男子都列入军队战时编制的制度,似乎会使采用它的国家能抵得住任何攻击而安然无恙。可是情况绝非如此。真正做到的只是,这个国家拥有的兵员比采用法国或奥地利征兵制所能拥有的多50%左右。就是靠着这个办法,一个人口约1700万左右,领土不大,既无海军又不直接进行海外贸易,制造业又不太发达的农业国家,才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一个欧洲大国的地位。

普鲁士军队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仍在训练中的士兵,这些士兵组成常备军;另一部分是已受过训练的士兵,这些士兵可以说是无限期归休,他们组成后备军。

常备军的服役期限为5年,每人都是从20岁服役到25岁。但是士兵服现役满3年即可,以后就归休,在剩下的2年里被列为所谓

战时预备兵。在此期间,他们编入原来的营或连的预备兵名册,有随时应召归队的义务。

战时预备兵两年期满后,就转入第一类后备军(erstes Aufgebot der Landwehr),直到 32 岁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每两年应召参加一次后备军的操练,这种操练通常规模相当大,而且是和常备军共同进行的。操练通常历时一个月,为此集中的队伍常常有 5 万—6 万人之多。第一类后备军是用来和常备军共同作战的。它和常备军一样,编成独立的团、营和连,并且团的番号相同。但炮兵仍分别附属于常备军的各个炮兵团。

32—39 岁(含 39 岁)的士兵列入第二类(zweites Aufgebot)后备军。在这一段时间内便不再服现役,除非爆发战争。如果发生战争,由第二类后备军承担驻守要塞的任务,以便使全部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都能够投入野战。

士兵在年满 40 岁以后就免除任何应征的义务,除非国家需要宣布总动员来组成那个神秘的所谓非常国民军。非常国民军包括所有不属于前述各种类别以及所有因身材矮、体质弱或其他原因而免服兵役的 16—60 岁的男子。但是这种非常国民军,连有名无实都算不上,因为没有为它成立过什么组织,也没有为它准备什么武器装备。如果真有一天必须把它召集起来,那就会发现,它除了在国内执行警察任务和消耗大量烈性酒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

既然在普鲁士每一个公民按照法律,从 20 岁到 40 岁都是一名士兵,那么 1 700 万人口似乎就应该能提供一支至少 150 万人的大军。但实际上连这个数字的一半也提供不出。事实上要训练这样的人,如果士兵在团里服役期限是 3 年,那军队平时的编制就至少应达到 30 万人,而普鲁士保持的人数只有 13 万左右。人们用各种办

法使很多应服兵役的人免除了兵役：把一些身体健康适合服役的人宣布为身体太弱，体格检查部门不是只挑选最强健的应征者，就是在挑选适合服役者时徇私受贿，如此等等。过去曾采用使步兵的现役期缩短到只剩两年的办法，把平时编制缩减到 10 万或 11 万人。但是自革命^①以来，政府发现，为了使士兵服从军官，为了使士兵在发生起义时忠实可靠，增加一年服役期大有好处，因而又普遍恢复了三年的服役期。

常备军，或者说基干部队，由 9 个军组成：1 个近卫军和 8 个基干军。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它们的奇特组织。它们总共包括 36 个步兵团（近卫团和基干团），每团 3 个营^②；8 个预备团，每团 2 个营；8 个混成预备营和 10 个猎兵（Jäger）营；总共 144 个步兵营，计 15 万人。

骑兵由 10 个胸甲骑兵团、5 个龙骑兵团、10 个枪骑兵团和 13 个骠骑兵团组成。每团 4 个中队，800 人；总计 3 万人。

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按战时编制有：4 个六磅步炮连，3 个十二磅步炮连，1 个榴弹步炮连，3 个骑炮连，还有 1 个预备连，后者可以作为第十二个连备用；此外还有 4 个要塞炮连和 1 个工役连。但是，为了给这些火炮配齐炮手和补充各连的兵力，还需要全体战时预备兵和第一类后备军（炮兵）中的人员，因而可以说，常备军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约 2 500 人和 30 门左右火炮。马匹和装备齐全。

这样，普鲁士常备军的总数就达到 20 万人左右；但是，可以有把握地从中扣除经过三年服役后归休的 6 万—7 万战时预备兵。

① 指 1848—1849 年革命。——编者注

② 在近卫军中并非一律每团 3 个营。——编者注

第一类后备军的情况是：常备军那边除 8 个预备团之外有多少个近卫团和基干团，后备军这边就有多少个团，此外后备军还有 8 个预备营，总计 116 个营，约 10 万人。骑兵有 2 个近卫团、32 个基干团和 8 个预备中队，共计 136 个中队，约 2 万人。炮兵则如前所述分别附属于常备军的各个炮兵团。

第二类后备军也有 116 个步兵营，167 个骑兵中队（包括任务与第二类后备军相同的各种各样的预备中队、后方中队在内）和若干要塞炮兵，共约 15 万人。

此外加上 9 个工兵营、几支辅助性的小部队、约 3 万名领优抚金者以及一支按战时编制不少于 45 000 人的辎重部队，普鲁士整个军队的人数据称达 58 万人。其中 30 万人执行野战任务，54 000 人执行后方任务，17 万人执行警备任务和作为预备部队，还有 6 万非战斗人员。全军的野炮数量为 800—850 门，分配于各个炮兵连，每连 8 门（加农炮 6 门，榴弹炮 2 门）。

所有这些部队都不仅基干组织完备而且武器装备充足，因而一旦必须动员全军，其他万事俱备，只需筹集马匹。而普鲁士马匹是很多的，而且牲畜也和人员一样，同属随时征用之列，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太难解决。按规定来看，情况是如此，但实际上究竟怎样，从 1850 年军队动员的情况就可以看出。那时，第一类后备军领到了武器装备，虽然并不是没有很大困难；但第二类后备军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没有武器，因而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大笑柄。曾亲身在普鲁士军队中服过役的有识之士在那以前早就预计到情况将会如此，即普鲁士在紧急时刻实际上只能依靠常备军和一部分第一类后备军。他们的看法完全为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无疑，从那时以后为第二类后备军准备了武器装备，而且这支后备军如果现在召集

起来,在1个月或6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可以成为一支很像样子的能执行警备任务甚至执行野战任务的部队。要知道,在战时有3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把新兵训练得能够投入野战。因此,普鲁士所采取的这套烦冗的组织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发挥出人们普遍认为它所具有的那种巨大优越性。何况,为第二类后备军准备的物资过两年又将会不知去向,与过去物资肯定曾经准备好但到1850年需要时已无处可寻的情形完全相同。

普鲁士虽然实行了每一个公民都要服兵役的原则³⁸⁷,但是只实行了一半,歪曲了这一原则,从而使整个军事组织变得不伦不类。只要以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征兵制³⁸⁸,那就应该废除现存的常备军,只保存军官和军士的骨干,由他们来训练青年人,训练的期限也不应超过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时间。如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平时的服役期就会缩短到一年,至少对所有步兵来说是如此。然而不论政府或守旧派军人都不同意这样做。政府希望有一支现成的可靠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守旧派军人希望有一支训练严格、军容整齐、意志坚定的军队,在这些方面要能够与由年龄较大的士兵组成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相媲美。由服役期不超过一年的年轻士兵组成的军队,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要求。因此折中地确定了三年的服役期,普鲁士军队的各种缺点和弱点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我们已经说过,至少有一半可服役的人没有入伍。他们一下子都被列入第二类后备军名册。这样一来,第二类后备军名义上兵员的数量大大膨胀,但是这一大批人全都没有摸过枪杆,并不比未经训练的新兵强。结果,这支后备军不论本来可能有多么强的战斗力也就完全无济于事了。国家的实际军事力量至少削弱了一半,这是拖

长服役期所造成的第一个恶果。

不仅如此,就连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也都受到这种制度的损害。每一个团有三分之一的士兵服役不到三年,三分之一的士兵服役不到二年,其余的三分之一不到一年。不可能指望这样构成的军队会具有英国、奥地利、俄国甚至法国军队中的老兵所特有的那些军事素质,即严格的纪律性,队伍的稳定性和团体观念。英国兵的服役期长,因而英国人是这方面有权威的评判人,他们认为必须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新兵完全训练好。^①可是在平时,普鲁士军队的士兵中没有一个是服役满三年的,因此,十分自然,老兵的那些军事素质,或者至少是表面上的那些军事素质,就得靠使用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手段来灌输给普鲁士年轻的新兵了。普鲁士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由于压在自己身上的都是极困难的任务,所以对待部属也就粗暴野蛮,令人加倍厌恶的是同时还死守陈规旧套。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尤其荒谬,一是因为它与所规定的简单而合理的训练制度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因为它总是以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传统为依据,殊不知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时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战术体系,训练的是完全不同的士兵。这样,战场上的实际战斗力就因练兵场上的墨守成规而受损,所以,普鲁士常备军总的看来,可以说比不上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战斗一开始就能使用的那些老的步兵营和骑兵中队。

普鲁士军队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它具备其他国家的军队所没有的许多优点。普鲁士人正像一般的德意志人那样,是当兵的最好材料。这个既有辽阔的平原又有大片山地的国家,能为每一个不同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参看威·纳皮尔爵士的《半岛战争》。”注文中所说的《半岛战争》指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的兵种提供充足的兵员。大部分德意志人的体质都既适于当轻步兵,又适于当基干步兵,这是任何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这个国家盛产马匹,所以能提供大量从小在家就不离马鞍的骑兵。德意志人稳健沉着的性格使他们特别适合在炮兵中服役。而且德意志人还是世界上最好斗的民族之一,他们从战争本身寻求快乐,常常是当自己国内无仗可打时就到国外去找仗打。从中世纪的德意志步兵到目前法国的外籍军团¹¹⁸和英国的外籍军团⁶,向来都是德意志人为之提供大批为打仗而打仗的雇佣兵。如果说法国人在进攻方面的敏捷和锐气胜过德意志人,如果说英国人在抵抗的顽强性上胜过德意志人,那么德意志人对军事任务的全面适应无疑胜过欧洲所有其他民族。这种全面的适应性使德意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优秀的士兵。

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的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他们必须接受的普通学科考试,比任何其他国家军队的标准都高得多。旅和师所设的学校使军官们得以完成他们的理论学习,还有许许多多的组织机构负责他们更高深更专门的军事知识的进修。普鲁士的军事文献具有很高的水平。近25年来出版的著作充分证明,它们的作者不仅熟谙本行业务,而且敢与任何国家军队的军官比试科学知识的渊博。实际上这些著作中有些著作,甚至可以说已略嫌过于深奥,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柏林、布雷斯劳或柯尼斯堡,你可以看到军官在大学里和学生一起听课。克劳塞维茨在其所属领域里同若米尼一样,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家,而阿斯特工程师的著作则开辟了筑城学的新时代。然而,“普鲁士尉官”一词在整个德意志却成了人们的话柄,军队内部那种通行的风气造成的滑稽可笑的团体观念、拘泥死板和粗暴作风,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同时,任何国家都不像普鲁士这样,在校官和将官中有如此多的倔强的老顽固——其中大部

分是 1813 年和 1815 年的遗老^①。说到底,必须承认,由于荒谬地试图强使普鲁士常备军成为一支它决不可能成为的由老兵组成的军队,以致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同样都受到了损害,而且对军官说来甚至还更严重一些。

普鲁士军队的操典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简单明了、前后如一,以几条合情合理的原则为依据,很难找出还有什么不足之处。这部操典是夏恩霍斯特的天才之作^②。他大概是自拿骚的莫里茨以来最杰出的军事组织家了。指挥大部队的条例同样也很好。而正式推荐给军官阅读的炮兵技术方面的手册类书籍却内容陈旧,完全不符合现代的要求。但是这一缺点只限于多少带有官方性质的读物,完全不涉及普鲁士一般的炮兵学术著作。

工程部队享有完全受之无愧的极好声誉。这支工程部队产生了自蒙塔朗贝尔以来最优秀的军事工程师阿斯特。从柯尼斯堡和波森到科隆和科布伦茨,普鲁士的军事工程师建筑了一系列博得全欧洲赞扬的要塞。

普鲁士军队的装备自 1843 年和 1844 年实行改革以来,虽然不很美观,但是对士兵却很方便实用。头盔能很好地遮阳和防雨,服装宽大而舒适;装备的协调甚至超过法国军队。近卫军和轻步兵营(每团都有一个轻步兵营)装备有线膛针发枪;其余的常备军正在把他们的滑膛枪用一种很简单的办法改造成性能良好的米涅式步枪。至于后备军,再过两三年也将领到米涅式步枪,目前仍是装备击发式滑膛枪。骑兵的马刀过宽过弯,因而劈刺时多半不管用。炮兵的武器装

① 1813 年和 1815 年,普鲁士曾作为反法同盟的成员同拿破仑第一作战。——编者注

② 格·夏恩霍斯特《普鲁士军队操典》1853 年柏林版。——编者注

备,不论是火炮、炮架或马具,都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

总的说来,普鲁士军队,即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是一支还不错的军队,但决不是像普鲁士的爱国作家所夸耀的那样。常备军投入战场后很快就会摆脱练兵场上那一套框框的束缚,经过几次战斗就能同敌人处于同一水平。第一类后备军,只要他们的老兵精神重新被激发,而战争又是深得民心的话,那么他们将不亚于欧洲最好的老部队。普鲁士所怕的应该是,在战争第一阶段就遭遇主动出击的敌人组织得比较好、服役期比较长的军队;但是如果战争拖长,则普鲁士军队里的老兵会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战争一开始,常备军将是军队的核心,但是,第一类后备军很快就会把它挤到次要地位,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的士兵具有更强的体力和更好的军事素质。他们是普鲁士的真正的老兵,而不是常备军里的毛头小伙子。第二类后备军我们就不谈了。它能起什么作用,还要由它本身来证明。

二、俄国军队

在俄国,也曾规定有某种为战时准备基干的办法,即实行一项在某些方面与普鲁士后备军制度相似的预备兵制度。³⁸⁹但从整体上说,俄国的预备兵员数量很有限,把他们从这个庞大帝国的各地调集起来又非常困难,所以早在英法宣战³⁹⁰仅半年以后,克里木还一枪未响之前,就显得有必要废除这种制度了,必须组建新的队伍,并继之以组织上的不断革新。因此在俄国,我们必须把战争爆发时的军队状况和现时的军队状况区别开来。

平时俄国军队分成以下几个部分:1. 作战部队——6个基干军。

第一军至第六军；2. 预备部队——1个近卫军，1个掷弹兵军，2个预备骑兵军；3. 特别部队——高加索军、芬兰军、奥伦堡军、西伯利亚军；4. 内地驻军——老兵、内地近卫军、残废军人等等；5. 非正规部队。这里还应该加上由归休兵组成的预备部队。

6个基干军的组成如下：每军有3个步兵师，每师有1个基干旅和1个轻步兵旅，每旅2个团，每团4个基干营；以上共为6个旅，即12个团，48个营，外加1个步枪营和1个工兵营，合计50个营。此外还有1个轻骑兵师，由1个枪骑兵旅和1个骠骑兵旅组成，每旅2个团，即16个中队，合计32个中队。炮兵是1个师，由3个步炮旅和1个骑炮旅组成；共14个炮兵连，计112门火炮。每个军总计：50个营，32个骑兵中队，112门火炮。全部基干军共计：300个营，192个骑兵中队，672门火炮。

近卫军包括3个师，即6个旅，12个团（9个掷弹兵团和3个马枪团即轻兵团）；总共是36个营，因为近卫团和掷弹兵团每团只有3个基干营。此外还有1个步枪营和1个坑道爆破兵营，3个骑兵师（1个胸甲骑兵师、一个枪骑兵师、1个骠骑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计72个骑兵中队。还有1个炮兵师，包括5个旅，即15个连（9个步炮连，5个骑炮连，1个火箭连），共有火炮135门。掷弹兵军由3个师，即6个旅组成，包括12个步兵团，即36个步兵营，外加1个步枪营和1个坑道爆破兵营。这个军也有1个骑兵师，下属2个旅（1个枪骑兵旅和1个骠骑兵旅），包括4个团，即32个中队。炮兵由3个步炮旅和1个骑炮旅组成，有14个连，共有112门火炮。

预备骑兵的编制如下：第一军有3个师（2个胸甲骑兵师，1个枪骑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计80个中队（48个胸甲骑兵中队，32个枪骑兵中队）。还有1个骑炮师，由3个旅组成，有6个连，

共计 48 门火炮。第二军有 3 个师(1 个枪骑兵师, 2 个龙骑兵师), 即 6 个旅, 包括 12 个团, 即 112 个中队(32 个枪骑兵中队, 80 个龙骑兵中队)。还有 2 个坑道与浮桥工程骑兵中队和 6 个骑炮连, 有 48 门火炮。

高加索军包括: 1 个预备掷弹兵旅, 有 2 个团, 即 6 个营; 3 个步兵师, 有 12 个团, 即 48 个营; 1 个步枪营; 1 个工兵营; 高加索防区 47 个营(民兵); 共计 103 个营。骑兵为 1 个龙骑兵团, 有 10 个中队。炮兵为 1 个师, 有 10 个普通炮兵连和 6 个山炮连, 共计 180 门火炮。

芬兰军为 1 个师, 包括 2 个旅, 即 12 个步兵营。奥伦堡军为 1 个师, 也包括 2 个旅, 但只有 10 个营。西伯利亚军为 1 个师, 包括 3 个旅, 计有 15 个营。

平时实际服役的正规部队总数可列表如下:

	步兵营	骑兵中队	火炮
6 个基干军	300	192	672
近卫军	38	72	135
掷弹兵军	38	32	112
预备骑兵军	—	194	96
高加索军	103	10	180
芬兰军	12	—	—
奥伦堡军	10	—	—
西伯利亚军	15	—	—
总 计	516	500	1 195

内地驻军包括 52 个内地近卫营即 800 个由老兵和残废兵组成的连队, 11 个半骑宪兵中队以及 98 个炮兵连。这些部队是很难计入国家实有兵力之内的。

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区分如下:

1. 顿河哥萨克——56个团,每团6个百人队^①;共计336个百人队,13个炮兵连;

2. Tshornomor^①(黑海哥萨克)——72个百人队,9个营,3个炮兵连;

3. 高加索防区哥萨克(驻库班河地区和捷列克河地区)——120个百人队和3个炮兵连;

4. 阿斯特拉罕哥萨克——18个百人队,1个炮兵连;

5. 奥伦堡哥萨克——60个百人队,3个炮兵连;

6. 乌拉尔哥萨克——60个百人队;

7. 巴什基里亚部队——85个百人队(几乎全是巴什基里亚人和卡尔梅克人);

8. 西伯利亚哥萨克——24个营,84个百人队,3个炮兵连,其中有一部分是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民族;

9. 亚速海哥萨克担任海军勤务;

10. 比萨拉比亚的多瑙河哥萨克——12个百人队;

11. 外贝加尔哥萨克是不久前编成的,其组织和兵额不详。

以上总计达847个百人队(即每队100人的骑兵中队,这个名词是从sto^①,即一百变来的),32个营,26个炮兵连。共约骑兵9万人,步兵3万人。但是目前能用于西部边境实际作战的大概只有骑兵4万—5万人,炮兵几个连,而步兵则根本没有。

由此可见,在平时俄国军队(除内地驻军外)应该包括:步兵36

① “百人队”在原文中是“sotnia”,同“Tshornomor”、“sto”一样,都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万人,骑兵7万人,炮兵9万人,共计50万人,此外还有一批人数随着情况而变化的哥萨克。但是在这50万人中,高加索、奥伦堡和西伯利亚的地区军队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不能用在帝国西部边境,因而能用来对付西欧的兵力最多是步兵26万人,骑兵7万人和炮兵5万人,火炮约1000门,外加哥萨克约3万人。

以上是俄国军队平时编制的情况。为了对付战争,采取了下列措施:整个服役期根据情况而规定为20年、22年或25年,但服役满10年或15年——也是根据情况而定——的士兵即归休,编入预备役。这种预备役的组织曾有过很大的改变,但现在的情况看来是,归休兵在头五年内根据原属的兵种而分别列入一个步兵预备营(即近卫军和掷弹兵每个团的第四营,基干部队每个团的第五营)、一个骑兵预备中队或者一个炮兵预备连。五年期满后转入本团的步兵后方营(即近卫团和掷弹兵团的第五营,基干团的第六营),或转入骑兵后方中队和炮兵后方连。这样,一旦征召预备兵员,步兵和炮兵的实际兵力就可以增加约50%;骑兵可以增加约20%。这些预备兵员将由退役军官指挥,他们的骨干虽然并非完全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但还是处于有一定准备的状态。

但是,在这次战争爆发时,一切都改变了。作战部队虽然应该用于在西部边境作战,但是却不得不派两个师到高加索去。在英法联军登船开往东方之前,俄国作战部队中有三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在同土耳其作战。那个时候确实也在集中预备兵员,但是把他们从帝国各地调集到各自的大本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联军的陆军和海军已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出现,以及奥地利的态度摇摆不定,都迫使俄国必须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征召的名额增加了一两倍,这样征召来的形形色色的大批新兵同预备兵员一起,编成了所有

步兵团中的第四、五、六、七、八营；骑兵也有同样的增加。这样，近卫军、掷弹兵和基干部队这 8 个军现在就不是 376 个营，而是 800 个营左右，每两个平时编制下的骑兵中队或炮兵连都至少增加了一个预备中队或一个预备连。但是，所有这些数字在书面上要比实际上显得吓人。这是因为，由于俄国官吏贪赃枉法，军队管理不善，以及长途行军——士兵要从家中走到兵站，再从兵站走到部队的集中地点，然后再从那里开往战场——以致有一大部分士兵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以前便死亡或伤残了。加之疫病肆虐，最近两次会战中的伤亡又很大，因此我们认为俄军的 1 000 个步兵营、800 个骑兵中队和 200 个炮兵连的总人数目前不会超过 60 万人。

但是，政府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第七营和第八营刚一编成，政府便下令征召民军，其行动之快，证明政府完全认识到，要把大量的人员从辽阔的帝国的各个地区调集起来有多么困难。民军^①，即民兵，按各省人口比例组成，以大队^②（营）为单位，每营 1 000 人；名额比例是在每 1 000 个男子中征召 23 人，即差不多占全体居民的 0.25%。目前只在西部各省征召了民军。这次是从 1 800 万居民中征召的，居民中男子约 900 万人，所以征集到的人数应为 12 万人左右，而这与俄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是相符的。毫无疑问，民军在各方面甚至比新编成的预备部队还要差，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是对俄国兵力的一个重要增补，如果用他们来执行波兰的警备任务，就可以使大批的基干团腾出手来作战。

另一方面，已经开到西部边境的，不仅有很多哥萨克，而且还有

① 原文为“opolshenie”，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② 原文为“druginas”，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相当数量的巴什基里亚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古斯人和其他蒙古民族组成的部队。这说明把他们调往西部的命令是早在很久以前就下达了的，因为其中有许多队伍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开到圣彼得堡或维斯图拉河。

可见，俄国几乎已经把自己的兵源搜刮到了极限，虽然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在一次决战中失利，但是现在它的全部军队最多不超过60万—65万正规部队、10万民军，也许还有5万非正规骑兵。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俄国的兵源已经枯竭，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打了20年仗的法国在1812年精锐部队全军覆没后一下子又新组成一支30万人的部队并且抵挡住了，至少是暂时抵挡住了敌军的攻击，而打了两年仗的俄国却做不到这一点。人口稠密的国家和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军事实力上就是这样悬殊。假如法国与俄国接壤的话，那么6600万俄国人会比3800万法国人还要弱。而4400万德意志人胜过信奉正教的沙皇的6600万臣民，那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俄国军队是用各种方法征集的。兵员大部分是靠定期征兵来补充，一年征自俄国欧洲部分西部各省，一年征自俄国欧洲部分东部各省。通常的比例为每1000名(男)“丁”中征4人或5人，因为在俄国的丁籍上只计男性，根据正统的东方观念，女子是不算做“丁”的。从帝国西半部征集的兵员服役20年，从东半部征集的服役25年。近卫军服役22年；军屯³⁹¹青年服役20年。除了这种征集的兵员以外，新兵一大来源是士兵子弟。凡是士兵在军队服役期间生的儿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规定实行得很彻底，士兵妻子生下的孩子都被置于国家掌握之中，哪怕丈夫远在帝国另一端服役已有五年或十年之久。这些士兵子弟称为世袭兵，其中大多数受政府的官费教育；大部分军士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出来的。最后还有罪犯、游民和其他

无用之人,都被法庭判服兵役。贵族有权将身体健全的农奴送去当兵。每一个父亲如果不喜欢自己的儿子,也可以这样做。“S’bogom idi pod krasnuyu shapko!”“滚蛋,上帝保佑你,去戴红帽子吧!”就是说去当兵吧——俄国农民平时对不听话的儿子就是这样说的。

军士,我们已经说过,大多是由在官办学校中受教育的士兵子弟补充的。这些从幼年就唯军纪是从的年轻人,与那些以后他们所要训练和指挥的士兵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等级。他们属于国家——没有国家他们就不能生存:一旦要他们自己谋生,他们是一无所长。所以,在政府豢养下过活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这些人在军队里同俄国民政机关里由官吏子弟补充的下级官吏完全一样:是一群奸诈狡猾、境界低下、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小僚属,受过一点点初等教育甚至使他们更加令人厌恶;虚荣心重,唯利是图,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出卖给国家,可是却又每日每时都在设法一点一点地把国家出卖,只要他们能从中得到好处。居斯丁先生在他的俄国游记^①中描写得非常出色的那个伴随他在俄国游历的猎骑信使或向导,就是这一类人的极好的典型。在民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都存在的这一类人,恰恰是盛行于那个国家一切政府机关的极端腐败之风的主要根源。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毫无疑问,假如废除了这种必须把子弟完全交给国家的制度,俄国就将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下级民政官吏和军队中的军士。

军官这一类人的情况也许更糟糕。培养未来的下士或军士长花费还比较少,而为百万大军培养军官(按照官方的说法,俄国就是要

① 阿·居斯丁《1839年的俄国》(四卷集)1843年巴黎版第4卷第283--285页。——编者注

为 100 万人的军队准备骨干),却是一件耗费很大的事。私人的机构团体不为此做任何事情,或者做得很少,一切又是必须由国家包办。但是国家显然没有力量使上述目的所需的那么多年轻人受到教育。于是,贵族子弟就受到一种直接的精神压力而必须在军队或民政机关至少供职 5 年或 10 年,因为凡连续三代未曾“供职”的贵族家庭,便失掉其贵族特权,特别是拥有农奴的特权,而在俄国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大片的地产便毫无价值,甚至还不如没有。因此,大批的年轻人就被送到军队里来,取得少尉或中尉军衔,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充其量也只是能用法语较流利地进行最普通的对话,稍许懂得一点初等数学、地理和历史——他们头脑里灌输的所有这些东西不过是用来做个样子而已。对他们来说,供职是不得不干的苦差事,他们以毫不掩饰的厌恶心情来对待它,把它看得就像长期住院治病一样;只要规定的服役期一满或者获得了少校军衔,他们便立刻退伍,列入后方营的名册。至于说到军校学生,他们也几乎全都是被灌输了一些用来应付考试的东西,因此就连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也远不如在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军事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另一方面,有天才而好学的热爱本行专业的青年在俄国非常罕见,因此只要一发现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立即给予重视。国家非常慷慨地供给他们全部学费,使他们能够受完教育,并迅速提拔他们。这些人被用来向欧洲炫示俄国文明。如果他们有写作的愿望,只要不越出俄国政府规定的界限,都予以百般的鼓励;俄国军事著作中那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出自这些人之手。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从根本上说还是太野蛮,不喜欢学术研究或任何脑力劳动(要阴谋除外),因此几乎所有在俄国军队供职的杰出人物,不是外国人就是差不多等于外国人的波罗的海东部沿岸

地区的人^①，即波罗的海东岸各省的德意志人。这一类人中间最近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工程长官托特列本将军，他已于7月负伤后死去³⁹²。不论从俄军方面还是从联军方面来说，在整个包围战的所有参加者中间，他无疑是他那门专业里最聪明的人，但他是波罗的海东岸的德意志人，是普鲁士人的后裔。

这样看来，在俄国军队的军官中，既有最优秀的人才，也有最低等的庸才，只是前者所占比例小到极点。俄国政府对本国军官的看法如何，已在它的战术条例中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来。这些条例不是仅仅为在战斗中的旅、师或军的部署规定一个总的模式，即所谓“标准部署”，指挥官可根据地形和其他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相反，条例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标准部署，不给将领们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简直要把他们束缚到肩上没有任何责任的地步。例如根据条例，一个军在作战时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部署，而在阿利马河会战⁹中俄军果真是按照其中之一，即按照第三种部署布阵的，结果当然被击败了。这种对一切可能的具体情况都事先作出抽象规定的癖好，留给指挥官自由行动的余地很少，甚至使他们在利用地形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一位普鲁士将军对此进行批评时说道：

“这样一套条例，只有在大多数将领都愚蠢到政府不能放心委以指挥全权或准其机动行事的军队中，才能够被容忍。”

俄国士兵属于欧洲最勇敢的士兵之列。他们的顽强精神同英国士兵和奥地利某些营的士兵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也像约翰牛所自夸的那样，挨了打也感觉不到。俄国步兵的方队曾经在被骑兵突破

^① 原文为“ostzeiski”，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后仍长时间地抵抗,进行白刃战;他们总是使人觉得,打死他们倒比打退他们还容易些。曾在1813—1814年作为盟友、1854年在克里木作为敌人见到过俄国兵的乔治·卡思卡特爵士,给他们作出了很不错的评价,说他们“决不惊慌失措”。^①此外,俄国士兵体格好、健康、善走路、要求不高、吃喝随便,而且对长官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士兵都更服从。虽然如此,俄国军队却并不是很值得夸耀的。自开国以来,俄国的军队无论是同普鲁士的、法国的、波兰的还是同英国的军队打仗,凡取胜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靠着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在兵力相等的条件下,他们总是被除土耳其或普鲁士之外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打败,而且在切塔泰³⁹³和锡利斯特里亚¹⁴,土耳其虽然人数上处于劣势,竟也打败了俄国军队。

俄军士兵的首要特点在于他们是最笨拙的士兵。他们既不适于当轻步兵,也不适于当轻骑兵。哥萨克在某些方面虽然是出色的轻骑兵,但总的说来很不可靠,以致在接触敌人时,总要在哥萨克前哨线的后方布上第二道前哨线。此外,哥萨克完全不适宜于攻击。至于说到正规部队的步兵和骑兵,他们是不善于进行散兵战的。俄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仿效者,命令他们或强迫他们做什么都行,可是一旦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去做事就什么都不行了。其实就连责任这个词对这样的人也几乎是用不上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责任是什么,他们可以被动地服从命令去挨枪弹,同奉命去泼水或去鞭笞一个同伴完全一样。期望俄国兵在担任前哨或进行散兵战时能够像法国人一样机灵,像普鲁士人一样理智,那就是对他们的嘲弄。俄

^① 乔·卡思卡特《评1812年和1813年的俄普战争》1850年伦敦版。

——编者注

国兵所需要的是命令,是清楚明白的命令,如果他们没接到命令,那他们可能不后退,但肯定不会前进,而且不会自己动脑筋。骑兵虽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并受到特别重视,但始终不是优秀的骑兵。不论在对法国还是对波兰的战争中,骑兵都没有突出的表现。俄国人被动的、能忍耐的服从精神并不是骑兵所需要的品质。一个骑兵的首要品质,恰恰是俄国人所最欠缺的,这就是“勇猛”。例如,当 600 名英国龙骑兵以真正骑兵敢打敢冲的精神在巴拉克拉瓦向人数多得多的俄军猛攻时,他们打垮了俄国的炮兵、哥萨克、骠骑兵和枪骑兵,一直冲到密集的步兵纵队跟前才不得不调回头去;但是,在这一次骑兵攻击中,谁应该被称为胜利者,这还值得怀疑。假如对任何别国军队进行这种轻率的攻击,那就不会有一个人生还,敌人会从翼侧和背后包抄攻击者,把他们一个个都砍下马来。可是俄国的骑兵竟然原地不动,等待敌人,及至想起策马前进时,已被敌人踩倒在马下了!如果要找什么证据来说明俄国正规骑兵无用的话,那么像这样一个事例肯定是最适合不过的。

炮兵的装备优劣不等,但只要装备的火炮好,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们在战场上非常勇敢,但总是表现得欠聪明。一个俄国炮兵连如果军官们都阵亡了,便毫无用处;而如果军官们活着,也只能按照条例的规定选择阵地,而且常常弄得荒谬可笑。当被包围于要塞中而需要忍耐、刻苦和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时,俄国炮兵会表现得非常出色,但这主要不是说他们射击准确,而是说他们在敌人的火力下能够忠于职守,坚韧不拔。这一点可以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整个被围过程中得到证明。

不过,在炮兵和工程部队中,可以找到俄国向欧洲夸耀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他们是真正被鼓励自由发挥其才干的。比方说

在普鲁士,最有才干的人,如果职位低下,一般都受到长官的压制,他们所提出的一切改良措施都被斥为异想天开的胡闹,因而其中许多人不得不到土耳其谋事,他们在那里造就了欧洲第一流的正规炮兵。而在俄国所有这样的人都是受到鼓励的,如表现突出则升迁迅速,前途光明。吉比奇和帕斯凯维奇在 29 岁和 30 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将军,而托特列本在塞瓦斯托波尔不到 8 个月的时间,便由上尉擢升为少将。

俄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的步兵。步兵极其坚定顽强,无论是用于横队或纵队还是在胸墙后,都永远是难对付的。可是他们的长处也仅限于此。他们几乎完全不适于当轻步兵(所谓猎兵只是名义上的轻步兵,而实际上担任轻步兵勤务的只是配属给轻步兵军的 8 个步枪营),枪法一般都不好,长于走路但走得不快;他们的队伍通常都部署在很不利的位置上,以致敌人总是能够在向他们冲锋之前先用大炮猛轰他们。这主要是由于将军们不敢偏离“标准部署”的缘故。例如在阿利马河,在英国军队同样笨拙地先排成横队,又改成纵队渡河,再排成横队对俄军冲锋之前,英国大炮早就把俄军队伍轰得落花流水了。就是对俄军引以自豪的坚定顽强精神也必须持相当的保留态度,因为在因克尔曼¹⁵, 8 000 名英国步兵在一个并未完全占领,防守也不严密的阵地上遭到突然袭击,他们同来袭的 15 000 名俄军进行了白刃战,抵抗达 4 小时以上,硬是打退了俄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次战斗肯定已经使俄军认识到,在他们自己最强的一方面,却碰上了更强的对手。俄军的每次攻击都遭到失败,就是因为英国的士兵勇敢,英国的军士和士兵都一样机智而沉着。从这次战斗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英国人有理由将基干步兵自命为世界第一。

俄军的服装几乎完全仿效普鲁士的式样,装备的佩戴非常不便;

不仅挂刺刀和子弹盒的皮带,而且还有挂背包的带子都交叉在胸前。不过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改进,但在这一点上有没有变化,我们还不知道。轻武器非常粗笨,只是在最近才加上了火帽;俄国的滑膛枪是这种枪支中最沉重、最不灵便的。骑兵的马刀样式不好,打造得也很差。至于火炮,据报道在克里木使用的新式炮很好,制造的工艺水平很高;但是否全都是这样,尚属疑问。

最后,俄国军队的某些特点仍然显示着它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文明总水平,并具有这种温室产物的一切弊端和缺点。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哥萨克由于积极顽强,所以是唯一令敌人畏惧的队伍,但是他们爱喝酒好抢劫,因而在指挥官的眼里他们是很不可靠的。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由于俄军行动迟缓,所以他们的战略机动是不足畏惧的,除非他们面对的是像去年秋季的英军那样粗心大意的敌人。在正规战中,俄军对于向他们进攻的士兵来说是顽强的对手,但对于向他们进攻的将领来说却不是很难对付的。俄军的部署一般都很简单,按规定的标准条例行事,因而很容易被识破;同时,将、校级军官都缺乏才智,士兵又笨拙不灵,这使俄军在战场上进行重要的机动成了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三、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

巴伐利亚有2个军,每军有2个师。每师由2个步兵旅(共4个步兵团和1个步枪营),1个骑兵旅(2个团)和3个步炮连及1个骑炮连组成。此外,每军有1个炮兵总预备队——6个步炮连和1个坑道爆破兵队。这样,全军总计:16个步兵团,每团3个营,加上6个

步枪营,共为54个营;2个胸甲骑兵团,6个轻龙骑兵团,共为48个骑兵中队;2个步炮团(每团6个六磅炮连和6个十二磅炮连),1个骑炮团(4个六磅炮连),共28个炮兵连,每连8门火炮,合计224门,另有6个要塞炮连和12个辎重连;此外,还有1个工程兵团(8个连)和2个卫生连。按照战时编制,除了没有骨干的预备兵和后备军,全军共有72 000人。

在德意志联邦²⁹⁰的军队中,奥地利提供第一、二、三军,普鲁士提供第四、五、六军,巴伐利亚提供第七军,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共同提供第八军。

符腾堡有8个步兵团(16个营),4个骑兵团(16个中队),1个炮兵团(4个步炮连和3个骑炮连,计48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约为19 000人。

巴登有4个团(8个营),2个火枪营和1个步枪营;共计10个步兵营,3个骑兵团(12个中队),4个步炮连和5个骑炮连,共有40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15 000人。

黑森-达姆施塔特有4个步兵团(8个营),1个轻骑兵团(6个中队),3个炮兵连(其中1个骑炮连),18门火炮。总额为1万人。

第七、八两个军唯一的独特之处,是炮兵采用了法国式的炮架。德意志联邦的第九军有两个师,一个师由萨克森王国提供,另一个师由黑森选帝侯国和拿骚提供。

萨克森师包括:4个步兵旅(每旅4个营),1个步枪旅(4个营);此外,还有4个基干营和1个步枪营作为预备队,尚未组编;4个轻骑兵团,每团5个中队;1个炮兵团,有6个步炮连和2个骑炮连。共计:20个步兵营,20个骑兵中队,50门火炮,按战时编制24 500人。黑森选帝侯国有:4个步兵团,即8个营,外加1个火枪营和1个

步枪营；2个胸甲骑兵中队，7个骠骑兵中队；3个炮兵连，其中1个是骑炮连，共计：10个步兵营，9个骑兵中队，19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12000人。拿骚提供的有：7个步兵营，2个炮兵连，战时编制总额为7000人，12门火炮。

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的军队组成第十军的第一个师，梅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和汉撒各城市³⁹⁴的军队组成该军的第二个师。汉诺威提供8个步兵团，即16个营；4个轻步兵营；6个骑兵团，即24个中队；4个步炮连和2个骑炮连。共计：22000人，36门火炮。炮兵是英国式的。不伦瑞克提供5个步兵营，4个骑兵中队，12门火炮，共5300人。至于提供第二个师的那些小邦就不值一提了。

最后，德意志最小的几个小邦共同组成一个预备师。德意志联邦军队加上这个预备师，按战时编制，全部情况可见下表：

	一、编制员额				二、预备兵员额			
	步兵	骑兵	火炮	合计	步兵	骑兵	火炮	合计
奥地利	73 501	13 546	192	94 822	36 750	6 773	96	47 411
普鲁士	61 629	11 355	160	79 484	30 834	5 660	80	39 742
巴伐利亚	27 566	5 086	72	35 600	13 793	2 543	36	17 800
第八军	23 369	4 308	60	30 150	11 685	2 154	32	15 075
第九军	19 294	2 887	50	24 254	9 702	1 446	25	12 136
第十军	22 246	3 572	58	28 067	11 107	1 788	29	14 019
预备师	11 116	—	—	11 116	5 584	—	—	5 584
共 计	238 721	40 754	592	303 493	119 455	20 364	298	151 767

当然，这还不能说明德意志联邦武装力量的实际情况，因为普鲁士、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在必要时所能提供的军队数量比上述兵额多得多。第十军和预备师，或许再加上第九军，可以组成警备部队，以免由于编制杂乱和特点不同而影响野战行动的速度。这些军队的士

兵在军事素质方面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士兵的水平,但是,在这些小部队里当然没有发挥军事才干的机会,而且在组织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陈旧过时的东西。

在第三篇即最后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研究西班牙、撒丁、土耳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

[第 三 篇]

一、土耳其军队

在目前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马茂德即位且近卫军被屠杀²³⁹以后,特别是阿德里安堡和约⁵⁰签订以后,历次为改组和革新军队所做的努力都取得了成果而且形成了制度。第一个最大的障碍——边远各省帕沙¹¹的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总的说来,他们的地位已降低到同欧洲地区的司令官差不多。然而帕沙们愚昧、蛮横和贪婪的程度却丝毫未减,依然像亚洲省督称霸最盛行的时代一样;近20年来,关于帕沙叛乱的消息,我们听到的不多,但是各省起义反抗贪婪的行政长官的消息,却听到不少。这些行政长官——原本都是最低贱的家奴和“无所不为的人”——利用他们新取得的地位,采取搜刮、受贿、鲸吞公款的手段来发财致富。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土耳其军队包括正规现役军(尼查姆)、预备军(列季弗)、非正规部队和附庸国的辅助部队。

正规现役军由6个军(奥尔杜)组成,各军都在本军驻防地区征集,这一点与普鲁士各军从所驻省份补充兵员的情况相似。我们可

以看到,土耳其的正规现役军和预备军的组织形式全都是模仿普鲁士的。6个军司令部的驻地:君士坦丁堡、舒姆拉、托利-莫纳斯提尔、埃尔祖鲁姆、巴格达和阿勒颇。每个军应由一名穆希尔(即元帅)统率,下属2个师,即6个旅,共计6个步兵团,4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

步兵和骑兵的组织制度仿效法国,炮兵则仿效普鲁士。

1个步兵团由4个营组成,每营8个连,满额时包括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在内应为3250人,即每营800人;但是,战前每营很少超过700人,而在亚洲地区,几乎一向是缺额更多。

1个骑兵团包括4个枪骑兵中队,2个猎骑兵中队;每中队应为151人;骑兵通常较步兵缺额更多。

炮兵每个团包括6个骑炮连和9个步炮连,每连有4门火炮,因而1个团的火炮总数为60门。

这样,每军应有:步兵19500人,骑兵3700人,火炮60门。但实际上所达到过的最高总人数是20000—21000人。

除了6个军以外,尚有4个炮兵团(1个预备团,3个要塞炮团),2个坑道爆破兵团,以及派往干地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3个步兵特遣队,总数为16000人。

因此在战前,尼查姆即正规现役军的总兵力应如下表:

36个步兵团,每团平均2500人	90000人
24个骑兵团,每团平均660—670人	16000人
7个野炮团	9000人
3个要塞炮团	3400人
2个坑道爆破兵团	1600人
特遣队	16000人
合 计	136000人

PUTNAM'S MONTHLY.

A Magazine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VOL. VI.—DEC., 1855.—NO. XXXVI.

THE ARMIES OF EUROPE.

[Third and last Article.]

I. THE TURKISH ARMY.

THE Turkish arm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war, was in a higher state of efficiency than it had ever reached before. The various attempts at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made since the accession of Mahmud, since the massacre of the Janissarie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peace of Adrianople, had been consolidated and systematized.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bstacle—the independent position of the pashas in command of distant provinces—had been removed, to a great extent, and, upon the whole, the pashas were reduced to a discipline somewhat approaching that of European district commanders. But their ignorance, insolence, and rapacity remained in as full vigor as in the best days of Asiatic satrap rule; and if,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we had heard little of revolts of pashas, we have heard enough of provinces in revolt against their greedy governors, who, originally the lowest domestic slaves and “men of all work,” profited by their new position to heap up fortunes by exactions, bribes, and wholesale embezzlement of the public money. That, under such a state of thing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rmy must, to a great extent, exist on paper only, is evident.

The Turkish army consists of the regular active army (Nizam), the reserve

(Redif), the irregular troops, and the auxiliary corps of the vassal states.

The Nizam is composed of six corps (Orders), each of which is raised in the district it occupies, similar to the army-corps in Prussia, each of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province from which it recruits itself. Altogethe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urkish Nizam and Redif is, as we shall see, copied from the Prussian model. The six Orders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in Constantinople, Shumla, Toli-Monastir, Erzurum, Bagdad, and Aleppo. Each of them should be commanded by a *Mushir* (field-marshal), and should consist of two divisions or six brigades, formed by six regiments of infantry, four of cavalry, and one of artillery.

The infantry and cavalry are organized, upon the French, the artillery upon the Prussian system.

A regiment of infantry is composed of four battalions of eight companies each, and should count, when on its full complement, 3,250 men, inclusive of officers and staff, or 2,000 men per battalion; the general strength, however, before the war, seldom exceeded 700 men, and in Asia was almost always much less.

A cavalry regiment consists of four squadrons of lancers, and two squadrons of chasseurs, each squadron to contain 151 men; in general, the effective strength was here even more below the standard than in the infantry.

在正规现役军服役满五年的士兵即离队归休,在以后七年的时间里算做列季弗,即预备军的兵员。这支预备军和现役军一样编有同等数量的军、师、旅、团等等的单位;它与正规现役军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普鲁士一线后备军与常备军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在普鲁士旅以上的大单位中,常备军和后备军总是混合编在一起的,而在土耳其军队里组织上则是各自分开的。预备军的军官和军士常常集中在兵站,预备军一年集合操练一次,在操练期间领取与现役军相同的薪饷和口粮。但是,这样的组织首先要求有良好的民政管理和一定的社会文明程度,而土耳其还距此甚远,所以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因此,如果我们说预备军的数量和正规现役军相等,那当然是按其最大的可能数字计算的。

辅助部队来自:

1. 多瑙河两公国	6 000 人
2. 塞尔维亚	20 000 人
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0 000 人
4. 上阿尔巴尼亚	10 000 人
5. 埃及	40 000 人
6.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10 000 人
合计约为	116 000 人

在这些辅助部队中还应当加上志愿兵——巴希布祖克²³⁶;小亚细亚、库尔德斯坦和叙利亚可以提供大量的这种志愿兵。他们是过去几个世纪遍布匈牙利并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外³⁹⁵的大帮非正规大军的最后残余。他们大都是骑兵,近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几乎每战必败,这证明他们连欧洲装备最差的骑兵都比不上。他们已经没有了自信心,现在只是聚集在军队的周围,把用以供养正规部队的资财

吃尽耗光,除此之外什么作用也不起。巴希布祖克喜好抢劫,性格反复无常,这样,甚至像俄国人可以派哥萨克执行的那种前哨任务也不适于让他们承担,因为他们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难找到。因此,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人们已经发现最好把这支队伍的人数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我们估计,他们的人数至多不过5万人。

这样,土耳其军队在这次战争开始时的人数,可作如下估计:

正规现役军.....	136 000 人
预备军.....	136 000 人
埃及和突尼斯的正规辅助部队.....	50 000 人
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辅助部队.....	40 000 人
巴希布祖克.....	50 000 人
合 计.....	412 000 人

但是,上述的总数还要打一些折扣。驻扎在欧洲地区的各军状况比较好,而且兵员数量也是在土耳其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上接近满员,这看来是相当确实的。然而在亚洲地区,在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边远各省,兵员可能是现成的,但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弹药,都供应不上。多瑙河军团主要由欧洲的三个军组成。这是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的是:欧洲的预备军,叙利亚军或至少是该军的大部分,还有许多阿尔瑙特人^①、波斯尼亚人以及巴希布祖克。可是,奥美尔帕沙的极端谨慎的态度——迄今为止总是不愿把他的部队投入战场——充分说明他对于土耳其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样一支唯一的优秀正规军的战斗力是信心不足的。而在亚洲地区——土耳其过去那种贪污和懒惰的风气在那里依然盛行——正规现役军的两个军、全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部预备军,加上大批的非正规部队都未能抵挡住一支人数少得多的俄国军队;他们每战必败,到1854年战局结束时,土耳其的亚洲军队几乎已不复存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具体的组织机构,甚至一大部分兵员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外国军官以及报社记者经常抱怨武器、装备、弹药和粮食不足,他们直截了当地说,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就是那些帕沙懒惰、无能和贪婪。经费是按期拨付给他们的,但总是被他们挪作私用。

土耳其正规军士兵的装备大体上仿效西欧军队;唯一不同的就是那红色的非斯帽或者叫无沿帽,在当地气候条件下这种帽子最糟糕不过,炎热的夏天里戴它常会使人中暑。发给的物品都是劣质的,已该更新的衣服还得继续穿,因为军官通常都把用来更新衣服的钱中饱私囊。步兵和骑兵的武器都是低劣的;唯独炮兵配有很好的野炮,这些炮都是由欧洲籍的军官和工程师负责在君士坦丁堡铸造的。

土耳其人本身是不错的士兵。他们生性勇敢,最能吃苦耐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够很驯顺。欧洲籍军官,只要得到了土耳其士兵的信任,就可以依靠他们;格拉赫和巴特勒在锡利斯特里亚,伊斯肯德贝伊(伊林斯基)在瓦拉几亚对此都有亲身体验。然而,这是例外情况。整个说来,土耳其人天生对“异教徒”的仇恨是如此难以消除,他们的风俗和观念与欧洲人是如此不同,以致只要他们依然是国内的统治民族,就决不会服从于他们从心底里加以蔑视的人,认为这些人比自己低贱,不能相提并论。自从军队按照欧洲方式改编以后,土耳其人也反感军队的组织。一般的土耳其人仇视异教徒的各项制度不下于仇视异教徒本身。再者,现代军队要求严守纪律、行动听指挥、精神常备不懈,这些对于懒惰、沉默、相信宿命的土耳其人来说都是极端可憎的。甚至军官宁可坐视军队吃败仗,也不肯自己费力气

动脑筋。这是土耳其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土耳其军队根本不能打进攻战。

上兵和军士是用志愿报名和抽签的办法补充的；下级军官也有从士兵中提升的，但通常都是些随军杂役和勤务兵，即侍候高级军官的仆从。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学校本身就不是很好，不能训练出足够的青年来补充缺额。至于谈到高级军官，那实行的就是任人唯亲了，西方国家对这种做法是无法想象的。将军们大部分都是切尔克西亚奴隶出身，年轻时曾受某个大人物的宠爱。极端的无知、无能和自负支配着一切，宫廷倾轧是晋升的主要手段。就是那些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的为数不多的欧洲籍将军（叛教者），若不是为避免整个军事机器瓦解而非用他们不可，也不会加以任用。其实，任用他们也是不加选择的，其中有的属于真正品质优秀的人，也有的本来不过是冒险家而已。

现在经过了三次会战之后，土耳其军队，除了分驻多瑙河和克里木两地的奥美尔帕沙原有的 8 万人以外，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亚洲地区的军队现有大约 25 000 乌合之众，这些人不适于上战场，而且由于打了败仗而士气低落。40 万人中，其余的人消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也许阵亡了、病死了、伤残了、逃散了，也许变成了土匪。很可能这就是全部土耳其军队最后一点残余了，因为很难设想，由于同英法结盟而受到打击的土耳其还能恢复元气。

土耳其人在奥尔泰尼察之战¹³和切塔泰之战³⁹³的勇敢表现，曾引起人们过分的喜悦，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奥美尔帕沙固执地按兵不动，这足以使人们对土耳其军队的其他军事素质产生怀疑：甚至出色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¹⁴也不能完全打消这一疑团。土耳其人在亚洲屡遭挫败，在巴拉克拉瓦狼狈逃窜，在叶夫帕托里亚采取绝对的守势，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稳坐军营毫无作为——这一切使

人们对他们军事才能的估价又降回到合乎实际的水平。由于土耳其军队本身的情况特殊,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根本不可能对它作出一个总的评价。无疑,有一些团作战勇敢,管理得很好,能执行任何勤务,但这样的团为数极少。数量庞大的步兵缺乏团结精神,因此不能用于野战,虽然他们打阵地战表现是好的。正规骑兵绝对比不上欧洲任何大国的骑兵。炮兵是土耳其军队里最突出最优秀的部分,野炮团战斗力极强;士兵简直好像生来就适于当炮兵,虽然军官令人不能满意之处无疑很多。在预备军中,看来普遍地缺乏组织,虽然士兵无疑是准备尽力效命的。在非正规部队中,阿尔瑙特人和波斯尼亚人是极好的游击队员,但也仅此而已,最适合用来防守工事,而巴希布祖克几乎毫无用处,甚至败事有余。埃及部队看来与土耳其的正规现役军水平相仿,而突尼斯部队差不多什么也不能干。这样一支混杂的军队,军官素质如此低下,组织管理如此无方,难怪经过了三次会战就几乎全军覆没。

二、撒 丁 军 队

这支军队包括 10 个步兵旅,10 个步枪营,4 个骑兵旅,3 个炮兵团,1 个坑道爆破兵团,1 个马枪队(警察部队),还有撒丁岛的轻骑兵。

在 10 个步兵旅中有 1 个近卫旅,4 个掷弹兵营,2 个猎兵营和 9 个基干旅,这 9 个旅共有 18 个团,每团有 3 个营。此外尚有 10 个步枪营(bersaglieri)³⁹⁶,即每旅各 1 个营,这样就使得受过扎实训练的轻步兵的比例比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大得多。

此外,每团有 1 个后方营。

自1849年以后,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各营的人数大为缩减。按战时编制1个营应有1000人左右,而按平时编制最多不过400人左右。其余的人都已无限期归休。

骑兵有4个重骑兵团和5个轻骑兵团。每团包括4个野战中队和1个后方中队。按战时编制每团的4个野战中队共应有800人左右,而按平时编制几乎不足600人。

3个炮兵团中1个是工役和技工团,1个是要塞炮团(12个连),还有1个是野炮团(6个步炮连,2个骑炮连,2个重炮连,每连有8门火炮)。轻炮连装备八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重炮连装备十六磅加农炮,共计80门火炮。

坑道爆破兵团有10个连,约1100人。马枪手(骑马的和徒步的)对于这样小的王国来说数量是很大的了,约有3200人。在撒丁岛上执行警察勤务的轻骑兵约1100人。

在1848年第一次对奥地利作战时,撒丁军队的人数肯定达到了7万,1849年将近13万,后来又缩减到45000人左右。³⁹⁷现在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与英法签订条约¹¹⁰后军队又有所扩充。

皮埃蒙特军队^①之所以具有在任何时候都能增减作战部队的这种巨大伸缩性,是因为它有着与普鲁士极为近似的征兵制;实际上撒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意大利的普鲁士。撒丁王国各邦也是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普鲁士不同的一点是容许代役;兵役义务延续的时间也像普鲁士那样,分为两段,一段时间属于现役,在另一段时间里士兵退伍归入预备役,发生战争时可重新征召入伍。这种

^① 即撒丁军队。撒丁王国的领土包括撒丁岛和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等地区。故撒丁王国又称皮埃蒙特王国,撒丁军队又可称皮埃蒙特军队。——编者注

办法介乎普鲁士与比利时和德意志各小邦之间。这样,通过征召预备役兵员,步兵人数可从3万人左右扩充到8万人,甚至更多。骑兵和野战炮兵只能有少量的增加,因为这两个兵种的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通常都必须留在团内。

皮埃蒙特军队就其军容和战斗素质来说,可以同欧洲任何国家相比。皮埃蒙特士兵和法国士兵一样身材不高,步兵尤甚;近卫军平均身高甚至不到5英尺4英寸。但是美观的服装、端正的军人姿态、匀称灵活的体格和意大利人的英俊面容,使他们看起来胜过许多身材高大的士兵。基于步兵和近卫军的服装和装备基本上和法国相同,在一些细小之处则仿效奥地利。步枪手有他们独特的服装:一顶垂有一根长长的鸡翎的小水兵帽和一件褐色上衣。骑兵穿着仅及胯部的褐色短上衣。步兵装备的一般都是击发式滑膛枪,步枪手装备的是蒂罗尔式短枪,这是一种优良适用的武器,但在各方面仍然不如米涅式步枪。第一横列中的骑兵过去使用长矛;现在的轻骑兵是否仍然如此,我们说不准。骑炮连和轻步炮连由于装备了八磅炮,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就像法国军队还保留着这种炮的时候那样,而重炮连由于装备有十六磅加农炮,所以成了大陆上最重型的野战炮兵。这种加农炮一旦架设就位,可发挥极大的作用,这一点已为黑河会战³⁹⁸所证实,在这次会战中,十六磅炮的准确射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联军的胜利,从而博得了一致的赞扬。

在意大利各邦中,皮埃蒙特所处的位置最有利于建立一支优良的军队。波河及其支流的平原地区出产骏马,那里的男子英俊魁梧,在所有的意大利人中身材最高,特别适于当骑兵和重炮兵。从南、西、北三面包围着这片平原的山地中,居民吃苦耐劳,虽然身材不很高,但同所有的山民一样,健壮而充满活力,勤劳而思维敏捷。正是

他们构成步兵的主要成分,特别是步枪手的主要成分。步枪手这支队伍在训练方面几乎不亚于万塞讷^①猎兵,而在体力和耐力方面无疑超过他们。

皮埃蒙特的军事学校整个说来是很好的,因而军官的素质高。然而时至1846年,贵族和教会的影响还在军官的任免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到那时为止,查理-阿尔伯特治理国家只知道依靠两个工具:教会和军队。事实上,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在皮埃蒙特街道上遇见的三个人当中,一个是军人,另一个是僧侣,只有第三个才是平民。现在这种现象当然已经没有了。教士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虽然贵族仍保留许多军官职务,但1848年和1849年的战争使军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质,而这种民主性质是不容易加以破坏的。有些英国报社驻克里木的记者说,皮埃蒙特军官几乎全都“出身贵族”,事实远非如此。我们自己就认识不止一位从士兵升上来的皮埃蒙特军官,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大部分尉官都是凭着对奥地利作战时的勇敢而获得自己军阶的人,或者至少也是与贵族无关的人。

我们认为,皮埃蒙特军队过去的敌人之一,1848—1849年任奥地利军队副参谋长的雪恩哈尔斯将军所发表的意见,是对皮埃蒙特军队所作的最好的赞语。这位将军是奥地利军队的优秀军官之一,也是对任何与意大利独立沾边之事都深恶痛绝的人,但在其所著《意大利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却始终以极其尊敬的口吻谈论皮埃蒙特军队。他写道:

① 万塞讷(Vincennes)是巴黎东面的一个小城,附近地区原为王室狩猎园地。该城是在过去的狩猎城堡遗址上修建的,以城中所设兵工厂和射击学校著称。——编者注

“他们的炮兵……都是精兵，由具备真才实学的优秀军官指挥；火炮性能好，口径也比我们的大……”“骑兵不可小视，第一横列的骑兵装备着长矛，但因为这种武器只有最熟练的骑手才能掌握得好，所以我们不想把这种新办法看做是真正的改进。然而他们的骑术……练得非常好。”“在圣卢恰，交战双方都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皮埃蒙特人的进攻迅猛异常；皮埃蒙特人和奥地利人都有许多战绩表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勇士。”“皮埃蒙特军队有权毫无愧色地谈论诺瓦拉之战³⁹⁹……”^①

诸如此类的评述甚多。曾参加 1848 年的战局、而且也不赞成意大利独立的普鲁士将军维利森，也同样称赞过皮埃蒙特军队。^②

从 1848 年起，意大利某些方面的人士就把撒丁国王看做整个半岛未来的首领。我们虽然决不赞同这种看法，但还是认为，只要意大利人想重新夺得自由，皮埃蒙特军队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军事力量，同时它将构成未来意大利军队的核心。在达到这一步以前，皮埃蒙特军队也许要经历不止一次的内部的革命性变化，但是它所具备的军事上的优点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这些优点还会由于这支军队融入一支真正全民族的军队而增强。

三、意大利各小邦的军队

罗马教皇的军队几乎形同虚设。那些步兵营和骑兵中队从来没有足额过，只构成 1 个兵力薄弱的师。此外还有 1 个瑞士籍近卫团，

① 卡·雪恩哈尔斯匿名发表的《一名奥地利老兵 1848—1849 年意大利战争回忆录》1852 年斯图加特 蒂宾根版第 1 卷第 166、167 和 223 页，第 2 卷第 239 页。——编者注

② 威·维利森《1848 年的意大利战局》1849 年柏林版。——编者注

这是政府多少尚能依靠的唯一部队。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摩德纳的军队兵力太小,不值一提;只要说明它们基本上是仿效奥地利形式组成的就够了。此外还有那不勒斯军队,但是关于它也用不着多谈。这支军队从来不敢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无论是在1799年为国王而战还是在1821年为宪法而战,他们总是以逃跑而出名。⁴⁰⁰甚至在1848—1849年,那不勒斯人的军队也是到处被起义者打败,要不是依靠瑞士籍部队,炮弹国王^①现在就不会坐在他的宝座上了。在罗马被围期间,加里波第率领一小队士兵出击那不勒斯师,并且两次将这个师击败。⁴⁰¹那不勒斯军队按平时编制估计有26 000—27 000人,但在1848年,据称有将近49 000人,而满员应该达到64 000人。在所有这些部队中,只有瑞士籍部队值得提一提。他们编为4个团,每团2个营。满员时每营应为600人,4个团共计4 800人。但在目前骨干过多,因而每营约有1 000人(仅第四团——伯尔尼团就有2 150人);瑞士籍部队的总数估计可能有将近9 000人。这是真正第一流的军队,由瑞士自己的军官指挥,并在内部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不受那不勒斯政府干预。他们最初是在1824年或1825年受雇的,当时那不勒斯国王^②不再信任不久前造反的本国军队,而认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近卫军来保卫自己。因此与瑞士各州签订了协议,即所谓“条约”,为期30年;瑞士籍部队保持着瑞士的军事条例和瑞士的军事组织,其薪饷为那不勒斯本地士兵的三倍;兵员是从瑞士各州招募来的志愿兵,每个州都设有募兵处。退役的军官、老兵和伤兵都可领到优抚金。如果30年期满后不订立新约,则各团即应解散。现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②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行的瑞士宪法⁴⁰³禁止为外国军队募兵,所以在1848年以后募兵条约即告废除;在瑞士至少表面上停止了招募,但基亚索以及伦巴第的其他各地都设立了兵站,许多代理人仍在瑞士境内秘密从事招募。那不勒斯政府如此迫切需要新兵,以致连当时逃亡瑞士的政治犯中的败类也不拒绝接收。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勒斯国王^①重新确认了条约给瑞士兵规定的特权,而且去年8月,在30年期满的时候,又特别下令,瑞士人继续为国王服役多久,这种特权就继续存在多久。

四、瑞士军队

瑞士没有全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身体健康,都必须在民兵中服役。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现役民兵、第一类后备和第二类后备)。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分散地应召受训,有时也集中在兵营里。但是,无论谁,只要看到过一小队瑞士兵的笨拙的步伐和不整齐的军容,或是听到过他们在训练时同教官乱开玩笑,他一定立刻就能看出这些人军事素质的培养是很差的。这种民兵打仗的本领如何,我们只能根据1847年宗得崩德⁴⁰³战争这唯一的实例来加以判断。这次战争的突出之点就是:伤亡的人数与参战的兵力比较起来微不足道。虽然民兵的总的体制是联邦法所确定的,而且全体民兵受联邦司令部领导,但民兵的组织几乎完全掌握在各州政府的手中,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导致混乱和不统一,同时还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阻碍军需物资的正常储备,阻碍改革的实施,阻碍重要地点,特别是瑞士与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德意志交界处薄弱地区的永久性设防。

瑞士人像所有的山民一样,经过训练,可以成为极好的军人;他们无论在哪里作为外国正规军都特别能打仗。然而由于头脑比较迟钝,他们的确比法国人或北德意志人需要接受更多得多的训练才能具备自信心和凝聚力。也许,在外国侵犯瑞士时,民族感情会弥补这些缺点,但即使是这一点,也很值得怀疑。一支8万人甚至更少一些的正规军,肯定能抵得上瑞士人自称能召集起来的16万人以上的民兵。1799年法国人只用几个团就结束了战事。⁴⁰⁴

瑞士人很以他们的神枪手们的手中枪自豪。肯定无疑,除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领地以外,瑞士的优秀射手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要多一些。但是当人们看到这些百发百中的射手装备的几乎都是粗笨的普通击发式滑膛枪的时候,对瑞士神枪手们的敬意就大大降低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步枪营可能都是优秀射手,然而他们的又短又重的枪(短枪)同米涅式步枪相比,过时无用,填充火药时要把粉末状的火药从牛角筒里倒出,使用这种方法既笨且慢,在武器不那么过时的敌军面前就难以取胜了。

总之,瑞士军队的武器、装备、组织、训练,样样都陈旧过时,而且只要各州政府对军事还有点发言权,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五、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队

瑞典和挪威的军队,虽然联合在一个国王的统率之下⁴⁰⁵,但仍然像他们所属的两个国家那样相互独立。这两个国家和瑞士不同,

它们是拥有常备军的山地国家的范例。但就其土地的自然条件和由此产生的贫穷以及人口稀少的状况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整个说来与瑞士极其相似,甚至在两地的军事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一种制度——民兵制。

瑞典有三种部队——招募的志愿部队(Värfvade trupper)、地方部队(Indelta trupper)和预备部队。志愿部队包括:3个步兵团,计6个营;2个骑兵团;3个炮兵团,计13个步炮连和4个骑炮连,共有96门六磅炮,24门十二磅炮,16门二十四磅炮。总计7700人,136门火炮。瑞典军队的全部炮兵都属于这种部队。

地方部队有20个团,每团2个营,另有5个独立步兵营和6个骑兵团,各团的中队数目为1—8个不等。这种部队的人数估计为33000人。

预备部队的人数占全军总数的大部分,征召起来可达95000人。

此外,在哥得兰省有一种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民兵,编为21个连,计7850人,16门火炮。这样,瑞典军队的总数约为14万人,150门野炮。

在志愿部队里,志愿兵的服役期通常为14年,但法律也允许有3年的服役期。地方部队是一种受训完毕即住在分配给其本人和家属的农场里的民兵,每年只集合操练一次,为期4个星期。农场收入就是他们的薪饷,但在集训期间可以领到特别补助金。军官同样可以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占有一块王室土地。凡年龄在20—25岁、身体健全的瑞典人都编入预备部队:他们先接受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以后每年集合操练2个星期。可见,除了为数不多的志愿部队和哥得兰部队以外,瑞典军队的主体——地方部队和预备部队——实质上全是民兵。

瑞典人在军事史上所占的地位与为他们提供了声誉卓著的军队

的有限人口,不可同日而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²⁸⁶期间以其所进行的改革开辟了战术的新纪元。虽然查理十二的杰出军事天才因为他的冒险鲁莽行为而大打折扣,但他仍然使瑞典人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例如用骑兵夺取堡垒。在以后几次对俄国的战争中,瑞典人打得很好。在1813年,贝尔纳多特尽一切可能不让瑞典军队受到损害,他们除非因为失误几乎没有受到过炮火的袭击,只有莱比锡会战²⁰⁷是一个例外,但在这次会战中瑞典军队也仅占联军极小的一部分。志愿部队,甚至地方部队,无疑一贯都能保持瑞典军队的荣誉,但是预备部队,如果在军事行动前不集中进行长时间的训练,就只能作为新兵使用。

挪威有5个步兵旅,包括22个营,计12 000人;1个骑兵旅,包括3个猎兵师,计1 070人;1个炮兵团,约1 300人。此外尚有作为预备部队的民兵9 000人。军队总人数约24 000人。挪威军队在性质上同瑞典军队没有多大差别。其唯一特点是,有几个猎兵连配备有平底雪鞋,士兵穿上这种雪鞋,借助于一根长棍,按拉普兰^①的方式在雪地上跑得非常快。

丹麦军队有:4个步兵旅,包括23个营(1个近卫营,12个基干营,5个轻步兵营,5个猎兵营),每营按平时编制约700人;3个骑兵旅(3个近卫中队,6个龙骑兵团,每团4个中队;平时每个中队140人);1个炮兵旅(2个团,计12个连,共有80门六磅炮,16门十二磅炮);3个工兵连。总计:步兵16 630人,骑兵2 900人,炮兵和工兵2 900人,火炮96门。

① 拉普兰是北欧的一个地区,从挪威、瑞典、芬兰北部伸展到俄罗斯西北角,大部分在北极圈内。土著居民称为拉普人,从事渔猎或游牧。——编者注

按战时编制每个步兵连要增加到 200 人,即每个营增加到 800 人,每个骑兵中队增加到 180 人,常备部队总人数增加到 25 500 人。此外还可征召预备部队,计有 32 个步兵营,24 个骑兵中队和 6 个炮兵连,共 31 500 人。这样,全军总数约增加到 56 000—57 000 人。但在必要时人数还可以增加。例如在最近那次战争³⁸⁵中,单是丹麦本土(既不包括荷尔斯泰因,也不包括石勒苏益格)就征集到 5 万—6 万人,而现在这两个公国又重新属于丹麦的征兵范围了。

丹麦军队是在 22 岁以上的青年中采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员的。服役期为 8 年,但实际上炮兵留在团内只有 6 年,常备部队的士兵只有 4 年,而其余的时间他们则被编入预备部队。30—38 岁时列为第一类后备民兵,然后到 45 岁为止列为第二类后备民兵。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但是一旦同德国发生战争,将近半数的部队——从两个公国征召的兵员——就会散伙,并且调转枪口来打现在的战友。有大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混杂于其中的这种状况,是丹麦军队的一大弱点,而且实际上会使得这支军队在同它那最强大的邻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变得几乎完全无用。

丹麦军队从 1848—1849 年整编以来,武器和装备都很好,各方面都非常不错。丹麦本土人是优秀的士兵,几乎在三年战争的所有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好,然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的表现却无疑比丹麦人更出色。丹麦的军官队伍一般说来是好的,但贵族作风太重,科学理论教育太差。军官的报告通常都写得极为草率,同英国军官一样。丹麦军队同英国军队还有一点近似之处,就是机动性差。但是他们近来却没有什么表现能说明他们具有因克尔曼会战¹⁵的胜利者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无可争辩地属于欧洲最优秀士兵之列。他们是卓越的炮兵,就像他们的兄弟民

族——英国人一样，在战斗中是冷静的。虽然他们是平原国家的居民，但却很适于当轻步兵；他们在 1850 年建立的第一个步枪营可以与任何国家的同一兵种相媲美。

六、荷兰军队

荷兰军队共有 36 个步兵营，编成 9 个团，计 44 000 人；4 个龙骑兵团，包括 20 个中队，另有 2 个猎骑兵中队和 2 个骑宪兵中队，共为 24 个骑兵中队，计 4 400 人；2 个野炮团（5 个六磅步炮连和 6 个十二磅步炮连，2 个六磅骑炮连和 2 个十二磅骑炮连，共计 120 门火炮）和 1 个工兵营。全军总数为 58 000 人，此外，在殖民地还有几个团。但平时这支军队并不是始终保有这么多人。服现役的只是由军官、军士和人数不多的志愿兵组成的核心。大部分士兵虽应服役 5 年，但实际上受训两三个月即解散回家，以后每年只集中操练几个星期。此外，还有一种划分为三类的预备部队，包括了所有 20—35 岁身体健全的男子。第一类预备部队编成大约 53 个步兵营和炮兵营；第二类预备部队编成 29 个步兵营和炮兵营。但这些部队处于完全没有组织的状态，几乎连民兵也算不上。

七、比利时军队

比利时军队有 16 个步兵团，计 49 个营，此外每团还有 1 个预备营，总人数为 46 000 人。骑兵有 2 个猎骑兵团和 2 个枪骑兵团、1 个向

导团、2个胸甲骑兵团,共38个中队,此外还有7个预备中队,总人数为5800人。炮兵有4个团(4个骑炮连,15个步炮连,4个炮兵后方连,24个要塞炮连),计有152门六磅的和十二磅的火炮;此外还有1个坑道爆破兵团,计1700人。全军除预备部队外总共62000人;加上预备部队,按照最近一次征召兵员的情况来看,全军人数可增加到10万人。军队是以抽签方式补充兵员的;服役期8年,但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归休。因此按平时的编制,比利时的实际兵力未必能达到3万人。

八、葡萄牙军队

葡萄牙军队在1850年由下列部队组成:

	平时编制	战时编制
步兵·····	18 738	10 401
骑兵·····	3 508	4 676
炮兵·····	2 707	4 098
工程部队和司令部·····	728	495
	<hr/>	<hr/>
	25 681	49 670

炮兵有1个野炮团(1个骑炮连和7个步炮连),3个阵地炮兵和要塞炮兵团以及3个驻防岛屿的独立营。火炮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两种。

九、西班牙军队

在所有的欧洲军队中,由于特殊情况,西班牙军队是美国最感兴

趣的一支军队。因此,在结束这次对欧洲军队所作的评述的时候,我们把西班牙军队介绍得详细一些,虽然就它在大西洋彼岸诸邻国军队当中的地位而言,未必需要如此对待。

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包括国内的军队和殖民地的军队。

国内的军队计有 1 个掷弹兵团,45 个基干团(每团 3 个营),驻休达的 2 个团(每团 2 个营),18 个猎兵(步枪)营。所有这 160 个营在 1852 年组成一支 72 670 人的作战部队,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82 692 651 雷阿耳,合 10 336 581 美元。骑兵在 1851 年有马枪兵、龙骑兵和枪骑兵共 16 个团,每团 4 个中队,另有 11 个猎骑兵中队即轻骑兵中队,共计 12 000 人,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17 549 562 雷阿耳,合 2 193 695 美元。

炮兵有 5 个步炮团(每团 3 个大队,王国境内每一地区驻 1 个团),5 个重炮大队,3 个骑炮大队和 3 个山炮大队,共计 26 个大队,或者按现在的名称为 26 个营。每个骑炮营有 2 个连,每个山炮营和步炮营有 4 个连。全部炮兵是 92 个步炮连和 6 个骑炮连,588 门野炮。

坑道爆破兵 1 个团,计 1 240 人。

预备部队包括每个步兵团的 1 个营(第四营)和每个骑兵团的 1 个后方中队。

兵力总数,根据书面材料 1851 年为 103 000 人;1813 年埃斯帕特罗下台时,总数仅为 5 万人,但纳尔瓦埃斯一度又把军队发展到 10 万人以上,平均来看,服现役的最多为 9 万人。

殖民地的军队如下:

1. 古巴军队:老兵 16 个步兵团,志愿兵 4 个连,2 个骑兵团,2 个步炮营(每营 4 个连),1 个山炮营(4 个连),1 个骑炮营(2 个连)和 1

个坑道爆破兵营。除了这些基干部队外,还有国民军惩戒部队^① 4个步兵营和4个骑兵中队,国民军城市部队8个骑兵中队;共计37个步兵营,20个骑兵中队和84门火炮。近几年来,古巴的常备军得到了由西班牙调来的大量部队的补充。如果我们把原有的数量算做16 000—18 000人,那么现在古巴军队大概有25 000—28 000人。不过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2. 波多黎各军队:老兵3个步兵营,国民军惩戒部队7个营,土著志愿兵2个步兵营和1个骑兵中队,4个步炮连。由于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都被人忽视,因此无法估计这支军队的人数。

3. 菲律宾群岛有5个步兵团(每团8个连),1个吕宋猎兵团,9个步炮连,1个骑炮连和1个山炮连。原先还有9个土著步兵大队(每大队5个营)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已于1851年解散。

军队是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员的,允许代役。每年征召25 000人人伍,但在1848年征召了三批,共75 000人。

西班牙军队采用现行的体制,主要应归功于纳尔瓦埃斯,虽然1768年查理三世制定的条例仍然是军队体制的基础。纳尔瓦埃斯实际上不得不废除各团旧有的各不相同的地方团旗,而在全军换上统一的西班牙旗帜!同样,他不得不打破旧的地方部队组织,集中军权并恢复军队的统一。他根据经验深知,对这样一支几乎从未领过薪饷甚至缺吃少穿的军队来说,钱是主要的推动力,因此他还试图使士兵的薪饷和军队的财务管理正常化。纳尔瓦埃斯是否全部实现了他的意图,无人得知,但他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改良措施,在萨尔托里乌斯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都迅速化为乌有。过去一贯“无饷、无

^① 一种以犯了罪被判刑的军人组编成的特殊军事组织。——编者注

食、无衣”的常态又完全恢复了；一方面，将校等高级军官身着缀满耀眼的金穗银带的外衣神气活现，甚至还可以穿不合乎任何规定的奇异军装，另一方面士兵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10—12年前西班牙军队是什么样子，一位英国作者这样写道：

“西班牙军队最没有军人的姿态，哨兵站岗时邈来邈去，军帽几乎要从后脑勺掉下来，枪在肩上晃荡，嘴里无所顾忌地大声唱着快活的西班牙舞曲。他们身上的军装要么常常缺这缺那，要么军装的衣裤褴褛不堪，以致即使在闷热的夏天也得穿上那件青石板颜色的大衣以遮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的鞋子破烂不堪，露出脚趾——这就是西班牙荣耀的军事生活。”^①

塞拉诺于1843年9月9日发布的一项条例中规定：

“今后，军队的所有军官和首长凡在公共场合不穿便服时，只能穿本团制服；并佩戴规定的军刀；同时所有的军官，除符合规定的准确军衔标志外，不得佩戴任何其他标志，不得再佩戴某些军官认为可以抬高自己身份的随意制作的怪异饰物。”

军官就是这样，现在来看看士兵：

“科尔多瓦准将亲自出面在加的斯发起一次募捐，为的是筹款给阿斯图里亚斯团的每个勇敢的士兵买一条布裤子。”

这种财政上的混乱，说明了西班牙军队自从1808年以来几乎无时不处于叛乱状态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还要更深远。在同拿破仑的长期战争中，形形色色的军队和将领们取得了政治势力，这次战争使西班牙军队第一次带上了御用军⁴⁰⁶色彩。从革命时期⁴⁰⁷起，许多奋发有为的人就一直留在军队里；游击队并入正规军就更增

^① 特·麦·休斯《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326、329—330页。——编者注

加了这个成分。因此,一方面将领们保持着他们的御用军式的野心,另一方面士兵和下级军官却始终受着革命传统的鼓舞。这就为1819—1823年的起义⁴⁰⁸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后,在1833—1843年⁴⁰⁹,内战又把军队和将领们推到了重要地位。各个方面都把军队当做工具使用,那么军队一时间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就不足为奇了。

德·普拉特神父曾说:

“西班牙人是一个尚武但不懂军事的民族。”^①

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对军事纪律最反感的肯定是西班牙人。但是这个曾以步兵闻名世界达百余年的民族,要重新建立一支可引以自豪的军队,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更需要改变政治生活。

① 多·迪·德·普拉特《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189页。 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马克思从1854年底开始为《新奥得报》撰稿，他的撰稿活动一直持续到1855年10月初。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一共在该报发表文章134篇。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的十几年中，《新奥得报》是除维也纳《新闻报》外，唯一一家马克思曾经定期为之撰稿的德语报刊。给《新奥得报》撰稿使马克思有机会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政治的状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内政外交、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马克思在撰写这样的政论文章时，主要参考了《泰晤士报》发表的有关英国议会辩论的速记记录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他还曾亲自到过议会会议现场。

马克思在给《新奥得报》撰稿时也与恩格斯保持着独特的合作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寄给《新奥得报》的有关克里木战争（见注32）进程的文章中。这类文章大都是马克思从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军事评论中翻译的。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的原文全部译成德文，有时把恩格斯的原文加以压缩后译成德文。他在利用这些文章时往往只作少量的修改和补充，或者作为一个整篇，或者作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收录了马克思于1854年12月29—30日和1855年1月1日所写的两篇通讯，是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写的第一批文章。在第一篇通讯中，马克思对维也纳会议（见注4）、英国军队的状况以及英国的舆论进行了评论；在第二篇通讯中，马克思对克里木战争中所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回顾。马克思在回顾时把恩格斯的原文《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因克尔曼会战》以及《克里木战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56—661、682—687和688—695页）中的一些段落进行了翻译和改写，在文章中加以利用。这两篇通讯以《回顾》为题分载于1855年1月2日和4日《新奥得报》第1号和第5号。——3。

- 2 1854年12月2日英国、法国、奥地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三国不得单独与俄国进行谈判,不允许俄军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应当是四项条款(见注3)。 — 3、66、70、241。
- 3 四项条款是参加克里木战争(见注32)的西方强国——英、法、奥——在1854年8月8日的照会中作为开始和谈的先决条件向俄国提出的:1. 俄国应当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代之以全欧洲共同保护;2. 开放多瑙河,使各国可以自由通航;3. 修改1841年7月13日伦敦海峡公约(见注42),以限制俄国在黑海的强权;4. 放弃对土耳其境内希腊正教徒的保护权。沙皇政府最初拒绝接受这四项条款,1854年11月终于被迫同意把这四项条款作为以后和谈的基础。四项条款在1856年巴黎和约之前一直是相关各国外交谈判的主要基础。 — 3、33、70、80、166、228、233、241、289、419、431、442。
- 4 从1853年7月至1856年初,英、法、普、奥为了调停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而在维也纳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结束克里木战争的1856年巴黎和约的基础。

英、法、奥、普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努力失败后,1853年7月24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见注41)。但这次调停无果而终,之后,英、法、奥、普加强了外交活动。

1853年12月5日,英、法、普、奥向土耳其外交大臣以及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提出以下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修改以前的俄土条约,列强保护基督徒的权利,改革土耳其行政制度。这份照会12月16日才到达君士坦丁堡。而在12月12日,英、法、普、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已经起草了一份照会,于12月15日送交土耳其政府(见注106)。

1854年1月13日,维也纳会议决定将土耳其政府接受1853年12月5日照会的声明通报俄国。1854年2月2日,相关代表再次在维也纳开会,讨论俄国政府提出的反建议,这些反建议包括:以条约的形式确定希腊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利,以此作为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的条件,但俄国拒绝修改1841年的条约(见注42)。

在英法分别于1854年3月27日和28日向俄国宣战之后,英、法、奥、普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代表于1854年4月9日签署了一份议定书。议

定书规定,签字国不得在调停俄国和土耳其冲突的问题上单独行动,并拟定了以下几点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给予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以不妨害苏丹独立和主权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及寻求在调整土耳其政治关系时保证欧洲均势的必要保障。

后来又举行了有关四项条款的谈判(见注3),英、法、奥于1854年12月2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见注2)。

在克里木战争没有中断的情况下,1854年12月28日和1855年1月7日,英、法、奥与俄方代表就四项条款的解释问题在维也纳进行了会谈。从1855年3月15日至6月4日,以上四国代表又断断续续地在维也纳举行了14次会议(见注274)。

1855年12月28日,维也纳会议在扩大了的四项条款的基础上确立了和谈条件。1856年初举行了最后一轮维也纳会议。——3、35、80、197、229、232、239、289、349、414、419、424、438、472、474。

- 5 指1854年12月30日法国立法团通过的发行5亿法郎公债以弥补战争开支的决定。——4、56。
- 6 招募外籍军团法案是陆军大臣亨·纽卡斯尔公爵于1854年12月12日向英国下院提出的,它在议会和公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854年12月23日,上院和下院最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法案。招募外籍军团法规定,要组建一支1万人的外籍军团,以补充在克里木参战的英国军队的数量。但直到1855年2月,组建外籍军团的工作才在帕麦斯顿内阁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一共招募了3338名瑞士人、8552名德国人和3535名意大利人。外籍军团实际上并未派上用场,它于1856年被解散。——4、56、118、137、163、566。
- 7 民军法案指1854年5月在议会获得通过的关于将民军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的法案。在英国,民军是按郡征集的志愿部队,服役期一般为六年。他们按正规军受训,原则上只在英国领上(包括英国殖民地以及英国最重要的海外地区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和科孚)服役。1907年,民军经过改组而成为正规军的一部分。——4、136、282、545。
- 8 反雅各宾战争即二十三年战争,又称拿破仑战争,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

1792年2月,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对革命的法国发动战争。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开始。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1793年春,反法同盟从四面向法国本土进攻,并支持法国王党叛乱。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会战中反法联军被击败。1797年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同盟瓦解。

1798年12月,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1800年6月,拿破仑在意大利马伦戈会战(见注209)中击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后又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同盟解散。

1805年夏,英、俄、奥、瑞典等国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会战(见注220)中大败俄、奥联军,签订普雷斯堡和约。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见注16)中击败普军主力,1807年2月8日在埃劳、6月11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打败俄军,迫使俄、普签订蒂尔西特和约(见注343),第四次反法同盟联军失败。

1809年春,英、奥等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同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

1813年10月,在莱比锡会战(见注207)中,拿破仑被击败,1814年3月,第六次反法同盟俄、普、奥、瑞典的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年3月,拿破仑回到巴黎复位,英、俄、普、奥等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在滑铁卢会战(见注30)中拿破仑被击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长达2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最后结束。——5、330、480、500、514、543、557。

- 9 阿利马河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32)期间俄军与英、法、土耳其联军于1854年9月20日在阿利马河进行的第一次大会战。联军在菲·拉格伦勋爵和阿·圣阿尔诺元帅的指挥下击败了俄军。俄军尽管遭到失败,仍能做到有序撤退并将所有的火炮撤到安全地带。而英国军队却未充分利用良机从北面乘胜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而是开始了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见注10)。对此,恩格斯在《克里木的消息》和《阿利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26—632、

643—649 页)中作了描述。——7、124、288、293、539、577。

- 10 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即巴拉克拉瓦会战。在阿利马河会战(见注 9)以后,以土耳其军队和英国军队为主的联军在巴拉克拉瓦建立了坚固的营地。1854 年 10 月 25 日,俄军向联军的这片营地发起进攻。最初,英军在法军的援助下守住了阵地,但后来由于非·拉格伦勋爵下达的采用骑兵进攻的错误军事命令,使得英国的轻骑兵团被帕·彼·利普兰迪将军指挥的俄军歼灭,战况由此急转直下,对英军极为不利。而俄军则守住了最初在同土耳其人的交战中所夺得的阵地。关于这次会战,恩格斯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克里木战役》、《东方战争》和另一篇《克里木战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56—661、662—670、671—681、688—695 页)等几篇文章中作了描述。——7、50、57、62、65、68、124、127、132、133、162、176、220、232、263、293、459、545。
- 11 在奥斯曼帝国,帕沙是对最高级别的文官和武官的一种称呼。其中一等帕沙即级别最低的帕沙是一种终身制的文官,而二等和三等帕沙是将军。——7、127、131、149、176、206、585。
- 12 1854 年 4 月 19 日,土耳其军队在卡拉法特成功地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有关这次成功防守的描述可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欧洲战争问题》以及恩格斯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77—81 页和第 141—145 页)。——7、50、216、277。
- 13 1853 年 11 月 4 日,俄军企图夺回几天前被土耳其占领的、位于奥尔泰尼察的一座桥头,因为它威胁到俄军的交通线。但这一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有关这一军事行动的描述可参看恩格斯的《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605—612 页)。——7、592。
- 14 指俄军 1854 年 5 月 17 日—6 月 22 日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是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南岸的一个要塞,这次围攻是克里木战争(见注 32)期间俄军在多瑙河战场的一次主要军事行动。由于奥地利采取敌对态度,让主要兵力在俄军的后面行动,俄军最后只得撤离多瑙河。恩格斯的《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土战场的形势》、《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332—345、346—353 和 379—384 页)对这次围攻作了描述和分析。——7、35、

50、275、578、592。

- 15 因克尔曼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 32)时期俄国军队和英法联军于 1854 年 11 月 5 日在因克尔曼附近进行的会战。会战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俄军不得不放弃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解围的努力,俄军的力量也因此受到削弱,开始接受在四项条款(见注 3)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由于俄军采取了积极行动,而联军特别是英军遭到了重大损失,迫使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长达十个月的围攻。恩格斯在《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82—687 页)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会战。—— 8、138、220、232、270、288、293、547、580、603。
- 16 指普鲁士军队与拿破仑军队 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会战。担任掩护主力任务的普军指挥官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占领普军侧翼瞰制萨勒河谷的兰格拉芬山。拿破仑抓住普军的错误,从这里发起进攻。普军几乎全军覆灭。—— 8、389、531。
- 17 金字塔会战是 1798—1801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在战术上作出重大贡献(采用密集师方阵)的一次会战。1798 年 7 月 21 日拿破仑在金字塔附近与埃及的马木留克(见注 18)兵交战。拿破仑将其军队编成方队,把敌方置于两处火力中间,以这种方式几乎全歼了敌军的兵力。—— 8。
- 18 马木留克是对阿拉伯语中“奴隶”一词的音译。奥斯曼帝国时代常训练马木留克作为苏丹的卫队。—— 8。
- 19 纳尔瓦会战是北方战争(1700—1720 年)期间的第一次会战,于 1700 年 11 月 30 日在纳尔瓦进行,交战的双方是彼得大帝的俄国军队和查理十二世的瑞典军队。瑞典军队袭击了俄军并攻占了俄军带有防御工事的军营。—— 8。
- 20 罗克鲁瓦会战发生在三十年战争(见注 286)期间(1618—1648 年)。1643 年 5 月 19 日,西班牙军队围攻罗克鲁瓦(位于阿登省对法国香槟地区起护卫作用的一个要塞),受到孔代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的沉重打击而全军覆没。这为法国人进入西属尼德兰开辟了通道,并使三十年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进程发生了巨大转变。—— 9。
- 21 《报刊和军事制度》是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3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

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1 月 6 日《新奥得报》第 9 号。当时的英国报刊对英军在克里木所遭受的灾难作了大量详细的报道,其中最突出的是《泰晤士报》,它派往克里木的战地记者对英国在军事管理上的混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关于亨·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马克思在自己于 1853 年秋所写的《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395—478 页)一文中曾作过详细的评述。但在《报刊和军事制度》中马克思谈到了《帕麦斯顿勋爵》一文所没有指出的一些事实,例如,帕麦斯顿在 1830 年根据利文夫人的提议而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在 1838—1842 年英阿战争(见注 23)中葬送了一支英国军队,而在 1839 年还使得法国提议的针对俄国的联盟走向了反面。——10。

- 22 1854 年 11 月 13—14 日的暴风雨给在黑海的联军舰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有关情况可参看恩格斯《克里木战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688—695 页)。——11,299。
- 23 阿富汗战争即第一次英阿战争(1838—1842 年)。1838 年,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尔)拒绝同英国结成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不能把阿富汗变成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于是决定用军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扶植亲英的已遭驱逐的前统治者舒扎沙赫为王。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抢劫一空。1839 年 8 月占领了喀布尔,俘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1841 年 11 月阿富汗人民起义,英国军队溃退。1842 年 8 月,英国人再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13,147。
- 24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的伦敦公约。1839—1841 年土埃战争和由此引起的各大国间的矛盾加剧,使得东方问题在 40 年代变得尖锐起来。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 1839 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于 1831—1833 年在法国的外交支持下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于 1839 年 7 月 27 日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声称所有大国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就势力范围问题存在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法国因此面临形成新

的反法同盟的危险,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1841年7月13日包括法国在内的相关各国签订了第二个伦敦公约(见注42)。——13、38、203、240。

- 25 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而不署作者的名字。自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删去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随意改动文章的内容,这种做法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让马克思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趋右倾。

《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恩格斯大约在1854年12月22日到过伦敦与马克思会面。这篇文章可能是恩格斯从伦敦返回曼彻斯特后写的,最迟写于1855年1月4日。在文中,恩格斯对他在《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98—304页)一文中探讨过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实际上是揭示了英国军队1854—1855年冬季在克里木处境急剧恶化的背景和原因。文章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5年1月6日离开利物浦,于1月19日抵达波士顿,1月20日或21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1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3号。

马克思在1855年1月5—6日将《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一文的大部分内容翻译成德文,对个别段落进行了概括,并作了删改和补充,寄给《新

奥得报》。文章被分成两篇通讯,以《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为题,发表在1855年1月8日和9日《新奥得报》第11号和第13号。这两篇通讯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15。

- 26 英国从1801年开始设立陆军和殖民大臣,他的官邸位于殖民部。在战时,他对军队具有总的但有限的支配权。他是军队在议会的代表,对除军械部队以外的军队的财政也具有一定的支配权。1854年陆军部与殖民部分开,设立单独的陆军大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评论,见恩格斯《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马克思《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和《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98—304、317—323和324—331页)。

1855年,陆军大臣和军务大臣的职位合而为一,军需部划归陆军部,军械局取消,它的事务分别划归总司令和陆军大臣管理。——17、77、88、102、118、123、156。

- 27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即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于1808—1814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岛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反对法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在反击拿破仑军队时,西班牙人广泛地运用了山地游击战的方法,与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同时在比利牛斯半岛行动的,还有阿·韦·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军。拿破仑第一于1812年在俄国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军。——18、23、206、531。
- 28 1832年海军首席大臣詹·格雷厄姆下令海军的一切事务由海军部总管,1837年亨·乔·格雷伯爵领导的委员会主张军队的一切非军事事务由军务大臣集中管理。——18。
- 29 赫拉克利亚半岛是克里木半岛南端白因克尔曼到巴拉克拉瓦以西的那部分土地,是克里木战争(见注32)的重要战场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就在这个小半岛上。——21、50、57、125、130、171、215、248、360、389、400、444、447、521。
- 30 指滑铁卢会战,它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联军进行的最后一次

会战。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在利尼(比利时)会战中击败由格·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阿·韦·威灵顿率领的英荷联军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1815年6月18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最终失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一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23、497、520。

- 31 《工商业危机》是马克思为探讨1849—1854年期间世界经济现实问题而写的,由内容上密切关联的四篇系列通讯组成。它们分别写于1855年1月8、9、16和22日,以《工商业危机》、《1849—1853年英国贸易和工业的增长》、《贸易危机》(第三篇和第四篇为同一标题)为题发表在1855年1月11、12、20和25日《新奥得报》第17、19、33和41号。——24。
- 32 东方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25、47、88、307、492、529、532、535。
- 33 “把猫头鹰带到雅典”是希腊的谚语,同中国谚语“石头往山里搬”意思相近。在雅典及其城郊猫头鹰非常之多。——26。
- 34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即贵格会,见注38)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见注37)的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自由贸易派的领导者(如理·科布顿)同时也是和平协会的领导者。——27、230、292。
- 35 指1806—1812年俄土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拿破仑战争(见注8)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战争从1806年开始,进行到1812年(1807—1809年曾中断)。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战局转而有利于俄国。战争以俄土两国于1812年5月28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结束。——28。
- 36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这场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

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1828年4—10月是战争的第一阶段,1829年5—8月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舒姆拉、瓦尔纳等要塞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8年10月11日,瓦尔纳被俄军攻占。1829年5月30日,土军在库列夫恰(保加利亚)会战中被击溃。1829年夏,俄国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于6月11日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829年9月14日,土耳其接受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50)。——28、239、316。

- 37 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54)。这种观点也被称做曼彻斯特主义。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80)。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29、43、110、129、165、184、188、211、233、259、354、404、440、452、479。

- 38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30。

- 39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早在1850年1月,即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18个月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相关内容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和《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67—281页和575—621页)。——30、43。

- 40 《四项条款》由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9、12 和 15 日为《新奥得报》写的三篇系列通讯组成,这三篇通讯分别发表在 1855 年 1 月 13、15 和 18 日《新奥得报》第 20、23 和 29 号。第一篇通讯发表时未加标题,第二篇和第三篇分别以《无条件接受四项条款》、《关于四项条款的评论》为题。——33。
- 41 为了调停俄土冲突,1853 年 7 月 24 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在维也纳召开一个有奥、英、法、普代表参加的会议(见注 4),俄方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照会,即所谓的第一个维也纳照会。它的草案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拟定,1853 年 7 月 31 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 49)和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 50),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会的权利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但是苏丹政府在路西德帕沙 1853 年 8 月 19 日给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照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保留条件,尤其是把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作为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沙皇政府表示不可接受。谈判因而中断。——33、116、121、442。
- 42 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指 1841 年 7 月 13 日以土耳其为一方,俄、英、法、奥、普五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第二个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行。公约未涉及战时的海峡制度,从而在形式上承认土耳其本身有权决定关于外国军舰通航的问题。公约废除了 1833 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 141)。——34、240、501。
- 43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重建波兰国家,1830 年 12 月 29 日在华沙爆发了由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并有大量波兰官吏参加的起义。俄国军队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下从 1831 年 1 月 25 日起对起义军采取行动。1831 年 9 月 8 日起义军被迫交出华沙,不过波兰其他地区的战斗一直进行到 10 月 5 日。起义被镇压后,波兰到那时为止还保留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最后痕迹也被清除。这次起义尽管失败,但由于它牵制了欧洲反动势力准备用于镇压 1830 年法国革命(见注 252)的一部分军队,从而具有国际意义。——34、148、333。
- 44 指 1825 年 10 月 16 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卡·

瓦·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涅谢尔罗德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和对外交路线的意见。波措·迪·博尔哥在他的紧急报告中分析了各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建议俄国对土耳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份紧急报告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34。

- 45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波措·迪·博尔哥1829年6月29日的紧急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和约必须在我们的军营里签订,而且务必做到在它生效之前欧洲对它的条款是毫不知情的。到生效时,反对就太晚了,而当欧洲无法加以阻止时,它就会乖乖忍受。”(见《公文集。外交评论》1844年伦敦版第2辑第2卷第7号第357页)波措·迪·博尔哥的这个思想来自赫·安·利文公爵和安·马图舍维奇伯爵1829年6月13日就阿德里安堡条约一事从伦敦给卡·瓦·涅谢尔罗德的紧急报告(参看《公文集。外交评论》1843年伦敦版第2辑第1卷第1号第24页)。——35。
- 46 詹·格雷厄姆在任英国内务大臣时曾于1844年授意英国邮政主管部门拆阅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并将信件内容转告那不勒斯和奥地利政府。在被拆阅的信件中,包括邦迪埃拉兄弟给朱·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谈到了以在意大利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统治和奥地利统治为目的的卡拉布里亚远征计划。远征刚开始,其成员就被俘虏。邦迪埃拉兄弟和其他7名远征队员经秘密审判后于1844年7月被处决。——36、113、470。
- 47 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代表和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代表于1814年9月18日—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断断续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于1815年5—6月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了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根据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规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

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维也纳会议决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 38,158,480。

- 48 这里指 1815 年 6 月 9 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 47)上通过的条款,其中规定允许船只在流经各个国家的河道上自由通航。—— 38。
- 49 指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该条约是 1768—1774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774 年 7 月 21 日签订的和约。根据条约,俄国获得了南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包括金布恩要塞在内)以及亚速、刻赤、叶尼卡列等城市,并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和其他鞑靼人居住地区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吞并这些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必须给予土耳其的正教会一系列特权,特别是在第十四项条款中,规定在君士坦丁堡建一座正教教堂。—— 38,266,296,416,423。
- 50 阿德里安堡条约是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见注 36)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829 年 9 月 14 日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实际上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对土耳其的义务仅限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颁布特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 38,85,148,296,585。
- 51 指英、俄、法三国代表于 1827 年 7 月 6 日在伦敦缔结的公约。1827 年的伦敦公约确认了英俄 1826 年 4 月 4 日签订的彼得堡议定书,承认希腊自治,公约还包括一个有关在外交上承认希腊以及武装调停希腊和土耳其冲突的协定。公约的第五条规定,俄、英、法在帮助希腊独立的战争中不得寻求领土扩张,不得单方面谋取其他两国所没有同时获取的影响力和贸易特权。—— 38。
- 52 二月敕令是指沙皇政府 1836 年 2 月 7 日颁布的命令。这个命令规定在多瑙河的苏利纳河口设立俄国检疫所,这个检疫所实际上起到了控制多瑙河支流,监督这段航线上船只航行的关卡作用。当英国议会在 1836 年

4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亨·帕麦斯顿声称,俄国的行动并未妨碍英国和土耳其的贸易,因此英国没有理由进行外交干涉。马克思对此事的评论见《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61—466页)。——38,149。

- 53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是马克思1855年1月11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文章的主题与马克思1855年1月8日和9日为《新奥得报》撰写的两篇通讯(见本卷第24—28页)相同,不同的是,《英国工商业的危机》一文的论述更为详细,增加了关于英国同中国的出口贸易的论述。文章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5年1月13日离开利物浦,于1月25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1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7号。
- 这篇文章的草稿保存在马克思1854年底的一个摘录本中,草稿是马克思于1855年1月10—11日在这个摘录本的空页上撰写的,由于内容与《英国工商业的危机》一文大致相同,只在脚注中把没有利用的材料作了说明。——40。

- 54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见注7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80)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43,146,181,184,188。

- 55 滑动比率制是英国谷物法(见注54)存在期间实行的一种规定谷物税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税的高低同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标准成反比例。滑动比率实施草案是由托利党坎宁内阁于1827年拟定的,经过修改后于1828年由托利党威灵顿内阁作为法律实施。在关于滑动比率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是1842年由托利党皮尔内阁实施的。——44。

56 指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1年中国爆发了反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建号太平天国,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圣库制度;反对孔孟思想;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整个起义席卷了全国18个省,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外国的侵略势力。——48。

57 在《克里木战局》和《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克里木的战况进行了评述。

马克思在1855年1月12日和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无法判断,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文章是一篇还是两篇。马克思在1月19日将手稿寄往纽约。文章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5年1月20日离开利物浦,于1月30日抵达哈利法克斯,最迟在2月2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收到马克思寄来的手稿后,把它加工整理成三篇通讯。

《克里木战局》是其中改动不多的一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04号。在发表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开头加了如下的话:“对于粗率而愚蠢的管理不善造成的灾难和痛苦的描写,没有比今天早上发表的本报驻君士坦丁堡通讯员的报道所提供的画面更为阴暗的了。诚然,他对英军在克里木的状况的描述总的来说确实没有提供什么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新情况,但是他用英国作家少有的自然流畅和生动鲜明的笔调表达了如此被毁灭的军队的感受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人的感受,有些细节是新的,也是令人痛心的。人们从心底里对政府及其代理人、对掌握指挥权的将领、对军需部、对造成如此骇人听闻的管理不善的制度感到强烈的愤慨。我们相信本报通讯员没有半点夸大;读者可以从我们的一篇伦敦通讯中看出,这种感受是英国人民所共有的。”

其余两篇文章以《〈论坛报〉和战争》以及《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为题,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2月3日和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04号和第4305号。由于在发表时被《论坛报》编辑部作过很大修改,本卷没有收入。

马克思在1月19日将恩格斯的上述手稿的主要内容翻译成德文,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该文以《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为题,发表在

1855年1月23日《新奥得报》第37号。——49、55。

58 《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是马克思于1855年1月19日为《新奥得报》撰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第35号。1855年1月19日的《晨报》报道了英国民众要求修改有关酒馆星期日营业时间的法令的大签名活动，单在曼彻斯特就有18000人签名，马克思显然是受到此事的触动而撰写了这篇文章。——52。

59 啤酒法案即1854年啤酒销售法案，指约·威尔逊·帕滕于1854年7月13日向英国下院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定啤酒和其他酒类在星期天出售的法令》。该项法案对酒类的零售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酒馆在星期日的开放时间作了规定，酒馆开放时间被限制在13时至14时30分和18时至22时。该法案在上院中主教们的支持下于1854年8月7日在议会迅速获得通过。——53、66、504。

60 一些主张严格遵守星期日戒律、去教堂礼拜和静思的协会认为啤酒法案（见注59）的规定还不够彻底，各种主张完全禁酒或适当饮酒的协会也对这个法案感到不满。这些协会与教会关系密切，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把它们统称为教会派。这些人在诺丁汉的一次大会上请求议会通过一项要求所有酒馆在星期日全天停止营业的法令。——53。

61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这里指《1839—1841年有关东方事件和土埃之间冲突的信函》。——54、162。

62 在恩格斯的《克里木的前景》和马克思的《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骚动》这两篇文章中，有关俄国军队的那部分内容基本相同。马克思为了说明俄国假借维也纳谈判（见注4）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而把恩格斯文章中这部分内容译成德文，收在自己的文章中。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于1855年1月16日出生后，暂时接替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参看马克思1855年1月17日和19日给恩格斯的信）。《克里木的前景》可能写于1855年1月22日，但也不排除这篇文章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从两篇恩格斯的手稿合并而成的，如

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恩格斯第二篇手稿的完成时间应该不晚于1月25日。文章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月27日离开利物浦,2月9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2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10号。

《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骚动》是马克思1855年1月23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文中有关英国酒馆星期日营业时间对民众生活的重要性的阐述,是对他在《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见本卷第52—54页)一文中相关评述的进一步发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1月26日《新奥得报》第43号。——58,65。

- 63 瓦尔赫伦岛远征指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见注8)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斯海尔德河口。英军在占领瓦尔赫伦岛以后,未能扩大战果,4万人的登陆部队因饥饿和疾病损失了1万人左右,因而被迫于1809年12月从瓦尔赫伦岛撤退。——58,89,371。
- 64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19世纪30—70年代法国殖民者为征服阿尔及利亚而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长期的顽强反抗。法军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当地居民,到1847年基本上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十年,直到1871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60,402。
- 65 指1789年的尼德兰人起义。1789年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即所谓布拉班特革命,此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独立的比利时民族国家。起义于1790年底被奥地利军队镇压。——67。
- 66 《议会常会开幕》是马克思1855年1月24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1月27日《新奥得报》第45号。马克思在文中对1855年1月23日复会的英国议会的辩论情况作了评述。马克思的选题是非常敏锐的,文中谈到的罗巴克提案(见注72)是促使阿伯丁内阁倒台的导火线。——68。
- 67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于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坎尼(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地区的一座古罗马城市)会战中击溃了在人数上远胜于自己的罗马军队,48000名罗马

人被杀死,1万人被俘虏。坎尼会战是古代战争史上成功运用包围战的一个范例。——69。

- 68 《论内阁的危机》是马克思1855年1月26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1月29日《新奥得报》第47号。英国议会下院围绕罗巴克提案(见注72)将要展开的辩论从1月25日推迟到26日,因此,马克思在文中对哪些问题在将要进行的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政府内部有哪些分歧作了一个概述。——72。
- 69 殉道派教徒(原文:Fedavee,意即自我牺牲者)是对哈桑·本·萨巴赫在11世纪末创立的阿萨辛派中部分教徒的称呼。阿萨辛派属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伊斯玛仪派,这个教派的成员曾经反抗过在伊朗进行统治的突厥—塞尔柱人,也反抗过十字军。它的创建人和后来的几个继承人自称为“山中长老”或“山王”。——72。
- 70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73)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71)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37)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72、75、93、105、110、112、129、146、152、179、192、210、262、368、375、395、433、489、495。
- 71 皮尔派是英国一批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人(见注73)。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见注54),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72、105、110、112、121、129、152、168、262、266、292、404、411、440、452、474。
- 72 约·阿·罗巴克于1855年1月23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要提交一份提

案,建议成立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调查英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案提出后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这个提案实质上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最终促使阿伯丁内阁倒台。亨·帕麦斯顿组阁后对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作了调整,本·迪斯累里和爱·亨·斯坦利等人被一些军人取代;因为担心调查委员会披露的事实会影响与法国的关系,所有证词只能涉及英军本身。

根据罗巴克提案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于1855年3月5日—5月15日开展工作,但直到1855年6月18日才提交报告。所有的大臣在报告中都受到了指责。对报告的讨论经一再拖延后于7月18日举行。——72、75、92、100、110、165、204、233、260、356、421、471、489、495、499、525。

- 73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70)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7)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4)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73、96、105、110、129、145、154、181、210、228、256、368、375、395、408、413、433、439、453、188、493。

- 74 这句话引自威·海特《1855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

《新奥得报》编辑部在马克思的文章末尾加上了下面一段话:“根据1月26日和27日发自伦敦的电讯,约·罗素勋爵在向议会说明自己辞职的原因时,他所列举的文件中还包括他同阿伯丁勋爵的来往信件,他在信中坚决主张在军事领导方面作某些改变。在他看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的凄惨情况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尽管他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还是无法判明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帕麦斯顿勋爵批评约·罗素勋爵的辞职理由,但同意必须竭尽全力进行战争。他肯定地说,全部舰只的使

用一直都是适当而有效的,它们正在把部队、制服和粮食运往克里木;他提议就信任或不信任政府进行正式投票。罗巴克的演说——虽然可以看出演说人是病了——不断为全体议员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阿伯丁伯爵在上院声称,虽然一位有影响力的同僚辞职了,但是大臣们仍然认为应该反对要求任命调查委员会的提案。”——74。

- 75 《议会状况》是马克思1855年1月27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1月30日《新奥得报》第49号。马克思在文中对1855年1月26日英国议会下院围绕约·罗素辞职一事进行的辩论作了概括和分析。从文章对下院会议的气氛、各派对罗素辞职的反应等的描写来看,马克思可能亲自到过议会辩论现场。——75。
- 76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性地把英国几个贵族家族举足轻重的作用与12—15世纪威尼斯执政官的政治统治地位作比较。执政官的统治地位被写进了当时的威尼斯条约,并于1171年在威尼斯召开的所谓宗教大会上通过。——78。
- 77 皮由兹教派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国教会中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派,以它的创始人之一、牛津大学的神学家菲·皮由兹的名字命名。该派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因此又被称为崇礼派或重仪派。该派的拥护者还将他们的教义写成文章或小册子,以《时代书册》为总标题出版,故又被称为书册派。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于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78,88,270,421。
- 78 英国买卖军衔证书的现象产生于17世纪末,后经国王批准而形成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871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地位。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逾期仍得不到与其军衔相符的任职时,便可按照惯例,出卖自己的军衔证书,然后领取原职位的一半军饷,几年之后再最终退役。马克思在1855年3月3日写给《新奥得报》的通讯《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见本卷第193—196页)中也谈到了英国买卖军衔的情况。——78,193。
- 79 《欧洲战争》是恩格斯最迟于1855年1月28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

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探讨了当时为结束克里木战争(见注 32)而进行的外交谈判与战事的可能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奥地利的特殊作用。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于 1855 年 2 月 3 日离开利物浦,于 2 月 15 日抵达波士顿,16 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5 年 2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16 号。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是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29 日为《新奥得报》准备的通讯,其中除了关于英国议会辩论的内容外,马克思还将恩格斯《欧洲战争》一文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略加改动,构成该文有关军事的部分。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2 月 1 日《新奥得报》第 53 号。——80、87。

- 80 在《阿伯丁内阁的倒台》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阿伯丁内阁倒台的经过进行了评述。文章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应该是马克思在 1855 年 1 月 29 日—2 月 2 日之间写成的,从所使用的材料来看,应该在 1 月 30 日就基本完成了。马克思把这篇通讯和恩格斯的《欧洲战争》(见本卷第 80—86 页)一起寄出,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于 2 月 3 日离开利物浦,2 月 15 日抵达波士顿,2 月 16 日到达纽约,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16 号,发表时署名卡尔·马克思,这是该报 1855 年发表的第一篇署有马克思名字的文章。——92。
- 81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1855 年)的讽刺性称呼。参加这个内阁的有辉格党(见注 70)和皮尔派(见注 71)的代表。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在执政党和托利党(见注 73)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彼此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所谓爱尔兰旅(见注 90),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 60 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阿伯丁组阁时给予三个爱尔兰议员以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旅的分裂。站在政府一边的爱尔兰议员的支持者是天主教上层僧侣、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害怕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大地主。以查·加·达菲为首的爱尔兰旅的另一部分人所依靠的是争取政府在爱尔兰实行新土地租佃法的爱尔兰富裕租佃者阶层。马克思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89—595 页)和《被推翻的内阁》(见本卷第 105—108 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一届英国政府》(见本卷第 112—119 页)中都对阿伯丁联合内阁作了评述。——92、100、105、113、121、262。

- 82 少数派指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 81)时期英国议会中的各个不同的小派别和集团,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议会里缺少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它们能够影响议会斗争的进程,因此起的作用相当之大。马克思在《政党和集团》(见本卷第 109—111 页)一文中对议会里的派别和集团作了评述。——92。
- 83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 1794 年失败后通过的 1795 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执行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 1799 年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见注 210)中被推翻。——94、100。
- 84 指悉·赫伯特对历史事实的混淆。赫伯特把 1793 年发生的事件说成是 1795 年成立的法国督政府(见注 83)所为。1793 年 1 月 2 日,即在革命的法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国民公会派委员和陆军部长到沙·弗·杜木里埃将军指挥的北部军队的大本营去传达一项命令,要求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就他被控背叛革命一事所举行的听证会。杜木里埃拒绝服从国民公会,逮捕了委员和陆军部长,并把他们引渡给奥地利人。此后不久,杜木里埃公开投奔奥地利。——94、100。
- 85 指亨·帕麦斯顿在 1847 年英希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1847 年英籍葡萄牙商人大·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以此事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意欲迫使希腊割让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次冲突直到 1850 年 4 月底才得以平息。1850 年 6 月 25 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就这次冲突发表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并宣称,正如“我是罗马公民”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然无恙。帕麦斯顿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称号。——97、145、117。
- 86 德比内阁指以爱·德比伯爵为首相的托利党(见注 73)内阁。这届内阁的执政时间为 1852 年 2 月 23 日—12 月 16 日。——97、105、112、191、211、282、369。
- 87 《论内阁危机》是马克思 1855 年 2 月 2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

发表在1855年2月5日《新奥得报》第59号。马克思在文中对1855年2月1日英国议会上院的会议进行了评述。 100。

- 88 在《被推翻的内阁》、《上一届英国政府》以及《两种危机》这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历史进行了评述。

《被推翻的内阁》是马克思在1855年2月3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2月7日《新奥得报》第63号。

《上一届英国政府》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著述的又一个范例。马克思在1855年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答应给恩格斯寄一些关于联合内阁的材料。马克思在1855年1月31日把恩格斯所需的材料寄给了他，还在同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拟出了一个有关阿伯丁联合内阁历史的详细概要。虽然现在无法确定马克思给恩格斯的材料究竟有哪些，但恩格斯在写作《上一届英国政府》时显然参考了这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1月31日的信，因此这篇文章与马克思同样也是根据他拟就的概要所写的《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在内容上大体一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应该是恩格斯于2月5日和8日之间完成的，马克思在2月9日把它与恩格斯的《克里木的斗争》（见本卷第124—128页）一起寄出，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2月10日离开利物浦，于2月21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

《两种危机》是马克思于1855年2月6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2月9日《新奥得报》第67号。这篇文章发表后，马克思对英国内阁危机和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分析告一段落。——105、112、120。

- 89 梅费尔激进派指一群支持自由派的英国贵族政治家，他们主张对议会、殖民地管理、刑法和公立学校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拒绝一切工人保护法。梅费尔是伦敦海德公园以东的一处建有很多贵族私邸的豪华居住区，梅费尔派这个名称由此而来。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激进派，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比曼彻斯特学派（见注37）更加激进。梅费尔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是约·阿·罗巴克和威·莫尔斯沃思。——105、129、155。

- 90 爱尔兰旅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1847年以前，这个派别一直由丹·奥康奈尔领导。该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

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见注 73)和辉格党(见注 70)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见注 37)一起,能够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的斗争,有时还能决定政府的命运。

19 世纪 50 年代初该派部分议员与激进的爱尔兰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联合,在下院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党。1859 年由于爱尔兰旅的领导人同英国统治集团达成妥协,该反对党瓦解。——105、112、192、210、262。

- 91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105、112、311、481。
- 92 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法案与租佃者权利法案是对 1849 年的在典地产法令的补充,这些法案规定,如果地产所有者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可以拍卖他的典当地产。破产地主的地产因此而落入高利贷者、不动产经纪人和富裕租佃者手中。马克思对这些法案的分析和评价见《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以及《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71—177 页和第 281—294 页)等文。——106、116、213。
- 93 南海公司是 1712 年左右在英国成立的一家公司,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英国与南美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国家有价证券的发行权。该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后,于 1720 年宣告破产,欠下了巨额国债,它的股票收归国家管理。1853 年威·格莱斯顿曾按照自己提出的财政改革计划,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 3% 降到 $2\frac{3}{4}$ %,并通过收买该公司贬值股票的办法来偿还一部分国债。——106、115。
- 94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 1600—1858 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 18 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 19 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

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 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 1854 年 4 月 30 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107、114。

- 95 约·罗素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是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 81)作出的最重要的承诺之一。但是直到 1854 年 2 月 13 日内阁才把有关选举改革的法律草案提交给下院。这份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给予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同等的地位,重新调整选举财产资格。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权力。但是,1854 年 3 月英法对俄宣战,反对派以此为借口,要求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最终不了了之。——108、113、122。
- 96 1853 年 4 月,英国当局声称在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一家私人火箭厂发现了所谓的“火药阴谋”,意欲借此对侨居英国的拉·科苏特及其他政治流亡者进行镇压。这一事件当时在英国使人联想起 1605 年天主教徒反对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火药阴谋”事件。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火箭事件。——瑞士的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95—99 页)以及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31 日给恩格斯的信。——108、113。
- 97 《政党和集团》是马克思 1855 年 2 月 5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2 月 8 日《新奥得报》第 65 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传统政党的瓦解进行了评述,早在 1853 年马克思就曾在很多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和第 12 卷)。——109。
- 98 亨·帕麦斯顿于 1855 年 2 月 4 日受命组阁,他的内阁在 1855 年 2 月 6 日至 1858 年 2 月 21 日期间执政。——112。
- 99 根据一项从 18 世纪初开始生效的法律,英国公职人员以及议会议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读一份表示摒弃天主教、否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代具有王位继承权的“退位誓词”,誓词的最后一句为“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宣誓”,这就使得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基督徒英国人不能担任国家公职,即使当选议员,也不能实际地参加议会工作。议会多次提出修改誓词的问题,如

- 约·罗素 1853 年 2 月就提出“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权利限制”的法案,但都遭到否决。这句誓词直到 1866 年才根据有关法令删除。——113、118、123、514。
- 100 约·罗素 1853 年 5 月 31 日在下院会议的发言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参看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25—136 页)以及马克思 1855 年 1 月 31 日给恩格斯的信。——114。
- 101 指关于取消报纸广告税和印花税的法案。印花税是英国政府从 1712 年开始对报刊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反对反对派报刊。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以致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限制了报纸的发行。1836 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 年 3 月 26 日和 6 月 15 日,关于取消报纸广告税和印花税的法案分别在下院和上院获得通过,印花税因此被取消。——115、233、259、265、478。
- 102 指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及其继任者乔·克拉伦登之间关于西摩尔同尼古拉一世于 1853 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通信。1854 年 3 月 2 日《圣彼得堡报》就罗素 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发表的反俄演说发表了一篇社论,暗示沙皇政府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有协议,并引用西摩尔的通信加以证明。英国政府在蓝皮书(见注 61)上公布了上述通信。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149—160、161—178 页)两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文件和英国政府在同尼古拉一世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116、117、122、414。
- 103 流法案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通过,它废除了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刑罚。罪犯在监禁一定时间后,可以假释,并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这些人大都成为公共工程的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281—294 页)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价。——116。

- 104 航海法案即航海条例,是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奥·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全部废除。——116。
- 105 指发生在1853年11月30日的锡诺普会战。土耳其一个区舰队在把军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的途中,被帕·斯·纳希莫夫指挥的俄国黑海分舰队发现并受到攻击。俄军参加会战的有6艘战列舰和2艘巡航舰,对抗上军有海岸炮垒炮火支援的16艘军舰(其中有2艘蒸汽舰)。可是,俄国舰队的火炮装备比土耳其优越。会战结果:土耳其舰队的15艘军舰被击毁,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被俘。锡诺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同时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116、121。
- 106 即四强照会,指由英国、法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联合签署、并于1853年12月15日递交土耳其政府的联合照会。四强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最重要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敕令的形式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特殊权利。土耳其政府于同年12月31日对这一照会作了答复。——116。
- 107 按照英国从1662年起实施的定居法,对于向教区济贫所申请救济的贫民,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们迁返原籍。1854年2月10日提交下院的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强迫贫民迁移的法案未被议会通过。——118。
- 108 在《克里木的斗争》和《帕麦斯顿。——军队》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对英法联军在克里木的战事进展情况进行评述。

《克里木的斗争》是恩格斯1855年2月7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马克思在2月9日把它寄出,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2月10日离开利物浦,于2月21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2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3号。

在《帕麦斯顿。——军队》一文中,马克思在第一部分继续报道英国

内阁重组情况,这一部分写于2月9日;而第二部分即有关军队的部分则摘自恩格斯的《克里木的斗争》。马克思在2月8日收到恩格斯的文章后,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译成德文,由于篇幅所限,作了一些删节、改写和调整,有关英军开小差的那一段(见本卷第131—132页)很可能是马克思补充的。这篇通讯首次发表在1855年2月12日《新奥得报》第71号。——124、129。

- 109 恩格斯可能参考了1855年2月10日《人民报》上的一则有关法国发生革命暴动的消息。这次暴动从鲁昂开始,一直发展到马赛,在报道刊出时仍在持续。联军1855年6月18日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失败的消息传开后在昂热也发生了暴动。——125。
- 110 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在1855年1月加入反俄联盟之后,同英法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撒丁有义务向克里木派遣一支兵力为15000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兵力最终增加到18000人,并于1855年5月离开意大利。撒丁王国之所以参战,主要是因为其统治集团希望在将来吞并被奥地利占领的意大利北部省份伦巴第和威尼斯的战争中获得法国的支持。它还指望凭借法国的支持来洗雪1848—1849年对奥战争(见注397)失败的耻辱。——126、131、136、247、279、359、385、402、405、594。
- 111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27)期间,由英军、西班牙军和葡萄牙军组成的联军在阿·韦·威灵顿和另外两位将军的指挥下围攻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与葡萄牙相邻的西班牙的一个边境要塞)。为迎击前来解围的法军,威灵顿曾于1811年5月14日和6月17日两度撤围。1812年3月16日重新开始围攻,4月7日,占领要塞的法军被迫投降,将要塞交给联军。——127、132。
- 112 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动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全国有32个省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一文中对政变作了分析。——130、146、160、202、256、291、394、520。

- 113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见注112)后,英国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勋爵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因这一表态事先未征得辉格党(见注70)其他阁员的同意,导致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19日被撤职。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分歧,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政府。——130、180。
- 114 《议会新闻:格莱斯顿的发言》是马克思1855年2月10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议会新闻》为题首次发表于1855年2月13日《新奥得报》第73号。英国议会批准从国家财政中追加200万英镑来弥补即将结束的1854—1855财政年度的军费赤字,马克思在文中引用关于英军健康状况和兵力的报告中的事实,证明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在向议会说明需要增加资金的理由时夸大了所援引的克里木残余英军数字。——133。
- 115 在《欧洲面临的战争》以及《议会和军事问题》这两篇文章中,关于英国军队有部分论述基本相同。

《欧洲面临的战争》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最迟完成于1855年2月12日。马克思在2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文章已于当天收到。因此文中有关2月13日下令组建英军第二营的那段话(见本卷第137页)很可能是马克思补充的。文章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5年2月17日离开利物浦,于3月1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大约于3月5日送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32号。

马克思于1855年2月21日将恩格斯《欧洲面临的战争》的主要内容翻译成德文,进行了少量的改写和删节,寄给《新奥得报》,以《军队的状况》为题发表在1855年2月24日《新奥得报》第93号。这篇文章内容与《欧洲面临的战争》大体相同,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

在《议会和军事问题》一文中,对英国议会辩论的评述是马克思写的,而有关英国军队的内容则是马克思从恩格斯《欧洲面临的战争》中摘译的,马克思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部分论述作了一些概括和修改。《议会和军事问题》一文首次发表在1855年2月23日《新奥得报》第91号。——135、162。

- 116 指当时英国军队的组织,一个团往往有一部分连队或营被派驻国外的殖民地。该团留在国内的连队或营就叫做后方连或后方营。法国也有类似情况。——137。
- 117 朱阿夫(原文:Zouave)本来是对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部落的称呼,后来又把北非诸侯的士兵称为朱阿夫兵。法国19世纪入侵阿尔及利亚(见注64)之后,于1830年底组建了两个由北非人组成但由法国军官指挥的“朱阿夫营”。30年代末,法国人加入朱阿夫营。1842年之后,所有不是法国人的朱阿夫官兵都被整编到所谓的“土耳其团”。拿破仑第三于1852年组建的三个朱阿夫团也全部由法国人组成。朱阿夫团参加了克里木战争,后来还参加了法国进行的其他战争。——138、246、252、273、287、347、387、394、401、405、536。
- 118 法国的外籍军团是法国为进行殖民战争和镇压宗主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31年建立的一支雇佣军队。外籍军团主要由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西班牙人中的难民、逃兵和冒险家组成。外籍军团曾参加过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1871年曾被凡尔赛军用来镇压巴黎公社。——138、536、566。
- 119 非洲营是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非洲部队。——138。
- 120 指模仿过去的皇家近卫军组建的部队。新组建的皇家近卫军包括:2个步兵旅,每旅2个掷弹兵团和2个轻步兵团,每团3个营;1个骑兵旅,其中包括1个胸甲骑兵团和1个向导团(见注379),每团1个中队;2个近卫宪兵旅,5个骑炮连以及1个工兵连。——139、247、537。
- 121 1855年1月29日,尼古拉一世发布了一项关于组建民兵的征召令,其中规定凡年龄在20—45岁之间、身高1.57米以上的男性都应应征入伍,不过征召的范围是俄罗斯中部地区的18个省,而不是像文中所说的“南俄罗斯”地区。由于一些省份缺少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男性,政府在征兵时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142。
- 122 《帕麦斯顿勋爵》由马克思在帕麦斯顿政府上台执政之际为《新奥得报》撰写的两篇通讯组成,基本上是马克思1853年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组著名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95—478页)的梗概,并且前半部分有多处段落是对1853年《帕麦

- 斯顿勋爵》中第一篇文章的摘译和改写。这两篇通讯分别写于1855年2月12日和14日,以《帕麦斯顿勋爵》和《帕麦斯顿》为题,首次发表在1855年2月16日和19日《新奥得报》第79号和第83号。——144。
- 123** 烧炭党是1806年在意大利,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秘密的政治团体。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实行政治改革,恢复意大利的统一。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宗旨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145。
- 124** 英国议会于1850年6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85)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当时的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在上院以37票的多数遭到反对,但得到下院的赞同。之后,法国和俄国通过它们驻伦敦大使表示对英国立场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拒绝出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145。
- 125** 英国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8)失败后,于1803年在德意志小邦,主要是汉诺威,招募了一支雇佣兵部队,这支部队一直存在到1816年。——146。
- 126** 比利时在1830年革命后,宣布脱离根据1815年维也纳条约(见注47)成立的荷兰联合王国,并获得维也纳条约各签约国的承认。在1831年6月和11月的伦敦会议上,通过英、法、奥、普、俄五国的调停,荷兰和比利时就这个问题拟定了一个最后协定,但荷兰拒绝签字,并出兵占领比利时。为了迫使荷兰退兵,法国派兵进入比利时,英法舰队封锁斯海尔德河口和荷兰海岸。1833年军事行动停止。1839年,比荷两国接受了列强拟定的折中条件,从此比利时脱离荷兰而获得真正独立。——147。
- 127** 在葡萄牙内战(1828—1834年)和西班牙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1833—1840年)期间,英国派兵封锁塔古斯河口和杜罗河口,其目的是反对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帮助两国恢复立宪君主制。1834年4月,英、法、西、葡签订同盟条约,这项形式上是针对“北方强国”(俄、普、奥)的条约加强了英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影响。——147。
- 128** 1838年4月16日,一支法国海军以保护墨西哥的法国公民为借口,封锁

了墨西哥的几处港口。封锁使英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尽管英国商人多次提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证英国船只自由通行,但在1839年3月19日的议会辩论中,亨·帕麦斯顿仍然维护英国政府坚持的不与法国发生冲突的立场。——147。

- 129 英法舰队在1845年至1849年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阿根廷海岸全线实施封锁,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向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这两条河流由于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的战争,从1841年起就被封锁了),并进而迫使阿根廷承认乌拉圭独立。1850年封锁由法国单独执行。1852年阿根廷政府接受了上述要求。——147。
- 130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订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年6月27日,双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英国对此强烈抗议。为了迫使斐迪南二世取消自己的决定,英国政府于1840年派遣舰队开往那不勒斯,迫使斐迪南二世于1840年7月21日取消了同法国签订的开采硫磺的协定。——147。
- 131 波斯湾远征指1838—1841年英伊冲突(见注23)期间英国舰队采取的军事行动。1837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沙赫派兵围攻阿富汗要塞赫拉特(最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为了加强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削弱俄国在伊朗日益强大的影响,英国政府声称,伊朗国王的行动是敌视英国的行动,要求撤除对赫拉特的围攻。由于伊朗国王拒绝执行这项要求,英国政府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于1838年派分舰队开入波斯湾,以战争相威胁。伊朗国王被迫撤除围攻,随后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利于本国的贸易条约。——147。
- 132 在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年)时期以及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1833—1840年)时期,英国都曾出兵西班牙。——147。
- 133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利用鸦片贸易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中国开展了禁烟运动,英帝国主义借机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47。
- 134 指美英之间为争夺北美边境地区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有争议领

土主要包括濒临太平洋的俄勒冈和美国缅因州北部地区。这些冲突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十分激烈。—— 147。

- 135 1840 年 7 月 15 日的伦敦公约(见注 24)要求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将他于 1831—1833 年占领的、包括叙利亚北部在内的全部领地立即归还土耳其苏丹,由于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执行这一要求,英奥舰队于 1840 年秋季炮轰了叙利亚沿岸地区的贝鲁特、圣让达克和其他要塞。—— 147。
- 136 马克思显然指的是英国对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的搜查权。英国在 19 世纪初宣称,为了反对奴隶贸易,有权在和平时期对所有行驶在公海、有贩奴嫌疑的船只进行搜查。这一要求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因为很多来自西非的运奴船只都打着美国国旗。但是英国检查葡萄牙船只的权利却在 1810、1815 和 1817 年的英葡条约中得到承认。英国免除葡萄牙的债务,作为回报,葡萄牙只允许本国船只运载一定量的奴隶到它当时的殖民地巴西,不允许别国贩奴者使用葡萄牙国旗。不过条约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183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英国船只扣押贩奴船只的法律。—— 147。
- 137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 1848 年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 1849 年 5 月 1 日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军事占领要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 1851 年才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在一定时期内苏丹在任命国君时应与沙皇协商;条约还规定,如再爆发革命,土耳其和俄国应采取包括重新实行军事占领在内的种种措施;与此同时,在这两个公国又恢复了 1831 年的组织规程。—— 148。
- 138 指 1852 年 5 月 2 日俄、奥、英、法、普、瑞典以及丹麦签订的关于丹麦王国领土完整和丹麦王位继承权的伦敦议定书,该议定书的基础是 1850 年 8 月 2 日上述各国(普鲁士除外)签订的一份确定丹麦王室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不可分割原则的协定书。1852 年的议定书把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也列为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当时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后),因为他是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的卡·彼·乌尔利希公爵即俄国沙皇彼得三世(1762 年在位)的后裔。尼古拉一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支持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公爵,后者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不过,如果格吕克斯堡王朝不复存在,那么俄国可

以援引此先例,要求继承丹麦的王位。——148。

- 139 俄国在反法同盟战争期间(见注 8)为了支付战争费用曾向荷兰霍普银行贷款。俄军把拿破仑的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之后,荷兰吞并了比利时。1815年5月19日,俄、荷、英在伦敦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英国因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所占领的荷兰殖民地,除向荷兰支付补偿费外,还必须和荷兰一起清偿俄国所借的一部分债款。伦敦协定是维也纳条约(见注 47)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协定只在荷兰和比利时合并未遭破坏期间有效。1830年比利时宣布脱离荷兰独立后,荷兰停止了付款。但是,1831年11月16日亨·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债务的新协定。——148。
- 140 指希腊脱离土耳其获得独立之后从它的三个保护国英国、法国和俄国那里获得的6000万法郎的贷款。1832年5月7日,英国、俄国和巴伐利亚在伦敦签署了一个条约,在第12条中确定了还款条件,但希腊政府始终没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148。
- 141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1833年7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军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登陆。这支登陆部队被派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卜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里。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沙皇的外交使团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同盟,并且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该同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条约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禁止外国军舰(俄国军舰除外)通过黑海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 50)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限为八年。——149,501。
- 142 《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是马克思1855年2月16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2月20日《新奥得报》第85号。马克思在文中主要对亨·帕麦斯顿在任命新的内阁大臣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评述。——151。

- 143 《议会》是马克思 1855 年 2 月 17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2 月 22 日《新奥得报》第 88 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议会在帕麦斯顿新内阁组成后于 1855 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下院会议进行了评述。——154。
- 144 指 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155、162。
- 145 指根据亨·帕麦斯顿的提议任命约·罗素为出席 1855 年 3 月再次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见注 274)的英国代表。——157、168、180。
- 146 罗·利物浦勋爵的内阁的执政时间是 1812 年 6 月 8 日至 1827 年 2 月。——158。
- 147 《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是马克思 1855 年 2 月 19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新奥得报》第 92 号。《新奥得报》通常将国外通讯刊登在该报的午报上，本篇例外刊登在该报的晨报上。1855 年 2 月 23 日《新奥得报》第 91 号在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议会和军事问题》(见本卷第 162—164 页)时加了一个脚注，对此作了解释：“19 日的通讯我们今天才收到，因此将在明天的晨报发表。”——159。
- 148 指法国的宴会运动。这是 1847 年 7 月—1848 年 1 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见注 353)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 1847 年 7 月 9 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 1847 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 70 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 17 000 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 1848 年 2 月 22 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 1848 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见注 151)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恩格斯《拉马丁先生的宣言》、《法国的改革运动》、《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

- 报》。民主主义的胜利》、《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159、355。
- 149 马克思讽刺性地把约·罗巴克提出的调查委员会比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最高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它于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救国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59、162。
- 150 1851年5月1日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伦敦开幕，博览会大厦是一座用金属和玻璃建造的特殊建筑，有水晶宫之称。——159。
- 151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353)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160、203。
- 152 指1855年1月在爱尔兰大法官法院审理的伊·汉德科克遗产纠纷案。伊·汉德科克于1853年2月去世以及她的女儿霍诺里娅于同年12月去世后，围绕她们的遗产继承权，以霍诺里娅的叔叔约·汉德科克为一方，以伊·汉德科克的儿子约·德·伯格为另一方，双方产生了争执。由于伯格据称是伊·汉德科克和乌·克兰里卡德伯爵的私生子，而伊·汉德科克的丈夫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又离奇地全都死亡，此案引起公众极大的兴趣。遗产案于1855年2月12日出乎意料地以和解告终，克兰里卡德虽为亨·帕麦斯顿的亲信，但由于此案而没有加入帕麦斯顿内阁。他1858年入阁是帕麦斯顿内阁倒台的原因之一。
- 马克思将这个案件与1847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舒瓦泽尔-普拉兰公

爵夫人案相提并论,普拉兰公爵夫人在家中被谋杀,嫌疑人是她的丈夫普拉兰公爵,他遭逮捕并在调查期间服毒自杀。——161、186。

- 153 《论新的内阁危机》和《休谟》这两篇文章都是马克思 1855 年 2 月 24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通讯,可能本来是一篇文章,由《新奥得报》编辑部分开,分别发表在 1855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新奥得报》第 97 号和第 98 号。

马克思在《论新的内阁危机》中对 1855 年 2 月 23 日的下院会议进行了评述。从文中的描述来看,马克思可能亲自到过议会辩论现场。——165、169。

- 154 指属于皮尔派(见注 71)的威·格莱斯顿、詹·格雷厄姆和悉·赫伯特这三位大臣退出内阁,因为他们反对继续执行由下院提出的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克里木军队情况的措施。——165。

- 155 威·格莱斯顿于 1845 年 2 月英国议会讨论梅努特神学院事务期间辞去商业大臣的职务。——167。

- 156 指 1845 年英国议会围绕给梅努特天主教神学院(1795 年创办于爱尔兰)增加经费的问题而进行的讨论。根据议会决议,从 1846 年起给梅努特神学院增加经费,用于修建和维修校舍,此举的目的在于拉拢爱尔兰的地主、天主教僧侣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从而削弱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167。

- 157 1831 年 3 月,辉格党(见注 70)内阁首相查·格雷和副首相约·罗素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这一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保证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下院。与此同时,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潮。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于 1832 年 6 月 4 日经上院最后批准,于 6 月 7 日生效。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改变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

关于这项议会改革法案,可参看恩格斯的《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99—310 页)。——169、181、188、352、373、436。

- 158 沃里克是布尔沃·利顿的小说《最后一个男爵》中的人物。约·休谟在为这部小说所写的短序中称沃里克是“国王制造者”(见布尔沃·利顿《最后一个男爵》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6页)。但马克思是否直接参阅了这部小说尚无法判断。他也有可能是从莎士比亚的戏剧,特别是《亨利六世》中了解到沃里克在英国15世纪蔷薇战争中所起的“国王制造者”的作用的。——169,441。
- 159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92)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169,237、383。
- 160 约·罗素领导的辉格党内阁的执政时间是1846年6月30日至1852年2月21日。——169,191。
- 161 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见注37)中的一个激进的政治流派,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拥护者。这个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见注192)的人民宪章(见注159),指望在宪章派1848年4月10日的示威游行失败后,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理·科布顿、约·布莱特和以菲·奥康瑞尔为首的宪章派中改良派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在50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
- 小宪章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约·休谟1848—1851年间多次在英国议会中提出的关于选举改革的法律草案的名称。休谟的法律草案要求:凡有住房或部分住房的人都有选举权,议会每三年改选一次,选举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小宪章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纲领。——169,383。
- 162 在英国,直到1872年推举候选人还通过举手来表决,没有选举权的人也

可以参与表决。不过,在真正选举时,表决虽然还是通过举手来进行,但只有符合财产资格等等条件的选民才有表决权。约·休谟的提案要求,在重大选举中用无记名投票来代替举手表决。——169。

- 163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中,恩格斯继续对联军在克里木的作战情况进行评述。恩格斯根据自己的军事专业知识,分析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地理条件以及围攻方炮位设置的可能性。他在文中首次称赞了俄军工程师。同时也首次将法军作战上的不足归咎于波拿巴体制。对土耳其军队在叶夫帕托里亚的作用的评价与以前的文章,如《克里木战局》(见本卷第49—51页)和《克里木的斗争》(见本卷第124—128页)相一致。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恩格斯最晚写于1855年2月25日,文章随太平洋号轮船于2月27日离开利物浦,3月14日到达纽约,首次发表于1855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40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这篇通讯有所改动。最后一段很可能为编辑部所写,或者经过他们很大的改动,因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病逝于1855年3月2日,恩格斯在撰写这篇文章之时以及这篇文章在被寄出之前,俄皇尚未病逝,而文章刊出之前,俄皇的死讯肯定已经从欧洲传到纽约。——171。

- 164 海军旅是联军将一部分海军调遣到陆地上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他们担当围城和攻击任务。——171。

- 165 衰落帝国(Lower Empire, 法文: bas empire)在历史文献中有时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后逐渐成了正在衰落和瓦解中的国家的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它来指法兰西第二帝国。——173、287、468、484。

- 166 位于法国阿登省的梅济耶尔要塞对于马斯河的全线防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恩格斯在此提到它是由于它多石的地面与塞瓦斯托波尔十分相似,另外当时的攻城者也使用了沙袋作掩体来进行围攻。在普鲁士将军指挥下的德国北部联军于1815年6月28日开始包围梅济耶尔,于7月28日发起缓慢进攻。8月13日梅济耶尔陷落,9月9日城里的法军全部投降。攻城者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用重型火炮进行轰炸。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在一两天之内”是不准确的。也许恩格斯指的是1815年6月29日黑森选帝侯国的联军攻下位于马斯河畔与梅济耶尔隔岸相对的、防守坚固的查尔维尔一事。——174。

- 167 据古希腊罗马传说,《西维拉占语集》是一本预言集或智慧女性西维拉的命运占卜书(后来,罗马所有重要的宗教祭祀条文都被称做《西维拉占语集》)。根据古罗马传说,当库马城的西维拉以 300 金币的价格向罗马国王塔克文兜售这类预言书(9 部,有时也说是 3 部)时,国王觉得价格太高而产生犹豫;直到西维拉把这些书的三分之二烧掉后,国王才答应用原来的价格购买剩下的书。——175、198。
- 168 托里什韦德拉什式的阵地指葡萄牙托里什韦德拉什附近的长条形防御阵地。它是 1810 年在葡萄牙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根据阿·韦·威灵顿的命令为保卫里斯本防备法军侵犯而修建的。这一阵地有三层坚固的工事,在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见注 27)中起了重要作用;1810—1811 年依靠这一阵地击败了安·马塞纳元帅率领的法军对里斯本的进攻。——177。
- 169 在《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中,马克思对亨·帕麦斯顿的新内阁作了一个详细评述,文章的观点与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的《论新的内阁危机》(见本卷第 165—168 页)一文观点相同。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都是这样来描述新内阁的:“帕麦斯顿勋爵用一些等于零的人物组成内阁,而其中只有他自己才是实数。”(见本卷第 180 页,同时参看本卷第 168 页)
- 虽然马克思将《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一文的写作日期标为 2 月 27 日,但文章可能直到 2 月 28 日才写完,因为马克思在文中引用了这一天《晨报》的消息。不过当时偶尔也会有次日的报纸头天晚上发送的情况。文章以《帕麦斯顿》为题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3 日《新奥得报》第 105 号。——179。
- 170 莫卧儿是 16 世纪从中亚细亚东部入侵印度的突厥征服者,1526 年在印度北部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该帝国的创建者巴卑尔(1483—1530 年)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
- 大莫卧儿帝国在 17 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富汗部分地区。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征服者的反抗加剧,加之征服者经常发生内讧,封建割据趋势日益加剧,到了 18 世纪上半叶莫卧儿帝国便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小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

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见注94)的赡养费维持生计,成了该公司的傀儡。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帝国遂亡。——179。

- 171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群众运动的压力而取消对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部分政治权利的限制,1661年的市镇机关法和1673年的宣誓法也因此被废除。天主教徒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但同时对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奉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181、211。
- 172 英国要求议会改革的群众运动是在阿·韦·威灵顿的托利党内阁(1828—1830年)时期兴起的,而改革则是在查·格雷的辉格党内阁(1830年11月—1834年7月)时期进行的(参看注157)。——181。
- 173 指英国1688年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181、187、193、369。
- 174 王座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182、371。
- 175 《英国的危机》和《不列颠宪法》是马克思就同一问题分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

《英国的危机》大约写于1855年3月2日,文章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3月3日离开利物浦,3月15日到达哈利法克斯,3月18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1855年3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46号。《论坛报》编辑部对文章进行过改动,可能还把马克思手稿的一部分用在该报1855年3月22日的社论《英国的民主》中(不过,该文所有基本观点都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背离)。

《不列颠宪法》是《英国的危机》的德文版,也写于3月2日,发表于

- 1855年3月6日《新奥得报》第109号。不过,两篇文章结尾一句表达的观点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新奥得报》编辑部对《不列颠宪法》的结尾一句进行过修改。——183、187。
- 176 指1837—1842年危机。恩格斯在1852年9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称这次危机是“一种带有某些急性病症状的慢性病”。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就对英国生产过剩危机进行过分析。——185、190。
- 177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从事强制性劳动。——188、369。
- 178 普雷斯顿罢工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附近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10%。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约有25000人参加了罢工,在其他城市工人的援助下,罢工持续了九个多月。1854年2月,同盟歇业宣告结束,但罢工仍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从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习艺所中往普雷斯顿招募工人。1854年3月,罢工领导人被捕。由于资金枯竭,工人被迫复工。罢工于5月结束。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起因、进程及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81—382、482—485、509—510和537—538页及第13卷第289—290页。——189。
- 179 《莱亚德》首次发表于1855年3月5日《新奥得报》第107号。它与《不列颠宪法》(见本卷第187—190页)本来同属马克思于1855年3月2日所写的一篇通讯,被《新奥得报》编辑部分为两篇文章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莱亚德》一文时加有脚注,对此作了说明。——191。
- 180 《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是马克思1855年3月3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3月7日《新奥得报》第111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军队中买卖军衔的现象以及澳大利亚巴拉腊特采金人的暴动(见注183)经过作了评述。澳大利亚金矿区矛盾的激化,在1855年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巴拉腊特金矿区的民众起义是促使马克思深入研究殖民理论的原因之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在谈到澳大利亚以及采

金人的作用时说：“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又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就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凶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86—887页）——193。

- 181** 惩治叛乱法是英国议会从1689年至1881年逐年通过的一套法令。这套法令授权国王在和平时期保有一定数量的陆军和海军，并规定在军中实行新的军事条令和规章制度，设立军事法庭，同时还规定了叛乱、抗令等行为所应受到的处罚。——193。
- 182** 买卖教职位的行为在中世纪就存在，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早在12世纪起就进行了反对这种陋习的斗争。——194。
- 183** 指1854年11月和12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采金人的革命行动。1854年11月底，愤怒的采金人在一次集会上焚烧采金特许证，之后起义者与军队发生冲突。12月采金人成立巴拉腊特改革联盟，他们要求废除采金特许证，释放被捕者，按宪章派的宗旨实行政治改革。起义最终遭到镇压，当地政府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但这次起义的一些要求得以实现并促使维多利亚殖民地开始施行一部新的宪法。——194。
- 184** 指英国政府和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所征收的苛捐杂税，包括对进口糖征收的高额关税（1764年实行）、印花税（1765年实行）等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对这些捐税深恶痛绝，这是引发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原因之一。——195。
- 185** 骚乱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任何12人以上的集会如果具有“骚乱性质”，则当局可以向集会者宣读此法令以示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强行驱散。——196。
- 186** 《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3日，本来可能与《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见本卷第193—196页）属同一个手稿，这个手稿被《新奥得报》编辑部分为两部分，本文所收的这一部分以《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为题发表于该报1855年3月6日

- 第 109 号。第二部分写于 1855 年 3 月 6 日,本来可能与《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见本卷第 200—203 页)属同一个手稿,这个手稿也被《新奥得报》编辑部分为两部分,本文所收的这一部分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10 日《新奥得报》第 116 号,发表时没有标题。——197。
- 187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后,他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即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英国大多数报刊称为最有希望的王位继承人。《晨报》却称沙皇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为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不过,《晨报》并没有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已故沙皇的长子,看来马克思此处有误。——197。
- 188 1855 年 3 月 5 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曾多次到过圣彼得堡,并有机会观察过沙皇病情的英国著名医生奥·博齐·格兰维尔 1853 年 6 月 6 日致亨·帕麦斯顿的一封信,格兰维尔在信中推断沙皇的有生之年不多了,以此提醒帕麦斯顿在制定对俄政策时考虑这一点。伦敦的其他报刊稍后转载了这封信。1855 年 3 月 9 日的《新奥得报》发表了一则有关这封信的简讯。——198。
- 189 皮蒂娅格言是德尔斐城(古希腊)的阿波罗神殿的女巫皮蒂娅的带有预言性质的、晦涩难懂的格言。——198。
- 190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是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6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3 月 9 日《新奥得报》第 115 号。马克思在文中继续对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的原因进行分析。英法联盟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32)中由于双方目的不同而逐渐陷入危机,联盟中的一方总是怕另一方在巴尔干半岛,以至在整个欧洲占据政治上的优势,因而在作战中犹豫不决。——200。
- 191 1855 年 2 月,布鲁塞尔出版了长达 72 页的题为《论东方战争的进展。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寄给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回忆录》的匿名小册子,它很快被译成了包括俄语在内的多种欧洲语言,其主要内容是批判克里木战争(见注 32)爆发以来法国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法国在战争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引起极大的轰动,是因为它触及了英国下院调查委员会和英法两国新闻报刊上所讨论的问题:英国军队 1854—1855 年冬天在克里木所经历的灾难是否由法国人的军事决定所

造成。当时普遍认为拿破仑亲王(小日罗姆)是这本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从马克思阅读过的小册子的旁注来看,马克思同样认为这本小册子出自拿破仑亲王之手。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本小册子是法国记者塔韦尼耶写的,因为他毫无疑问能从拿破仑亲王和波兰将军约·维索茨基那里获取重要资料。波兰将军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可能参与了这本小册子的写作。——201、208、214、219、224、295。

- 192**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159)。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19世纪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202、236、265、354、376、434、471、505。

- 193** 指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及其妹妹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公主的婚姻问题。欧洲各大国试图利用伊萨伯拉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内政外交上的弱势,通过联姻来增加自己在西班牙的影响力。英国希望西班牙女王与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丈夫的堂弟科堡亲王莱奥波德定亲,从而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地位。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伊萨伯拉嫁给了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但法国通过几个外交让步,成功实现了让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嫁给路易·菲利浦的小儿子蒙庞西埃公爵的计划。如果伊萨伯拉无后,蒙庞西埃就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第一继承人。法国外交上的胜利引起英国极大的不满。——203。

- 194** 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条约,它结束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年开始)。根据法国和英国1713年4月1日签署的条约(乌得勒支条约的一部分)的第六

款,路易十四的孙子波旁王朝的菲力浦·安茹公爵,即菲力浦五世仍保有西班牙王位,但法王必须放弃合并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

亨·帕麦斯顿在 1846 年谴责法国破坏乌得勒支条约,因为他认为路易-菲力浦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
—— 203。

- 195 《调查委员会》与《布鲁塞尔回忆录》可能同属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7 日写的一篇通讯。《新奥得报》编辑部将这篇通讯分成两部分单独发表。第一部分以《调查委员会》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3 月 10 日《新奥得报》第 117 号。第二部分以《布鲁塞尔回忆录》为题,发表在该报 1855 年 3 月 11 日第 118 号。—— 204、208。
- 196 《爱尔兰的复仇》是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13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16 日《新奥得报》第 127 号。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爱尔兰局势的发展。马克思在 1853 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中(参看《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658—666 页,第 12 卷第 171—177 页和第 253—264 页),曾对英国剥削爱尔兰的方法和后果进行过分析。但是,爱尔兰统治集团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同英国寡头政府达成了妥协。在《爱尔兰的复仇》中,马克思对英国内阁和议会中爱尔兰代表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评述。—— 210。
- 197 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指英国议会里爱尔兰旅(见注 90)以及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袖丹·奥康奈尔与辉格党(见注 70)的领袖们于 1835 年 2 月在伦敦利奇菲尔德勋爵府邸签署的协定。根据协定,爱尔兰自由派获得一些政府职位,而奥康奈尔则保证停止要求取消英爱合并的群众运动。—— 210。
- 198 指为取消英国和爱尔兰的合并而进行的鼓动。英爱合并是 1798 年爱尔兰

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英国政府强加给爱尔兰的,它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英爱合并消除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要求取消合并的口号开始在爱尔兰深得人心。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以丹·奥康奈尔等人为首的自由派,只是把取消合并的鼓动当成迫使英国政府作出一些小小让步的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在签订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见注197)后停止了鼓动。1840年爱尔兰自由派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建立了取消合并协会,并力图把协会引上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1847年7月,一群激进分子与该协会决裂,成立爱尔兰同盟。同盟的左翼革命派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被镇压(见注200)。取消合并协会最终瓦解。——210。

199 1845—1847年的土豆歉收在爱尔兰引起了普遍的饥荒。深受大地主剥削的小佃农生活贫困,广大民众几乎全靠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出产的土豆生活。英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反而把大量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从爱尔兰运到英国。大约有100万人饿死,由于饥饿而造成的移民潮又使100万人离开爱尔兰。爱尔兰的土地大片荒废。这些荒废的土地被英国和爱尔兰的地主改用为牧场。——212。

200 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建立共和国,爱尔兰同盟革命派代表约·米切尔、詹·莱勒等人策划于1848年在爱尔兰发动起义。由于米切尔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被捕,而以威·斯·奥勃莱恩为首的同盟自由派立场摇摆不定,因而没能举行全国性的总起义。1848年7月下旬在一些城市和乡村爆发了零散的、自发的起义,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213。

201 《克里木的战果》是恩格斯大约于1855年3月14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马克思把它与《大冒险家的命运》(见本卷第219—223页)一起从伦敦寄出,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于3月17日离开利物浦,3月31日到达波士顿,大约于次日到达纽约,发表在1855年4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3号。

马克思大约于1855年3月16日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翻译成德文,他在翻译时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和少量的删除,这篇文章以《克里木事件》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19日《新奥得报》第131号。由于马克思的译文与恩格斯的原文在内容上区别不大,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214。

- 202 1855年2月9日由奥美尔帕沙指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在叶夫帕托里亚登陆。这支部队由2个土耳其师、1个埃及师、2个骑兵中队以及2个野炮连组成,共计21600人。他们从保加利亚开来,准备加入联军方面在克里木作战。——216、276。
- 203 在俄军发动进攻的这一天,在叶夫帕托里亚湾停靠有6艘联军的军舰,这些军舰参与了战斗,用炮火为联军提供支援。——217。
- 204 在《大冒险家的命运》和《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拿破仑第三出于稳固自己统治的需要而对联军在克里木的作战方法施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大冒险家的命运》是恩格斯1855年3月14日前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马克思于3月16日将它从伦敦寄出,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于3月17日离开利物浦,3月31日到达波士顿,大约于次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4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3号。
- 马克思在1855年3月16—17日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译成了德文,删掉了一些段落,并作了少量改写、补充,寄给《新奥得报》。这篇文章以《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20日《新奥得报》第133号。对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奥得报》上的文章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恩格斯的文章中有一段论述拿破仑第一作战方法的军事史方面的内容(见本卷第226页),可能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删除。——219、224。
- 205 拿破仑第三计划亲临克里木战场是当时报刊热论的一个话题,也是当时联军外交谈判的一个内容,由于英法两国统治阶层的反对,拿破仑第三的计划没有实现。——221、245、342。
- 206 指阿斯珀恩会战。1809年5月21—22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与奥地利卡尔大公的军队在维也纳附近位于多瑙河北岸的阿斯珀恩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结果奥地利军队获胜。在这次会战中,奥地利步兵的方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挡住了法国骑兵的猛烈进攻,使法军在占领维也纳以后试图越过多瑙河的计划破产,这也是拿破仑第一在野战中经历的第一次战事失利。但拿破仑及时把军队撤离多瑙河北岸,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221、227、557。

- 207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莱比锡会战,这是第六次反法同盟(见注 8)的联军(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222、227、602。
- 208 文中所说的“斯特拉斯堡的英雄”指路易·波拿巴。1836 年 10 月 30 日,他在一些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斯特拉斯堡驻防军两个炮兵团发动政变,但几小时后政变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222。
- 209 指马伦戈会战。1800 年 5 月下半月,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军队后方,于 6 月 14 日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米·梅拉斯的军队。马伦戈会战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第二次反法同盟(见注 8)解体。同时这次会战也是拿破仑·波拿巴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政变(见注 210)后的第一次大捷,它使拿破仑·波拿巴的政权得到了巩固。——226。
- 210 文中所说的“雾月十八日的再版”指路易·波拿巴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的政变(见注 112)。
文中所说的“雾月十八日”指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于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和他的拥护者发动的政变。这次政变推翻了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制度,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226。
- 211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 8)时期,法国和奥地利在莱茵河上游经过多次交锋后于 1795 年底停战。1796 年,法军向奥地利进发,主要与包括撒丁军队在内的奥地利军队展开作战。法军在 9 月 3 日的维尔茨堡会战中战败,它的进军在德国南部受阻,但是在意大利北部,法军占领了伦巴第,并把奥地利大军包围在曼图亚(见注 338)。1797 年拿破仑把卡尔大公的军队打回维也纳。两个战场都在 4 月中旬停火。撒丁退出战争后建立了法国保护下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226。

- 212 《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19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为题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22 日《新奥得报》第 137 号。文中谈到的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中的中立立场,马克思在 1854 年就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分析。——228。
- 213 非国教徒指英国新教各教派的教徒。他们不承认国教会的某些信条,曾长期遭到迫害。但随着 1698 年宽容法的颁布、1673 年宣誓法和 1661 年市镇机关法的废除(1829 年)等等,他们逐渐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与国教徒平等的权利。——229,503。
- 214 英国工人阶级从 18 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是英国议会在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 1848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 10 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 5 时半延续到晚上 8 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35—336 页)。
-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82—288、299—310 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67—350 页)中作了详细考察。——231。
- 215 1850 年 2 月大法官法院(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宣判违反 1847 年十小时工作日法(见注 214)的工厂主无罪,这一判决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激起了工人的抗议。随后,英国议会在 1850 年 8 月 5 日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每周前五天的每个工作日工作十小时半,星期六工作七小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1850 年的法令虽然禁止工厂主采用轮班制规避 1847 年的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了。——231。
- 216 《英国报刊的消息》与《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可能同属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的一篇通讯,由《新奥得报》编辑部分为两篇文章发表。《英国报刊的消息》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23 日《新奥得报》第 139 号。

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中,马克思详细报道了国民和立宪协会于1855年3月16日在伦敦举行的一次集会。马克思之所以对这次集会感兴趣,是因为从这次集会可以看出,英国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方面想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一方面又想利用宪章派(见注192)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的做法遭到了以厄·琼斯为首的宪章派的反对。这篇文章以《一次集会》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24日《新奥得报》第141号。——232、235。

- 217 《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是马克思1855年3月21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议会新闻》为题首次发表在1855年3月24日《新奥得报》第141号。马克思在文中对1855年3月20日英国议会上院的辩论情况进行了评述。这次辩论是围绕英法与普奥之间外交利益冲突问题进行的。马克思在为《新奥得报》写的其他通讯中也报道了相关的内容。例如他在《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见本卷第228—231页)中叙述了普鲁士的动机;在《皮亚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见本卷第356—358页)中谈到奥地利的特殊利益及相关问题。——239。
- 218 指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国于1853—1854年在维也纳的几次会议(见注4)上签订的议定书。——240、415。
- 219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47)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见注290)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联邦议会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联邦议会宣布停止工作。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企图利用1850年恢复的联邦议会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51—1859年,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1866年普奥战争后,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241、310。
- 220 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是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见注8)中俄奥军队与法军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取得了胜利。奥地利在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普雷斯堡和

约。——242、531。

- 221 《拿破仑最近的诡计》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都是恩格斯大约于1855年3月21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马克思在3月23日将这两篇文章一起从伦敦寄出，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3月24日离开利物浦，4月6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同时发表在1855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8号。

马克思在1855年3月23日将恩格斯的这两篇英文文章的部分内容翻译成德文，略加改写，组成一篇文章，寄给了《新奥得报》，该文以《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为题发表在1855年3月26日《新奥得报》第143号。《克里木的最新情况》一文本卷没有收入，只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在脚注中作了说明。——245、250。

- 222 德尔斐为古希腊城市，因阿波罗神庙的神谕出名。所谓神谕就是神庙里的祭司借神灵之名预卜希腊各城邦内外政策并对这种政策实施影响（卜辞由女巫宣布，但是编写卜辞的是洞悉希腊政治形势的祭司）。吕底亚是曾经称霸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古国，公元前546年最后一个国王克罗伊斯为波斯王居鲁士所俘，国遂灭。哈利斯河（今土耳其之克孜勒河）在当时是吕底亚和已臣属于波斯的古国米提亚的分界线。根据古代传说，克罗伊斯的失败是因为他被模棱两可的神谕所惑。在这句神谕中，“一个大帝国”所指为何并未明言。——245、266。

- 223 法语“singes”本义是猢猻，也是长官、老板之类人物的俗称，此处被用做对阿·圣阿尔诺、沙·埃斯皮纳斯等法国远征军军官的贬词。以克·拉莫里谢尔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将领在19世纪30—40年代参加过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见注64），在士兵中颇有声望。他们在政治上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见注112）后大都被流放。——246。

- 224 小日罗姆·拿破仑亲王于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他因为不赞成克里木远征，加之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没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脱军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246。

- 225 大军是对拿破仑战争（见注8）中在主战场作战的法军主力部队的称呼。大军中除法国军队外，还包括拿破仑第一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分遣部队以及波兰军团。——247。

- 226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 2000 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 6 章)。——247。
- 227 由于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邮班发生延误,关于 1855 年 2 月 24—27 日色楞金斯克多面堡战事的官方消息比关于 2 月 28 日—3 月 3 日战事的官方消息要晚到伦敦。因此产生了很多谣言,有的说埃·福雷把进攻多面堡的计划出卖给了俄国人,有的说弗·康罗贝尔和福雷之间有了争执而且福雷还受到拘禁等。直到 3 月底,法国报刊才正式证实了福雷与康罗贝尔之间的冲突。福雷感到自己的军事荣誉受到损害而向拿破仑第三申请离职。——253、394。
- 228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是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24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3 月 27 日《新奥得报》第 145 号。文章的内容与他 1855 年 3 月 6 日写的同名通讯(见本卷第 200—203 页)相关联,主要分析了英法联盟中法国所采取的政策特征,法国与英国一样,都想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256。
- 229 马克思可能指已于 1852 年 12 月卸任托利党德比内阁(见注 86)外交大臣职务的詹·马姆兹伯里勋爵于 1853 年 3 月对巴黎的访问,马姆兹伯里在访问期间同拿破仑第三就英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256。
- 230 在《不列颠军队》和《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议会下院罗巴克委员会(见注 72)已经公布于众的调查结果进行了评述。
《不列颠军队》应该是恩格斯最迟于 1855 年 3 月 26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马克思在 27 日将它寄出,文章随华盛顿号轮船于 3 月 28 日离开南安普敦,于 4 月 12 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4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64 号。
马克思在 3 月 28 日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作了一定的改写和删节,形成一篇通讯,即《调查委员会的揭露》,寄给《新奥得报》,以《调查委员会》为题,刊登在 1855 年 3 月 31 日《新奥得报》第 153 号。不过,《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中最后那一段(见本卷 270—271 页)以及几段引文(见本卷第 269 页)在《不列颠军队》中没有,它们可能是马克思补充的。

也可能是恩格斯的文章中本来有这些内容,但《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该文时将其删去了。——260、268。

- 231 《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是马克思 1855 年 3 月 27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新奥得报》第 151 号。马克思在文中主要对英国议会下院 1855 年 3 月 26 日就废除报刊印花税问题进行的辩论作了评述。马克思早在 1853 年就曾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对英国的印花税进行批评。——265。
- 232 伦敦圣詹姆斯宫是 17 世纪末英国国王的宫殿,19 世纪成为举行隆重庆典和招待会的地方。——265。
- 233 1854 年,为了隆重欢迎阿·巴尔贝斯来伦敦和抗议拿破仑第三访问英国,宪章派(见注 192)在厄·琼斯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欢迎和抗议委员会。不过,巴尔贝斯在 1854 年 11 月底的一封来信中说,他因为生病不得不放弃伦敦之行。马克思对这件事的评论参看他 1854 年 12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265。
- 234 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各个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集会的地方。1831—1907 年英国国教会福音派的中心组织就设在这里。——270。
- 235 在《战争的进程》和《论克里木局势》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对克里木的军事状况进行评述。
《战争的进程》是恩格斯最迟于 1855 年 3 月 29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文章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 3 月 31 日离开利物浦,4 月 15 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该报 1855 年 4 月 17 日第 4366 号。
《论克里木局势》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在 1855 年 3 月 30 日从恩格斯《战争的进程》一文翻译的,马克思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一些修改、删除和补充,寄给《新奥得报》,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4 月 2 日《新奥得报》第 155 号。——272、277。
- 236 巴希布祖克是 18—19 世纪土耳其非正规部队的名称。这支部队由来自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小亚细亚好战的各部落的人组成。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32)期间,这支部队由于纪律涣散,被奥美尔帕沙解散,一部分人被遣返回乡,一部分人被编入正规部队。此外,人们把缺乏纪律、凶狠残暴和抢掠成性的部队称为巴希布祖克。——278、589。

- 237 《法国立法团的丑事。——德鲁安-德路易斯的影响。——民军的现状》是马克思 1855 年 4 月 3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4 月 7 日《新奥得报》第 163 号。马克思在文中对维也纳谈判（见注 4）的进展、英国在征召民军方面采取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评论。——281。
- 238 代役法即代役制，是法国军队中曾经盛行的征兵制度，有产阶级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雇人代服兵役。这种制度在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曾被废除，后来被拿破仑第一恢复。1855 年 4 月，拿破仑第三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对代役法作了修改，规定除非被征召者有近亲，雇人代服兵役一事由国家包办，被征召者按规定数额交纳一笔代役金作为“助军捐款”即可免服兵役。法国军队代役制 1872 年被废止。——281、287、292、538。
- 239 土耳其近卫军是土耳其苏丹从 14 世纪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组建的一支精锐部队，它主要由被土耳其苏丹所征服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青年组成。参加近卫军的青年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完全被土耳其化，并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与任何氏族或家族都没有特殊关系，是土耳其苏丹用来抵御国内外敌人的一支忠诚部队。但随着近卫军权力的增长，土耳其的国家政治逐渐受其威胁，而且这支军队在 17 世纪也慢慢失去了它在军事上的优良特征。它反对在土耳其军队中实行旨在以正规部队代替封建的近卫军的改革。苏丹马茂德二世为了扫清改革道路上的这一障碍，遂诱使近卫军叛乱，并于 1826 年 6 月 14 日将叛乱镇压下去，15 000 名近卫军被处决，2 万人被流放，叛乱平息之后，近卫军被解散。——281、585。
- 240 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一文的内容与他 1855 年 3 月 21 日前后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见本卷第 250—255 页）和最迟于 3 月 29 日写的《战争的进程》（见本卷第 272—276 页）的内容相关。在结尾对法国军队以及他们在波拿巴制度下的作用的评价与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中的论述（见本卷第 535—544 页）以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187—188 页）一致。《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局势》最迟写于 1855 年 4 月 6 日，运载它的轮船于 4 月 7 日离开利物浦，4 月 22 日到达纽约。文章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4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1 号。——284。
- 241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是继《阿伯丁内阁的倒台》（见本卷第 92—99

页)之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另一篇署名为马克思的文章,也是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署有马克思名字的文章。不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恩格斯,因为马克思在儿子埃德加于1855年4月6日去世后十分悲痛,几乎无法写作(参看马克思1855年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而在此之前,恩格斯已经在替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参看马克思1855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但是,也有一些情况表明,恩格斯可能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如在文章寄出的同一天(4月12日),恩格斯已经写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见本卷第302—306页),此外恩格斯同一时期的文章涉及的都是克里木战争,没有与《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内容相同的其他文章存在。因此,本卷还是保留过去的做法,视马克思为这篇文章的作者。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写于1855年4月10日,随圣路易斯号轮船于4月12日离开考斯,4月26日到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55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5号。——289。

- 242 马克思在此指曼彻斯特学派,即自由贸易派(见注37)。——292。
- 243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二月革命(见注151)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294。
- 244 《拿破仑的辩白》是恩格斯最迟于1855年4月12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对拿破仑第三在《总汇通报》上匿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进行了评述,进而再次对联军的克里木远征进行了彻底批判。文章由马克思于4月13日从伦敦寄出,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4日离开利物浦,大约于27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7号。
- 马克思在1855年4月13日或14日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以《评拿破仑在〈通报〉的社论》为题,首次发表

在1855年4月17日《新奥得报》第177号。马克思的译文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对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295。

- 245 1808年7月20日，在西班牙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年）的拜伦会战中，由杜邦将军指挥的法军被西班牙军队包围，被迫于7月22日投降。

1813年8月29—30日，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见注8），多·勒·旺达姆将军指挥的法军在库尔姆（波希米亚）附近被同盟军包围，法军全部被俘。——296。

- 246 伦敦的米瓦特饭店是路易·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政变（见注208）失败后流亡英国时的住所，他在那里从1838年住到1840年。——298。

- 247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是恩格斯最迟于1855年4月12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不过，从“鼓吹夺取外围工事最卖力的伦敦《泰晤士报》”到“俄军还打算从那里向前延伸自己的反接近壕”这段话（见本卷第305页），有可能是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的文章之后，根据《泰晤士报》的最新报道补充的。文章于4月14日从伦敦寄出，同日随阿非利加号轮船离开利物浦，大约于27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7号。

马克思在4月15日可能是依据燕妮的抄写稿，将恩格斯文章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寄给《新奥得报》，以《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为题，首次发表在1855年4月18日《新奥得报》第179号。马克思的译文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对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302。

- 248 据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未能攻克。后来，他们佯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方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夺取了特洛伊城。——306。

- 249 在《德国与斯拉夫民族》、《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以及《欧洲的斗争》这组文章中，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恩格斯在1849年2月曾经为《新莱茵报》写过一篇题为《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此后他逐渐产生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想法。

马克思在 1853 年 9 月 7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首次建议恩格斯就这一问题撰写文章。恩格斯就此问题所作的一些摘录和笔记保存了下来。这些摘录和笔记大约写于 1854 年底,一般只有 1—3 页的篇幅,其中包括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历史的书目,在《斯拉夫语和语文学》这个标题下包含关于俄国著作家生平的笔记以及书目资料,此外还有在普鲁士、奥地利和匈牙利居住的斯拉夫民族的统计数据以及对菲·斯特拉尔《俄国史》(1832 年汉堡版)一书所作的简短摘录。恩格斯在 1854 年 12 月初写信给马克思,表达了撰写一个论述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小册子的想法。马克思在 1854 年 12 月 8 日的回信中对此表示赞同。恩格斯在 1854 年 12 月 22 日至 1855 年 1 月初逗留伦敦期间与马克思详谈,使写作有关泛斯拉夫主义的小册子或系列文章的计划进一步具体化。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德国与斯拉夫民族》是恩格斯为写作这个小册子而草拟的一个提纲。提纲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可能是写于 1855 年 1 月,但也不排除是写于 1855 年 4 月初。提纲的俄译文首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时代》1990 年莫斯科版,德文原文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4 卷(2001 年)。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是恩格斯以上述提纲为基础为《新奥得报》写的文章。马克思可能对该文进行过编辑。他在 1855 年 4 月 17 日给《新奥得报》编辑莫·迈斯纳的信中写道:“附上两篇文章,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德国早就应当严肃地研究关于威胁着它的危险的问题了……我深感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响警钟。”这两篇文章分别以《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一》和《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二》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4 月 21 日和 24 日《新奥得报》第 185 号和第 189 号。虽然恩格斯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说过以后会详谈这个问题,但相关报刊上再也没有刊登过他就此问题写的文章。

而恩格斯就此问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英文文章则以《欧洲的斗争》和《奥地利的弱点》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5 月 5 日和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82 号和第 4383 号。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在 1855 年 4 月 18 日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恩格斯的家。如果恩格斯的英文稿是在马克思动身之前完成的,那么写作时间就不会晚于 4 月 16 日,即英文稿可能与德文稿同时完成。如果英文稿是在马克思于曼彻斯特逗留期间完

成的,则写作时间应该是在4月20日之前。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文章就是从曼彻斯特寄出,可能是随大西洋号轮船于4月23日离开英国,5月4日到达美国。

《欧洲的斗争》与《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一篇相比前半部分有所不同,开头两段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中所没有的,里面补充了维也纳和谈(见注4)失败的消息和对奥地利立场的评论。这两段有可能是恩格斯自己加上的,因为在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维也纳和谈失败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过,也不能排除这个消息是《论坛报》编辑部根据英国报纸上的消息加上的。

《奥地利的弱点》对应的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第二篇。两篇文章相比较可以看出,《论坛报》编辑部从自己的亲俄立场出发,对这篇文章作了很大修改,以致使这篇文章的政治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相反,因此本卷没有收入。——307、317、325。

- 250** 神圣同盟是欧洲专制君主国家为镇压进步运动、维护封建君主制度而建立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见注47)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07。
- 251** 弗·勒·夏多勃里昂在俄军1815年驻扎巴黎期间同沙皇及其随从关系密切。在法国与反法同盟进行的谈判中,夏多勃里昂是法国的代表。——307。
- 252** 文中所说的“七月”指法国的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

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文中所说的“波兰人”指 1830—1831 年波兰人起义(见注 43)。——307。

- 253** 1848 年 3 月匈牙利爆发革命。1849 年春天,匈牙利的革命军队解放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同年 4 月 14 日,布达佩斯议会宣布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独立。奥地利于是请求俄国军队给予军事援助。1849 年 8 月 13 日匈牙利军队在维拉戈什向俄国的武装干涉军队投降。——307、323。
- 254** 指 1850 年 11 月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奥洛穆茨)举行的会议。1850 年 11 月 29 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会议结束时签订了奥尔米茨协定。迫于俄国的压力,普鲁士放弃了对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政策抵抗,并准备重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恢复的联邦议会(见注 219)。随着奥尔米茨协定的签订,普鲁士暂时放弃了在它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政策。——307。
- 255** 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斯拉夫语言研究一开始就与同一时期德国的语言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约·多布罗夫斯基、耶·科皮塔尔和武·卡拉季奇同雅·格林不仅学术上联系密切,而且私人关系也很密切。多布罗夫斯基认识克·布伦塔诺。卡拉季奇是格丁根科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他认识歌德,而歌德曾推动对他的著作的翻译。帕·约·沙法里克曾于 1815—1817 年在耶拿学习。——307。
- 256** 指拿破仑战争(见注 8)时期法国和德国的战争。——308。
- 257**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共产党宣言》的拥护者。——308。
- 258** 1793 年波兰被第二次瓜分后,波兰国内反抗占领者的斗争日益加剧。1794 年 3 月,在塔·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分割波兰、反对出卖波兰的封建主的起义,组成了一个波兰临时政府向俄国和普鲁士宣战。波兰爱国者的起义曾取得最初的胜利,最终还是遭到失败,1795 年 10 月波兰被第三次瓜分。——310。
- 259**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是 1848—1849 年在科隆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立场。——310。

- 260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弗·帕拉茨基和帕·约·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卡·萨宾纳、约·弗里奇、卡·利贝尔特等)对此坚决反对,他们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积极参加了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受到残酷的迫害;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310、321。
- 261 19世纪,在包括十二月党人和米·巴枯宁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中,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斯拉夫大帝国的观念以各种形式广为流行。亚·赫尔岑19世纪50年代初在一系列小册子中也曾宣传这种观念。恩格斯在这里可能主要是指赫尔岑的文章《俄国和旧世界》,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威·林顿在伦敦出版的杂志《英格兰共和国》1854年第3期,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1854年泽西版)。——311。
- 262 恩格斯指的是奥·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亚·赫尔岑在他的著作中曾数次援引这部著作,对它表示认可,也作过批评。马克思的藏书中有这部著作的第3册。——311。
- 263 布·鲍威尔在他于夏洛腾堡出版的《俄国和日耳曼民族》(1853年)、《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德国和俄罗斯民族》(1854年)、《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以及《俄国和英国》(1854年)等著作中,对亲俄的泛斯拉夫主义表示赞同。鲍威尔在《俄国和日耳曼民族》中采用了奥·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许多观点,在该小册子第26页还直接提到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一书。恩格斯的藏书中有鲍威尔的《俄国和日耳曼民族》以及《俄国和英国》这两部著作。
- 鲍威尔标榜自己的著作是对当时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用“批判”一词来指称鲍威尔及其论著。有关情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311、312、324、353。
- 264 奥·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

设施概论》(1852年柏林版)第3册的扉页上,用俄语和德译文刊印了两则俄罗斯谚语作为题词:

“欧洲:离开了此岸,还没有抵达彼岸!

俄国:我坐在岸边,等待好风吹来!”——312。

- 265 亚·赫尔岑在《俄国和旧世界》中认为,俄国公社的土地是由公社成员自由和共同使用的。其主要论据就是奥·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论点。此外,在赫尔岑的《俄国》一文中这样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俄国必须经历欧洲发展的全部阶段,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未来的文明应当一成不变地服从过去的文明的存在条件。”——312。
- 266 光明之友是1841年在德国产生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秘主义和虔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光明之友作为德国天主教运动的支持者,构成1848年三月革命前夕反对派的一部分。——312。
- 267 参看亚·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炫耀”在恩格斯的手稿中写作“Blistat”,是俄文“блистать”的拉丁文转写形式。在这一章中,普希金常常用这个词表示“吹牛、空谈、爱慕虚荣”的举动。——313。
- 268 亚·赫尔岑在他的著作《监狱与流放》中写道,他1852年底居住在经常被雾霭笼罩的伦敦城区的普里姆斯山。恩格斯使用的是该著作的俄文第1版。——314。
- 269 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见注32)中如果公开同西方强国结盟,那么它将面临在自己的领土上同俄国作战的危险;而且它在巴尔干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会受到损害。另外,维也纳政府还惧怕向俄国的公开宣战会引起境内斯拉夫民族的叛乱。
- 另一方面,如果奥地利同俄国结盟,奥地利本土和它对北意大利的占领将受到来自法国的威胁。而且俄国一旦得胜,它将成为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一个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奥地利政府在财政方面已陷入窘境,因而奥地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克里木战争中从形式上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实质上却是反对俄国的。——317、325。

- 270 恩格斯把克罗地亚人和克恩滕人归于斯洛文尼亚人,依据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划分南方斯拉夫人的方法。南方斯拉夫人即伊利里亚系,指生活在中世纪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占领的巴尔干半岛亚德里亚海海滨西北部及邻近地区(施蒂里亚、克恩滕、卡尔尼奥拉等)的斯拉夫人。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斯拉夫人中,一部分人,包括克恩滕人在内,确实是斯洛文尼亚人,但克罗地亚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斯拉夫人。—— 319。
- 271 指 1804 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近卫军(见注 239)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在格·彼得罗维奇领导下,起义发展成争取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1804—1813 年)。在起义过程中,土耳其封建主的土地转归塞尔维亚农民所有。起义者得到俄国经济上、外交上的支持;彼得罗维奇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后,于 1805 年 4 月召集国民议会,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遭拒绝后继续领导这场斗争,于 1808 年被宣布为塞尔维亚世袭最高首领,1811 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土耳其在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见注 35)中遭到失败,在 1812 年 5 月 28 日与俄国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中被迫答应给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不久,苏丹乘拿破仑入侵俄国之机,撕毁和约,于 1813 年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恢复了自己的统治。由于 1815 年塞尔维亚人又一次举行了成功的起义,以及俄国在外交上的援助,塞尔维亚为自己的自治争取到了一点有限的自由。1828—1829 年俄土战争(见注 36)后,土耳其在 1830 年的苏丹特赦令中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即事实上的独立。—— 322。
- 272 迫于革命运动的压力,奥地利宫廷作出让步,于 1848 年 3 月 13 日解除了梅特涅的首相职务。—— 323。
- 273 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地区的斯拉夫人在约·温·拉德茨基率领的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统一运动的奥地利军队中是主力,在阿·文迪施格雷茨率领的于 1848 年 10 月占领维也纳的奥地利军队中也是主力。—— 323。
- 274 指维也纳会议(见注 4)暂时休会一事。从 1855 年 3 月 15 日开始,英、法、奥、俄围绕四项条款(见注 3)在维也纳举行新一轮会谈。在 1855 年 4 月 26 日的会议上,俄国代表提出新建议,但同盟国代表对此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建议无助于削弱俄国在黑海的优势。之后宣布无限期休会。

由于奥地利之前曾宣布,如果此次会议无果而终,它将对俄国动武,于是各国敦促它向俄国开战。为了避免这种局势,俄国代表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各国代表在6月4日又召开会议,奥地利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限制黑海海军力量的问题应该纯粹是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事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同日这一轮会议宣告结束。——325、344、397、410。

275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是恩格斯最迟于1855年4月27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文章随亚细亚号轮船于4月28日离开利物浦,5月9日抵达波士顿,大约于9日夜间送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5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86号。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评述了联军1855年4月9—22日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炮击。——329。

276 《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轰击》是恩格斯最迟于1855年4月27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在内容上是《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见本卷第329—335页)一文的续篇,与《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势在必撤》一起随亚细亚号轮船于4月28日离开利物浦,5月9日抵达波士顿,大约于9日夜间送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5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87号。——336。

277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是恩格斯于1855年5月4—7日之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文章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5月12日离开利物浦,5月25日到达哈利法克斯,5月27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5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01号。

马克思在1855年5月8日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译成德文,作了一些删节和改动,寄给《新奥得报》,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为题,发表在1855年5月11日《新奥得报》第217号。马克思的译文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344。

278 这个消息有误。恩格斯根据核实的材料在《克里木战争》(见本卷第385—392页)一文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更正。此处所列举的俄军工事在1855年6月7日才被联军占领。——344。

279 《论鼓动运动的历史》是马克思1855年5月7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5月10日《新奥得报》第215号。行政改革协会(见注282)的成立大会引起英国媒体的极大关注。马克思在《论鼓动运动

的历史》中指出,行政改革协会发出改革倡议的目的是为了让各派商人和银行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还企图利用宪章运动来博取达到这一目的的群众基础。同时马克思在文中还对以厄·琼斯为首的宪章派(见注 192)针对这种企图作出的反应进行了评述。—— 352。

- 280** 反谷物法运动是在反谷物法同盟领导下的旨在取消谷物法(见注 54)的一场运动。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见注 192)。1846 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 1849 年。—— 352、368、376、383、453。

- 281** 1797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了英格兰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并规定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 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 1821 年才完全恢复。—— 352。

- 282** 行政改革协会是在英国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奥·亨·莱亚德等人的倡议下于 1855 年 5 月初在伦敦成立的。由于英国报刊对英军在克里木所遭受的灾难以及议会调查委员会(见注 72)的相关调查结果的大量报道,英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剧。协会试图利用这种情况,举行群众大会,向议会施压,打破贵族对国家职位的垄断,让大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国家职位。协会领袖试图获得宪章派(见注 192)的支持,但是宪章派无论是在协会组织的集会上,还是在它自己的集会上,都拒绝支持现代资产阶级的行政改革要求,而是提出在人民宪章(见注 159)的基础上改革议会。行政改革运动没有取得成功,行政改革协会很快就不复存在。马克思对协会的活动以及它和宪章派的关系的评论,还可参看本卷第 375—378、382—384 和 433—437 页。—— 353、368、373、376、409、433、471、488、502、512。

- 283 奥·亨·莱亚德于1855年4月27日向议院提出了一个决议案,他认为英国在军事、外交和行政等领域的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灾难,原因在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在各个部门任职的人员的无能和不能称职。这一议案遭到否决。——353,396。
- 284 指18世纪德国作家克·马·维兰德的讽刺小说《阿布德拉人》,小说第四部分讲述的是在租驴是否要连驴的影子也一起租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古色雷斯城的阿布德拉人因此分为两派,两派间的斗争几乎毁了整个城市。小说于1774年在魏玛首次出版。——354。
- 285 弗·伯德特爵士于1789年在巴黎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并深受它的影响,但在1807年仍作为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入选议院。他于1796年初次入选下院,曾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而被暂时驱逐出英国。19世纪30年代之前他作为来自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一再要求改革,并因此于1810年遭到短时间监禁。——354。
- 286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54,602。
- 287 1846—1848年初,迫于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曾尝试在教皇国内进行某些有利于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以防止革命的发展。——355。
- 288 《皮亚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是马克思1855年5月9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5月12日《新奥得报》第219号。马克思在文中揭示了英法与普奥在外交上的矛盾。——356。
- 289 意大利革命者、朱·加里波第的追随者乔·皮亚诺里在1855年4月28日企图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皮亚诺里于5月14日被处决。——356。
- 290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47)上由德意志各邦

联合组成,最初包括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其中还包括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联邦成员的数目有所变化。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的联邦议会(见注 219)。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 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德意志联邦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357、582。

- 291 《克里木战局》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5 月 14 日《新奥得报》第 221 号,其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在 1855 年 5 月 11 日从恩格斯《克里木的新攻势》一文中翻译的。

恩格斯《克里木的新攻势》一文最迟写于 1855 年 5 月 10 日,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5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2 号。

《克里木战局》与《克里木的新攻势》的区别,有些是由于马克思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修改和删节,有些显然是由于《论坛报》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原文进行了修改,以使它更像是出自该报编辑部的社论。如,《克里木的新攻势》的开头和结尾都有《论坛报》修改的痕迹,对联军兵力的估计以及相关数字也经《论坛报》修改过。因此,《克里木的新攻势》本卷没有收入,与《克里木战局》有较大区别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359。

- 292 《〈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是马克思 1855 年 5 月 14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特点》为题,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5 月 18 日《新奥得报》第 227 号。马克思在文中揭露了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32)期间通过与作战双方的中间贸易获取利润这一事实,同时揭示了英国的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各自的阶级基础以及局限性。——367。

- 293 1855 年 5 月 7 日,爱·罗·埃伦伯勒在上院宣布要提交几个决议案。5 月 14 日他在上院提交了这些决议案,提议将上院对军事管理部门的不满以及对克里木战争(见注 32)指挥的不满上奏女王,政府的职位只有由合适的人担任才能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这些议案在同一天经过讨论后被否决。——368、370、375。

- 294 指 1716 年的议会法令,这个法令从辉格党(见注 70)寡头政治的利益出发,把议会任期从三年延长到七年。——369。
- 295 指 19 世纪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注 214)和十小时半工作日法(见注 215)。——369。
- 296 在《上院会议》中,马克思对英国议会上院 1855 年 5 月 14 日围绕爱·罗·埃伦伯勒勋爵的提案(见注 293)而展开的辩论作了评述。马克思标注的写作日期是 1855 年 5 月 15 日,不过他有可能在 5 月 16 日还在写这篇文章,文章可能是于 16 日上午寄往布雷斯劳的,因为在马克思标注的写作时间和文章发表的时间之间间隔了四天,而通常只间隔三天。《上院会议》发表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新奥得报》第 228 号。——370。
- 297 腐败选区是 19 世纪初英国议会改革者首先使用的专有名词,指英国那些从中世纪起就享有选举代表进入议会的权利,但到 18—19 世纪时居民已经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城镇。在这些城镇,议员的选举常常是由行贿受贿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当地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这种特权被 1832、1867 和 1884 年的改革所取消。——373。
- 298 《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是马克思 1855 年 5 月 16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议会外的骚动》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5 月 19 日《新奥得报》第 229 号,在内容上是马克思《上院会议》(见本卷第 370—374 页)一文的续篇。——375。
- 299 伦敦宪章派执行委员会指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欢迎和抗议委员会”(见注 233)改组后于 1855 年 2 月成立的。伦敦组织委员会与宪章派中央执行委员会(见注 368)一起致力于在伦敦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并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协作。委员会成员有厄·琼斯、乔·哈里逊、詹·泰勒等人;由委员会选出的七人小组执行建立国际联系的任务,这个小组同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伦敦的流亡者代表共同组成国际委员会。1855 年年底伦敦组织委员会宣告解散,国际委员会便成了独立的组织,并于 1856 年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 1859 年。——376。
- 300 《金融市场》可能像马克思自己标注的那样写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5 月 22 日《新奥得报》第 233 号。马克思在文中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对当时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征兆以及英国的银行制

度作了评述。相关内容还可参看马克思《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36—346页）。——379。

- 301 1844年银行法是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于1844年7月19日公布的银行券发行改革法,其中规定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定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令,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三十四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380。

- 302 《关于改革运动》是马克思1855年5月21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5月24日《新奥得报》第237号。马克思在文中揭示了行政改革协会(见注282)成立的目的以及它的局限性。——382。

- 303 恩格斯的《克里木战争》和马克思的《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这两篇文章,都对联军中断亚速海远征这一事件进行了论述,而且两篇文章看法一致,都断言法军总司令阿·佩利西埃不会执行拿破仑第三制定的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作战计划。不过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明显不同,恩格斯的文章侧重于对克里木的局势和战争的进程进行评述,而马克思的文章则主要对英国议会围绕克里木战争而进行的辩论作了分析。

恩格斯的《克里木战争》最迟写于1855年5月22日,马克思于第二天在伦敦收到这篇文章后,可能对文章作过少许修改,并将文章的某些内容用于《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克里木战争》这篇文章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5月26日离开利物浦,大约于6月7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6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11号。

马克思的《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写于1855年5月23日,发表在1855年5月26日《新奥得报》第241号。——385、393。

- 304 联军在1855年3月开始计划向亚速海派遣远征舰队。不过一支由40艘轮船和12000人组成的船队已经出发后被拿破仑第三的电报召回。5月

底一支有 7 000 名法军、5 000 名土军、3 500 名英军和 1 000 名皮埃蒙特军参加,有约 60 只大小船只的舰队重新开始远征刻赤,于 5 月 25 日占领了刻赤、叶尼卡列沿海地区的俄军炮台。从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联军的分舰队曾进逼别尔江斯克,炮击阿拉巴特,并一度占领格尼切斯克、塔甘罗格和塔曼等港口城市。在这些行动中,大量俄军船只和武器被摧毁,俄军被销毁的粮食足够 10 万人 4 个月的口粮。—— 386、393、402、405、425、449。

305 指远征多布罗加。1854 年 7 月,法军在沙·埃斯皮纳斯指挥下远征多布罗加,由于大量士兵患霍乱和其他疾病而死亡,这次远征遭到失败。—— 394。

306 1851 年 12 月 1 日夜,由沙·埃斯皮纳斯指挥的团下属的一个营奉命守卫国民议会;被波拿巴分子收买了的埃斯皮纳斯在 12 月 2 日率领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大厦,从而促成了路易·波拿巴的 12 月 2 日政变(见注 112)。—— 394。

307 1834 年 11 月 15 日辉格党内阁倒台后,亨·帕麦斯顿卸任外交事务大臣职务。他在 1835 年 5 月作为蒂弗顿的代表成为议会议员,并终身保有这个身份。—— 395。

308 指 1855 年 5 月 22 日本·迪斯累里在下院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声明将于近期把致女王的一份奏本的草案提交议会讨论,他将在这份草案中对亨·帕麦斯顿政府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所采取的摇摆立场进行抨击。这项议案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提交议会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对相关辩论进行了分析(见本卷第 413—417、438—442 和 451—454 页)。—— 396、404、408、413、439。

309 在《必败无疑的围攻》、《新任法军总司令》和《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这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对克里木战事的进程进行了评述。

《必败无疑的围攻》和《新任法军总司令》可能本来同属于恩格斯在 1855 年 5 月 24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通讯,文章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 5 月 26 日离开利物浦,大约于 6 月 7 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文章分为两部分,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 1855 年 6 月 11

日和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13号和第4414号。

《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一文的开头一段和最后两段是马克思写的。有关克里木战争的部分，有一小段是马克思从恩格斯《必败无疑的围攻》中翻译过来的，其他主要内容都摘译自恩格斯的《新任法军总司令》，马克思在摘译过程中作了少量改动。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1855年5月29日《新奥得报》第243号。——398、401、404。

- 310 法国军队在1808年6月15日—8月14日对西班牙城市萨拉戈萨进行围攻，没有攻下。1808年12月20日—1809年2月20日，法军发动第二次围攻，这次围攻最终发展成为巷战和街垒战，在战斗中，每一处住房都被防守者变成了堡垒。法军投入大量兵力才迫使防守者余部最终投降。参加这座城市防守的约有5万人，其中只有27000人为正规军。萨拉戈萨保卫战成为西班牙反对法国入侵的自由之战的象征。——400。
- 311 马克思在《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和恢复。——所谓歼灭性战争》、《迪斯累里的提案》、《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以及《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这组文章中，对英国议会下院1855年5月24日和25日围绕英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英国在维也纳和谈中的立场问题进行的辩论作了分析。《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这篇文章中的引文与当时报刊上的报道有出入，这表明马克思可能利用了自己在关注议会会议进展时所作的笔记。这四篇文章分别写于1855年5月26、28、29日和6月1日，分别发表于1855年5月30日、31日及6月1日和4日《新奥得报》第245、247、249和253号，第三篇文章发表时的标题为《议会新闻》。——408、413、418、429。
- 312 指1830年以来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运动的结果就是1831年的选举权改革法案（见注157）获得通过。——408。
- 313 米·吉布森1855年5月11日在议会宣布将提交一份给女王的奏本的草案供讨论，其中将表达希望维也纳会议（见注274）圆满结束，希望英国能够不失尊严地获得和平的愿望。——410。
- 314 指圣斯蒂芬教堂，它是威斯敏斯特宫的一部分，曾是供英国王室使用的教堂，自1547年以来一直是英国议会下院开会的地方。——410。

- 315 大型政治历史剧(Haupt- und Staatsaktion)本来是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大的、同时也用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事件。——412。
- 316 弗·贝林于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发言中表示支持迪斯累里提案(见注308)中提出的将战争坚决果断地进行下去的建议,但他不同意弹劾政府,并提议争取一切机会进行和谈。——413、451。
- 317 威·希思科特于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发言中提出要对迪斯累里提案作一处改动,即表明希望维也纳和谈继续进行下去。——413。
- 318 在耶稣会的道德学说中有这样一条准则:在有怀疑的情况下,如果理由正当可以不遵守道德法则。——418。
- 319 指威·格莱斯顿曾分别在阿伯丁联合内阁时期(1852—1855年)和亨·帕麦斯顿执政的最初几个星期(1855年2月21日前)担任英国财政大臣。——418。
- 320 指俄国外交大臣卡·瓦·涅谢尔罗德伯爵1854年8月26日致亚·米·哥尔查科夫公爵以及安·费·布德贝格男爵的紧急函件,参看马克思《战况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592—597页)。——419。
- 321 指俄国对1854年12月2日英、法、奥三国同盟条约(见注2)的态度。——419。
- 322 指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提出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它指的是,个体的行为应该遵循可以作为普遍立法原则的准则。——424。
- 323 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5月31日的《克里木的消息》、最迟写于1855年6月7日的《克里木的消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评克里木事件》这篇文章,对1855年5月英法联军在亚速海进行的远征、法军在卡兰亭湾和中央棱堡之间的地段进行的战斗以及联军在黑河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评述。
- 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5月31日的《克里木的消息》,应该是马克思在6月1日从伦敦寄出的,文章随大西洋号轮船于6月2日离开利物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1855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16号。

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6月7日的《克里木的消息》，应该是随亚细亚号轮船于6月9日离开利物浦，6月21日到达波士顿，同日晚间到达纽约的。文章作为社论首次发表在1855年6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24号。

马克思在1855年6月8日把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6月7日的《克里木的消息》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稍作修改，构成他为《新奥得报》写的通讯《评克里木事件》的开头两段。《评克里木事件》这篇文章中联军远征亚速海的军事行动的评述，内容比恩格斯最迟写于1855年5月31日的《克里木的消息》中的相关报道要详细，而恩格斯最迟写于6月7日的同名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时，没有相关内容。因此马克思可能利用了恩格斯写于5月31日的那篇文章的相关内容并根据新的消息来源进行了补充，也有可能恩格斯最迟写于6月7日的文章中本来有这些内容，但在发表时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删掉了。《评克里木事件》首次发表于1855年6月11日《新奥得报》第265号。——425、443、447。

- 324**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是马克思1855年6月5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行政改革协会》为题首次发表在1855年6月8日《新奥得报》第261号。文中的引文与当时报刊的报道有出入，马克思可能参考的是私人资料或传单。1855年，宪章运动的主要要求仍然是在人民宪章（见注159）的基础上实行广泛的民主的选举改革，反对行政改革协会（见注282）试图把宪章运动纳入它自己的选举改革运动的计划。对此马克思显然是赞同的，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当时的改革运动也为独立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出发点。——433。
- 325** 1848年革命之后的国内政治局势使波拿巴集团可以利用普选权大做文章。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50年5月31日法国立法议会废除了普选权。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见注112）时，打出了恢复普选权的口号进行鼓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页）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中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分析。——435。
- 326** 1842年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37）曾多次企图利用工人

运动来达到废除谷物法(见注 54)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目的。他们提出了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所谓“完全选举权”的要求,试图诱使工人们离开争取实现宪章派(见注 192)的社会政治纲领的斗争。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宪章派的某些具有妥协倾向的领袖(威·拉维特、亨·文森特等),于 1842 年 4 月和 12 月在伯明翰召开了两次资产阶级和宪章派的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共同进行要求选举改革的鼓动的问题。但是,以新的“权利法案”和“完全选举权”的要求来代替人民宪章的建议在 12 月 27 日被参加代表会议的宪章派多数坚决否决了。——436。

- 327 《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是马克思 1855 年 6 月 6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议会辩论》为题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6 月 9 日《新奥得报》第 263 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议会下院围绕克里木战争(见注 32)的最终目的而展开的辩论进行了评述。——438。
- 328 联军从 1855 年 6 月 6 日开始再次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这次炮轰主要针对的是位于军港区的俄军东部防线。在不间断的炮轰之后,法军和英军向第 1—3 号棱堡,即小凸角堡、马拉霍夫棱堡和大凸角堡前方的工事发起了进攻,法军占领了马梅隆多面堡、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英军占领了大凸角堡前方的石墙,俄军放弃了色楞金斯克多面堡和小凸角堡之间的炮台。但是联军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这就为 6 月 18 日的失利埋下了伏笔。——444。
- 329 在阿·佩利西埃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接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之前,他的前任弗·康罗贝尔已经收到拿破仑第三的新的作战计划。拿破仑第三的这份计划归结起来就是:打运动战,以便打击亚·米·哥尔查科夫的增援部队,对塞瓦斯托波尔实施全面包围。佩利西埃接管总指挥权后向法军公布了自己的计划:夺取马拉霍夫冈前方的工事,然后用重兵强攻这一作为塞瓦斯托波尔锁钥的俄军最为强大的棱堡。——445。
- 330 维也纳会议于 1855 年 6 月 4 日暂时中断(见注 274)之后,奥地利宣称,只要多瑙河的船只仍享有出入黑海的自由,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的舰队对奥地利的利益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威胁,因此奥地利将不会参加对俄战争。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裁军 20 万,从加利西亚撤走了大部分军队。这使得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有机会把驻扎在波兰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兵力调往塞瓦斯托波尔。——445。

- 331 匈牙利爆发起义(见注 253)后,因残酷镇压意大利革命而臭名昭著的奥地利将军尤·雅·海瑙,于 1848 年 5 月 30 日作为总指挥官率领奥地利军队前去镇压。奥军得到俄军的支持,俄国将军费·谢·帕纽亭指挥的一个师直接加入了海瑙的部队作战。帕纽亭在克里木战争初期负责指挥俄军的一个军团。——446。
- 332 苏茹克-卡列是黑海高加索沿岸的一个要塞。俄军在 1855 年 6 月 5 日放弃了这个要塞,又于当天放弃了高加索沿岸的最后一个要塞阿纳帕并撤到了库班河。几天后,联军舰队占领这些要塞。——450。
- 333 《英国议会中的辩论》是马克思 1855 年 6 月 9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议会大辩论》为题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新奥得报》第 267 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议会下院 1855 年 6 月 8 日围绕克里木战争如何继续进行而展开的辩论作了评述。——451。
- 334 指为实现人民宪章(见注 159)而开展的运动。——453。
- 335 《塞瓦斯托波尔》与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7 日的《克里木的消息》(见本卷第 443—446 页)一文在内容上一脉相承,恩格斯在文中继续对联军夺取色楞金斯克、沃伦和马梅隆这三个多面堡一事进行评述。在恩格斯的藏书中有一些与筑城术有关的书籍,可能是为写作这篇文章准备的。其中有阿·冯·察斯特罗的《永久性筑城的历史或筑城艺术的最优秀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 年莱比锡第 2 版,书中详细介绍了路·德·科尔蒙太涅、塞·勒·沃邦、马·勒·蒙塔朗贝尔以及拉·卡诺等人的工事体系。
- 《塞瓦斯托波尔》最迟写于 1855 年 6 月 11 日,与《拿破仑的军事计划》(见本卷第 463—469 页)一起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 6 月 16 日离开利物浦,6 月 27 日到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9 号。
- 马克思在 6 月 12 日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删除了一些段落,并稍加修改,寄给《新奥得报》,以《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为题发表在该报 1855 年 6 月 15 日第 273 号。《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本卷没有收入,只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在脚注中作了说明。——455。
- 336 1806—1807 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见注 8),大多数普鲁士要塞在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下都不战而降,只有奈·冯·格奈泽瑙指挥的科尔贝

- 格驻军顶住了法军以优势兵力对它实行的长达两个月的包围。——456。
- 337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见注8),普俄军队于1813年包围法军占领的但泽城,历时11个月。在该城被迫投降之前,法军在让·拉普将军的指挥下顶住了三次围攻。——457。
- 338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见注8),拿破仑的军队在1796年春打败了奥军以及与奥军结盟的皮埃蒙特军,并占领了米兰,之后,法军的前进因曼图亚的抵抗而受阻。法军于1796年6月开始围攻该要塞,历时长达9个月,在奥地利增援部队被打败后,曼图亚于1797年2月2日被迫投降。——457。
- 339 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见注8),拿破仑军队于1807年3月围攻但泽(格但斯克)。由普鲁士军队和俄国军队组成的要塞守军对占优势的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要塞守军于1807年5月底投降。——457。
- 340 在《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和《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这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军的作战情况进行了批评。他们的批评不再像以往的文章那样主要针对围攻的方式,而是对整个克里木战争提出了质疑。
-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最迟完成于1855年6月14日,马克思在6月15日收到这篇文章(见马克思1855年6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6月16日离开利物浦,6月27日到达纽约,首次发表于1855年7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1号。
- 马克思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删除了一些段落,略加改动,一部分收入他为《新奥得报》写的通讯《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中,另一部分收入他为《新奥得报》写的另一篇通讯《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后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855年6月19日和23日《新奥得报》第279号和第287号。《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一文发表时的标题为《关于莱亚德提案的辩论。——克里木战争》。——463、474、485。
- 341 指路易·波拿巴,他当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是1849年5—7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的组织者之一。

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8年11月,庇护九世逃往那不勒斯的要塞加埃塔。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1849年2月9日,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尼·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463。

342 指四项条款(见注3)中的第三项条款。——464、476。

343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见注8)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拿破仑第一强行签订的掠夺性的蒂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466、486。

344 指1854年4月20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签订的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两国有义务在俄国拒绝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而继续在巴尔干进军时共同对俄作战。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俄国的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53—259页)一文中对这一条约作了详尽的分析。——468、487。

345 《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是马克思1855年6月15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6月18日《新奥得报》第277号。马克思在文中对英国海军上将查·纳皮尔的信件、罗巴克委员会(见注

72)的调查结果以及阿尔伯特亲王在领港会馆一年一度的聚餐会上的祝酒词进行了评述。在马克思随后为《新奥得报》所写的通讯《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报纸印花税》(见本卷第477—479页)中,也详细地评述了当时的报刊对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的反应。——470。

346 领港会馆是伦敦的一座大厦,是成立于16世纪的旨在促进贸易和航海的不列颠海员协会理事会的所在地。——471、477。

347 奥·亨·莱亚德于1855年6月15日在向英国下院提交的提案中建议取消政府官员只能由有名望的家族成员来担任的传统任职规定,认为这会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并使英民族颜面尽失。莱亚德的提案经下院讨论后遭拒绝。——474、499。

348 《阿尔伯特亲王的祝酒词。——报纸印花税》是马克思1855年6月18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1855年6月21日《新奥得报》第283号。在英国,王室成员干预朝政是报刊长久不衰的一个话题,马克思对此也十分关注,参看马克思《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81—294页)以及威·皮佩尔《科堡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711—713页)。阿尔伯特亲王成为争论的焦点人物,因为他自1841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女王在政治事务中的顾问,特别是对她的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他在克里木战争(见注32)期间的态度是:反俄,主张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联军在克里木的对俄战争。

报纸印花税(见注101)也是马克思在文章中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参看马克思《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9—76页),因为这种税收主要针对的是反对派的报刊杂志。——477。

349 《奇怪的政策》是马克思1855年6月19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文章随海尔曼号轮船于6月20日离开南安普敦,7月5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1855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7号。马克思在1855年6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寄出了一篇关于波拿巴的外交、1815年条约(见注47)和普鲁士元帅卡·弗·克奈泽贝克的文章,指的就是《奇怪的政策》。文中有一大段引文出自克奈泽贝克男爵的小册子《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不过这段

引文马克思不是直接从克奈泽贝克的小册子中引用的,而是从亚·邓洛普的《哥萨克的统治和俄国对欧洲和德国的影响》一书中转引的。马克思在文章的结尾提到了邓洛普的这部著作,马克思的藏书中有邓洛普的这本书,书中在本文所引用部分划有标记。邓洛普属于马克思在文章开始批判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伙著作家”(见本卷第480页)。——480。

- 350** 指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在维也纳会议(见注47)期间于1815年1月3日建立的旨在对抗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同盟。除了当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之外,法国外交大臣达朗充分利用前反法同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对三国同盟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同盟的建立迫使普鲁士降低了对波兰领土的要求,放弃了吞并整个萨克森王国的计划,只得到该王国北部地区以及劳西茨的一部分领土。——480。
- 351** 根据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15年5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以及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定,拿破仑第一于1807年建立的华沙大公国取消,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重新对波兰领土进行瓜分。——481。
- 352** 这段引文原本出自卡·弗·克奈泽贝克《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1854年柏林版第11—14页),但马克思并没有引用克奈泽贝克的原著,而是从亚·邓洛普的书《哥萨克的统治和俄国对欧洲和德国的影响》中摘录的,所以引文与克奈泽贝克的原文有些出入。——483。
- 353** 复辟时期指拿破仑战争(见注8)结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国恢复统治以后的时期(1814年、1815—1830年)。
七月王朝又称奥尔良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252)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51)之间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统治时期。——483。
- 354** 布尔沃-利顿在1855年6月15日向下院提出制订更为严格的政府官员任职规章的要求以及其他行政改革要求。这份旨在压制行政改革协会(见注282)的提案在6月15日和18日经下院辩论后获得通过。——488。

- 355 1855年6月5日,当打出军使旗的英军战舰哥萨克号在芬兰南部城市汉科登陆时,遇到俄军猛烈袭击。除一个名叫约·布朗的水手生还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打死,其中包括英军准备在汉科释放的俄国俘虏。——489、493、511。
- 356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消息。——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科暴行的辩论》是马克思在1855年6月22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通讯,被《新奥得报》分为两篇文章发表。第一部分以《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消息》为题发表在该报1855年6月25日第289号,结尾附有编者加的预告次日将发表这篇通讯的续篇的脚注。第二部分以《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科暴行的辩论》为题发表在该报1855年6月26日第290号。——491。
- 357 文中提到的歌剧是1855年6月21日在伦敦德留黎梭剧院上演的。马克思所描述的事情经过,在现存的英国当日报刊上没有找到相应的报道,可能马克思本人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某位熟人曾观看过这场演出。——491。
- 358 联军在1855年6月18日向俄军发起进攻,这是克里木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战斗之一,不过联军的这次进攻被俄军彻底击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详细评述,参看本卷第499—500、516—523页。——492、498。
- 359 指拿破仑第三。1854年9月底拿破仑第三在布洛涅举行阅兵仪式,当时他根据错误的报道宣布塞瓦斯托波尔尔被联军占领了。——492。
- 360 1855年6月20日,巴黎通过了一项发行金额为75 000万—80 000万法郎新公债的法令。——492。
- 361 《六月十八日的失利。——增援部队》是马克思在1855年6月23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1855年6月26日《新奥得报》第291号,其中有关克里木战事的部分是马克思根据伦敦报刊的报道自己写成的,而不是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以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为基础翻译和加工而成。——497。
- 362 《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是马克思1855年6月25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以《教会鼓动》为题发表在1855年6月28日《新奥得报》第295号。

1855年6月24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活动引起英国公众很大的关注。马克思和威·李卜克内西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当时由宪章派(见注192)发起的规模最大的群众示威活动之一,其目的是抗议一系列有损工人利益的议会决议。另外,人们对克里木战争日益不满,而恰在此时又传来联军6月18日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失利的消息。在罗巴克调查委员会(见注72)的会议上公开的军事管理混乱的细节在报刊上发表,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帕麦斯顿政府。马克思认为这次示威活动完全是革命的(参看马克思1855年6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在文中还从政治和宗教的角度对啤酒法案(见注59)进行了分析。相关的分析还可参看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的《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一文(见本卷第52—54页)。——503。

- 363**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364),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503。
- 364** 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世纪高教会派(见注363)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安·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派的“教皇”。——503。
- 365** 安·舍夫茨别利伯爵在罗·格罗夫纳和其他清教主义信徒的支持下,提出要废除一项在乔治三世时代开始生效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在教堂之外的场所参加礼拜的人,除同一家庭成员之外,不得超过20人。受这项规定限制的主要是非国教徒(见注213)。上院在1855年6月16日对相关礼拜仪式登记法案进行了讨论。——503。
- 366**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开会;由下院议长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504。

- 367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506。
- 368 指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全体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是全国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大会间歇期间的常务机构。宪章派全国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见注 192）高涨年代其会员曾达到 5 万人。1848 年宪章运动的失败和宪章派的分裂使该协会丧失了群众性。但是，在厄·琼斯和宪章派其他成员的领导下，协会在 1851—1852 年期间仍然为在革命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贯彻人民宪章（见注 159）及 1851 年宪章派大会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斗争。协会于 1858 年停止活动。
1855 年，厄·琼斯和詹·芬伦都是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506。
- 369 《消息数则》是马克思 1855 年 6 月 26 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在 1855 年 6 月 29 日《新奥得报》第 297 号。马克思在文中主要对英国议会和英国报刊对 1855 年 6 月 24 日海德公园的示威活动的反应、汉科屠杀（见注 355）以及行政改革协会（见注 282）的活动进行了评述。——511。
- 370 在希腊神话中，赫斯贝里德姊妹负责看管该亚送给宙斯和赫拉作为结婚礼物的金苹果树，而摘取树上的金苹果则是海格力斯的任务之一。——514。
- 371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最迟于 1855 年 6 月 28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通讯（参看马克思 1855 年 6 月 26 日给恩格斯的信），在内容上与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见本卷第 455—462 页）一文有直接联系。文章随太平洋号轮船于 6 月 30 日离开利物浦，7 月 11 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5 年 7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9 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作了一些改动。如，文章第一段就可能是《论坛报》编辑部加的（见本卷第 516 页）。同样，文章倒数第二段也可能出自《论坛报》编辑部（见本卷第 523 页），因为这一段里对联军远征亚速海的评价与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表达的看法不同，而与发表在 1855 年 6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2 号的《克里木战争》（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4 日，但发表时被《论坛报》做过很大改

动,因此本卷没有收入)一文中的观点一致。

马克思在1855年6月29日收到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草稿之后,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翻译成德文,作了一些删节和改动,寄给《新奥得报》,以《论克里木局势》为题,发表在1855年7月2日《新奥得报》第301号。《论克里木局势》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对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516。

372 《消息教则》是马克思1855年6月30日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855年7月3日《新奥得报》第303号。马克思在文中主要对英国内阁发布的增加战区军人薪饷的文告,包法利法案对英国商业立法的意义以及受巨头控制的选区的统计数字进行了评述。——524。

373 《欧洲军队》这篇著作是由《普特南氏月刊》通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向马克思约稿,而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55年6月底—9月或10月写成的。马克思在1855年6月15日将德纳约稿的信转寄给恩格斯时,请求他“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印张”。但是,恩格斯的这篇著作远远超出了所要求的篇幅,并且用了较长时间写成。马克思1855年6月底—7月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帮助恩格斯搜集欧洲各国军队的材料,其中主要包括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并把自己的摘录提供给恩格斯使用。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这组文章的第一篇后,于1855年8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关于《军队》的文章非常出色。”第一篇发表在1855年8月《普特南氏月刊》第32期。9月1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评价总的来说是好的,但评论文章的作者对恩格斯引用的英国军队的士兵受体罚的例子表示怀疑。这组文章的续篇即第二和第三篇发表在该杂志1855年9月第33期和12月第36期,并编号为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一篇文章发表时没有编号)。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编辑企图暗示它的作者是美国人,而且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军事专家。这可能就是编辑对文章作细微改动,尤其是用“我们”来指代美国军队的原因。

马克思在1855年7—8月间将《欧洲军队》这篇著作中有关英国军队的部分的主要内容译成德文,形成三篇通讯,分别以《英国军队》、《对英国士兵的惩罚办法》和《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为题发表在1855年8月28

日、31日和9月1日《新奥得报》第399、405和407号。由于《英国军队》和《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的内容与《欧洲军队》的相关部分大体相同，本卷没有收入，只在脚注中将马克思所作的重要改动作了说明。《对英国士兵的惩罚办法》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5卷。——527。

- 374** 布洛涅兵营是拿破仑第一为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于1803—1805年在布洛涅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他在这里集中了约2500只小运输船和10万—15万名登陆战士。由于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军打败，以及1805年有俄、奥、普等国参加的第三次反法同盟（见注8）的建立，拿破仑被迫放弃了他的入侵计划。——531。
- 375** 1815年1月8日，美国安·杰克逊将军指挥一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其中不少是民兵）在新奥尔良以弱胜强，大败来犯的英军，并击毙其司令官爱·帕肯厄姆，这是始于1812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即所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的最后一战，而且发生于两国代表业已签订根特和约（1814年12月24日）之后。——532。
- 376** 指博罗季诺会战。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法军与俄军展开激烈的会战，虽然俄军被迫放弃并焚毁莫斯科，但他们保存了实力。这次会战之后，形势开始向有利于俄军的方向发展。俄军切断拿破仑军队的后路，使之陷于饥寒交迫被围困的绝境而不得不引军后退。俄军乘机反攻，拿破仑军队溃败，仅2万余人得以逃生。——533。
- 377** 猎步兵亦称猎兵，是轻步兵的一种，装备有线膛枪、匕首和刀，以散开队形行动，进行瞄准射击，用于支援骑兵和包围、迂回敌人及掩护自己的侧翼。此外，轻骑兵中也有性质与猎兵相近的猎骑兵。——536。
- 378** 北非骑兵是法国于1831年在北非殖民地开始组建的一种轻骑兵，军官多由法国人充任，士兵皆是当地土著人。——536。
- 379** 原文为“guide”，指担任军队向导的年轻军官或猎骑兵。1799年在法国曾短暂地存在一个向导连担任拿破仑的警卫。在克里木战争时期，法国近卫军（见注120）的骑兵旅中有一个向导团。——538。
- 380** 七年战争又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

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和约承认了普鲁士对它在1740年吞并的西里西亚的权利,普鲁士确立了其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542。

381 指参与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见注112)的法国军队,并见注406。——544。

382 义勇骑兵队是英国1794年建立的一支志愿骑兵队,主要由社会地位介于绅士和劳动者之间的自由民和自耕农组成。——546。

383 在英国,人们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军队由招募的雇佣兵组成,服役期为21年。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保卫国土的还有民军、义勇骑兵队和志愿军。——546。

384 夹道鞭打是直到19世纪还在欧洲军队中实行的一种刑罚。在施行夹道鞭打时,受处罚者必须赤裸着上身,从一队夹道排列的士兵中间穿过,这些士兵手拿藤鞭(在英国则使用“九尾鞭”)对受罚者进行夹道鞭笞。普鲁士在1808年取消了这种刑罚。——547。

385 指1848—1850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47)的决议,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仍归丹麦君主国所有。在1848年革命时期,力求同德国合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居民发动了反抗丹麦统治、争取德国统一的民族解放起义。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国各邦加入两公国一方作战。由于要对付国内的革命运动,也由于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压力,普鲁士政府于1848年8月26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即马尔默停战协定。1849年3月底战事再起,普鲁士当局于1850年7月10日同丹麦签订和约,独力作战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两公国仍归丹麦

- 王国统治。——549、603。
- 386** 边屯区指16—19世纪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巴纳特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它是为了抵抗土耳其的入侵于16世纪20年代设立的,边屯区居民主要是克罗地亚人、斯拉夫人和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他们从国家分得一块土地(1850年转归个人所有),为此他们必须服兵役、纳税和承担某些公共义务。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边屯区的部队曾被用来镇压意大利北部和匈牙利的革命。边屯区在1851—1881年逐渐走向瓦解。——555。
- 387** 普鲁士在1813年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814—1819年的军队改革使这种制度巩固下来。——564。
- 388** 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564。
- 389** 1860年以前,俄国的农奴主每年必须从自己的每1000个农奴中抽出五六人去服兵役。这些人经过一年的训练后即被编入常备军,并且他们在服役满25年之后可获得自由。但这种制度使俄国在战争状态时缺乏后备军。克里木战争(见注32)期间,俄国政府不得不要求农奴主增派更多的农奴服兵役,但同时向农奴主保证,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这些新增派的农奴。政府的这一规定在由农奴组成的新兵中引起了骚乱。俄国军队的战时动员制受农奴制限制这一事实是俄国于1860年废除农奴制的原因之一。——568。
- 390** 在克里木战争(见注32)中,首先是土耳其于1853年10月16日对俄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是在1854年3月27日和28日。1854年9月14—18日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半岛登陆。——568。
- 391** 军屯是俄国沙皇政府为了既能积蓄后备军力量又能缩减军费从1810年起设置的一种特殊军事组织。在俄国欧洲部分的西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黑海边的6个省的军屯区内,所有农村居民都要一面当兵,一面种田,以保证军屯的粮秣。军屯居民的一切日常生活都受军事长官的严格监督。苦役般的军屯生活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居民多次举行起义。沙皇政府的目的并未达到,军屯制度于1857年宣布废除。——574。

- 392** 托特列本之死的传言是由于欧洲报纸的报道有误造成的。托特列本因于1855年6月20日负伤,不得不立即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前去野战医院接受治疗。——577。
- 393** 1854年1月6日,在切塔泰村进行了一场血战,俄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才把土耳其军队赶至卡拉法特。恩格斯在《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1—34页)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578、592。
- 394** 指汉撒同盟,它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Hanse”(“汉撒”)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该同盟是北德意志商人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组织;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中心在吕贝克;同盟的宗旨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转运贸易。该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前半期,15世纪末开始衰落,1669年解体。文中所说的“汉撒各城市”指在同盟里起过核心作用的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583。
- 395** 1529年和1683年土耳其军队两次围攻维也纳均未成功。——589。
- 396** 指由优秀射手组成的军队,属精英部队。1836年亚·拉马尔摩拉将军首次组建了两个步枪连,1848年扩大为8个连。恩格斯文中所说的10个营(40个连)是1852年组建的。步枪手头戴具有波浪形羽毛边沿的毡帽。——593。
- 397** 1848年3月,伦巴第和威尼斯爆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随着撒丁—皮埃蒙特王国的参战,在意大利北部,战斗主要在撒丁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之间展开。1848年7月25日,撒丁军队在库斯托扎被奥军打败,撒丁被迫于8月9日签订和约,从伦巴第和威尼斯撤军。1849年初,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再次兴起,撒丁王国于1849年3月20日重新向奥地利开战,但于21日和23日在摩尔塔拉和诺瓦拉(见注399)被奥军打败。撒丁的失败使奥地利得以分兵将意大利北部其他地区的抵抗镇压下去。——594。
- 398** 1855年8月16日,俄国军队在黑河岸边距塞瓦斯托波尔12公里处向法国和撒丁的军队发起进攻,这是俄军最后一次尝试解除联军对塞瓦斯托

波尔的包围。结果,俄军被击退并受重创。之后俄军开始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向俄国南部腹地撤退。1855年9月8日,联军向这座城市发起最后的强攻并取得成功。——595。

399 指1849年3月23日发生在北意大利的诺瓦拉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约·温·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巧妙地利用了皮埃蒙特将军杰·拉莫里诺兵力分散的弱点,大败皮埃蒙特的军队。结果,奥地利恢复了在北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关于这次会战,可参看恩格斯1849年写的《皮埃蒙特军队的失败》。——597。

400 1799年,在法国反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时期(见注8),那不勒斯(双西西里王国)参加了战争,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的军队被法军击溃,那不勒斯被法军占领。

1820年7月在军队的参与下,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烧炭党人(见注123)在那不勒斯发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并制定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1821年奥地利根据神圣同盟(见注250)的莱巴赫会议的决定,对那不勒斯进行武装干涉;奥地利军队击败了那不勒斯军队,并占领了那不勒斯,专制制度又重新恢复。——598。

401 那不勒斯王国在1849年4—7月参与了法国和奥地利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见注341)。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在朱·加里波第的指挥下发动了两次神速的进攻,击退了那不勒斯军队。——598。

402 指1848年9月12日通过的瑞士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加强了中央政权,使瑞士从一个十分松散的州的联盟变成一个联邦国家。根据宪法建立一个中央立法机关即联邦议会,联邦议会由国民院和联邦院组成。行政权授予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主席任联邦总统。

此外,这部宪法还禁止各州同别国签订军事条约和招募士兵到外国军队服役。——599。

403 宗得崩德(Sonderbund)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乌里、弗里堡、卢塞恩、翁特瓦尔登、施维茨、瓦利斯和楚格)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5年缔结的联盟。1847年7月,瑞士议会下令解散宗得崩德,宗得崩德遂于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名称来讽刺搞分裂的宗派集团,尤其是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599。

- 404** 法国对瑞士的占领不是发生在1799年,而是从1797年12月开始,直到1798年春天结束。法国督政府(见注83)的军队最终打败了瑞士军队,占领了瑞士,使瑞士联邦瓦解,并宣布成立依附于法国的、实行法国式宪法的海尔维第共和国。——600。
- 405** 挪威从14世纪后期起即为丹麦属地,1814年丹麦将挪威让与瑞典。挪威与瑞典的合并得到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47)的批准。合并后,挪威保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构,瑞典国王成为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的国王和军队总司令。1905年取消合并,挪威获得独立。——600。
- 406** “御用军”一词的原文为“Pretorian”。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享有特权的私人近卫军称为御用军。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争夺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横行霸道的雇佣兵和军阀的同义语。——608。
- 407** 这里指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同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1808年,拿破仑进攻西班牙,囚禁了西班牙国王,让自己的哥哥约·波拿巴取而代之。西班牙人民纷纷发动起义,各地先后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洪达”。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领导的“中央洪达”,即中央政府,同英国结成了同盟。1811年,阿·韦·威灵顿公爵率领英军在西班牙游击队的配合下击败拿破仑的军队。“中央洪达”因执行政策引起人民及抗法游击队的不满,于1809年10月被迫宣布召集制宪议会并自行解散。制宪议会于1812年在加的斯通过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宪法。1814年,斐迪南七世复辟,废除了1812年宪法。——608。
- 408** 指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年),它是由一批有革命情绪的军官于1820年1月发动的。发动这次革命的原因之一是,斐迪南七世于1814年废除1812年宪法,恢复专制制度,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革命的口号是恢复1812年宪法,取消宗教裁判所和召开议会。1820年3月,斐迪南七世被迫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但他在1823年借助于法国军队的干涉,再次恢复了专制制度,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一切法令。

使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归于失败。尽管革命失败,但它仍给西班牙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西班牙派遣武装力量去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镇压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计划。——609。

- 409** 指西班牙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是伴随西班牙卡洛斯派战争而发生的。在卡洛斯派战争期间,于183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权派的起义,起义者同时也反对政府实行自由主义改革不力。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在实行改革方面一直时进时退,反政府的起义亦时起时伏。1840年,摄政女王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在起义者的压力下,被迫离开西班牙,进步党左翼领袖巴·埃斯帕特罗将军出任首相,次年被选为摄政。1843年7月,温和派首领拉·马·纳尔瓦埃斯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政权最终落入土地贵族之手,革命归于失败。——609。

人名索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34—1835)、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13, 72—74, 76—79, 92, 100—104, 107, 110, 112, 114, 116, 129, 148, 154, 157, 158, 163, 166, 180, 232, 410, 415, 429, 452, 488。
-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Medjed I 1823—1861)——土耳其苏丹(1839—1861)。——226, 233。
- 阿丁顿——见西德茅斯子爵, 亨利·阿丁顿。
- 阿尔贝罗尼, 朱利奥(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红衣主教; 1717—1719年任国王菲力浦五世的首相; 原籍意大利。——154。
- 阿尔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9—1861)——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471—473, 477, 499—501, 525。
- 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尔贝洛伯爵,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Heinrichsdorf-Werbelow, Heinrich Friedrich Graf von 1791—1859)——普鲁士外交家, 曾任勃兰登堡内阁外交大臣(1849)和驻维也纳大使(1845—1848, 1851—1858)。——242。
- 阿盖尔公爵, 乔治·道格拉斯·坎贝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Duke of 1823—1900)——英国国务活动家, 皮尔分子,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掌玺大臣(1853—1855, 1859—1866, 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和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179。

-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506。
- 阿克兰,詹姆斯(Acland, James 1799—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1855年为财贸界争取行政改革运动组织者之一。——376、377。
- 阿斯特,恩斯特·路德维希(Aster, Ernst Ludwig 1778—1855)——普鲁士将军,军事工程师。——458、566、567。
- 埃布林顿,休(Ebrington, Hugh 1818—190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236、431。
- 埃勒斯-纳皮尔,爱德华·德拉瓦尔·亨格福德(Elers-Napier, Edward Delaval Hungerford 1808—1870)——英国上校,1864年起为中将;1854—1855年负责克里木的英军军需工作。——127。
- 埃利斯,爱德华(Ellice, Edward 1781—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59。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68、368、370、372、373、375、376。
- 埃伦伯勒男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Baron 1750—181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初期为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查官(1801—1802),王座法院首席法官(1802—1818)。——371。
-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公元前 389—314)——雅典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占有制寡头政体的拥护者。——208。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领袖,政府首脑(1839—1841和1854—1856),西班牙摄政(1841—1843)。——606。
- 埃斯皮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854年任驻多布罗加法军师长,1854—1855年克里木战争中任旅长,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曾任内务大臣五个月,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任师长。——246、287、394。

- 安·斯图亚特(Anna [Ann, 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194。
- 奥柏,丹尼尔·弗朗索瓦·埃斯普里(Auber, Daniel-François-Esprit 1782—1871)——法国作曲家,法国喜歌剧的主要代表人物。——290。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246。
- 奥尔西伯爵(Orsi, comte de 死于1899年)——交易所经纪人,拿破仑第三的代理人;科西嘉人。——492。
- 奥弗莱厄蒂,埃德蒙(O'Flaherty, Edmond)——英国官员,1854年任财政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117。
-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169, 210—211, 436。
- 奥康瑞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成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169。
-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儿子,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1848);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46。
- 奥马拉,巴里·爱德华(O'Meara, Barrie Edward 1786—1836)——英国军医和政论家,曾为放逐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第一的私人医生(1815—1818);爱尔兰人。——267。
-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 奥塞哲,托马斯·马萨(Alsager, Thomas Massa 1779—1846)——英国新闻工作者和音乐家,《泰晤士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1817年起)。——266。
-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 奥特韦从男爵,阿瑟·约翰(Otway, Sir Arthur John, Baronet 1822—1912)——英国政治活动家,50年代是托利党人,议会议员。——474, 511。
- 奥托一世(Otto I [Otho] 1815—1867)——巴伐利亚亲王,希腊国王(1832—1862)。——226。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

满被驱逐出罗马。——193。

B

巴恩斯,托马斯(Barnes, Thomas 1785—1841)——英国《泰晤士报》的出版者(1817—1841)。——266。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265。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161。

巴克豪斯,约翰(Backhouse, John 1772—1845)——英国官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27—1842)。——150。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307。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407。

巴林顿,威廉·怀尔德曼子爵(Barrington, William Wildman, Viscount 1717—1793)——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755—1761和1765—1778)。——194。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ón 1791—

- 1873)——法国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355。
- 巴特,伊萨克(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2—1865);60年代是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社社员的辩护人,1871年起为爱尔兰自治派的领导人。——159。
- 巴特勒,詹姆斯·阿默尔(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军官,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参加者。——591。
- 巴托里,斯蒂凡——见巴托里,伊什特万(斯蒂凡·巴托里)。
- 巴托里,伊什特万(斯蒂凡·巴托里)(Báthory, István [Stephen Bathory] 1533—1586)——特兰西瓦尼亚君主(1571—1576),波兰国王(1575—1586)。——483。
- 拜比吉,查理(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440。
- 拜伦,乔治(Byron, 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101。
- 邦迪埃拉,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36、470。
- 邦迪埃拉,埃米利奥(Bandiera,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阿·邦迪埃拉的弟弟。——470。
- 包法利,爱德华·普莱德尔(Bouverie, Edward Pleydell 1818—188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副大臣(1855),济贫法委员会主席(1855—1858);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对格莱斯顿政府。——525。
- 保罗,约翰·迪恩(Paul, John Dean 1802—1868)——英国银行家,于1855年6月破产;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513。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

- 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311、312。
- 贝茨,罗伯特·梅金(Bates, Robert Makin 约生于1791年)——英国银行家,于1855年6月破产;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513。
- 贝德福德家族——英国贵族世家。——368。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1859年回国。——220。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部政务大臣(1852—1858)。——69、94、105。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 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602。
- 贝克莱,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大臣(1833—1839和1846—1857)。——95、470。
- 贝利,亨利·詹姆斯(Baillie, Henry James)——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395。
- 贝利尼,文钦佐(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491。
- 贝林,弗兰西斯·桑希尔,诺思布鲁克男爵(Baring, 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on Northbrook 1796—186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839—1841),海军首席大臣(1849—1852)。——152、413、414、438、451。
- 本丢·彼拉多(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Pilatus] 约死于39年)——犹太行省

- 的罗马总督(26—36),曾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512。
- 本生男爵,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梵蒂冈的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240。
- 比尔斯,埃德蒙(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55年为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来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宣传家之一;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曾为改革同盟主席(1865—1869)。——236。
- 比佐,米歇尔·布里斯(Bizot, Michel-Bris 1795—1855)——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1854—1855)。——251。
-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8, 85, 239。
- 彼拉多——见本丢·彼拉多。
-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 世俗名乔万尼·马利亚·马斯塔伊 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226。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34, 239。
-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 1822—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208, 209, 214, 219, 222, 224, 246, 259, 295, 298—299。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46。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 1815和1852—1870)。——220, 225, 453。
- 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约瑟夫·安东(Poniatowski, Józef Anton, Fürst 1763—

- 1813)——波兰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法国元帅,曾参加1794年波兰起义和拿破仑第一的历次远征(1809—1813)。——482。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267。
- 波切斯特,亨利·赫伯特(Porchester, Henry Herbert 1741—1811)——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89、371。
- 波特兰公爵,威廉·亨利·卡文迪什·本廷克(Portland, William Henry Cavendish Bentinck, Duke of 1738—180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794—1801),首相(1783和1807—1809)。——146。
- 伯德特,弗兰西斯(Burdett, Francis 1770—1844)——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354、436。
- 伯恩施托尔夫伯爵,阿尔布雷希特(Bernstorff, Albrecht Graf von 1809—1873)——普鲁士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242。
- 伯戈因从男爵,约翰·福克斯(Burgoyne, Sir John Fox, Baronet 1782—1871)——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68年起为元帅;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英军军事顾问和工程兵指挥官。——156。
- 伯格,约翰·德(Burgh, John de 生于1841年)——英国伊·约·汉德科克和克兰里卡德伯爵的儿子。——186。
- 博克瑟,爱德华(Boxer, Edward 1784—1855)——英国海军上将,1855年为巴拉克拉瓦军港司令。——152。
-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369。
- 博宁,爱德华·冯(Bonin, Eduard von 1793—1865)——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陆军大臣(1852—1854和1858—1859)。——240。
- 博齐-格兰维尔,奥古斯塔斯(Bozzi Granville, Augustus 1783—1872)——英国医生,原籍意大利;曾给尼古拉一世治过病,著有医学方面的著作。——198。
- 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Graf von 1797—1865)——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驻伦敦公使(1851—1852)、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3、70、290、416。
- 布尔克奈伯爵,弗朗索瓦·阿道夫(Bourqueney, François Adolphe, comte de

- 1799—1869)——法国外交官,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和大使(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和大使(1856—1859);法国出席巴黎会议(1856)的代表。——3、70。
- 布尔沃·爱德华·乔治·利顿男爵(Bulwer, Edward George, Baron Lytton 1803—1873)——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辉格党人,1852年起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殖民大臣(1858—1859)。——441、488。
- 布尔沃-利顿——见布尔沃·爱德华·乔治·利顿男爵。
- 布坎南,安德鲁(Buchanan, Sir Andrew 1807—1882)——法国外交官,1853—1858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494。
- 布莱,詹姆斯(Bligh, James)——19世纪50年代宪章运动领袖,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506。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65—167、237、266、292、354、383、396、404、452、453。
- 布朗,乔治(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将军,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和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60—1865年任爱尔兰军总司令。——402、406、426。
-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著作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495。
-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78。
-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普鲁上元帅,1793—1794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和1813—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23。
- 布伦诺夫男爵,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он 1797—187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和1858—1860)和大使(1860—1874);出席1856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成员。——424。

C

- 查尔托雷斯基公爵, 亚当·耶日 (Czartoryski, Adam Jerzy, Fürst 1770 — 1861)——波兰大地主, 19 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1804—1806);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为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150。
- 查理 阿尔伯特 (Carlo Alberto [Charles Albert, Karl Albert] 1798—1849)——撒丁和皮埃蒙特国王 (1831—1849)。——596。
-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4。
- 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246。
- 查理三世 (Carlos III [Charles III] 1716—1788)——西班牙国王 (1759—1788)。——607。
- 查理十二 (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 (1697—1718)。——602。

D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德, 贝内文特亲王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 (1797—1799, 1799—1807 和 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的代表, 驻伦敦大使 (1830—1834)。——289, 480。
- 达森特, 乔治·韦伯 (Dasent, George Webbe 1817—1896)——英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泰晤士报》的编辑 (1845—1870), 同外交界有联系。——266。
- 道格拉斯, 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55, 88, 553。
- 道金斯, 爱德华 (Dawkins, Edward)——英国外交官, 1827—1834 年为驻希腊驻办公使。——149。
- 德比伯爵, 爱德华·亨利·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Lord Edward Henr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826—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60—70 年代是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外交副大臣 (1852)、殖民大臣 (1858—1859 和 1882—1885)、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和印度事务大臣

- (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爱·德比伯爵的儿子。——159、191。
-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97、101、105、109、112、116、129、159、191、211、282、369、372、376、488。
- 德拉蒙德,亨利(Drummond, Henry 1786—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88、159、266、267、513。
- 德莱恩,约翰·塔杰乌斯(Delanc, John Thaddeus 1817—1879)——英国新闻工作者,《泰晤士报》主编(1841—1877)。——98、266。
- 德鲁安 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Édouard 1805—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40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1848—1849、1852—1855和1862—1866),驻伦敦公使(1850年夏以前);1855年是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281、282、289—290。
- 德文希尔家族——英国贵族世家。——368。
- 邓达斯,理查·桑德斯(Dundas, Richard Sanders 1802—1861)——英国海军上将,1855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470、493、511、512。
- 邓达斯,詹姆斯·惠特利·迪恩斯(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克里木战争期间任英军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852—1855年1月)。——441。
- 邓克林男爵,尤利克·坎宁(Dunkellin, Ulick Canning, Baron 生于1827年)——英国军官,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后为议会议员。——53。
- 邓库姆,托马斯·斯林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1826—1861)。——155、158、470、514。
- 邓洛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Dunlop, Alexander Graham 1814—1892)——英国政论家和作家。——484。
-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5前后—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

- 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文集》。——133。
- 邓唐纳德——见柯克伦·托马斯·邓唐纳德伯爵。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 338)被驱逐出雅典。——209。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39、68、78、96、105、106、110、111、112、115、117、154、157、159、160、180、256、369、396、404、408—418、422、423、430、439、488。
- 杜邦·德莱唐伯爵,皮埃尔·安东(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comte 1765—1840)——法国将军,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年在西班牙拜伦会战中率部队投降。——296。
- 杜克,詹姆斯(Duke, James 生于 1792年)——英国议会议员,自由贸易论者。——235。
-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 [Dü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94、100、488。
- 多布罗夫斯基,约瑟夫(Dobrovský, Josef 1753—1829)——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19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307、320。

F

- 法特尔,埃默(Vattel, Emer 1714—1767)——瑞士法学家,国际法专家,驻萨克森外交官。——317、327。
- 菲茨杰拉德,约翰·戴维(Fitzgerald, John David 1816—1889)——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的高级司法官。——211、212。
- 菲尔德,威廉(Filder [Fielder], William 1789—1861)——英国将军,1854—

- 1855 年为克里木英军军需司令。——206。
-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Philip [Philippos]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 382—336)——马其顿王(公元前 359—336)。——209。
- 斐迪南多一世,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I, Ferdinand I 1751—1825)——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16—1825)。——598。
-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598, 599。
- 芬伦,詹姆斯(Finlen, James)——英国政论家,宪章派,1852—1855 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506。
- 弗兰茨·欧根,萨瓦亲王(欧根亲王)(Franz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Prinz Eugen] 1663—1736)——奥地利统帅和国务活动家。——481, 531。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257, 328, 357, 556。
- 弗兰西斯·约瑟夫——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弗里德里希大帝——见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241, 531, 542, 565。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80。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228, 240。
- 弗洛里蒙——见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504。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782, 1783—1806)。——76。
-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 Elic-Frédéric 1804—1872)——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854—1855 年任克里木法军指挥官;1855 年 4 月被任命为奥兰省(北非)总督;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师长。——253, 394。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174。

G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179。

盖伊·路德维特(Gaj, Ljudevit 1809—1872)——克罗地亚记者,语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克罗地亚临时政府委员,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320。

哥尔查科夫公爵,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1)——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方军团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90、334、357、389、427、449。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3、35、36、70、289、290、389、411、422。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30、88、508。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 Friedrich 1812—1854)——普鲁士军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591。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13、29、78、95、96、106、107、110、115、117、120—122、129、130、133、134、155、165、167、180、201、202、233、263、270、292、396、411、413、414、418、420—422、429、431、440、452、453、474、475、488。

格兰比侯爵,查理·塞西尔·约翰·曼纳斯(Granby, 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Marquess of 1815—1888)——英国贵族,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413。

- 格兰特,詹姆斯(Grant, James 1802—187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激进派;《晨报》编辑(1850—1871)。——52。
- 格兰维尔——见博齐 格兰维尔。
-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 1870—1874 和 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 和 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 1855—1858 和 1859—1865)。——35、179、191、495、501。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281。
- 格雷伯爵,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52);查·格雷的儿子。——77、105、110、718。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 1855—1858 和 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118、121、122、179。
- 格雷厄姆,蒙塔古·威廉(Graham, Montagu William 生于1807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52—1857)。——243。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 和 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36、113、121、129、155、165、166、180、200、202、256、404、411、440、441、452、470、474。
- 格里菲思(Griffith, W.)——英国牧师。——453。
-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309。
- 格罗夫纳,罗伯特,伊伯里男爵(Grosvenor, Robert, Baron Ebury 1801—

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404、431、505、509、511、524。

葛德里奇子爵——见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

古罗夫斯基伯爵,亚当(Gurowski, Adam, Graf 1805—1866)——波兰政论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变节,于1835年移居俄国成为叛徒;1844年前往德国,1849年移居美国;50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307、310。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f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联盟;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成立的新教联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602。

H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力浦·约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 Earl of 1799—1873)——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68、370—371。

哈丁子爵,亨利(Hardinge, Henry, Viscount 1785—1856)——英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5年起为陆军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1815)的参加者,曾任军务大臣(1828—1830和1841—1844),印度总督(1844—1848年1月),英军总司令(1852—1856)。——19、95、232、263。

哈尔福德,亨利(Halford, Henry 生于1798年)——英国议会议员(1832—1857)。——230、231。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311、312、314、315、352、353。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哈里逊,乔治(Harrison,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236。

哈桑·本·萨巴赫(Hasan-Ben-Sabbah 1056—1124)——伊斯兰教阿萨辛派创始人,该教派在12—13世纪曾抗御突厥—塞尔柱人和十字军。——72。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

- 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452。
-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总司令（1849）。——446。
- 海特，威廉·古迪纳夫（Hayter, William Goodenough 1792—1878）——英国法学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74。
- 海沃德，阿伯拉罕（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年被委任为济贫法委员会秘书长。——117。
- 汉德科克，约翰·斯特拉特福德（Handcock, John Stratford）——英国克兰里卡德伯爵的情妇伊·约·汉德科克遗产案的原告。——186。
- 汉卡，瓦茨拉夫（Hanka, Václav 1791—1861）——捷克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持保守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320。
- 汉密尔顿，威廉·亚历山大·贝利（Hamilton, William Alexander Baillie 1803—1881）——英国海军部副政务大臣。——35、36。
-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相传为古希腊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52。
-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政务大臣（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5、75、88、94—96、100、102、110、121、129、151、152、165—168、180、201、263、270、396。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11—316。
- 赫鲁晓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Хрущ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06—1875）——俄国将军，1853—1856年任克里木驻军指挥官，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253。
- 赫斯男爵，亨利希（Heß, Heinrich Freiherr von 1788—1870）——奥地利将军。

- 后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1854—1855 年任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马真塔会战失败后,统率奥军(1859 年 6—7 月)。——357。
- 黑尔,威廉(Hale, William)——伦敦郊区一家火箭工厂的所有人,罗·黑尔的父亲。——113、530。
- 怀斯,约翰·艾什福德(Wise, John Ayshford)——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53)。——395。
- 怀特赛德,詹姆斯(Whiteside, 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58—1859 和 1866)。——159。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40。
- 霍尔,本杰明(Hall, Benjamin 1802—1867)——英国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属于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曾任卫生大臣(1854 年 8 月—1855 年 7 月),公共工程部长官(1855—1858)。——69。
- 霍尔,约翰(Hall, John 1795—1866)——英国军医,1854—1856 年任克里木英军主任军医。——133。
- 霍尔顿(Halton)——英国工人。——53。
- 霍华德,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卡莱尔伯爵(Howard,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Earl of Carlisle 1802—186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上院议员,爱尔兰总督(1855—1858 和 1859—1864)。——211。
-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230。
- 霍瑟姆,查理(Hotham, Charles 1806—1855)——英国军官,1854—1855 年任维多利亚(澳洲)总督。——195、196。
- 霍斯曼,爱德华(Horsman, Edward 1807—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1857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55。

J

- 基奥,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h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会党团的领袖之一;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105、211、212。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 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81、383。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 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 原籍德国, 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 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580。
- 吉布森, 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396、410、441。
- 季托夫,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Тит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05—1891)——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43—1853); 1855年为俄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11、422。
- 加里波第, 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 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 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 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 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 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598。
- 剑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 英军总司令(1856—1895)。——260、268、270。
- 杰弗里斯, 乔治(Jeffreys, George 1648—1689)——英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王座法院大法官(1683—1685); 他对政治案件的判决极为严酷。——371。
- 杰罗尔德, 道格拉斯·威廉(Jerrold, Douglas William 1803—1857)——英国讽刺作家和剧作家。——53。
- 居斯丁侯爵, 阿斯托尔夫(Custine, Astolphe, marquis de 1793—1857)——法国旅行家和作家。——314、575。

K

- 卡德威尔子爵, 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 最初属托利党, 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 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 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165, 184, 263。
- 卡迪根伯爵, 詹姆斯·托马斯·布鲁德内尔(Cardigan, James Thomas Brudenell, Earl of 1797—1868)——英国将军,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旅长。——232。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 镇压巴黎六月起义; 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 立法会议员(1849—1851);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407。
- 卡莱尔家族——英国贵族世家。——368。
- 卡利古拉——见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
- 卡诺,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Carnot, Lazare-Nicolas-Marguerite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 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 1795年是五人内阁成员, 曾一度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陆军和内务大臣。——458。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尔纳·阿道夫。
- 卡思卡特, 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会战(1815),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232, 578。
-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 亨利·罗伯特, 卡斯尔雷子爵。
- 卡斯泰朗伯爵, 埃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Castellane, Esprit-Victor-Elisabeth-Boniface, comte de 1788—1862)——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0年起任里昂警备司令, 1859—1862年任里昂军区司令。——407。

卡特赖特,约翰(Cartwright, John 1740—1824)——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实行普选权和议会改革。——436。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论农业》的作者。——233。

凯利(Kelly)——英国军官,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团长。——304。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êtelet, 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109。

坎宁伯爵,查理·约翰(Canning, Charles John, Earl of 1812—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邮政大臣(1853—1855),印度总督(1856—1862),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策划者。——166。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托利党领袖,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145,146,369。

坎特伯雷大主教——见萨姆纳,约翰·伯德。

康格里夫,威廉(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1808年发明火箭,被命名为康格里夫火箭。——530。

康罗贝尔,弗朗索瓦·塞尔坦(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5月),克里木战争和奥意法战争期间任军长,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在梅斯被俘。——174,220,214,225,252—254,273—274,276,278,279,285,286,299,304,345,347,359,385,390,394,401,402,405,406,443,460,544。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150。

康替龙(Cantillon)——法国下级军官,在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中服役,1818年被控谋刺在法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威灵顿,后被宣告无罪。——356。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 [Kosciuszko], 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1776年流亡美

- 国,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的合作。——482。
- 柯克伦,托马斯,邓唐纳德伯爵(Cochrane, Thomas, Earl of Dundonald 1775—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历次战争,议会议员。——470。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31,104,169,231,353,439。
- 科贝特,约翰·摩尔根(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英国政治活动家,律师,议会议员;威·科贝特的儿子。——231。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30,38,237,354,383,441,452。
- 科尔多瓦(Cordoba [Córdoba])——西班牙准将。——608。
-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前后—1752)——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457。
-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黑海舰队参谋长(1849—1853),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274,275,278。
- 科尔切斯特男爵,查理·阿伯特(Colchester, Charles Abbot, Baron 1798—1867)——英国海军上将,托利党人,议会议员。——494,495。
- 科拉尔,扬(Kollár, Ján 1793—1852)——捷克诗人和语文学家,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鼓动者之一;斯洛伐克人。——307,320。
- 科皮塔尔,巴托洛缪或耶奈伊(Kopitar, Bartholomaeus [Jernej] 1780—1844)——斯拉夫语文学的杰出代表,斯洛文尼亚人,写有许多有关斯拉夫各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320。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08,113。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曾镇压爱尔兰 1848 年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 1865—1866 和 1868—1870)。——78, 113, 129, 155, 179, 197, 204, 242—243, 415, 494, 501。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伯格(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Marquess of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爱尔兰的大庄园主;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38—1841)、邮政大臣(1846—1852)和掌玺大臣(1858 年 2 月)。——53, 54, 160, 186, 513。

克劳塞维茨, 卡尔·菲力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首次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 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 1812—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 1818—1830 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 1831 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冯·格奈泽瑙的参谋长。——566。

克里斯蒂(Christie 1798—1855)——英国船长, 巴拉克拉瓦港监和运输事务指挥官, 在海军首席大臣詹·格雷厄姆指控他所谓的贻误军机, 打算将他送交军事法庭的时候去世。——470。

克伦威尔, 奥利费(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49 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37, 236。

克罗伊斯(Kroisos [Croesus])——吕底亚王(公元前 560—546)。——245。

克奈泽贝克男爵, 卡尔·弗里德里希(Knesebeck, K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768—1848)——普鲁士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历次战争, 出席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 1831 年任普鲁士驻波森监视军总司令。——481, 483。

L

拉德茨基伯爵, 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 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 1848—1849 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323, 556。

- 拉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曾以威灵顿的大本营参谋身份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15),曾任总司令部军务秘书(1827—1852),军械总长(1852—1854),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6、11、12、15、19、22、59、60、100、103、125—127、131、156、172、174、206、214、219—220、224、225、232、254、262、271、276、279、285、286、293、299、304、341、402、405—406、445、455、497。
-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回到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220、246、407。
- 拉姆(Lamb生于1785前后)——英国萨塞克斯的教士。——182。
- 拉姆(Lamb)——英国西哈克尼的教士,前者的儿子。——182。
- 拉姆,爱德华·奥古斯塔斯(Lamb, Edward Augustus)——英国萨塞克斯的教区保护人,前者的哥哥。——182。
- 拉斯卡斯伯爵,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 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 comte de 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拿破仑第一的秘书;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484。
- 拉塔什,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š, 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1854),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7、127、131、136、176、206、272、273、275、277—279、359—360、362—365、389、403、406、444、448、461、590、592。
- 拉维特,威廉(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宪章运动领袖,拥护“道德力量”并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436。
- 莱昂斯,埃德蒙(Lyons, Edmund 1790—1858)——英国海军上将,曾任驻雅典公使(1835—1849),瑞士公使(1849—1851)和瑞典公使;克里木战争的参加

- 者(1853—1856),曾任黑海舰队副总司令(1854)、总司令(1855)。——402、406。
- 莱特,纳坦(Wright, Nathan 1654—1721)——英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掌玺大臣和枢密院议员(1700—1705)。——194。
- 莱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 Sir Auste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起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大臣助理(1861—1866),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77—1880),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855)。——70、75、95、155、159、162、191、192、235、264、353、368、372—373、396、404、431、452、470、471、474、499。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 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159、313。
-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 Marquess of 1780—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和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58)。——129、501。
- 劳利,弗兰西斯·查理(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英国新闻工作者,威·尤·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1852—1854),《泰晤士报》驻美国通讯员(1854—1865)。——117、186。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
- 雷丁顿,托马斯·尼古拉斯(Redington, Thomas Nicolas 1815—1862)——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副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副主席(1852—1856)。——192。
- 李,詹姆斯(Lee, James)——英国医生。——198。
- 里普利,罗斯韦尔·萨宾(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61年起为将军,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写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历史方面的著作。——531。
- 里士满公爵,查理·戈登·伦诺克斯(Richmond, Charles Gordon-Lennox, Duke of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保护关税派,议会议员。——68。

- 理查二世(Richard II 1367—1400)——英国国王(1377—1399)。——155、162。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179。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贝特(Richards, Alfred Bate 笔名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man 1820—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50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派进行论战。——202。
- 理查兹,乔治·亨利(Richards, Sir George Henry)——英国海军上将和著作家。——470。
- 利涅公爵,卡尔·约瑟夫(Ligne, Karl Joseph, Fürst von 1735—1814)——奥地利将军,外交家和著作家;1809年起为元帅。——67、480。
- 利文公爵夫人,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赫·安·利文公爵的夫人,曾在欧洲的外交生活中起重要作用。——13、501。
-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Earl of 1770—182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屡任内阁大臣,曾任首相(1812—1827)。——146、158、239、371、514。
-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Baron 1772—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大法官(1827—1830、1834—1835和1841—1846)。——53、73、74、239—241、415。
-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笔名斯巴达克 Spartacu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宪章运动并为宪章派刊物撰稿;《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66年迁居美国。——313。
- 林赛,威廉·肖(Lindsay, William Shaw 1816—1877)——英国船主和商人,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514。
- 刘易斯,乔治·康沃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次官(1850—1852),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1855—1858),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179、233。
- 娄,罗伯特(鲍勃),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

- 财政大臣(1855—1858和1868—1873)和内务大臣(1873—1874)。——159,266,404,413,414,438,439。
-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10。
- 卢肯伯爵,乔治·查理·宾厄姆(Lucan,George Charles Bingham,Earl of 1800—1888)——英国将军,托利党人,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师长。——232。
- 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里彭伯爵(Robinson,Frederick John,Viscount Goderich,Earl of Ripon 1782—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18和1841—1843)、财政大臣(1823—1827)、首相(1827—1828)。——31,146,193。
-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Lionel Nathan,Baron 1808—1879)——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58—1874)。——514。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60,186,281,289,301,345,395,514。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531。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493。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71—79,88,92—94,96,100,103,110,111,118,155,157—160,165—168,204,270,409,410,425,470—472,485,495,499,501,525。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59。
- 罗德韦尔,约瑟亚(Rodwell,Josiah)——英国神父。——182。
- 罗盖伯爵,克里斯托夫·米歇尔(Roguet,Christoph-Michel,comte de 1800—

1877)——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407。

罗克比男爵,亨利·鲁宾逊·蒙塔古(Rokeby, Henry Robinson-Montague, Baron 1798—1883)——英国将军,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师长。——152。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1841),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13,38,59,70,72,74—79,92,93,95,97,102—104,110,113,114,117—118,120—122,130,154,157—158,160,166—168,169,180,181,191,192,257,258,262,264,282,289,290,325,409—412,414—416,422—424,439—442,452,472,474,501,514。

M

马里克沙赫(Malik Shah 1055—1092)——塞尔柱人国家的执政者(苏丹)(1072—1092)。——72。

马林斯,理查(Malins, Richard 1805—1882)——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514。

马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149,585。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256,493—495。

马尼昂,贝尔纳·皮埃尔(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里昂(1831和1849)、里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及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为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是参议员。——174,287,407。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

- 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113。
- 迈尔斯，威廉(Miles William 1797—1878)——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159。
- 麦克尼尔，约翰(McNeill [M'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36—1842)，调查克里木英军军需状况的政府全权代表(1855)。——156。
- 麦克唐纳(Macdonald)——英国新闻工作者，《泰晤士报》的撰稿人。——268。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240。
- 芒茨，乔治·弗雷德里克(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兵工厂厂主，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时期(1832)曾组织多次群众集会拥护改革。——211。
-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296。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20—322, 441, 480。
- 蒙塞尔，威廉，埃姆利男爵(Monsell, William, Baron Emly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曾任军械局

- 秘书(1852—1857)。——105、192、211。
-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81。
-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458、567。
- 蒙特库库利伯爵,雷蒙德·梅尔菲公爵(Montecuculi, Raimond, Graf von, Herzog von Melfi 1609—1681)——奥地利统帅、军事著作家和改革家,原籍意大利,三十年战争的参加者;写有军事方面的著作。——481。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500。
- 米尔纳·吉布森——见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
-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197。
-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Miklošich, František 1813—1891)——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洛文尼亚人;曾任维也纳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授(1849—1886);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320。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发明者。——540、548、550、557、567、595、600。
- 缅施科夫公爵,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нязь 1787—1869)——俄国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1836—1853年任海军大臣,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任陆海军总司令。——8、83、91。
-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 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的同

- 母异父的弟弟。——281。
-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 Sir William, 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69、105、408、409、440。
- 莫里茨(拿骚的),拿骚伯爵(奥伦治亲王)(Moritz von Nassau, Graf von Nassau [Prinz von Oranien] 1567—1625)——尼德兰总督(1585—1625),军事活动家,尼德兰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567。
- 莫里斯,莫布雷(Morris, Mowbray 1819—1874)——英国出版商,《泰晤士报》的财务负责人(1848—1873)。——266。
- 莫奈,德(Monet, de)——法国将军,1854—1855年初为克里木法军旅长。——253。
-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Viscount 1779—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和首相(1834和1835—1841)。——13、152、160、201。
- 默罗,约翰·帕特里克(Murrough, John Patrick)——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236。
- 穆罕默德沙赫(Muhammed Shah 1810—1848)——波斯沙赫(1834—1848)。——149。
- 穆拉维约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Муравь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4—1866)——俄国将军,1854—1856年任高加索俄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465、486。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8、23、138、180、221—222、226—227、246、247、249、260、266—268、301、356、388、442、457、468、482—484、531、533—535、542、543、567、608。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60、100、129、130、160、174、180、197、200—202、204—205、208、219—222、224—226、245—247、249、255—259、265、277、281、287、290、293、295—301、342、356、358、390、393、394、402、407、441、

445、463—468、475、476、482、485、487、493、497、540、544。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纳尔瓦埃斯,拉蒙·马利亚,巴伦西亚公爵(Narváez, Ramón Maria, duque de Valencia 1800—1868)——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温和派领袖,政府首脑(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607。

纳皮尔,爱德华——见埃勒斯 纳皮尔,爱德华·德拉瓦尔·亨格福德。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441、470、513。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Si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137、164、541、542、548、552—553、565。

纳皮尔,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2年起任德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16。

奈特,查理(Knight, Charles 1791—1873)——英国政论家、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478。

南丁格尔,弗洛伦斯(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英国女社会活动家,克里木战争期间在组织英军医疗方面起杰出作用。——261、269。

尼埃尔,阿道夫(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将军,1859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1854年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工程长官,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220、225、251。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10、36、53、66、80、83、116、117、122、142、147、177、188、197、198、228、239、257、296、326、415、423、486。

尼科莱(Nicholay, J. A.)——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55年为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扩大工业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宣传家之一,60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236。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239、415—417、422、423。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12、13、22、68、73、76、77、93、95、102—104、110、120—122、158、166、167、232、263、270。

O

欧根亲王——见弗兰茨·欧根,萨瓦亲王(欧根亲王)。

欧几里得(Euclid 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古希腊数学家。——551。

P

帕克斯顿,约瑟夫(Paxton, Sir Joseph 1801—1865)——英国建筑学家,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1851)展览馆设计者,议会议员。——159。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6月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320。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3、12、13、38、39、69、73、77—79、87、93、94、97—98、100、102、108—113、116、117、121、122、129、130、144—150、154—158、160、162、163、165—168、179—181、192、193、197、202—204、208、211、212、228、232、234、244、262、277、282、290、353、354、356、367、372、373、375、395、396、404、408—411、417、429—431、438—439、451—453、466、473—475、477、488、489、498、500、501、509、511—513。

帕纽亭,费多尔·谢尔盖耶维奇(Панютин, Фё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俄国将军,在克里木战争初期任军长,1855—1856年为俄国西南部后备军指挥官。——63、65、83、91、446。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 1782—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580。
- 帕西非科,大卫(Pacifico, David 1784—1854)——英国商人,原籍葡萄牙。——97,147。
- 派西沃,斯宾塞(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席检察官(1802—1806),财政大臣(1807—1809),首相(1809—1812)。——146,369,371,372,514。
- 潘缪尔男爵,福克斯·莫尔(Panmure, Fox Maule, Baron 1801—187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军务大臣(1846—1852)和陆军大臣(1855—1858)。——152,155,158,166,232,282,373,524。
- 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贝·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174。
- 佩拉特,阿普斯利(Pellat, Apsley 1791—1863)——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236。
-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ess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岗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385,390,394—395,402,403,405—407,427,443—445,447—449,455,460—462,464,492,497,498,516,518,520—522。
- 皮尔,弗雷德里克(Peel, Frederick 1823—1906)——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陆军副大臣(1855—1857);英国首相罗·皮尔的儿子。——152,192。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该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

- 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3、148、152、167、181、203、263、270、369、380、441。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副大臣(1855—1857);英国首相罗·皮尔的儿子。——228、243—244。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180、352、369、371、514。
- 皮亚诺里,乔万尼(Pianori, Giovanni 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和抗击法国武装干涉者的罗马共和国保卫战;革命失败后流亡皮埃蒙特,后迁法国,1855年5月谋刺拿破仑第三未遂被处死。——356。
-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146、371。
- 普芬多夫男爵,赛米尔(Pufendorf, Samuel Freiherr von 1632—1694)——德国学者,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317、327。
- 普拉兰——见舒瓦泽尔 普拉兰公爵,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
- 普拉特,多米尼克·迪富尔·德(Pradt, 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法国神父、外交官、政论家和历史学家。——480、609。
- 普莱森男爵,奥托(Plessen, Otto, Baron von 1816—1897)——丹麦驻彼得堡公使(1849—1867)。——494。
- 普里切特,罗伯特·泰勒(Pritchett, Robert Taylor 1828—1907)——英国枪械技工,曾改进米涅式步枪。——548、550。
-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俄国诗人。——313。

Q

-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1714—1727)。——5。
-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5。
-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英国摄政王(1811—1820),英国国王

(1820—1830)。——504。

切奥达耶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俄国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12),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军长和预备军团指挥官。——83,91。

切斯尼,弗兰西斯·罗登(Chesney, Francis Rawdon 1789—1872)——英国军官和探险家,1855年起为将军;曾考察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的水运通道。——552。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和政论家,职业是律师,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202,237,354,376—378,434。

琼斯,哈里·大卫(Jones, Harry David 1791—1866)——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10—1814)的参加者;1854年为波罗的海英国远征军指挥官,1855年在克里木作战时负责工程勤务。——156,251。

琼斯,约翰·盖尔(Jones, John Gale 1769—1838)——英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小资产阶级激进派。——372。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258。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566。

S

萨德勒,约翰(Sadle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105,117,186。

- 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何塞, 圣路易斯伯爵 (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847—1851), 政府首脑 (1853—1854)。——607。
- 萨默塞特, 亨利 (Somerset, Henry 1794—1862)——英国将军, 1855 年被任命为孟买东印度公司英军总司令。——152。
- 萨姆纳, 约翰·伯德 (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英国教士, 切斯特主教 (1828—1848), 坎特伯雷大主教 (1848—1862)。——229。
- 萨瑟兰家族——苏格兰贵族大地主家族。——368。
- 萨瓦亲王——见弗兰茨·欧根, 萨瓦亲王 (欧根亲王)。
- 塞拉诺·多明格斯, 弗朗西斯科, 圣安东尼奥伯爵, 托雷公爵 (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conde de San Antonio, duque de la Torre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陆军大臣 (1843), 1854 年七月革命和 1856 年国家政变的参加者; 马德里镇守司令 (1859—1862), 外交大臣 (1862—1863), 临时政府首脑 (1868—1869), 王国摄政 (1869—1871), 内阁首相 (1871, 1874)。——608。
- 塞桑纳, 阿梅代·巴泰勒米·加耶·德 (Cesena, Amédéc-Barthélemy-Gayet de 1810—1889)——法国政论家,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和其他定期刊物撰稿, 1852—1857 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编。——463, 475, 485。
- 沙法里克, 帕维尔·约瑟夫 (Šafárik, Pavel Josef 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307, 320。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1, 53, 93, 133, 179, 440, 497。
- 尚加尔涅, 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1849), 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 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 曾参加驱散巴黎 1849 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 1859 年回到法国, 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220, 407。
-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

- 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503。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74、208、219—221、224、246、263、287、296—297、299—300、394、407、539。
- 圣乔治(Saint-Georges)——法国冒险家。——208。
- 圣热尔曼伯爵,约瑟夫·玛丽(Saint-Germain, Joseph Marie, comte de 死于1784年)——冒险家,可能是葡萄牙人,约1748年开始出入法国宫廷,路易十五曾请他执行秘密使命。——208。
- 施勒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Schlözer, 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1761—1769年居住在俄国,写有关于斯拉夫历史和语文学方面的著作。——311。
- 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Choiseul-Praslin, Charles-Laure-Hugues-Théobald, duc de 1805—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贵族院议员(1845年起);因谋杀其妻受到控告,后自杀。——160、186。
- 斯克里布,奥古斯坦·欧仁(Scribe, Augustin-Eugène 1791—1861)——法国戏剧家和歌剧作家。——290。
- 斯洛科姆,威廉(Slocombe, William)——19世纪50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377。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8。
- 斯密斯,安德鲁(Smith, Andrew 1797—1872)——英国军医,曾领导英军医务部门的工作(1846—1858)。——261、270。
- 斯密斯,罗伯特·弗农(Smith, Robert Vernon 1800—187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军务大臣(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88、179。
- 斯塔福德,奥古斯塔斯(Stafford, Augustus 1811—1857)——英国议会活动家,托利党人。——95、264。

- 斯坦利——见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 斯特拉恩,威廉(Strahan, William 约生于 1808 年)——英国银行家,1855 年 6 月破产,因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513,514。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议会议员(1828—1841);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5—1828 和 1841—1858)。——150。
- 斯特林,爱德华(Sterling, Edward 1773—1847)——英国《泰晤士报》的通讯员(1811—1815)和编辑(1815—1840)。——266。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Stuart, Dudley Coum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147。
-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 Henry Robe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 和 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239,480。
- 斯托纳,亨利(Stonor, Henry)——英国政治活动家,1854 年起任维多利亚(澳洲)法官。——186。
- 索比斯基——见扬三世·索比斯基。

T

- 塔克文(鲁齐乌斯·塔克文)(高傲的)(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公元前 534—约 509)——相传为古罗马最后一个(第七个)王,据传说人民起义把他驱逐出罗马,废除了王政,建立起共和制度。——175。
- 塔珀,马丁(Tupper, Martin 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劝谕性诗篇。——98。
- 泰勒,汤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50 年代为《笨拙》杂志的撰稿人,后为该杂志编辑(1874—1880);1854 年被任命为卫生委员会秘书;1860 年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69。
- 泰勒,瓦特(Tyler, Wat 死于 1381 年)——英国神父,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155,162。
- 泰勒,詹姆斯(Taylor, James)——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55 年支持工业资

- 产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235。
- 泰特,威廉(Tite, William 1798—1873)——英国建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行政改革协会副主席。——433。
- 汤普森,乔治(Thompson, George 1804—1878)——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50年代为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积极活动家。——383。
- 特拉弗斯,英格拉哈姆(Travers, Ingraham)——英国政治活动家,1855年为资产阶级财贸界争取行政改革运动的领袖。——377。
- 特罗洛普,约翰(Trollope, John 生于1800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11。
-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ūr-i-lang [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197。
- 托特列本,爱德华·伊万诺维奇(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俄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领导工程作业,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领导围攻普列夫纳。——275,349,577,580。



- 瓦扬,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Vaillant, Jean-Baptiste-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陆军大臣(1854—1859),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任总参谋长,皇廷事务大臣(1860—1870)。——219,224,445。
- 旺达姆,多米尼克·勒奈(Vandamme, Dominique-René 1770—1830)——法国将军,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3年在库尔姆附近率军投降。——296。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部财务次官(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9,160。
- 威尔逊·帕滕,约翰(Wilson-Patten, John 1802—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53。
- 威科夫,亨利(Wikoff, Henry 约1813—1884)——美国新闻工作者,外交家;1834年起住在欧洲,英国间谍(1855年起);50年代初代表帕麦斯顿在报刊上发表意见。——98。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5,154。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150。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8,22,23,126,127,132,146,181,263,356,497,531,542,546,547。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费恩(Westmorland, John Fane, Earl of 1784—1859)——英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41—1851),驻维也纳公使(1851—1855)。——3,70,409,410。

韦德尔,莱奥波德·亨利希(Wedell, Leopold Heinrich 1784—1861)——普鲁士将军,1855年负外交使命驻巴黎。——228—229。

韦尔斯利侯爵,理查·科利(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Marquis 1760—1842)——英国国务活动家,曾任印度总督(1797—1805),驻西班牙大使(1809),外交大臣(1809—1812),爱尔兰总督(1821—1828和1833—1834);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者。——18,23。

韦克利,托马斯(Wakley, Thomas 1795—1862)——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医生,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55年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235。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1,258,373,472,499,506,524。

维利森男爵,卡尔·威廉(Willisen, 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1848—1849年在奥地利军队中供职,曾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年统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对丹麦作战;写有军事史方面的著作。——597。

魏恩,哈里·乔治(Vane, Harry George)——英国议会议员。——396。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

- 命。——323,556。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74,457,459。
-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肖(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96—97,453。
- 沃尔特家族——英国家族,《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266。
- 沃克曼(Workman)——19世纪50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377。
- 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Warwick, Richard Neville, Earl of 1428—1471)——英国封建主,在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中起巨大作用;他操纵了立王事宜,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者”。——169。
- 沃龙佐夫公爵,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1854)。——152。
- 沃姆斯利,乔舒亚(Walm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50年代为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组织者之一和主席。——383。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外交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52,150,198,199,436—438,441,471。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106,107,114,154,179,256,511,514。

X

-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温和的立宪君主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复辟后被

- 放逐,定居布鲁塞尔,1830年7月回到巴黎;《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作者。——493。
-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2—1821)。——146,369。
- 西顿男爵,约翰·科尔伯恩(Seaton, John Colborne, Baron 1778—1863)——英国将军,后为陆军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15);爱尔兰英军司令(1855—1860)。——152。
- 西弗斯伯爵,弗拉基米尔·卡尔洛维奇(Сиверс,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лович, граф 1790—1862)——俄国将军,1854—1855年任波罗的海沿岸驻军司令。——82,90。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彼得堡(1851—1854)和维也纳(1855—1858)公使。——116,415,423。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101。
- 希,威廉(Shé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212。
- 希尔德,卡尔·安德烈耶维奇(Шильдер,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俄国将军和军事工程师,武器技术方面的发明家,俄土战争时期(1828—1829和1854)在锡利斯特里亚领导俄军进行围攻作业。——275。
- 希律(Herod 公元前73—4)——犹太国王(公元前40—4)。——30。
-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 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245。
- 希思科特,威廉(Heathcote, William 1801—1881)——英国议会议员。——413,414,438。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307。
-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德(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活动家,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定委员

- 会主席;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567。
- 小日罗姆·波拿巴——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辛普森,约翰(Simpson, John)——英国经纪人。——182。
- 辛普森,詹姆斯(Simpson, James 1792—1868)——英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参谋长(2—6月),后任总司令(6—11月)。——152、156。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47、169、383、436。
- 休斯,特伦斯·麦克马洪(Hughes, Terence McMahon 1812—1849)——英国作家,长期侨居西班牙。——608。
- 雪恩哈尔斯男爵,卡尔(Schönhals, Karl Freiherr von 1788—1857)——奥地利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596、597。
- 雪莱,约翰·维利尔斯(Shelley, John Villiers 1808—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议会议员。——235。

Y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198、239、480。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233、239、247、249、257、317、326、327、466、486、495。
- 扬三世·索比斯基(Jan III Sobieski 1629—1696)——波兰国王(1674—1696)。——481。
- 杨格,约翰,利斯加男爵(Young, Sir John, Baron Lisgar 1807—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52—1855),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1855—1859)。——106。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239。
- 伊林斯基,亚历山大(伊斯肯德贝伊)(Iliniski, Alexander [Iskander Bey] 1810—1861)——土耳其将军,原籍波兰,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称伊斯肯德贝伊,在土耳其供职;1853—1854年在多瑙河,1855年在克里木,1855—1856年在高加索任土军指挥官。——277、278、591。

伊斯肯德贝伊——见伊林斯基,亚历山大。

伊文思,戴维·莫里埃(Evans, David Morier 1819—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383。

伊文思,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152, 205—207, 235。

易卜拉欣帕沙(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统帅,曾率领土耳其军队镇压希腊的起义者(1824—1828),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1831—1833和1839—1841)中任埃及军队总司令;1844年起为埃及的共同摄政者;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的义子。——149。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前后—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453。

约克,查理·菲力浦(York, Charles Philipp 1764—183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01—1803),内务大臣(1803—1804),海军大臣(1810—1811)。——371, 372。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奥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67。

Z

扎莫伊斯基伯爵,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 Władysław, Graf 1803—1868)——波兰大地主和将军,曾参加1830—1831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15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格拉曼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摩尔国皇帝。——21。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71。

奥涅金——见叶甫盖尼·奥涅金。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人。——152。

F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133。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440、497。

海格力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12、13。

赫斯贝里德姊妹——古希腊神话中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们，看守长在生命树

上的金苹果。——514。

K

科伯恩——丹·弗·奥柏根据奥·欧·斯克里布的脚本改编的喜歌剧《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兄弟》)中的人物。——290。

库尔齐乌斯(马可·库尔齐乌斯)——传说中的古罗马少年,他投身深渊以拯救罗马。——78。

L

连斯基——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313。

M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508。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229。

Q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浴,因而刀枪不入。——411。

S

瑟息替斯——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和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因诋毁希腊军队的首领而遭到奥德赛的毒打。——71、501。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46、372。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辱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

就消失不见。——21、261、269。

特洛米奥(爱非斯的特洛米奥和叙拉古的特洛米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中的人物。——157。

W

沃里克——布尔沃-利顿的小说《最后一个男爵》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理想化了的15世纪封建内乱的参加者的典型人物。——169。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175、198。

Y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313。

以萨迦——据圣经传说,是雅各的儿子之一,是犹太人十二支派之一的祖先;他异常驯服顺从,并特别能吃苦耐劳,因此他的父亲雅各把他比做“强壮的驴”。——477。

尤金·阿拉姆——布尔沃-利顿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与学术界隔绝、最后在与周围现实冲突中牺牲的学者典型。——441。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20、58、63、92、97、118、137、290、291、393、465。

文献索引^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载于1853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The Russian humbug.—Gladstone's failure.—Sir Charles Wood's East Indian reform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801.22.Juni 1853)。——115。
-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载于1853年5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8号(Fergus O'Connor.—Ministerial Defeats.—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3758, May 3, 1853)。——115。
-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载于1853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0号(Affairs in Holland.—Denmark.—Conversion of the British debt.—India, Turkey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790.9.Juni 1853)。——115。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Riot at Constantinople.—German table moving.—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761.6.Mai 1853)。115。
- [《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两公国的局势。——西班牙。——不列颠的对外贸易》]，载于1854年10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8号([The Ac-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 tions of the Allied Fleet.—The Situation in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Spain.—British Foreign Trad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4198, October 2, 1854). — 40。
- 《内阁的成就》，载于 1853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3 号 (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3, 27. April 1853)。— 115。
- 《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载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新奥得报》第 241 号 (Zur Kritik der Krim'schen Angelegenheiten. — Aus dem Parlamente. In: Neue Oder-Zeitung, No. 241, May 26, 1855)。— 418。
-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载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22 号 (Forced emigration.—Kossuth and Mazzini.—The refuge question.—Election bribery in England.—Mr. Cobde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22, 22. März 1853)。— 111。
-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载于 1853 年 2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95 号 (Capital punishment.—Mr. Cobden's pamphlet.—Regula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95, 18. Februar 1853)。— 109。
- 《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载于 1853 年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81 号 (The Vienna note.—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Letters from Shumla.—Peel's bank ac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81, 24. September 1853)。— 380。
- [《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载于 1854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5 号 ([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 ministry of war in Britain.—The war on the Danube.—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4105, June 14, 1854)。— 219, 224。
- 《战争。——罢工。——缺粮》，载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 (War.—Strikes.—Dearth.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3925, November 15, 1853)。— 45, 48。
- 《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载于 1853 年 8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54 号 (The war question.—British population and trade returns.—Doings of Parlia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54, 24. August 1853)。——40。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3886, September 30, 1853)。——40, 45。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3794, 14. Juni 1853)。——40, 48。

弗·恩格斯

《阿利马河会战》，载于1854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The battle of the Alma.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4219, October 26, 1854)。——124。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载于1854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4号(The capture of Bomarsund.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4174, September 4, 1854)。——55。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载于1854年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09号(The attack on Sevastopol.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4209, October 14, 1854)。——15, 61, 246, 287。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载于1854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The Siege of Sevastopol.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4236, November 15, 1854)。——15, 128。

《俄国的军事力量》，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The Military Power of Russia.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o. 4223, October 31, 1854)。——81。

《克里木的新攻势》，载于1855年5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02号(The new move in the Crimea.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402, 29. Mai 1855)。——359—365, 385, 389。

《克里木战役》，载于1854年1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6号(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n.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246, 27. November 1854)。——220, 225。

《拿破仑最近的诡计》，载于1855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8号(Napoleon's last dodge.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358, 7. April

- 1855)。——247。
-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载于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The last battle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3997, February 8, 1854)。——7。
- 《塞瓦斯托波尔》，载于1855年6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29号(Sevastopol.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429, 29. Juni 1855)。——498。
- 《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战斗》，载于1855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8号(A battle at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58, 7. April 1855)。——2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载于1855年5月11日《新奥得报》第217号(Die Belagerung von Sebastopol. In: Neue Oder-Zeitung, Nr. 217, 11. Mai 1855)。——344—346, 348—349。
- 《关于英国的军事制度》，载于1855年1月8、9日《新奥得报》第11、13号(Zum englischen Militärwesen. In: Neue Oder-Zeitung, Nr. 11, 8. Januar 1855; Nr. 13, 9. Januar 1855)。——16—22。
- 《军队的状况》，载于1855年2月24日《新奥得报》第93号(Zustand der Armeen. In: Neue Oder-Zeitung, Nr. 93, 24. Februar 1855)。——138, 140—142。
- 《克里木的最新情况》，载于1855年3月26日《新奥得报》第143号(Uber die letzten Vorgänge in der Krim. In: Neue Oder-Zeitung, Nr. 143, 26. März 1855)。——247—248, 250—254。
- 《克里木事件》，载于1855年3月19日《新奥得报》第131号(Krimsche Angelegenheiten. In: Neue Oder Zeitung, Nr. 131, 19. März 1855)。——214—218。
- 《论克里木局势》，载于1855年7月2日《新奥得报》第301号(Uber die Ereignisse in der Krim. In: Neue Oder-Zeitung, Nr. 301, 2. Juli 1855)。——516—523。
- 《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载于1855年4月17日《新奥得报》第177号(Kritik des Napoleonischen Moniteur-Artikels. In: Neue Oder Zeitung, Nr. 177, 17. April 1855)。——295—301。

- 《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载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新奥得报》第 273 号(Kritik der Krimischen Unternehmungen. In: Neue Oder-Zeitung. Nr. 273. 15. Juni 1855)。——455—462、498。
- 《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载于 1855 年 4 月 18 日《新奥得报》第 179 号(Die Affäre vom 23. März. In: Neue Oder-Zeitung. Nr. 179. 18. April 1855)。——302、304—306。
- 《英国军队》，载于 1855 年 8 月 28 日《新奥得报》第 399 号(Die britische Armee. In: Neue Oder-Zeitung. Nr. 399. 28. August 1855)。——544—546。
- 《英国士兵的服装和装备》，载于 1855 年 9 月 1 日《新奥得报》第 407 号(Uniformierung und Equipierung des britischen Soldaten. In: Neue Oder-Zeitung. Nr. 407. 1. September 1855)。——544、548—549、552—554。
- 《战况的进展》，载于 1855 年 1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76 号(Progress of the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4276, January 1, 1855)。——84、326。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伯丁, 乔·〔《给罗素的信。1854 年 11 月 30 日》,〕载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1962 号(Aberdeen, G.: [Letter to Russell of November 30,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77。
- 阿伯丁, 乔·〔《给蒙塞尔的信。1853 年 6 月 3 日》,〕载于 1853 年 6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1447 号(Aberdeen, G.: [Letter to Monsell of June 3, 1853.] In: The Times, No. 21447, June 6, 1853)。——114。
- 阿伯丁, 乔·〔《1853 年 8 月 9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3 年 8 月 10 日《泰晤士报》第 21503 号(Aberdeen,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August 9, 1853.] In: The Times, No. 21503, August 10, 1853)。——116。
- 阿伯丁, 乔·〔《1855 年 2 月 1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2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1967 号(Aberdeen,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7, February 2, 1855)。——101。
- 《阿尔伯特亲王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载于 1855 年 6 月 13 日《每日新闻》(伦

- 敦)第 2829 号 (Opinions of Prince Albert on public affair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829, 13. Juni 1855)。——472—473, 477。
- 《阿尔伯特亲王谴责我们的立宪政府》, 载于 1855 年 6 月 17 日《雷诺新闻》(伦敦)第 253 期 (Prince Albert condemns ou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Reynolds's Newspaper, London, Nr. 253, 17. Juni 1855)。——477—478。
- 埃伦伯勒, 爱·[《1855 年 1 月 23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1959 号 (Ellenborough,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68。
- 埃伦伯勒, 爱·[《1855 年 5 月 14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5 月 15 日《泰晤士报》第 22054 号 (Ellenborough,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May 1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54, May 15, 1855)。——368, 370—374。
- 奥马拉, 巴·爱·《流放中的拿破仑, 或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拿破仑对其生活的和政府的重大事件的看法和影响》(两卷集) 1822 年伦敦版 (O' Meara, B. E.: Napoleon in exile; or, a voice from St. Helena. The opinions and reflections of Napoleon on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his life and government, in his own words, Vols. I—II, London 1822)。——267。
- 奥特韦, 阿·约·[《1855 年 6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2090 号 (Otway, A.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0, June 26, 1855)。——511。

B

- 《巴黎通讯》, 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新闻报》(伦敦)第 3 卷第 99 期 (Paris correspondence. In: The Press, London, Vol. 3, Nr. 99, 24. März 1855)。——256—257。
- 拜比吉, 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 年伦敦版 (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440。
- 包法利, 爱·普·[《1855 年 6 月 29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6 月 30 日《泰晤士报》第 22094 号 (Bouverie, E. P.: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4, June 30, 1855)。——525。
- 《报纸印花税》, 载于 1855 年 6 月 17 日《雷诺新闻》(伦敦)第 253 期 (The newspaper stamp. In: Reynolds's Newspaper, London, Nr. 253, 17. Juni 1855)。——

477—478。

贝尔纳-奥斯本,拉·〔《1855年1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Bernal Osborne,R.:〔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9, 1855.〕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4—95。

贝克莱,莫·〔《1855年1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Berkeley,M.:〔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9, 1855.〕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5。

贝利,亨·〔《1855年5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61号(Baillie, H.:〔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y 22, 1855.〕In: The Times, No. 22061, May 23, 1855)。——395。

贝林,弗·〔《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Baring, F.:〔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y 24, 1855.〕In: The Times, No. 22063, May 25, 1855)。——413—414。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 L. N.: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259、394、483、488。

布尔沃-利顿〔《1855年6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5日《泰晤士报》第22072号(Bulwer-Lytton:〔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4, 1855.〕In: The Times, No. 22072, June 5, 1855)。——441。

布尔沃-利顿〔《1855年6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6日《泰晤士报》第22082号(Bulwer-Lytton:〔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5, 1855.〕In: The Times, No. 22082, June 16, 1855)。——488。

布莱特,约·〔《1855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86号(Bright, J.:〔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3, 1855.〕In: The Times, No. 21986, February 24, 1855)。——166。

布莱特,约·〔《1855年6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8日《泰晤士报》第22075号(Bright, J.:〔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7, 1855.〕In: The Times, No. 22075, June 8, 1855)。——453。

布鲁姆,亨·彼·〔《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Brougham, H. P.:〔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June 21, 1855.〕In: The Times, No. 22087, June 22, 1855)。——495。

C

- 《出口。——工厂法》，载于1855年1月13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94期(Exports.—The Factory Ac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94, 13. Januar 1855)。——29。
- 《船员在汉科遭残杀。致〈纪事晨报〉编辑》，署名:R.G.A.,载于1855年6月20日《纪事晨报》第27607号(R.G.A.; The Boat's Crew Destroyed at Hangö.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Chronicle.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No. 27607, June 20, 1855)。——489。

D

- 道格拉斯,霍·《论海军炮》1820年伦敦版(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20)。——553。
- 道格拉斯,霍·《论海军炮》1855年伦敦修订第4版(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Fourth edition, revised. London 1855)。——55。
- 德比,爱·乔·〔《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Derby, E.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7, February 2, 1855)。——101。
- 德比,爱·乔·〔《1855年2月8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73号(Derby, E.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73, February 9, 1855)。——129。
- 德比,爱·乔·〔《1855年5月1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15日《泰晤士报》第22054号(Derby, E.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May 1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54, May 15, 1855)。——372—373。
- 德拉蒙德,亨·〔《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Drummond,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88。
- 德拉蒙德,亨·〔《1855年3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012号(Drummond,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12, March 27, 1855)。——266—267。
- 德拉蒙德,亨·〔《1855年6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9日

- 《泰晤士报》第 22084 号 (Drummond,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8,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4, June 19, 1855)。——513。
- 邓克林·尤·坎·[《给卡卢加省长托尔斯泰伯爵的信。1854 年 11 月 10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1946 号 (Dunkellin, U.C.: [Letter to the Kaluga governor, Count Tolstoi, dated November 10,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46, January 9, 1855)。——53。
- 邓库姆, 托·斯·[《1855 年 2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泰晤士报》第 21980 号 (Duncombe, Th.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0, February 17, 1855)。——158。
- 邓库姆, 托·斯·[《1855 年 6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2090 号 (Duncombe, Th.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0, June 26, 1855)。——514。
- 邓洛普, 亚·格·《哥萨克的统治和俄国对欧洲和德国的影响》1855 年伦敦版 (Dunlop, A.G.: Cosack rule and Russian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over Germany. London 1855)。——483—484。
- 迪斯累里, 本·[《1845 年 2 月 28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5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78 卷 (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8, 1845.]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78, London 1845)。——180。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12 月 12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1923 号 (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December 12,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23, December 13, 1854)。——39。
- 迪斯累里, 本·[《1855 年 1 月 29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1 月 30 日《泰晤士报》第 21964 号 (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6, 110。
- 迪斯累里, 本·[《1855 年 2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泰晤士报》第 21980 号 (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0, February 17, 1855)。——157。
- 迪斯累里, 本·[《1855 年 5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2063 号 (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3, May 25, 1855)。——396, 404, 408。

413—417。

迪斯累里,本·[《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430。

迪斯累里,本·[《1855年6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9日《泰晤士报》第22084号(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8,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4, June 19, 1855)。——488。

《东方远征》,载于1855年4月11日《总汇通报》第101号(Expédition d'Orient.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r. 101, 11, April 1855)。——295, 342, 393。

E

《俄国及其诡计》,载于1855年1月1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第1684期(Russia and her ruses. In: The Sunday Times, London, Nr. 1684, 14, Januar 1855)。——37。

F

法特尔,埃·德·《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四卷集)1758年莱顿版(Vattel, E. de: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Bd. 1-4, Leyden 1758)。——317, 327。

《芬兰湾,距喀琅施塔得16海里。5月28日》,载于1855年6月6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450号(Gulf of Finland, 16 miles off Cronstadt, May 28.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450, 6, Juni 1855)。——453—454。

[福克斯,查·]《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约·罗素编,1853—1854年伦敦版第1—3卷,第4卷于1857年在伦敦出版([Fox, Ch.:] Memori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James Fox, Ed. By Lord John Russell, Vols. 1—3, London 1853—1854, The last, fourth volume came out in 1857)。——76。

G

[哥尔查科夫,米·德·]《[电报。1855年]4月19日于塞瓦斯托波尔》,载于1855年4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37号([Gorchakoff, M. D.: Depesche.] Sebastopol, April 19,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37, 25, April 1855)。——

334。

[哥尔查科夫,米·德·][《电报。1855年》4月22日于塞瓦斯托波尔],载于1855年4月27日《圣彼得堡报》第679号([Gorchakoff, M. D.; Depesche.]Sebastopol. April 22, [1855]. In: 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 Nr. 679. 27. avril 1855)。——334。

格莱斯顿,威·尤·[《1854年3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82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6, 1854.] In: The Times, No. 21682, March 7, 1854)。——117、122。

格莱斯顿,威·尤·[《1854年4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12日《泰晤士报》第21713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pril 11, 1854.] In: The Times, No. 21713, April 12, 1854)。——122。

格莱斯顿,威·尤·[《1854年5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第21736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8, 1854.] In: The Times, No. 21736, May 9, 1854)。——122。

格莱斯顿,威·尤·[《1855年1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6。

格莱斯顿,威·尤·[《1855年2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1970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5,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70, February 6, 1855)。——120。

格莱斯顿,威·尤·[《1855年2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73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73, February 9, 1855)。——133—134。

格莱斯顿,威·尤·[《1855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86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6, February 24, 1855)。——167、201。

格莱斯顿,威·尤·[《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Gladstone, W. 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

- mons on May 24, 1855.]In: The Times, No.22063, May 25, 1855)。——418、420。
- 格莱斯顿, 威·尤·[《1855年6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6日《泰晤士报》第22082号(Gladstone, W.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5, 1855.]In: The Times, No.22082, June 16, 1855)。——488。
- 格兰维尔, 乔·[《1854年12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12月22日《泰晤士报》第21934号(Granville,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December 21, 1854.]In: The Times, No.21934, December 22, 1854)。——35。
- 格兰维尔, 乔·[《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Granville,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une 21, 1855.]In: The Times, No.22087, June 22, 1855)。——495。
- 格雷, 亨·乔·[《1854年4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1710号(Grey, H.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April 7, 1854.]In: The Times, No.21710, April 8, 1854)。——118。
- 格雷厄姆, 威·[《1855年3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Graham, W.: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20, 1855.]In: The Times, No.22007, March 21, 1855)。——243。
- 格雷厄姆, 詹·[《1855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86号(Graham,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3, 1855.]In: The Times, No. 21986, February 24, 1855)。——165—166、200。
- 格雷厄姆, 詹·[《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Graham,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In: The Times, No.22064, May 26, 1855)。——411—412。
- 格林, 雅·《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Aufl. Leipzig 1853)。——309。
- 格罗夫纳, 罗·[《1855年6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4日《泰晤士报》第22080号(Grosvenor,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3, 1855.]In: The Times, No.22080, June 14, 1855)。——505。
- 格罗夫纳, 罗·[《1855年6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091号(Grosvenor,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6, 1855.]In: The Times, No.22091, June 27, 1855)。——524。

- 葛德里奇·弗·约·〔《1855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91号(Goderich, F.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91, March 2, 1855)。——193。
- 《国民和立宪协会》,载于1855年3月19日《晨邮报》(伦敦)第25338号(National and Constitutional Association,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5338, 19. März 1855)。——235—237。

H

- 哈德威克·查·〔《1855年1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Hardwicke, C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68。
- 哈丁·亨·〔《1855年1月29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Harding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5。
- 哈尔福德·亨·〔《1855年3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97号(Halford,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rch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97, March 9, 1855)。——230—231。
- 哈克斯特豪森·奥·冯·《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三卷集)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Haxthausen, A. vo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 1—3, Hannover, Berlin 1847—1852)。——315, 352—353。
- 海特·威·古·〔《1855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Hayter, W.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1, January 26, 1855)。——74。
- 《和平条款和战争动机》,载于1855年1月13日《观察家》(伦敦)第2450期(Terms of peace and causes of war, In: The Examiner, London, Nr. 2450, 13. Januar 1855)。——37—38。
- 赫伯特·悉·〔《1854年12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12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929号(Herbert, 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December 19,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29, December 20, 1854)。——5。
- 赫伯特·悉·〔《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

- 晤士报》第 21962 号(Herbert, 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75, 88, 94 — 96。
- 赫伯特·悉·〔《1855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1986 号(Herbert, S.: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6, February 24, 1855)。——166 — 168, 201。
- 赫尔岑·亚·《俄国》,载于 1849 年 11 月 19, 26 日和 12 月 10 日《人民之声报》(巴黎)第 50, 57 和 71 号(Herzen, A.: La Russie. In: La Voix du Peuple, Paris, Nrn. 50, 57 und 71, 19. und 26. November und 10. Dezember 1849)。——312。
- 〔赫尔岑·亚·〕《俄国和旧世界》,威·林顿按照亚·赫尔岑原稿出版,1854 年泽西版([Herzen, A.:] La Russie et le vieux monde. Lettres à W. Linton, esq. Par Alexandre Herzen, Jersey 1854)。——313。
- 〔赫尔岑·亚·〕《来自彼岸》,根据俄文原稿翻译,1850 年汉堡版([Herzen, A.:] Vom anderen Ufer. Aus dem russischen Manuskript, Hamburg 1850)。——312。
- 赫尔岑·亚·《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3 年伦敦第 2 版(Herzen, A.: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2. éd. Londres 1853)。——313。
- 怀斯·约·艾·〔《1855 年 5 月 22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5 月 23 日《泰晤士报》第 22061 号(Wise,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y 22,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1, May 23, 1855)。——395。
- 《皇帝的视察》,载于《公文集》1844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12 期(The visit of the emperor. In: The Portfolio, London 1844, Vol. III, No. XII)。——36。
- 〔霍布斯·托·〕《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威·莫尔斯沃思编,1839 — 1845 年伦敦版第 1 — 11 卷([Hobbes, Th.:]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now first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Sir William Molesworth, Bart. Vols. I — XI, London 1839 — 1845)。——440。
- 〔霍布斯·托·〕《霍布斯哲学全集》1839 — 1845 年伦敦版第 1 — 5 卷([Hobbes, Th.:] Thomae Hobbes Malmesburiensis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latine scripsit omnia in unum corpus nunc primum collecta studio et labore Gulielmi Molesworth, Vols. I — V, Londini 1839 — 1845)。——440。

[霍纳, 伦·]《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先生的报告。截至 1854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 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4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奉女王之命呈送议会两院》1855 年伦敦版 ([Horner, L.:] Report of Leonard Horner, Esq., Inspector of Factories,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the 31st of October, 1854.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4.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5)。—— 230。

J

吉布森, 托·米· [《1855 年 5 月 1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泰晤士报》第 22052 号 (Gibson, Th. M.: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11,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52, May 12, 1855)。—— 410。

吉布森, 托·米· [《1855 年 5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2064 号 (Gibson, Th. M.: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 410—411。

吉布森, 托·米· [《1855 年 6 月 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6 月 5 日《泰晤士报》第 22072 号 (Gibson, Th. M.: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72, June 5, 1855)。—— 440。

《即将到来的和平》, 载于 1855 年 1 月 13 日《先驱》(伦敦) 第 6 卷第 251 期 (The coming peace. In: The Leader, London, Vol. 6, Nr. 251, 13. Januar 1855)。—— 37。

居斯丁, 阿·德·《1839 年的俄国》(四卷集) 1843 年巴黎版 (Custine, A. de: Le russie en 1839, T. 1—4, Paris 1843)。—— 314, 575。

《军队的状况》, 载于 1855 年 2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10 号 (Condition of the arm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10, 10. Februar 1855)。—— 58—59。

K

卡思卡特, 乔·《评 1812 年和 1813 年的俄普战争》1850 年伦敦版 (Cathcart, G.: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 578。

-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Quêtelet, A.;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1. 2. Paris 1835)。——109。
- 康罗贝尔, [弗·]《[电报。1855年]2月27日》。载于1855年3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08号(Canrobert, [F.]: [Depesche.] February 27, [1855]. In: The Times. Nr.22008, 22. März 1855)。——273。
- 康罗贝尔, [弗·]《[电报。1855年]3月23日》。载于1855年4月7日《泰晤士报》第22022号(Canrobert, [F.]: [Depesche.] March 23, [1855]. In: The Times. Nr.22022, 7. April 1855)。——302—303。
- 康罗贝尔, [弗·]《[1855年]4月14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载于1855年4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033号(Canrobert, [F.]: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April 14,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33, 20. April 1855)。——334。
- 康罗贝尔, [弗·]《[1855年]4月17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载于1855年4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35号(Canrobert, [F.]: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April 17,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35, 23. April 1855)。——329。
- 科贝特, 约·《[1855年3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16日《泰晤士报》第22003号(Cobbett,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5, 1855.] In: The Times. No.22003, March 16, 1855)。——231。
- 科布顿, 理·《[1855年6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6日《泰晤士报》第22073号(Cobden,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June 5, 1855.] In: The Times. No.22073, June 6, 1855)。——441, 453。
- 科尔切斯特, 查·阿·《[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Colchester, Ch.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June 21, 1855.] In: The Times. No.22087, June 22, 1855)。——494。
- 克拉伦登, 乔·《[1855年3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Clarendon,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March 20,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07, March 21, 1855)。——242—243。
- 克拉伦登, 乔·《[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Clarendon, G.: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 June 21,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7, June 22, 1855)。——494。
- 克兰里卡德, 乌·约·〔《给俄国陆军大臣多尔戈鲁科夫王子的信。1854年11月18日》, 〕载于1855年1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46号(Clanricarde, U. J.: [Letter to the Russian War Minister, Prince Dolgorukov, of November 18,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46, January 9, 1855)。——53。
- 《克里木远征》, 载于1855年3月7日《晨邮报》(伦敦)第25328号(The Crimean expedition,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5328, 7. März 1855)。——208。
- 《克里木远征秘史》, 载于1855年3月3日《晨报》(伦敦)第19875号(Secret history of the Crimean expedi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875, 3. März 1855)。——202。
- 《克里木远征秘史。它的起因和失误。拿破仑亲王揭露的秘密》, 载于1855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0号(Secret history of the Crimean expedition. Its origin and blunders. Revelations of Prince Napoleon.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350, 29. März 1855)。——219。
- 〔克奈泽贝克, 卡·弗·〕《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1854年柏林版〔Knesebeck, K. F.:]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Gleichgewichts-Lage Europa's, beim Zusammentritte des Wiener Congresses verfasst, Berlin 1854)。——481—483。

L

- 拉格伦, 〔菲·詹·〕《〔1855年〕3月24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5年4月6日《伦敦官报》第21689号(Raglan, [F. 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rch 24, [1855]. In: The London Gazette, Nr. 21689, 6. April 1855)。——285。
- 拉格伦, 〔菲·詹·〕《〔1855年〕3月24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5年4月7日《泰晤士报》第22022号(Raglan, [F. 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rch 24,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22, 7. April 1855)。——285, 302—303。
- 拉格伦, 〔菲·詹·〕《〔1855年〕3月27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5年4月12日《泰晤士报》第22026号(Raglan, [F. 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rch 27,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26, 12. April 1855)。——302—303。

- 拉格伦, [菲·詹·]《[1855年]4月10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5年4月24日《泰晤士报》第22036号(Raglan, [F.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April 10,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36, 24. April 1855)。——329。
- 拉格伦, [菲·詹·]《[1855年]5月1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5年5月15日《伦敦官报》第21712号(Raglan, [F.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y 1, [1855]. In: The London Gazette, Nr. 21712, 15. Mai 1855)。——391。
- 拉斯卡斯, [艾·奥·]德·《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目录》(八卷集)1823年巴黎版第3卷(Las Cases, [E. A.] d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ou Journal où se trouve consigné, jour par jour, ce qu'a dit et fait Napoléon durant dix-huit mois. T. 1—8, T. 3. Paris 1823)。——484。
- 《来自克里木的最新报道》, 载于1855年3月27日《泰晤士报》第22012号(The last accounts from the Crime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012, 27. März 1855)。——279。
- 莱亚德, 奥·亨·《[1855年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Layard, A.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70。
- 莱亚德, 奥·亨·《[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Layard, A.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75, 95。
- 莱亚德, 奥·亨·《[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Layard, A.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431。
- 莱亚德, 奥·亨·《[1855年6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6月16日《泰晤士报》第22082号(Layard, A.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2, June 16, 1855)。——471, 474, 499。
- 《莱亚德先生和他的选民们》, 载于1855年3月1日《泰晤士报》第21990号(Mr. Layard and his constituents. In: The Times, Nr. 21990, 1. März 1855)。——191。
- 兰斯唐, 亨·《[1855年2月8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73号(Lansdown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

- ary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73, February 9, 1855). — 129。
- 里普利·罗·萨·《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纽约版(Ripley, R.S.: The War with Mexico, New York 1849)。——531。
- 里士满·查·[《1855年1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Richmond, C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68。
- [理查兹·阿·]《一个英国人[的信件]》, 载于1851年12月20日、1852年1月9日、24日、2月21日、4月16日、9月27日和11月2日《泰晤士报》第20990、21007、21020、21044、21091、21231和21262号([Richards, A.: Letters of] an Englishman, In: The Times, No. 20990, December 20, 1851; No. 21007, January 9, 1852; No. 21020, January 24, 1852; No. 21044, February 21, 1852; No. 21091, April 16, 1852; No. 21231, September 27, 1852; No. 21262, November 2, 1852)。——202。
- 理查兹·阿·《一个英国人的信件》1852年伦敦版(Richards, A.: Letters of an Englishman, London 1852)。——202。
- 林德赫斯特·约·[《1855年1月2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纪事晨报》第27484号(Lyndhurst,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5, 1855.]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No. 27484, January 26, 1855)。——73。
- 林德赫斯特·约·[《1855年3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Lyndhurst,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March 20,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07, March 21, 1855)。——239。
- 《另一个英国人的说明。伦敦〈先驱晨报〉通讯。1855年3月23日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 载于1855年4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1号(Another English account, Correspondence of the London Morning Herald, Before Sebastopol, March 23, 1855,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71, 23. April 1855)。——285。
- 刘易斯·乔·康·[《1855年3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97号(Lewis, G.C.: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97, March 9, 1855)。——233。
- 刘易斯·乔·康·[《1855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006号(Lewis, G.C.: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 March 19,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06, March 20, 1855)。——233。
- 娄·罗·〔《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Lowe,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414、439。
- 卢肯·乔·查·〔《1855年3月19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006号(Lucan, G. C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March 19,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06, March 20, 1855)。——232。
- 鲁宾逊·弗·约·〔《1825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25年伦敦版新辑第12卷(Robinson, F.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8, 1825.]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New Series, Vol. 12, London 1825)。——31。
- 《伦敦群众大会——马里勒本宪章派的胜利——战胜和揭露行政改革协会》,载于1855年6月2日《人民报》(伦敦)第161期(Great meeting in London—Victory of the Marylebone Chartists—Defeat and exposu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ssociation.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61, 2. Juni 1855)。——433—434。
- 《论东方战争的进展。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寄给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回忆录》1855年布鲁塞尔版(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1855)。——201—202、208、214、219、224、295、299。
- 罗巴克·约·阿·〔《1855年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71。
- 罗巴克·约·阿·〔《1855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1, January 26, 1855)。——73。
- 罗巴克·约·阿·〔《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88。
- 罗巴克·约·阿·〔《1855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17日《泰晤士报》第21980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 on February 1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0, February 17, 1855). — 155, 157.
- 罗巴克, 约·阿·〔《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64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 — 409.
- 罗巴克, 约·阿·〔《1855年6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88号(Roebuck, J.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2,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8, June 23, 1855). — 501.
- 〔罗素·威·霍·〕《塞瓦斯托波尔城外。1月22日》, 载于1855年2月7日《泰晤士报》第21971号([Russell, W. H.:] Before Sebastopol, Jan. 22. In: The Times, No. 21971, February 7, 1855). — 132.
- 〔罗素·威·霍·〕《祝福我们……〔通讯:〕卡德柯伊附近的营地。〔1855年〕3月16日星期五》, 载于1855年3月29日《泰晤士报》第22014号([Russell, W. H.:] We are blessed... [Korrespondenz:] Camp near Kadikoi, Friday, March 16, [1855]. In: The Times, Nr. 22014, 29. März 1855). — 274, 278.
- 罗素, 约·〔《给阿伯丁的信。1854年11月17日》,〕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Russell, J.: [Letter to Aberdeen of November 17,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 — 77.
- 罗素, 约·〔《给阿伯丁的信。1854年11月28日》,〕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Russell, J.: [Letter to Aberdeen of November 28,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 — 77.
- 罗素, 约·〔《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361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4, 1853.] In: The Times, No. 21361, February 25, 1853). — 113.
- 罗素, 约·〔《1853年4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4月5日《泰晤士报》第21394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pril 4, 1853.] In: The Times, No. 21394, April 5, 1853). — 113.
- 罗素, 约·〔《1853年5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1日《泰晤士报》第21443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31, 1853.] In: The Times, No. 21443, June 1, 1853). — 114.
- 罗素, 约·〔《1854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14日《泰晤士报》第21664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 13,1854.]In: The Times, No.21664, February 14, 1854)。——117、122。
- 罗素,约·[《1855年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21959, January 24, 1855)。——70。
- 罗素,约·[《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21962, January 27, 1855)。——75--78。
- 罗素,约·[《1855年2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1970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5, 1855.] In: The Times, No.21970, February 6, 1855)。——120。
- 罗素,约·[《1855年2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9日《泰晤士报》第21973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8, 1855.] In: The Times, No.21973, February 9, 1855)。——130、157。
- 罗素,约·[《1855年5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5日《泰晤士报》第22063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4, 1855.] In: The Times, No.22063, May 25, 1855)。——411—412、414、422—424。
- 罗素,约·[《1855年6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6日《泰晤士报》第22073号(Russell,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5, 1855.] In: The Times, No.22073, June 6, 1855)。——441。

M

- 马林斯,理·[《1855年6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090号(Malins,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June 25, 1855.] In: The Times, No.22090, June 26, 1855)。——514。
- 马姆兹伯里,詹·霍·[《1855年6月2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87号(Malmesbury, J.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une 21, 1855.] In: The Times, No.22087, June 22, 1855)。——493。
- [麦克尼尔,约·]《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年伦敦版([McNeill, J.:]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156。
- 曼托伊费尔,奥·冯·[《1854年4月22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信贷委员会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23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第95号(Man-

teuffel, O. von: [Speech in the Credit Committee of the First Chamber of the Prussian Diet, April 22, 1854.] In: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o. 95, April 23, 1854). —— 240。

曼托伊费尔, 奥·冯· [《1854年4月25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26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第97号 (Manteuffel, O. von: [Rede in der Ersten Preußischen Kammer, 25. April 1854.] In: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97, 26. April 1854)。 —— 240。

毛奇, [赫·卡·伯·] 《俄军1828—1829年在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1854年伦敦版 (Moltke, [H. K. B.]: The Russians in Bulgaria and Rumelia in 1828 and 1829. London 1854)。 —— 296。

毛奇, [赫·卡·伯·] 《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 (Moltke, [H. K. B.]: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 —— 296。

孟德斯鸠, 沙·《论法的精神》(两卷集) 1748年日内瓦第1版 (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The first edition in two volumes appeared anonymously in Geneva in 1748)。 —— 500。

《目前我们已经……》, 载于1855年1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21956号 (We have now...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56, 20. Januar 1855)。 —— 58。

N

纳皮尔, 爱·《克里木战争的前景。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185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1970号 (Napier, E.: The Prospects of the Crimean Campaign.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No. 21970, February 6, 1855)。 —— 127—128。

纳皮尔, 查· [《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一封信》,] 载于1855年6月15日《晨报》第19964号 (Napier, Ch.: [The first letter about the Baltic flee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No. 19964, June 15, 1855)。 —— 470—471。

纳皮尔, 威·《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 (Napier,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The first edition in six volumes appeared in London in 1828—1840)。 —— 137, 164, 542, 548—549、

553、565。

纽卡斯尔,亨·[《1855年1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59号(Newcastl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59, January 24, 1855)。——68。

纽卡斯尔,亨·[《1855年1月2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Newcastl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1, January 26, 1855)。——73。

纽卡斯尔,亨·[《1855年1月29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Newcastl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5。

纽卡斯尔,亨·[《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Newcastl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February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7, February 2, 1855)。——102--103。

O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十三卷集)(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III)。——551。

P

帕麦斯顿,亨·约·[《1829年6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29年伦敦版新第2辑第21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 1829.]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New series 2, Vol. XXI, London 1829)。——148。

帕麦斯顿,亨·约·[《1830年2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0年伦敦版新第2辑第22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5, 183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New series 2, Vol. XXII, London 1830)。——148。

帕麦斯顿,亨·约·[《1830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0年伦敦版新第2辑第22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6, 183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New series 2, Vol. XXII, London 1830)。——148。

帕麦斯顿,亨·约·[《1833年7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3辑第19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 House of Commons on July 11,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XIX, London 1833)。——149。
- 帕麦斯顿, 亨·约·[《1833年8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3辑第20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4, 1833.]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XX, London 1833)。——149。
- 帕麦斯顿, 亨·约·[《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3年伦敦版第3辑第22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17, 1834.]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XXII, London 1834)。——149。
- 帕麦斯顿, 亨·约·[《1853年4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404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pril 15, 1853.] In: The Times, No. 21404, April 16, 1853)。——108。
- 帕麦斯顿, 亨·约·[《1853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22日《泰晤士报》第21513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20, 1853.] In: The Times, No. 21513, August 22, 1853)。——108, 116。
- 帕麦斯顿, 亨·约·[《1854年2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58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6, 1854.] In: The Times, No. 21658, February 7, 1854)。——117, 122。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961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1, January 26, 1855)。——73。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78。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年1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Palmerston, H.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

- mon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4, January 30, 1855)。——97。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2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67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7, February 2, 1855)。——100。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17日《泰晤士报》第21980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0, February 17, 1855)。——155—157。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2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0日《泰晤士报》第21982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9,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2, February 20, 1855)。——162—163。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2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986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23,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86, February 24, 1855)。——167。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21991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1,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91, March 2, 1855)。——193。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3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20,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07, March 21, 1855)。——244。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5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060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1,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0, May 22, 1855)。——396、410。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5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3日《泰晤士报》第22061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2,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1, May 23, 1855)。——396。
- 帕麦斯顿,亨·约·[《1855年5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5月26

- 日《泰晤士报》第 22064 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y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4, May 26, 1855)。——408—411, 429—431。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 年 6 月 8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6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2076 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8,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76, June 9, 1855)。——451—452。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 年 6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6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2084 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18,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4, June 19, 1855)。——488。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 年 6 月 22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泰晤士报》第 22088 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2,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88, June 23, 1855)。——498。
- 帕麦斯顿, 亨·约·〔《1855 年 6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2090 号(Palmerston, H.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0, June 26, 1855)。——511。
- 潘缪尔, 福·〔《1855 年 5 月 14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5 月 15 日《泰晤士报》第 22054 号(Panmure, F.: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May 1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54, May 15, 1855)。——373。
- 潘缪尔, 福·〔《1855 年 6 月 28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泰晤士报》第 22093 号(Panmure, F.: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June 28,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3, June 29, 1855)。——524。
- 佩利西埃, [阿·]〔《电报。1855 年》5 月 26 日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司令部》, 载于 1855 年 6 月 6 日《泰晤士报》第 22073 号(Pélissier, [A.]: [Depesche.] Head-quarters, before Sebastopol, May 26, [1855].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073, 6. Juni 1855)。——443—444。
- 佩利西埃, [阿·]〔《电报。1855 年》6 月 2 日于司令部》, 载于 1855 年 6 月 14 日《泰晤士报》第 22080 号(Pélissier, [A.]: [Depesche.] Head-quarters, June 2, [1855].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080, 14. Juni 1855)。——464。
- 佩利西埃, [阿·]〔《电报。1855 年》6 月 9 日于司令部》, 载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泰晤士报》第 22088 号(Pélissier, [A.]: [Depesche.] Head-quarters, June 9, [1855].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088, 23. Juni 1855)。——516—518。
- 皮尔, 罗·〔《1830 年 2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

- 1830年伦敦版新第2辑第22卷(Peel,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6, 1830.]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New series 2, Vol. XXII, London 1830)。——148。
- 皮尔, 罗·〔1842年8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2年伦敦版第3辑第65卷(Peel, R.: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August 10, 1842.]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LXV, London 1842)。——13, 203。
- 普芬多夫, 赛·《自然法和民族法》(八卷集) 1672年伦敦版(Pufendorf, S.: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 The 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London in 1672)。——317, 327。
- 普拉特, [多·迪·]德·《维也纳会议》(两卷集) 1815年巴黎版(Pradt, [D.D.] de: Du Congrès de Vienne. Tomes I—II, Paris 1815)。——480。
- 普拉特, [多·迪·]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Pradt, [D.D.] de: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609。
- 《朴茨茅斯。——星期六》, 载于1855年3月19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383号(Portsmouth .— Saturday.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383, 19. März 1855)。——228。

Q

- 切斯尼, 弗·罗·《简评火器及它的过去和现在》1852年伦敦版(Chesney, F.R.: Observation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fire-arms and on the probable effects in war of the new musket; with a proposition for reorganizing the royal regiments of artillery. London 1852)。——552。
- 琼斯, 厄·〔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堂的演说〕, 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第148期(Jones, E.: [Speech in St. Martin's Hall, February 27, 1855.] In: The People's Paper, No. 148, March 3, 1855)。——202。
- 琼斯, 厄·《政治上的犯罪。行政改革协会的无耻奸计和欺骗》, 载于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第158期(Jones, E.: Political Felony. Infamous Chicanery and Frau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ssociation. In: The People's Paper, No. 158, May 12, 1855)。——378。

R

- 日拉丹, 埃·德·《和平》1855年巴黎版(Girardin, É. de: La Paix, Paris

1855)。——258、259。

S

塞桑纳,阿·德·《最有教益的现象之一》,载于1855年6月18日《立宪主义者报》第169号(Cesena, A. de; Un des phénomènes les plus instructifs... In: Le Constitutionnel, No.169, June 18, 1855)。——463、475、485。

《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军队的部署》,载于1855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007号(State of the army before Sebastopol. In: The Times, London, Nr.22007, 21. März 1855)。——262。

舍夫茨别利,安·阿·[《1855年6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079号(Shaftesbury, A.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Lords, June 12, 1855.] In: The Times, No.22079, June 13, 1855)。——503。

圣阿尔诺,阿·德·《驻阿利马河的总司令部。阿利马河战场。1854年9月21日》,载于1854年10月7日《总汇通报》第280号(Saint-Arnaud, A. de; Au quartier général à Alma, Champ de bataille d'Alma, le 21 septembre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No.280, October 7, 1854)。——539。

施勒策尔,奥·路·冯·《奈斯托尔。用古斯拉夫语写的俄国编年史。比较、翻译和解释》1802年格丁根版第1—2卷(Schlözer, A. L. von; Nestor,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ichen, übersetzt und erklärt. Th.1.2. Göttingen 1802)。——311。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nburgh 1828, Vol. I)。——68。

斯密斯,弗·[《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Smith, V.: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21962, January 27, 1855)。——88—89。

斯塔福德,奥·[《1855年1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964号(Stafford, A.: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9, 1855.] In: The Times, No.21964, January 30, 1855)。——264。

斯图亚特,达·库·[《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37年伦敦版第3辑第37卷(Stuart, D. C.: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7, 1837.]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

- ries, Vol. XXXVII, London 1837)。——147—148。
《四项条款》，载于1855年1月22日《每日新闻》第2707号(The Four Points. In: The Daily News, Nr. 2707, 22. Januar 1855)。——70。

T

- 特罗洛普, 约·〔《1853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21365号(Trollope,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1, 1853.] In: The Times, No. 21365, March 2, 1853)。——111。

W

- 维多利亚〔《1854年12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第21922号(Victoria: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Dezember 1854.] In: The Times, Nr. 21922, 12. Dezember 1854)。——31。
维兰德, 克·马·《阿布德拉人, 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1774年魏玛版(Wieland, Ch. M.: Die Abderiten, eine sehr wahrscheinliche Geschichte. The first edition appeared in Weimar in 1774)。——354。
维利森, 威·《1848年的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illisen, W.: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597。
《维也纳。5月4日》, 载于1855年5月8日《泰晤士报》第22048号(Vienna, May 4. In: The Times, Nr. 22048, 8. Mai 1855)。——357—358。
沃尔波尔, 霍·〔《1855年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962号(Walpole, 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anuary 26, 1855.] In: The Times, No. 21962, January 27, 1855)。——96—97。
乌尔卡尔特, 戴·《关于尼古拉皇帝之死。致〈晨报〉编辑》, 载于1855年3月6日《晨报》第19877号(Urquhart, D.: On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Nicholas.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No. 19877, March 6, 1855)。——198。
乌尔卡尔特, 戴·〔《与约·巴克豪斯的通信》,〕载于1839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16948号(Urquhart, D.: [Correspondence with J. Backhouse.] In: The Times, No. 16948, January 25, 1839)。——150。
伍德, 查·〔《1855年6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5年6月26日《泰晤

士报》第 22090 号 (Wood, Ch.: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5,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90, June 26, 1855). — 511.

X

希罗多德 (哈利卡纳苏的)《历史》(九卷集) (Herodoti Halicarnassei: Historiarum libri IX)。—— 245。

希思科特·威·[《1855 年 5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2063 号 (Heathcote, W.: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May 24, 1855.] In: The Times, No. 22063, May 25, 1855)。—— 413 — 414、438。

[夏恩霍斯特·格·]《普鲁士军队操典》1853 年柏林版 ([Scharnhorst, G.:] Kriegs-Artikel für das Preussische Heer, Berlin 1853)。—— 567。

休谟·约·[《1848 年 6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99 卷 (Hume,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ne 20,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XCIX, London 1848)。—— 169。

休谟·约·[《1852 年 3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52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20 卷 (Hume,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March 25, 1852.]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Vol. CXX, London 1852)。—— 169。

[休斯·特·麦·]《1845 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作》1845 年伦敦版第 1—2 卷 ([Hughes, T.M.:] 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By an English Resident, Vol. I—II, London 1845)。—— 608。

[雪恩哈尔斯·卡·]《一名奥地利老兵 1848—1849 年意大利战争回忆录》(两卷集) 1852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 ([Schönhals, K.:] Erinnerungen eines österreichischen Veteranen aus dem italienischen Kriege der Jahre 1848 und 1849, Bd. I—II,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52)。—— 596—597。

Y

《议会解散的报道》, 载于 1855 年 3 月 7 日《晨报》(伦敦) 第 19878 号 (The reported dissolu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878, 7. März 1855)。—— 204。

- [伊文思·戴·莫·]《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Evans, D. M.:] *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 change, and the coffee houses.* London 1845)。——383。
- 伊文思·乔·德·莱·[《向调查克里木英军状况的委员会所作的陈述》。]载于1855年3月6日和7日《泰晤士报》第21994和21995号(Evans, G. de L.:[*Statements to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Crimea.*] In: *The Times*, No.21994, March 6, 1855; No.21995, March 7, 1855)。——205—207。
- 《英国和法国。议会可能解散》,载于1855年3月6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372号(*England and France. Probabl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22372, 6. März 1855)。——200。
- 《约翰·罗素勋爵的辞职》,载于1855年1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62号(*Resignation of Lord John Russe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62, 27. Januar 1855)。——59。

Z

- 《在海德公园举行的露天大会》,载于1855年6月25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7611号(*Open-air meeting in Hyde Park.*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27611, 25. Juni 1855)。——505。
- 《在圣马丁堂举行的示威活动》,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伦敦)第148期(*Immense demonstration in St. Martin's Hall.*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148, 3. März 1855)。——202。
- 《在这样一个季节……》,载于1855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60号(*There is a season...* In: *The Times*, London, Nr.21960, 25. Januar 1855)。——59。
- 《“职权”的羞辱》,载于1855年3月17日《先驱》(伦敦)第6卷第260期(*Humiliation" Ex-Officio".* In: *The Leader*, London, Vol. 6, Nr. 260, 17. März 1855)。——229—230。
- 《〈总汇通报〉评英国宪法》,载于1855年3月3日《先驱》(伦敦)第258期(*The "Moniteur"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The Leader*, London, Nr.258, 3. März 1855)。——201。

法律、法令、文件

C

《惩治叛乱法。1694年》(Mutiny Act, 1694)。——193。

F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御座演说。1854年11月30日》，载于1854年12月1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第283号(Thronrede von Friedrich Wilhelm IV. Vom 30. November 1854. In: 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 No. 283, December 1, 1854)。——240。

G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4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5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4. London 1855)。——230。

《谷物法》(Corn Laws)。——146, 181, 184, 188, 352, 376。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An act to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 [1850])。——231, 369。

《关于加强英国国民军法的修正法令。[1852年]》(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militia in England, [1852])。——282。

《关于进一步让女王陛下对贸易和其他公司授予一定权力和豁免权的法令。[1837年]》(An act for better enabling Her Majesty to confer certain powers and immunities on trading and other companies [1837])。——526。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4年12月5日为止的十一个月。三、不列颠和爱尔兰工农业产品的出口》。载于1855年1月6日《经济学家》第593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eleven months ended 5th December 1854. III. Exports of British and Irish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Economist, No. 593, January 6, 1855)。——40。

- 《关于延长议会任期的法令。[1716年]》(An act for enlarging the time of continuance of parliaments, appointed by an act made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William and Queen Mary, intituled, An act for the frequent meeting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s, [1716])。——369。
- 《关于允许外国人在女王的军队中服役的议会法》(An act of parliament to permit foreigners to be enlisted and to serve as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Her Majesty's Forces)。——4。
- 《关于在有限期内遵守和延长1797年2月26日会议制定的限制银行支付现金的法令。[1797年]》(An act for confirming and continuing, for a limited time, the restriction contained in the minute of council on the twenty-sixth of February o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ninety-seven, on payments of cash by the bank, [1797])。——352。

J

- 《济贫法。[1834年]》(Poor Law, [1834])。——188, 369。
- 《禁止星期日营业法案》, 载于1855年6月30日《人民报》(伦敦)第165期(The Sunday bigotry bill.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65, 30. Juni 1855)。——524。

Q

- [《强国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照会。1853年7月》,] 载于1853年9月1日《泰晤士报》第21523号([Note approved by the Powers represented at the Vienna Conference, July 1853.] In: The Times, No. 21523, September 1, 1853)。——121。
- 《取缔骚乱和动乱分子集会, 更迅速更有效地惩治动乱分子的法令。[骚乱取缔令。1715年]》(An act for preventing tumults and riotous assemblies, and for the more speedy and effectual punishing of the rioters. [Riot Act, 1715])。——196。

R

- 《人民宪章》1838年伦敦版(The People's Charter, London 1838)。——237。
- 《瑞士联邦宪法。1848年5月15日—6月27日召开的议会会议讨论, 并于1848

年9月12日通过》1848年日内瓦版(Constitution fédérale d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délibérée par la Diète dans ses séances du 15 mai au 27 juin 1848 et déclarée acceptée le 12 septembre 1848, Genève 1848)。——599。

S

《[四强国公使递交土耳其政府的联合照会。]1853年12月12日于佩拉》, [署名:]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巴拉盖·狄利埃、路·冯·维登布鲁赫、布鲁克男爵, 载于1854年1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84号([Kollektivnote der Repräsentanten der vier Großmächte an die Pforte.]Pera, December 12, 1853. [Gez. :] Stratford de Redcliffe, Baraguay d'Hilliers, L. von Wildenbruck [vielm. Wildenbruch], B. de Bruck.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84, 10. Januar 1854. [U. d. T. :] The following document...)。——116, 121。

X

《行政改革》, 载于1855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2040号(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Times. Nr. 22040, 28. April 1855)。——377。

Y

《1839—1841年有关东方事件和土埃之间冲突的信函》(共四部分)[1841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1839—1841, relative to the Affaires of the Eas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gypt and Turkey. 4 parts. [London 1841])。——54。

《1854年贸易年度报告》, 载于1855年1月6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93期(Trade of 1854.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93. 6. Januar 1855)。——24—25, 29, 46—47。

[《英、奥、法三国同盟条约。1854年12月2日于维也纳》,]载于1854年12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926号([The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England, Austria, and France, signed at Vienna December 2, 1854.] In: The Times. No. 21926, December 16, 1854)。——3。

《由议员担任法院审判职位的薪俸事务和外交机关的支出事务委员会报告。附证词、附件和索引》185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Salaries and Emoluments of Offices held during the pleasure of the Crown by Members of Parliament, Judicial Offices in the Law Courts, and on the Expense of Diplo-

matic Establishments;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London] 1850). —— 395。

文学著作

A

奥柏,丹·弗·埃·《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兄弟》)。——290。
奥维狄乌斯《爱的医疗》。——193。

B

拜伦,乔·《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01。
贝利尼,文·《梦行者》。——491。
布尔沃-利顿《尤金·阿拉姆》。——441。
布尔沃-利顿《最后一个男爵》。——441。

G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508。
歌德《箴言》。——88。
歌德《致祖莱卡》。——30。

H

海尔维格,格·《来自山上》。——452。

L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491。

P

普希金,亚·谢·《叶甫盖尼·奥涅金》。——313。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37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440。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93、133。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179。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1。

T

《天佑女王》(英国国歌)。——491、506。

《统治吧,不列颠》(爱国歌曲)。——491。

X

《西维拉占语集》。——198。

《向叙利亚出发》(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歌曲)。——491。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453。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424。

—《旧约全书·创世记》。——477。

—《旧约全书·利未记》。——72。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503。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21。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512。

报 刊 索 引

A

- 《阿尔古斯报》(The Argus)——澳大利亚的一家自由派日报,1846—1934年在墨尔本出版。——195。
-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英国的一家杂志,自由派的文学、政治刊物,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233。
- 《奥格斯堡报》——见《总汇报》。

B

-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Punch),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是威·梅·萨克雷。——69、146、395。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32、34、36、52—53、87、163、179—180、197—198、202、204、235、353、356、471、507。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3—4、12、13、33—35、37、98、121、197、208、228—229、235—237、277、367、368、396、506、509。
- 《城乡新闻》(Town and Country 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5年5月—1856年6月在伦敦出版。——478。

D

- 《地球》(The Globe)——见《地球和旅行家》。

- 《地球报。政治、哲学和文学日报》(Le Globe, Journal Politique, Philosophique et Littéra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24—1832年在巴黎出版,1831年1月18日成为圣西门学派的机关报。——281。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66、498。
- 《舵手》(The Pilot)——英国的一家天主教周刊,在伦敦出版。——478。

E

-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俄国陆军部的机关报,1813—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816年起每日出版。——493。

G

-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费舍。——36、150。
-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37—38。
-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 《官报》(The Gazette)——见《伦敦官报》。
-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巴黎创刊;1852—1870年是波拿巴政府的半官方报纸。——27。

J

- 《纪事报》(The Chronicle)——见《纪事晨报》。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11、13、33、66、73、159—160、162、281—282、353、

356—357、489、505。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5、27—29、45—47、160。

L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2年创刊,1843—1918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53、478。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477—478。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该报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463、475、485。

《柳叶刀》(The Lancet)——英国的一家医学周报,1823年在伦敦创刊。——513。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官方报纸,1666年创刊,每周出两次。——31、35、69。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见《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94年在曼彻斯特出版,50年代每周出两次;该报是

- 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19世纪40—50年代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30。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153。
- 《每日电讯和信使报》(Daily Telegraph and Courier)——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年6月29日—1856年10月27日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56年10月28日起改为《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478。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威·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亨·约·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2—13、34、98、160、198、297、299、353、356、472—473、477、513。
- 《美国文学、科学和艺术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美国的一家杂志,1853—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杂志曾刊登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531。

N

- 《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

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45、47、59、115、127—128、177、178、183、219、250、272、285、286、289、302、334、336、344、359、389、398、425、427、443、445、455、484、516、520、523。
《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R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一家日报,蒲鲁东派的机关报;主编是皮·约·蒲鲁东;1848年9月2日—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出版,是1848年4—8月出版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的续刊;1849年9月25日—1850年5月14日改名为《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出版;1850年6月15日—10月13日又改名为《1850年人民报》(Le Peuple de 1850)出版,并改为每周三次。——312。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该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202、378、434、478、512。
《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报纸,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65。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

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19世纪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世纪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5—6,10—12,15,22,31,33—36,52,55—56,58—59,68,70—71,73,76—77,87,89,92,98,101—103,105—107,112—113,127,132,150,151—153,155,159—161,166,183,187,191,197,202,206—207,232—233,239,243,262,264,266—268,270,273—276,278—279,286,301,305,339,357,358,377,395,415—418,420,423—424,427,429—431,441,472—473,477—478,493—496,501,505,511,514,524。《泰晤士每周新闻画报》(Illustrated Times Weekly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5—1872年在伦敦出版。——478。

X

《先驱》(The Lead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0年3月—1860年6月由桑·汉特在伦敦出版。——37,201,229,230,498。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13,98,200,204—205,212,228,256,285,286,375,394,403,453—454,478,498—499。

《新奥得报》(Neue Oder Zeitung)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该报是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后于1849年4月创办的。它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16—22,138,190,214,247,295,302,344,448,455,471,516,

521、544、548。

《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的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3、256—259。

《信使电讯报》(Courier and Telegraph)——见《每日电讯和信使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为辉格党机关报。——37。

Y

《英格兰共和国。报刊和评论》(The English Republic. A newspaper and review)——威·詹·林顿于1851—1855年编辑出版的周刊。——313。

《邮报》(Post)——见《晨邮报》。

Z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19世纪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36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1870—1871年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201、281、295—297、300 301、342、356、393、539。

地名索引

A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 38,85,148、
 296,359,585。
 阿尔巴尼亚 325,590。
 阿尔卑斯山脉 600。
 阿尔及利亚 60,138,246,402,543。
 阿富汗 6,13,26,147。
 阿拉巴特 425,426,449。
 阿拉穆特(堡垒) 72。
 阿勒颇 586。
 阿利马河 7,61,62,124,126,176、
 202,288,293,359,363—365,387、
 389,539,577,580。
 阿卢普卡 387,388,427。
 阿卢什塔 386,387。
 阿纳帕 450,464。
 阿斯珀恩 221,227,557。
 阿斯隆 212。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608。
 埃尔祖鲁姆 586,591。
 埃及 54,192,589,590,593。
 艾尔斯伯里 191。
 艾托多尔(戈里斯托耶) 519,520。
 爱尔兰 106,107,117,122,146,152、

155,160,161,192,210—213,495、
 526。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 149,501。
 敖德萨 28,35,36,63,65,152,297、
 441,465—468,486,487,489,522。
 奥地利 3,34,36,37,66,70,80,83、
 84,89,91,94,100,136,141—143、
 148,202,222,226,229,240—244、
 256,257,290,310,317—326,328、
 356—358,410,415,420—423、
 427,429,430,438,441,445,463、
 467,468,475,478,481,487,522、
 531,547,554—559,565,572,576、
 577,582—584,594—598,600。
 奥尔登堡 583。
 奥尔泰尼察 7,592。
 奥斯特利茨(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
 242,531。
 澳大利亚 澳洲 25,26,30,43,46、
 117,185,189,193—195,212。
 Б
 巴达霍斯 127,132。
 巴拉腊特 194—196。
 巴登 582。

- 巴尔干半岛 135。
巴尔干(山脉) 296、468、487。
巴尔塔利曼尼 148。
巴伐利亚 581—583。
巴格达 586。
巴赫奇萨赖 62、65、84、215、403、406。
巴拉克拉瓦 6、7、49、50、56、57、61—63、65、68、95、124、127、132、133、152、162、171、172、201、202、206、215、219、220、224、232、254、260、263、268、293、345、361、364、385—389、461、464、485、519、545、548、550、553、579、592。
巴黎 4、31、161、222、228、243、247、259、281、298、301、312、314、345、349、350、359、386、390、393、394、402、405、445、458、463、464、480、483、484、491—493、497、498、506、520。
巴斯 433。
巴扎尔吉克(多布里奇·托尔布欣) 246。
拜达尔(奥尔利诺耶) 60、364、387、388、443、447、519。
拜伦 296。
拜占庭 418、482。
保加利亚 19、28、246。
北冰洋 322。
贝加尔湖 571。
比利牛斯半岛 18、164、206。
比利时 29、336、398、464、595、605。
比萨拉比亚 82、84、90、249、357、468、571。
比尤克-乌津河 387、388。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彼列科普 63、65、177、216、248、359、425、449、465、485。
俾路支 26。
别尔江斯克(奥西片科) 449。
别里斯拉夫 449。
别利别克河 365、385、387—389、519。
波多黎各 607。
波多利亚(波多利斯克) 80、83、84、89、91、446、467、487。
波尔塔瓦(省) 467、487。
波河 126、131、595。
波兰 80、82、83、89—91、145、148、198、226、227、243、244、310、318—320、324、326、358、411、463、481、482、534、573、578、579。
波列西耶沼泽(罗基特诺沼泽) 84、91。
波罗的海(东海) 82、90、135、221、225、227、228、367、441、466、470、529、572、576、577。
波美拉尼亚 309。
波森(波兹南) 458、567。
波斯(伊朗) 6、26、148、149。
波斯尼亚 28、325、589、590。
波斯湾 147、149。
波希米亚 83、91、141、319、321。
波希米亚森林 318。

伯明翰 32,211,352,433,434。
柏林 240,315,353,357,550,566、
567,597。
博尔顿 153。
博罗季诺 533。
博马尔松德 55,454。
博斯普鲁斯海峡 28,95,149。
不列颠——见大不列颠。
不伦瑞克 583。
布达佩斯 321。
布格河 80,82,84,89—91。
布哈拉 26。
布加勒斯特 7,28,63。
布拉德福德 47,313。
布拉格 321。
布莱克本 153。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566。
布洛涅 197,531。
布宜诺斯艾利斯 147。

C

臭水海(锡瓦什湖) 449。

D

达达尼尔海峡 34,38,39,149,291、
501。
达尔马提亚(地区) 556。
大不列颠(不列颠,英国) 4,10,15、
17,20,24,25,35,37—39,44,69、
70,78,79,85,88,92,97,100,105、
109,112,122,133,136—140,144—
150,156,160,163,169,183—186、

188,189,194,196,201,203,205、
208—212,228,229,236,241—
244,258,261,265,266,269—271、
275,279,282,289—294,325,352—
356,368,371—374,379,382,383、
395,398,410,415,418—423,430、
435,436,440,453,465,472,500、
503,506,525,544,546,558,566、
592,594。

大西洋 43,136,529,606。

丹麦 6,148,494,603。

但泽(格但斯克) 367,457—459。

德尔斐 245,266。

德国 德意志 29,85,115,208,240、
243,244,307—314,316—318、
320,321,324,327,336,398,423、
424,458,480,481,566,582,600、
603。

德涅斯特河 80,82,83,89,90,91、
468。

德特福德 499。

的黎波里 586,589。

的里雅斯特 309。

地中海 204。

第聂伯河 84,91,449,463,475,523。

第戎 141。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466,486。

蒂弗顿 395。

蒂罗尔(州) 321。

杜罗河 147。

多布罗加(地区) 61,287,394。

多瑙河 28,35,36,38,44,62,82,90、

108、136、141、149、206、216、240、
291、295、325、464、468、485、487、
592。

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瓦拉几亚)

28、36、38、44、83、90、108、116、240、
241、325、327、419、589。

顿河 523、571。

E

俄国 俄罗斯 4、6、8、11、28、30、33、
34、36—39、44、52、65、70、72、79、80、
82—85、89、91、115、116、118、121、
140—143、145、147—150、158、198、
199、222、228、239—243、245、249、
257、258、282、290、291、317—320、
322、323、326、357、367、411、414—
424、441、446、464—468、472、475、
480—483、485—487、495、501、523、
541、556、559、568、572—579、602。

厄尔巴岛 267。

F

法国 4、13、29、35、37、85、98、136—
142、161、173、200、202、203、220、
222、225—228、241、242、244、246、
248、249、256—259、275、286、287、
290—295、325、330、343、357、394、
398、415、420、423、430、435、463、
464、468、475、480、481、483、497、
535—539、541。

非洲 246、287、388、394、407、536、
539。

菲律宾群岛 607。

菲希特尔山 309。

费奥多西亚(卡法) 276、279、297—
299、359、386、464、465、485。

芬兰 83、91。

芬兰湾 453。

弗吉尼亚州 182。

伏尔加河 481。

符腾堡 582。

G

干地亚岛(克里特岛) 586。

高加索 82、90、149、465、466、486、
572。

哥本哈根 494。

哥得兰省 601。

格拉斯哥 479。

格鲁吉亚 465、486。

格尼切斯克 449。

古巴岛 607。

H

哈尔科夫 467、468、487。

哈利法克斯 58、444、445。

哈里斯河(克孜勒河) 245。

汉科 489、511。

汉诺威 583。

荷尔斯泰因 583、603。

荷兰 29、115、604。

赫尔松 63、65、84、449、465—467、
486、487、523。

赫尔松涅斯角 84。

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 511—512。
 赫拉克利亚半岛 21、50、57、60—62、
 125、130、171、177、215、218、247、
 248、279、360、361、365、389、400、
 402、405、444、447、448、521。
 赫拉特 149。
 黑海 28、35、68、70、85、135、136、183、
 187、216、298、299、321、325、417、
 419、430、431、439、441、464、466—
 468、470、475、476、485、487、529、
 571、572。
 黑河(乔尔纳亚河) 172、177、216、
 220、273、275、276、278、279、339、
 359、364、365、385、388—390、394、
 403、406、427、443、447、460、492、
 499、519、595。
 黑林山 452。
 黑塞哥维那(地区) 589。
 黑森 582。
 华沙 83、84、91、326、333。
 滑铁卢 23、497、498、520、521。

基辅 83、84、91、326、467、487。
 基连湾 251、284、303、338、339、341。
 基亚索 599。
 加的斯 608。
 加尔各答 153。
 加利波利 18、20、96、296、359。
 加利福尼亚 30、43、185、189。
 加利西亚 82、84、90、141、316、318、
 326。

加拿大 17。
 迦太基 229。
 剑桥 371、372。
 捷列克河 466、486、571。
 军港区 336、338、399、456、521、522。
 君士坦丁堡(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
 6、19、22、26、47、115、116、121、138、
 149、150、152、156、219、224、226、
 227、240、247、261、268、269、270、
 279、296、297、311、316、318、327、
 361、422、423、464、485、586、591、
 592。

K

喀尔巴阡山脉 320、326、328。
 喀琅施塔得 453。
 卡德柯伊 361。
 卡尔斯 591。
 卡法——见费奥多西亚。
 卡拉法特 7、50、216、217、277。
 卡兰亭湾 251、336、337、339、443、
 444、448。
 卡利什 81、82、89、90。
 卡缅涅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82、90。
 卡恰河 176—177、359、387、388。
 凯纳吉——见库楚克 凯纳吉。
 堪察加多面堡(马梅隆多面堡) 306、
 338、340、344、345、391、399、444、
 455、456、460、516—519。
 坎尼 69。
 坎特伯雷 229。

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 458、566、567。
 科布伦茨 458、567。
 科尔贝格(科沃布热格) 456。
 科孚岛(克基拉岛) 136、163、500、545。
 科隆 458、567。
 克恩滕山 318。
 克恩滕(卡林西亚)州 319、321。
 克拉科夫 141。
 克拉肯韦尔 509。
 克莱德河 499。
 克赖因(克拉伊纳) 319。
 克里木 6、11、15、20、22、36、50、55、56、58、60—63、65、66、68、69、77、80、82—84、87、89—92、94、95、103、118、120、124、125、128、130、132、133、135—141、152、156、162、163、171、176、184、201、202、206、214、216、218—222、224、225、227、232、233、245—249、257、258、260、262、269、270、272、275、277、279、285、297、300、301、305、335、342、344、357、359—364、371、385、386、389、394、401、405、415、416、423、425、428、438、443、445、447、449、450、461、464—466、474、475、485、486、492、496、497、500、501、505、507、516、521—523、535、539、544—546、550、551、553、568、578、581、592。
 克罗地亚 319。
 刻赤 36、359、386、402、405、406、425、

426、433、449、450、461、464。
 库班河 466、486、571。
 库楚克 凯纳吉(凯纳吉) 38、266、296、416、423。
 库尔德斯坦 589。
 库尔姆(赫卢梅茨) 296。

L

拉芒什海峡(海峡) 200、215、257。
 拉普兰 602。
 兰开斯特 152。
 兰开夏郡 47、230、314、545。
 莱比锡 222、227、309、602。
 莱茵河 309、310、464。
 黎凡特(地区) 26、47、150、291。
 里昂 141。
 利物浦 4、418、479、499。
 利兹 30。
 鲁斯楚克(鲁塞) 296。
 吕宋岛 607。
 伦巴第 316、321、558、599。
 伦敦 4、6、10、15、21、24、26、28、31、33、36、45、49、52、55、65、68、69、72、75、87、92、98、100、105、107、109、112、114、120、127、129、133、144、146、151、154、159、160、162、165、169、179、183、187、191、193、197、198、200、204、208、210、224、228、230、232、235、236、239、240、256、264、265、268、277、281、285、289、290、292、295、302、339、352—354、356、359、367、370、375、376、379、

382、393、400、403、404、408、413、
418、427、429、431、433、438、447、
451、470、474、477 — 479、485、491、
492、497、503、504、511、524。
罗克鲁瓦 9。
罗马 69、138、226、227、308、316、465、
492、598。

M

马耳他岛 136、163、205、500、545。
马更些庄园 364、388。
马拉霍夫冈 250、251、253、274、275、
278、284、306、338 — 341、345、351、
399、426、460、462、492、518 — 520。
马里勒本(区) 160、236、431、433。
马伦戈 226。
马梅隆多面堡 — 见堪察加多面堡。
马其顿 209。
马赛 500、523。
马斯拉克 359。
曼彻斯特 29 — 31、44 — 47、110、129、
153、165、185、189、211、230、233、
234、259、314、352、354、404、440、
452、453、472、479。
曼图亚 457。
梅济耶尔 174。
梅克伦堡 583。
梅梅尔(克莱佩达) 367。
美国 25 27、29、32、45、46、98、185、
189、208、267、310、529、534、605。
美因茨 458。
蒙瓦莱里安 350。

孟加拉 107、114。
孟买 153。
明乔河 323。
摩尔多瓦——见多瑙河两公国。
摩拉维亚 83、91、319。
莫斯科 142、198、199、260、268、467、
468、472、487。
墨尔本 194、195。
墨西哥 147。

N

拿骚 567、582、583。
那不勒斯 136、147、598、599。
纳尔瓦 8。
尼古拉耶夫 63、65、465 — 467、486、
487、522。
涅曼河 481。
牛津 118、123。
纽卡斯尔(泰恩河畔)——见泰恩河畔
纽卡斯尔。
挪威 600、602。
诺丁汉 53、231、236。
诺瓦拉 597。

O

欧洲 21、25、27、30、33、34、37、43、81、
82、89、100、114、135、140、149、183、
214、222、223、226、227、243 — 245、
255、258、266、267、293、295、302、
307、311、312、314、315、317 — 320、
322、324、327、411、414 — 416、422、
424、464、480 — 484、488、493 — 495、

520, 529 — 535, 539, 541, 549, 551,
560, 561 — 568, 571, 576, 577, 579,
580, 584, 585, 589 — 593, 595, 600,
603, 606, 609。

P

旁遮普 25。
皮埃蒙特 594 — 596。
朴次茅斯 152, 228, 470, 499。
普雷斯頓 153, 189。
普里姆罗斯山 314。
普鲁士 8, 34, 66, 80, 143, 228, 229,
239 — 243, 326, 357, 358, 367, 368,
415, 420, 458, 463, 468, 475, 480,
487, 539, 543, 549, 560 — 568, 578,
580, 582 — 586, 589, 595。
普鲁特河 83, 91, 357。

Q

恰特尔达格山 386。
乔尔贡 103, 106, 413, 519。
切尔克西亚 149, 450, 464, 485。

R

瑞典 148, 600 — 602。
瑞士 29, 598 — 601。

S

撒丁岛 465, 593, 594, 597。
萨尔吉尔河 386。
萨尔马特平原 135。
萨拉戈萨 400。

萨蓬山 278, 284, 305, 306, 345, 399,
401, 405, 517。

萨塞克斯郡 182。

萨瑟克 376, 408。

萨瑟克湖 217。

萨瓦 464。

塞尔维亚 28, 319, 325, 589。

塞瓦斯托波尔 7, 10, 49, 50, 55 — 63,
69, 71, 76, 85, 120, 125, 127, 128,
130, 132, 133, 166, 172 — 177, 198,
202, 204, 207, 208, 214, 215, 218
220, 222, 224, 225, 233, 246, 251,
254, 258, 272, 275 — 277, 279, 284,
295, 298 — 306, 327, 329, 331 — 333,
335, 336, 342, 344, 347, 350, 360 —
364, 385 — 387, 390 — 393, 398, 399,
403, 415, 425, 443, 447, 449, 450,
455, 459, 464, 465, 472, 485, 489,
491, 492, 498, 516, 521 — 523, 547,
577, 579, 592。

圣安东(郊区) 301。

圣彼得堡(彼得堡) 3, 122, 314, 415,
419, 423, 494, 574。

圣卢恰 597。

圣让达克 147。

施泰尔马克(施蒂里亚)(州) 319。

石勒苏益格 548, 549, 603。

士麦那(伊兹密尔) 156。

舒姆拉(舒门, 科拉罗夫格勒) 125,
130, 296, 586。

斯巴达 482。

斯海尔德河(埃斯科河) 147。

斯堪的纳维亚 601。
 斯库塔里(于斯屈达尔) 6、19、20、22、
 96、156、205、261、268、269。
 斯摩棱斯克 142。
 斯塔福德郡 32。
 斯特拉斯堡 222、226。
 斯韦阿堡(芬兰堡) 470。
 苏格兰 76、117、118、122、123、151。
 苏利纳河 45、108。
 苏茹克-卡列湾 149、450。
 索尔兹伯里 151。

T

塔甘罗格 28、36、449、465、485。
 塔古斯河(塔霍河或特茹河) 147。
 太平洋 494。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121、471、499。
 特拉佩宗特 291。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556。
 特洛伊城 特洛伊(伊利昂) 306。
 提尔(推罗) 229。
 突尼斯 586、589、590。
 土耳其 6、28、38、50、62、115、125、
 136、143、149、150、218、239、240、
 258、260、291、317、319、322、325、
 327、357、415、419、422、465、468、
 481、483、487、501、578、580、586 —
 593。
 土伦 247、523。
 托里什韦德拉什 177。
 托利 莫纳斯提尔(比托拉,比托利)
 586。

W

瓦尔赫伦岛 58、89、371。
 瓦尔纳 19、20、61、63、95、96、205、
 206、219、224、246、296、297、499。
 瓦尔塔河(瓦尔特河) 481、482。
 瓦拉儿亚——见多瑙河两公国。
 万塞讷 596。
 威尔士 4。
 威尔特郡 151。
 维多利亚 194—196。
 维斯图拉河——见魏克瑟尔河。
 维也纳 3、4、33、35、36、38、70、80、
 100、116、121、135、157、158、163、
 168、206、226、240 — 242、244、247、
 257、258、272、282、290、321、323、
 325、334、344、349、357、409、410、
 416、419、422、452、464、474、480、
 483、558、589。
 魏克瑟尔河(维斯图拉河) 84、142、
 463、475、481、574。
 温莎城堡 73。
 沃伦 沃伦省 80、84、89、249、326、
 445、446、522。
 乌得勒支 203。
 乌津 巴什河 388。
 伍利奇 499。
 伍斯特 伍斯特郡 433、434。

X

西班牙 26、31、40、47、126、147、203、
 531、542、584、606—608。

- 西伯利亚 314,473,572。
西蒂区 26,31—34,180,352—355、
368,373—377,434,488,513—515。
西哈克尼 182。
希腊 36,149,316,481,482,559。
锡兰(斯里兰卡) 499。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拉) 7、35、
50,206,275,296,297,578,591,592。
锡诺普 116,121,122。
锡瓦什 425,449。
辛菲罗波尔 7、50,57,216,248,298、
359,363,364,385,386,388,427、
498,523。
新奥尔良 532。
信德 信德省 25。
匈牙利 84,143,158,244,310,316、
318,319,321—324,326—328,446、
463,534,556,558,589。
休达 606。
叙利亚 589。
- v
- 雅典 26,103,138,226,227。
雅尔塔 364,386。
雅西 28。
亚德里亚海 322。
亚速 449。
亚速海 35,425,426,433,449,465、
485,523。
- 亚伊拉(山地) 387。
亚洲 136,258,291,481,482,585、
586,590,592。
耶利哥 247。
耶拿 8,389,531。
叶夫帕托里亚 50,57,63,65,176、
177,216—218,248,272,273,276—
278,362—364,386,389,394,444、
448,464,485,592。
叶尼卡列 449。
伊奥尼亚群岛 500。
伊兹梅尔 81,89,466,486。
易北河 322。
意大利 126,141,226,309,310,328、
463,491,556,558,594—596。
因克尔曼 8,61,63,202,215,220、
232,251,253,254,270,288,293、
339,361,364,385—387,443,447、
519,521,522,550,553,580,603。
印度 4,15,17,25,106,107,114,115、
123,151—153,179,185,189,191、
291,495,500,546。
印度河 107,114。
英格兰 4,76,151,373,503。
英国——见大不列颠。
- 7
- 直布罗陀 136,163,258,500,545。
中国 17,40,47,147,185,189,322。